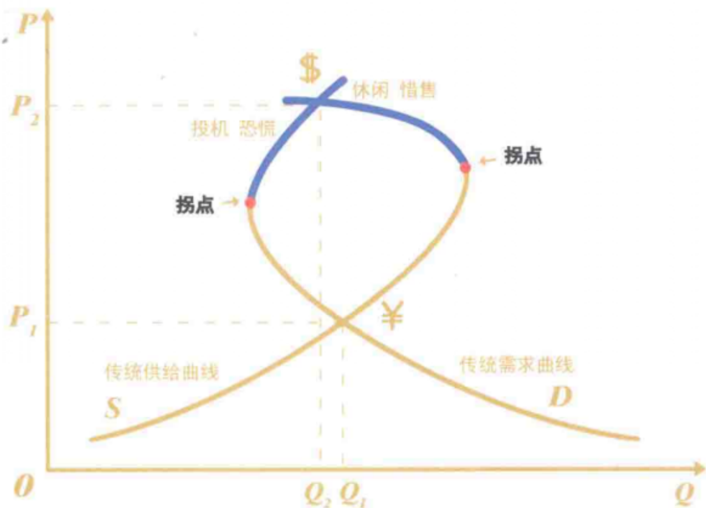
Pricing power

定价权

张捷（谁是谁非任评说）著

？为什么明明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美国人赚得就是**比你多**？

定价权的基础：劳动力与资源



掌握定价权的**制高点**，
是西方崛起、东方衰落的原点

殖民
是成本最低的
统治方式

定价权
是最有力的
财富分配方式

如今，中国如何重获定价权**进而复兴**？

左派与理中客最急需的系统理论支撑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Pricing power **定价权**

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 卢麒元	《定价权》一书意图揭示出利益形成的一些规律，张捷的努力无疑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白钢	本书观点，极富震撼而自证充分，为理解13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力量更替、升降、演进提供了充满原创性的解释，是一部兼具史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匠心之作。
产业经济学家、《三井帝国在行动》作者 白益民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定价权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集团的统治力。张捷同志向世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是否拥有定价权就是区别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准确标尺。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主任 吕述望	从“贵金属”到“金融”，再到今天知识文明时代网络中之“信息”，谁掌握了时代的核心关键词，谁就占领了制高点。"定价权”就是这样的利器。
《中国不高兴》作者、著名作家、评论家 刘仰	"看不见的手"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意指自由市场可以自行实现合理配置。张捷先生提出的"定价权"，对这一理论是一个挑战:在经济领域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同业鸦片》作者、资深金融专家 邱鸿	《定价权》一书为我们打开一个新视角，用鲜活的历史和事件，从殖民经济到互联网金融时代，诠释了流动性的定价逻辑，为理解全球金融霸权和竞争，打开一扇新思路之门，是一本非常值得细细品位的好书。
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 钮文新	市场的核心是价格，谁控制了价格，谁就控制了市场。因此，经济强权必然体现于价格主导，谁拥有这个权力，谁将主导市场，并使市场的天平倾斜于自己。
独立财经观察家 侯宁	美元的定价权从何而来？张捷这本书便给了你答案——硬的，铁蹄下得来的；软的，金融智慧赚来的！就此而言，这是一本博识的书，一本揭秘的书，更应是国人的励志书！
著名股评家央视评论员 徐一钉	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市场并没有定价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国家管理部门，还是企业高级管理者，亦或证券市场投资者，都有必要通过本书，了解国际列强在全球博弈中，如何利用“定价权”打击竞争对手，赢得全球领导地位。

上架建议/畅销书/

ISBN 978-7-5177-01

9 787517 701897

定价：69.80元

今阅·出品

今阅图书微信公众平台

看好书，找今阅！ 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cheerfulreading

定价权

Pricing power

张捷（谁是谁非任评说）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价权/张捷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177-0189-7

Ⅰ.①定… Ⅱ.①张… Ⅲ.①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研究 Ⅳ.①F7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393 号

书　　名：定价权
著作责任者：张　捷
出 版 发 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5177-0189-7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28.5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80 元

联 系 电 话：（010）68990646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68990682　68990686
网 络 订 购：http://zgfzcbs.tmall.com
网 购 电 话：（010）68990639　88333349
本 社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Recommended 推荐语

（按姓氏笔画为序）

张捷，一个尚未被道德束缚的、尚未被知识蒙蔽的、尚未被金钱腐蚀的布衣学者。用心去读世界，就会形成自己的学问。用一颗方正的心去读世界，就会发现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真学问，就是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定价权》一书意图揭示出利益形成的一些规律，张捷的努力无疑是重要且有价值的。

——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　卢麒元

本书将定价权问题的脉络置于世界文明史之中加以考察，发覆自宋元易代之际直至当下，伴随货币及相伴生之社会—经济—金融制度的内在迁变逻辑。诸多观点，极富震撼而自证充分，为理解13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力量更替、升降、演进提供了充满原创性的解释，是一部兼具史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匠心之作。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白　钢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定价权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集团的统治力。张捷同志向世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是否拥有定价权就是区别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准确标尺。

——产业经济学家、《三井帝国在行动》作者　白益民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众多理论假设的理想状态，从微观到宏观，从市场竞争到国际博弈，那些貌似浑然天成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有人力而为之的影子。从“贵金属”到“金融”，再到今天知识文明时代网络中之“信息”，谁掌握了时代的核心关键词，谁就占领了制高点。“定价权”就是这样的利器，我们可以不盘剥别人，但一定不能被别人压榨。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主任　吕述望

“看不见的手”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意指自由市场可以自行实现合理配置。张捷先生提出的“定价权”，对这一理论是一个挑战：在经济领域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中国不高兴》作者、著名作家、评论家　刘　仰

中国货币总量超过118万亿元，人民币已经走出国门，以中国经济为基础的人民币即将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人民币的价值几许，是弱化美元，还是强势美元的新伴侣？人民币有无国际地位的定价权？张捷先生撰写的《定价权》一书为我们打开一个新视角，用鲜活的历史和事件，从殖民经济到互联网金融时代，诠释了流动性的定价逻辑，为理解全球金融霸权和竞争，打开一扇新思路之门，是一本非常值得细细品位的好书。

——《同业鸦片》作者、资深金融专家　邱　鸿

市场的核心是价格，谁控制了价格，谁就控制了市场。因此，经济强权必然体现于价格主导，谁拥有这个权力，谁将主导市场，并使市场的天平倾斜于自己。我们国人到底有多少能意识到价格的重要？真要意识到，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漠视资本定价被任意扭曲而失效，因为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格。我们必须关注价格，关注价格形成机制，关注价格变动中利益的倾斜、传导，尤其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被定价权扭曲的价格将给我们利益带来的巨额损失。所以我们看看张捷带来的这本书吧，它可以带给我们许多真相。最后还想说一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很多时候并不成立，因为我们生活在寡头垄断的世界里。

——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　钮文新

定价权这个词为国人所熟悉应该是从铁矿石开始的，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却无法拥有铁矿石定价权，这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但定价权又是什么呢？玩过期货和外汇的人大都明白，因为作为结算货币的美元就拥有最大的定价权。然而，美元的定价权又从何而来？定价权是否相当于品牌？张捷这本书便给了你答案——硬的，铁蹄下得来的；软的，金融智慧赚来的！就此而言，这是一本博识的书，一本揭秘的书，更应是国人的励志书！

——独立财经观察家　侯　宁

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市场并没有定价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国家管理部门，还是企业高级管理者，亦或证券市场投资者，都有必要通过本书，了解国际列强在全球博弈中，如何利用"定价权"打击竞争对手，赢得全球领导地位。本书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中国需要"定价权"。这点尤为重要，对于企业家、投资者，这其中即孕育着机会，也面临着风险，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所在。

——著名股评家央视评论员　徐一钉

PREFACE 序言

敲开金融霸权的内核

很多人都抱怨：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不但普通人看不懂，连一众专家学者们也看不懂。不管你是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还是经济金融问题学者，不管你是秉持传统经典学说，还是运用现下流行理论，统统解释不了——起码无法完美解释——当今世界乱象。

谁该为2008年金融危机负责？是华尔街，还是美联储，抑或美政府？既然克里已承认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错误，那么对伊拉克重陷内战后撒手不管，是避免陷入新的错误，还是在犯始乱终弃的错误？用互联网推进颜色革命，颠覆异己国家，让中东地区陷入连锁式混乱，到底对谁有利？在波黑战争时，西方积极推进科索沃公投，为什么到了乌克兰危机，西方却拒不接受克里米亚分离？为什么恰恰在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亚太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变得愈加不平衡？

地球人都知道这一切皆与美国有关，但地球人大都不会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与美国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美国什么东西有关？

知道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难题的人很多，但知道如何去解这道难题的人却没几个。

更何况在面对事关美国和霸权的奥秘这一顶级话题面前，“天机不可泄露”这句中国人的古语，似乎已成为世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禁忌；集体性失语。那么他们究竟是心知肚明而刻意回避，还是根本就没有能力谈论这个话题？在我看来，后者的可能要大于前者。

因为要谈论这个话题，首先需要有手术刀一般锐利切割问题的洞察力。而这

是一般有学历、有学识、有专业资质的人未必都能具备的能力。更何况洞穿这一问题还需要一定的天赋，谈论这一问题更需要一点勇气呢。这就使得很多人绕道走开，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敢碰这一敏感又尖锐的课题——帝国霸权之谜。

所有的帝国都会追求霸权，行使霸权。但霸权的核心是什么？霸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又是什么？这是千百年来从中国人谈论“霸术”到西方人（马基雅维里）研究“君主论”，都一直瞄准的靶标，却很少有谁能一语中的。

特别是当这个话题在过去一百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里加入了美国因素之后，就更加变得扑朔迷离，令人难解。

首先，美国是个帝国么？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如果说是，美国却分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从它没有海外殖民地，也不从其打仗占领的国家掠夺资源财富，更不驱使奴役占领地的人民来看，美国完全不像一个帝国。如果说不是，美国为什么追求霸权，并且拥有霸权？1975 年 8 月 15 日之后，美国人用纯粹的信用——纸币——获得了它孜孜以求的金融霸权，顺便也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美国的确没有一块海外殖民地，但它却把全球贸易都纳入了用美元结算的实质性金融殖民体系；它也的确没有公开掠夺过别国的资源和产品，但它用几乎没有成本的“绿纸”交换这些资源和产品，这无异于隐形的掠夺；它也没有驱使和奴役别国的民众去为美国直接打工，但它却通过制造业转移，把美国人眼中的那些“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统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间接的“驱使和奴役”，它自己却不用承担管理和统治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成本，又不用面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劳资纠纷、反抗和敌意，而帝国之利，它却一分也没少得，甚至所获更丰。看看近二十年来，美国 GDP 整整翻了一番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的距离！

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慧的帝国。

这个帝国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有些人试图解开这个谜底，但几无成功；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和回避。谁愿意冒揭开“伏地魔”的真实面目，而被它所伤害的风险呢？想想阿桑奇和斯诺登的下场！

但，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站出来，扮演揭穿“皇帝的新衣”的勇敢者角色。

今天，这个人是张捷。

他用《定价权》这只榔头，为我们敲开了金融霸权坚硬的外壳和内核。

看看他发现并告诉我们什么？

一开篇，他就把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定价权”问题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既然是波动就有高有低，没有‘定价权’问题。”“而西方经济学讲的是供求关系，在供给随价格越来越大和需求随价格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形成所谓均衡点”，应该也不存在“定价权”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迄今为止没有一位东西经济学家发现的问题）。可事实是，无论从个人经验，还是从国与国贸易融通的角度看，定价权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那么，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缺位，究竟是无知者的认识盲点，还是有知者的刻意掩盖？我想是二者兼有。

无知者的认识盲点，可以不必追究，因为人类历史上，知识和思想，从来就不是对所有人洞开的。

对“有知者的刻意掩盖”，我们倒是应该问个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对这一人们从日常生活到国与国贸易融通时时刻刻都会遇到的问题，要刻意遮蔽，不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甚至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独独不讲授这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环节？

由此开始，张捷一步步、一层层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发现：

首先，他发现了西方近代的崛起，不是始于科技的进步进而导致的工业革命，而是缘于蒙古骑兵带着从亚洲各国特别是大宋帝国劫掠的大量金银，远征欧陆，其后是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把从新大陆尤其是印加帝国劫掠的巨量黄金，运回欧洲，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丰厚充裕的流动性，才使西方获得了殖民东方乃至世界的雄厚金融实力，也使西方人可以用极低的利率就获得资本发展经济。相比之下，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贵金属的开采量低且屡经战乱，造成流动性始终不足，一直处于高利率状态，无法充分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其产品在与低利率下的西方产品竞争时便毫无价格优势。结果，一旦东西方贸易的大门打开，缺少流动性的一方，为了尽快出售产品以换得现金，就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也在所不惜。久而久之，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定价权拱手让人。这意味着丧失了定价权的东方包括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一开始就输在了起

跑线上。获得了定价权的西方，则可以极其低廉的方式占有东方的财富和劳动，进而从从容容地发展自己的科技，开始一场改变西方面貌的，也改变世界格局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从此进入西方人主导的世纪。

这就是定价权的秘密，而这种不那么光彩的秘密，西方人怎么可能把它昭示天下，写进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

而当美国人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金融权杖，又经过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背弃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化后，更把“金融定价权”推高到了一切定价权的巅峰。一切价格皆由美元标的，意味着一切财富价值几何都由美国人说了算，这是操控全球财富的最高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中国人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奇观”，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没有定价权，就没有发展权，也就没有生存权，这个道理，那些认为中国如不把自己的“肉”廉价卖出去，就连肉汤也喝不上的人，懂吗？

定价权就是财富的分配权，最终也就是对财富的占有权。

“中国要崛起，首要的是不能被掠夺，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要认识到分配财富的权力是更重要的层面。一般经济学家多围绕 GDP，围绕怎样提高一国的 GDP 来发展经济，但 GDP 只不过是财富的增加量，不反映背后谁拥有和分配这些 GDP。在初次分配之后，用定价权在再分配中牟利，这些（才）是西方御用学者不会明说的不传之秘。”张捷如是说。话虽平和，但不啻于对中国人敲响的一记警钟。

面对美国这个手握金融霸权——其核心权力是金融定价权——的超级帝国以及它的帝国实践，我想，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是不是到了应该修订一下的时候？起码，从现在起，中国人自己应该明白，什么是定价权？它与中国的崛起乃至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大国坐标系上找到中国的位置，也为中国更准确结实地迈出下一步，确定清晰的路标。

为此，每个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下张捷的《定价权》，并细思之。

乔　良

2014 年 7 月 14 日于北京夕照寺

PREFACE
序 言

一、定价权的关键是什么

定价权——从199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猛增、中国外贸在全球外贸中排行地位上升，定价权就开始成为中国外经贸部门，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部门热烈探讨的主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现象日益突出，自信心日益高涨的国人对国际经贸的受剥削感相应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空前高的水平，定价权话题愈发炙手可热，我本人就曾为此写过多篇文章。

然而，定价权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公众和贸易部门的直觉通常将微观层次的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等视为定价权关键，认为是由于经营同类商品的企业主体数量过多，导致低价竞销和高价竞购，肥水外流。基于上述认识，我国一方面多年来推动骨干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屡次整顿外贸秩序，就多种出口商品建立了各种名目的协调机制。其一是对30多种重点、大宗和敏感商品实行海关审价、商会预核签章；其二是通过外经贸商会设立商品分会，协调会员企业行为，食品土畜、五矿化工、机电、轻工工艺品、医疗保健品等进出口商会各自设立的商品分会和协调组，一度均数以十计。特别是随着中国资源进口价格风险的凸现，海外集体采购的主张也曾经赢得了广泛的赞同者。2005年进口铁矿石大幅度涨价风波之后，中国对铁矿石进口企业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资质管理，后来连续数年进一步收紧。同时，在21世纪前10年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越式发展中，资源投资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之一。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都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我们也需要保留未来有必要时在一定规模上再度使用这类措施的权力。然而，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上述贸易做法与外经贸经营权自由化的趋势相悖，潜藏着一系列设租、寻租的腐败机会，对市场效率也存在长期的潜在损害；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以来推行的公司资本制度（一元钱注册公司）、取消工商年检等改革措施，对这些措施的内在问题能够认识得更加深入。而海外资源投资的热潮也带来了顺周期投资导致高位买入套牢的问题。

不仅如此，这些贸易措施还存在遭遇其他国家反垄断诉讼的风险。2005年2月7日和2月17日，美国Ranis公司和得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Animal Science Products Inc.）以及一些个人分别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高等法院提出反垄断申诉，指控维尔康（华药集团）、维生药业（石药集团）、江山制药（华源集团）、东北制药等6家我国维生素C（简称VC）巨头，声称中国上述6家企业自2001年12月起联合操纵出口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维生素C价格与数量，触犯了美国及加利福尼亚州反垄断法规，致使两家原告公司蒙受损失，表示要向中国企业索取3倍的损害赔偿以及其他辅助赔偿，成为中国企业在国外遭遇反垄断诉讼第一案。经过数年纠缠，中国企业最终在此案中败诉。

维生素C案开此先河之后，对中国外经贸企业的反垄断诉讼一时大有纷至沓来之势：

同年10月末、11月初，美国得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宾夕法尼亚州雷斯克公司又向新泽西州纽瓦克地方法院递交了长达56页的起诉书，指控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等17家中国企业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指导下，先后成立了中国镁砂出口联盟和中国镁砂论坛，利用定期开会、通信、电话会议等方式，组成了价格卡特尔，合谋控制镁砂出口供应，操纵镁砂和镁制品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镁砂价格持续大幅上升，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规中关于公平竞争的规定，要求对他们进行处罚。

维生素C反垄断案诉讼进入司法程序之后，铁矿石领域也一度酝酿涉华跨国反垄断案件。在2005年铁矿石进口价格谈判僵持、我国提高铁矿石进口企业门槛的背景下，为了索取更高的价格，一些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开始搜集证

据，企图向世贸组织有关争端解决机构指控中国规范国内铁矿石市场的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①

……

正因为感受到了潜在风险压力，为未雨绸缪起见，某进出口商会于2007年委托我开展了《国外竞争法规与我国进出口商品协调体制的潜在冲突及其防范》课题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反垄断域外管辖制度的建立及其实践，又使得中国获得了一件用于打击、抑制外国企业垄断剥削行为的利器。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这简短的一句话标志着中国确认了反垄断法域外管辖的原则，确认中国有权力对影响境内市场的境外行为实施管辖；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二进口大国，而且保持着政治独立自主，又使得中国有能力对外国企业落实这种域外管辖权力。在实践中，2013年初国家发改委裁定韩国三星、LG等企业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罪名成立，并为此责令其退还、没收和罚款合计3.53亿元；高通、进口豪车价格立案，中国反垄断域外管辖制度的威力正逐步展现。相应的，中国高度依赖进出口商品协调机制来争夺定价权的做法其必要性日益降低。

进一步考察进出口商品协调机制和价格集体谈判制度的结果，还可以发现，在某些重要进出口商品上，上述机制的效果并不理想。最典型者莫过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三大矿山就进口铁矿石长协价格开展的集体谈判，前几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谈判不可不谓努力，但始终无法遏制进口铁矿石价格暴涨的势头。

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我们逐步认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在更高层次上，金融资本和流动性的管理才是定价权的关键。资本主义"中心"国度源源不断向"外围"地区输出金融资本和相应的金融泡沫，在此进程中获取铸币税收入，以及货物和资产市场上的定价权，张捷这本《定价权》（原副书名：流动性的货殖天下）的原副书名本身就体现了对这一进程本质

① 《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5月12日。

的认识，是在资本流动和金融全球化的基础上探讨这个问题，只不过他没有使用这样学究味的语言而已。

从较长历史跨度上看，这一带有浓烈“弱肉强食”色彩的进程已经存在很久，未来还将继续存在相当一段时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有必要加深对这一机制的认识。张捷此书中将这一进程起点上推，超过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一直到了蒙古西征及其屠杀；国际共运和学术界的先行者们也早已将对这一机制的考察放到了大历史的背景之上。在其1912年的《资本积累》一书中，国际共运早期著名烈士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而且只有通过将弱小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外围纳入其空间，才能求得生存。这是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工人的消费是积累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是积累的目的和前提，资本主义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环境来解决扩大再生产为谁进行、谁是积累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的消费者这些问题，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没有这种买者，而且也不可能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度还是“外围”地区，历史上资本一次又一次因为实质经济部门无法寻觅有利可图出路而涌向虚拟的金融资本领域，当苏东剧变基本消除了非资本主义外围环境，旧有的殖民战争扩张途径又不具备现实性时，金融资本全球化就成为资本主义内向扩张以暂时缓解其内在矛盾的最重要途径。通过这一进程，发达国家的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行使着流通、支付和储藏职能，金融资本不断从发达国家注入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获得以纯粹信用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以维持国际支付能力，就必须通过贸易等渠道将其实物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往发达国家，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借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攫取铸币税，以及货物和资产市场上的定价权。

二、从金融危机的视角考察定价权

正由于定价权的关键在于金融资本和流动性的管理，所以张捷此书把大量篇幅隐含地用于从现实和潜在金融危机的视角讨论定价权，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国际资本流动驱动下的金融全球化本身就会导致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

假定金融资本持有者全部保持平稳心态，各自持有1单位生息金融资本，

则经过一段时间后全球金融体系达到均衡时，这些金融资本持有者因资本自我增殖而各自持有1.2个单位的生息金融资本。如果少数金融资本持有者发生恐慌而放弃持有生息金融资本，转而持有不生息现金乃至实物资本，继续持有者因金融资本贬损而丧失了利息收入，放弃持有者因其已经将金融资本转换为不生息资本，故全体原持有人相当于仅持有1单位金融资本。假如信用恐慌严重，更多的持有者放弃持有将导致生息金融资本的贬损越发恶化，全体原持有者最终将发现仅相当于持有1/i金融资本。如果信用全面崩溃，则金融资本持有者将发现其原持有的金融资本缩水到1/n个单位。由于全球金融资本持有人数n极为庞大，等于说是一旦信用崩溃，金融资本将不名一文。

在纯粹信用本位全面确立之前，金融体系的这种内在脆弱性尚且不太明显，金融危机局限于一国、一个地区之内，n相应也比较小；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持有者都可能卷入同一场危机中，n急剧增长。金融恐慌发生及蔓延的本质就是金融体系的初始微小扰动（如个别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恐慌、个别金融资产的贬损、个别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其他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持有者、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发生怀疑。假设发生微小扰动时，单个金融机构均有98%概率选择继续持有金融资产，2%概率放弃，且金融全球化之前n=10，金融全球化之后n=100，则金融全球化之前金融体系维持稳定的概率为（98%）10=81.7%，金融全球化之后维持稳定的概率为（98%）100=13.2%，即金融机构之间达成协议维持稳定的概率随金融全球化深化、机构投资者增长而出现指数下降。

进一步地，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游资的增长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行由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资本从中心向半外围和外围国家输出导致实物资本不断反向流动。随着外围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不断恶化和实质经济的侵蚀，外围国家金融资本对真实财富的索取权日益削弱，投机性攻击因而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游资必然对新兴市场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从金融资本和流动性管理层次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价权问题，不可避免要涉及从金融危机视角探讨。如今正值美联储已经决定于2014年10月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际，经历了近两年新兴市场的经济金融震荡，特别是2013年5月之后围绕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预期而引发的新兴市场大面积震荡，张捷此书中的相关探讨尤其有意义。

三、重新审视“货币超发”和金融资产膨胀

毋庸置疑，我们要控制流动性增长和通货膨胀，张捷在此书中还提出，面对西方货币政策变动导致全球信用崩盘和“剪羊毛”（实际上就是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风险，中国有必要主动刺破泡沫在先。但是，从长期来看，在这个“中心”国家源源不断向“外围”国家输出金融泡沫的现实世界上，为了争夺定价权，为了改善本国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货币供给和金融资产的适度增长，甚至一定程度的金融泡沫，都是必要的。从这一点出发，回顾2010年沸沸扬扬的“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说法，可以看到，所谓“货币超发”和金融资产膨胀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之说大意如下：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中国货币供给量有3个层次的衡量指标：

M0＝流通中现金，

狭义货币供给M1＝M0＋活期存款＝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

广义货币供给M2＝M1＋准货币＝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所谓“货币超发”，指的是广义货币供给M2超过GDP。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货币超发，由于货币供给增幅持续高于GDP增幅，货币超发现象近年来与日俱增。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GDP总量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多出了27.1万亿元。2009年我国GDP为33.54万亿元，是1978年GDP规模3645.2亿元的92倍，但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是前者的705倍。其后几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还在进一步加大。“货币超发论”者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

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超发的货币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正值美日第二轮定量宽松引发全球性货币洪灾，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诚不足为奇；然而，上述论述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甚至存在基础性讹误。GDP是流量数据，即衡量的是一段时期内产出的规模；货币供给是存量数据，衡量的是某一时点的货币规模；将作为流量数据的GDP和作为存量数据的货币供给直接比较，颇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不仅如此，货币理论也没有提供必须以M2作为衡量货币是否超发标准的依据，以M2而不是M0、M1或其他货币口径衡量货币是否超发，并无扎实的理由。M2与名义GDP之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收入比率。

不仅如此，从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膨胀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的必然性，目前舆论热炒的所谓"货币超发"不过是金融资本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马克思确认，"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①] 因此，产业资本一度得以凌驾于生息资本、商业资本这两类"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②] 之上，并使货币和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职能机构"或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然而，马克思在指出他所处时代产业资本的优势地位之后，便发出这样一种警示性的说明："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③] 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页。

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而在列宁和希法亭（20世纪前期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时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已成现实。

受种种条件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德国等中欧地区，借助国民经济统计理论与技术的进步，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时间跨度上对金融资本的发展进行更精密的定量研究。在历时25年方才完成的巨著《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 施瓦茨考察了19世纪中至20世纪70年代美、英两国货币数量与其他关键性经济变量的关系，认为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发展同步，金融资本占GDP总量的比例提高是经济增长进程的内在趋势，从而为日后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基础。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考察了35个国家近200年的金融发展实绩，梳理、分析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12条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第一条就是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的增长快于经济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因而一国的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绝对规模和金融相关率的演变进一步验证了戈德史密斯的论断。倘若说戈德史密斯的论断与迄今各国金融发展历程有何重大出入，那就是戈德史密斯显然大大低估了金融资本的增长潜力。他根据历史经验断言，金融相关率达到100%～150%时便将趋向稳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相关率多在70%～100%之间。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相关率便突破了戈德史密斯所宣称的理论上限；到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金融相关率都突破了300%的大关；到2001年，全世界金融相关率（根据股票市值、债券、银行资产总和计算）高达484.2%，其中欧盟15国为651.9%，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西方国家都超过500%，亚洲新兴市场为301.2%。[①] 即使是处于金融压制状态长达几十年的中

---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3年3月，第121页（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March 2003, p. 121）。

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一旦启动便显示出了强大的动能，1980 年代末金融相关率便达到了 200%。

不仅如此，中国的某些特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货币供给和金融资产增速超越 GDP 增速。一方面是整个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许多原来不投入市场的投入和产出要投入市场，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是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从1990 年代以来连续贸易顺差近20 年，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有较大的被动性。但只要我们能够创造足够的金融工具吸纳增发的货币，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实施提高准备率、利率等措施，“货币超发”就不至于对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形成实际的威胁。

四、经济学界外部人分析的独到价值

毋庸讳言，本书作者张捷不是经济学专业科班出身，但这恰恰是他这本书的独特价值所在。尽管经济学是当今之世名列前茅的“显学”，以至于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称，我仍然坚定地认为，经济学更应当被看做是历史学的一种。既然如此，任何理论都不能取代对事实的记录，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对事实的分析之上；而这些记录既包括已经高度系统化的统计数据，也包括对方方面面事件貌似不那么学术化的记录。而且，通俗的、不那么“学术化”的记录自有其高度学术化的记录所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所谓“学术化”往往也意味着用一种思维模式去裁剪事实，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失真。

不仅如此，张捷的家庭背景和在投资界积累的多年实战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投资界实战经验的价值自不待言；更不可替代的是家族出身背景的价值。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Jr.，1918～2007）的名声在经济和管理学界无人不晓，他那本《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堪称经典；而若非出身与杜邦、福特等巨型企业高管之家，寻常人家子弟也实在难以深入了解哪些巨型企业组合的详细情节，难以理解当事者的思维逻辑。张捷出身数百年世家，祖上在洋务运动时期参与主持开发开滦煤矿、秦皇岛港口等国家命脉项目，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当时也是该企业的雇员，被公认为京东首富。外祖父为赵炳麟后人，是戴季陶亲外甥和侍从秘书，其家族

为湖州著名望族，署理过总督当过两江盐运使入过军机处、同文馆。张捷的家世与民国、共和国时期的不少名人沾亲带故，祖父外祖父后来还都留学海外名校，成为大师级科学家为中国航天和矿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他熟知许多我们这类平民子弟所难以想象的财富管理操作手法和细节。在他以前的文章中，我对此已经深有感受，在这本书中，他讲到的某些内容，如艺术品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我此前也想象不到，相信读者阅读他的作品时会感受到这些。

我并不认为张捷这本书所有内容都无懈可击，相反，从史料到分析逻辑，都存在可商榷之处。如本书中提到蒙古人用从东亚、中亚、西亚掠夺的金银去购买未被蒙古人占领破坏的西欧货物，此说恐怕不确。因为即使经过惨绝人寰的蒙古屠杀，当时西欧发展水平与中国仍然相去甚远，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中才会有那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口吻，这样的落后地区不可能向蒙古亲贵提供多少他们追求的奢侈品，当时中土金银大规模外流主要源于赏赐之类超经济剥削。蒙元统治者在中国本土禁止金银流通，用纸币大量收兑中国居民白银，以赏赐成吉思汗子孙后代诸王贵族之类名义运往中亚、西亚，往往一次“库里尔台”大会（即部族贵族全体大会）便要掏空上都、大都的库藏还不够。中国本土居民在近百年天文数字通货膨胀变相掠夺榨取下痛苦呼号，中亚、西亚（至少是当地权贵阶层）则在中国白银的洪流之上弦歌狂欢。中亚、西亚虽然自古通行银币，但11世纪初以来已经因为白银不足而停止铸造银币，此时凭借蒙元统治者强制收兑运来的中国白银而从13世纪中叶重新开始铸造银币，新铸银币也往往因中国白银颜色发白而干脆以“白”为名（当地产白银因含铅质较多而发黑色），如塞浦路斯和特列比松（Trebizond）在此期间所铸银币就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元末人民大起义反抗蒙元统治时，最激动人心的谴责之一就是“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但就总体而言，这本书值得一看。

梅新育
2014年7月24日

PREFACE 前言

定价权的概念热了很久，但在中外正统的经济学著作当中对之却讨论甚少，但“定价权”又真真切切地让我们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尤其是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的怪现象。中国要崛起，对待定价权的问题确实是要思考了。

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既然是波动就是有高有低，似乎没有“定价权”的问题。而西方经济学讲的是供求关系，在供给随价格上涨越来越大和需求随价格上涨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形成所谓的均衡点，在这个理论下，均衡点总可以很快形成，也不存在“定价权”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假设实际上就是假设了定价权是不存在的。那么定价权是怎么来的？定价权真实地让你感到它的存在，真实地影响着中国的崛起。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马克思的价值尺度扭曲，又是什么打破了市场出清的西方微观经济假设，让价格总是偏离应有的均衡点？

本书的副标题提到货殖天下，其实中国古代对于货殖的理解就是有定价权的含义的。货，《尚书·洪范篇》云：“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殖，《广雅》云：“殖，立也。”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货殖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即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殖就是滋生的意思。货殖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要在交换当中有“殖”的成分滋生利益，商业带来的巨大价值增加不是简单的价值交换，而是通过获得

定价权来取得利益。因此本书首先将探讨殖民的概念和历史作用，殖民不仅仅是移民，也不是一连串形容词的描绘，而是一种通过建立定价权进行掠夺剥削的统治方式。

我们认识历史是有很多误区的，西方殖民的时代是早于工业革命上百年的，西方殖民的时候在技术上是落后于东方的，甚至军事技术也是落后的，对比一下郑和的宝船与西方殖民者的小帆船就知道了。因此所谓科技进步导致西方崛起的理论只是一块掩盖历史真相的遮羞布！科技创造财富，但不会分配财富，**定价权才是财富的分配权！**西方是先有财富分配权再有科技发展的，而且在定价权下所有的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或者偷到的。

殖民者技术落后，要进入到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的市场，如何才能够交易？而这种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殖民者有更多的流动性，能够以这些金银来购买东西！西方如果当年没有远远超过东方的流动性，是不能殖民东方的。西方早年进入东方的船只往往十分简陋，武力也是不行的，葡萄牙开始的殖民就是一场蛮族入侵，只不过这个入侵是以货币流动性为主要武器的。

我们很多人忽视了在中国最强大和领先世界的时期，中国人的收入只有西方人的1%，这是在工业革命前的差别，是中国生产力水平和技术领先情况下的差别。对应到利率上，中国古代的高利率大家都知道，常常是在50%甚至100%以上，但西方的历史利率往往只是10%以内甚至只有5%，二者在贸易领域相遇进行竞争，到底谁能够获胜这不是很清楚吗？资金紧张的一方是不得不低价出售以尽快取得现金的，因此定价权一定是拱手让人的。

认识历史，正本清源，我们才能够理解定价权，理解定价权对于世界的财富分配，中国要崛起，首要的是不能被掠夺，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要认识到分配财富的权力是更重要的层面。一般经济学多围绕GDP，围绕怎样提高一国的GDP来发展经济，但GDP只不过是财富的增加量，不反映背后谁拥有和分配这些GDP在初次分配之后，用定价权在再分配当中牟利，这些才是西方御用学者不会明说的不传之秘。**而财富到底是怎样通过价格体系被分配的，**就是本书试图要向大家阐述的内容。

CONTENTS 目录

引 言 崖山之后无中国之定价权

第一章 西方殖民崛起与定价权

殖民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在武力维持秩序下经济的征服，是一个定价权的控制和财富掠夺过程。印度被征服的时候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近百年，而且印度是发达先进的一方。西方的崛起和胜利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这个过程是西方贵金属流动性富集下的资本优势，是价格革命的延续结果，是西方取得全球定价权的必然。在定价权下，全球的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

第 1 节 近代西方价格革命 / 8

第 2 节 认识殖民的真谛 / 32

第 3 节 认识印度被殖民后的掠夺和灾难 / 70

第 4 节 殖民定价权带来的全球变革 / 79

第 5 节 从殖民、集权到信息的社会发展 / 82

第二章 流动性与定价权

定价权到底是什么决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却不主宰财富的分配。西方崛起的几百年间，西方的利率基本是5%以内，而中国则是百分之几十以上，流动性的差别才是关键。本章将介绍笔者的理论核心，笔者将通过供需曲线的后弯与畸形，发展传统经济理论，给您解答下面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流动性与定价权的关系是什么？西方经济理论在美元性质改变下有什么变化？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却可以收益率低于不会违约的美联储利率，这些现象的理论基础在哪里？这里将告诉您为什么有定价权存在，带您认识供需曲线后弯和畸形带来非市场出清的定价权……西方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情，在物质无法从明天穿越的情况下，背后是什么样的定价掠夺？

第 1 节　科技进步不是定价权决定因素 / 88
第 2 节　定价世界的关键是流动性 / 91
第 3 节　从美债收益率低于美联储看金融定价权 / 102
第 4 节　供需曲线的扭曲与定价权理论 / 108
第 5 节　货币结算权与金融定价权 / 121
第 6 节　借贷消费、定价权与流动性穿越 / 126
第 7 节　定价权和本人劳动资源二维价值论 / 134

第三章　定价权关键要素资源和劳动力

各种价格都是广泛联系的，定价权不是微观上某个产业的定价，因为产业都是与其各种要素成本和下游使用者广泛联系在一个价格体系内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体系的关键要素就是劳动力和资源的定价，压低了竞争对手的劳动力和优势资源价格，就在整个定价体系中取得了主导权。通过流动性的优势和奴隶，把殖民地的资源变得极为廉价，西方劳动力价格在中国领先的时代就是东方的 100 倍左右，这才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第 1 节　从定价权体系当中找出关键要素 / 154
第 2 节　资源、劳动力与定价权 / 156
第 3 节　劳动力价格与定价权剥削 / 169
第 4 节　资源积累的重要意义 / 197

第四章　流动性的博弈和金融定价权

国际流动性的松紧和流向以及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决定了整个定价体系的尺度。在价格体系国际博弈中，货币的价格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货币是所有价格体系的尺度，货币的尺度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和不同尺度下也会出现不均衡。货币流动性的不均衡也产生价格的渔利和定价权问题。金融也是有成本和价格的，金融货币也是可以输出和定价的产品，金融的定价权就是金融霸权。在金融统治市场的时代，金融定价权成为霸权的核心。

第 1 节　认识金融的成本与价格 / 214
第 2 节　金融霸权与定价权 / 218
第 3 节　美欧的流动性的腾挪 / 231
第 4 节　认识流动性不均衡问题 / 242
第 5 节　金融定价的博弈 / 260
第 6 节　流动性下全面认识人民币升值 / 268

第五章 货殖 QE 时代

量化宽松简称 QE，在日本的日元升值和国内经济衰退背景下，由日本人创造，日本刺激了 20 年，也失去了 20 年，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世界发达国家却采取了类似做法。美联储是不断 QE 的主导者，QE 到底带来了什么？对定价权有什么影响？围绕 QE 大家都在博弈什么？QE 为何会导致中国海外投资的屡战屡败？QE 的未来走向在哪里？我们分析定价权，离不开对 QE 的认知。

第 1 节 定价权与为什么要 QE ／276
第 2 节 QE 不是简单等同于印钞 ／286
第 3 节 土地价值将重组世界 ／295
第 4 节 美元霸权的新动向 ／306
第 5 节 中国受控着陆博弈 QE 定价权 ／322
第 6 节 未来的 QE ／327

第六章 微观调控与打破定价霸权

中国要崛起会面对怎样的风险？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的风险有多大？宏观上在世界一体化和西方定价霸权下中国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应当如何学习日本在微观层面解决问题？微观调控理论对中国有现实意义，央行的新工具在微观流动性控制上具有重大意义，控制流动性和金融价格利率才是中国取得全球价格体系定价地位的关键。

第 1 节 要有再次危机的忧患意识 ／340
第 2 节 认识中国的微观风险 ／343
第 3 节 微观调控博弈定价权 ／365
第 4 节 央行新工具 SLF 与微观调控 ／390
第 5 节 中国走向低利率是崛起关键 ／402

后 记 ／425

引 言
崖山之后无中国之定价权

中国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衰落的？世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崖山之后无中国”指宋元鼎革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剧变，其历史故事是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后宫及群臣大多随之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壮烈殉国！《宋史》记载，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西方人认为中华文明自此而绝，但我们炎黄子孙对西方人这样的说法是不承认的，中华文明是历经挫折而复兴，自古延续至今的！笔者在本书的开篇提出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从定价权的视角重新让大家认识这个历史事件，这是东西方文明定价权的历史拐点，从这个时间开始，中国掌控世界千年的定价权不复存在，转而是西方的定价权控制了世界，虽然有后面明朝的发达和康乾盛世，也只能以闭关锁国来对抗西方的定价优势，直到中国的国门被大炮敲开彻底衰落。定价权的转移是兴衰更替的关键，失去了定价权则意味着未来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经受多次战败失血甚至死后重生，但对失去定价权后日复一日的财富贸易流失，对此经年累月的失血和给竞争对手输血，则是无法承受的。

崖山之战是宋朝对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十万军民投海殉难，陆秀夫背负幼帝于崖山跳海，宁死不降，何其壮哉！此战之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崖山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独

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文官制度、皇权礼教信仰、先进的政治制度等都中断了，很多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宋以后那个自信、开放、宽容的大汉民族的民族性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元代有独立反抗精神的人被屠杀了，剩下的北方汉人是三等臣民，而南方汉人更是四等接近奴隶，整个元朝汉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贱民。这些对崖山之后中国变化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在政治上进行的，在经济上崖山宋亡怎样影响了世界，怎样导致世界的财富格局变化，有关学者的研究则不够深入或者根本没有涉及，而本书则将揭示定价权怎样在崖山之战后成为东西方历史的拐点，怎样决定了现代人类经济社会的行为规则和财富分配。

崖山之后宋朝的户籍簿上 3/4 的汉人都被屠杀，当时汉人的社会精英要么被屠杀，要么投海自尽。宋代能够去海外的人是有限的。崖山海战之后，海上浮尸十万，那基本上是宋朝之举国精英了，这一次亡国之变让中国的历史财富遭受巨大损失，而我们更关心的则是中国领先世界时所集中的世界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的天然货币——贵金属的去向，这些贵金属到哪里去了？在征服战争当中，财富的不动产部分是很容易占有的，财富的动产部分则很不同，除了大量的动产被消耗以外，看似不会消失的贵金属货币，实际上也是会大量灭失的，尤其是在被征服民族宁死不屈的情况下，这些贵金属财富是找不到的。具体到南宋的灭亡，十万跟随皇帝的富人精英殉国，你可能说他们带有的贵金属是有限的，但因为他们的死，你找不到的贵金属则是要多很多倍的。

中国古代人们逃难时，能够携带的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以铜为货币的话是带不了多少铜板的，金银为货币也是受制于贵金属的重量，我们看小说里面大侠们一掷千金的豪气，而几百两上千两的白银是几十斤上百斤的重量的，在长途逃难的时候是只能有限携带的，因为你还必须带足够的衣物和粮食，这比带钱更重要。所以在逃难的时候，带不走的贵金属就要妥善就地隐藏，此时的社会潜规则就是把金银埋入地下，等战火平息以后再找机会回来取。而宋元之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以前中原被外族入侵，士大夫是可以外逃到岭南等地的，而且以前的外族是主动融入中华文明，没有蒙古人这样大规模屠杀的，虽然改朝换代也杀戮残酷，但新的统治者都是会吸纳和招抚

原来社会中的士绅的。因此，战乱虽然死人很多，但不会死绝户，一旦天下太平，这些活下来的人被新统治者招抚接纳，就会回到过去的地方把埋藏在地下的贵金属挖出，社会上的贵金属数量不会大幅度地灭失。而蒙古的宋元鼎革，是种族灭绝性的，是没有地理逃亡空间的，元军打到崖山实际上已经彻底断送了原来社会上流士绅流亡的空间。因此最后殉国的十多万南宋臣民，实际上就是灭绝了南宋的精英和富人，他们死了的结果，就是使得大量的埋入地下的金银，再也找不到了！逃难隐藏金银的掩埋不等同于金银矿藏，矿藏是有外部特征，是能够被探矿的；也不同于墓葬，墓葬是有规制和要给后人祭拜，地面有标志的。这个私藏性质的掩埋，在战争中地表的建筑物还可能被战火付之一炬，因此在相关人死亡以后，被发现的概率是极小的，大量的中国贵金属就被埋入地下了，在人类社会灭失了。对要逃难的人，还要干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带不走的其他动产和不动产都尽可能地变现成为容易贮藏的贵金属，再将他们埋好，只要有可能就不会随意丢弃其带不走的任何财产的，而购买他们这些资产进行抄底的则是不愿意逃难的人，这个变现过程将战乱逃亡地的贵金属货币流动性席卷一空。因此逃难还导致社会的资产构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当中的贵金属流动性被集中于逃难者手中，不是带走就是埋入地下，不光是白银，铜钱也会被埋入，铜钱是大部分带不走的，我们现在不是也时常从地底下挖出成罐的宋代铜钱吗？所以被逃难者埋入地下的贵金属货币，是远远多于他们日常持有的货币数量的。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十几万最后追随皇帝逃难的军民，有能力追随的都是原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士绅，对这些士绅和富人，每人以随身携带一百两银子来计算不过分，崖山之战就是千万两的银子一起投海了。相比随身的金银，他们带不走的银子应当是更多的，如果你只能够带走 1/10 的贵金属货币，则意味着埋葬的价值上亿两的白银也再找不到了。包括黄金和铜钱在内的上亿两白银的贵金属货币价值，在那个时代是与全世界可以作为货币的白银可比的，人类社会流通中的白银综合也不会比这多很多的，清代末期中国吸引了全球的货币白银，清朝流通中的白银各种估算也不过是 3 亿 ~ 15 亿两，但此时日本的石见银山、美洲地理大发现等已经让文明社会的货币白银增长出数量级的差别了。而宋朝被征服的过程中被杀的人比这些崖山海殉的人还要多得多，宋朝 3/4 的

户籍人口被屠杀以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埋藏的财富也随之消失了，而抵抗是士绅富户带头组织的，他们也最先被种族屠杀，宋朝的士绅的死亡率远远超过3/4，几乎灭绝，这些死去的人集中了宋朝绝大部分货币财富，他们的死意味着中国古代货币流动性超过3/4以上灭失了。同时蒙古帝国是一个掠夺杀伐的帝国，不是一个生产性的帝国，它已经没有放牧生产的性质了，或者说蒙古崛起后的人口增长依靠放牧是根本养不活的！而蒙古的杀伐对所占领地区的生产力也造成巨大的破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统治需求。所以他们掠夺征服地区所有的黄金白银，到其他地方去换取他们需要的产品。如此的金融政策也使得贵金属从南宋故地大量流出。中国大地在蒙古的统治下，贵金属不是找不到了就是外流了，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到了历史低点，对此，元朝统治者多次发行纸币，而其纸币由于印钞掠夺的结果，也没有任何的信誉，带不来商业上的货币流动性，因此蒙古的征服使得曾经无比繁华的中国大地的货币流动性到了历史冰点，定价权的东西方转折点到来了。

对崖山前后的货币流动性差距，还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来体现，宋朝时，财政收入是以“贯”来作为标准的。一贯是1000文，同时一贯钱官价最初是一两白银，所以北宋时白银也叫贯银。北宋的财政收入史载是5000万贯左右，也就是白银5000万两。宋朝的财政收入到南宋达到一亿贯以上，最高的时候是1.6亿贯，主要范围在1.2亿~1.6亿贯，但南宋与北宋的银钱比价有一些差别。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廷规定行在左藏库确定银钱人纳的比价为每两3300文后，这一比价稳定了很长时间。此后的隆兴、乾道、庆元、宝庆、绍定年间，镇江、临安、新安、四明、江浙诸军的银钱比价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四章）。因此考虑到银价问题，1.6亿贯也是5000万两左右，因此宋代的财政收入平均应当是5000万两左右。而崖山之后的中国朝代，相比于宋朝，财政收入就锐减了，我们不说破坏生产力的元朝，就是曾经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明朝，白银的税收数量也是大幅度降低的，明朝的平均财政收入是200万两，只有在明末大量白银流入之后，财政收入才达到400万两左右，这些数据黄仁宇先生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明代崇祯时期600万两的辽饷和280万两的剿饷都是大问题，这还是在明末白银大幅度贬值后的结果，打这样的国家级全面战争，军饷只有这点数字，在宋代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直到清朝才可能一比。清朝在早期只有不到3000万两白银的财政收入，晚期才达到8000万两白银，总体平均是与宋朝相当。但清朝末年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宋朝末期的几倍，古代生产力与人口和土地面积成正比，因此如果计算人均占有量，清朝还是远不如宋朝。对税收白银的多少，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是与经济繁荣程度无关的，是由税收率和贵金属货币数量决定的。这与信用货币时代完全不同，现在我们货币发行量与经济繁荣程度相关，财政收入与经济繁荣相关，是不能照搬到贵金属货币时代的。在中国古代经济自给自足相类似的情况下，税收的多少就是与社会当中流通的贵金属货币的数量成正比的，崖山前后朝代财政收入白银的巨大差别，就是中国社会货币流动性大幅度萎缩的写照，而清朝的财政税收能够与宋朝相比，也是在明末开始的白银大量流入的结果，到清朝西方金本位不再把白银作为货币而当做货物到中国进口商品，白银再度大量流入才得以实现。

崖山之后财政税收的巨大差别，不是朝代间生产力的差距有这样大，我们看历代的存世古董，可以知道是历代的生产力虽然与世界的相对比值下降，但绝对生产能力是发展的，如此的资产价格差别和财政收入差别，最主要的就是贵金属在民间数量的差别，是流动性数量的差别，货币的购买力不同，税收带来的购买力是相当的。货币购买力的差别与流动性有关，流动性与货币数量是成正比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最主要的资产房产价值为例看清。不同朝代全社会的房屋需求都是类似的，这里房产价格也是同样存在巨大差别。对此我们可以从明代小说中找到直观的依据。《金瓶梅》中一处“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量一般，要35两银子；西门庆替姘妇王六儿买了狮子街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第三十九回），花了120两银子，而如果是买地，60两银子是可以买20亩地的。与之可以对照的是有历史记载的万历年间，在北京城里有个太监，卖掉了自己的住宅，得到银子1300两。房的大小是：门面七间，到底五进（五排）。每间折合白银40多两。明朝的太监是很有权的，这应当是豪宅了。按照中国古代的建造方式，每间房的大小都是标准尺寸的。但我们看一下宋朝的房价是多少？宋徽宗政和七年，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意思就是那时候在开封置一所豪宅得花几十万贯，如果再想装修得更豪华一些，得花到100万贯（李开周：

《千年楼市》)。宋朝与明朝的房价差价是巨大的，甚至这个差价比宋和明的税收差价还要大很多，因此宋代与明代的物价和财政税收等经济问题上的差别，就是一个计价的问题，是一个定价权的影响在起作用，崖山之战所带给中国社会的，就是这定价权的变化。

以崖山之战为历史节点，蒙古的征服导致贵金属货币流动性灭失，同时还有大量的流动性因蒙古的金融政策从东方流向了西方，东方世界从此变成了货币流动性奇缺的地区。流动性的不足对定价权是有根本性影响的，这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流动性决定了定价权！**后文我们会充分论证这个观点并以此分析定价权的博弈，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宋亡以后贵金属的占有量的天平已经完全地倾向于西方，而且西方还将在蒙古的西征和地理大发现当中不断地加强流动性的输入，从此货币的权力不再归东方世界，历史的定价权拐点到来了。在崖山之战后，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在流动性的东西方巨大差异之下，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利率长期在10%甚至5%以下，是中国社会的1/10，而西方人的工资，在中国还领先世界的情况下，以贵金属计价就是中国人的100倍！如此大的差距中国如何能够有定价权？没有定价权又如何继续保持文明的领先？在贵金属自然汇率时代双方的贸易交换下，**1个西方人的劳动可以换取我们100个人的劳动**，这是巨大的劳动不等价交换，东方和西方的财富再分配开始了！自唐宋以来，中国主导世界定价权的时代结束了。

崖山之战是东西方的流动性和定价权的拐点，对此笔者所要说的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之定价权。定价权是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之一，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都是在经济基础之上服务于经济目的的，所以我们以定价权的角度看问题，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

第一章 西方殖民崛起与定价权

殖民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在武力维持秩序下经济的征服，是一个定价权的控制和财富掠夺过程。印度被征服的时候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近百年，而且印度是发达先进的一方。西方的崛起和胜利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这个过程是西方贵金属流动性富集下的资本优势，是价格革命的延续结果，是西方取得全球定价权的必然。在定价权下，全球的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

第 1 节　近代西方价格革命

全球金银齐集西方的时代

蒙古杀伐与贵金属流动

西方崛起的首要内涵和意义在于取得全球的定价权，这又与历史上贵金属向西方的流动关系巨大。这种全球贵金属向西方汇聚的历史进程既包括东方贵金属向西方的流动，也包括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金银向西方的流动。这些流动中最关键的恐怕还是东方贵金属向西方的流动。然而对此，世界学界探讨得非常少，更多的是说美洲金银向西欧涌入的问题。究其原因，客观上可能是这段时间处于西方中世纪，相关史料非常有限，主观上西方是不愿意把他们崛起的原因说成是外在因素带来的，而更愿意说是他们的开拓、殖民、科技发展等。但笔者还是要对此进行另外方向的分析——西方中世纪时代所谓的“黄祸”，实际上是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带来了第一桶金。

蒙古三次西征，远及西亚、北非、中东、东欧甚至直达多瑙河，剑锋所指，远远超过中国人认知的元朝边界，这是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东西方大征伐和大一统，财富也随之流动。

毋庸讳言，蒙古的征伐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屠杀，杀戮之重令世界为之战栗。对于屠杀所造成的金融效应，拙作《信用战》一书做过详细的论述，征伐导致恐惧，恐惧驱使人们逃难，逃难就会把自己最值钱又便于携带的财物带上，也就是要把金银带走。因此，蒙古铁蹄一路向西横扫，金银也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向西，大量的财富最终抵达西欧。不单被征伐占领的国家的富人带着金银逃往西欧，受到蒙古军事威胁的广大地区的大量富人也带着金银向西逃难，这是一个金银向西方大规模流动的过程。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原则陷入困境：同中原农耕民族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持续了数十年，直到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才攻下临安，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终灭南宋。按照中原王朝的标

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对于宋朝的征服耗尽了蒙古的战争资源，也降低了西方面临的压力；而蒙古对于广袤中原腹地的统治，则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方向。

中国自汉唐以来就领先世界。唐代的丝绸之路导致世界贵金属向东方集中；在宋朝还有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的外贸也是非常发达的。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以及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出口物品中又以陶瓷为最大宗。中国在宋代及以前是一个出口国，是大量产品出口换取贵金属流入的时代。

但到元代，蒙古的政策造就了贵金属向西方的集中。蒙古统治者在其统治区域内不许金银流通，他们收缴辖区内所有的金银，在所在的地区发行纸币，用所收取的金银到统治区之外的地方去交换财物。在蒙古历次征讨战争以后，蒙古统治区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蒙古人需要的各种高档商品已经难以生产，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则不得不使用辖区内的黄金白银去交换外来的商品。这实际上使得中国这个传统的商品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黄金白银开始大量外流，民间的金银存量也被收缴，而蒙古交换商品的方向就是欧洲那些他们没能占领的国家。

蒙古屠杀导致了逃难的人口迁徙和避险的金银流动。据史料记载，这个过程中损失了2亿以上的人口，这个数字是当时欧亚大陆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此大规模屠杀并占有这些受害者的财富，再把这些受害者的金银拿到西欧购买商品，如此这般，西欧会集中多少金银？而幸存于乱世的人又大部分生活在蒙古统治的地区，再把这些人的金银全部收缴来交换商品，又有多少金银流入西方？这还不算逃难到西方的人所带走的金银。

蒙古对于西方社会的攻击还有一件杀手锏——生物武器，把患瘟疫而死之人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中带去黑死病。在黑死病流行的时代，欧洲人口减少2/3，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人均贵金属的占有量大幅度提高，物价也要随着这些流动性的丰富而上涨。而人们趋避瘟疫，不得已逃难，也使得贵金属被逃难的

人们带到更西边的地方，欧洲进入了流动性丰富的时代。

在蒙古的征伐和金融政策之下，西方集中了当时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金银存量，积聚了丰富的流动性，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蒙古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而这样的后果又直接影响了中国明朝的政府决策和时代脉络。

延伸阅读 蒙古对欧亚大陆的席卷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蒙古人的西征。

蒙古第一次西征又称蒙古征服花剌子模之战，是公元1219～1224年（元太祖十四至十九年），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剌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成吉思汗灭亡西辽后，其领地便与中亚最强大的国家花剌子模王国接壤。蒙古第一次西征带给了伊斯兰世界太多的毁灭，蒙古兵因“血腥屠戮”（集数十场作战）开始恶名昭彰；这场不到两年的国与国的战争，实际上不单纯是一个中亚帝国的彻底毁灭，也将成吉思汗的残忍作战方式带到西方：迂回攻击；彻底、全面且恐怖；军队以武器屠戮民众。当时雄踞中亚的花剌子模的国境面积相当于印度次大陆的大小。

1231年，拖雷率军强行假道宋汉中地攻金，抄掠四川北部诸州县。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在金朝灭亡的背景下，公元1236年，元蒙古兵团在铁木真之孙拔都率领下，进行了历时七年的第二次西征。共计征服了东部欧洲包括不里阿耳、斡罗思（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钦察蒙古汗国。因为日耳曼诸王国、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的联合军团被击败，欧洲震恐。1241年7月蒙古军团的前锋历史性抵达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塔特。1241年12月25日拔都亲自率军历史性越过结冰的多瑙河，夺取格兰。至此匈牙利全境均被征服。维也纳和威尼斯的大门“瑟瑟发抖”。1241年12月11日窝阔台驾崩，消息传来，大军回撤进行继位战争，这才保住了欧洲。

蒙古第三次西征，是由蒙哥汗之弟旭烈兀率领，是蒙古帝国继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及长子西征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西征，亦是蒙古帝国最后一次西征。这次西征蒙古占领了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木剌夷国及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因蒙哥集中征服南宋，因而由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征战中东。而且当时

位于伊朗的木剌夷国不肯对蒙古称臣和朝贡，因此蒙古借此发起第三次西征。于1258年1月，围攻东巴格达。2月，巴格达陷落，阿拔斯哈里发帝国（Abbasid Caliphate）的末代君主、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穆斯塔西姆（al-Mustasim）被蒙古大军生擒处死，阿拔斯帝国灭亡；1260年年初阿拉伯人在亚洲最后的重镇大马士革陷落，由于大汗蒙哥于中国四川合州战死，旭烈兀班师参加继位战争，旭烈兀东返途中得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的消息，于是留在西亚，自帝一方，并宣布支持忽必烈，后来被忽必烈封为"伊儿汗"，西亚的伊儿汗国从此建立。埃及马木留克政权成为伊斯兰世界硕果仅存的一支武装力量，1260年9月3日埃及马木留克王朝趁着旭烈兀率主力东返，攻占叙利亚，杀怯的不花，旭烈兀本想率军继续西征，但此时他和钦察汗国的别儿哥汗因为争夺阿塞拜疆爆发了战争，只好结束西征，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正式结束。蒙古第三次西征除了屠城、灭族，减少了世界人口外，中国的印刷术、火药，也经蒙古西征而传入欧洲。

这次屠杀空前绝后，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纪录中说估计中国直接死于屠杀的有6700万。连同中亚、西亚和东欧共死亡约2亿人。1122年中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银川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一年之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城时这样描述所看到的情景：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中国北方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近7000万人口。蒙古

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中。

公元1220~1221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对寻思干也就是撒马尔罕（还有说是玉龙劫赤的）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

1258年，旭烈兀（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蒙古人还全面破坏两河流域的水利设施，至巴比伦时期正在发挥作用的灌溉系统被毁于一旦；他们还引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进城，整个城市被洪水淹没，即使有个别躲起来的人也被淹死；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巴格达被彻底毁灭！

蒙古第二次西征是在太宗窝阔台灭金后一年，这次进军路线，是沿着阿尔泰山脉蒙古灭不里阿儿、钦察，攻入斡罗思（俄罗斯）。三年之后，蹂躏了斡罗思大部分国土，包括莫斯科，蒙军在莫斯科共屠杀了27万的俄罗斯人。1237年12月，里亚赞大公（俄罗斯）尤里和罗曼兄弟二人各自守住里亚赞和科罗姆纳。里亚赞城破，尤里被杀，全城居民都遭屠杀。1238年2月，罗曼在城堡前战败被杀，接着科罗姆纳城被占领。莫斯科遭到洗劫。

蒙古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这一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摧毁了五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 Paul B. Kern 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

在美洲、非洲等地发现和输入的金银

随着蒙古入侵中亚、东欧，大量难民带着黄金、白银进入了欧洲西部，而蒙古的金融政策又通过贸易把更多的黄金白银带到了西欧，但这样的黄金白银不断输入的模式在蒙古式微以后就中断了，已经习惯于贵金属不断流入的西方就需要寻找新的贵金属输入的来源了，受此驱动，各种探险活动开始了。所谓“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原始动机，就是寻找欧洲缺少的黄金白银。当欧洲发现了新大陆后，南美洲、非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大量流入欧洲。

除此之外，非洲马里人的黄金也很关键，马里帝国于公元13世纪建立，它吞并了一度曾以黄金出口贸易闻名于撒哈拉地区（后被入侵的穆拉比人征服）的加纳王国。从公元9世纪或10世纪开始，杰内古城在黄金贸易以及苏丹地区其他商品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00年，由于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建立了伊斯兰教帝国。马里帝国当时出产世界2/3的黄金，16世纪末，该帝国在外敌不断入侵下衰败了。伊斯兰马里帝国的衰败与西方崛起并逐步打败阿拉伯人对比利牛斯半岛的统治处于相同时期，马里的黄金流入地中海，是威尼斯贸易当中主要的黄金来源，给文艺复兴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和货币。

根据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估计，在1500年时欧洲的货币总存量为3500吨黄金、37500吨白银。从1500年开始以后数十年间，每年葡萄牙要从西非运回里斯本半吨以上黄金。在17世纪，仅从莫桑比克的莫诺莫塔帕金矿每年要运回欧洲达一吨以上黄金。但是这些数字比起从美洲运回欧洲的黄金数量要小得多。1500～1650年，从美洲运回欧洲的黄金总量达到了181吨，通过走私、海盗、直接贸易流入的数量还要大于这个数字。白银的数量更为可观，1500～1650年，合法运往欧洲的白银数量达到了16886吨。后来美洲又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金矿，黄金又一次开始流入欧洲，这次流入持续了大半个18世纪。16世纪末，尽管在同东方的贸易中仍然流出了大量的货币，全欧洲的黄金储量依然上升了119.2万公斤，白银储量上升到2100万公斤。

16世纪，封建的军事殖民帝国西班牙在西半球不可一世，垄断了许多地区的贸易，其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据统计，公元1545～1560年间，西班牙海军从海外运回的黄金即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万公斤。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16世纪后半期，英国国势空前强盛，生产不断增长，经济走向繁荣，伦敦成为国际贸易和信贷的中心。1500年，伦敦大约有5万人口，过了一个世纪，它的人口增加到原来的5倍左右，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英国海军开始仅是一支不起眼的力量，后经不断扩充，发展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海军，曾先后击败过16世纪末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荷兰舰队、18世纪法国海军，截至1938年，英国海军舰船总吨位达214万吨，数量近700艘。与此同时，英国国家实力也不断强大，英国海外殖民地面积一度占

到全球总面积的 1/4，比英国本土几乎大 100 倍，殖民地人口达 4 亿多。

西方的海权理论和军事霸权成为西方不断扩张的实力保障，扩张带来财富，这些由扩张而来的财富最先的表现形式就是大量真金白银流入西方。而这些贵金属的流入，只不过意味着货币数量的增加，如果仅仅是以增加货币数量来看，则与现在多发行纸币没有什么不同。当年的世界没有现在的央行体制，纸币是没有信用的，一个社会要取得更多的货币只有依赖贵金属，这样规模的贵金属集中，这样规模的货币投放量增加，造成怎样的金融效应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本书后面要不断讨论的定价权问题——拥有定价权所带来的长期利益才是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

世界贵金属汇聚西方

从蒙古西征开始，实际上就开启了几百年的全球贵金属向西方流动的过程，极大影响了后世的世界格局。

首先是由于蒙古征伐造成的战乱避祸使大量的贵金属随着逃难的人群流入了西方，同时蒙古采取收缴全国的贵金属与西方进行交易的金融政策，又使得贵金属再度向西方集中，这使得富庶的东方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西方，改变了历史上西方贵金属经由丝绸之路大量流入东方的局面。

在此之后，地理大发现、发现新大陆、残酷地掠夺屠杀印第安人、大量贩卖非洲黑奴到美洲种植和采矿，让美洲、非洲、大洋洲的黄金白银被开采后大量流入欧洲，这种流动趋势是巨大的。

东方贵金属的流出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明朝白银的通缩。明朝的白银价值比历史白银价值高很多，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而其后随着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对于印度地区的殖民侵略，古代富庶且没有被蒙古入侵破坏的印度贵金属财富开始向西方流动了，在东印度公司的长期殖民贸易之下，整个南亚地区的贵金属历史存量财富也在向西方集中。

最后的贵金属流向西方的历史事件是鸦片战争，中国大门被打开。在此之前部分贵金属还有向中国回流的趋势，明末到清朝中期，西方白银大量向中国流入。针对中国的贸易优势，西方发明了鸦片贸易，并且通过军舰保护这样的

贸易，中国的贵金属又开始大量外流，同时西方资本利用东西方金银比价的差别套利，也加剧了贵金属流入西方的速度。而最后甲午战争和庚子赔款，让中国流通的贵金属大幅度外流，中国贵金属货币时代终于终结了。

在黄金流入的同时，金矿的大量发现也是关键性的。在19世纪前，人类总的黄金开采量不足1万吨，19世纪最后50年的黄金生产量是人类5000年黄金产量的总和！18世纪的100年间，全世界生产黄金不足200吨，而19世纪黄金生产量是1.15万吨，其中1850～1900年生产黄金达到1万吨，世界最大的金矿是当年英国殖民地南非维特瓦斯特兰德金矿，储量为54040吨，已经生产黄金37000吨。1800年以后激增的黄金产量也都进入了西方金融体系，在金本位下成为西方充裕的金融流动性来源。

这样的贵金属自东方向西方大规模流动从公元13世纪开始到20世纪才结束。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全地带再一次成为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集中地，贵金属离开欧洲转移到美国，结束了美洲向欧洲输出贵金属的历史。在二战中美国集中了世界75%的可流动的黄金，建立了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经过冷战直到金本位终结，以及中国崛起、印度独立，中国和印度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黄金消费国，贵金属才开始向东方流动，而且主要的黄金储备还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控着。

西方对于贵金属流入所带来的好处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因此产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16～18世纪）。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一国的国力基于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

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保障贵金属的流入，英国到中国贩卖鸦片和中国的禁烟也是为了贵金属；而后世央行的金融作用所带来的金融衍生的货币投入替代了直接的贵金属流入，重商主义才被古典经济学所取代。各种经济理论的背景实际上是与货币、贵金属等带来的客观环境高度相关的。

在没有完善的央行体制之前，一个国家要取得货币投放量是非常困难的。从古代至近代，一场战争的胜利，为的就是多获得货币投放量。战争失败者所赔偿的是黄金白银等金属货币，如果这些贵金属不当做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仅仅是作为货币的话，那么它在社会的作用就和纸钞没有什么两样，最多就是信誉好一些，国际兑换好使一些，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这些战争赔款要成为真正的财富，除非要到其他的国家买来实际物质财富才能够增加本国的财富总量，但是在古代交通成本极高的状态下，这样的交易规模是很小的，次数也很少，更多的是在本国使用，尤其是当年欧洲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的金银，肯定不会再拿这些金银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买东西的！那么在本国使用的这些货币，就根本没有增加本国社会的财富，增加的实际上是货币投放量！

在现在的社会，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是很简单的，但是在古代社会没有现在的央行体制，金属货币的增加非常有限，后来实行很长时间的金本位制或金银为主的复本位制，均受制于金银的开采量，想增加社会的货币投放量是极其困难的，最后货币投放量成为限制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因此近代战争胜利实际上是使战胜国国内的经济获得了货币投放量，因此经济大发展；而战败国通过战争赔款输出大量货币就会出现货币紧缩，经济萧条。同时战胜国的战争赔款是战胜国政府获得的，政府获得了这些赔款后就有条件增加政府开支，这样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学原理，社会需求也增加了，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国家就富强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古代和近代一个国家要取得货币投放量和流动性，就只有取得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得到这些贵金属实际上是需要战争来实现的。西方集中了全球的贵金属，实际上就等于西方打赢了一场对于全球的世界大战。这样的贵金属集中的状态将深远地影响后世，其主导的流动性和定价权博弈造成长期的财富流动趋势和剥削，这也是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落的拐点。

货币激增的价格革命

西方贵金属数量激增，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发生了价格革命。货币数量激增表现为物价暴涨，但西方学者并不将此当做通胀，而是把它叫做价格革命——被冠以革命的字眼，完全是一个褒义词，可见这个物价的涨势对于欧洲

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价格革命又叫物价革命（Price Revolution），是指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入侵美洲，破坏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印加和阿兹提克文明，并且掠夺大量贵重金属（主要是黄金白银）输入欧洲，但是各项物资并未增加，加上人口增加，以致商品农产品产量不足，物价急遽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

蒙古战争导致的逃难人群涌入再加上新航路的开辟是引起“价格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西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出现伪币，投机活跃。在一个世纪里，西班牙的物价上升了大约四倍，其他欧洲国家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它们传统的经济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物价猛涨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物价暴涨被称作“价格革命”的原因。这里带来的不仅是西欧物价的涨幅，也带来了东西方物价水平的差异。

笔者对于西方学者把价格革命归结为美洲金银的涌入的观点是有歧见的，蒙古的战争和金融政策导致的早期贵金属大量涌入西欧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由于蒙古的战争和蒙古拿贵金属来换取所需的奢侈品，而蒙古统治的东方又因为经济完全破坏，所以蒙古只能依靠掠夺境内的贵金属并在境内发行纸币来维持这样的国际贸易。在这种扭曲的国际贸易形态下，对东方来说贵金属处于一种逆差的状态，导致贵金属在地理大发现前就已经持续地输入西方，这已经造成西方对于外来贵金属输入的依赖性，因此已经造成西方对于贵金属输入的渴望和需求，造成了社会变革的萌芽。在中世纪封建状态之下社会对于贵金属货币的需求是相对低的，所需贵金属货币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外寻求金银的动力，郑和下西洋对于金银是没有那么渴望的；而西方持续输入货币贵金属，这样的需求就是一种依赖性，促进了整个社会对于贵金属的需求，因此也产生了地理大发现的巨大动力。

西欧这次物价上涨涉及了工业和农业的各种商品，上涨幅度前所未有，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近代早期席卷整个欧洲的物价持续上涨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对其内在机理的探索不断有新的发展。传统的解释往往将价格革命归因于美洲贵金属的大量涌入这一倚重于美洲贵金属流入的观点（即货币数量理论），这种简单因果论的解释模式有着极其悠久的理论传统。早在价格革命时期的西

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就提出了这种解释，他们认为发生于西班牙的物价飞速上涨是由于美洲金银大量进口所致。其后，法国思想家博丹也支持这一解释。而到了现代，费雪提出了著名的货币数量方程式，即“PT = MV”（分别代表价格、交易量、货币、流通速度），认为在均衡条件下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量决定。早在1895年，德国史学家韦埃伯在其著作中就将16世纪西欧物价飞涨归结为美洲金银流入的影响。进入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汉密尔顿更是成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以极其翔实的数据资料论证了美洲白银输入对于西班牙和欧洲的影响，从而使货币数量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模式。

价格革命带给西方最深远的影响就是改变了西方国家从立国伊始就进入长期通缩的趋势。反观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白银的人均占有量逐步降低，而人均创造的财富却是逐步增长，这样的结果就只有通缩，而通缩的趋势造就人们从事生产不如存钱、放贷的心理预期和经济形态，导致很多白银转入窖藏，退出流通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通缩的趋势，这样的通缩会扼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美洲金银自西向东、亚洲金银自东向西的持续流入，使得西方汇集了全球的贵金属，根本上改变了通缩的趋势，这是西方世界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时代的欧洲是刚刚被黑死病摧残蹂躏的欧洲，人口减员2/3以上，而其后的价格暴涨的背后就是人均占有货币量的增加，也就是贵金属数量的增加，这个过程才是诞生当今资本社会的关键。

对于西方价格革命时期的历史物价，很多人以今日的价格来比较，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西方当年是金本位制而现在不是了，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在1850年以前全球总计的黄金才1万吨，1850～1900年又开采了1万吨，而如今全球的黄金已经开采了17万吨，其中南非的最大金矿就有3.7万吨，大量黄金出现在金本位时代给西方带来了充足的流动性（依据中国黄金协会2013年最新数据），现今黄金的数量与黄金的历史数量之间也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于古代的物价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影响，我们要全面地认识。达·伽马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为这次远征费用的60倍，这巨大的暴利里面，就有巨大价格差异的贡献。

货币激增导致的价格革命，给后世带来的巨大影响，就是西方的崛起、定

价权和财富的集中，物价高企对内可能导致存款贬值，但如果是对外贸易，则原来物物交换的天平就要被打破了，高昂的物价可以换取更多的财物，也带来了更多的贸易需求，全球化时代由此开始。

延伸阅读　价格革命数据支持

人们把西欧历史上的这次大规模物价暴涨称为价格革命而不是通胀，关键就是劳动力价值发生根本改变。要确立全球定价权，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到西欧工资水平的暴涨。

英国12~19世纪的工资呈现以下特点：①“升”中有“稳”，下降的次数少（仅有3次）、时间短（共计不超过20年）。在“升”的方面，工匠日工资从3便士上涨到450便士，增长了150倍，帮工工资从1.5便士升至420便士，增长了280倍；所谓“稳”，指的是工资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多次保持长时间稳定，维持时间最长的工资增长甚至长达120年，不变时间总计达500年。②增长率较高。工匠和帮工的名义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65%和61%。③工匠和帮工之间的工资差别持续稳定，比例大致维持在1.5:1。在其工资的实际支出中，其中食物（淀粉类谷物、肉类、鱼、奶酪等）占80%，穿衣、燃料等其他非食品类消费品（non foodstuff）占20%。

对于西方工资暴涨的历史，我们可以看一篇论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工资历史变动考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陈幼其），其中以英国平均工资为100来计算其他主要国家的工资水平，以此结合英国工资水平可以方便推算出其他国家工资水平。英国是近代化的鼻祖，最早、最详细开始所谓“以数目字进行管理”，各种数据详尽又丰富，这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认识西方崛起时代劳动力价格的东西方差距。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工资水平暴涨，但恩格尔系数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年均60%以上的工资增长是恐怖的。收入暴增而食品的消费比例没有改变，说明收入的提高与物价的增长是同步的，1450~1750年，英格兰的总价格指数从100上涨到600。在法国，从1500到1592年，价格增长了10倍。在对巴黎食品市场价目表的分析中，鲍兰和穆芜莱发现，1521~1522年、1524~1525年、1531~1532年、1545~1546年、1562~1563年、1565~1566年、1573~1574年、

1586~1587年、1589~1591年的价格都明显的上升。[①] 但在贵金属货币和金本位的时代，这样的增长就是西方取得全球贵金属流动性的主要证据。

在西方工资增长的同时，人口数量也是同步增长的，人口在近代早期的增长也对需求和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里格利带领的剑桥人口小组对从1541年开始的人口调查中可以看出，人口自然增长在整个16世纪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康沃尔指出，英国1430年人口为210万，在16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为230万，而此后进入高速的增长期，到1545年达到280万，16世纪中期短暂的降低之后，到1603年达到了375万，在8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63%。法国16世纪中叶已处于人口过多的状态，而且同之前14世纪的1500万人口数量相比，15世纪中期的人口量达到了最高点，即1700万，并且这一数字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人口大幅度增长下还能维持工资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是靠国家总的财富和流动性过剩才能够支撑的，在中国人口增长的时代，贵金属数量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均货币收入必然是一个下降的过程。

金融衍生下的信用爆炸

人类要进入商品社会，是离不开信用的，货币的本质也是信用，契约还是信用。商业是需要信用支持的，没有足够的信用支持而发展商业给社会带来的就是不稳定。在中国古代信用稀缺的时代，在贵金属数量有限，会不断通缩的时代，货币信用就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在价格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贵金属源源不断涌入西方，给西方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充裕的信用和流动性。这样充裕的流动性所带来的就是西方社会的信用爆炸。在信用爆炸的条件下，由于货币的充裕，以货币为信用凭证的信用社会得以出现，西方的资本社会更准确地说应当是信用社会。西方的金融革命带来的纸币和银行票据等充当了信用凭证，在纸币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货币不是简单的贵金属，而是对应于某种贵金属价值的信用凭证。

在纸币流行和央行体制下，由国家信用保障或者银行商业信用保障，将贵金

① 布罗代尔，斯普纳：《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载波斯坦等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属货币变成纸币，只要央行或银行的贵金属储备能够支付日常的贵金属需求，发行的纸币数量是可以大幅度高于贵金属数量的，这经常是数量级的差别，能够以信用成功地发行纸币，信用的数量也随之暴增了。在银行体制下，各种票据和支付工具不断涌现，这些票据一方面是信用的载体，可以使得信用的交换比货币更富广义性，并使货币支付更容易，在市场上流通的票据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货币，是一种信用。这就为社会提供了在古代贵金属时代难以想象的信用。

在这样的银行体系下，银行体系内部能够进行货币衍生，就如你存入银行100万元，银行将这其中的80万元贷款给别人，别人就有了80万元，而你在的银行的存款数量在账面上不变，别人贷款得到的80万元无论是现金还是存款也是货币，这样总的货币数量就变成了180万。这就是金融的衍生，金融衍生让基础货币增加了许多倍，这个倍数就是我们常说的货币乘数，中国现在的货币乘数在3~4之间。这样的衍生体制建立起来以后，货币的总量就又可以在原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很多倍，货币的数量就大幅度增加了。

对应于货币的衍生，背后的信用也同时发生衍生，信用的衍生才是货币能够衍生的基础。在贵金属时代，我们的财富是藏在家中的金银，是他人难以利用的，而到了银行金融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财富是银行存款，但我们对于自己存在银行的财富到底给谁利用，银行以什么价格给他人利用，也就是说银行贷款给谁、利率多少是银行的事情，这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了，我们贵金属财富所对应的信用就在银行存贷款的操作下被他人利用了，而我们在银行的存款本身，我们的货币信用依然存在。人家从银行贷款，人家也得到了货币信用，这里信用得到了大幅度的衍生，银行实际上就是经营信用的机构。

从贵金属到纸币，货币数量已经呈现数量级式的增长，在银行的金融衍生作用下又是数倍的增长，再有各种票据的出现，使得社会的广义货币数量和信用极大地增加，增幅是百倍以上的。在西方已经集中世界大部分金银的基础上，货币再在金融体系内如此规模地增加，西方的货币数量和流动性是东方的上百倍就不奇怪了。

同样是流动性的泛滥和价格的上涨，为何西方人在他们的历史上不叫做通胀？西方人把这个涨价的过程取了个褒义的名字叫做“价格革命”而不是大通胀，就是因为其带来的是一个财富汇聚和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价格革命的背后

就是信用爆炸，信用的增加是取得世界贸易定价权的关键。

事实上，通胀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定价权的丧失。通胀由产品紧缺造成，人们被迫高价买入产品；通胀或者是由货币滥发造成，人们对于货币产生恐慌和厌恶心理，不愿意持有货币而愿意抢购商品，这样的社会对外都将导致商品定价权的丧失。而在西方贵金属富集后的金融革命信用爆炸期间，西方取得了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信用不足和流动性紧张，不得不低价将产品卖给西方。信用爆炸和货币流动性的泛滥不叫通胀的关键是这些流动性是被外国认可的，也就是域外是认可的，如果以现代的眼光看就是汇率是没有贬值的。因为贵金属货币没有汇率问题，而银行的金融衍生和央行的纸币虽然也被外国认可，但却是要得到军事霸权的军舰大炮加以背书的。货币终究通行天下，在这样流动性不均衡的条件下造成了不同地区的购买力差异，造成了贸易需求，在巨大的贸易需求面前也产生了控制这些贸易的海权概念。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西方信用爆炸对于全球历史和现状的影响，其历史功效应当不亚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信用爆炸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能够建立工业社会必须有足够的商业文明来销售和分配海量的工业产品，而商业文明的建立和流畅运转离不开信用扩张，工业社会也必须要有充分的分工合作，这样的企业分工合作也是以信用体系为纽带的。有充足的信用是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基础。西方发生的信用爆炸，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财富分配和社会飞跃。

延伸阅读　欧洲的金融革命①

欧洲商业革命带来了金融革命，金融革命也促进了商业革命。金融革命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革命性变化。

票据与票据市场

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在商业的大发展中，首先出现的是汇票。欧洲各地每年定期召开的由各地商人组织参与的大型商品展销会，称为集市。欧洲最早的集市是法国的香槟集市，后来又在日内瓦、里昂等地建立了集市。这

① 引用自孔祥毅：《金融发展史纲》，载孔祥毅博客。

些集市最初一般是用硬币来进行支付与结算的。每个商人都有一本账，在账上记下他欠别人的和别人欠他的钱。本人对他人的负债称为来账，他人对本人的负债称为往账。当结算日期来临的时候，集市的管理人员来核实商人账本上的来账与往账，并实行相互抵消以减少硬币的使用量。随着商品市场的成熟与完善，一种新的信用工具——汇票出现了，它不但可以代替硬币进行交易，而且具有远期交易功能。在集市中，新贸易产生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开具新汇票的方法转移到下一次集市。渐渐的，参加到这种结算中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和其他行业的人。后来，税务官也参与到集市上的汇票买卖中来，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汇票要求同纳税人进行支付交割。于是，皇家借债代理人也参加结算，他们用票据或其他的债务证据来筹集资金。房地产业、银行业、早期的保险业，甚至彩票业都在集市上出现了。这样，集市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贸易市场，而且也是一个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和清算市场。

汇票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承诺，即甲在A地承诺在未来的某一天向B地乙支付一笔款项。其特点有二：一是支付汇票的地点与发出汇票的地点不同；二是支付汇票所使用的货币与发出汇票的地点使用的货币不同。在中世纪时，存款人委托银行转账，必须亲自到银行口授一份转账授权书，要求将自己账户上的一笔存款转至别人的账户下。这样，一个人就很难把一个城市中的一笔钱交给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人。汇票的产生，减少了易货贸易、当面清账或用大量金银货币支付的必要。因此汇票在商品市场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汇票是一种支付工具，但也是信用工具，每一张汇票都包含着一笔短期信用借款，自然含有利息因素。当时欧洲的交通十分不便，即使是“见票即付”的汇票，从其出发点带到支付地点也要一定的时间。如从西班牙或意大利到达低地国家需要2~4个星期。如果汇票要求承兑的是很大一笔钱，那么承兑汇票的人就可以得到一段时间以便筹措应付的款项。这段时间被称为“汇票支付期限”。这种期限往往是对特定的交易所提供的标准信用期限。16世纪初，从热那亚到比萨的期限为5天，到米兰的期限为6天，到安科纳为15天，到巴塞罗那为20天，到瓦伦西亚和蒙彼利埃为30天，到布鲁日为2个月，到伦敦为3个月。购货者用汇票支付一笔现金，既是延期支付，也意味着得到了一笔相当于汇票期限的借款，所以，支付时要加上这笔款在此期限内的利息。如果商人之

间找不到相互了解并同意使用这种支付方式的对象，这种交易就无法进行。那么，付款人就会去找商业银行家，请商业银行家开出汇票。银行家汇票的信誉比普通商人要更高。于是汇票制度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种汇票制度方便有效，省却了许多麻烦。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是买卖双方两地的汇率变动问题；二是两方的银行家可能发现，契约的某一方已经无力偿付或者弄虚作假，可是错付的钱已经无法追还回来；三是付款人同收款人之间也会发生时间拖延问题等。尽管如此，汇票产生以后还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作为信用转让的书面工具，汇票之后支票很快也出现了。在中世纪时，如在威尼斯，商人要求转账时，银行家向来要求客户亲自来银行办理，或者必须派其代理人到银行来。虽然在14世纪的意大利就零星出现过用书面票据委托银行转账，但没有发展。到了16世纪70年代，这种方法在意大利就已经很普遍了，并且逐渐传到欧洲其他各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就已经出现了支票。当然，在支票形成之初，它还是一种不可以转让的票据。

除支票外，还有一种叫“责任票”的期票广为应用。它主要出现在那些并不绝对禁止放债取息的国家内，这些国家使用一种简单的期票作为贷款的保障，这种期票即“责任票”，作为出票人的借方以此为保证在某日清偿一笔债务。这种信用工具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甚至在同一通货区内一笔款项由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也使用这一工具。

票据的可转让性在欧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早可以转让的是“责任票”。在15世纪，英国商人经常将其所持有的期票“转让”给其债权人以清偿债务，并且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到16世纪，欧洲各国基本在法律上保护债券持有者对原债务人拥有一切权利，如果期票上署名的原债权人将期票转让给其他人，他便不再对该票的支付拥有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于是，这种责任票有时可能会“在四五个甚至更多的人”中间易手转让。但是由于现持票人对以前的持票人没有追索权，所以导致了汇票的可转让进展较慢。票据的背书转让，安特卫普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开始，而英国至少到17世纪中期才有进展。

票据完全转让的另一方面就是票据贴现了。贴现就是指在一张票据到期之前卖给第三者，获得低于票面价值的现金。在中世纪，汇票严禁贴现。因为贴

现意味着收取了利息，而教会高利贷法则禁止收取利息。直到教会的法令有所放松，票据贴现才逐渐出现。1536年以后，票据贴现已经有所发生。到了1550年以后，由于金银货币严重短缺，人们越来越喜欢使用贴现这种办法来筹集现金。17世纪，由于人们对各商业中心证券买卖习以为常，贴现也就司空见惯了。到了18世纪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可以说就是一个贴现银行。

票据的背书转让和贴现的意义在于票据的流通所带来的是资金的流通，在票据不可买卖贴现的状况下，票据占有了一部分现金，影响了经济效率。票据的转让贴现，为个人或公司融通资金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子，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票据的广泛使用，产生了票据交换的问题。同一城市的票据交换比较容易进行，只需一个清算银行即可。各个银行家都在彼此的银行内设立账户，那么一个银行的顾客可以通过他的银行，在避免现金流动的情况下实现转账至其他银行的账户。伦敦在18世纪仍采用这种办法。但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票据交换与清算就比较复杂了。集市为票据的交换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制，并最终成为国际票据交换体系。商人在交易结束后，将所有承付款项记录在也参加集市的银行的账簿上。银行将各个客户的来账往账进行归总结算，差额部分客户用现金或者汇票支付。当汇票普遍以后，商人们就可以不带任何现金在集市上贸易。这种制度很受商人的欢迎。但是这里还涉及汇率的问题。有少数的集市汇率是由参加票据交换贸易的所有商人来决定的，大部分集市决定汇率的工作都由一些富有的商业银行家垄断，操纵者是那些大银行家。

公共银行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的繁荣。贸易已经不能再局限于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需求、供给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在主要的商业中心建立了常驻的办事处。这些商人没必要，也不愿意将其贸易限制在集市期内。这样欧洲集市的作用迅速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城市相继建立的交易所，交易所给商人们提供了经常性的商品交易场所，也是金融交易的场所。

1531年安特卫普建立了一个交易所，不仅取代了集市的贸易职能，而且也取代了集市的金融职能。1551年开始，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安排皇家汇兑人托马斯·格兰欣爵士常驻安特卫普考察交易所，后来他回到英国，于1571年建立英

国皇家交易所，主要经营国际票据。紧接着，塞利维亚和阿姆斯特丹先后在1583年和1611年建立了交易所。

交易所一年四季不间断地进行商品批发业务，自然产生了相应的金融变革。商人们希望有大型的管理和服务更好的银行，以便放心地将其资产放在这些银行中，并且能够随时提取，还可以进行快速的票据结算。因为原来的私人银行实力有限，信誉较差，有时还往往利用客户的存款进行自己的商业经营。1575年以后，私人银行纷纷陷入困境，取而代之以国家和政府创建或者改建的“公共银行”。这种银行在办理存贷款业务以及信用转让票据清算业务过程中，受到政府部门的担保和监督。

最早的公共银行萌芽是1401年后巴塞罗那创建的市立银行。但是真正的公共银行最早是1587年4月开始营业的莱尔托银行。莱尔托银行主要有三项任务：接受与偿还存款；负责各账户之间的转账；将应付汇票记入客户贷方。有些银行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在政府主持下进行了改组。1593年米兰的圣安布罗焦银行，1605年罗马的圣灵银行、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等等，这些银行成立后马上成为重要的信用交易中心。

但是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公共银行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它于1606年得到市议会的批准，1609年开始营业。其业务与意大利莱尔托银行相似，接受与偿还存款；负责各账户之间的转账；将应付汇票记入客户贷方。与意大利相似，它也不允许私人账户的透支，也不允许向客户提供私人贷款。由于当时所有在600佛罗林以上的票据只有通过银行才能记入贷方，所以几乎每一个商人都在银行开有账户。除此之外，该银行还可以兑换货币、购买金银外国货币并将其铸造成合法货币。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后发展迅猛，并且效果显著。它为社会流动资本找到了可靠的存放处，同时也为信用票据提供了有效的票据交换所。所以这种类型的公共银行迅速在欧洲其他地方成立。米德尔堡、鹿特丹、纽伦堡、斯德哥尔摩纷纷成立。到1697年，欧洲已有25家不同类型的公共银行。但是他们的实力财力不可与阿姆斯特丹银行同日而语。

阿姆斯特丹银行之所以能取得金融优势，关键在于荷兰的贸易企业遍布各地。荷兰商人、荷兰造船业与荷兰的投资在欧洲各主要商业中心以及亚洲、美洲与非洲的大多数沿海城市都取得了立足之地。这就意味着阿姆斯特丹实际上

与其他所有的中心都保持着直接的贸易联系，意味着在阿姆斯特丹购买的汇票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承兑。有一些贸易区——如波罗的海地区只接受阿姆斯特丹开出的票据。这个城市的广泛的商业联系以及世界各地的金银与硬币的大量流入（阿姆斯特丹当时也是欧洲贵金属贸易的中心）使得它能够建立起稳定的汇率，而稳定的汇率又进一步巩固了它在贸易上的主导地位。直到伦敦商人的贸易联系与财富超过了荷兰商人之后，阿姆斯特丹的优势才被动摇。到 18 世纪，英国的殖民地已经超过了荷兰。1694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起初该行的目的只是向政府贷款与发行银行券，但不久它便承担了其他许多项业务。

从郎咸平黄金房产价值论看价格扭曲

我们看西方的价格在贵金属时代的扭曲，可以比较中外资产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差异，可以管中窥豹。中外的工资差别不是现代的产物，这样的差别在明朝就开始出现了，在清末民初，这样的差别实际上比现在还要大。

2013 年黄金价格暴跌，各路专家对于黄金走势的说法就又热了起来，对此郎咸平先生对于房地产和黄金的保值性进行了论述，将其于 2012 年年底发表的“黄金不如房产保值”的观点再次推到幕前。根据郎咸平的换算：“民国初年，1 两黄金可以买 2 亩良田，而 5 两黄金就可以买北京一个四合院。但是 100 年后的今天，同样的一公斤黄金等于 30 万元人民币，却只能买到北京四合院的半个厕所。黄金适合短期炒作，长期投资的话，房地产的增值空间要比黄金好。”

郎咸平关于 5 两黄金就可以购买一套北京四合院的论述已经说了有几年了，但他的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原因之一就是民国初年的北京，是中国军阀混战最厉害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之下，战乱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一定是超跌的，原因就是老百姓逃避战乱的时候房地产等不动产不能在战乱时带走，而“乱世买金”却是人尽皆知的经济常识。不拘古今中外，在类似的历史时期，战乱地区的黄金价格肯定是极其高涨，而土地价格是超低的，历史上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黄金就曾经达到 170 美元每盎司的一个高点，那时美国《宅地法》规定可以通过耕种以象征价格购买土地，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 10 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到 160 英亩土地，连续耕种 5 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但后来很快价格稳定到了 20 美元每盎司，直到二战前。因此这样的数值比较，本

身就是倾向性地选择数据，忽略了战争对于黄金和房产价格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本身不过是基本的人类常识。身为专家而违背基本常识，真是匪夷所思。

更关键的就是，支持郎咸平先生这一观点的只有这一个数据，是为孤证，而且就连这个孤证的数据他也没有参照其他数据进行合理性的分析，没有对数据进行分辨就把一个匪夷所思的、单一的数据拿出来论证其理论并且作为其理论的关键支撑，实在令人费解。实际上多找一些数据一点也不难，为什么单单就抓住这个数据说话，关键就是这个数据很有轰动性，很能够抓眼球，但这不是客观严谨的做法。做学问重要的不是吸引多少眼球而是对于真理的追求，不把基本数据搞扎实怎么能够使自己的理论让人信服？经济学理论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派间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这是基于分析角度的不同，绝对不是概念和数据的不同，更不能以错误的概念和数据误导大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对于“五两黄金买一间四合院”的问题，我们还要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其内在机理。在那时，金融已经基本全球化，而中国还延用着贵金属直接作为货币的银本位制，中国与世界的物价是严重不接轨的！我们看一下当时中国华工在美国的收入情况，这些华工在美国是低收入的苦力，但他们的工资每月 50 美元，他们在美国开小店洗一打衬衫就可以收费 3 ~ 5 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在二战前的金本位下一盎司黄金只有 20 美元，在中国 16 两斤制的状态下，中国的“两”与英美的“盎司”在重量上基本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当时华工苦力两个月工资在中国北京就能够购买一个四合院，而一个四合院在美国就只值洗 100 多件衬衫的钱！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物价方面的极大扭曲，西方通过这个扭曲大量赚取了中国的财富。中国的东西都被他们廉价买走，中国穷人下南洋当苦力回来就是“金山伯”，就是富豪，在广东等地的侨乡，这样的“金山伯”建的碉楼是很多的。而同期中国社会的一般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一般一个秀才的收入一年只有 2 ~ 4 两银子，也就是一年几分之一盎司的黄金，中国外出的苦力一年还有几十盎司的黄金呢！这是巨大的价格差距，比当今中美劳动力工资差距还要大得多，因此这个匪夷所思的数据背后更多的不是黄金价格的问题，而是中国与外国价格扭曲的问题。

我们看当时的财富差距，还可以参照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南洋糖王陈芳携巨资回到梅溪老家定居，看到澳门某豪华酒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时，

愤怒的陈芳当众宣布以5000美元的价格买下酒店，改名为“四海芳园”，对所有人开放，“四海芳园”遂成为澳门市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这个酒店的地址就是现在澳门行政区政府，当时能够当天就买下，必然是给了天价，正常的交易价格应当比这低很多，而美国华工一个月的工资就是50美元，不到10年的工资就可以在当年澳门繁华地带买下高级酒店，这是多么巨大的物价差距呢？当时澳门开埠后的房地产酒店价格是显著高于内地的。如果我们按照白银价格，则中国当时官员的俸禄也是不高的，亲王的俸禄也只有一年一万两白银，约合5000美元，而华工是一年600美元，有1000多两银子，清代其他文官则是官俸计分十等：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二品155两，禄米155斛；三品130两，禄米130斛；四品105两，禄米105斛；五品80两，禄米80斛；六品60两，禄米60斛；七品45两，禄米45斛；八品40两，禄米40斛；正九品33两1.14钱，禄米33斛1.14斗；从九品兼未入流31两5钱，禄米31斛半（注：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从雍正起，由于京官清苦，特支双俸（米除外），称“恩俸”（一些高级大臣俸米也加倍支给）。这样的收入实在太低，就算是看似巨款的养廉银，与华工收入相比也是很低的，据《大清会典》中所载，地方官员养廉银一般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000两。另如河道总督6000两（其中北河总督系直隶总督兼领，支银1000两），管河道员2000~4000两，漕运总督9520两，盐运使2000~5000两，盐法道2000~4240两。而清朝这些官的辅助人员的费用都是要官员自己掏腰包的，因此这些养廉银看似高但这不是工资而是全部的办公经费，由此可以知道中外收入差别的大小。这里华工苦力一年的收入居然与县太爷的工资加办公经费相当。

对于黄金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当年在美国一个普通劳工一个月的工资是2~3盎司的黄金，现在美国的收入依然相当于现在黄金价格的2~3盎司，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福特的T型车就是300美元，价值15盎司的黄金，现在美国的一个家用福特车，依然价值15盎司黄金左右，因此以这样的价值来判断，黄金的价值是很稳定的，黄金更多的需求是保值！黄金价格与能源价格是高度相关的，十多年前每盎司黄金价值200多美元，但是当时石油的价格是一度跌破

10 美金的，一吨金矿富矿也只有几克黄金，开采黄金的成本与能源价格相关，而采金的剧毒和污染导致未来环保要求不断提高，采金的成本甚至比石油价格增长还快，更何况黄金一旦产生货币属性就要有溢价。

那么房产增值的情况是如何呢？这个增值的情况是很复杂的，美国现在的房子就很便宜，但不意味着历史上美国的房价就便宜。我们可以查阅到当年美国代表性建筑帝国大厦的价格，当年美国帝国大厦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出头，造价是 6700 万美元，也就是每平方米 330 美元左右，折合黄金来说是 16 盎司，现在有 2 万多美元 1 平方米了，但后来日本人收购的时候总计才 4000 多万美元。美国的房产价格受到租约和房产税的很大影响，3% 的房产税等于是房产历经 30 多年就要被征收一遍，同时美国的租约对于房租的增长也有限制，还支持超长租约，而中国是最多租约 20 年且目前没有房产税。

对于房地产价值走向影响最大的还有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再到去城市化，日本的房价下跌也与日本城市化率下降有关，美国更是后工业社会去城市化，因此房地产受到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中国房地产是否保值是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的，对此拙作《房势》一书专门进行过分析。未来中国发展到了去城市化、老龄化等社会，加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减少，房地产在度过当前城市化和下一个 18 年周期的城镇化以后，出现牛熊拐点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房地产的保值要看针对多长的时间周期而言！

因此黄金的趋势要与能源的走势高度挂钩，黄金是非常好的避险和保值品，房地产则要与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趋势相关，这二者相比首先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二者的投资价值所体现得时间长短周期也是不同的，郎咸平先生以一个百年前的数据为支撑说黄金不保值，还没有分析这个数据受到其他因素导致的巨大扭曲，这样的思考方式不像是一个金融专家。郎咸平先生说了很多老百姓爱听的话，但如果他的经济学建议是依据没有谱的数据和错误概念的话，人们就要当心不要被误导了。

从这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问题不是黄金和房产价格，而是中外价格的扭曲，尤其是中外收入和资产价格的扭曲，这样的扭曲给西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通胀变成价值革命

西方称这段通胀历史为价格革命，而笔者要进一步把它称为价值革命。价

格是一个短期概念，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如果发生了长期的价格上涨，这里不单是“价格”革命的问题，更有一个价值革命的命题在里面，我们要从价值革命的角度对此进行认识。

我们对于价值的认识来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客观价值论，而当前西方流行的主要是主观价值论，对于西方这一次价值革命，我们先从主观价值论层面进行讨论。对于主观价值论更多的是讨论价格，也就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因此价值是源自人们的主观认识，如果从主观价值论层面，价格的长期上涨取决于货币流动性的充裕，流动性的充裕又来自于金银的流入和金融的创新，产生了金银与其他商品的边际效用的变化。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虽然早于18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但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奥地利学派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等人完成的。他们在“边际效用”概念基础上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并非供给方面的生产费用多少，而是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主观因素，即商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小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这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货币充裕条件下相对于货币产生了边际效用，人们的眼中各种商品价值更大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不是货币的贬值而是商品价值的变化。

而我们站在客观价值论上，对于问题的认识可能更有意义。在客观价值论上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我们看到的西方这段历史是价格长期暴涨，并不存在波动，于是结论只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发生只能是价值发生了变化，价值是在长期上涨的。客观价值论讲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候，劳动力的价值是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劳动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在这里金银供给量大增以后，劳动力的成本也是大增的，要养活一个人，培养一个劳动力的成本是大增的，因为劳动力所消耗的各种费用支出都是在上涨的，以前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来养活劳动力所需要的必要时间，与后来全球贸易，农产品需要从外面长途贩运养活劳动力的方式相比，在种粮食的方式没有革命性改变的情况下，必要的劳动时间从原来的仅仅种粮食，变成加上了贩运、航海和商业等必要的劳动时间，养活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实际上是大幅度加长的，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大幅度地增加了，这样的劳动力成本之下的商品，其内在的价值也随之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习惯于看见涨价就说是通胀，就说是钱不值钱了，但我们不能忽视人力成本的刚性上涨。人力价值提高以后，产品的成本自然也就要提高，以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计算的价值当然也水涨船高，价值增加了，价格自然也要高，这与通胀下价值没有增加的机制是不同的。西方的价格革命变成价值革命，就是在价格不均衡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地粮食价格高涨以后，当地不种粮食，从外面采购，从而使当地人从事复杂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创造过程进一步为西方积累了财富。这样的差别产生了一个长期的效果，就是西方人的工资收入也是长期高于东方的，就如中国到美国的苦力，所赚取的钱比国内的达官贵人还多，回来就是富豪，这样的趋势是从西方的价格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对于这些西方人高成本干的同样的事情，我们很多人是当做奢侈品等接受的，如果仅仅以必要劳动时间计算，中国人生产和西方人生产的时间是一样的，在中国生产还要有很多物流费用才能到美国，但西方人生产同样的东西要卖得贵，人们可能不买，但人们不会认为这是通胀，就如人们看到日本大米总是几十块钱一斤也不会认为是通胀一样，这内在的价值变化因素才是我们更要深入思考的。不同的劳动力体系和地区，实际上就构成了不同的体系，对于这样的体系差异，就是定价权存在的意义了，而维持这样的价值体系的不同，更是需要军事和金融等多方面的支持，**谁有更多的金银、谁有金融制高点、谁有强大的军队、谁能够控制海权和物流等，谁就有定价权**，这定价权之下还有剥削、压迫、掠夺、食利等。对于定价权的奥妙，是闷声赚大钱的事情，我们想不被外来定价权掠夺，就要认清其中的本质，认清这个本质就要从西方汇聚全球贵金属进而实现价值革命开始。

第 2 节　认识殖民的真谛

重新认识殖民

在认识近代世界时，政治经济学中最常见的词汇就是殖民了，我们总是讲西方的殖民扩张、奴役世界人民等，但对于殖民的本质和运作过程却很少提及，

本节就是让大家更深入地认识殖民的本质，认识所谓的商业贸易、定价权在殖民当中的作用。殖民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也不是屠杀，殖民的本质，是一种**在武力保护下的不平等的流动性和定价权的攻击，造成被攻击地区的信用崩溃，让殖民者取得定价权进而能够以和平贸易的外衣不断剥削被殖民地区。**统治离不开暴力，但暴力也有成本，也有管理和收益的极限。殖民是一种以最小暴力优势控制最大地区、攫取最大利益的方式。

从字面上理解，殖是繁殖、孳生之意。殖民则指强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依据我们的定义，现指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掠夺和奴役当地的人民（即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强国对力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的政策。殖民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向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原料掠夺等。殖民是一个大国在国外寻求并获得对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不发达地区的占有权的过程。

从 15 世纪开始，在重商主义原则的刺激下，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洲、亚洲以及各大洋的岛屿上获得了大片殖民地。1870 年以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起的帝国主义扩张又使得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尚未沦为殖民地的地区取得了大片殖民地。1898 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广泛地参加了殖民活动。殖民活动是伴随着西方崛起始终的。但我们要知道殖民可不仅仅只是存在于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殖民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在西方，殖民这个词汇可以说是自古就有。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人类最早的殖民活动应当与古亚述帝国的衰落相关，流亡的亚述部族们在古希腊世界的环地中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城邦。亚述（Assyria）是古代西亚奴隶制国家，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属于闪米特族的亚述人在此建立亚述尔城，后逐渐形成贵族专制的奴隶制城邦。公元前 10 世纪，亚述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为其长期对外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给养。但随后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进攻亚述，帝国急剧衰落。迦勒底人乘机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恢复独立，并联合米底人于公元前 614 年攻克亚述古都亚述，公元前 612 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灭亡，亚述被并入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但是亚述人有着优秀的冶铁和制陶工艺，这些先进的技术成为他们在别处进行殖民的资本。这些衰落民族的

流民成为最初的殖民者。技术上的领先，尤其是军事技术上的先进，是其能够进行殖民的保障，但殖民体系的维系，唯武力论是不成的，经济手段才是关键，而经济上的领先既有技术因素也有市场因素，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殖民过程当中，市场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据说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中国的西周晚期），希腊诸城邦已经远征亚、非、欧三大洲，向外大规模扩张，在覆盖三大洲、三大海洋——爱琴海、地中海、黑海和跨大西洋的广袤地域上建立起巨大的海外殖民地。发起并完成这种远洋航行和征服的，主要是全城人口不过区区1万~2万人的雅典城邦等。考古证据表明这些城邦的人口规模是非常小的，而如此广袤的受到希腊影响的地区难道就是无人区吗？他们怎么能够奴役那么多的人呢？实际上他们在开始殖民之初是非常友好的，是处于守势的，需要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进行商业贸易，建立起类似城邦一样的堡垒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在这些堡垒里面生产外面蛮族们无法生产的东西，这些东西被他们定下高昂的价格，以此高昂的价格换取蛮族低价供应的必需品，并且建立起相应的规则，由此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他们这样的殖民只要到了一定强大程度的时候，就要以暴力奴役蛮族了，或者利用蛮族内部的矛盾，使得蛮族给他们提供奴隶。因此对于少数人殖民多数人，统治的方式不是依仗军事领先，以军事手段进行镇压，而是以军事手段为后盾确立市场规则，维持自己的权力和信用体系，这样的殖民方式比起简单粗暴的直接军事镇压来可以统治更多的人口和更广袤的地区。

古希腊和近代西欧的历史是被美化的，他们的殖民智慧传承更多的是从北欧海盗维京人那里来的。维京人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他们及其后代通过殖民曾一度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大部分、俄罗斯的内陆、法国的诺曼底、英国、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西方真实的殖民感受和实践经验是来自野蛮的海盗们的。在维京海盗侵扰欧洲西海岸的年代，这些北方的海盗民族就是沿着海岸低地和河流，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定居点的。这些殖民者后来逐渐皈依基督教并融入了欧洲社会，在宗教的支持下逐步得到权力，英国皇室和荷兰的统治者都有这些海盗后裔的背景，这两个国家也是后来殖民时代的翘楚，而最早从事殖民活动的西班牙、葡萄牙也与海盗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于是才有能力进行大航海活动。

维京人的野蛮史是难以掩盖的，因此要创设出古希腊殖民的美妙和“五月花号”的故事。近代西方的殖民被美化，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教徒当年被美化的初到美洲时的情景，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事件。五月花号本来是一条用于捕鱼的小船，当他们离开英国的港口时，许多人都怀疑他们是否能顺利通过大西洋到达彼岸。船出发的时候共 102 人，在船未上岸之前，就如何管理未来的世界，船上的 51 名成年男子共同参与签署了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大致内容是：“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这些内容与当年的希腊历史文献是高度接近的。希腊的殖民城邦也是如此，通过高度自治来降低统治成本。

当“五月花号”船的 102 人到达美洲以后，他们与印第安人的贸易还是非常融洽平等的，初期维持非常困难，在 1620 年和 1621 年之交的冬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冬天过去时，活下来的移民只有 50 来人。这时，心地善良的印第安人给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特地派人教他们怎样狩猎、养火鸡、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移民们终于获得了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按照宗教传统习俗，移民规定了感谢上帝的日子，并决定为感谢印第安人的真诚帮助，邀请他们一同庆祝节日，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这个故事是西方人树立起来的典范，但大量的欧洲人到美洲等地去是为了冒险和发财，他们原来就是流氓无产者，各种恶劣的事情都做，后来对于印第安人的屠杀历史已经很清楚了。而五月花的故事背后是遇到了一个会说英语的印第安人。英国人第一次来就能够遇到会说英语的人，多么巧合？这个印第安人曾经是西班牙人的奴隶，后来取得自由到英国生活，攒够路费回来的，所以对于英国人非常友好，这根本不是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第一批到美洲嘛，是印第安人先访问了英国啊！印第安人都能够先到英国了，怎么能够说这些英国人是第一批到美洲的西方人呢？这完全是一个包装出来的故事，既然这个故事都能够包装，那么《五月花号公约》的真实性就很可疑了。这太多的巧合背后一定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故事。而他们的感恩节更多地不是

感谢印第安人，而是感谢上帝，是上帝让他们遇到会说英语的印第安人，是上帝让他们占有这些富饶的土地，而不是他们劫掠了印第安人！

在殖民贸易规则建立的初期，虽然也出现荷兰殖民者用玻璃珠子换了一个曼哈顿岛这样的事情，但大多数时候双方的交易在局部看来还是公平的，毕竟虽然人家没见过玻璃，但牛羊牲畜、木材、粮食的价位还是清楚的。不过要是我们放眼全球的话，这样的交易就不公平了，这里的差别就是信用体系巨大的落差。在蒙古人的劫掠下，黄金白银向西方聚集，而西方的贵金属价格水平对于这些贸易地区是有落差的，在黄金缺乏的东方，殖民者是以黄金等贵金属的优势确立资本定价地位的，而在黄金相对多的美洲，则是以一些当地人没有的技术性产品来定价，比如玻璃珠子等，还有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动物——马，甚至还有陶瓷。这些物资的定价权是被掌握在殖民者手里的，背后就是他们掌握了在不同地区贸易的流动性，是他们可以赚取这样的贸易差价，别人是赚取不了的。这样的定价权溢价不断的累积，会发生正反馈的放大，最终将造成原有被殖民地区的商业崩溃，在商业崩溃之后，殖民者的商业统治就建立起来了。

西方对于殖民是市场经济自由选择过程的论述实际上早已经偏离了历史的真相，从东印度公司的设立过程就看出，这个殖民是完全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之上的。从 1595 年 4 月至 1602 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 14 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为了避免过度的商业竞争，于是这 14 家公司合并，成为一家联合公司，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当时的国家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的范围内具有贸易垄断权。类比荷兰，英国等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也是抛弃了自由竞争，以国家特许权的方式，将所有的竞争排除，以垄断的状态来维持殖民利益，以殖民者垄断的实力对被殖民者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借助垄断取得市场的霸权，攫取殖民利益。说是市场行为，但对于市场的垄断是最重要的，国家的统治者垄断最核心的产业，用垄断建立定价权和价值体系，以垄断打垮被殖民者的产业，建立殖民者的统治秩序。等他们以垄断建立起来世界秩序以后，他们反而要反垄断了，其目的就是不让其他的竞争者和竞争国家能够建立足够挑战他们价值体系的经济力量，不能挑战他们的统治权。

殖民成功的关键就是定价权，关键是建立一个对殖民者有利的价值体系，

这个价值的定义是殖民者下的。我们虽然坚持劳动价值论，否定西方的主观价值论，但即使是在劳动价值论上，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要与劳动力的成本挂钩的，在西方流动性宽松的条件下，西方人的劳动价值和培养一个劳动力的花费是有不同的。这里我们知道西方在价格革命以后物价奇贵，养活一个劳动者以贵金属核算的成本与缺乏贵金属的殖民地区养活一个劳动力的成本是有天壤之别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劳动力成本定义的不同，在西方的定价体系之下就是一个剥削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就如他们可以把玻璃珠子定出天价一样，大量的贸易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进行所谓的自愿等价交换，就如玻璃珠子换取曼哈顿岛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等价交换一样，而随着这个体系被戳破，殖民者要维持这个体系就越来越依靠暴力，这个暴力更具体的就是表现为货币的权力和通道的权力，拥有足够多的贵金属和控制海权，使得贸易只能是单向地宗主国拿东西到殖民地来交换，而不是殖民地拿东西到宗主国去交换，不同定价体系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贸易利润只能被殖民者占有。这才是殖民剥削的关键。

在殖民者的商业帝国建立起来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在被殖民地区培养买办，建立雇佣军，腐蚀被殖民地区的政权，直到搞垮原来的政权，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让代理人进行统治，殖民者实际上就成为奴隶主，这样的方式是在开始的怀柔政策之下对被统治者下慢性毒药，等到被统治者想要反抗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具备反抗的条件了。殖民在古希腊是很成功的，被统治者的反抗历史记录很少，美洲印第安人不愿意当奴隶而进行了反抗，不过印第安人的反抗太晚了。开始的时候印第安人的祭祀阶层（也就是他们的精英阶层）钦慕殖民者的文明，还痴心妄想与殖民者做朋友，以为能够平等相处，但殖民者是要印第安人当奴隶的，等印第安人明白了以后都晚了。印第安人不够统一，没有形成完整的力量，他们反抗的时候已经不是五月花号登陆的时候了，殖民者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他们被集体屠杀了。印第安人的“精英”与我们现在的公知是何其相似啊！由于殖民者的强大，在印度、阿拉伯和非洲，原来的统治者都选择了与殖民者合作，接受了殖民者的统治。对于这样的殖民结果可以看一下非洲，在非洲原来的部族国家是与西方的现代国家重叠的，南非的祖鲁族有自己的国王，也遍布南部非洲多个国家，但这些国家却是殖民者利益瓜分后建立的现代国家，这些地区是完全被殖民在这些现代国家下了。对应于历史上

的古希腊殖民体系，这些非洲现代国家就是当年的城邦，而祖鲁等部族就是希腊历史当中所谓的蛮族，他们是统治蛮族的，蛮族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殖民的目标就是在一块新的土地之上，建立自己独立的信用体系，在商业规则上制定不平等的规则并据此进行市场操纵，在这个信用体系之上打垮和奴役原有的社会信用，建立对于自己有利的定价权进行商业奴役，因此在殖民时代特别重视的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攫取被殖民国家的金融权力、产权和货币权，致力于建立在原有统治权之上的产权制度，以这个产权制度来保障殖民者的利益，并且向被殖民的国家输出宗教、文化和价值观，让他们攫取这些商业利益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信仰。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西方殖民与中国古代的扩张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不是殖民而是同化，是让他们融入中国的文化，与殖民者搞种族隔离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的扩张更多是文化扩张，而不是攫取经济利益，是对于普天之下皆为皇权皇土的追求，只要臣服朝贡，得到的赏赐甚至更多，所以西方指责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是不对的。

殖民与简单的军事征服、屠杀奴役是完全不同的，殖民是在军事保障之下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殖民统治是与商业和资本分不开的，其核心是建立一套不平等的规则，建立这些规则下的新信用体系、新价值体系，**在殖民主义当中，定价权是核心权力。** 对于这样的殖民，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一种高效的统治模式，在古代的高成本统治下，殖民是解决了分封与集权的另外一种统治方式，一种以商业利益为纽带的统治方式，这个统治方式的统治成本是极低的，但在面临外来的攻势当中，对外的战争能力受制于商业利益的约束，大家一切为了钱而维系的体系，战斗力是低下的，殖民地的战斗力都是不高的，必须依赖宗主国的军事实力或者军事技术的领先，这也是英国的衰落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败亡的原因之一。而对于现代殖民国家，也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对于现代殖民的关键，海权、贵金属、重商主义的重要性等，以后的章节还会深入的探讨。

从殖民的视角看文艺复兴

我们认识西方殖民的本质，离不开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指 14 ~ 15 世

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 16 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是带来科学与艺术革命的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而这个文艺复兴的背后是什么，难道就是字面上的文艺吗？这里的文化艺术是怎样变成了生产力、统治力、财富源泉的，我们需要把这个文艺复兴与殖民联系到一起看待，以殖民的视角来看文艺复兴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历史上，“希腊”并非多数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古国名称，而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地理区域之名。会使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世界历史中从来不曾存在一个希腊古国——希腊作为一个国家只是存在于 1829 年以后。我们主流的世界观认为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持续了约 650 年（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146 年）。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公元前 5 ~ 公元前 6 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这里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公元前 776 年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公元前 750 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雅典等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 250 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在《荷马史诗》描写的时代（公元前 11 ~ 公元前 9 世纪），“古希腊”半岛上的人自称为亚该俄斯人（Acheos）或达拉俄斯人（Danaos），他们的族种和语言来源是地中海彼岸的迦南人和腓尼基人。在诸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所谓希腊文明其实是环地中海文明，地域包括西亚、北非和南欧，希腊本身并不突出，如众所周知的迦太基就在非洲。在雅典全盛期，以希腊文明汇集了各地文明，形成了一个高峰，不过雅典的战斗力不如相对野蛮的斯巴达人。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向外扩散，则要感谢亚历山大领导马其顿人的征服运动。这是一段交融和武力扩张的大历史。这些城邦的文明的积累被认为是后来欧洲复兴的智慧源泉。

那么所谓古希腊文明的根底到底如何呢？如果按照西方考证中华文明的标准，对于希腊文明的真伪甚至都是存疑的，就如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夏朝存在，把炎黄子孙的历史记载当作传说一样，对于希腊文明国内也是有质疑的。质疑的学者认为：现在西方流传的那些所谓希腊名著——包括荷马、修昔底德、希

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不是古希腊文的原作品。而且更为讽刺的是，事实上也并没有人能真正知道，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原文件存在过。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对于希腊文献和文化的大规模而且有意识的伪造活动[①]。文艺复兴时期对意大利新兴商业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最初并不是希腊，而是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文明（包括犹太人）。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才接触到希腊文化和哲学。后来欧洲人用拉丁文字所翻译的希腊作品，都是根据阿拉伯文字或希伯来文字转译的，当时的欧洲人没有得到希腊原本件，因此作品内容的真伪是存疑的。其中可能有相当部分是将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作品贴上希腊人的标签，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西方的崛起是需要有文明、文化来修饰的，有些内容确实有可能被注水，但也会有一定的真实基础，就如我们找不到夏朝很多的证据一样，我们不能全部相信、盲目崇拜，对其中的水分要心里有数。

这样对希腊文明的吹捧，背后是给西方的殖民找到历史依据并进行历史美化，但我们即便从质疑声中，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希腊罗马文明的记载和内容中有阿拉伯的影子。阿拉伯地区在中世纪相对欧洲是先进文化，而且阿拉伯人也是以做生意著名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广泛使用，反而被叫做阿拉伯数字了。阿拉伯地区是沙漠为主的地区，不是传统的农耕地区和国家，贸易和商业立国是重要的，这里面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智慧，阿拉伯部族历史上的贸易也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只不过对这一切欧洲人是不愿意承认的，他们愿意说是他们祖先的智慧，同时还有宗教信仰的因素，因此在欧洲崛起的时候突出希腊文明是必须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蒙古的崛起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破坏，巴格达被攻陷，埃及等地也面临巨大的威胁，这样的结果导致了知识的扩散，尤其是阿拉伯人到直布罗陀与西班牙的直接接触，对于西班牙率先崛起是有巨大的技术输入作用的，但所有这些都要被说成是文艺复兴的功绩，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而这个复兴的背后，就是殖民。这样一种在希腊罗马时代普及的统治方式的复兴，使人们对殖民的游戏规则、商业规则这些丰富的历史积累下的知识进行重新发掘，并且于大航海时代在全球找到了市场。

---

① 何新：《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 2013 年版。

文艺复兴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是创立了一个虚拟的艺术市场。以文艺复兴下的艺术市场来吸收这些过多的货币，艺术品在价值定位上也是可以被无限推高的，艺术品的高价是殖民者重要的商品，在定价体系当中对于艺术品是有特殊性的，他的价值无法进行常规的比较和替代，就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当时就是天价，被国王以4000金币购得。文艺复兴的大量艺术品成为殖民者取得贸易利益的源泉，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陶瓷，这些艺术品对于贵族的生活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品价格巨大的扩张，是维系财富高端的重要手段，今天判断暴发户与贵族的差别时，艺术品的多寡就是一条鸿沟。而当今艺术品的价格和西方社会当中艺术品的数量，其中所沉淀的财富依然是极其巨大的，而且让历史上存留的艺术品的价值膨胀，是非常有利于自身信用体系建设的，艺术品的定价权和艺术品价格的暴涨，是维系西方殖民信用扩张的有力保障之一。随着艺术的兴起，各种社会财富的艺术溢价则变得膨胀起来，使得社会总财富的计价将完全不同。我们当今为何要发展文化产业，也是有中国的艺术溢价和财富价值重估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对于什么是艺术的美，是带有巨大的主观性和文化差异的，能够让自己的文化成为艺术的评价标准，所带来的艺术溢价就是财富的实现，在等价交换的时候就能够换取更多的资源和财富，占有其他社会更多的劳动，这也是定价权和殖民的真谛。

艺术品在其本身的价值之外，也成为金融货币的一种延伸，在社会当中充当了货币价值储藏的功能，从而能够使更多的货币到市场当中。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就如明代成化的鸡缸杯，就是一个可以有货币作用的标志性古玩，价格非常明晰稳定，升值也与利率挂钩，可以取代一定的货币功能。因此艺术品替代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也是保持西方货币流动性丰富的重要因素，这使得大家把更多的货币投向市场而不是存储起来。因此文艺复兴让艺术品的增值，是增加西方总体财富资产的有力手段，也是挤压货币流动性离开财富储藏领域进入流通的手段，这样的社会财富增加和流动性增加，维持宗主地区与殖民地区的流动性和财富总量的差距，是维持殖民掠夺的重要层面。

在贵族的消费当中，由于艺术品的消费需求，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也使得殖民文化进入了政治的空间，于是那些权贵也开始需要货币了。在封建时代，贵族们的庄园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如今对艺术追求的出现使得他们开始入不



图 1－1　明代化斗彩鸡缸杯

注：2014 春拍上，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 1.6 亿港元起拍，以 2.8124 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据悉，买家为上海收藏家刘益谦。

敷出，这就给掌握现金的殖民者们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机会，这样的机会首先是从宗教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金融资本家的代表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的关系，美第奇家族的人是出现了多位教皇的，金融资本与宗教结合了。拙作《霸权博弈》当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这个世界是由三种力量博弈平衡所决定的：宗教、政客贵族、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与宗教结合起来了以后，必然是要打倒原来的贵族统治体系的，西方社会资本革命的开始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革命也开启了殖民者和殖民主义掌权的过程。同样由于文艺复兴，教会的财富需求也迅速增加，商人对于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美第奇家族能够出现多位教皇，已经充分说明商业对于教会的影响，教会也离不开货币和金融了。为了维持这样的财富，教会支持资本革命是必然的，同时教会进行改变也是必然的，宗教走向宽容，新教的出现，等等，都是与资本的崛起有关的；在各个殖民地，宗教对于殖民地的渗透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像靖国神社之于日本军国主义一样，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给西方的殖民主义找到了精神支持。在文艺复兴中找出来的各种希腊故事和历史神话当中，美化是可以想象的，就如中国儒家在西汉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崇尚和神化古代历史的过程就开始了，包括对于古代圣贤的禅让制度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来考据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都有伪作。文艺复兴给西方的殖民找到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也挖掘殖民的历史智慧，从而使得西方的殖民统治方式比古代又有了完善，殖民成为一个不公开说的秘密，西方的殖民智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西方殖民全球有很多的文化因素与他们维京人的海盗传统是分不开的。维京人的一支自称罗斯的部族来到今日的俄罗斯，俄罗斯名字的由来就与这支维京人有关。维京长船的航速可以达到20海里小时，是现代赛艇的速度。俄罗斯能够向东扩展，本身就是航运殖民的结果，因为北冰洋水系大量是东西向的河流，近距离跨越河流系统可以一直航行到黑龙江。这也是海上屠夫打败了陆地的蒙古屠夫，而不是先进文明的传播。对于这些海盗民族，是没有敬老和赡养父母的传统的，现在这样的传统依然贯穿西方社会，而在我们东方文明看来，这些没有敬老传统和孝道的民族就是蛮夷，西方在古罗马之后基本上也是蛮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如何把他们标榜为先进文明，把他们入侵和掠夺全球变成所谓的文明扩散和淘汰落后文明、文明的更替等，这就需要文艺复兴的神话来维系。

中华文明的东方自古就是宗教宽容的地方，中华文明也是没有种族歧视传统的地方，如果我们把文明上升到人权的高度，那么东方是先进文明而西方是野蛮人的入侵，西方号称有人权但人是不能自由流动的，中国的传统是“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语出《孟子》，当年春秋战国的各国人，与当今多国多民族的世界根本没有差别）的地方。西方的文艺复兴既找到了殖民的智慧，也找到了道德制高点，而当时的罗马希腊人与古代罗马希腊是根本没有传承关系的，北欧海盗们就更没有这样的关系了，这与中华文明的传承有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崛起时的种族奴隶制、人种灭绝式的屠杀等在东方文明里都是没有的，干这样的事情能够被称作是文明传播吗？英国率先废除黑奴制度，美国解放黑奴，美国解除种族隔离制度，这些事件被美化成为西方文明的进步，但1807年禁止英国人买卖黑奴，1833年解放了英国所有黑奴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使用黑奴的美国独立了，成为英国的竞争者；1865年美国解放黑奴则是为了打击南方农场主的势力，赢得战争，这些行为并不是真的为了尊重人权，看一下他们同期对毛利人、印第安人的屠杀就知道了，怎么对黑人和印第安人厚此薄彼呢？这一切只是为了取得利益的手段而已。现代消除种族隔离，是在社会主义运动、苏联冷战压力以及我们毛主席搞的第三世界的背景下，革命势力以人权攻击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根本不是西方文明率先实现了人权，而是在东方国度原来就没有的恶行被他们不得已废止了而已。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奴隶了，但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他们

贩卖奴隶和种族屠杀最激烈的时期，他们从古希腊复兴得来的，难道是他们的奴隶制吗？文艺复兴是复兴先进文明吗？

推崇文艺复兴的背后有打压阿拉伯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需要。文艺复兴更多的智慧是来自阿拉伯文明的，很多事物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阿拉伯文明对于西方的崛起贡献巨大，但这个作用却被忽视，这里面有征服阿拉伯的需要，也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竞争的因素。在印度等东方地区，中世纪受到了阿拉伯文明的巨大影响，印度洋上富裕的商业中心孟加拉等地区，都是伊斯兰控制的地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在西方就已经不复存在，连历史记录文件都没有，现代西方文明本来是阿拉伯被蒙古西征摧毁、巴格达被屠城后，阿拉伯文明转移的结果，但西方却要把这些转移所带来的东西硬说成是他们的独创。这个转移不仅仅是阿拉伯的典籍，连他们所依据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依据，也是阿拉伯给他们的。同时，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时期，阿拉伯地区与当时的泛希腊地区本身是不分家的，古代罗马帝国的疆土也包括现在的阿拉伯地区，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相继出现了一批蛮族国家。先后有法兰克、伦巴德、奥多亚克、勃艮第、汪达尔·阿兰、东哥特、西哥特、盎格鲁撒克逊等王国建立。王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王国存在的时间比较长。这些西方国家基本都是野蛮国家，因此就算有这样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这个文明的拥有者也是阿拉伯人，西方人最多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的，但西方人却要把这些变成他们祖宗的独创！

西方人征服世界所具有的实际上只是驾驭海洋的武力和因为蒙古入侵以及美洲发现所带来的贵金属流动性上的优势，但一个落后野蛮民族的征服要成功，就要融入先进文明，西方通过所谓的文艺复兴可以融入阿拉伯文明的精髓，又保有了自己民族宗教信仰的制高点，这与中世纪通过残酷手段保有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宗教是有关的，但在文艺复兴以后，吸收新文明的宗教就发生分裂和改革了，这宗教的变化也是财富和吸收新文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西方的殖民和大航海是开始最早的，然后是文艺复兴，接着是宗教改革运动，最后是资产阶级革命、资本掌权和启蒙运动，这个过程是不能颠倒的。所谓中世纪结束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实际上宗教改革先于文艺复兴就开始了，打破了宗教在中世纪的统治，而殖民扩张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西方偷换了中世纪

宗教的概念，中世纪的黑暗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存在，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一样不宽容，宗教宽容是在启蒙运动以后，但现在不经意间给人们的感觉是这一切进步都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都是西方人老祖宗所带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如果能够从殖民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我们就会知道，文艺复兴背后与我们当时的独尊儒术是一样的，是一种统治艺术的价值观的兴起，是一个给西方殖民主义找到精神支持的过程，也是西方历史智慧的一个重新认知的过程，是一个摆脱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过程。在文艺的美名之下，更多的是对于古代殖民形态的创造，是对于古希腊奴隶制的现代应用，是殖民智慧的复兴，这一切都并没有西方学者包装得那么高尚。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瓷器在历史上的作用①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品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与人的生命等值。“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17 世纪后半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

17 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

① 引自《甘肃日报》，转引自每日甘肃网。



图1-2 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乾隆年间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碗



图1-3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订制绘有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在一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中国瓷器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

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做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一桩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菲律宾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缴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人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

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用具。

犹太资本与海盗民族的结合

大航海时代开辟的海上贸易，看上去似乎是一趟简单运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小船很难顶住恶劣的暴风雨，海盗也令小商船队一路上提心吊胆，最可怕的是那个年代欧洲英、法、荷、葡几个国家为了争夺亚洲资源进行了白热化的竞争，很多私掠船甚至国家军舰都参与打劫毁灭对方。要成功地攫取殖民贸易利益，需要更多的力量平衡，在西方我们提北欧海盗，提盎格鲁—撒克逊，提他们与犹太黄金资本的联盟，这背后海盗、资本等因素最终落户到英国，让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人的历史。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分支，原居北欧日德兰半岛、丹麦诸岛和德国西北沿海一带。公元5～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两部都有人群南渡北海移民大不列颠岛，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两部落才融合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征服、同化，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大不列颠岛的“土著人”（克尔特人），再加上后来移民的“丹人”、“诺曼人”经长时期融合，才形成近代意义上的英吉利人（包括苏格兰人）。人类学上指不列颠祖先的分类：盎格鲁—撒克逊族（Anglo-Saxon），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大部分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是一个集合用语，通常用来形容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他们使用非常相近的日耳曼方言，被历史学家比德认为是三个强大的日耳曼部族——源自日德兰半岛的盎格鲁人（Angles）和朱特人（Jutes）以及来自之后称作下萨克森地区的撒克逊人（Saxons）的后裔。而诺曼人则是北欧海盗维京人的后裔，后来诺曼人征服了英国，成为英国的王室和贵族阶层的来源，因此英国的政治看似是贵族的上院与平民的下院，是贵族与平民的民主，背后实际上是维京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种权利平衡。

犹太人是欧洲的千年流浪民族，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还有历史的渊源，一神

教的伊斯兰教同样来源于犹太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属闪族（按传说两族还源于同一祖先亚伯拉罕，即易卜拉欣）。在阿拉伯人统治世界商业的时代，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是贸易的伙伴。中世纪反犹的欧洲禁止犹太人从事农业及在政府部门中任职，也不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而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信仰是把收取利息和商业差价作为一种信仰道德上的邪恶，干这个是上不了天堂的，这样的恶事社会还不得不需要，总得有人干，那么就交给犹太人干好了，迫使犹太人从事高智商的商业和金融业，加上犹太人内部通婚加速了后代智商的提升和血缘的凝聚力。由于近亲的通婚造成很多犹太人特有的疾病与高智商。在贸易上犹太人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聚了非常多的财富，通过这些财富来谋取政治利益。欧洲崛起时代的传奇富豪家族美第奇家族就被广泛怀疑为犹太家族，这个家族产生了多位教皇和皇后。

这些势力的结合有他们背后的共同需要，海盗与犹太人所仰赖的都是黄金资本，不是土地资本，海盗不可能拥有土地，犹太人是不准有土地的，海盗民族的后裔后来成为英国王室和贵族的来源，而英国的宗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教派，独立于普遍迫害犹太人和视海盗为蛮族的天主教，因此在英国这个主权实体下，贵族政客集团、金融资本集团和宗教集团都完成了一整合，他们的结合了对于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看待，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英国内乱不堪，但这个时候却打败了世界最强大的荷兰，这说明了什么？荷兰是依靠金融资本支持取得独立的国家，而荷兰被英国击败是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之中，这背后充分说明了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转移。而荷兰当年改宗新教，新教对于犹太人又态度宽松，于是荷兰成为犹太金融资本的大本营；英国当年能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也是依靠大量的海盗支持，国际资本势力从荷兰到英国，就是彻底从投靠海上马车夫到投靠海上强盗的过程，金融资本与海盗民族结合了。这个结合的结果就是把全球的殖民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建立了全球的殖民体系，英国也成为日不落的殖民帝国。

延伸阅读　北欧海盗的历史

维京海盗（Viking）就是北欧海盗。在欧洲语系中，这个名字往往是北欧海

盗的同义词。他们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欧洲大陆至北极的广阔疆域，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在英语中，这个词是从18世纪的传奇故事中引入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来源于古代北欧人的语言，“vik”，意思是“海湾”，“ing”意思是“从……来”，加起来“维京”意思是在海湾中从事某种事，“vikingr”是在海湾中从事这种事的人；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来源于古英语“wíc”意思是“进行贸易的城市”，因为后来部分维京人定居到不列颠岛，并和当地人进行贸易。

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中的维京海盗是记录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公元789年维京海盗发动了一次对英国的袭击，当时他们被当地官员误认为是商人，这些海盗杀死了要向他们征税的官员。第二次记录是在公元793年。之后200年间维京人不断地侵扰欧洲各沿海国家，沿着河流向上游内地劫掠，曾经控制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据说他们曾远达地中海和里海沿岸。其中的一支渡过波罗的海，并远征俄罗斯，到达基辅和保加尔。

维京人与很多地区保持着贸易上的往来，考古学家从北欧的墓葬群中也找到了不少别的地区的产品与钱币。不过他们更加喜欢白银，商人随身带着天平，用银块充当砝码。

石刻与传说记载了他们的旅行：公元860年，沿着伏尔加河而下的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那时还不叫这个名字）。他们同当地的斯拉夫人做交易，从诺夫格罗德南下，沿河来到波尔加，用奴隶换取蜂蜜和毛皮；再顺着伏尔加河进入里海，换乘骆驼，一直来到巴格达，交易丝绸和香料。

另一条贸易路线是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进黑海，到达盛产葡萄酒、丝绸的伊斯坦布尔，出售精美的珠宝首饰。维京人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相比较，别国的船去不了远海，设计也很笨重。维京人的船分量轻，船身狭窄，吃水浅，可以在欧洲所有河流中航行。

9世纪和10世纪，维京人侵袭了在海岸上和沿着低地国家河流的基本上无防御的弗里西亚和法兰克城镇。尽管维京人从没有在这些地区大量定居，但他们确实设立了长期基地，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被公认为统治者。在尼德兰和弗里西亚历史传统中，贸易中心多瑞斯塔德在834～863年的维京袭击中衰退。然而因为没有令人信服的维京考古证据在该遗址被发现（到2007年），关于这些的

疑问在最近产生。低地国家遭遇维京侵袭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追溯到公元880~890年的维京攻击的遗物在聚特芬和代芬特尔（Deventer，尼东）被发现。公元907年维京人以2000艘战船和8万人的部队攻击君士坦丁堡。不过他们被拜占庭的皇帝以最优惠的贸易条件成功收买。丹麦人攻击和掠夺英国东北海岸的在林狄斯芬上有名的海岛修道院，这种攻击和掠夺开始成为趋势。由于维京人突袭英国、法国和日耳曼的规模和次数增加，因此逐渐变成为入侵。他们建立殖民地作为继续突击的基地。在法国西北方的维京人的殖民地即诺曼底（由北欧人的名称而来），在那里居住的人就被称为诺曼人。

在10世纪，法国国王以分裂部分领土（诺曼底，由古代挪威人或诺曼人来统治）给维京人来换取和平，其他的诺曼人亦征服了西西里、大半个意大利，并在巴勒斯坦建立十字军的王国。在公元911年，法国的国王让诺曼底的维京首领成为公爵，以换取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停止入侵。自从诺曼底的公国成立后，就不断出现卓越的战士，包括在公元1066年征服英国的威廉一世、在公元1060~1091年之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西西里的罗伯吉士卡特和他的家族，还有由十字军战士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鲍特温一世。

维京的入侵在10世纪末期便已停止，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成为基督徒后，不再听从过去异教信仰的战士价值观。另外，斯堪的那维亚分为几个王国，新的统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管理业已拥有的土地上。除此，维京的殖民者在俄罗斯、法国和不列颠等地亦被他们周围的文化所同化。

11世纪时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自不来梅的亚当曾在他的著作《汉堡大主教史》第四卷中记载过："海盗们在西兰岛聚集了大量的黄金，这些海盗被他们自己人称为维京，我们称他们为阿斯考曼尼，他们向丹麦国王纳贡"。

13世纪时，挪威国王哈罗德一世下决心要将这些海盗从苏格兰及附近岛屿清除出去，部分维京人逃到冰岛。北欧的传说将他们描绘成无畏的英雄，但到了18世纪的传奇中又把他们描绘成强盗。欧洲人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业余去做海盗，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这些人可能只是非法的强盗。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斯拉夫人中的海盗逃亡并落脚在北欧。

因维京人的威胁而发展出来的欧洲战士文化，随后却在地中海东部的圣地找到发挥的新出口。还有丹麦、瑞典和挪威都成为王国的原因，很多他们国王

的敌人都投奔到他们的土地。基督教的传播削弱了这些古老异教战士的价值观，并使得这种价值观慢慢消失。古北欧人亦被他们以前常侵扰的基督教文化所吸收。英国的占领者和征服者就成为英国人、诺曼人成为法国人。

延伸阅读 传奇的美第奇家族

在经济史上，美第奇家族是现代金融业的开山鼻祖。13 世纪以来，经过十字军东征的洗礼，欧洲通向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的传统海洋贸易路线被阿拉伯人切断，意大利成为欧洲最主要的贸易大国，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进口。

意大利人在跨国贸易扩张中积累了大量周转资金和财富，专门从事货币汇兑、货物抵押、结算、保险和有息贷款的商业银行在这个国家纷纷诞生。排斥贷款付息的基督教势力较为薄弱的佛罗伦萨逐渐成为金融中心。特别是在 1252 年发行了金币弗洛林后，佛罗伦萨创造的标准货币在整个欧洲被广泛采用，进一步巩固了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地位。

美第奇家族是 13 世纪到 17 世纪期间称雄于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该家族最初经营兑换钱币的钱庄，后来随着财富的大量积累而设立了银行。在众多家族领袖中，三个重要人物维系了美第奇家族的传奇。

一个从高利贷生意起家，精于计算、钩心斗角的金融家族，沉浸在中世纪前的古典浪漫艺术之中，并主导开启了文艺复兴时代，这与大众文化认知中对于金融家的定位相去甚远。

美第奇家族中出过 3 个教皇和 2 个法兰西王后。一方面，在政治上权倾一时；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资助艺术活动，对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有巨大的影响。这第一批成员从 16 世纪至 1737 年统治着佛罗伦萨，其中包括 8 位大公。他们会一个一个地接受检测，得出生物学和遗传学数据。美第奇家族是从北托斯卡纳的穆杰洛地区来到佛罗伦萨的，“但是他们更远的祖先可能来自东方。按有些人的说法，他们可能是犹太人”。

早在 14 世纪 90 年代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称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银行家”：一个没有起色的小团伙，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资活动而著称。1343 ~ 1360 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 5 人因为资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对

于乔万尼·美第奇来说，让美第奇家族活动合法化是他的奋斗目标。他通过勤奋工作，节俭持家，精打细算，最后成功了。1385年，乔万尼成为一家银行罗马支行的经理。这家银行是由他的亲戚、佛罗伦萨放贷人维埃里·美第奇经营的。在罗马，乔万尼以一个外汇交易员的身份而声名卓著。从诸多方面来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户，因为他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流入和流出梵蒂冈金库的不同货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多种铸币共存的时代，有些是黄金，有些是白银，有些是贱金属，这使长途贸易或纳税很复杂，需要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乔万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机会在佛罗伦萨。他在1397年返回佛罗伦萨。到1420年的时候，他把业务移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罗马成立了银行分支机构，他还从两家佛罗伦萨羊毛工厂获取收益。后来他在日内瓦、比萨、伦敦和阿维尼翁增设了银行分支机构。

美第奇家族早期业务中特别重要的是商业汇票，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融资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的债务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几个月后才能用现金支付，那么债权人可以给债务人出票，还可以使用该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低于票面的价格从愿意充当中间人的银行套取现金。征收利息被视为高利贷而受到教会的谴责，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精明的交易者从此类交易中获利。这是美第奇家族业务的本质。没有支票，说明只是口头上的，并记录在银行册子里。没有利息，储户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公司每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以补偿他们的资金所承担的风险。

乔万尼的“机密簿”（libro segreto）让这个家族的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心翼翼保存账簿的故事。按照现代标准，这里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虽然早在14世纪40年代，复式簿记方法在热那亚广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现代研究者对美第奇家族整洁有序的账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档案还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负债表，一边是记录准确的准备金和存款（作为负债），另一边则是贷款客户或商业票据（作为资产）。美第奇家族没有发明这些技术，但他们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经营规模庞大，不如说是经营多元化。早期意大利银行一直是单一的经营结构，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美第奇家

族银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谈判合同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多重相关的合伙关系。银行分行经理并不是雇员，而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他们从利润份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正是这种权力下放，让美第奇家族银行获得了巨额利润。美第奇家族银行在1402年拥有大约2万弗洛林金币资本，在册职员最多时有17人；1397～1420年所赚取的利润为151820弗洛林金币，大约每年是6326弗洛林金币，年收益率为32%，仅罗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过30%。这种经营模式在佛罗伦萨纳税记录上得到证明，记入其中的乔万尼的资产一页接一页，加起来总计是9.1万弗洛林金币。

阿拉伯商业帝国崩溃带来的机会

西方的崛起，西方能够殖民全球，流动性的差异造成贸易的不对等是其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垄断贸易通路就很有必要。以往东西方的贸易是被阿拉伯人垄断的，印度发明的数字由于阿拉伯人的使用和传播于世界，都被叫做阿拉伯数字了，西方崛起与阿拉伯世界商业帝国的崩溃也是分不开的。

阿拉伯世界的崩溃始自蒙古人的打击。1258年蒙古西征攻灭阿拔斯帝国，巴格达惨遭屠城厄运，是阿拉伯世界衰落的标志。蒙古西征大军在旭烈兀的统帅下，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波斯和两河流域。1258年巴格达陷落，阿拔斯哈里发帝国（AbbasidCaliphate）的末代君主穆斯塔西姆（al-Mustasim）被蒙古大军生擒处死，阿拔斯帝国灭亡；1260年初阿拉伯人在亚洲最后的重镇大马士革陷落，至此埃及马木留克政权成为伊斯兰世界硕果仅存的一支武装力量。

马木留克（Mamluk、Mamluke、Mameluk、Mameluke，又名马木鲁克、马穆鲁克、马木路克），也叫做钦察奴隶兵，公元9～16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的意思。阿拔斯帝国的哈里发们开始从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购买奴隶组建成骑兵部队，用以抗衡拥兵自重的阿拉伯各部落首领。马木留克骑兵全部是重骑兵，头戴精钢打造的头盔，身披钢丝密织而成的锁子甲。武器装备包括：强弓长矛和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以及盾牌；马木留克强弓性能优于蒙古强弓；其坐骑是世界闻名的阿拉伯纯种马，也比蒙古马更适合当地环境。

蒙古大汗蒙哥去世，旭烈兀的哥哥忽必烈和阿不里哥为争夺汗位而发动内

战，而旭烈兀率领十几万大军东归以助其兄一臂之力，只留下部将怯的不花率领两万军队镇守大马士革。埃及马木留克王朝趁着旭烈兀率主力东返而发难。1260 年 8 月的一天，苏丹忽都思（Kudus）率领 12 万大军从开罗出发，前往叙利亚同蒙古军队决战。在 1260 年 9 月 3 日于艾因贾鲁以 12 万人对 2 万人的优势兵力打败了蒙古人，杀了蒙古留守主帅怯的不花。怯的不花大军覆灭的消息传到大马士革，留守的蒙古将士马上逃之夭夭，忽都思就率领大军胜利开进大马士革，收复了叙利亚。

艾因贾鲁战役的失败对旭烈兀西征来说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得到忽必烈支持的旭烈兀更加强大，完全有能力再次出征，一雪艾因贾鲁之耻。如果不是埃及马木留克新苏丹拜巴尔施展过人的外交才能，埃及是终究难以抵挡旭烈兀大军的。这外交成功的背后是当时的胜利者忽都思还没能享受几天胜利果实，就被他的得力干将拜巴尔暗杀。拜巴尔以给蒙古人报仇的名义得到蒙古人的谅解成为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新苏丹。拜巴尔还有效地利用了蒙古人内部的矛盾。在金帐汗国拔都死后其子别尔哥即位。别尔哥非常不满旭烈兀独享果实，血洗巴格达，杀死哈里发。拜巴尔因此和别尔哥结盟。1262 年别尔哥向旭烈兀宣战。蒙古人旷日持久的内战让旭烈兀无暇西顾，反攻叙利亚的计划就无限期地搁置起来。

马木留克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1250 年，阿育布王朝苏丹萨利赫（as-Salih）病逝，突厥籍马木留克将领阿依巴克（Aybak）杀掉了年幼的继承人，娶了萨利赫的遗孀为妻，从而创建埃及马木留克政权。而对于蒙古人战争的胜利，保住了他们的统治权威性，先后建立了伯海里王朝与布尔吉王朝（Burji Dynasty），统治埃及近 300 年之久（1250～1517 年）。这些马木留克是以阉割奴隶为主的，阿拉伯人对待奴隶一般也是阉割使用的，因此这一时期与我国当年的太监专制统治时期一样，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而阿拉伯世界与蒙古的征战，使得阿拉伯的商业受到巨大的毁坏，后来一直没有恢复。在马木留克统治时代，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分裂和内斗的时代，这也是西方世界崛起的机会，葡萄牙、西班牙也是在马木留克统治时期驱逐阿拉伯的统治者取得独立，然后征服世界的。

在阿拉伯衰落和蒙古人衰落留下的中东权力空间内，经过激烈的内斗和战

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了。该国为突厥人所建立的一个帝国，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奥斯曼人初居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日渐兴盛。极盛时势力达欧、亚、非三大洲，领有南欧、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之大部分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北苏丹与也门。自消灭东罗马帝国后，定都于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且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故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统治范围内得以统合。

16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日趋鼎盛，其领土在 17 世纪更达最高峰。在巴巴罗萨的带领下，其海军更掌控地中海。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间段占据上风，东南亚地区的亚齐国、马六甲素丹国皆成为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由于奥斯曼帝国封锁了向南及向东的海路，欧洲各国只得另觅路径。正是由于阿拉伯世界的衰落、混乱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锁，原有的陆路贸易通道和海运通道已经不复存在，才驱使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始。在阿拉伯衰落和奥斯曼帝国时代，原有的贸易通道不行了，西方的大航海发现了新的贸易通道，而且成地的垄断了这个贸易通道，因此可以成功地赚取流动性差异带来的定价权利益，从垄断的贸易通道开始，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从这个海上通道的发现、兴起和维护当中，海权的概念兴起了，殖民兴起了，西方富裕了。阿拉伯的商业帝国则被西方超过，阿拉伯对于全球贸易的垄断不复存在了。

殖民模式下海盗与海权兴起

西方能够建立殖民体系，能够维持西方与殖民地的巨大价格落差，这里面海权和海盗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在蒙古的战争和金融政策导致向西方输出金银的条件下，在大航海时代美洲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全球金银主要集中在西欧，进而导致以金银定价的价格革命，此后东西方的物价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等就出现了巨大的价差。这巨大的差价造就了不同的信用体系和殖民渔利的前提条件，维持这样的信用体系的落差，就要海权和海盗起作用了。

中国的丝绸、陶瓷与印度的香料运到欧洲，价格可翻几十倍。最有名的就是胡椒，西方有一个成语是“他没有胡椒”，意思就是他是穷人，当年西方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带自己的胡椒来参加聚会的。如此的差价，定价合理吗？西方主

流观点是殖民逻辑的延续，是西方殖民者给世界制定的规则，这就是：只要没有武力胁迫，没有垄断，成交的价格都是合理的。但这个价格真的没有武力胁迫和垄断吗？这个武力胁迫和垄断是在贸易的通路海权层面，是由海盗支持和维护的。在近代，由于海洋被控制，只有能够与海盗建立良好关系和控制海洋的人，才有贸易机会，因此这样大的价格落差，只能由海盗和海权的垄断者攫取。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贸易的结果，在贸易上只有我能够到你那里贸易，没有你到我这里贸易的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先是我到你那里贸易时商定了关税，而你到我这里原来没有贸易，所以关税多少是由我随意定的，这样的贸易和价格还是合理的市场定价吗？

为了维持贸易的需要，海洋的贸易通道就非常重要。在以往的陆权时代，是一路贸易过来被一路收税，谁也绕不过税吏。但海洋贸易就不受陆路关卡的限制了，而且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这样的价格差就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此的价格落差经过多次贸易后会迅速降低，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那么为何西方与东方殖民地的贸易价格落差会一直存在呢？这就是要通过海权和海盗建立起贸易壁垒，而且这个壁垒越高，越能够体现海权的价值。

海上交通一样是有关卡的，这样的关卡与陆地相对应就是海权的关卡，现代“海关”的概念也是诞生于此。在历史上海关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国界港口，还有各种海上交通要道的通行权，通过一些他国控制的海上通路也是要有他们海关的文书的，与陆地上的通行证没有什么两样。海权必须能确保自己的交通线安全，同时能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从而达到自己垄断海洋和贸易的目的。海洋交通线越长，相对于陆地的关卡和运输费用的差价也就越大，则海权所能给予的利益也就越大。而海洋交通线的建立，与殖民地的取得也是互相促进的，维持海权的海军军事补给，就依赖线上的各个海外基地（殖民地）与海港了。

如果你距离相关海域过于远，补给难以达到，那么维持你在其中的海权地位，就不得不与海盗合作了。在大航海时代，西方的海盗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剿灭与被剿灭的敌对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合作的关系。西方国家甚至授予这些海盗抢劫特许权，也就是著名的私掠许可证，把他们的抢劫行为合法化，并且豢养海盗作为维护自己海洋权力的辅助力量。官方背书的海盗存在，就是

在海上通路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壁垒；而海盗也不能完全脱离陆地，也需要这个国家的主权保护，这是一种狼狈为奸的交易。谁有海权，就意味着谁在贸易当中拥有竞争优势；不平等的关税必然导致竞争者垮台，这以武力为背景的掠夺，是被包装在市场自愿交易的外衣之下的，也是维持殖民信用体系的关键。对于殖民地的抗争，如果抗争者不能突破海权的限制，则贸易利益就被完全控制了；如果开放贸易自由的话，一定很快又要在经济上被控制，国家一步步沦落为殖民地。

西方的海权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那样强大，西方探险者初次大航海的时候，远航到达未来殖民地附近的力量都是弱小的，真正主宰海洋的是海盗。但海盗到底跟谁合作，差别在哪里？如此巨大的贸易利益，海盗要攫取也离不开上岸交易，海盗找谁交易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海盗的选择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就是海盗要找金银多的有钱方交易，哪里的金银流动性多，海盗的赃物就能够在哪里卖出更高的价格，获得更多的金银。西方社会当时集中了最多的金银，在共同使用金银贵金属货币的时期比东方社会的物价要高，可以用货物换来更多的金银，因此海盗与西方主权国家合作就是必然的。而西方社会的犹太人赚取大量黄金，是主要的商业经营者。犹太人当时社会地位低、底线低，与海盗合作最有可能性，潜在的合作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听到北欧海盗与犹太黄金资本联盟控制着世界的说法。海盗是不会与当时发达而物价低的东方文明合作的，而是与金银多、物价高、相对落后的西方政权合作。这成了西方殖民者的海洋武力保护伞，给了西方掠夺者能够向东方殖民的可能，西方因此赚取大量的财富而崛起。

英国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1588 年英国著名的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就作为副指挥参加了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西大海战。1587 年，英西海战爆发，德雷克的海盗船队在这次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德雷克也被封为英格兰勋爵。海盗联盟大军与英国海军一起参与了与西班牙无敌舰队战争。英国与海盗在历史上还有特别的渊源，我们可以翻开维京人的历史。维京海盗（Viking）就是北欧海盗，他们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的广阔疆域，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维京人实际上就是海上的蒙

古人，他们根本不是先进文明，到处野蛮入侵抢掠。在公元911年，法国国王让诺曼底的维京首领成为公爵，以换取他们皈依基督教并停止入侵。维京人后来上岸变成诺曼人，诺曼人又登陆英国成为英国的统治集团。同民族背景是合作的巨大信用保障，维京人的海盗能力是英国崛起的关键。在中世纪的907年，维京人就可以以2000艘战船和8万人的部队攻击君士坦丁堡。**维京人的海上战斗力是当时海权争霸的关键，就如蒙古骑兵的陆地战斗力决定了古代欧亚大陆的陆权一样。** 海盗是西方崛起和殖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西方的黄金则是吸引海盗的关键因素。而西方由于需要的不同，对于海盗的称谓在不同场合下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一般总用“海盗”一词，而西方人在不同场合则可能用了另两个词：“冒险家”或“航海家”。在我们看到的各种西方的文字当中，“冒险家”或“航海家”是频繁出现的，但要论这些人的行为，则是与海盗无异的，对此中国人自己要有足够的判断力。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获得殖民地的大量财富，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建立海洋霸权，与海盗的合作需求就下降了，也不愿意和海盗分享巨大的海权红利了，海盗海权的合法性就没有了，海盗就成为被剿灭的对象了。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崛起，海上的贸易被一个霸权垄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铁路的出现导致陆权重新崛起，对于海权也是一个重要的竞争。霸权国家为了殖民和垄断优势，新的垄断焦点就进化到了金融权力，在金融交易上的壁垒很多是类似海权的，海上的通路权与金融的结算权类似。因此在西方发展到金融时代产生现代金融体制时，货币的权力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谁能够发行信用货币成为决定性要素。日本当年接受以英镑发行日元，英国就免除了日本一切不平等条约。明白了这些，才能够理解当年朝廷为什么要闭关锁国，为什么不愿意多开通商口岸，今天“闭关锁国”是一个被妖魔化的词语，但是不理解西方殖民掠夺世界的大背景，就片面地指责古人封闭愚昧，其实自己就是愚民。信用货币这个体系的维持，依然离不开物流贸易体系的军事霸权，当今美元的信用来源不是其不断赤字的政府国债，而是美军控制全球海洋贸易通路的军事实力，以及整个美军实力带来的全球供应体系。就如石油离不开运输，在美军的实力下产油国不得不以美元来结算石油贸易。

认识殖民，以殖民的视角我们能够充分认识海权的重要性，海上实力是殖

民成功的重要保障。而西方取得海权称霸世界，所依靠的也不是文明，而是金银的诱惑下与海盗达成的合作。海盗的实力对于西方的崛起有主导性的作用。能够与海盗合作又与西方当时集中了全球的金银有关。所有的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背景阅读　私掠许可证与豢养海盗

西方的海权崛起，与海盗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对此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文明国家给海盗抢劫的合法凭证，以及为了国家利益搞丛林法则豢养海盗的历史故事，由此你才能够知道西方殖民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带路党眼中的所谓“文明的扩散”。

私掠是指由国家颁发私掠许可证，授权个人攻击或劫掠他国船只的行为。执行私掠的船只通常被称为私掠船或武装民船，船长通常被称为私掠船长。16~19世纪，武装民船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国家海上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航海贸易业热了起来。新大陆的发现与殖民地的扩张，令世界各地弋游着各种各样满载黄金和其他货物的船只，各国的利益竞争和对殖民地的野心提供了海盗活动最大的温床。随着私掠许可证的出现，海盗活动甚至开始“合法化”了。私掠许可证听起来有点强盗逻辑，例如：能通过合法或外交手段来获得对于他损失的补偿，反而能得到一封荷兰政府授权的私掠许可证，这样的许可证允许他可以通过俘获德国商船来弥补损失。

后来各国政府使用这些许可证作为国家工具来加强海军，可以使该国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凭空多出一支能够攻击敌国商船、保护本国商船的海上力量，保护领海，以私掠许可证豢养海盗就是一些号称“文明”的国家的历史污点。后来的海上霸主英国，就是靠着一群海盗起家的，难怪有人曾戏说：全英国就是一大群海盗，伊丽莎白就是最大的海盗头子。在这个自由与荣誉共重、炮声伴随海风齐飘的海盗黄金岁月，一批著名的海盗头子涌现出来，基德船长、“黑胡子”蒂奇、“黑色准男爵”罗伯茨等都成为海盗史上的传奇经典。

私掠船通常被利用来破坏敌国的海上贸易线。对于海上力量弱小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战胜强大敌人的好办法。不少国家使用这种方法在不花费大量经费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同时还培养了大量优秀水手和军官。

私掠船攻击敌船所获得的货物通常会在指定地点拍卖。其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归船长、船员和授权国（皇室）所有。必要的时候，私掠船还会被征调为军舰参加战斗。

但随着经济和实力的发展，已经取得海洋霸权的西方列强就不再允许海盗分享他们的海洋利益了，从此海盗和私掠国际潜规则也就走到了尽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各国缔结了《巴黎条约》，同年4月16日发表巴黎宣言，以附件追加的形式废止了私掠权限，但当时主要国家只剩下美国未批准此合议。直到1907年，含美国在内的列强在海牙和会中决议武装商船必须视为军舰造册管理之后，私掠许可证的历史才正式画下句号。此时海盗已经从国际海权舞台当中衰落了很多年了。

流动性与殖民的真谛

殖民体系在世界的崛起，殖民统治成为全球新的统治方式，我们要仔细剖析殖民到底是怎样管理整个世界、怎样攫取世界利益的。殖民背后伴随着垄断和流动性的控制，殖民的背后是金融的不对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殖民是一种高效的管理方式，在殖民模式的进攻之下，原来的传统信用体系和政权轰然倒下。殖民的真谛在哪里呢？

殖民的真谛一直是商业统治而不是农业统治、宗教统治和武力统治，虽然殖民离不开农业、宗教和武力，但就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要有钱一样，殖民控制的主要层面是商业，是货币，而不是其他形式。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一个统治成本更低的模式，不过这也是有前提的，在最开始殖民的时候，商业控制最开始体现在物流层面。本书的核心假设在于定价权是流动性导致的，殖民体系的关键就是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取得定价权，要达到目的，殖民统治的关键就是怎样管理和控制好流动性的问题。

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不能人为创造，不能如当今信用货币时代这样印钞放水，但是一样有控制流动性的手段，这就是在物流层面来控制流动性。在古代陆路运输成本极高，中国古代就有千里不运粮的说法，对于大宗商品而言，高昂的成本是难以长距离贸易的，只有走水路。大规模低成本的物流离不开水运，一个国家的运转体系是以航运为核心的，虽然很多古代陆权国家也离不开航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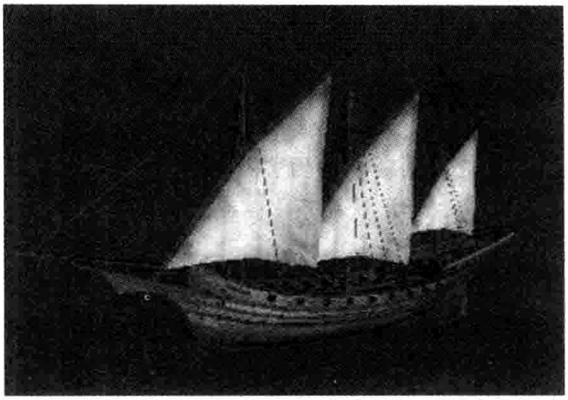


图1-4 尖底帆船

运河，但河流很多情况下还是被两岸的自然地貌和河岸上的炮台所控制，远不如海洋自由。殖民是离不开一个开放的海洋体系的。在古希腊殖民的历史中就是非常好地利用了地中海的航运条件。由于地中海非常平静，很适合航运，各个殖民地就在地中海的四周建立起来了。当时地中海的平静对于航运而言就是航行在内河河道的平底船也可以在其上航行，而要航行大洋则需要尖底帆船。郑和远洋的船只就是尖底帆船，而中国古代海禁也是禁止建造尖底帆船，平底的小船则是不受多少限制的。到了大航海时代，尖底帆船发展到了成熟的程度，人类征服海洋进行航运的能力进一步提高，逐步可以进行环球航行，海洋成为物流的控制核心。

流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地区的流动性是否丰富要和这个地区流通的商品数量相对应，控制了物流，也就是控制了流动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古代贵金属时代，货币也是一种商品，运输成本也是巨大的。想象一下，古代大侠要带几百两银子行走江湖的话，那相当于扛着几十斤的物件满大街跑。而在世界殖民和航运的历史上，直接运输贵金属金银本身就是运输中很重要的项目，不同地区之间的货币流动性也是要依靠金银的物流来完成的，因此控制金银的运输也是控制流动性非常关键的层面。

控制物流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控制粮食。古代的粮食运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赶车的过程中人吃马喂消耗很大，如果就地取粮则等于没有运输。我们想一下，一车草料和粮食可以供给拉车的牛和赶车的人吃着走多远？运粮还要考虑回来的成本。粮道中间建设囤粮点等模式虽然还可以远一些，但其他成本也非常高。在古代靠天吃饭的年代，各年份粮食的产量相差很大，很不均衡，遇到灾年的话，谁能够控制粮食运输，谁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在殖民时代的粮食战争也是非常残酷的，例如英国掠夺富裕的孟加拉时就出现过多次粮食

危机。

而粮食在古代经常是一种准货币，或者粮食决定了货币的价值，到粮食紧缺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不是粮食涨价而是货币贬值，因为货币能够购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要高于能够养活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口粮的价格，因此粮食危机造成的是全面的涨价而不仅仅是粮食涨价。同时，在价格层面，资产的价格却会因为粮食价格的降低而大幅度降低，原因就是人要拿它换取粮食。饥荒下一根金条或者一栋房屋换一个馒头的事情屡有发生。殖民统治就是要控制粮食这样的刚需，在刚需的压力下重新建立价格体系。

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给殖民带来的就是更直接的控制货币流动性的手段，那就是货币的衍生和货币的结算。在殖民时代，西方的货币是金本位的，对应的殖民地东方却是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而且殖民地的货币是实银，是直接的金属铸币，但西方殖民者的货币是以殖民武力保障下的对应于黄金的纸币，这个货币不是贵金属了，却可以比贵金属货币的数量多很多倍！就算在本位货币时代承诺其纸币对应贵金属的兑换价值，但纸币的数量是要比贵金属的数量多很多倍的。纸币相对于贵金属数量衍生多少，是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的。

而再后来他们连承诺的纸币与贵金属的等价关系也不承认、不保障了，贵金属价值所对应的财富也被金融系统的所有者占有了，这使得货币利益从贵金属矿主或者说贵族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金融者和殖民者手中了，殖民地的金融权力都是在殖民者手里的，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是以宗主国货币为本位的。为殖民者可以制造货币的时候，与控制物流时期相比，其可以控制更多的市场上的流动性，取得更多的定价权。而殖民者与殖民地的货币，一个是金本位纸币，一个是白银货币，在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上也造成了黄金的溢价，这个溢价就是货币定价权。利用这样的溢价让殖民地白银内升外贬，货币的汇率变化让殖民地财富大量外流，大量进入了殖民统治者的腰包。

与殖民全球同时期，近现代的金融体系建立了，在这新的金融货币信用体系下，殖民者能够控制的流动性就更大了。在以往财富体现为贵金属货币的时代，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他人是难以利用的。在现代货币体系诞生以后，货币所代表的财富是被其他人利用的。纸币后建立了银行金融系统，你的财富持有方式不是直接持有商品货币而是持有货币信用凭证，也就是在银行的存款。

但你的存款所对应的财富是给谁使用且以什么代价使用，则你说了不算，而是由银行决定，他人利用你的财富还可以被另外的人利用。通过这样的层层衍生，财富被利用的程度就达到了极致。就如你有100万元银行存款，这100万元所对应的财富就被银行再贷款给他人，他人就利用了你的财富，而且贷款给谁、什么利率，存款人不能控制。而贷款人取得的贷款也是存在银行的，这存款还可以被另外的人贷款。如此往复，财富的效应得到了数倍放大，这样的决定能力就是一种权力，如果这个权力垄断了，就是一种霸权。而这样的金融权力到底在谁的手里，在近代殖民崛起的时代是非常关键的。西方的殖民者能够殖民与进行流动性控制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历史利率上明确地看出来。中国的历史利率一直是很高的，但西方殖民全球的时代，西方资本化市场化的时代，西方的利率是很低的，与西方世界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利率是基本一致的。西方的利率大多数时间是在10%以下甚至5%以下的。现在西方的QE搞不到1%的超低利率和大量印钞释放，是又一次控制流动性的全球殖民。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背景阅读中关于西方历史利率的数据，对这样的历史利率差距，本书当中还要多次提到和分析，对如此明显和巨大的差距，中外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同时选择性失明，确实很难以非阴谋论的正常的思维加以解释。

西方殖民的成功是得到多方面的支持的。古希腊殖民的历史智慧继承，美洲金银和蒙古屠杀造成的全球金银向西欧的集中，维京人的海盗技术类似于蒙古骑兵在大陆的作用，金融体系背后的掠夺和印钞，等等。但这些因素西方人不提或者淡化，西方人要包装的是他们的崛起源于产权明晰或科技进步！不过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东西如果不能够融入商业的环境，一样是会被束之高阁的，更何况很多被殖民的地区，其科技反而在当时一直是领先的，就如孟加拉的织布和中国的瓷器，这些难道不是高技术吗？西方把蒸汽机作为他们工业革命的原动力。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历史，就会知道瓦特的蒸汽机是在1769年建造的，而建造这个蒸汽机很早以前西方的优势就确立了，殖民时代也早就开始了，历史的现实是被本末倒置的。新的技术不断地进步，是西方殖民成功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在有巨大财富保障下的创新。财富是基础，财富是殖民得来的，对于科技这样的锦上添花是在丰富流动性保障的条件下促生的。在流动性紧缺的时候，技术的研发经常是最先被砍的费用。而且就算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制度改革之外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日本发现了世界级的银矿。日本的石见银山是在明代中后期和西方全球大殖民时期发现并开采的全球最大的银矿山，产量曾高达当时全球的30%。此外也有铜、铁等矿产，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的流动性。一个国家的崛起和资本化，背后的流动性支持在哪里非常关键，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流动性支持，资本化必然失败！这才叫做物质决定意识。到现代，流动性更体现在信息流上面，本人在《信用战》里面曾经分析过，信息、信用与货币是一个性质的，信用是由一组信息表述的，你的信用就是你的信息，纸币等也是一个信息的载体，你在银行的存款和财富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组信息。如果到物理层面，你可以利用的能量和资源是熵，熵也是信息，是状态数量，信息的流动本身也是一种流动性。而当今世界，美国的网络霸权，是在网络层面建立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谁控制了网络信息的流动性，谁就控制了世界。** 依靠网络的力量，美国已经成功地颠覆了多国政府，建立了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政府，这难道不是一种网络殖民？

笔者认为，殖民的成功在于取得定价权，通过垄断定价权让市场调节其他事物维持统治，是在古代管理成本极高的情况下节约管理成本最好的方式。殖民统治能够成功，源于其比武力征服更低的统治成本，在流动性与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他们的统治目的得以实现。因此殖民者无论到哪里，首要要求的就是开放市场，在开放的市场当中实现他们的垄断和统治。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争夺统治权，要害就是对这个市场货币和商品的流动性进行掌控，流动性是其统治的原动力。**殖民的真谛在于建立信用体系来掌控商品和货币的流动性。**

延伸阅读　西方的历史利率

利率的高低反映了世界流动性的松紧，别说与中国历史上的高利率相比，就算与中国现在的社会利率相比西方历史的利率都是很低的，在西方殖民全球的主要时期内，西方的利率常年维持在10%以内的，19世纪到二战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率甚至基本在5%以下，而同期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利率则高达40%～50%，甚至更高。我们根据《利率史·第四版》（[美] 悉尼·霍默、理查德·西勒著）中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利率情况进行了整理见表1-1、表1-2、表1-3。

表 1-1 **古代利率一览** 单位:%

时间	苏美尔和巴比伦王朝		希腊				埃及	罗马/拜占庭		罗马亚洲		巴比伦王朝
	正常	法定	正常	房地产	城邦贷款	信托	正常	正常	法定	正常	信托	正常
公元前 3000 年 ~ 公元前 1900 年	20 ~ 25	—	—	—	—	—	—	—	—	—	—	—
公元前 1900 ~ 公元前 700 年	10 ~ 25	20	—	—	—	—	—	—	—	—	—	—
7 世纪	10 ~ 20	20	—	—	—	—	—	—	—	—	—	—
6 世纪	10 ~ 20	20	16 ~ 18	—	—	—	—	—	—	—	—	—
5 世纪	40	—	10 ~ 12	8 ~ 12	—	—	—	8. 333	8. 333	—	—	—
4 世纪	40	—	10 ~ 12	8 ~ 12	8. 5 ~ 12	—	—	8. 333	4. 167 ~ 8. 333	—	—	—
3 世纪	—	—	6 ~ 12	7 ~ 10	8. 5 ~ 12	6 ~ 10	24	8. 333	8. 333	—	—	—
2 世纪	—	—	6 ~ 9	6. 667 ~ 10	7 ~ 10	6. 667 ~ 10	5 ~ 10	6 ~ 8. 333	8. 333	8 ~ 12	—	—
1 世纪	—	—	6 ~ 12	—	8 ~ 12	10	12	4 ~ 12	8. 333 ~ 12	8 ~ 12	—	—
公元后	—	—	—	—	—	—	—	—	—	—	—	—
1 世纪	—	—	8 ~ 9	—	—	—	12	4 ~ 12	12	低于 12	—	—
2 世纪	—	—	—	—	—	—	12	6 ~ 12	12	低于 12	6 ~ 9	5 ~ 12
3 世纪	—	—	—	—	—	—	—	12	12	—	—	—
4 世纪	—	—	—	—	—	—	—	12. 5	12 ~ 12. 5	—	—	—
5 世纪	—	—	—	—	—	—	—	—	12. 5	—	—	—
6 世纪	—	—	—	—	—	—	—	—	6 ~ 8	—	—	—
7 世纪	—	—	—	—	—	—	—	—	6 ~ 8	—	—	—
8 世纪	—	—	—	—	—	—	—	—	—	—	—	—
9 世纪	—	—	—	—	—	—	—	—	8. 333 ~ 11. 125	—	—	—
10 世纪	—	—	—	—	—	—	—	—	8. 333 ~ 11. 125	—	—	—

表 1－2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利率回顾　　　　单位：%

时间		商业贷款——短期						
		西属荷兰	荷兰共和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12世纪	上半叶	—	—	—	—	—	—	—
	下半叶	10～16	—	20	—	—	—	—
13世纪	上半叶	10～16	—	20～25	—	—	—	—
	下半叶	10～16	—	8～15	—	—	—	15～20
14世纪	上半叶	10～25	—	7～15	—	—	—	15～20
	下半叶	10～25	—	5～15	—	—	—	15～20
15世纪	上半叶	8～17	—	5～15	—	—	—	—
	下半叶	8～17	—	5～15	—	—	—	
16世纪	上半叶	4～13	—	4～13	5～12	—	—	—
	下半叶	7～12	—	7～12	8～12	—	—	
17世纪	上半叶	—	6～12	—	—	—	—	6～10
	下半叶	—	1.75～4.5	—	—	—	—	3～6

时间		存款——短期						
		西属荷兰	荷兰共和国	意大利	英国	德意志		西班牙
12世纪	上半叶	—	—	—	—	—	—	—
	下半叶	—	—	—	—	—	—	
13世纪	上半叶	—	—	10～20	—	—	—	—
	下半叶	—	—	10～20	—	—	—	
14世纪	上半叶	—	—	5～12	—	—	—	—
	下半叶	10	—	5～12	—	—	—	
15世纪	上半叶	5	—	5～10	10	5	—	—
	下半叶	5	—	5～10	10	5	—	
16世纪	上半叶	4～6.25	—	4～6	—	4.5～5	—	4～5
	下半叶	6.25	—	5～6	—	5～7	—	5
17世纪	上半叶	—	6.167～8.333	—	6	—	—	—
	下半叶	—	3～4	—	4～6	—	—	

时间		岁金型年金、抵押贷款、其他长期债务						
		西属荷兰	荷兰共和国	意大利	法国	德意志	英国	西班牙
12世纪	上半叶	—	—	—	—	—	—	—
	下半叶	8～10	—	—	—	—	—	

续表

时间		岁金型年金、抵押贷款、其他长期债务						
		西属荷兰	荷兰共和国	意大利	法国	德意志	英国	西班牙
13世纪	上半叶	8~10	—	—	—	—	—	—
	下半叶	8~10	—	6.625~8.375	14	—	—	
14世纪	上半叶	8~10	—	4.875~8.375	—	—	—	—
	下半叶	8~10	—	5.25~10	—	—	—	
15世纪	上半叶	8~12	—	6~10	10	—	—	4~10
	下半叶	8~12	—	5~10	10	5	—	4~10
16世纪	上半叶	4~10	8.333	4~10	8.333	4~10	10~14	—
	下半叶	4~10	6.167~8.333	4~10	8.333	4~12	10~14	
17世纪	上半叶	—	5~8.333	—	8.333	—	8~10	—
	下半叶	—	3~12.5	—	5~8.333	—	8~10	

表1-3　中世纪和现代时期西欧和美洲长期利率回顾　单位:%

时间		每半世纪最佳信贷的最低利率										
		英国	法国	荷兰	西属荷兰与比利时	德国	瑞典	西班牙	瑞士	意大利	加拿大	美国
13世纪	上半叶	—	—	—	8	—	—	—	—	—	—	—
	下半叶	—	14	—	8	—	—	—	—	6.625	—	
14世纪	上半叶	—	—	—	8	—	—	—	—	4.875	—	—
	下半叶	—	—	—	8	—	—	—	—	5.25	—	
15世纪	上半叶	—	10	—	8	—	—	4	—	6	—	—
	下半叶	—	10	—	8	—	—	4	—	5	—	
16世纪	上半叶	10	8.33	8.33	4	—	—	—	—	4	—	—
	下半叶	10	8.33	6.17	4	—	—	—	—	4	—	
17世纪	上半叶	8	8.33	5	—	—	—	—	—	—	—	—
	下半叶	4	5	3	—	—	—	—	—	—	—	
18世纪	上半叶	3.05	5	3	—	4	—	—	5	4	—	—
	下半叶	3.13	5	2.5	—	4	—	—	4	4	—	
19世纪	上半叶	3.26	4.06	4.53	4.43	3.84	—	—	—	—	—	4.55
	下半叶	2.47	3.03	2.93	2.71	3.53	3.68	—	—	—	—	3.23
20世纪	上半叶	2.79	3.06	3.20	2.94	3.64	3.04	—	3.31	—	2.93	2.31
	下半叶	4.31	5.39	3.52	4.41	6.01	3.65	—	2.96	—	3.67	2.99

续表

时间		每10年平均最低利率								
		英国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德国	瑞典	瑞士	加拿大	美国
18世纪	1700s	7	—	—	—	—	—	—	—	—
	1710s	6	—	—	—	—	—	—	—	—
	1720s	3. 4	—	—	—	—	—	—	—	—
	1730s	3. 05	—	—	—	—	—	—	—	—
	1740s	3. 22	—	—	—	—	—	—	—	—
	1750s	3. 13	—	—	—	—	—	—	—	—
	1760s	3. 59	—	—	—	—	—	—	—	—
	1770s	3. 75	—	—	—	—	—	—	—	—
	1780s	4. 64	—	—	—	—	—	—	—	—
	1790s	4. 54	14	6. 42	—	—	—	—	—	
19世纪	1800s	4. 80	8. 66	—	—	—	—	—	—	6. 23
	1810s	4. 57	7. 29	5. 95	—	5. 45	—	—	—	6. 39
	1820s	3. 72	4. 21	4. 79	—	4. 91	—	—	—	4. 55
	1830s	3. 40	4. 06	5. 11	5. 05	4. 05	—	—	—	4. 95
	1840s	3. 26	4. 14	4. 53	4. 43	3. 84	—	—	—	5. 41
	1850s	3. 16	4. 45	4. 02	4. 25	4. 08	4. 64	—	—	4. 33
	1860s	3. 27	4. 37	4. 21	3. 62	4. 03	5. 41	—	—	5. 34
	1870s	3. 19	4. 71	4. 17	3. 72	4. 29	4. 91	—	—	4. 98
	1880s	2. 97	3. 68	3. 55	3. 38	3. 82	3. 73	—	—	3. 60
	1890s	2. 47	3. 03	2. 93	2. 71	3. 53	3. 68	—	—	3. 23
20世纪	1900s	2. 97	3. 06	3. 20	2. 94	3. 64	3. 74	3. 86	3. 80	3. 17
	1910s	3. 81	4. 06	4. 00	—	4. 72	5. 10	4. 52	4. 76	3. 93
	1920s	4. 63	5. 22	4. 50	5. 25	7. 25	4. 72	5. 20	5. 07	4. 26
	1930s	3. 54	3. 98	3. 50	4. 04	6. 26	3. 48	3. 94	3. 88	3. 34
	1940s	3. 06	3. 60	3. 24	4. 27	4. 70	3. 04	3. 31	2. 93	2. 31
	1950s	4. 31	5. 68	3. 52	4. 41	6. 01	3. 65	2. 96	3. 67	2. 99
	1960s	6. 54	5. 39	5. 30	6. 12	6. 59	5. 16	3. 84	5. 68	4. 51
	1970s	11. 77	8. 68	8. 24	8. 27	7. 96	8. 55	5. 11	8. 49	6. 87
	1980s	10. 42	11. 74	8. 24	10. 60	7. 63	12. 02	4. 69	11. 74	10. 38
	1990s	—	—	—	—	—	—	—	—	

第3节　认识印度被殖民后的掠夺和灾难①

研究西方殖民崛起的历史，印度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是不多的，印度古代文明的重心是孟加拉地区。这里的印度是广义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才是以前印度的概念，也是英属印度的范围。印度孟加拉地区在人类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基本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而现在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研究印度的关键意义就是印度被殖民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殖民印度的不是大约近百年之后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工业化西方殖民势力；印度地方武装的火器也不比西方落后多少。这是与中国被西方财富流动性以及技术优势打开大门完全不同的形态。1757 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建立对孟加拉的统治，彼时距离蒸汽机、纺纱机的发明还有 10 多年，距离蒸汽机的大规模使用还有 50 年，印度还是有技术优势的一方，西方所谓的科学进步、工业文明让西方称雄世界的论调在此不攻自破。但为什么先进的印度会被落后的西方殖民，为什么会这样？

早在中国春秋晚期，从本身就在孟加拉北部的摩揭陀统一今天达卡一带的央伽时开始，孟加拉地区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孔雀帝国最后统一的地区就是西孟加拉的羯陵伽。此后一直到英国人占领孟加拉为止，孟加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洲际集散地和绵纺织业的中心，始终保持着世界上最富裕地区的地位。作为连接罗马与孟加拉的海上通道，南印度到锡兰一带也是富裕的。中国人醉心于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富裕情况是了解不多的。实际上对比一下泰姬陵和中国同时期的建筑，我们就知道当年印度的繁华。泰姬陵是用纯白大理石砌建而成的主体建筑，陵墓上下左右工整对称，中央圆顶高 62 米，四周有四座高约 41 米的尖塔，塔与塔之间耸立着镶满 35 种不同类型

① 本节数据与论述主要引自麦迪逊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的半宝石的墓碑。泰姬陵于1631年（另说1632年）开始动工，历时22年（另说18年），每天动用2万役工。人们将它誉为印度的骄傲，称它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印度文明同样是富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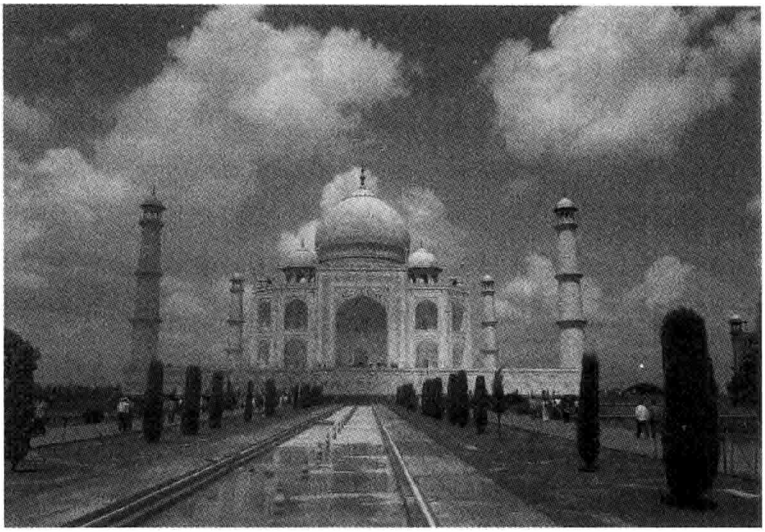


图1-5　泰姬陵

古代中国与印度除了丰富的文化交流和佛教的宗教影响外，双方的贸易往来也是频繁的，中国西向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不是欧洲的罗马，而是近东的孟加拉。中国的产品经马六甲抵达孟加拉后，大宗销往印度市场，小宗产品与孟加拉的出口品再打包后，沿海岸抵达南印度喀拉拉一带（当时是车腊王国），等候一年一度的季风，再运往罗马，抵达东非的阿杜利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都曾派兵远征该地，确保罗马商船待遇），再经罗马的附属国埃塞俄比亚的梅雷王国，经尼罗河运抵埃及。印度的富裕与中国的富裕不同，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富裕，而印度是工商业的富裕。

宋代，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朝代。但是在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其人均GDP的评价仍然低于印度。考虑到信用体系、价格体系的不同，是否富裕按假定的平价购买力的GDP计算是合理的。以此为标准，孟加拉人均富裕程度是超出宋朝的。南宋与北方的金、蒙古等国比较相对富裕，放到亚洲整体板块来讲是否富裕就两说了。当时印度最主要的政治力量是孟加

拉为主体的波罗王朝，而北部则是臣属于波罗王朝的拉其普特人王国，旁遮普以北就是阿拉伯人和阿富汗的穆斯林。麦迪逊之所以认为被殖民前的印度的富裕程度超过中国，原因就在于孟加拉的富裕，其富裕程度至少不亚于宋朝的苏杭，人口规模是苏杭的几倍之多。当时的孟加拉的概念也比现在的大几倍。不过这样的体量与中华文明的地域范围是无法比的。印度的政权不统一、佛教等宗教的平和内敛思维、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商业立国精神是西方能够对其迅速展开殖民攻击的关键。而对于孟加拉的富裕，我们也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国家的体量是有限的，富裕体现在人均层面，中国则是一个饥饿的帝国，粮食很不足，西方对于中国当年的富裕是言过其实的。中国社会总体物质财富的体量历经千年积累，绝对规模是很可观的，不过这样的地区相对于当年的欧洲足够了。

从麦迪逊的专著中，我们可以抛开古代中国繁荣昌盛冠绝全球的神话，了解国外学者的一般感性认识。宋朝时代的印度至少不亚于中国，而孟加拉的平均富裕水平超出宋朝。我们注意到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孟加拉的工商业税收总是超出农业土地税收。以此标准来看，古代孟加拉就是工业化国家、工业社会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唐朝的工商业收入也是极高的，宋朝的工商业收入在宋儒理学以农为本的主导意识形态之下也是不低的，西方所谓的工业革命开创工业社会是有注水嫌疑的。但孟加拉等地区信用崩溃、工业塌陷以后，西方则成了世界唯一的工业地区。

在美洲发现的初期，大量的白银也是涌入印度的，西方人号称印度因此而富裕，但这对于印度而言，仅仅是一种货币流动性的输入，与多发行了一些货币哪怕是纸币的效果没有什么两样，大量的实物财富是被这些白银高价换取的，在这里白银变成了实物，这样的流动性输入使印度付出了高昂的对价，欧洲把其抢掠挖掘的白银拿到这里换成了更有价值的实物，利益得到了迅速的放大。如果欧洲在美洲得到的白银过多的直接投放到欧洲市场，给欧洲带来的就是通胀，但在印度换取了实物以后就给欧洲带来真正的新增财富，而留给印度的则是财富的外流和通胀，印度所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以国家特许方式组成的垄断贸易集团。

开放的印度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场所，凭借海盗带来的军事优势和所谓的

金银收买，西方殖民性质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纷纷设立。荷兰取得独立后经济发展迅速，利用西班牙衰落和英国忙于内战之机垄断了世界贸易。1602 年荷兰建立了具有国家职能、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贸易的商业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02 年 3 月 20 日，1799 年解散，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公司，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行使殖民与统治的权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 200 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 1772 艘船，约有 100 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 4789 航次的船班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 25000 名员工，12000 名船员。到 166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拥有 150 条商船，40 条战舰，50000 名员工和 10000 人的私人武装，公司投资的收益率为 40%。在殖民印度的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东方的主宰者。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的同时，英国、丹麦等国也设立了类似的公司，1600 年 12 月 31 日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随时间的变迁，英国海军战胜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逐步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并且在不断掠夺当中让富饶的印度大步走向贫穷和衰弱。西方东印度公司能够在东方成功，与当时西方的海权优势和西方富集的资本优势是分不开的，这些公司背后都有印度原统治者内部买办势力的支持，殖民者不断在被殖民地区建立据点和武装，与海盗合作控制海权，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与当年倭寇侵华的模式是一样的。当年中国的澳门也是这样的情况，殖民者合法占有澳门是甲午战争之后租用 99 年，之前澳门的情况可以让我们知道当初的殖民据点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令国家财富不断外流的毒瘤，使得国家一步步地沦为殖民地。

最先到印度开拓的是葡荷殖民势力，随着英国的崛起而衰落，真正把印度变成殖民地的是英国。1588 年英国海军历史性地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随后英国陷入内战。英国内战结束后，恢复扩张路线，大力发展海军。1651 年立法禁止荷兰参与英国海上贸易，17 世纪 50 ~ 70 年代，两国进行了三次贸易战争，英国最终获胜，夺取了海上霸主地位，建立了“海权——贸易——殖民地”的海洋帝国模式。在这个背景下，东方的局面因海洋霸主的变更而改变，印度

早期的葡荷殖民势力消退，代以英法两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竞争。早在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加尔各答设立了威廉堡据点。这一据点在1717年获得了大莫卧尔授予的在孟加拉进行贸易的特权。由于第三次英荷战争是英法联军合作打败荷兰的，英法对于印度原荷兰势力范围的争夺是从友好竞争开始的。在18世纪中期，英法几乎在同时进入印度，各自都有东印度公司，在沿海设立据点控制当地贸易。两家东印度公司都有当地印度王公作为后台，公司的少量雇佣军则为他们的盟友担任打手。由于印度地方势力的权位争夺不休，两家公司为支持各自盟友也常有冲突，但这些欧洲殖民者在攫取利益的大方向上是团结的，共同促使印度原有政权衰落。

英法在印度的直接冲突是从奥地利王位继位战争开始的，1744年英法在欧洲已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开打，印度大地随之发生了英法东印度公司主导的战争，这场战争诞生了传奇人物克莱武。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年）又译为罗伯特·克莱夫或罗伯特·克莱芙，克莱武被认为是英帝国最伟大的缔造者之一，可以说是集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以如此少的兵力征服如此广大的土地，获取如此多的财富。克莱武指挥了著名的1757年“普拉西战役”，打败了土著政权，建立了英国对孟加拉的统治。普拉西战役是一场史诗般的传奇，印度原政权在孟加拉的纳瓦布（相当于总督）兵力有7万人，而克莱武只有900人，加上接受其训练的印度土兵，也不到3000人，且克莱武部队远离本土，后勤物资供应困难，更令人不安的是纳瓦布一方还有法国人撑腰。但克莱武果断开战，经过激战，化险为夷，以少胜多，一举占领了孟加拉。这样的战役不仅仅是英法之间的战争，也是殖民者彻底征服印度的战争，从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印度在西方不断殖民的过程当中已经衰弱不堪。这场战争是一个质变的转折点，让整个印度从半殖民地变成彻底的殖民地！

征服拥有如此广袤土地和众多人口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殖民者的代价小得可怜。普拉西会战中共有22名英国人、16名印度雇佣土兵阵亡。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当要注意的是被征服者的死亡数量和比例也小得惊人，孟加拉军队损失大约5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这个人数只不过是本方参战人数的2%，剩余的几乎全部被俘或溃逃，只有2%的伤亡就溃败。这不仅是英国人善

战，更关键的是印度人已经没有了足够的战斗意志，已经没有了浴血奋战的勇气。克莱武的远征军拥有大约900名欧洲人和2200名印度人，这当中核心是英国本土带来的皇家第39掷弹兵连和第12炮兵连。克莱武的对手西拉杰纳瓦布在普拉西拥有大约35000名步兵和15000名骑兵。远征军的火炮只有8门6磅炮和从海军借来的2门榴弹炮，而孟加拉军有50多门24磅和36磅炮，还有大量的火绳枪和火箭，火力占优却溃败如此，这说明印度人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斗的勇气和欲望。而中国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僧格林沁还可以战斗到最后的七人七骑。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虽然清军武器低劣，但投降的就更少，前线最高将领中战死和殉国的居多：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战死，定海总兵葛云飞战死，处州总兵郑国鸿战死，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增援战死定海，镇江京口副都统海龄打到最后一人，自杀殉国，还有定海知县姚怀详、三江口副将陈连升，连钦差大臣裕谦也战败自杀殉国（提督是从一品，总兵二品，副将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少将到上将的军衔）。清军的表现虽然不让国人满意，但比起印度来强多了。后来的革命党人延续贬低前朝的传统，但世界是有公正评价的，如果不算武器问题，那时候的清军放到全球都是战斗意志可怕的军队。印度人没有抵抗的勇气和决心的背后，就是经过长期殖民发展以后，原来的政权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已经被殖民者侵蚀殆尽，亡国就是必然的了。普拉西战争之后，克莱武指挥军队彻底摧毁了法国在孟加拉的影响，帮助米尔·贾法扫平了异己，登上纳瓦布之位，在英国控制孟加拉以后对法国不断地打击下，法国势力不得不退出印度。其后不甘心做傀儡的米尔·贾法联合了大莫卧儿同东印度公司开战，但是这时孟加拉已无像样的军队了。结果联军在布尔克萨（Buxar）大败，从而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印度的被殖民是在蒸汽机、珍妮纺纱机发明之前，也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殖民财富日后更是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这些当然是以孟加拉人民的深重灾难为代价的。

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最大灾难就是毁灭了印度的传统手工业。在18世纪中叶前，手工棉纺织业是印度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而到了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发生前，曾经辉煌于世界上千年的印度手工业一蹶不振。孟加拉占有世界棉纺织品一半以上市场的千年好光景，一去不复返了。80年后，孟加拉本土的纺织品也要从英国进口了。为什么孟加拉会衰落的这样快呢？要知道孟

加拉的布匹一直到公元1800年仍然是欧洲的消费标准。人们对欧洲产的布的最高评价是："看上去质量几乎和孟加拉布一样高!" 到公元1860年孟加拉纺织市场上，英国产的布，只占当地市场的10%！孟加拉是人类千年的纺织中心，从来都没有关税，从来只有别人对它征进口关税！孟加拉在19世纪后，先是失去了它的传统欧洲市场，然后是中西亚市场，英国的殖民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使千百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大批人因饥饿而亡。就是这样，一个千年富裕的孟加拉地区，在英国接管孟加拉政权后，却迅速地衰落了。仅仅是在普拉西战役后十几年，孟加拉饿死2000多万人。在西欧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印度几乎立刻就成了一个被西方人鄙视的"落后国家"。但其本国市场和千年积累的财富，是不会瞬间蒸发的，英国虽然横征暴敛，但从数字上来说总额也是不大的，真正让一个国家崩溃的，是金融问题。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印度为的是英镑计价的利润，而不是印度人民的解放。

克莱武在孟加拉的征服给英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后来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年收入达10万英镑，数量并不太多。在战争失败后，孟加拉被迫与英方达成城下之盟，1765年8月12日5位孟加拉地万（Dewan）在克莱武的营帐中承认了印度历史上著名的"双重管理制度"，即既保留了地方统治者们原有的行政机构，又让东印度公司拥有税收和审判民事案件的权力，这为英国带来了每年400万银元的收入。这些钱看似不多，但相比之下，同期清朝的税收是5000万～8000万两白银，而清政府的征税率只在GDP的5%以内。因此真正造成灾难的不是殖民者账面上刮走的那点钱，而是货币流通量所带来的金融灾难。在古代社会，商品化的程度不高，同时由于使用贵金属和贵金属货币数量有限，总的社会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非常少的。英国同时期，牛顿主持全国的货币重铸，在极大幅度提高铸造速度的情况下，每周也只有1万英镑的货币铸造量。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核心价值是收到卢比计价的税。英国在印度收到的税收是卢比。"卢比"一词意即"银币"。英国是以印度的白银为征税标的的！如果英国的400万银元均以白银收取，然后这些白银并不回到原来的社会中流通，那么对于原社会的货币流动性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如果我们再看此时的背景，英国则是在这个相关的时候建立了金本位的制度。在1717年9月的货币报告中，牛顿

建议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黄金的价格固定下来，金本位从此诞生。[①] 印度的银币被英国大量征收，英国却不铸造银币了，卢比的数量越来越少，发生严重的通缩是必然的，同时英国实行金本位了，可以在国际上抛售白银打压银价，而且美国及欧洲殖民者发现不少银，银与金的相对价值也随之大幅度下跌，被殖民下的印度因此不能以标准货币从外界采购商品，这事件被历史学者称之为“卢比的衰落”。卢比内升外贬导致孟加拉的财富通过“正常”贸易大量外流。英国在印度的所得，都被换成了输往英国的实物，大量的财富是可以被廉价买走的。

除了西方在与印度贸易时把欧洲人的劳动力价格定得极高，以高价换取印度人更多的劳动以外，印度也面临极低收入劳动者的竞争，让本地产业和人民收入陷入崩溃，即印度经济也面临美洲的竞争。虽然西方有了纺织机，一台机器可以完成过去20个人的工作量，但布匹贸易还有价值链的关键层面，就是要有生产布匹的原料，否则技术带来的产能过剩就要让原材料的价格变成当今中国的铁矿石伤疤了。印度关键的竞争对象是美洲黑奴，印度的产品价格要与美洲的廉价棉花竞争，背后就是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与黑奴的成本进行竞争。黑奴的劳动力成本仅仅是养活他的口粮而已，如此条件的竞争下，印度的相关劳动者的收入就要向美洲黑奴靠拢，结果就是印度劳动者陷入类似奴隶一样的赤贫。虽然购买黑奴需要成本，但同样的土地也需要成本，美洲的土地是屠杀印第安人得来的无本土地，印度的土地成本也是与之无法比拟的，这里打败印度的不是西方的高技术而是西方人在其他殖民地搞的奴隶制和屠杀抢掠！对于这样的不正当竞争，本来是需要运用国家的关税权来保护本国产业的，但殖民地的地位使其不可能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外来织物可以倾销到印度市场的重要原因，如果它是一个能够设立关税进行海禁的国家，也不至于衰落到如此。

对于殖民地最后的财富掠夺，金融掠夺最关键，这个金融掠夺就是体现在流动性的不同上，以卢比征税却不再铸造银币投放市场，造成市场流动性的恶化。英国自己的金本位提供黄金额外的溢价和丰富的流动性，国际上抛售白银导致流动性的差异更大，所有的举动就是造成被殖民地区的流动性紧缺，不得

①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

不低价出售财富。对于孟加拉这样的历史上的工商业地区，其大量的人口不是农业人口，粮食是需要外购的，如果货币的国际购买力暴跌，需要外购的粮食不能有足够的硬通货支付，就是要饿死人的。在饿死的威胁之下，以前积累的财富都会被拿出来贱卖。我们看到历史记录的孟加拉一下子饿死2000万人口，这样严重的饥荒必然是遍地饿殍，全社会的粮食价格一定是天价，所有的财富就可以被一点点粮食廉价换走。英国的殖民统治还造成了印度的饥荒。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赚钱而横征暴敛，在其统治印度东部之后不久就将田赋提高了近一倍，造成了连年的饥荒，仅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了1000万人，约占孟加拉人口的1/3！“在1769～1770年间，英国人囤积全部大米，用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达卡城的人口由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一位东印度总督曾经这样说。这种饥荒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一种以掠夺为目的的人道灾难，与西方渲染的二战后东方革命时因为被封锁后的粮食不足而大量饿死人完全不是同样的概念。经过这样的一次饥荒，就是在先前的金融攻击下再发展到粮食的攻击，在饥饿之下，全社会的财富都会交出去，再富裕的地方没有足够的粮食自给，没有制海权、金融权以后，再多的财富也要在饥饿的胁迫下全部交给他人。印度比中国先衰落，其中就有粮食攻击的作用。在中国以农为本的社会，粮食攻击是难以发生的，因此中国的文明在优势流动性金融攻击下没有发展成为粮食攻击，没有如印度那样衰落成为完全的殖民地，这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也是有关联的。

克莱武本人通过巧取豪夺获得的财富高达1.6万英镑，不过他走前留了7万英镑给军队。克莱武在英国议会上炫耀：“在我的脚下有富裕的城市，在我们手中有雄强的国家，在我一个人的面前打开了充满了金条银锭、珍珠宝石的宝库。我统共取了20万英镑。诸位先生，直到现在，我还奇怪自己为什么那么客气呢?”如果按照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年收入10万英镑的角度来说，20多万英镑当然是天文数字，但从整个孟加拉财富被掠夺的数量来说，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时期的中国大贪官和绅，他的资产数量是10亿两白银，按照市价是几亿英镑的概念。由克莱武的这个表态，我们就可以知道，英国人殖民孟加拉所得到的财富远远不止典籍当中东印度公司的年收入10万英镑，这是一

个金融攻击下海量财富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孟加拉积累的千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认识到印度被收走贵金属以后的衰落，你就可以理解英国的重商主义为什么那么重视贵金属的流入流出，对于当年的经济学，是不能按照现在信用货币的思维来理解的。

综上所述，印度文明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文明，不过这个文明一旦变成了英国殖民者的殖民地，印度就落入了苦难的深渊。在被海盗等类似蒙古的蛮族殖民以后，贸易和金融的权力也被控制了，国家的凝聚力没有了，国家的统治权流失了。殖民者建立统治以后就是进一步的金融掠夺，国家的历史财富也没有了，遍地饿殍。这个过程是发生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的，是以一个拥有丰富流动性的金融殖民攻击为主导的，是西方在古希腊殖民和维京人殖民基础上的一个升级版，印度的被殖民与西方工业革命后打开中国大门不同，完全是一个蛮族入侵式的行为，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千年历史积累的财富是可以被殖民手段迅速毁掉的，因此我们对于殖民者的买办们绝对不能手软，他们是出卖我们子孙未来的人。

第 4 节　殖民定价权带来的全球变革

殖民给西方带来巨大财富，也给东方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改变了全球财富分配。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也在殖民所带来的财富集中上实现，所有这些变化的最大原因都是由殖民导致的定价权改变而来，殖民带动了全球变革。

很多人说西方崛起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但科技进步却是发生在西方开始建立世界殖民体系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工业革命的发生，则是西方通过殖民掠夺全球财富成功以后的事情了。仔细看工业革命标志性的一系列事件：1764 ~ 1967 年珍妮纺纱机提高纺纱效率，1769 年发明水力纺纱机，1779 年发明骡机；1769 年发明单向蒸汽机，1782 年发明双向蒸汽机。所有这些技术的发明都是在西方殖民之前的，此时英国早已让印度沦为了殖民地。西方能够殖民世界，并

不是因为有了科技。与此相反，科技是因殖民以后取得巨大财富而发展起来的。《剑桥战争史》就有说到，明朝“山寨”的西洋红衣大炮比起原版的红衣大炮还厉害，就是因为明代中国的冶金技术高出欧洲太多。西方所谓的技术领先，需要大量的资金流动性支持，而这些资金财富大多来自于殖民掠夺。

很多崇洋者还说西方的殖民带来了现代文明，否则殖民地还是封建社会，尤其现在，曾经的被殖民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是富裕地区，而日本也是在殖民后明治维新走向了光明。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除了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小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日本等因成为西方代理人而富裕以外，其他富裕的被殖民地区基本上都对殖民地的原住民进行了种族灭绝，过上好日子的是殖民者自己。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毛利人等都基本被杀绝，人口不到原来的1%，你是否愿意冒着99%被杀灭的风险享受现代的西方生活？新加坡的富裕是因其作为代理人盘剥了东南亚，同时其为地理要冲有地缘利益输入；香港的富裕是因为代理人盘剥了内地和内地的地缘利益输入；日本则是西方扶持的，为了限制东方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中国和俄国。真正殖民地的翻版我们要看今日之非洲和印度，看非洲的饥饿和印度从世界文明核心之一的地位上衰落。这些都表明殖民不是带来文明而是摧毁文明。

还有崇洋者说文明是有扩散和淘汰效应的，是西方的先进文明淘汰了东方当时的落后文明，但当时东方就真的落后吗？西方人是有意把自己的文明在时间上提前了。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中学会了怎样去殖民，学会了怎样去掠夺。我们从印度的被殖民可以看出，当时印度是文明领先的地区，而西方则还没有开始工业革命，也没有思想的启蒙运动，有的就是东西方的价格差距。在康熙时期中国与西方以白银计价的劳动力收入就有几十倍的差距，西方靠历史的机缘取得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流动性，也取得了殖民的智慧，干的是他们祖先维京海盗行径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先进文明”吗？殖民带来的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财富的分配，西方创造财富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是通过殖民分享了巨大的财富以后取得的社会发展，这样重要的顺序怎么能够颠倒？

打破西方中世纪愚昧的首先是宗教改革，是基督教新教派的诞生，但新教徒一样是野蛮和愚昧的，一样会残酷屠杀所谓的“女巫”。宗教改革以后，据统计，有45000名女巫被绞死、烧死。光是在德国，1625～1630年短短数年中，

就有5000人因被控为“女巫”而被烧死。在布莱恩·佩弗亚克所著的《西方世界女巫迫害史》一书中记录了大量的案例，这样侵害人权的事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美国的萨勒姆女巫案特别有名，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此而闻名世界。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双儿女，声称看到了异象。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却大肆株连，通过有指引的逼供，让“女巫”将邻里中想要罗织的女人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和西方人，也给整个人类历史带来耻辱。西方当时就是野蛮社会，是野蛮社会对于东方文明的摧残。当时的东方文明是相对尊重人权和宽容的社会，而西方能够走向文明，谁能够否认不是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后学习文明的影响呢？就如蒙古和满清征服中原以后，吸收学习先进文明一样。

西方人开始走向文明，是在他们殖民之后的事情，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的事情，这个向文明的转化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带来的。启蒙运动（法文：Siècle des Lumières，英文：the Enlightenment，德文：die Aufklärung），通常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同一时期。启蒙运动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的，财富是基础。东方的财富以及东方的智慧，客观上为西方思想的领先奠定了基础。

西方殖民带来的价值观就是：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民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其文化有何异同，无论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但真的就是一切为了个人吗？你对你的家人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个人主义来自于维京人的野蛮背景，维京人是没有老人的社会，维京人认为男人均应当战死而不是老死，是不讲孝道的。这种观念的背后就是把社会当中的依靠人情、亲情维持的大整体变成一

个人与人之间依靠市场和价格决定的小空间，结果就是市场和定价的权力实现了最大化！家族宗法关系被打破是建立大市场和推行殖民权力所需要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分工合作，需要的是契约精神维护生人社会，而不是血缘人脉维持的熟人社会。但家族利益在西方富豪的眼中一直是最重要的，这与他们灌输给普通民众的观念完全不同，统治者们的家族纽带通过其家族的基金会紧密联系，而普通人则难以与之竞争。这样的家族统治从前台隐藏到后台，资本家族成为幕后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与原来的宗教势力和贵族家族们三种力量构成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

西方的殖民带来财富集中，带来了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现代社会，全球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变革。在西方人享受富裕的同时，东方社会却陷入了衰落。东方再次取得独立地位，是200年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独立浪潮，而经济的真正崛起则要等到将来了，只不过现在金砖国家经济在发展，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展开……

第5节　从殖民、集权到信息的社会发展

在殖民时代之前，西方世界是封建社会，而殖民时代之后则进入现代社会。对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而现在如果我们认识殖民时代，认识殖民美洲的大规模奴隶经济历史，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也需要以另外的角度来审视。

西方在古罗马时代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时代，奴隶经济创造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就如罗马的大斗兽场，其与现代的体育场规模是相当的，可以容纳数万人，而古罗马衰落后西方进入到了封建时代，殖民则是打破封建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钥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古罗马时代之前的希腊时代也是一个殖民的时代。对于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发展和剥削程度来解读的，笔者认识世界的角度则从国家的管理成本来开始，从特殊的管理成本来认识殖民的特点。不同的主体在进行价格竞争的时候，成本因素就是关键性的

因素之一，而人类的金融流动性的影响与成本相互作用，定价权带来的财富移动，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如果从管理成本来看，古代的科技落后，管理成本是极高的，在封建社会要层层分封，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分封来降低总体的管理成本。历史上的征服过程当中，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屠杀，背后就是通过屠杀给对方造成混乱，降低人口的集中度好进行控制，是以屠杀来完成征服的管理成本问题，但屠杀所带来的副作用和财富数量损失是巨大的。殖民相对于其他的征服手段，管理成本是最低的。从殖民的低成本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其中的统治智慧。而能够进行殖民，在我们前面的分析当中，流动性的充裕和优势就是重要的层面。

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把原来政府需要管理的事情交给市场，利用市场的运作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殖民也是非常好地利用了市场。殖民是以不公平的市场博弈取得利益，而武力的直接管理更近似于计划性的管理。殖民的背后是建立市场，制定市场规则，垄断市场和货币流动性，从而在市场当中攫取财富和统治权。这个市场的统治权就是以金融定价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定价权。而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货币，有足够用于市场交易的流动性。在古代，贵金属货币不断被埋入地下存储，人口随经济发展增长、人均贵金属拥有量不断下降的通缩年代，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重农抑商是必要的，否则就是内乱。

在殖民的初期，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个小的殖民地和宗主国单向控制的市场，殖民本质就是一个市场的统治方式，这个低成本的统治方式可以统治更大的地区。西方的殖民思维是根植于西方社会且不断发展的，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殖民，到罗马的帝国化，再到罗马的崩溃；随后就是维京人的殖民，在欧洲建立各个维京人的殖民点，维京人通过征服进入了欧洲的统治层，也皈依了欧洲的宗教基督教；同时阿拉伯人也在殖民，阿拉伯人主导世界的商业并且影响西班牙等国家；再之后就是蒙古的征服让阿拉伯衰落和流动性集中于西方。

但随着殖民地的增多，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统治权的巩固，产业革命的发展和深化，市场也在整合，资源需要全球化的配置，最关键的是央行制度的建立，央行的金融集权要求国家的政权权力集中。在这样背景下，松散的殖民地帝国如果不能整合成为一个集权的国家，那么就必然出现殖民者在殖民地有独立发

行货币需求的趋势，核心利益与宗主国冲突，殖民地就要由殖民者来闹独立了。注意，这里不是被殖民者取得独立，这样的独立是殖民者主导的，并不是殖民压迫的结束，独立的殖民地对其被殖民者都是采用双重标准的。美洲多国的独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以美国独立为例，欧洲殖民者独立建国，土著印第安人被杀光，种族隔离成为社会规则。在这独立浪潮的同时，宗主国则集权帝国化，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当初殖民的东印度公司纷纷被国有化了。这是一个国内市场贸易保护的时代，希望对方打开市场而自己进行关税保护的时代，强国追求的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而对内则是进入整合，集权还要通过央行的金融管理权力实现，国家的货币定价权、资产定价权被操控在中央机构的财政政策和央行的货币政策之下。

集权帝国的出现，与当时技术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管理成本，技术进步使得近现代的帝国体制得以建立。比如有了汽船可以使水上交通更快、更便宜，比如有了铁路交通使陆路的交通能力得到跨时代的增长，比如有了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可以实现远程、即时的通讯。交通、通讯的进步非常关键。电报是一种最早的、可靠的即时远距离通信方式，它是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的。1820年，丹麦的奥斯特（Hans Christian Ørsted）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大数学家高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现象实现了信息的短程传递。英国人库克（William Fothergill Cooke）在1837年获得了电报的发明专利，其产品在铁路系统投入使用。1844年摩尔斯电码的发明人摩尔斯（Samuel F. B. Morse）架设了美国的第一条电报线路。1858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开始运行。铁路发展方面，1814年发明了蒸汽机车，1825年有了第一条铁路，到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达到2235英里，覆盖全国。世界掀起了架设电报线和铺设铁路的浪潮。1875年电话的发明使得通讯更便捷了。这些技术的进展极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古代通讯、交通有时需要往来一年，现在时间被极大地缩短了。而通讯、交通的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交易可以更加集中，可以集中到金融中心，是金融统治的技术保障。这瞬间的通讯和交通以及集中交易就是宗主国整合殖民地形成集权大帝国的保障，此后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进入了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

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问题，应当说马克思是看得很透彻的，帝国整合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管理成本开始增加，成为国家管理的问题，首先出现问题的是传统的帝国，这些大帝国国内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与通过整合殖民地市场建立的帝国的管理成本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激烈的战争中和战争过后的恢复时代，传统帝国的管理成本劣势就更加明显，这样的竞争就使传统的大帝国开始解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了，奥匈帝国也解体了，俄罗斯革命了，而中华民国也是军阀林立，处于分崩离析的准解体状态。这些国家的解体带来国家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并且再一次引发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再一次变化，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变成了全球的自由市场，打破贸易壁垒。在西方世界，美国与英国争霸，美国替代英国崛起的关键就是让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从而肢解英国。独立的殖民地均加入美元的全球大市场，在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被美国的货币定价权和汇率定价权所左右。因而在美国的支持下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个独立过程有澳大利亚这样的原殖民者的独立，也有非洲各国和印度这样的被殖民者取得独立，之前的帝国内部市场变成了国际大市场，不同的背景使得他们在国际大市场上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殖民者自己创建并独立的国家，产权是殖民者自己的，这些国家变成了资源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是有足够的定价权的；而和平独立的被殖民国家，国家内大量的产权是属于原来的殖民者的，这样的国家没有国际定价权，发展下去反而沦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全球大市场的建立，使小国在国际市场配置资源变得更加容易。战败的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是想先占领各个资源国，把持其国内资源，为突破资源瓶颈而发动战争。而二战后资源国均取得独立，可以在国际市场通过交易获得资源，德国和日本的战后崛起就可以想象了。而大国则面临高国家管理成本，在世界大市场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因此苏联解体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相对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管理成本更高。与美国竞争国际市场时，美国还有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美国拥有更多的流动性和定价权。在苏联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通过打压世界油价和金价，控制世界粮食定价，促成苏联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苏联因此解体，这标志着第二轮大国的衰落和解体。这是一个从海洋霸权到金融霸权的时代，国际大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国际金融霸权，产生了国际金融定价权。在二战以前，国际货币交易是以黄金清算为主的，

谁也没有主导的权力，英国的金汇兑本位制影响也是有限的，难以影响西方列强，因此英国金融强权还不足以称霸世界。但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国际金本位能够影响几乎所有国际交易，美元有了超越其他货币的霸权，美国拥有了全球金融定价权。

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第三轮技术浪潮所带来的发展，信息革命出现了。由于有了复印机、计算机、数据库、网络、搜索引擎等革命性的信息技术，人类进入到了信息社会，这些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就是国家管理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管理成本的降低使得大国的规模效益得到显现，因此世界进入了大国崛起的时代，中国是管理成本降低的受益者，成本的降低使得中国的人口规模成为优势，可以进行全产业链的资源配置，提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流动性，带来了更多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信息系统的快速运转带来了更多的流动性。以往的货币流通速度囿于技术手段是受人工时间限制的，现在计算机都可以高频交易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只有在金融电子化、信息化以后才可以实现，这些衍生品带来了更多的流动性，在金融定价权层面起到了更加主导的作用。美国的金融霸权同样的也发展到了信息霸权，美国人主宰了互联网，主宰了网络上的主要企业，主宰了互联网的网络管理，新的一轮的霸权争夺活动又开始了。对于世界各国的争霸不是本书重点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拙作《霸权博弈》。

流动性的丰富让西方殖民兴起，集权帝国兴盛，并由此进入工业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类从集权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信息是未来人类发展的关键，信息社会的国家管理成本降低是中国等大国崛起的关键，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也给了世界重新争夺定价权、重新划分强弱的机会，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先机，但中国缩短了与世界的差距。这新一轮的国际竞争，是中华民族再一次崛起的希望所在。

第二章

流动性与定价权

定价权到底是什么决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却不主宰财富的分配。西方崛起的几百年间，西方的利率基本是5%以内，而中国则是百分之几十以上，流动性的差别才是关键。本章将介绍笔者的理论核心，笔者将通过供需曲线的后弯与畸形，发展传统经济理论，给您解答下面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流动性与定价权的关系是什么？西方经济理论在美元性质改变下有什么变化？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却可以收益率低于不会违约的美联储利率，这些现象的理论基础在哪里？这里将告诉您为什么有定价权存在，带您认识供需曲线后弯和畸形带来非市场出清的定价权……西方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情，在物质无法从明天穿越的情况下，背后是什么样的定价掠夺？

第1节 科技进步不是定价权的决定因素

很多人信仰科技，力图以科技报国来谋求国家的富强。对于国家的发展，科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层面，也成为很多人的信仰，但科技不是一切，科技的领先对于定价权而言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科技对产品的影响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提高产品的生产能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性能，降低单位性能下的成本；另外一个则是让产品出现新功能，这些新功能无法与原有功能进行替代和比较，如果能够比较就是第一种情况了。在产品出现新功能以后，这个产品与原来的产品实际上已经不是同样的产品了，用不同的产品来比较价格是不行的。产品的新功能实际上是科技的创新，创新带来的财富分配是与价格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创新的东西，到底价格如何，依然离不开定价体系给创新确定价格，创新的东西也不是能够随意定价的，例如中国特有的东西也会卖不上价。对于定价权而言，不是针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进步，而是针对科技导致的成本因素和对创新的价格确定，我们在分析科技对于定价权的贡献层面，必须把二者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打破对科技决定定价权的错误认知。在中国不发达的时候，外国人说我们只能做初级产品，他们的技术产品卖高价，但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他们最初级的铁矿石却卖了天价！还有，现在网络创新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热门，但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当中最赚钱最有影响力的，并不是技术最好的公司，而是应用最好的公司，是创造了商业模式、应用模式，控制了与人们生活习惯当中的流动性有关的东西，这流动性有狭义的货币流动性，也有广义的物流、信息流等，因而应用是比技术更重要的因素。

在科技之外，我们更不能忽视艺术的力量，艺术对于定价的影响也很大。就如我们看电视，更关注电视演什么内容而不是电视机的显示技术，而电视内容属于艺术范畴，在定价权领域，技术性的产品永远难于与艺术性的产品相比，就如我们有了机械，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但现在我们又崇尚纯手工的原

汁原味的产品了。就算同样性质的产品，在竞争的时候是科技含量高还是更富艺术性，本身就是互相制衡，而且除了极少数尖端产品和科技发烧友，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艺术性好的价格更高。对于艺术的认知，则关系到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审美等诸多的社会层面。艺术对商品带来的溢价远非科技所能够比拟的。

很多人把人类近代的文明发展归结为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是需要在一个信用体系下进行分工合作的。人类近代开始出现的科技飞跃也是一个信用体系下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系统性的应用，人们可以很好地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中国以往的技术发明很多，科技有很多领域领先世界，但是要让技术成系统地发展，拥有类似西方那样的信用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信用体系是一个定价体系，由这个定价体系来保障技术能够卖得一个好价钱，而不是好技术理所应当就是好价格。因此由信用体系维系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就显得很重要了。

对于西方的发达，我们更多地提到了科技的力量，但对于其中金融力量的发展却提及不多，其中一个关键是在西方崛起过程当中，金融资本的力量严重依赖获取黄金等贵金属。西方贵金属的取得可没有科技那样光鲜的外衣，这与西方取得黄金的历史有关，金融的发展与科技的作用二者是互相反馈的。没有充裕的资本支持，就没有对于科技的充分投入，科技的产出也不容易实现，而科技的发展在那个年代更多的是为了占有殖民地掠夺更多的黄金，这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充足的资金本身才是科技发展的前提，在资金紧张的时候，首先被砍掉的就是科技。

科技发展对于价格贡献很大，但科技发展以后矛盾也发生转化，科技产品对于资源有了更多的要求，科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背后是消耗资源或者依赖一些资源的稀缺性。就如我们的现代科技使得社会产生了对于石油的巨大需求一样，石油的稀缺反而更重要了。到底是科技重要还是资源重要？这就是定价体系的力量了。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不足，这个时候人们的生产力受到制约。但现在科技发达，到处是产能过剩，相对于过剩的产能，资源瓶颈就是关键的限制。你没有足够满足你产能的资源，主要矛盾便转化了。这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初级产品变成资源了。在生产的价值链上，资源的紧缺带来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在劳动价值论当中虽然不承认资源的价值，但必

要劳动时间在科技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后，劳动时间是缩短的，而且科技本身要替代劳动，劳动的复杂性也是降低的，那么科技是怎样带来价值的？

我们可以说纺织机的发明使得一个童工的工作可以顶上20个成年人，似乎科技发展了，但这时候对于成品而言，反而是分配在初级产品的价值变得更高了。就如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是一个羊吃人的运动，背后就是要羊毛！但你听说过畜牧业的土地收入高于农业的吗？科技让纺织成本下降，但羊毛贵到了天价，那么毛纺产品的价格还能够便宜吗？这里是一个价值链的问题，初级产品价格反而更高了。这样的情况下，技术带来的是使拥有初级产品的人群的利润增加！历史上圈地运动的现代版就是我们的铁矿石成了天价！一个产品有不同的生产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定价权，这些定价权的博弈和制衡形成价值链，而决定各个环节定价权的则是在不同环节的流动性的不同。

对于定价，科技固然有贡献，艺术也有贡献，同时，品牌也是价格贡献的重要因素，而品牌就涉及人们的喜好和信仰了。从极端来讲，很多宗教圣物价格是无限的，而通俗地讲，著名品牌与一般商品的价格也是存在极大不同的，所有这些导致的价格变化是可以完全脱离科技进步的，甚至很多奢侈品是反科技的，反而是手工的价值更高。

从一两个重大的发明，变成一场社会革命，背后是要有一整套体系的发展的，这个体系的发展才是更关键的问题。中国以前也不乏重大发明，但整个社会的进步却没有被带动，这就是信用体系的差别。科技是信用体系的一个层面，金融也是，而价格体系也是，定价权更多的是价格体系的事情，而价格受到艺术、品牌、金融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在整个信用体系中有机地联系到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科技对于定价权有影响，但我们需要找到比控制价格更直接的因素。在整个信用体系里面，定价的影响是可以脱离科技而发生的，因此科技进步不是定价权的决定因素。西方人把他们依靠定价权取得的财富全部归因为科技进步，背后掩盖了他们文化信仰侵略、征服殖民掠夺、金融货币霸权、劳动剥削等多个层面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们要认识定价权，首先就要拨开迷雾，看到更本质的东西，认清怎样能够操纵定价权。我们不去掠夺和剥削他人，但也不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说科技进步不是西方定价权的关键支持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历史数据。在

贵金属时代的自然汇率下，英国人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是中国的几十倍了，彼时距离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还有上百年。因此说西方人收入高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高，这完全是不成立的。西方人开始殖民时候甚至还没有厕所，并不是普通人家没有厕所，皇宫里面也没有，他们是彻底的野蛮人！相反，这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在西方是硬通货，中国制造瓷器的技术领先世界，同时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却远远低于西方，劳动力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人手里，与科技无关。我们还可以看到1861年6月30日，法兰西一代文豪雨果，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一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书中作者以痛心疾首的笔调，痛批巴黎的排水系统。然后他心怀仰慕地介绍同时代北京的下水道！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前，这就是中国财富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流失前西方人眼中中国真实的写照。我们前面提过印度，印度被殖民也发生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印度与西方的真正差距就在于贵金属的流动性层面。

科技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核心，是第一生产力，但不是第一定价力，定价的规则是人类的社会博弈规则，不是科技问题。科技创造新财富是不错的，但定价权是分配财富的，科技并不能主宰财富的分配权，它是生产力但不一定是分配力。古代技术领先的文明经常被野蛮人侵略，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古代罗马的奴隶经常是最先进技术的掌握者，古希腊则通过殖民统治地中海周边。对此，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认识得比东方人更清楚，这个认识也给了他们殖民东方的自信和理论。我们承认科技的重要性，但要反对把科技神化——并不是一切均由科技决定，定价权问题中，科技就不是决定因素。

第2节　定价世界的关键是流动性

流动性均衡问题与定价权

中国制造的商品绝大多数都没有定价权，没有定价权的苦日子中国经济是特别有体会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定价权呢？中国的定价权争夺屡战屡败的背后

一定是有规律性的因素的。原因在哪里？很多人说我们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但是铁矿石为什么价格就这样高呢？很多人又会说我们不掌握资源。但是中国的优势资源稀土一样是没有定价权，一样贱卖。还有人说我们自己没有制造核心技术，但是现在很多中国的轻工业产品，比如玩具等，质量和技术已经不逊于西方，但没有定价权，还是西方赚大钱。最后很多人把定价权的问题归结到中国的产业规模小和恶性竞争上面，这个结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不可能仅仅因为农民的惜售就推高农产品的价格，根本原因不在这些地方。中国定价权博弈的失利主要在于双方的流动性不均衡、不对等。

很多人不理解流动性对于定价权的影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很多商品的通胀并不是真实的紧缺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流动性的局部过剩，局部的预期造成投机泛滥引发大量的投机性和避险性的需求。这一点对于具有刚需性质的粮食是特别明显的，农民的惜售和市民的超量储备立即就可以把丰收年变成紧缺年。对于经济个体，没有比农民更小、更分散的了，但仅仅是农民的惜售就可以让农产品的价格暴涨，那么中国众多掌握稀土等稀缺资源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让价格涨上去呢？原因就是流动性不均衡，而农产品的价格被压低造成工农剪刀差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没有钱、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农民必须出售粮食换取其他工业品。局部性的流动性紧缺也是危害极大的，例如我们的稀土资源本来是世界上的稀缺资源，而且中国有绝对的能力控制资源数量，但是由于中国相关企业的资金紧缺，只能是低价出售变现，而不能长期存储，这就让我们本来紧缺的资源变得很廉价，珍贵的稀土卖了一个土价钱，而西方本来数量众多的铁矿石却可以通过其资金优势和富裕的流动性控制销售数量、操纵价格，让中国购买铁矿石的支出连年上涨。在这里西方学者强调所谓的定价机制，而这个定价机制是什么？就在于物流和资金流的渠道，只要你的流动性不均衡，需要通过它的渠道，无论是物流还是资金流，就要被他所渔利。所以在不均衡的流动性变化中寻找平衡的时候，渠道是关键，就如股市中占据渠道资源的股票在危机中都被市场看好一样。而我们再想一下，所谓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多是非必需品，刚需较小，而如果是成规模的企业流动性不足要抛售的话，谁能够接盘？价格损失肯定是更大的，此时要是流动性不足的话对于高附加值和集中

度高的产业，在定价权上的危害和损失是更大的。

现在外资不仅仅控制了海外资源和商品渠道，让中国产品、中国资源只能廉价出售并让中国只能高价购买海外资源，更逐步将手伸向国内关键物资的渠道，因此在中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渠道不畅通或者渠道被外资所控制的时候，流动性不均衡给外资热钱渔利的机会就特别多。为了控制各种泡沫，央行向社会收紧流动性，虽然能够给各种投机炒作以资金的压力，但是给很多正常生产的企业带来的压力也很巨大。投机资金炒作价格的利率承受能力一般是要大于实体生产的。在利率的诱惑下，资金的逐利流动导致投机的资金照样充足而实业的资金就发生紧缺了，结果就使大量的中国企业受到压力，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不得不忍受渠道的盘剥、廉价出售和压低库存，导致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的挥泪大甩卖，而库存低则没有对于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只能现货买卖，不得不接受渠道的高价勒索。

中国希望自己的产品和特有的稀缺资源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前提，就是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而他们流动性紧缺的结果就是一定要被有充足资金能力的发达国家所盘剥。两个世纪前，中国茶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博弈也是由于中国白银紧缺，利率高企，一般不会少于年息40%～50%，也就是四分利或五分利，就如中国典当常说的“九出十三进”，即你当十扣一成的手续费还的时候要换十三，也就是利率达到44.4%。而荷兰得到了美洲的白银，这些白银是美洲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而不是货币，这导致双方流动性和利率的极大不对等，因此中国商人只能贱卖，导致中国商人退出了全部茶叶海上交易。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人写的《利率史》[①] 就可以发现，西方崛起时的利率一般都低于10%，大部分时间是低于5%的，这与中国的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百的利率相比，二者如何能够竞争？

现在是历史的重演，在高额利率和紧张的资金面前，中国企业没有与外国博弈的筹码。中国生产型企业的资金是非常紧张的，当前中国的银行基本上不会给企业做无抵押的流通贷款，企业要抵押也要是房产等不动产，企业的存货库存在银行的眼里不算不良资产而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减分就已经很好了，基

---

① ［美］霍默、［美］西勒著，肖新明、曹建海译：《利率史》，中信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

本上是没有贷款的可能的，这不但导致企业产生投资买房的畸形动机，挤压企业的生产资本，而且推高了房市的价格，就算有房子抵押能够取得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也高于西方很多，同时这样的贷款都是短期贷款，展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与海外的定价权博弈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和货物囤积做长期博弈的。更进一步讲，对于中国企业的利率，虽然我们官方的利率就比西方的高很多，但还是贷不到，更多的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是靠民间借贷，基本是高利贷，由此企业的资金紧张，利率高昂。中外在做定价权博弈的时候根本是不对等的。流动性紧张导致生产企业被盘剥让出定价权，而我们不断地收紧和放松金融货币的流动性，这样的松紧震荡会给流通和渠道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不稳定性，这个压力对于做流通的企业的库存和现金难以平衡，最终会导致中国的流通渠道企业在与外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将定价权完全拱手让人。**中国的企业都是孤立的，而外国企业早已经与金融资本紧密捆绑形成金融寡头，这样的博弈在定价权之争中是根本无法取胜的。**

西方世界对于定价权的竞争，实际上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其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流动性的不对等。英国搞的重商主义在表面上看是把贵金属当作财富，这样的观点早已经被认为是落伍的，但是实际上其是利用贵金属的流入和外国贵金属的外流，造成彼此之间流动性的不均衡。这在贵金属为货币的时代是致命的，在金本位的时代对于世界也影响巨大。在古代，战争的赔款是贵金属，如果不拿到外国去买东西，实际上赔的就是货币投放量和流动性。而在重商的情况下，这样的贵金属货币的流动性的失衡，其结果就是财富外流，导致财富外流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定价权归属哪一方。比如当年胡雪岩与洋商斗法蚕丝，也是因为资本流动性的问题。胡雪岩囤积了价值2000万两白银的蚕丝，并且还有上千万的资本，却因一笔50万两白银的付款而崩盘，原因就是这笔付款要拿实银。当时上海所有的实银也就是100万两，洋商控制了上海的银根，而对于中国当年30多亿两的GDP和8000万两的中央政府收入，作为货币的白银，乐观估计也只有10亿两，保守估计最低有3亿两，而英国等国因发现美洲的大量黄金白银而使得流动性增加，同时西方是使用金本位，白银不是货币，双方银根的差别是巨大的。这样的银根紧缩导致的高利率和流动性紧张在中外定价权博弈中屡次掐住了中方的脖子。在金本位时代，货币数量得到了衍生，同时西

方还拉大了中外金银的比值，而中国却还基本是使用实银交易，只有小范围的银票流动，货币的衍生创造很少，中国本位货币的建立是20世纪的事情，比西方要晚了百年，这样中外流动性的差距就更大了。后来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西方推行的货币主义和受控的超发货币的政策，使得西方的流动性和资本总是在发展中国家之上，牢牢地控制住了各种商品和资源的定价权，每一次经济危机就是再一次对于资源占有和定价权再分配的博弈，流动性对于这样的博弈至关重要，在经济危机中，各国印钞就非常可以理解了。对这样的流动性差别，我们从中外的利率差异就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流动性一直比西方紧张，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创造流动性方面也一直比西方慢半拍。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的印钞说是淤积在银行等流通系统，实体经济是通缩，而这背后就是西方的流动性过剩被用到了渠道和定价权的竞争上，他们可以利用充裕的流动性囤积产品，而发展中国家流动性不足，只有卖出商品，在他们的囤积和渠道控制下，紧缺经常是人为制造的，就如20世纪西方在危机中把过剩的牛奶倒入海中。现在西方在渠道上所囤积的流动性，保障了西方金融体系的低利率优势，就是要在定价权上有所动作，我们反对农产品的涨价也与渠道被控制和定价权渔利有关。有关资本可以炒高农产品价格的关键也是在这个领域堆积了流动性，这也是一种流动性不均衡的体现。我们反对流动性炒高农产品，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统一压缩流动性的行为误杀了中国出口资源和商品定价权，同时也给外来热钱进入流通领域渔利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损失，前者是中国的实业买单，后者就是中国的消费者买单了。而流动性紧缩也让我们进口的资源产品价格被外国炒作，让中国经济买单，就如铁矿石成为中国经济之痛之后，铜紧接着成为中国巨大的资源压力，在铜价不断创造新高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冶铜企业却陷入了亏损的边缘——在2006年中国铜冶炼企业加工费为95美元/吨，现货铜加工费最高水平甚至达到175美元/吨。在2006年的谈判中，矿业巨头借势取消了已经存在30年的价格分享条款。随后，加工费一路下滑，中国铜冶炼企业仅在盈亏边缘徘徊，面对七八千美元的铜价，冶炼加工铜的加工费在现货市场最低甚至达到25美元/吨。全球铜矿寡头企业不断压榨中国铜利润的历程赫然在目：矿业巨头盈利上千亿元，中国铜冶炼企业仅以控制亏损为目标，这背后与铜的融资链密切相关，铜的仓单是重要的融资

手段，并且有各种衍生品支持，融资的高利息是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中国国内的很多商品价格在国内要远远高于国外，哪怕这个商品是从中国进口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对于流动性的调控就不能在宏观上一刀切，在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一定要有充足的流动性，这样的结果就需要微观调控来满足。

我们要认识到流动性的充裕未必是坏事，不能仅仅以通胀视角看问题，西方历史的价格革命与通胀的内在差别是要深刻理解的，没有控制权、定价权的涨价是通胀，在定价权控制下的涨价是得利的价格革命。因此对充足的流动性和价格上涨，在有些时候还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只有泛滥到过度投机的领域才是有害的，而流动性的不均衡还会加剧这样的不利局面，因此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压力，防范实体经济的危机是重中之重，因此流动性不均衡在此处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我们的微观调控就是针对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的，对于流动性不均衡进行调控的重点就是要保障中国产品和资源的定价权，因为定价权的争夺关系到中国根本的经济利益和长期稳定发展，此时失之毫厘，将来就要谬以千里了。

货币方程式阐释定价权

笔者认为对于定价权的决定因素是流动性的大小，为了阐释这个问题，实际上从西方的货币方程式就可以得出最直观的认识，只不过很多专家并不把这样的问题明确说出来。

货币数量与价格的问题在西方是早有研究的，并且有现成的公式，这些公式揭示了定价权问题的答案。对于货币的资产层面和交易流通层面是有完全不同的研究的，对于微观与货币的资产和存储价值，西方使用的是剑桥公式，而对于宏观与货币的交易功能，西方使用的是费雪公式，不同的公式有不同的内涵，主要公式内容如下：

> 1917年，剑桥大学教授庇古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货币的价值》一文，提出 $M = kPy$ 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剑桥方程式。式中 y 表示实际收入，P 表示价格水平，Py 表示名义收入，k 表示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

收入的比率，因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和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比例的函数。

费雪方程式是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之一。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费雪方程式为：$MV = 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

这两个方程式彼此是有不同的，在这里对于货币的交易功能，其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参数 V 是关键，而对于货币的资产功能人们持有现金的比例 k 所占据的影响巨大。剑桥方程式表达的经济意义被称为"现金余额说"，主要是强调人们保有的现金余额对币值的影响，从而导致对物价的影响。

从货币方程式，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与货币的关系。按照费雪方程式，MV 是流动性，商品的数量是很难变化的，因此价格 P 实际上就是被流动性所决定的，这就建立了宏观上的价格与流动性的一个关系函数。而在微观之上，流动性是一个比较难以衡量的量，在这个微观社会就体现为现金的多少，因此剑桥方程式的现金余额说就变得更有意义了。k 表示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这个现金量的多少是比较好衡量的，而 Py 表示名义收入，人们的名义收入是多少也是很容易衡量的。剑桥方程式告诉我们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和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比例的函数。

通过这样的函数，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代西方取得大量的金银，是怎样主导了他们的经济行为的。在贵金属货币时代，不论货币需求是多少，费雪方程式中的 M 都等于贵金属的数量，这是无法改变的。由于人们持有现金贵金属的意愿又非常强烈，贵金属还经常被埋入地下储存。按照剑桥方程式，这些结果就导致人们的名义收入降低，即劳动力价格的降低和物价的降低。在有了古代银行的衍生和后来的金本位以后，剑桥方程式中 M 的数量可以大幅度地增加了，但也带来了银行信誉的巨大波动。这个波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持有纸币现金的信心，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 k 会大幅度地降低，从而也产生了当时货币的通胀通缩。

等到信用货币的时代，公式当中的 M 数量完全是央行调控的，人们是可以

通过增加 M 的数量来博弈定价权的。我们的央行调控控制通胀，就是这样的宏观定价权的体现。这是一项央行的权力了，这个权力的实现也离不开对于流动性的操控。但是央行的货币操控同样是有边际效应的，央行能够调控货币的数量，但要抑制通胀，则需要货币流通速度或者持有货币意愿的变化，在美国的QE宽松下，美元不通胀的背后是各国持有美元的意愿增强，或者说不是直接的增强，而是因为《巴塞尔协议》不断增加的要求和金融风险，各个金融机构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以持有更多的货币来对抗风险。而美国的QE以及退出QE，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也是把控制通胀通缩放在一个重要的层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控制通胀通缩就是控制物价，是一个操纵定价权的体现。

因此，通过货币方程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上对于流动性决定定价权的支持，真正主导定价权的，就是流动性的博弈。

流动性与定价权价值链

我们说定价权，通常上是指公司对其产品价格制定拥有主动权，若改变产品定价不会对需求有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但对于目前的中国，定价权不仅仅存在于公司之间，也存在于产业和行业之间，在价格变化的时候不仅仅是向下游传导，也向上游传导。例如，对于矿产资源，在世界上是价格向下游传导，而到了中国则可以如稀土这样让上游也感到压力。而且定价权也不仅仅是公司在行业内部的竞争，公司的竞争会让其在行业内部发展成为行业的标准，变成对行业上下游其他行业的产业链的竞争。

流动性对于定价权的影响也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在宏观上，流动性的丰富影响价格，是总体上货币与商品的一个价格比值，这其实是一个货币定价的过程；但在微观，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各个公司、各个行业、各个区域的流动性本身是不均衡的，这些不同领域流动性的叠加积分就是总的流动性 MV，而在不同领域的价格和商品的乘积就是这个领域的细分市场，这个细分市场的积分就是总的市场规模 PT。在宏观上，费雪方程式告诉我们这个等式的意义在于流动性与市场规模的互相适应。

对于不同的微观领域之间，流动性的不同决定了定价的差异。在一个产业

的上下游，流动性本身是不同的，流动性的差异决定了各个细分领域价格利润的不同。交易的上下游的成本可能是不同的，不好比较，但我们如果在费雪方程式的两边同时除以一个产品的成本的话，就可以消除成本大小的差别，因为在价格 P 这一边除以成本的话，得到的就是利润率水平，而在 M 货币这一边除以成本的话，则资本的效率（成本/货币量）的倒数——单位资本占有率，在没有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之下，是应当假设不同领域货币流动性的单位资本占有率是一样的，资本的效率也是一样的，定价高、利润高自然是资本的效率收益高，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资本的效率要求就越高，也就是资本回报率的要求更高。

由于各个不同的领域货币流动性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领域会形成不同的价值链。这个价值链的概念最先是在公司治理层面上，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 1985 年提出的。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为企业的股东和其他利益集团包括员工、顾客、供货商以及所在地区和相关行业等创造价值。如果把“企业”这个“黑匣子”打开，我们可以把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或者称之为“增值活动”，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价值链的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一个环节经营管理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其他环节的成本和效益。但我们在定价权博弈的时候可以把价值链的理论放大，国家、行业等都可以看做与企业法人类似的一个实体，这些实体的博弈就是类似于企业的，国家的各种政府机构就是企业的管理销售等多部门，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价值链的概念微观化。对于一个大的产品线，比如我们的汽车，从炼钢、零部件、设计，到整车组装、驾驶服务、售后维修等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是不同的部门。在一个集团里面是不同的企业，还可以是不同的企业或者不同的行业，这些都是汽车产业的价值链，这些价值链当中是有很多环节的。所以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的，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之间存在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用波特的话来说：“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由一连串企业内部物质与技术上的具体活动与利润所构成，当你和其他企业竞争时，其实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而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而定价权也是一样，是一个价值链的竞争，彼此是不能脱节的。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是可以有不同的流动性的，不同的流动性下在不同的环节上也会有不同的定价权，可以将成本的变化向其他的环节进行转移。而价值链中的定价权竞争，就是流动性怎么样在价值链当中转移。对于一个产业链，价值链可以分布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国家，因此价值链上有不同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之间也是有壁垒的，对此我们以后还会深入讨论。

认识了这样的价值链，我们也就知道在前文中为什么说科技不是定价权的决定因素。在企业内部科技只是一个部门，在产业里面设计研发也是价值链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进步是否会向其他环节转化，从其他环节得到利益，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价值链和价值链规则构成的就是一个信用体系，而流动性就是这个信用体系的能量，我们如果把货币看做是信用的符号的话，这就是一种信用流。

而在西方社会，不只是一个产品的价值链的问题。金融商品和普通商品、劳动力等不同市场的价值链是相互博弈制约的。流动性丰富以后，西方是让流动性集中于金融市场，而社会日用品市场流动性则被控制，我们所说的西方不通胀是其日用品的价格对货币没有涨价，但金融品的价格部涨到了天价，到 2014 年美国股市从危机时的道琼斯 6000 多点涨到 16000 多点，并且大大超过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股市点位再创新高，但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却没有 2008 年前好。

流动性在不同的系统位置松紧是不同的，决定了不同市场的价值链，这样的流动性分配机制就是信用体系，价值链和流动性是在信用体系当中得到整合，定价权就是流动性在不同的层面确定定价权，而这些定价权是被价值链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

延伸阅读　成交量与股市牛熊的理论分析

对于股市，很多人都知道成交量对股市牛熊的关键性意义，但是对于成交

量对于股市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更多的是感性的认识。说成交量大说明市场活跃度高，市场活力大，因此是牛市，反之则是熊市。但是这样的感性分析不是理性的分析，更不是一个定量的分析，现在笔者就要从理论的深度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成交量所对应的，就是每一次成交都是一次货币与股票的交易，成交量大的背后就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对于价格的影响是早就有理论模型的。

这里要提到经济学理论中的经典货币供应方程式——费雪方程式。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费雪方程式为：$MV = 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通过费雪方程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原先的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加与价格下降成为反比，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与价格成正比，对于股市的增发和再融资就是股市的商品 T 的增加，而成交量的增加就是股市的货币流通速度 V 的增加。

对于一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市场的总市值而言，商品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股市的增发即使很大，但是总体的比例也是有限的，就如我们股市的融资上万亿，针对股市 20 多万亿的股市总市值而言也是 5% 的差别，货币总量的增加完全可以弥补增发的商品数量的增加。同样，货币的数量增加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政府防通胀、控制货币总量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我们每一年货币总量增加百分之十几，已经是非常高了，受到了很多非议，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市场的成交量。股市的成交量是可以比货币总量增长快很多的，就如 2010 年 10 月的成交量，最大的时候，沪市可以达到 3000 亿，而 2012 ~ 2014 年只有 1000 亿左右，灰暗的时候才几百亿，这其中的差别是 3 倍，带来的股价点位是 3000 多和 2000 点左右的差别，而货币总量除非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成倍的差别的。因此成交量的成倍增加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 V 的成倍增加，对于股价的贡献作用是最大的。

对于股市的走熊，市场的缩量阴跌，很多人认为是市场拒绝再跌，因为很多人已经不愿意抛售股票了，但是这样的成交量的萎缩恰恰意味着股市货币流

通速度的减缓。成交量低实际上是两方面的反映，既反映了很多人不愿意卖出，也反映了没有人愿意买入，否则股价就要涨上去了，但是很多人思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厢情愿。对于这样的主观因素，我们不应当忽视西方的主观价值论的影响，价值的高低不再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决定，而是主观上愿意买卖的统计曲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均衡，对于主观价值论，人们买入支付货币的动因就是认为赚取了便宜，在股市购买股票就更是为了赚钱而不是看中股票的使用价值，没有便宜赚是不会买入的，这样的交易背景就使货币每一次过手都是要赢利或者有强烈的盈利预期的，这样的交易背景和主观价值论环境下，成交量的活跃表明人们对于价值的主观认识在不断提高，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也在于此，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公式来源，认识经济事物的本质也需要有哲学的高度。

因此，在股市当中，成交量实际上是直接决定股市的总市值的，也直接影响每一只股票的价值，这是一条统计规律，对于越大越完善的市场，统计规律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和准确性也越好，我们认识股市的牛熊的关键也就不再是股市的价格指数，而是股市的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成交量水平。突然的短线成交量的放大可能是因为恐慌和政策影响所造成的波动，长期的成交量趋势肯定是有内在的规律性影响。股市要发生牛熊的根本性转变，一定是成交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成交量萎缩，即使是大盘指数上涨，也一定是到了顶部；成交量持续放大，即使是股价还没有动，也必然是一个底部的形成没有成交量的上涨必然是一个短线的反弹；放量下跌的资金恐慌出逃却可能是诱空的最后一跌。

因此对于股市的短线走势可以看指数的 *K* 线，长期的牛熊对于市值的支撑就要有成交量所带来的货币理论模型的规律性影响，股市的成交量与股市的长期走势是一个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必然。

第 3 节　从美债收益率低于美联储看金融定价权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标准普尔在 2011 年 8 月 5 日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下调至"AA+"，并指出美国的信用可信度有所下降，尽管如此，美国国债价格仍逆市大幅上涨，到8月10日，其二年期国债最低收益率竟然达到了0.169%，这个利率是大幅度低于美联储的0.25%的利率的。到2014年年初，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两年期的是0.31%~0.35%，一年期的是0.11%~0.12%，三个月的是0.02%~0.06%，六个月的是0.07%~0.10%。在这个幅度下美国国债的一年内短期收益率竟然还赶不上美联储的利率，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存钱而是要买入国债呢？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低于美联储的利率已经两年多了，这样的利率差的长期存在，就是金融定价权的体现，利率本身就是金融价格，美债的收益率就是金融资产的价格，美联储利率则反映货币作为资本的资本价格。

对美国评级下调美债反而上涨的问题，各种意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而且有人还在指责人民银行为什么要拿着那么多的美国国债，但国债涨了他们都哑口了，没有人分析过为什么美债会在评级下调、美国偿债信用下跌的时候还会暴涨！对此笔者在《信用战》一书当中做过详尽的分析，主要原因就是风险问题。美国的银行是会破产的，美债评级下调，美国金融系统的风险更大，银行会破产，银行破产对于大资金来说，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和清偿方式使得大资金风险杠杆性放大，虽然美债风险增加，但你拿着美债，相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反而是相对减少的，因此人们为了避险会购买美债。

基于我们对现代央行体系的了解，可以认为在央行的存款是没有风险的，因为央行是有印钞权的，总可以发行货币支付你在央行的存款，因此央行存款的0.25%利率是绝对的无风险利率，国债风险再低毕竟也是有风险存在的，为什么不在美联储存款呢？对美国国债评级下调的初期，会有恐慌，因此各路资金都购买美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资金持有者都是美国金融机构，它们没有权利在美联储存款占有利息，所以会出现风险因素决定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的0.25%和市场的0.12%利率存在一倍利差。如此的利差在西方的金融机构是可以进行套利的，西方有对冲基金专门干这个事情，各个银行也可以干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看到，在危机以后，这样的利差维持了好几年，而本来套利模式下是不会让这样的利差长时间存在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利差的长期存在呢？

对这个利差的存在，有人分析认为是由于美联储取消给超额准备金支付利

息的政策，这样他们就需要拿着国债了，因为美联储不再付利息了。但笔者对此是存疑的，因为短期国债依然是利率极低、低于美联储的存款利息的。长期的国债利率比较高容易理解，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以后的利率不会长期低迷。而短于半年的低利率则不受美联储取消利率的影响，美联储只要短期不取消就可以套利，但国债短期利率依然非常低，套利的空间是依然存在的，因为现在美国国债的短期利率与美元的美联储利率的利差有十几个基点，这是很大的。因为在西方，国债交易一个基点以上就可以套利了，十几个基点的利差长期存在而不被套利，则一定是另有原因。因此这个利率的差价根本不是套利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因为美联储改变政策导致的，这个利差的存在还有另外的原因。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直接地说就是金融定价权的体现，体现在资本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之间的差价。货币的利率是资本的收益率，而债券的利率则是资产的收益率。为何会有这个差别，原因就是流动性的差别！对于美元和美债的流动性差别，确实让一般人难以理解，中国央行大量持有美债，为什么不拿着美元现金？对这个问题，笔者也是随着对于定价权问题的研究和思考的深入逐步认识的，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深刻认识到其中流动性的差别，认识到其中流动性的影响，就可以知道那些谴责央行持有大量美债的所谓金融专家的浅薄。

根据人民银行网站的数据，截至 2013 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是 38213.15 亿美元，相对而言，美国的 M2 才有多少，如果把这些外汇储备存储于美国的银行，美国不到 10 万亿美元的 M2 里面百分之三四十都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存款了，这可能吗?！美国人能够答应吗？想一下，你如果提款，对于美国银行的挤兑风险会有什么影响？挤兑下，这些银行如果破产，你的外汇储备的损失是多少？在西方，对于大额存款，可不像中国这样被银行争抢，银行因为害怕被挤兑，是不接受或者有限制提款的附加条件的。美国的 M2 才 10 万亿美元，按照《巴塞尔协议》中的资本充足率，银行的资本能够有多少，超过本金的存款你想存美国的银行都难以存进去，你能够存多少家银行？如果平均每一个美国银行都有超过 30% 的中国国家主权存款，你想要到哪一家提款就可以到哪一家提款，美国所有的银行就要都被你控制了，这可能吗？有人说我们的外汇储备可以投资于美国的股市取得高收益云云，但股票的风险且不说，每天的股票交易量背后的流动性高而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市场股票基金总份

额大约在 10 万亿美元，日内基金的金额虽然只有前者的 1% 为 1000 亿美元左右，但这日内基金的总交易量却已经达到了 55%，高频交易占据交易量的主导地位。因此美股的活跃资金只有 1000 亿美元规模，是无法支撑数万亿美元的中国外储盘子抽走资金的，一旦我们的储备要抛售，市场马上就要崩溃了。同时由于各国对于市场的监管，对足以影响市场走向的大资金，每一天的抛售量都被严格地限制。因此在这个层面外储放到美国股市里面，变现的速度是有限的，这就不是储备而是投资了，不是央行该干的事情而是中投该干的事情了。同时对美国的股市规模，多数跨国集团上市公司持有 5% ~20% 就是控股股东了，中国可以控制美国全部产业了，美国现在以国家安全理由，连华为收购一个 200 万美元的公司都拒绝了，说明美国也是不让你买的。同样的，对于大宗商品市场，相对于美国股票就更是流动性不足了，而市场规模也同样限制你的外汇储备资金的进入，且央行储备大宗商品是虚拟交易还是实物交割也是问题，更不是外储的选择。

还有人说如果美国的货币市场不够大，我国美元外汇储备可以存储于美国之外的银行啊！这个说法就简直是不懂金融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果是美元，就必须在美国境内，如果是欧元则必须在欧盟境内！这差别就是在境内的叫做 M2，在境外的叫做 M3，都是广义货币，M3 是可以在 M2 的基础上再衍生的，就如欧洲银行给你记账 100 亿美元的存款，欧洲银行是不用有 100 亿美元的，就如当年钱庄开的银票是可以比钱庄内的白银多很多的，只要有日常兑付的白银即可！所以 M3 可以再衍生。你存储于美国之外的美元，人家照样给你衍生，而且衍生的美元还要贷款出去。你要提取的时候，其与存在美国境内银行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美联储只是对境内美国银行承担央行的最终贷款人义务，对境外衍生的美元是没有这样的义务的，你的美元可能就提不到了。

而我们的外储投资于美元资产之外的市场，首先必须看到的就是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的份额是 70% 以上，如果我们的储备份额比例与外汇市场上外国货币市场份额的比例不一致，这个差别大了，就存在金融攻击和套利的风险；同时欧债危机的阴影也是巨大的，日本的国债占 GDP 比重最高，还不断宽松，而更本质的是不论欧元还是日元资产，流动性均无法与美元资产的流动性相比，美元资产的流动性不仅仅是美国资本和美国人持有，也不光是中国持有，还是

世界所有国家主要储备的外汇资产，其流动性的丰富是其他发达国家无法比的。

分析了以上那么多“池子”，这些池子的流动性规模都不够大，是无法容纳过多的中国央行外汇储备的，而美债则不同，它是比美元存款市场更大的一个池子。美国国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6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各种企业债，美国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证券化的次级债，美国的债券市场规模是足够大的，而且美国债券市场的波动却比股票等其他市场更小、更稳定，这也是作为储备所需要的，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之大，背后还有美国的社保机构，社保机构占据了国债大约60%的份额，中国是国外第一大户，也只不过占美国国债8%的份额，因此这个池子确实是够大的，比货币M2的池子还要大。

对于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更关键的是要有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支持，这些金融衍生品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性。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巨大，以美国的CDS市场为例，2001年只有1万亿美元，到2008年高达62万亿美元，2009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计划，试图监管高达592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2009年GDP的40.82倍。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明确表态不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因此这个市场的数据是不透明的，其规模即使是比危机前有所萎缩，但对于我们的几万亿外汇储备而言也是足够的了，这样的流动性充足，是很多大型机构不得不选择美国国债的原因。选择美债导致美债的收益率低于美联储的利率，低于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利率，这推高美债的推手可不仅仅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美国的各种资金也是因为银行的流动性不足要购买美债而不是存储于银行，就如房地美、房利美（和其他房贷银行）多余的资金头寸影响了联邦基金实际利率（Bech和Klee，2011年提出的）。

所有的大资金为了安全不得不选择国债，结果就是货币M2的数量因此流失而越来越少，国债的流动性因此越来越多，流动性越少则大资金越不敢去，流动性越多则越吸引大资金，因此美国的M2是很低的，但有支付性质的债券则充当广义货币M3的角色。而这样的选择导致流动性越来越集中，哪里流动性大，资金反而去哪里，流动性小并不能吸引外来流动性去补偿，这时候在货币市场微观经济学的假设市场出清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以利率作为货币的价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也出现了后弯和畸形，这扭曲就是定价权的来源之一。

而且如果我国央行将大额外汇存储到美国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害怕我们挤兑其流动性，他们拿着这些存款是不敢贷款的，有很多是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是转存，原因就是转存一样存在流动性的问题，且其他银行有风险。而存入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会如何？别看国债有可能违约，似乎转存美联储没有违约的问题，央行总可以发钞给你，但若真是金融系统出现风险，美联储限制商业银行提取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不叫违约而叫做央行货币政策调控，这是各国央行都有的权力，但对存款银行则意味着流动性被挤兑的危机。同时因为《巴塞尔协议》对经合组织市场经济国家国债的资产风险设定是零，金融机构存款是20%，买国债不占用银行资本，由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低和风险，他们给你的利率就更低，绝对不是美联储给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利率0.25%。因此，与其是存款让银行去买国债还要承担银行破产的风险，不如自己直接买国债，美国国债的利率低于美联储给银行的利率就非常清楚了，具体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债以及债券市场有更多的流动性。** 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主要持有美国国债是必然的。有人说持有这个国债是替美国人打工，其实持有美元又何尝不是呢？在当今信用货币非本位货币的时代，美元就是美联储债券！只要你持有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选择美国国债就是必然的了。而我们为什么不得不持有这么多的美元储备，则是另外的问题了，我们的储备规模与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是有关的。资源国用不着拿那么多外汇储备，金融国自己可以创造货币也用不着，而制造国如果没有这些外汇储备则会出现如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风险，存在被掠夺的可能。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联储的利率，美国国债利率更低是有一个金融定价权在起作用的，这个定价权的关键因素就是在货币存款市场和债券市场有不同的流动性，流动性高的债券市场可以让债券价格更高，所对应的就是收益率更低，甚至可以低于货币存款的利率，这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差别是无法通过金融套利消除的，这个无法消除是定价权的关键。而且由于这个流动性的不同，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要大规模地持有美债，美债是美国金融定价权的来源和制高点，西方是以国债信用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的，国债信用也捆绑着西方的社保体系，持有美债就是绑定美国信用体系。占据足够份额的美债，就有对于美国金融定价权的发言权，就如美国对于中国操作美

债的行为一直很关注，如果大规模地抛售美债，甚至会被美国称作对美国的金融攻击和战争！在央行持有美债层面，我们已对美元的金融定价权乃至全球的金融定价权有了发言权，但我们对圩这个权力只不过是在经济层面上得到了，是否真的敢发言，就如索罗斯攻击英镑那样地惩罚印钞进行套利，还要看我国的国际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是否允许了。中国的大国崛起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西方当年从取得了世界的流动性制高点到真正统治世界，中间走了几百年呢！

第4节　供需曲线的扭曲与定价权理论

从供需理论来看定价权，在供需理论上，每一个价格下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是一个点，随着价格的变化就可以画出一条供给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通常是供给随着价格的增加而增大，需求随着价格的增加而减少，这样供给和需求曲线很快就会交叉到一个均衡点上，这就是均衡价格，如果一切定价都围绕均衡价格和趋向于均衡点的价格，就没有定价权一说了，为何有定价权的问题呢，关键的就是供给曲线是会后弯的，而需求曲线是有刚需的，也会弯曲。定价权正是来自于供需曲线的弯曲，这个弯曲提供了定价权理论的基础，这个弯曲和畸形下，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市场出清就不存在了，不能市场出清的偏离，就是定价权的体现。

供需曲线会出现后弯的现象是很早就被发现的，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 D. Nordhaus）在谈到后弯的供给曲线时用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这两个例子的现象虽然相同：都是随着价格上涨而供给先增加，然后随着价格的继续上涨而供给减少。对应后弯的曲线，有劳动力和石油等资源，对于这个现象，西方当年的主流经济学者就是关注的①，但是却在后来选择性失明，而且在萨缪尔森的时代，后弯

① ［美］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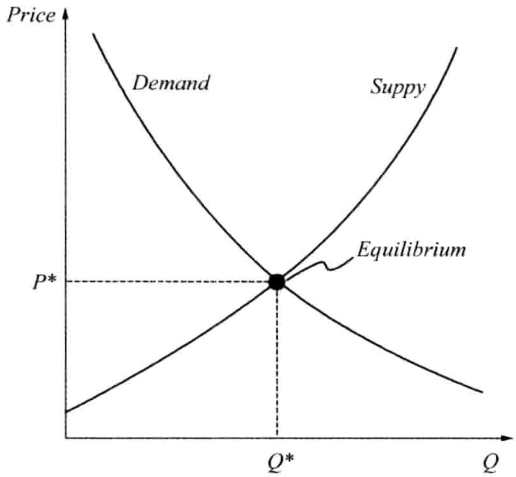


图 2－1　供需曲线与均衡点

注：这是传统的供需曲线和它们形成的均衡点，在经济学教科书当中都有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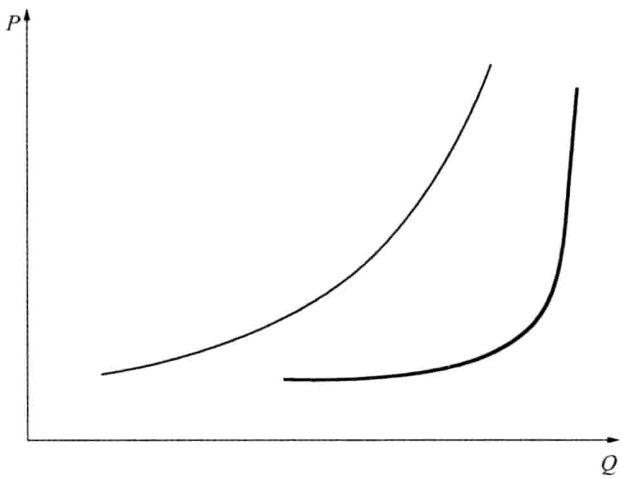


图 2－2　传统的供给曲线

注：在传统的供给曲线下，供给的数量随着价格的增加而增加，但这个供给量很多时候是受制于资源的数量的，就如图中的粗线，在资源产品中，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在劳动力层面，社会的劳力是有限的，劳动力的供给量也是会有限的。价格高供给也不可能增加，曲线到后面会形成一个接近竖直的直线。对这些的供给，很多经济学论著上讲供给的替代性，但笔者分析经济学时就如《资源角逐》所论述，是以熵的视角进行分析，熵的增加性使得这样的需求很难被替代。

的曲线是特例和不多见的，原因就是金本位的存在，在金本位不存在和印钞没有了限制以后，后弯的供给曲线就更多地出现了。在石油价格危机后暴涨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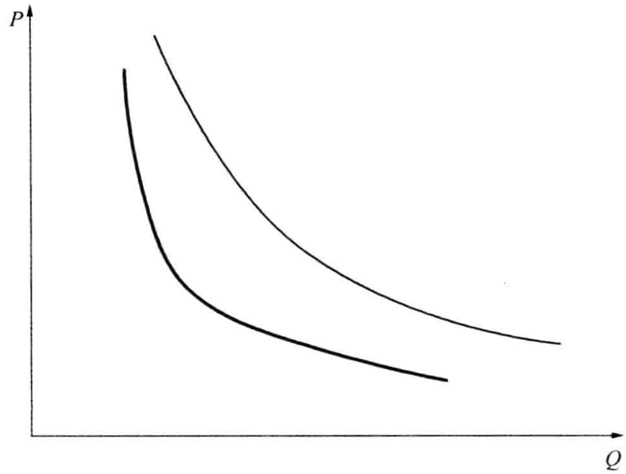


图 2－3　传统的需求曲线

注：传统的需求曲线中，随着价格的增加，需求会越来越少，但有些需求人们无法离开，比如粮食就是如此，这样的需求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对刚需如图中粗线所显示的，在价格不断上涨下，需求到一定的程度就趋于刚性，形成价格增加需求也没有怎么减少的近似竖直的需求曲线。

候，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也是减少的。

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表现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指劳动供给曲线呈现出的劳动供给量随着工资上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的特征。为什么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劳动供给取决于工资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随着工资增加，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家庭用工作代替闲暇，从而劳动供给增加。同时，随着工资增加，由于收入效应的作用，家庭需要更多的闲暇，从而劳动供给减少，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劳动供给随工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劳动供给随工资增加而减少。一般规律是，当工资较低时，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当工资达到某个较高水平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

资源产品也会出现供给曲线的后弯，原因就是货币属性的变化。在贵金属主导货币价值的时代，贵金属是有资源属性的，贵金属除需要大量劳动以外还需要资源，也就是金矿、银矿等。当货币变成信用货币以后，资源属性就没有了，信用货币是可以无限量发行衍生的，但资源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假设以国家信用发行的货币当中的国家信用是无限的。然而，实际上国家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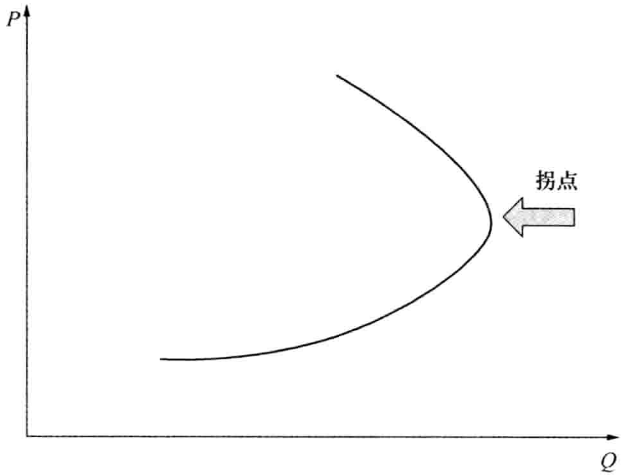


图 2－4　供给曲线的后弯

注：对能源和劳动力的供给，我们在传统的刚性曲线竖直之下，如果考虑了资源持有者的惜售和休闲的需求，那么这个供给量随着价格的增长是可以减少的。这样的情况在传统时代为什么不会出现？这是由于金本位之下，货币的数量是稀缺的，大多数情况下实际货币供给有限导致供需曲线根本画不到后弯的时刻。

用肯定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世界陷于危机的时候，国家信用还要大幅度地降低，结果就是货币衡量下的资源产品供需曲线就要发生扭曲了。在价格高涨、货币竞争贬值的时代，价格越高货币的贬值趋势越严重，则资源产品替代货币进行储备的需求越大，人们越不愿意以资源换取货币，资源的供给量是随着涨价降低的，供给曲线出现了后弯。这在2008 年金融危机石油达到147 美元/桶时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后来在石油价格达到100 美元/桶之上时，俄罗斯也降低石油产量、压低出口量。在流动性的挤兑下，如果资源所有者缺钱，则再低廉的价格也是要卖的，我们当年低价卖资源是如此，2008 年金融危机后石油价格跌到30 多美元/桶也是如此，因此石油供需曲线也是带有后弯属性的。对这个后弯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有奶粉，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抢购奶粉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限购，不但港澳限购，像新西兰这样的传统出口奶粉的国家也限制中国人大量购买，在涨价的压力下，奶粉出现限购，这就是供给曲线后弯定理的生动写照。

我们还要注意到石油、粮食等价格是带有“刚需”性质的，而劳动力供给对于所有产品的作用都是难以替代的。“刚需”是刚性需求的简称，那么什么是

刚性需求呢？这是相对于“弹性需求”而言的，从字面可以理解“刚需”就是硬性的、必须需要的东西，指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这些商品包括粮食、能源、房产、等等。在刚需的模式下，在价格增加的时候，需求甚至是可以提高的，因为紧缺增加了人们恐慌和投机的需求，在供给曲线后弯以后，需求曲线的刚性过大，甚至也发生弯曲。就如民众对于粮食发生恐慌，原来储备一年就足够的粮食，人们出于安全感的不足非要储备二年。同时还有投机商人囤积居奇，那么需求立即就可以翻倍，就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言食盐要涨价，一下子就让所有的商店买不到盐，盐价可以变成原来的几倍，而有的人甚至一下子买下了足够吃一辈子的盐，这就是价格上涨时因为投机和恐慌，需求反而暴增的例子。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房价，在“刚需”和涨价之下，人们的投机性需求和恐慌性需求对涨价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靠宏观调控压低这些需求，而正常的市场是需要有投机来维持市场活力的。

在一般的市场规律下，价格高、利润高的产品，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而需求大、价格高，人们生产的热情也高。但在供需曲线后弯的情况下就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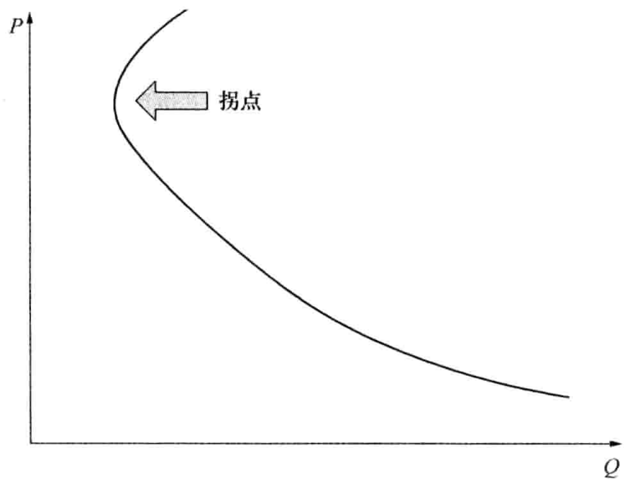


图2－5　需求曲线的畸形

注：在传统的需求曲线之下，刚需的曲线接近竖直，但在竖直向上以后，由于投机需求和恐慌需求的存在，需求的数量会在以前的刚性需求基础上继续增加。在传统曲线上为什么看不到这个现象？这也是由于金本位下货币流动性的数量绝大多数时候是有限的，在刚需价格极高下市场是没有多余的流动性支持投机需求和恐慌需求的，但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超发，情况就出现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个拐点，需求反而可以随着价格的提高而诱发更多的投机和恐慌性需求。

“刚需”产品的产量是受到资源和时间的限制的，不是能够迅速增加的，而后弯的供给曲线，价格更高以后人们是不愿意生产的，劳动力收入高了要休闲，也不愿意更多地工作。这样的情况下，价格高、利润高是不会通过市场内的扩大再生产主动地恢复到合理低利润的，就如阿拉伯国家卖石油是按照它们的外汇需求来的，不会因为石油价格高就多卖，多卖得到的美元有贬值趋势，谁也不愿意多要。这样不能回归正常利润率的趋势就是这个后弯曲线的特性决定的。我们的血汗工厂则是反方面的例子：收入低了，工人不仅不会不干了，而是没有选择地要为了吃饱肚子和养家糊口而多干，供给反而增多。这样的供给曲线也不会如市场经济假设的那样，收入低就会按照市场规律自然地调整收益水平。由此可知，在后弯的供给需求曲线下，不同产业的收益率差别很大，微观经济学要求的市场出清是与此不符合的。在利润率和收入层面，对于后弯供给市场的不同状态、普通市场的市场平均收益等是不均衡的，而且这不同层面的利润率差别是不会因市场调整而自动均衡的，这不均衡的偏离就是定价权！因此，对于微观领域的不均衡，完全是符合宏观经济学的假设的，是要有政府财政力量进行干预的，这也是笔者一直提倡进行微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后弯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是可以有两个交叉点的，到底是交叉在哪一个均衡点则体现了定价权带来的价值。对于我们出售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是交叉在供给曲线下方的，必须不断多卖出，维持必要的收入，西方发达国家则交叉在后弯曲线的上方，价格高而供给会减少，是与需求的减少进行比较的，这就让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起，没有需求。有效的供给在供给曲线的高价段只能给发达国家，他们享受更多的资源，却提供更少的劳动。对这样的后弯曲线，不同国家的供需均衡点到底交叉在后弯的哪一个位置，就成为关键的因素。而且对于劳动力曲线的后弯特性，会造成所有与劳动力相关的供给曲线出现同样的效应，同样，资源曲线的后弯特性也会让资源依赖性的产品的供给曲线出现同样的特性，这会使得各种替代产品的供给曲线都有类似的特点，消费者是难以逃出定价体系的。而在不同的区域，供需曲线受到流动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均衡点的位置就要有很大的差异，在曲线出现后弯以后，这个均衡点的差异会因为供需曲线的弯曲而放大，两个地方交易的利益差别将是巨大的。

刚需下的需求曲线对后弯的供给曲线，或者是刚需下弯曲的需求曲线对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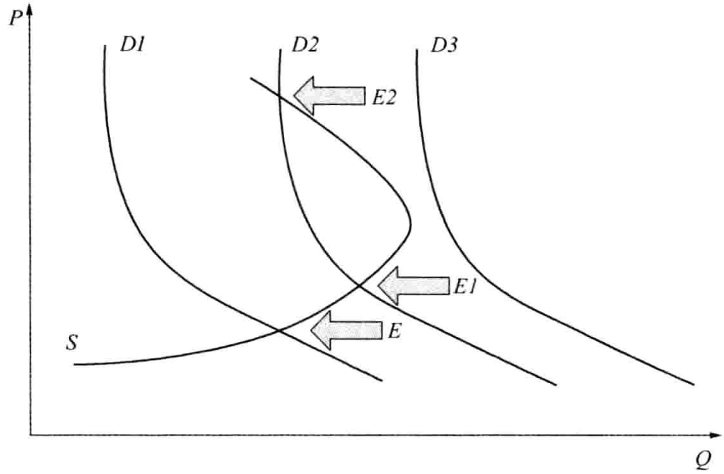


图 2－6 供给弯曲曲线的均衡点

注：在传统的供需曲线理论之下，价格越高供给越多，价格越低需求越小，这样均衡点是很容易形成的，但在供给曲线出现了后弯和扭曲的情况下，与传统的情形就要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看不同的需求曲线位置，如图当中的 D1、D2、D3。在 D1 的情况下是与传统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只产生了一个均衡点 E。而随着需求曲线受到市场的影响右移到 D2，则可能产生两个均衡点，也就是 E1 和 E2 对具体的市场参与者，在价值链上是 E1 还是 E2，则就是本书解释的定价权的影响。如果需求曲线再右移到 D3，则由于供给曲线的后弯，则不能形成均衡点，这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市场出清的崩溃，市场处于价格混乱状态，这就是我在《信用战》一书当中解释的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根源。石油涨到每桶 147 美元后被逼空，无法交割形成均衡点导致市场的崩溃，造成全球巨大的危机。

给曲线，甚至二者均有弯曲，发生这样的情况还会造成西方市场价格体系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后弯以后，随着价格的增加，供给下降的速度比需求减弱的速度还要快，或者供给虽然增加但投机和恐慌性需求增加更多，供需曲线是可以没有交叉点的，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供需平衡无法实现。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石油价格在 147 美元/桶高位时，石油的交割量反而下降，这导致西方的市场体系破裂，空头无论出多少高价都无法平仓。因此资源等曲线的后弯效应，就是 2008 年出现金融危机的根源。

那么供给曲线的后弯特性怎样让均衡点达到高位呢？对劳动力供给曲线而言就是要价格高才可以，这个价格高与流动性和地域性是高度相关的，而资源类的产品能够在高位得到后弯的利益，则需要价格高的同时有高位需求支撑价格，这里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本国推动消费的原因。但是他们也是能源的消费者，也不希望能源价格高企。想让资源国卖出更多的资源从而降低资源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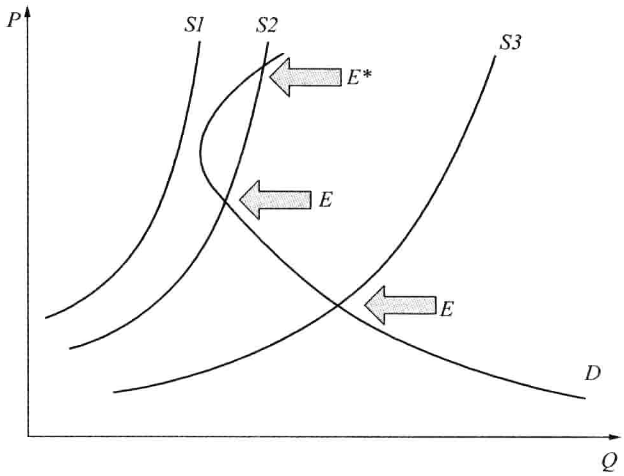


图 2－7　供给弯曲曲线的均衡点

注：在传统的供需曲线理论之下，供给需求是单向变化的，这导致均衡点是很容易形成的，但在恐慌性和投机性需求下，需求曲线出现了畸形，就与传统的情形就要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看不同的需求曲线位置，如图当中的 S1、S2、S3。在 S3 的情况下是与传统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只产生了一个均衡点 E。而随着供给曲线受到市场的影响左移到 S2，则可能产生两个均衡点，也就是 E1 和 E2。对具体的市场参与者，在价值链上是 E1 还是 E2，则就是本书解释的定价权的影响，就如对于粮食紧张的社会，人们由于恐慌而大量存储粮食，粮食的价格就是处于高位的，而社会保障完善下大家都不在家中贮藏粮食，粮食的需求则会降低。如果供给曲线再左移到 S1，由于需求曲线的畸形，则不能形成均衡点，这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市场出清的崩溃，市场处于价格混乱状态。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当年荷兰郁金香事件，大量的投机需求使得市场不能均衡而崩溃。

则需要提高资源国对于货币流动性的需求，只有在流动性紧张，需要货币的时候，资源国才能够卖出更多的资源。因此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制造混乱，提升他们对于军火的需求，买军火就需要更多的美元从而要卖出更多的石油，这里面的军事和政治博弈背后，存在资源定价权的实质影响。

对于价格的操纵，到底在供需曲线的哪一个位置上，这与流动性的多寡是有直接关系的。在金本位和贵金属货币时代，价格大面积地处于供需曲线的高位是会造成流动性不足的。西方国家形成了资本化的背后，就是西方因为历史的机缘汇集了全球的贵金属，流动性过剩使得劳动力和资源的供需曲线均处于一个高位；而对东方国家则供需曲线均处于一个低位。二者的市场均衡点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带来巨大的利益，不同的均衡点之下的利润率是完全不同的。同时，由于两个地域的流动性不同，供需曲线的差异因为流动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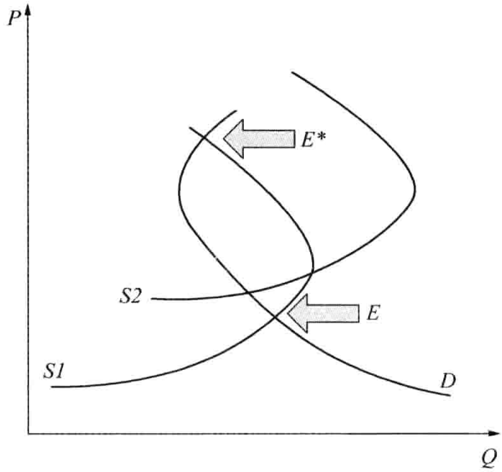


图2-8　后弯的供给曲线对畸形的需求曲线

注：对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出现了畸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由于曲线会弯过来导致再度交叉形成均衡点，在这样的情况下，S1 最容易出现两个均衡点。同样的也可能是如 S2 所表示的情况，后弯的空间曲线是有限的，只有一个均衡点，即恢复到传统供需理论。因此在同时考虑到供给和需求的后弯之下，产生定价权的可能性大增。同时这样的后弯来自于流动性的丰富，在不同领域的流动性丰歉，决定了形成均衡点的位置，成为博弈定价权的关键。

而无法改变，这样的均衡点差异是不能通过贸易消除的，贸易存在的作用不是让二者均衡成为统一的大市场，而是产业的重新布局，所有的生产将转移到这些处于供需曲线价格低端的国家或者地域去，从而使得发达国家或者殖民地生产均衡点处于供需曲线低位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或者宗主国生产均衡点处于供需曲线高位的产品，曲线后弯的均衡点差异带来的价格差异导致利润率的根本不同，使得双方的流动性在上述分工以后，不会通过贸易而趋于均衡。双方的流动性差异是这个曲线后弯带来的，因而使得这个剥削套利变得长期化。就如中国制造的产品工人取得收入一毛钱，企业利润率是3%以内，而美国则是工人取得收入3美元，企业利润率30%，工人的收入和企业的利润都是所在区域流动性的持续来源，二者存在这样的收入和利润差别，流动性怎么能够在贸易中趋于均衡呢？如果流动性均衡不了，供需曲线和均衡点、利润率等差别就将持续维持，这样的剥削效应也是不断维持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在金本位的时代，供需曲线的扭曲是不容易出现的，因为货币的供应量受到黄金等贵金属数量的制约，在价格处于过高的位置的时候，

是没有那么多的货币的，因此供需曲线在这样的位置上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难以看到的，能够见到扭曲本身就是要有足够的流动性。对此我们可以从通胀的角度去看。货币超发时的供需曲线呈现什么形态？通胀印钞、恶性通胀的时候，如果假定货币的价值没有改变的话，则超发货币下的通胀供需曲线就是扭曲的，所谓的资源供给曲线的后弯，则变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惜售”，所谓的“刚需”曲线的扭曲则是我们抢购的曲线。不同的通胀，反映在不同的曲线之上，对供给不足的通胀出现恐慌和投机，体现在“刚需”需求曲线的扭曲；对于需求过盛的通胀则产生惜售，供给曲线出现后弯。

这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扭曲，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屡次发生，与货币性质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牙买加协议》签署，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变成了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原来的每盎司黄金 35 美元变成了几百到上千美元，货币的购买力完全贬值，尤其是美国不断 QE 以来，美元的实际信用贬值很快，但美元的币值变化却不在供需曲线当中体现，人们依然认为美元是不变的，就如对于滥发钞票的恶性通胀下人们还认定币值不变并做出一个供需曲线来一样，这样的曲线必然是扭曲的。在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印钞模式开启以后，西方国家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印钞增加货币就是需求过剩，产生后弯的供给曲线就正常了，因为大量的资源在资源国出现了惜售的现象，在全球配置的市场下就是供给量对于印钞后的涨价供给减少了。同样的，由于西方货币的流动性输入，大量的财富外流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的通胀就变得很多，需求曲线的扭曲会更为多见。

回顾历史上的一些特殊的时刻，虽然贵金属的数量对于货币的总量有巨大的限制，但突然发现金银矿或者有外来流动性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而金融体系的发展也会造成流动性相对于前期的暴涨，这样的流动性突然增加的情况，在贵金属仅仅体现其货币金融价值不是其使用商品价值的时候，也是会产生历史上出现过的流动性泛滥的，这样的泛滥就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出现扭曲，会造成奇特的投机机会。某一种商品突然价格越高需求越大，投机和恐慌带来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在供给层面，人们的惜售使得供给反而是越涨越小。直到这个涨幅超过市场所能够提供的流动性，则会出现价格突然的坍塌——惜售者在抛售，投机者也在抛售，恐慌者更在抛售！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涨价和降价

的不同过程当中，供给和需求曲线是不同的、变化的，这曲线的变化也与在这个市场的流动性有关，涨价的时候吸引了大量的流动性进入市场投机，降价时流动性又恐慌性出逃，这样的现象依然是一个流动性决定的事件，解释流动性在供需曲线层面如何催生了泡沫，并且让这个泡沫不能在自由市场上实现市场出清迅速消减，解释了为什么泡沫不会在市场中自动地通过微观经济学假设消除，而是导致危机性的破裂。

这样的实例在西方殖民崛起时代就出现过，这就是荷兰的郁金香炒作故事：16 世纪中期时，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当时量少价高，被上层阶级视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投机商看中其中的商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并推动价格上涨。1635 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全民运动，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1637 年 2 月 4 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六个星期内，价格平均下跌了 90%。郁金香事件，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经济，此事间接导致了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荷兰的衰落。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这一次出现郁金香危机的荷兰正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荷兰进行了现代金融业的创新，就如对郁金香就进行了期权合同交易，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此时的荷兰是流动性最丰富的国家！还可以注意一下中国国内的相关炒作和泡沫，邮票、君子兰和牡丹鹦鹉都是与荷兰郁金香事件类似的炒作，背后也是在当时改革深化，中国市场化、市场流动性丰富、货币出现巨大贬值趋势的时候。再进一步讲，美国带给世界的次贷危机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炒作金融衍生品，难道不也是在这样的流动性极为过剩的背景下，出现的类似荷兰郁金香事件的危机吗？如果我们能够从货币的流动性与供给、需求曲线的扭曲层面分析，从它们对于定价权的影响上来认识，我们就可以在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下解读危机的本质。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另外一个供需曲线的后弯明显出现了，这样的曲线实际以前也应当是有的，这就是“牙买加美元”与“布雷顿美元”的差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这个曲线就出现了，只是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元的国际金本位还在，这个曲线在表面上是难以看到的。日本的 QE 已经存在但日元影响力不具有世界性，而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美国也搞 QE 以后，这样的曲

线扭曲就非常明显了，这就是资金或货币的供需曲线，资金或货币的供给量和货币的价格即利率也可以做一个供需曲线！在传统上，利率越高越能够吸引更多的货币资金，而利率越低则资金越少。同样在需求层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利率越高则资金的需求就越小，而货币利率越低则资金越不愿意参与。QE 当道，风险和收益产生了互相替代的效应，类似于在劳动力曲线后弯时劳动与休闲之间的替代关系。在风险和泡沫的因素下，利率越高人们越担心其中的风险，越担心是庞氏骗局，因而资金越是远离；而在利率低的地方由于流动性的充足和资金的安全，有更多的资金涌入。因此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利率不断降低，而信用卡利率升到高位，中国的利率也到高位，这样的资金供给曲线的扭曲，就产生了金融定价权，产生了多个均衡点，一个是风险利率的，一个是无风险利率的。在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下，发达国家利率极低而资金供给充分，发展中国家利率极高但资金供给不足，而高昂的利率最后形成产品的成本，使得资金充足的地方反而没有了通胀，资金不足的地方反而通胀压力很大。这些反常现象均是由于资金供给供需曲线造成的，而到底谁能够取得低的利率利益，就要看金融定价权的力量了，这样的体系差别导致流动性在全球无法均衡，无法自动平衡，这个扭曲就是给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记耳光。

综上所述，通过供需曲线的扭曲，可以看到曲线的后弯是不会通过市场出清自动恢复到正常曲线状态的，这差异就是定价权的来源。处于不同曲线位置的利润率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后弯曲线的位置，这差异也是剥削的利益来源，而决定处于曲线什么位置，则与流动性水平决定的价格高低有关。因此，这个后弯可以揭示在自由市场下怎么会有定价权，也可以揭示流动性与定价权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地区均衡点处于劳动力和资源供给曲线不同位置所带来的剥削和财富转移效应，还有就是供给、需求曲线出现后弯与流动性、印钞、通胀之间的联系。所以，对于定价权，我们是可以通过西方的经济理论进行解释的，只不过这些理论西方人在殖民时代就很清楚，但就是不出现在他们的经济学教材之中。

在这里我们看到，供需曲线的扭曲发生在劳动力、资源（包括能源、粮食）等领域，它们的供给曲线的后弯和需求曲线的扭曲就是定价权的核心，对此问题我们以后还会不断地论述。

延伸阅读　从新闻报道看石油供给的扭曲

这个背景资料是笔者说明供需曲线畸形的关键数据佐证，可以看到在石油达到147美元/桶高点以后，投机性需求（也就是说期货空头和持仓量）高涨，也可以看到供给的减少。报道称，欧佩克国家沙特的增产低于预期，尼日利亚的减产比沙特的增产要多，沙特本来是最听美国话增加石油产量的国家，而欧佩克有配额约束产量变化有非市场性质。我们再看一下油价高位时俄罗斯的减产就更清楚了，同时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石油价格再度高企的时候，俄罗斯再一次减产，石油的供给出现了明显的后弯现象。

主要的报道如下：

新华网纽约2008年7月11日电（记者陈刚）11日纽约市场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开盘后历史上首次突破每桶147美元。当天开盘后，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47.25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大幅上涨5.6美元。

2008年8月1日中国石油新闻中心报道：沙特阿拉伯原油日产量增加幅度仍然低于预期，7月份沙特阿拉伯原油日产量960万桶，仅仅增加了10万桶。本周尼日利亚骚乱导致该国原油日产量损失15万桶，此前该国原油日产量损失在100万桶以上。持续地区性骚乱使得国外资本从尼日利亚产油区撤出，该国原先是非洲第一大产油国，目前已经屈居非洲第二。7月上旬国际油价继续上涨，7月11日欧美原油期货突破每桶147美元。大型投机商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净空头部位下降。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发布的新公式计算，截至7月29日的一周，投机基金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中持有净空头660手，比前一周下降2980万桶。大型投机基金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中持仓量1220537手，增加3162手。

新华网莫斯科2008年4月24日电（记者赵嘉麟）国际文传电讯社24日援引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的消息报道，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石油开采量为1.21亿吨，比去年同期下降0.1%。另外，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3月，俄罗斯共出口石油6023万吨，同比下降4.6%。其中，对独联体国家出口883万吨，同比增长4.7%；对非独联体国家和地区出口5140万吨，同比减少6.1%。

2011年2月15日~2011年10月23日利比亚战争对世界危机后的格局。不仅因为这是和平时代的战争，更多的原因在石油上。利比亚的动荡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局势失控后，国际原油价格也攀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暴涨8%。

据路透社莫斯科报道，俄罗斯能源部2011年7月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6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从5月份的1026万桶下降到了1019.5万桶。

新华网纽约2008年12月22日电（记者陈刚）由于对原油需求下降的担忧仍然主导市场，国际油价22日下跌近6%，收在每桶40美元以下的低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上周宣布将从2009年1月1日起削减原油日产量220万桶，使该组织从今年9月起的减产总量达到420万桶。但欧佩克的决定并未抑制国际油价的跌势，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对一些预算紧张的欧佩克成员国能否协同实现减产目标心存疑虑。

第5节　货币结算权与金融定价权

当今国际金融霸权都将货币的结算权放到了无比重要的位置上，而中国的人民币走向海外，力推和看重的就是货币结算权的比重，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结算权是比外国储备这些货币更看重的因素。到底结算权如何发挥其价值，在很多经济理论当中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是笼统地讲结算权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权力，美国的举动也是如此，谁敢不以美元结算石油，谁就是妖魔！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下结算权的力量，结算权是与货币发行权和定价权紧密挂钩的。

货币结算简称“结算”，是由于商品交易、劳务供应和资金调拨等经济往来所引起的货币收付行为的清算。而国际贸易的货币结算是两国不同货币之间的清算，到底以哪一国或者是第三国货币进行结算，则是一项货币权力，选用的货币就叫做结算货币。

在贵金属时代，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也不止一种，金、银、铜都可以是货币，而以什么货币进行结算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没有结算权的概念；而在本位货币

时代，国家发行的纸币被定义为唯一的市场结算货币，国家间的结算则以本位货币背后所对应的贵金属为准！到此国内的货币结算权归了国家央行，而国际层面谈不上什么货币结算权。但贵金属货币的数量有限，西方殖民经济的发展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货币结算则变成了金汇兑本位制，也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要以宗主国的纸币为结算标的，宗主国保障其纸币的购买力与本位金属挂钩，殖民地、半殖民地丧失了国际货币结算权。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殖民地金汇兑本位制的全球版，从此全球其他国家丧失国际货币结算权，美国在二战后起劲争取全球殖民地独立，而全球在美元结算权下与当年的殖民地实际情况差不多。在这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贸易能够不以美元而是以双边货币来结算的比例是很低的，只有英国的历史遗产（英联邦成员国）和美国的对立面（苏联—东欧集团）还有一些。

而在现代的信用货币时代，欧元诞生了，苏联解体了，日本的国际化战略虽略有小成，但日元大多为日本在世界各地的财团内部结算和政府间日元贷款，美元依旧是世界霸主，而且不承担维持国际金本位义务，这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带来了空前的利益，造成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迫使苏联解体从而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元霸权达到顶点。而随着苏联解体，欧洲人出于对美元独大的不满，出人预料地放弃了历史旧恨，整合出了欧盟和欧元，有了欧元俄罗斯才能够借助石油复苏并且一再威胁以欧元结算石油来削弱美元霸权。

对于美元结算权的价值，很多人简单直接地认为就是美元结算，如果汇率贬值了，你就亏了，美国赚钱了！美国不断 QE、不断印钞，美元不断贬值，这个结算权就带来不断的利益。绝大多数人持这样的看法，就连大多数经济学者也不例外，但事实真相真就这样简单吗？别忘了美元还有升值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买美国产品的时候，比如芯片、软件等，在这些出口商品上美国岂不要吃亏？这个结算权就只能在逆差的时候起作用吗？美国争取结算权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是美国产品行销世界的时候，现在美联储 QE，美元不断贬值，但当年二战后不久的时候是国际金本位，美元是不贬值的，既然如此，美国为啥会自讨苦吃？而如果把美元的结算权变成一个汇率变化的固定走势，那

么世界各国为啥不放弃美元，为何美国的汇率不会大跌，为何美元指数相对稳定，如此等等，不是哪个简单逻辑能够解释通顺的。这里面有金融定价权的力量，结算权最后形成了流动性，变成了定价权！结算权变成定价权不假，但也不是这个简单的逻辑。这个简单的逻辑讲的还是贸易交易物品的定价权，而结算权带来的实质不是具体物品的定价权而是金融定价权，对此真正的本质，人们需要认清楚，才可能在金融层面博弈全球的定价权。

结算权的重要性在于带来了额外的流动性，流动性决定定价权，流动性的溢价不能通过市场出清来均衡，这才能够保障美国不断地印钞宽松而定价权不失，既不通胀也不使汇率快速贬值！这流动性首先来自结算权带来的货币衍生！由于要用美元结算，这些国际结算大多数还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在美国以外的银行之间进行，但结算就需要媒介货币，这些结算的媒介货币是可以再一次金融衍生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之外的美元会再一次衍生，而且这些新衍生出的流动性是不受美联储控制的。就如我国银行给储户多少美元的存款，只不过是美元结算的存款而已，并不意味着银行就要有那么多的美元，银行的美元只要能够应对日常散户兑付就可以了，这个比例类似金本位时代黄金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关系，是可以放大很多倍的，银行存款总额肯定比美国发行在这个银行的美元多，所以对于存储于美国之外的美元就叫做广义货币 M3，这比在国内的广义货币 M2 要大。结算同时还要衍生出来以美元结算的可支付债券，这些能够兑付美元的债券背后对应的可以是国际贸易的应付款，也可以是美元结算的货物的仓单等。可支付债券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些市场上的可支付债券也具有货币性质，按照广义货币的分类也是属于 M3，这也是结算权对于 M3 的贡献。

国际贸易当中结算的货币可能没有直接表现为美元，但很多国家为了贸易市场的稳定实行绑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如果汇率被绑定或国家以美元为储备发行货币的话，这实际上还是美元货币的衍生，这样的衍生让美元的发行者控制的流动性规模大幅度地放大，如果还能自由流动，这衍生出来的货币就是一种广义的美元。这样的原理就是“蒙代尔三角”所谓的汇率、外汇自由流动、独立的央行货币权力三者只能得其二。广义货币 M3 和 M2 的差别就是发行货币的央行对于这些货币存款的义务是不同的，对于可支付债券和海外存储美元的银行，央行是没有义务做现代金融体制下的最终贷款人为境外金融机构发行新

货币提供流动性分散风险的。这使得很多国家存在美元依赖，如果离开了美元，其国内的金融市场是要被挤兑的。

结算权另外的贡献就是金融衍生品了，在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当中，汇率风险是非常大的，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就诞生了汇率掉期 NDF。同样的对美元结算的可支付债券、仓单、应付款等还诞生了各种金融衍生品，包括这些债券的利率掉期和信用掉期，货物的期权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等。金融衍生品本来是为了对冲风险和套期保值的，但这个市场要实现上述功能就必须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就需要吸引大量的投资者参与，这些投资者也带来货币供给。这些金融衍生品本身还具有货币性质，按照广义货币的分类，他们就属于广义货币 M4。而由于有 M4 等金融衍生品的一系列套期保值存在，美元超发是不容易通胀的，是被套保的，但为这些套保买单的，就是不得不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的国家了。由于套保的存在，商品的近期与远期的价格的差别就被压制在一个利率的空间之内，美国以及日本的 QE 带来的低利率政策和欧洲实行的负利率，虽然大量发行了货币，但压低了利率，这个利率控制了远期物价能够通胀的规模，而整个套保是一个零和博弈，美国、日本、欧洲如果能够通过套保控制国际贸易的期货与现货的差别，也就压低了国际相关商品的价格变化空间。在印钞下就压低了通胀，则为他们买单的必然是不能进行这样套保的非国际结算货币，货币的国际结算权带来的金融定价权产生了巨大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元是一种媒介，使用这个媒介的话不是白用的，是要付费的。

广义货币 M3 和 M4 都是流动性，这些流动性是要影响商品交易的定价权的。通过衍生和衍生品市场，原来的商品交易金融化，M3 和 M4 流动性作用于这个金融化的国际交易市场，产生了国际金融定价权，美国取得这个国际金融定价权并成为金融霸主。美国大量的货币超发结果是美国的汇率和通胀并不大，M3 和 M4 市场吸纳了大量的流动性。对于这些，美联储是非常清楚的，而美联储在海外美元衍生 M3 暴增和金融衍生品 M4 暴增的时候，分别表态对于 M3 由于不能提供比 M2 更多的美国国内信息所以不公开了，注意这个 M3 比 M2 本来多的就是外国美元衍生货币，当然对其国内不重要，但对国际上的各国经济和对国际贸易、汇率的影响却至关重要。美联储同样表态对于金融衍生品不监管，这不监管意味着金融衍生品可以随意炒作，同时衍生品的数据是不公开的，因

此外界也无从推算 M4 的数量，只是在 2008 年衍生品危机后的美国机构研究文章当中见到一些破碎和过时的数据，按照西方人的标准，不透明就是有阴谋。因为 M3 和 M4 美联储的官员知道，他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主导世界财富再分配向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从而决定全球的金融定价权，在这个金融定价权和金融霸权下，美联储才有印钞权，才能够不断地 QE 宽松而不通胀、不汇率贬值。

这些结算权带来的货币衍生会让货币的供需曲线弯曲，因为使用美元结算，你就需要大量的美元流动性，需要有大量的美元充当货币结算只能流通于市场上，这些美元需要低风险和高流动性，这些流动性的低风险需求使得持有美元的目的不是为了收益，而是因为风险和流动性的充足。所以美国的一些领域内，货币供给量反而是利率低供给多，原因就是利率低，货币的风险更低或者流动性更大，因此美债的收益率即使是低于美元存款，美国国债依然受到追捧，在美国国家信用评级下调之后，美国的国债反而可以上涨，反而收益率降低了，这些都是这个结算权和金融定价权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结算权的价值在于金融定价权，这个金融定价权的核心是结算权代来的流动性，金融定价权对世界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并可以影响其他商品的定价权。** 中国人民币走向世界，人民币的结算权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应当尽力推广海外人民币的结算规模，人民币才能够真正实现国际化，才能够在国际金融定价权当中有发言权。

延伸阅读　远期外汇掉期 NDF

NDF，是指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on-Delivery Forward），它是一种远期外汇交易的模式，是一种衍生金融工具，用于对那些实行外汇管制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离岸交易。在交易时，交易双方确定交易的名义金额、远期汇价、到期日。在到期日前两天，确定该货币的即期汇价，在到期日，交易双方根据确定的即期汇价和交易伊始时的远期汇价的差额计算出损益，由亏损方以可兑换货币如美元交付给收益方。

其做法是交易双方在签订买卖契约时“不需交付资金凭证或保证金”，合约到期时亦不需交割本金，“只需就双方议定的汇率与到期时即期汇率间的差额”

从事清算并收付。

NDO（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选择权），操作逻辑与 NDF 的概念一致，只是从远期外汇的概念延伸到选择权交易而已。

NDF 市场是一个离岸市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以从中参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人民币币值并没有实质影响。

人民币 NDF 市场是存在于中国境外的银行与客户间的远期市场，主要的目的是帮未来有人民币支出或人民币收入的客户对冲风险。但是到期时，只计算差价，不真正交割。结算货币是美元。由于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对冲基金能够流入中国内地直接炒作人民币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是一种常见的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它不但被广泛应用于外汇市场，也应用于债券投资等其他场合。

远期合约指双方同意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照固定价格交换金融资产的合约，远期合约中需要规定标的物、有效期和执行价格等内容。

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的区别主要在于远期合约的灵活性大，而期货合约则是标准化合约。由于期货合约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因此履约风险要低，流动性也更大。远期合约由于灵活性大、流动性差，因此一般在场外交易，而期货合约则一般在交易所交易。

第 6 节　借贷消费、定价权与流动性穿越

现在扩大消费需求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词，美国也进行了 QE4，标榜扩大消费，世界各国都在讲扩大需求促进消费，但是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大量消耗光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吗？消费不仅仅是需求，消费是要由需求和供给共同来完成的，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对此西方专家们的解释是西方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能够让消费者在今天花未来的钱，使用未来的钱来提振今日的经济，让今日过剩的产能找到出口，让今天的危机得以渡过。而笔者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则是借贷权利本身的不同，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定价权的问题，流

动性穿越带来的意义不是促进经济而是重新分配财富。

关于花明天钱振兴今日经济的说法，是当今最流行的理论之一，被称作振兴当今经济的关键因素，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提这个经济逻辑，陈志武等华裔美国专家特别热衷于给中国人布道。发达的现代金融体制确实可以把未来的钱和物放到交易的平台上来，使得今天就可以对未来的事物进行交易，但是这样的交易却不能把明天的财富变成今天的各种物质，未来的物质能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让人们消费吗？如果这个穿越能够实现，按照现代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意味着超越光速的时空出现了，能量和物质可以从未来穿越到今天，这完全违反我们的自然规律。要知道钱的背后是信用，所谓“钱”只有在能够真的对应于劳动成果的物质和财富时，才是真正的钱。

很多人说“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这一逻辑能够实现的原因在于现在有大量过剩的产能，如果我们能够花未来的钱，则未来的需求可以让当今过剩的产能来满足，所有的产能就达到了高效率，这样就等于实现了产能和经济能力的穿越。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产能可以是过剩的，不过现在过剩的产能不能实现的关键则是其所需要消耗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包括各种矿产、空间、能量等。产能确实过剩，但如果照这些产能进行生产，则资源是不够的。很多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例如农业的种植、养殖和水电等都是可再生的。还有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总不能把子孙的资源都用光了吧？这样的消费有的还是要付出环境代价的，多消费会多污染，你现在都消费了，我们的环境是受不了的，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这些东西都不可能穿越过来。如果你要消费的财富不能穿越过来，那么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就是一个忽悠人的谎言。

对于花明天钱办今天事的理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有限度，今天为了刺激经济，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情，到了明天怎么办？如果明天是要为我们今天的花费而还账的话，明天的消费又在哪里？现在是超前消费刺激经济，到明天需要还账的时候经济怎么办？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给出的答案就是明天还可以花后天的钱嘛！似乎这个寅吃卯粮的故事可以一直演下去，但是不要忘记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当一代人逐渐老去凋零的时候，这个明天推后天的游戏就要过去了，这代人年轻时候的消费怎么还账？这个时候还要养老，养老钱在哪里？西方社会会信誓旦旦地说养老是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但社会保障体系的

钱哪里来？是人们年轻的时候进行养老计划攒下来的，还是收取现在年轻人的税收来支付？或者是政府印钞来支付？这样大的养老负担实际上在西方就是依靠类似庞氏骗局的机制来实现的，依靠不断增加的年轻人和移民的缴费来实现的，在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逐步退休的时候，在西方进入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现实下，西方社保危机就开始了，这保障支出已经让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寅吃卯粮的穿越游戏本身是流动性与财富相脱节的。

另外，再寅吃卯粮也是有限度的，总有要还款的时候，如果不能偿还就有问题了。西方国家老百姓看似不直接攒钱，但是他们为了养老加入各种养老计划，实际上是间接攒钱，他们现在透支未来花的就是百姓养老的钱。美国国债大部分都是其本国养老基金买去的，中国号称外来头号购买者，只持有 8% 的美国国债，美国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债务呢！今天透支把养老钱也花了以后，到时候怎样养老呢？今天把明天的钱花了，到老去的时候怎么办？有专家说人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少钱而老了钱非常多，因此这样花没有问题，但世界上有多大比例的人群是到老了以后收入远远高于现在的呢？体力劳动显然是年轻壮劳力更赚钱，而 IT 等高技术行业也是年轻人的天堂，真的能够依靠经验老赚得多的人群只有管理者等少数职业，所谓“老了以后高收入，可偿还年轻时花明天的钱”放到社会普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成立。还有人说政府可以收税替人们养老，但政府的税收实际上就是收取正在劳动的人的财富来给老人养老，是要让正在工作的人为退休老人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付出以后，现有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就没有了，他们交税给现在的老人养老，其实是政府把他们的消费能力征收了，而且除了把他们的透支消费都给抵消了以外，还要增加额外的政府管理成本，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因此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各国都不愿意紧缩加税来维持其社保体系。

财富实物不能穿越和人的寿命有限这两点就决定了所谓的“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西方逻辑是有问题的，所谓的刺激消费要花明天的钱是一个伪命题，钱花了以后如果真的要让他们明天还钱是不可能的，明天的财富也不会过来。这个没逻辑的说法是一个欺骗世界的美丽谎言。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段子，讲的是中美老太太买房子的事情，故事说美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贷款买房，到

死的时候刚好把房贷还完，而中国老太太则攒钱一辈子，到死的时候终于买上了房子。这个故事的差别就是美国老太太享受了一辈子的好房子，而中国老太太则一辈子没有好房子住。由这个故事开始，有人就得出了必须尽早贷款买房的结论。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去贷款，按照现在的金融制度，大家也都可以贷款出来，但是房子没有啊？房子是要一栋一栋地建造的，你把款都贷出来以后买不到房子，必然的结果就是房价的飞涨，这个结果不是你能够提前消费明天的钱，而是社会要为这个模式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现在房价飞涨，但是购房人群的年龄却在不断的降低，确实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了，却付出了房价泡沫的代价。

在上面的段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能够贷款消费的人群和必须攒钱的人群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所谓的“今天花明天钱”的背后就一定是要有人在今天攒钱，有人推迟消费才可以。也就是说，有人花明天的财富，但明天的财富不能穿越到今天，他们所花费的实际上就是今天积攒财富等着明天花费的人群的财富。因为特定时间段内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即使是产能过剩，但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博弈的就是谁能够抢先扣动扳机去消费！美国所谓的“花明天的钱”，实际上就是要先消费世界的资源和财富，而让世界其他人群被迫去攒钱。美国银行全球财富和投资主管约瑟夫·昆兰曾撰文指出美国从中国输入最多的东西既不是芭比娃娃，也不是苹果 iPods 播放器，而是中国的储蓄或现金。这里不是未来财富穿越到现在，而是流动性的流入流出。能够主导流动性流向的是定价权，原因就是中国买不到合适的东西，这些钱是花不掉的，定价权被控制，买什么什么就涨价，难以有足够的资源储备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那么储备货币就是必须的了。

在原来的社会，谁要先消费财富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利率和物价的变化，先消费贷款要支付利息，而攒钱后消费的人可以得到利息，也就是先消费的人要给后消费的人一定的利益。同时在大家都想要先消费的情况下，物价就可能高企，先消费的人就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后消费的人则可以便宜地买下来。这样的经济过程是一个天公地道的，但是现在如果还维持这样天公地道的经济运行模式，则刺激所谓“消费”的美国人是得不到好处的。现在美国人要干的就是不但要先消费世界的资源，而且还要不付代价，更要得利，所

以美国不断印钞，人为压低利率，使得先消费支付的利息极其低廉，同时在印钞下世界进入通胀，后消费的人反而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掠夺过程。美国人所谓的花明天的钱刺激经济，就是这个掠夺过程的美丽外衣。而付出代价的高低，就是一个核心定价权的体现，这就是金融定价权。

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习惯是勤俭节约，不是超前消费，原因就是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总量的变化是有限的，经济却可以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货币资本不足、利率是很高的，同时由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大大快于货币总量的变化，货币还处于一个长期通缩的趋势之中，这样的模式下攒钱肯定是得利的。但是在现代货币模式下，货币总量增长是超过经济增长的，甚至西方国家还在通过人为印钞来捞取货币利益，利率极低且通胀成为长期趋势，因此超前消费成了主流。但是攒钱是靠自己，谁都可以选择攒钱是一个公平的方式。而超前消费却要看他人的脸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金融体系，在全球市场当中的不同地位，都可以决定谁有超前消费的权利。这是一个丛林竞争和充满不公的环境。在这个丛林世界中，有人超前消费了，在当今低利率和通胀的条件下，就是掠夺了他人的利益；有人抢先享受了财富，还要他人承担通胀的损失，这不是剥削压迫是什么？因此这些能够超前消费的西方国家幸福指数高的背后，就是全民超前消费占有全球金融利益的权利。就如我们都要贷款买楼的背后，是贷款相对于通胀的实际负利率和楼价的不断上涨，如果贷款是很高的正利率且楼价维持不动，谁会借高利贷来消费呢？因此拥有流动性的主导权，取得信用体系内的金融定价权，就可以再分配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取得重大经济利益。

历史上“花明天钱办今天事”的逻辑是从战争开始的，英国等国通过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可以在战争时代宽松货币和借贷国债，以金融力量把社会资源调动起来，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这同样面临怎样偿还的问题。在当年的金本位时代，是不鼓励全民这样消费的。这个战争借贷实际上也是不准备偿还的，如果国家打输了，政府就要破产，自然是没有办法偿还，如果打赢了则有战争赔款和战争红利，是由敌国偿还的。如果是要自己偿还而且要付利息，那也就不必打仗了。而刺激消费和印钞的超前消费这样的美好说法，是在金本位破裂以后各国竞争性贬值以后开始的，这样的刺激消费是带有竞争性贬值的背景的，是通过贬值来偿还消费的！通胀则是一个货币定价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花明

天的钱”这样美好的说法的由来大家也要搞清楚，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一个忽悠人的美好童话，背后定价权主导的财富博弈才是真章。

美国可以印钞且不通胀的背景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要美元，如果其他国家同样印钞花明天的钱，那么结果就是灾难，就如我国前两年央行刚刚宽松一点儿，人民币的汇率就连续触及跌停位置。因此中国很多时候是被迫攒钱的：我们与美国不同，美国有美元霸权可以随意印钞；我们也与欧盟的货币国际合作不同，欧盟国家可以主要储备黄金而不是美元，而我们必须要有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必然要以国际结算货币美元为主。我们的国际金融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攒钱，这就是我们不拥有金融定价权的代价！这个攒钱的过程就是被掠夺的过程，也是美国能够超前消费的基础，但美国超前消费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攒出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债的“大债主”是养老基金。美国人不直接攒钱养老，但是美国人间接攒钱养老，那就是美国人都要参加养老计划和缴纳养老保险，这些养老钱也成为被掠夺的对象，现在养老钱已经被掠夺，损失惨重，政府又不得不补贴养老，这才是美国当今危机的根源。

我们现在讲刺激消费，虽然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被迫攒钱的命运，但是却能够让我们也多消费一些资源，在全球每年有限的资源供给当中多占有和消费一分，所以扩大消费还是有意义的。但在看清这个矛盾症结所在之后，我们就应当看到中国扩大消费的关键点在于资源的供给，在于我们能够占有和支配多少资源，就如我们的汽车销量和保有量不断增加，能够保证这个汽车消费的是我们能够买到多少油和能够建设多少路，这需要的是资源的保障。因此中国扩大消费实际上是保障供给而不是提高需求，如果没有供给的保障，就会如房地产那样，造成通胀，造成泡沫，成为西方渔利的对象，这样的扩大内需就是陷阱。而保障资源供给的博弈，就是与定价权的所有者争取利益的博弈，以中国的庞大需求相对于资源市场的规模，要想资源供给不被对方高价勒索，则必然要有足够的定价权才行。西方对于中国刺激消费，把中国的视线全部引向扩大需求，但是需求过剩以后没有供给就是泡沫和通胀，背后就是陷阱。西方对于中国在世界寻找资源和保障供给的行为，却是百般阻挠，其中的差别我们需要看清楚。

美国能够这样印钞，背后同样需要全球资源供给体系的保障，需要世界定

价体系的主导权，这是美元霸权的保障。在 QE2 以后，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当时笔者曾预言美国不会推出 QE3，也就是因为资源价格的暴涨，现在美国能够有 QE3、QE4 的背景也是资源价格的回落，而美国开始缩减 QE 的规模，一样是因为资源有涨价的压力。美国如果不能让美元与油价保持稳定，另外一次石油危机就开始了。石油危机是美国人起的名，实际上应当是美元危机，美国能够这样印钞的根本就是石油价格的稳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黄金美元被石油美元取代，石油价格才是关键，因此美国人打出页岩气、页岩油这些牌出来，开采页岩中的油气而引致的水资源问题、污染问题、产量稳定性问题和诱发地质灾害问题等都被选择性失明，这是其渡过危机的重要手段，美元的价值就在于其维持的全球资源体系。2008 年石油价格涨到 147 美元/桶，实际上是另外一次石油危机，这才造成了 2008 年金融危机。能够印钞而石油价格不涨，才是美国可以持续印钞和持续消费的关键。

美国 2008 年开始的危机发展深化下去如果要破局，还是要着落在石油价格的崩溃上。但美国有其价格体系来维持其石油价格稳定，也就是欧佩克的配额要起到作用。对于欧佩克的配额，美国是有巨大控制权的，美国对石油的定价权也是有发言权的，因此他才能够允许欧佩克这个组织存在，但中国却可能要为这个配额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没有配额是无法按照国际油价买到石油的，石油不是你有钱想买就可以买的。因此石油供给体系不是完全市场化的，是被国际组织的价格体系严密控制的，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不对等。国内有人过于迷信国际市场是有问题的，世界的各种资源也如石油一样，被各种长协、股权、定价机制所绑定，世界的铁矿石博弈就是另外的例子。除此之外，中国所需要的各种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供给都受制于人。这些资源的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背后是要有强大的军事为基础的，美元的霸权也是军事霸权，美国可以透支消费保障供给是需要军事实力的。我们还以石油供给为例，美国打了伊拉克让伊拉克不受欧佩克配额限制，欧洲为此打了利比亚，取得了利比亚的配额，如果再把伊朗的欧佩克配额掐死，中国的石油进口就会异常被动。虽然俄罗斯的石油不受配额限制，但俄罗斯的产量增产潜力有限，能够维持现有水平就不错了，且俄罗斯是高价卖油，同时还要考虑平衡各国，给中国的石油不多。中国大陆油田产能已经在衰退，南海是中国石油的增长点，因此南海异常关键，也是东

南亚小国的石油资源根本，因此很可能要有殊死的博弈。中国是否能够消费资源，需要中国有强大的实力！

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借贷消费带来的是流动性不均衡，造成流动性局部过盛和充裕，在定价权层面流动性还要带来巨大的利益，这里不光是流动性穿越过来以后的贬值和归还问题，其带来的定价权的意义一样是重大的。由于流动性的穿越带来丰富的流动性，则劳动力供需曲线就会向有利的方向弯曲，能够借钱的劳动力会有更多的休闲，不用拼命攒钱，从而在后弯的劳动力曲线上处于劳动力的高价格。西方人就是通过不断借贷消费和借贷的低利率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而且失业以后也不是还钱而是破产赖账。明天的钱花了、今天的事情办了，但明天该用钱的时候只要赖账就行，还可以找救济。这里攒钱买房子的人最有体会，在攒钱阶段是又要攒钱又要付房租的，真的贷款买房了，房租不要支付了，也不攒钱了，只还款月供了，反而是轻松一些了。如果中国的利率如美国一样低，月供至少还可以少30%，那就舒服多了。因此这流动性穿越带来的定价权意义是会带来更多的财富，至于什么样的劳动力差价和流动性左右定价权，其他的部分会分层次论述。

在这个世界，谁有权先消费和谁不得不攒钱，实际上是谁能够获取资源供给的问题。弱者没有能力获得供给，多余的钱就只有攒着，只能拿着货币，最多买买国债；这些攒起来的钱花不出去，就是给强者提供超前消费的保障，强者卖给弱者债券或者使用弱者的存款超前消费。中国贸易顺差积累起巨额美元收入但是又花不掉，被迫成为外汇储备，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刺激消费没有错，但在扩大消费这个矛盾面前，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需求，而是供给，中国的崛起面临的是资源瓶颈，是我们的经济和消费需要更多资源保障的问题。这个经济关系也必须看清楚。我们需要抓住主要矛盾，也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主导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定价权的力量！这里能够花明天钱的人，本身就是拥有定价权的一方，只有拥有了定价权，才可以让穿越过来的流动性不会导致价格体系的失控，给自己造成损失，所以能够搞这个流动性穿越的，也是对于市场价格体系拥有足够权力的人，而定价权本身又来自于流动性的充裕，流动性充裕再促进定价权。这结果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通过

这样的借贷消费，原有定价权的一方可以维持定价权，不断取得利益，从而让流动性的差别无法通过套利消除，套利无法均衡，就是定价权存在的体现。

因此对于西方扩大消费发展经济的逻辑要认清楚，中国扩大消费的关键点在哪里也要认清楚，这里的掠夺和博弈大家在面子上都是不说的，也是不能说的，定价权在其中起到了主导力量，但谁认不清谁就要被欺骗了。这里我们的资源供给才是关键，需求不是关键，相关的定价权主导了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保障资源供给的博弈在全球是异常激烈的，不仅仅是经济，更有军事上的博弈，中国老百姓要能够消费，实际上与国家是否强大，是否在全球价格体系内有相应的定价权是密切相关的。

第 7 节　定价权和劳动资源二维价值论

定价权与主观价值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制造在全球定价权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关键，“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 2010 年 5 月 16 日在第二届国际商务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就降价。”这番表述一语成谶，成为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无奈的调侃。中国产品的价格在世界上处处被打压，产品的利润长期处于接近于零的地步，而且这样的挤压不单单是对于一个公司或企业，而是变成整个产业和行业的问题，对此我们对于国际上的定价权的问题要有更深入的认识。

认识定价权就离不开价值论，我们长期以来信奉的是客观价值论，价格是要围绕价值做上下波动的，而价值的多少是客观决定的，基于这样的哲学认识，我们实际上是谈不到定价权的，因为价值既然是客观的，价格也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的平均值离不开价值，哪里来的定价权？我们对于价值的认识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种认知，对于价值的认识，世界上是有很多学说的，而定价权成为一种人的主观权力的时候，我们就离不开对于价值主观层面上的认识，起码是在客观价值论上认识主观对其的影响。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了解一下世界上主观价值论的主要观点和流派。从门格尔引发边际革命，认为价值来源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起，边际效用递减就是主观价值论的核心概念。这一心理规律普遍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简单来说，主观价值就是消费者在主观上愿意为商品支付的货币金额。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通常会表现出以下几种消费需求：生存、便利、舒适、娱乐、审美、尊享、健康。其中大部分属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是主观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之前斯密、约翰·密尔（包括后来的马克思）认为价值由一般劳动时间决定。后来马歇尔说，主观效用论相对消费者而言，劳动价值论相对生产者而言，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统计平均一下，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就出来了。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商品中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劳动价值论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是劳动时间。而主观价值论把这种共同的东西归结为效用，即商品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前者是对商品中共同东西的狭义理解，后者是宽泛的理解，这里双方概念的差别也是不能忽视的。在主观价值论下参与交易的主体对于价值的主观认知都是不同的，因此产生了价值分布，而这些主观价值进行一个统计就可以得出按照卖方价值分布愿意出售的供给曲线和按照买方价值分布愿意购买的需求曲线，曲线的交会就是均衡点，均衡点不是具体的成交价格而是一个统计平均的结果。我们研究经济学，就是对于全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一个数理统计的学科。

我们相信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商品的定价也应基于其劳动成本（包括人们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经常是偏离的，跌破成本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而定价权则是说价格偏离价值且出现了一种持续的力量，使得能够掌握这样的力量的群体获得了定价的权力，这个定价的权力也离不开价格形成的机制。在市场当中，有五种价格形成机制，即平台机制的买方平台、卖方平台，非平台机制的讨价还价、招标、拍卖。在主观价值论下是买方认为的价值高于卖方认为的价值，这个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卖方价值到买方价值之间的价值区间，但是到底在价值区间的哪一个部位成交却是由交易机制所决定的，谁能够主导这样的交易机制，谁就有定价权。

对于定价权在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上是有不同理解的，主观价值论认为实际上定价权正是在确定价值，而客观价值论则强调定价权下价格怎样产生

偏离价值的力量。对于这样的差别，笔者认为是带有殊途同归意味的。对于主观价值论所探讨的是价值主观因素之外的客观内容，而对于客观价值论则是在讨论客观价值下价格的主观因素。

是什么力量让价格总是偏离一方而让另外一方有利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主观确定价值方面总是对于一个交易方向有利呢？这就是本书讨论的问题，笔者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定价权都是以劳动力定价权、金融定价权为核心的，决定定价权的核心因素是货币流动性，货币流动性的不均衡使得流动性好的一方具有系统性的优势。而这些系统性优势的来源，与一方占有资源的优势是分不开的，价值是由劳动和资源共同决定的。

熵经济学

笔者在2009年写了《资源角逐》一书，最终于2010年3月出版，书中最后两章阐释了笔者以家族传承和自己研究摸索出来用以操盘分析经济走势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以熵和二元价值论为基础的。对于这部分理论，笔者在那部著作当中已经详细论述，这里扼要介绍一下其中的观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资源”是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前者如阳光、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动物、矿藏等；后者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经过劳动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而这些要素怎样从抽象到非常具体的定量，笔者认为负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量，经济学当中也是贯穿着熵这个概念的。

在熵（entropy）增加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下，资源以熵为维度来衡量熵永远增加意味着可用的资源不断减少，人类可用的资源将是有限的。自然科学应当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古典经济学时资源不计算价值的背景是建立了能量守恒和质量守恒，但是在发现熵增加以后，熵的价值必须要计算在经济价值之中。因此应当通过人类的劳动和地球的熵两个层面来定义价值。以熵为标准的资源版图是国家、民族生存权。

古典经济学说的基础假设就是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循环往复的，如果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不计算资源的价值的经济理论是难以存活的。可以忽略资源价值的基础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源是在人类活动中转移的，因为质量和能量都

是守恒的，不会额外产生也不会额外消灭，但他们没有计算转移的成本！结果就是做出来一个资源的永动机。在热力学确定的今天，由于熵的永远增加性，这样的“资源取之不尽，可以循环产生”就不存在了，资源在人类每一次活动中的转移都要导致熵增加的结果，熵的增加无可替代。因此资源的每一次转移的过程中都要付出熵的代价，资源的转移不是没有成本而是成本巨大！

这里我们可以举例进行说明，一种观点认为在世界 2% 的铜矿被开采光了以后，世界还有 1% 的铜矿可以开采，这样的说法引申开来就是世界还有 1‰的铜矿，还有废铜可以回收，还有其他材料可以替代等！但是认识的高度就在于熵的概念，我们开采 1% 的铜矿所需要的能量消耗肯定要高于 2% 的铜矿，所造出的熵增也要大得多，这样的消耗就意味着熵的代价导致的支出。更进一步讲，我们早就有技术可以把百万分之几含量的元素给提取出来，就如居里夫人当年提取镭一样。对于世界铜从 1% 富集到 2%，本身就是一个熵降低的过程，所有的矿藏本身就是该元素的一个富集熵减的过程，矿藏的价值本身就在于熵的价值！而我们提炼 1% 的铜矿和提炼 2% 的铜矿本身所消耗的熵也是不同的，各种替代的材料本身也是要消耗熵的价值造成熵增的。因此以熵为尺度，我们就可以把各种可以替代和混淆的因素都给屏蔽，熵增加原理确立了资源财富在转化中的代价，也确立了资源的有限性，因为回到熵增加的本质上是不能替代的。美国农业部（USDA）曾公布乙醇能源回报率报告。2002 年生产的玉米乙醇为 83961 英热单位。产生的副产品为 14372 英热单位，而消耗能源为 77228 英热单位，在 2004 年需要花 72052 英热单位能量来生产 1 加仑乙醇，但到了 2010 年仅需 53785 英热单位能量就能生产 1 加仑乙醇，而副产品则为 20409 英热单位。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生产乙醇所消耗的是有效的可以利用的能源，而乙醇作为动力燃料的效率是不超过 50% 的，生产乙醇的副产品热利用效率就更低了，这样的情况如果计算一下乙醇以及副产品的效率，这样的生产是否合算就要思量了。更进一步的是，这里还没有计算耕种玉米所需要的土地资源。

我们的世界也是存在熵减的过程的，对于地球这样的体系来说，熵减需要得到太阳的能量，也就是从太阳取得负熵。古典经济学的重农学派把一切财富的来源归结为农业的生产，马克思对土地对于财富的贡献也特别予以关注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从熵的角度可以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地球的一切熵降低的

能量来源在于太阳，在于从太阳取得的负熵，包括我们的风能、水能等也与太阳能量造成的大气运动和降水有关。太阳的能量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分摊到土地上的，在土地上被植物等转化取得负熵，让地球的熵降低，而水能、风能、太阳能等也是与土地和地理环境有关，因此土地对于熵的价值的取得是重要的资源。地球所得到的负熵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分配到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上的，而地球形成所带来的历史能量和负熵也是分配在土地上的，我们的资源也就是来自这些熵。因此我们在熵的层面可以更好地认识对于土地的资源价值，也更能够从深层次理解为什么在二战以后世界确定了国家领土不可侵犯和寸土必争的国际原则。

而资源是什么？是一个有序的过程。若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应当把它看做是熵减（或者负熵）。比如矿藏资源，不是世界平均的元素含量，而是在某处某种元素的一个富集，这样的富集本身就是熵减。冶炼开采是一个熵减取得负熵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另外需要消耗能量，因此从更大的体系中来看还是熵增，因为能量的消耗是更大的熵增过程，而之后对于资源的使用和消费，又使之变得熵增。所以对资源的利用和消费就是熵增。获得资源和利用资源的过程只能是熵增的过程，不违反能量守恒的热力学上的永动机是没有的，而我们如果坚持一切都可以劳动解决的话，就意味着可以存在熵减或者熵不变的循环过程，即从劳动力的生产、消费、消耗到再回到劳动力的过程没有给世界的能量和资源等造成任何的熵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在人类社会建造了一个永动机。

资源是千差万别的，对于能源和各种矿产是完全不同的，石油和阳光怎样统一衡量？如果资源眼光再扩展到人文领域，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等如何与自然资源进行统一？对于各种资源怎样进行统一，如何有一个有效的标准来衡量资源？这个问题是我们要以资源来衡量和思考世界的关键，对于资源的衡量，笔者的认识就是资源是熵的利益，是能够让熵增加逆转的负熵，是一种有序度的衡量，凡是能够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有序度的就是资源。熵的概念不但在物理当中，在化学、生物学当中也有，在人类社会的信息论、控制论当中也有熵的概念。当物理的熵被波尔兹曼表述成为一个有序度的等式$S = k \times \ln\Omega$（K 为波尔兹曼常数，Ω 为微观的状态数量）之时，熵成为无序度的度量之后，各种领域的熵得到了完全的统一。

在波尔兹曼公式 $S = k \times \ln\Omega$ 建立以后，熵反应的是有序度多少的情况，这样以有序度作为衡量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是达到统一的。而对于资源，更深刻的认识就是熵了，认识熵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作用非常关键，熵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还是生物的、信息的、社会的概念，不仅仅与能量有关，更是一种统计的状态量，从更加根本的层面阐释资源的核心概念。在世界各种资源千差万别的面前，熵增加的原理无法打破，因此对于熵的消耗和熵的价值，就成为资源最好的一个等价物和统一的衡量描述量。熵的概念的引入，也使得人为资源与自然资源达到了和谐统一。

在熵的概念引入后，熵在各个领域是可以计算或者测量的，结果就是我们在 GDP 之外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数据——熵。一个社会的熵值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熵的变化，可以衡量在 GDP 中不能反映的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财富情况，而国际贸易的不均衡也就是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其效用是不等价的。资源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取得熵的利益，等价交换而熵不同，结果就是资源的外流和消耗的不等，影响社会的资源占有情况。用熵可以统一衡量这样的资源变化，就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结果。

在熵的眼光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本质，从物理熵到生命熵再到信息熵，自然与社会得到统一的描述，人类社会的有序也可以按照熵的规律进行描述，我们的高度有序是要依赖资源消耗维持的耗散结构，这样的耗散结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

世界的各种资源可以用熵值和负熵进行描述，各个经济体是一个耗散结构。在世界的均衡态势下，最小熵产生原理的作用下，各个实体系统都在追求熵产生的最小化，也就是通过节能环保降低自身的熵增和通过贸易等手段在实体之间交换取得负熵，降低熵值成为重点。而这样的贸易、金融等经济往来，就是以降低熵值为第一重点，也就是输出熵增或者取得负熵，也就是资源重商主义，因此资源重商主义实质上就是重熵主义。

而对于地球的体系，从太阳得到的负熵在最近一些年已经赶不上人类的资源消耗，造成了由于生命的耗散结构和光合作用的负熵。地球亿万年的熵减模式变成了熵增，这样的历史转变时刻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环保主义的发展反映了这样的熵临界点在本国内的

影响，而资源重商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反映了这样的熵的临界点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而在临界点附近，将是一个世界质变的时期，一定会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

二维价值模型

人类对于财富的认识在唯物和唯心之间摇摆和变化，对于财富的物质性和贵金属的认识更唯物，而对于财富的社会性，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论更唯心一些，以人类需要而确定的财富本身就是唯心的，只不过这样的唯心可以来自于人类的社会普适价值思想，是一种主观的唯心信念而已。我们在财富的认识这个问题上回避了唯心和唯物的讨论，原因就是号称唯物的马克思的认识在此是有重大客观唯心主义嫌疑的。而这样的认识变化的起因就是人类对于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的自然规律的认识，在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的定律下，人们了解了物质不灭和能量不灭，物质和能量也不能被创造，这就使得物质和能量对于人类所带来的利益似乎只是在人类所在的空间里面不停地转化，而只有人类的劳动对于人类所生活的世界的改变才是不断增加、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的。一个发达的社会必然可以看到大量的人类创造和劳动的长期积累。因此，大家达成了社会财富的共识，把人类劳动作为财富的来源；而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由于不能被创造，也不会消灭，只能转化，就不作为财富的来源了。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认识到了熵，这个世界的有序度是向越来越无序发展的，这个世界可以利用的物质和能量是越来越少的，这就是熵增加原理所告诉我们的事实。因此原来对于财富和价值的认识是需要全面刷新的，财富的资源、物质属性在熵增加的背景下不可忽视，而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力量和因素也不可忽视，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来认识财富和价值。因此在笔者所写的经济理论当中，把劳动价值和资源价值作为共同测量价值的变量，这实际上是一个近似二元论的哲学做法，而普通中国人所接触到的都是一元论的哲学。这样的规律在一个国家是小国的时候可以互相转换，是近似的，但是对于一个大国，由于市场的有限性，我们的劳动未必能够取得我们需要的资源，这样的二维定义就很重要了。

笔者在《资源角逐》一书当中论证了二维价值定义的思维，把价值来源变

成了劳动和资源。在过去贵金属货币之下，贵金属本身就是劳动和资源的统一，而在信用货币时代，信用对应于货币、对应于劳动价值，而资源价值要通过统一的熵来实现。对于原来的供需价格体系，笔者认为，不考虑资源时，所有供需曲线都会退化为劳动力供需曲线，造成差别是因为资源依赖性要消耗资源和资源稀缺性受资源供给限制。由于资源的拥有限制和使用、占用限制，各种曲线就与劳动力的曲线不同了。这里有人为霸权占有资源的影响，也有自然的原因，比如所需要的资源路途远近输出成本不同，产品的供需曲线就肯定要有异于劳动力曲线了。而我们也可以有自然资源外的社会资源，这个资源是通过社会的有序度度量实现的。这也是一种熵，社会有序度高，社会的效率高。当然劳动生产率不同，人的迁徙和配置也是需要成本的，供给需求曲线就要异于劳动供需曲线了，人们的社会组织，社会分工就是这方面资源的体现。

这个二元论的思维，是可以与古典经济学衔接的，人类的经济理论也是随着货币演化和对价值的理解变化不断发展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传统经济学建立的时候，货币是具备资源效用属性的，因为作为货币或者货币本位的贵金属是必须有资源矿藏的，因此贵金属不但是人类劳动的等价物，也是资源等价物，但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彻底脱离了贵金属，也就没有了资源属性，世界的经济理论也就从要获得货币的重商主义变成了让货币贬值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了。这样的变化与货币的资源属性有关。价值是一元还是二元，与经济体量有关，对于小国，如果资源可以简单地通过货币交易取得，资源与货币形成等价关系。现有的货币即使是没有资源属性，也可以在小国经济中反映资源的影响，资源的效用就不会有特别的体现，因此笔者的理论就可以近似到原有的经济学理论中，这一点与相对论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关系是一致的，甚至是对于资源效用的矢量模型和资源场的描述，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场论、量子力学的数学模型都可以借用。但对于大国，全球的资源与国家的体量相比是有限的，资源是不可能都通过货币购买来完成的，不是劳动就一定能够换取来足够的资源。因此对于资源和劳动二者的脱节就必须考虑，由二者决定的价值模型也必须是二元的，就如中国古代要把粮食与货币共同捆绑来发放俸禄一样。

因此笔者的价值模型就是一个资源与劳动的二维价值模型，这样的模型可以便于人们更清晰地理解定价权。

二维价值模型下看定价权

这100多年以来，对于价值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在没有认识到熵的时代，人们对资源价值内涵的认识是不足的，而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其内涵也是变化的，货币的资源属性在脱离了贵金属本位制后则也不存在了。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货币，在奥地利学派是以金本位为前提的，现在央行控制货币，货币不自由则自由不存在，金融主权成为关键，剥削已经从阶级之间变成国家之间，金融、资本、贸易、信息全球化，但不让人全球化，于是产生剥削。对于定价权的认识，就要以更高的价值层面来认识。

如果我们国家的信用是一个良好的不滥发钞票的信用，那么这个信用也是来自于人的劳动和人的信用的组合，以这个信用发行的货币更多是劳动力的衡量，尤其是当代的信用创造。所谓的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能够承诺明天还钱的，是人明天的劳动，资源是没有办法穿越的，对于资源在其中的影响就是体现在对于价值体系的定价权之上。资源的熵本身度量的就是秩序，定价权、价格体系等本身就是一个市场秩序的产物。

为什么各种商品的供需曲线异于劳动力的供需曲线，产生这样的差异就是由于资源带来的影响。资源的影响如果对应于一维的体系，就是通过资源的依赖性和稀缺性建立的各种定价体系的差别，而资源如果统一到熵这个层面，就是体现有序度对于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有序度下，价格是不同的，有序度决定了价格与价值的稳定偏离趋势，这个偏离本身就是定价权的体现。

在二维的模型下，我们的价值是二维的，而价格却是一维的。价格是货币实现的，货币是信用不包含资源在其中的作用，那么定价权就非常好理解了，资源在很多地方可以通过劳动创造和替代，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源产生的效用都能够被替代，对于熵增加的趋势，即使通过劳动也是无法逆转的，因此资源必然有劳动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不可替代作用的部分，在二维体系之下，价值表现是一个劳动与资源的矢量，而在一维体系之下，则变成了在劳动上的扭曲，这个扭曲的力量受到资源力量的影响。这是一个通过不断套利也不能消除的差价，就如在金本位之下，西方对以白银为货币的东方就进行了上百年的套利，这个套利差价就是因为黄金成为本位货币之后有特殊的资源属性，黄金带来了特殊的金融有序度。

认识到了二维的模型，也就可以解释在一维模型下为什么等价交换让价格围绕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会出现偏离，如果没有价格对于价值的偏离，就没有定价权。而对于主观价值论，交易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有序度决定的体系，理解熵对于其中的影响则更为容易。资源权力是一种物质权力，在主观价值论方面，这是物质权力对于人们意识的影响。

在二维模型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保持劳动力的差距是可以产生资源掠夺效用的，因为劳动中所带来的熵的效用的改变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是与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价格无关的，就可以很清楚地把不同劳动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统一到对于熵的改变大小上来。劳动对于熵有多少改变不受劳动具体过程的影响，因为熵是一个状态量而不是过程量，熵的变化与生产中不同方式的过程的千变万化是无关的。以熵来衡量劳动的成果与人们的劳动时间是二维模型的两个维度，我们的交易更关心时间，不关注其中熵的损益。这些交易当中的资源流动被忽略，资源在这里被掠夺，资源的流动带来的就是定价权的影响，因为资源在地球范围内是有限的，带来了与劳动时间、劳动力成本所对应的内在价值的差异。对于人类社会，同样的熵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对应的劳动价值却不一样，尤其是很多不能贸易的服务项目，西方的服务业产生高 GDP 的背后是服务业占 GDP 比重在 2/3 以上，英国甚至可以达到 77%，但同样的服务在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很低，背后就是同样的服务由于工资低廉、价格低导致的。两个社会对此的等价交换的背后就是西方以较少的劳动换取了我们较多的劳动。或者劳动一样但资源不一样，剥削就产生了。

因此对于定价权，把我们对价值的认识变成二元性以后，资源的价值被认知，因此定价权产生额外的偏离和利益，就完全可以用理论模型来进行解释了。

熵循环下看定价权

市场的不均衡似乎都能够通过交易达到平衡，价格总能在套利下趋于一致，如果这个平衡的过程真的能够实现，则定价权也就没有意义了。对于这个过程，我们从熵的角度也可以重新认识。市场的平衡就如热量的流动和平衡一样。热流能量流就是流动性，我们总是看到高温物体将热量流向低温物体，但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热寂说的世界，怎样从热平衡的模型建立起秩序，才是关键。对于

这样的熵模型，我们的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耗散结构理论。这样的理论一样可以引申到社会、经济和市场中。在市场经济领域，价格有偏离价值且不能在套利下趋向一致的情况。社会形成了价格体系，这样的秩序之一就是信用体系下的定价权。

对定价权的建立，我们在熵的眼光下，要从经济、社会等的熵循环开始认识。热力学发现了熵增原理以后，世界上就有人提出了热寂说，也就是世界的熵最终会变得最大，一切寂静失去活力。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认识的过程：波尔兹曼最早就发现了生物对于熵的作用，麦克斯韦提出了著名的麦克斯韦妖的概念，把生物对于熵的作用神灵化。斯莫鲁霍夫斯基发现了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从而这个“麦克斯威妖”成为食人间烟火的“妖”了，这个妖的神灵性质不存在了。齐拉德（Leo Szilard）在斯莫鲁霍夫斯基工作的影响下，对麦克斯韦妖作用的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负熵的概念。此后的普利高津发展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彻底解释了生物给地球造成的熵减的效果。这样对于地球的平衡，就是一个一个的熵的循环。

在熵和耗散结构的作用之下，地球形成了熵的循环。如地球的碳的循环。植物的生长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得到碳并从太阳那里得到把二氧化碳变成碳的能量，而生物圈以植物为食的食物链就都得到了碳，并且以碳的氧化得到能量和生长，这样通过呼吸，碳再次以二氧化碳形式进入空气。再如地球的水的循环。太阳的热造成蒸发和大气流动、降水，把水从海洋的咸水变成淡水，然后再通过河流流入海洋。这样的过程都是从熵增到熵减的一个熵的循环，维持这样的循环所需要的是太阳的能量。

人类也是通过从生物食物那里取得能量，由出生、成长、产生新的后代再到衰老、死亡、尸体分解，也是一个从负熵增加再到减少的循环过程，人类一代代的繁衍就是这样循环的继续，而推动这样的循环的就是熵的流入。人类要不断地消耗食物，而食物是太阳给地球带来的负熵，同时人类还要消耗其他资源和能源。而对于人类的社会制度，也是可以用熵来衡量的。制度也是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之中，制度也是不断地循环发展，其中就是要与外界交换，进行人的新老交替，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没有人的变动，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结果就是一个制度在原来的人衰老后要变成新的人接管，是一代代人群的交替

过程。

所有这样的循环都要给社会带来熵的增加，而消除熵增的效果就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对于生物圈需要的是太阳的能量。人类需要额外的食物，食物的熵增肯定比人类肌体的负熵要多很多，而对于一个制度的熵循环，新老交替肯定有混乱发生并带来损失，只是一个好制度会让这样的损失尽可能地减少。我们每一次熵的循环，也是一个相当于热机运行给人类带来效用的过程，在低级循环所带来的效用成为高级循环的基础，就如生物圈的循环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基础，而人的繁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社会发展是人类控制整个世界的基础和人类生存权的基础。所有的熵的循环的链条不能断裂，熵循环的停滞意味着热寂的开始，意味着所有在更高层次的熵循环和人类活动的灭亡。

因此熵循环对于经济社会是极其重要的，经济运行实质上就是熵循环的运行，经济发展使这样的循环更好地运行，给人类社会带来更高的负熵，维持社会更大的有序和稳定。所以地球是一个一个的熵的循环，这样的循环就是一个热力学上的热机系统，低层次的熵循环产生的负熵效用成为高层次的熵循环的外来力量，使得高层次的循环中实现熵的减低，回到初始状态，只有这样的循环存在，地球才不是一个热寂的世界，才有今天万物生长、人类繁衍的勃勃生机。

但是我们的古典经济学当中，对于这样的生产过程，只承认劳动的价值，却把资源的循环看做是一个财富的转化过程。在这样的经济学说当中忽略了熵的增加，把每一次的循环只看做财富的转化而没有计算其中的代价，这个熵的代价是不可忽略的。这样的做法就是建造了一个永动机的循环体系，但是所有的熵的循环是需要代价的，需要其他系统的熵增或者能量流入的，熵的价值也就在这样的循环驱动动力上体现。因此对于这样的经济动力，不仅仅是人类的劳动，还有熵利益的消耗，是人类意识的劳动和物质的熵的统一，是意识与物质的共同作用，二者都不可忽略。

对于熵循环，在定价层面上的认识就是建立了价格的秩序，这里就是定价权！熵是不能利用的能量，熵循环也是能量的循环。在波尔兹曼公式中，建立起了熵与有序度的关系，也就是建立起了信息流与秩序的关系，在社会层面的信息熵的概念，就是从自然的能量到社会的信息的一种对应，我们的信用也是

信息的一个层面，这些也在拙作《信用战》当中论述过。因此在理论层面，能量也是一种信息的传达。在社会层面，流动性对应的效用也是一种人为的信息和能量。信用本身与自然的能量是可以在熵的层面上对立统一的。熵循环的背后就是流动性的循环，也是定价权的源泉，定价权本身就是建立有序度的过程。

因此从熵循环、熵的能量和信息属性层面，熵与有序度的关系层面，我们可以在哲学层面认识定价权的意义。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

中国应当进行大国资源战略研究

中国崛起遭遇资源瓶颈，中国对于自身特殊性和资源的研究完全是非独立的。在这里，大国的资源需求和供给会对资源市场造成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崛起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一个大国和一个垄断超级经济体对于世界的影响与小国是根本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国的行为（甚至包括大国的不作为）都会对世界的相关市场造成极大的影响。小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解决问题，大国却不行。所以才有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的现象。这样的市场结果和经济效应是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由于有国际市场存在，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国家这样的经济实体，经济模型的假设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每一个国家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满足。但是在全球一体化之后，由于人类还不能脱离地球生存，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封闭体系。在这样的封闭体系下，对于资源等，只要国家的实体大到与封闭体系的规模可以比的时候，国家经济实体的经济学开放近似就不存在了，经济学的原有假设就根本不成立了，必须有新的经济模型和新的战略。这就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所不能避免的根本变化。如果未来的地球国家可以统一在一起，成为联合政权，地球联合政府就如中国古代朝贡体系之天下的概念——不发达的边缘化都是蛮夷，核心强国就是天朝，天朝与蛮夷是存在鸿沟的。古代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局限，实际上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后来开创的大航海时代才再一次让世界成为开放体系，在这样开放与封闭的对抗之中，中国饱尝艰辛，而对于这样的体系的规律变化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西方传统经济学建立的时候，货币是具备资源效用属性的。因为作为货币或者货币本位的贵金属要具有资源属性，必须先有金属矿

藏，然后才能挖掘冶炼。因此贵金属不但是人类劳动的等价物，也是资源等价物。但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彻底脱离了贵金属，也就没有了资源属性。世界的经济理论也是从主张获得货币的重商主义转变为让货币贬值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这种变化与货币的资源属性变化有关。对于小国，如果资源可以简单地通过货币交易取得，资源与货币形成等价关系，现有的货币即使是没有资源属性也可以在小国经济中反映资源的影响，资源的效用就不会有特别的体现；而对于大国就会有根本的不同，资源的效用在货币没有了资源属性以后就必须特别考虑，因为规模和需求市场的供给在不改变市场状态的情况下是无法满足的，所以要有新的理论。因此对于小国经济，新的理论与原有的经济学理论近似，这一点与相对论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关系是类似的。

面对资源紧缺和资源压力，小国可以采取市场行为应对，而大国则不然。大国必须考虑市场的相对性效用，大国的资源供、需量相对于市场容量而言，所占比例很大，大国剧增的资源供、需量相对于市场整体增量而言，所占比例更大，因此大国的资源供需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一次交易完成。对于大国的资源需求，不可能根据现有资源市价计算出货币价值，然后认为大国只要付出这么多钱就可以得到所需的资源了。因为只要国家足够大，不论是购买资源还是抛售资源，都不可能按照现有市价成交，因为对应你的需求，市场中不会有足够的供给满足你，你的供给，市场中不会有足够的需求消化。由此可以看到，世界的资源问题、价值衡量问题和贸易问题中，资源效用不可忽略，因此相关的描述就应当使用二维的模型，一个维度是人类劳动的衡量，另外一个维度是资源的衡量。所以世界的“石油—美元”模型不是简单的石油本位的美元，而是美元为货币以及劳动的等价物，石油为资源的等价物。众多经济分析按照石油—美元一维可替换的思路，造成了对于本次经济金融危机中石油和美元走势分离的分析失误，并且造成中国重大的投资损失。

通过自身的从业经历，笔者了解到西方早已经使用类似石油和美元的二维模型分析中国并分析他们垄断下的经济博弈，因为西方的产业形成垄断以后，对于垄断经济体的分析也需要考虑市场相对性效用，也需要借助石油、美元等互相作用的多维模型，只不过具体细节和模型设计各个机构有所不同。目前通行的经济学理论都是针对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垄断经济，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

距的，这种差距正成为有关机构渔利的来源。世界的垄断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一体化的时候形成的，以前的垄断是在国家内部，没有全球化，各个产业国家间的竞争使得全球基本上还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在国际供需关系下是一个资源无限的开放体系。但是在全球一体化完成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如果从全球的角度考虑不再是开放的体系，而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体系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影响到原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对于这样的情况，各国都选取对于他们有利的坐标系。经济霸主美国控制世界的资源和石油，就是以石油和美元来衡量世界，而欧洲等国家则创造了碳排放为他们的标准，更加偏重于环境影响。欧洲已经发达，保持环境的结果也就是保证他们的现有领先位置，保持了他们的优势延续。但是对于世界的资源影响是多方面的，能源和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石油并不代表所有的能源和资源，碳排放也不是所有的环境问题。对于环境影响的污染、COD、BOD、二氧化硫、氟利昂等影响也很大。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使用熵的增加来描述，世界各国都是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性的。

对于各国不同的认知模式，笔者认为只有通过“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资源，认识到熵对于世界的作用非常关键。熵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还是生物的、信息的、社会的概念，不仅仅与能量有关，更是一种统计的状态量，从更加根本的层面阐释资源的核心概念。世界上的各种资源千差万别，通常的概念难以统一衡量，但是引入熵的概念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熵永远只能增加，资源的有限性就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因此对于熵的消耗和熵的价值，就成为资源最好的一个等价物和统一的衡量描述量。熵这一概念的引入，也使得人为资源与自然资源达到了和谐统一。而引入熵的概念后，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场论、量子力学的数学模型都可以借用来描述资源效用的矢量模型和资源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取向并引入自己的分析坐标，提出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

对于封闭体系和相对性的资源效用，各个经济体不可能自己独自发展而不与其他经济体发生博弈关系，而且封闭和相对性导致了非合作的加强，非合作的博弈效应也出现了，促成了微观上博弈论的发展，引入了非合作的博弈理论。对于市场的行为，在非合作博弈下，就可以如囚徒困境一样——实际上得不到

政策所希望的结果，就如中国的海外资源战略和房地产调控。中国的政策经常是事与愿违，其主要败因也是对于这样封闭体系的非合作博弈认识不足，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世界经济的描述，熵是宏观视角而博弈论就是微观视角，二者结合反应了在封闭和相对性的经济模型下世界的更近似真实的全貌。大国资源经济理论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全球资源战略和熵的眼光下，对于经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就是要认识到在熵只能增加、太阳给地球的负熵有限且转化率很低的情况下，人类无法解决资源的有限性。人类能够做的就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要认识到资源有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已经接近可利用资源的极限，达到地球熵增的临界点。对于大国的经济，我们可以解释并揭示资源需求大国和资源供给大国怎样地受到了市场相对性效应的挤压。例如：在次贷危机前后石油走势与美元偏离，石油的暴涨是怎样挤压中国的，石油的暴跌又是怎样挤压俄罗斯。

对于需求经济理论，小国以货币或财政政策拉动国内需求促进消费是一个资源流入的过程；而大国由于在外部受到全球市场相对性的限制，拉动新增需求，市场供给无法满足，会造成市场的扭曲和异常变化，会使得大国内部产生通货膨胀，落入经济陷阱。而中国的高积累率也是与人力资源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供给不足等大国资源效用有关。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资源净流入之资源重商主义。在看似等价交换的模式下，贸易中的熵增变化是完全不对等的，从而在看似平等的等价交换贸易中取得大量的资源净流入，如果以资源和货币的二维定价坐标来看，就可以看清楚了。所以我们建立了大国资源经济理论以后，对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很多问题就很容易清晰地解释了。而且中国历史上对于资源这样的二重性也是有深刻认识的，古代中国的官员俸禄都是以钱和粮食二维坐标进行计算的，因为在古代粮食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和资源等价物，中国的历史智慧也是可以借鉴的。

美国崛起的实质是美国当时（1900 年）近 8000 万人口要加入到全球工业化人口中来。当时全球老牌工业化人群也就差不多 8000 万。美国的崛起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拥有跟当时世界差不多的工业化人口的国家崛起的事件。导致的是工业品价格的长期走低。这导致了原有世界帝国英国的利润大

幅减低，并最终影响了其全球霸权。现在世界工业化人口也差不多在10亿左右（欧、美、日加部分东南亚国家、俄罗斯、韩国），而中国崛起是另一个跟之前全球工业化人口规模差不多大的经济体崛起的历史事件，将是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国资源效用是最明显的，因为很多的资源需求是按照人均计算的，中国的人均占有量极低。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需求是超级巨大的，会重新划分世界的资源版图，因此中国的崛起首先就造成了世界市场的相对性变化，也受到了资源效用的重大作用。因此通过经济理论上的研究和思考，深入地认识资源效用，是中国突破当前崛起中的资源瓶颈的思想武器。按照西方规划好的理论和道路，中国是不可能超越西方取得崛起的，肯定会掉入他人设计的陷阱之中，而这样的陷阱就是中国沿用西方理论忽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规模和资源控制能力的差别，通过资源效用的差别、经济和市场的相对性、资源供给危机等造成的。中国的政策失当多为中国经济理论落后所造成的。

中国威胁论的来源跟当时美国威胁论一样，本质上是世界权力资源分配问题。事实上，谁先完成工业化，谁就先成为肉食动物，就能在地球这个丛林社会中掌握发言权。英国首先工业化，当时地球上独此一家，工业品少资源多，于是它可以为所欲为，况且它其实不需要收买资源，只要强夺就可以了。美国其实已经来晚了，所以它付出的代价比英国大得多，在殖民时代，美国开出的条件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最温和的，有点收买的意思。想一下当年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和友好，美国给中国建造最好的大学和医院，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代价，同样也应当可以理解我们对于非洲的援助。而在此之前的大国崛起时代，各国的资源消费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都要小很多。每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源的相对性效用的存在。

而现在中国要崛起，毫无疑问，要付出的代价比美国那时候还要高得多。中国现在已经是个工业品多、资源少的国家，中国要“收买”资源国家，无疑要收紧裤腰带干些苦力活了。而资源价格也节节上涨。这是我们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中国不是终点。虽然中国收买的价格比较高，但毕竟在可见的将来，还是出得起这个价格，能够完成工业化的。跟中国相比，下一个10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印度就要悲惨得多。等到印度10亿人口想要全面工业化

的时候，地球资源已经被中国用的差不多了，各种资源价格都要涨上天。我们很难看到印度出得起这个价钱，因为印度如果再崛起的话就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发达。世界的运转和残酷竞争实际上是必须有淘汰的。所以，也许中国是最后一个可以完成全面工业化的人口大国或者区域。因为地球形成统一联合政府之前，发达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口，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对于印度的先发优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不能保持这样的优势，被印度所超越，那么取得崛起的资源代价极大，中国再崛起的希望就极其渺茫了。

对于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很多人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就没有什么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西方的经济在博弈理论上是有巨大发展的，纳什均衡博弈和进化稳定博弈成为支持经济运作的微观理论，纳什先生得到了诺贝尔奖。在世界进入一体化的情况下博弈是极其关键的；而熵理论得到充分发展，耗散结构解决了系统的热寂说的矛盾并且将熵的概念从物理扩展到信息和控制论，普利高津得到了诺贝尔奖。而计算机技术和随之的计算数学的发展，使得各种复杂的经济模型可以进行数值计算，数学天才、模型先生西蒙斯，量子模型的索罗斯等人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基金经理，这个世界的经济理论在物理理论大发展和信息技术大发展以后，实际上是发展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迅速。但是，就如最好的博弈论诞生在赌场一样，最好的经济金融理论也诞生在这些金融大鳄中，他们需要使用这些理论为自己赚钱服务，是不会把这些理论公开给世界享用的，最后这些理论让世人知道时，却是过时很多年了。西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现给研究人带来财富的学说，都首先成为投资渔利的工具而不公开，所公开的就只剩下服务利益集团和洗脑大众的用途，大多数被他们培养的人都不自觉地不再思考了，所以中国如果没有同样的独立研究思考，就会被西方洗脑，实现西方控制中国的新的和平演变。在经济领域，西方所需要的还是在他们先进理论下让我们的经济和资源不断地被其掠夺，让我们和平演变成为他们的打工奴隶。

当考虑到世界是封闭体系和大国对于这样的封闭系统的整体运行的影响不可忽略时，资源的有限和经济的相对性就产生了，这就是与当今普通国家所不同的大国资源理论和大国资源效应。就如资本市场投资人在股市上是大资金、庄家，还是散户，其决策、博弈等的理论和对策是根本不同的，原因就是对于

市场的作用不同。对于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大国是大户，超级大国是庄家，而小国是散户，战略对策也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与印度都是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大国，都具备这样的资源有限性的限制和大国资源效用的相对性，因此中国与印度的崛起竞争，实际上是一个封闭体系内的资源占有之争。中国取得资源的领先才是根本的优势，这样的领先在资源处于相对性的大国封闭体系下，是远远比开放体系下要困难的。原因就是在封闭的相对性的体系中，你的发展要看他人的眼色，付出额外的代价；而开放体系中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了，在这里是需要完全不同的战略的，在这样的战略下取得领先的优势是会扩大的，只要中国不犯战略性错误，这样的领先优势是难以超越的。因此中国崛起是不能犯战略错误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需要有中国的战略研究。对于中国的战略研究实际上是需要各个部门集体参与的，而这里的核心就是资源和环境。

第三章

定价权关键要素资源和劳动力

各种价格都是广泛联系的，定价权不是微观上某个产业的定价，因为产业都是与其各种要素成本和下游使用者广泛联系在一个价格体系内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体系的关键要素就是劳动力和资源的定价，压低了竞争对手的劳动力和优势资源价格，就在整个定价体系中取得了主导权。通过流动性的优势和奴隶，把殖民地的资源变得极为廉价，西方劳动力价格在中国领先的时代就是东方的100倍左右，这才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第1节　从定价权体系当中找出关键要素

对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定价权，我们看到各种价格千差万别，而在一个区域的价格曲线并没有明显的出现本书论述的供需曲线的畸形，价格与当地劳动力水平也相关。从西方经济学上讲，在供需上的均衡点也非常的清楚，而且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言，更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进行解释的体系。这里的定价权关键要素在哪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要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中国制造的利润与外国没法比，这些现象似乎也都是符合供需均衡关系和劳动价值论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要从问题的基本假设开始。劳动价值论谈的，是某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对于不同的国家，同样的劳动当然要有同样的计价，但现实中，不同的国家之间劳动的计价是不同的。同样的，我们还看到，利润的高低被古典经济学家归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但劳动也是没有贵贱的，农民种地要能够保障粮食的高产一样需要非常复杂的劳动，是一项技术活儿。使用机器导致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价值也随之降低，但所有这些差别被所谓的劳动是否复杂所取代了。如果你把劳动的供给看成各种劳动均是平等的，问题就不同了。

同样在古典经济学下，资源由于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是不计算价值的，但有熵增加以后，资源就是有限的了，而在金本位时代，作为货币的黄金就是资源之一，是以资源为尺度的。而我们现在的信用货币，也是需要人类社会高度有序的社会资源的，这高度有序就是熵减的体现，熵是无序度的度量。

我们纷繁复杂的商品定价是可以不断替代的，但他们都是由资源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所组成的，如果我们假设劳动无贵贱的话，把资源按照其给我们带来的熵效应进行统一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各种价格均是劳动力曲线和资源曲线的某种组合而已。

这个世界的价值由劳动力和资源组成，而资源和劳动力的供需曲线均是有

畸形之处的，在不同的社会并不生产同样的产品，而是不同的产品互通有无，在贸易当中，这样就不是直接的价格竞争，而是不同地区的产品在价值链上的价值分配，你的产品生产所在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决定了你的产品价格和利润的情况，而构成这个产品价格的要素，却是被弯曲的供需曲线所定价。虽然产品的种类千差万别，但要素却不多，要素价格决定了产品的价格。同样的要素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配置的价格是不同的，这些要素在不同环境下有其自己的均衡点。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要素价格是由定价权主导的，是在劳动力供需曲线上形成的不同的均衡点，例如西方和中国的劳动力均衡点就在不同的位置。中国特有资源和西方控制资源在均衡点上也处于不同的位置，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同的产品可以有巨大差别，但定价权被弯曲的供需曲线所决定的本质是不变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从这些差别当中找到共性，找到与定价权有关的关键要素。

延伸阅读　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

后弯劳动供给曲线是指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表现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指劳动供给曲线呈现出的劳动供给量随着工资上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的特征。

就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而言，劳动时间（想获得一定数量的收入而必须投入的时间）和闲暇时间基本是替代品，但一定程度上又是互补品。收入和闲暇都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并且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又是此消彼长的，所以它们是替代品。同时，如果有了一定的收入做保障，闲暇时的享受质量可以更高一些，所以收入对闲暇有互补的作用；而闲暇对劳动也有一定的互补作用，“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平时的娱乐和休息使自己精神愉悦，那么工作的效率也会因此而提高。

横轴 H 为闲暇，纵轴 Y 为收入，E 为初始状态点。当劳动价格工资为 W_0 时，可以得到相应的预算线 EK_0，与 U_0 相切于 A。当价格上升到 K_1、K_2 时，相应的预算线 EK_1、EK_2 分别与 U_1、U_2 相切于 B、C 点。每一个切点都对应着一个最优闲暇量 H_0、H_1、H_2。相应的劳动供给量分别为（$16-H_0$）、（$16-H_1$）、（$16-H_2$）。于是可以得到劳动供给曲线上的三个点 a、b、c。连接 A、B、C 得到价格扩展线 PEP，连接 a、b、c 得劳动供给曲线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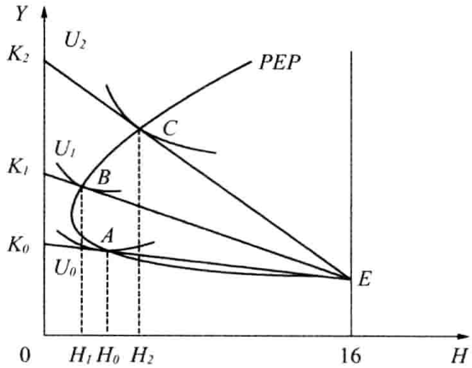


图 3-1　时间资源在闲暇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分配

第 2 节　资源、劳动力与定价权

东西方劳动力价值差的形成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劳动力的工资差别，那个时候中国的精英争相到海外刷盘子，刷盘子一个小时的工资就可以在黑市上换到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对于这样的现象，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是西方发达、中国闭关锁国的结果，而事实的真相却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经济领先世界的时候就存在了，是中国当年闭关锁国的原因之一。

由于蒙古的杀伐和美洲的金银，全球贵金属富集于西方，造成西方的流动性充裕和泛滥，从 14 ~ 15 世纪西方历史上的价格革命开始，西方的劳动力价格开始普遍高于东方，但西方人的生活并不比东方人好，宏观上社会平均工资以贵金属计价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所在地区的经济是否发达、文明是否先进，而是取决于这个地区的人均贵金属占有量，与地区人均贵金属占有量是成正比的。东西方的工资差别在贸易上对世界财富再分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西方带来了定价权，重新分配了全世界的财富。对西方历史上的工资增长和东西方的工资差距，我们以世界资本主义的代表英国的情况来分析。

英国12～19世纪的工资水平呈现以下特点："升"中有"稳"，下降的次数少（仅有3次）、时间短（共计不超过20年）。在"升"的方面，工匠日工资从3便士上涨到450便士，增长了149倍，帮工工资从1.5便士升至420便士，增长了279倍；所谓"稳"，指的是工资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多次保持长时间稳定，维持时间最长达120年，不变时间总计达500年。

相比西方的高工资，中国到了清朝康乾时，普通中国劳动者的工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也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多少。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英国的普通农民工的月薪是约合白银2两7钱，有点技术的工人约4两白银，年收入就是50两左右，明显高出中国人许多。中国人的年收入水平比较公认的是一户年收入2两银子，这还是对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描述，而19世纪末美国华工的收入就达到了每年600美元。当时的1美元银币是0.7盎司白银，这1美元银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洋，后来才是中国政权铸造的银元。"银元"之所以叫"大洋"，是因为其是来自外国的大个洋硬币。中国当时可是大家庭，是男耕女织，男女均劳动的，因此在中国2两银子是可以买一亩地的，如果是在灾年等特殊情况，2两银子甚至是几亩地的价值。所以西方人的名义收入是中国的几十倍、上百倍！但是西方世界的流动性丰富，社会当中的金银数量，尤其是人均贵金属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等东方国家，以至于他们的物价远远高于中国，实际所得工资和生活水平并不理想。据麦考伦《英国史》记载，当时英国的平民大约88万户，其中一半每星期可以吃到两次肉，其余一星期最多吃一次，或者完全没肉吃；西方的主食之一——面包，当时平民并不能天天吃，他们吃的都是杂粮，这种生活水平与当时的中国普通人差别并不大。

西方的劳动力增长率较高，工匠和帮工的名义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65%和61%。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工匠和帮工之间的工资差别稳定，比例大致维持在1.5∶1。这说明"工资高是科技带来的复杂劳动"是站不住脚的，最简单的劳动依然是收入很高的。我们再看其消费的构成，可以看到，在当年英国工人工资的实际支出中，食物（淀粉类谷物、肉类、鱼、奶酪等）占80%，衣服、燃料等其他非食品类消费品（non foodstuff）占20%，这说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没有变化，在购买力平价上他们并不富裕。但到国际贸易当中，汇率的确定不是依据某方所拥有的真实财富，

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是贵金属数量所对应的自然汇率。在国与国之间，财富的鸿沟就已经建立了。

西方当年这样的高粮价，也使得西方社会从全球配置资源购买粮食等产品成为可能，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劳动力价格的落差才是英国可以享受全球资源的基础，如果各地商品的价格没有差别，则这些产品的贸易就无利可图，尤其是现代低廉运输方式出现之前，很多贸易是赔本的。贸易要有利可图，价格差别至少要高于运输成本！如果没有两地工资的差别，面对这样大规模的全球供应的高价格，劳动者是根本消费不起的！而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使得宗主国生产的产品成本和价格更高，宗主国出售给其他国家和殖民地相关的产品，其实质上是以较少的劳动换取了对方较多的劳动，如果这个过程再计算资源的价值，则宗主国的收益是更多的。因此在西方主导的商品价值论当中，对于资源的价值是不计算的，理由是能量与质量守恒。但如果有了熵和熵增加的概念，贸易所带来的熵利益是不同的。熵就是一个有序度的衡量，得到更多的负熵，将使得社会变得更加有序，得到更好的社会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就是在这财富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了现代文明的上层建筑。

中国清代的GDP是32亿两白银，人口是3亿人，如果按照西方的劳动力价格进行购买力平价计算，劳动力的总收入就要有150亿两~1000亿两的白银了，因此他们当年把中国视为睡狮，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与西方相当，那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帝国。而西方要崛起，压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收入非常关键。按照上面的数据，康乾时代中国按照1亿~2亿人口计算，如果收入水平达到英国那样的标准，则中国当年的工资总收入就是近100亿两，这个规模是西方无法想象的。只有把东方的劳动力成本压低到西方的几十分之一，西方才有超越东方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东西方历史性的流动性差距造成的。不要说什么工业革命，在康乾时代蒸汽机没有发明，纺织机也没有发明，西方的工业革命根本

没有开始，但东西方的工资差距就已经存在了。有人说东西方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是由西方技术进步等导致的，这完全是西方的御用文人粉饰的论调。我们需要认清历史真相，流动性才是定价权的关键，而不是科技！

英国等西方国家收入高企，在贵金属时代或者金本位时代，国际贸易的汇率是贵金属价格的自然汇率，整个工资差就是实际的交易差别，高工资可以换取其他地区更多的劳动和资源，这个工资差别是实实在在地带来了财富的掠夺效应。双方的成本由双方当地的工资为主要依据，各种资产和物资价格在当地也是要最终对应于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工资是贵金属计价，而国际贸易是在成本的基础上进行贵金属的等价交换，这个等价的是贵金属成本，而不是等价在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之上。如果人是平等的，劳动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则是巨大的财富输送，这里面的差别就是定价权最直接的体现。对此如果你是一个富国而不是不得不给世界打工的制造工厂，肯定是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的，要靠关税来平衡补偿劳动力价值差别。

劳动力定价权与金融定价权

对于劳动力定价权在各种定价权当中的关系，笔者认为定价权的最终体现就是劳动力的定价差别。因为按照我们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来源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本身就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因为劳动力的价值体现就是他的劳动，是他劳动了多少时间。

货币实际上是一把价值尺子，货币流动性的大小在市场当中充当媒介的作用，劳动力的定价权与货币流动性的关系就是这个尺子是否准确不扭曲。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有不同的货币，也就是不同的尺子，货币单位就是尺子上的刻度，但不同货币之间的本质是尺子的不同，这些尺子刻度不同怎样换算，换算是否公平就是劳动力价值是否被定价、被剥削的体现。

从人生而平等的角度看，从事同样劳动的不同国家的人的价值和价格都应当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存在实际差别，就是这样的尺子扭曲了。劳动力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算出来的汇率与劳动力价格算出来的汇率是不一样的，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在不同的区域就不一样了，这不一样的背后是在货币、流动性和汇率之间的定价权的体现，从而造就了劳动力定价权。如果价值统一到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上，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应当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社会平均到单位劳动量上的货币流动性却是不同的。我们并不是按照这个不同决定货币换算的汇率，之间的差异就是劳动力定价权所决定的，因此劳动力定价权就产生了。

谁能够给劳动力定价，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劳动力的价格体系，是霸权利益的来源，而维持这个体系则与就业等指标有密切的关系。丰富的流动性带来劳动力培养的高成本，如果就业不成就要跌破成本价造成信用的坍塌了，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就业率的关注是第一位的，宁可不断印钞宽松通过极其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养活这些失业人员，也不能让他们为了吃饭低价工作。类似的做法西方在古罗马时代就开始了，古罗马给他们的自由人充分的娱乐和福利，就是为了维持其劳动力成本的高昂。劳动力价格的落差是不同经济体之间利益博弈的关键，这个落差不能通过贸易逐步恢复平衡就是劳动力定价权的体现。

劳动是价值的来源这一点是被广泛认可的，基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推论出劳动力的定价也是价值定价的根本，劳动力定价权是所有定价权的基石。而劳动力定价权这一个基石与金融定价权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定价权需要以货币为尺度，而货币定价权则属于金融定价权当中的核心权力之一。同时金融定价权本身就是一个信用的定价，金融的核心是信用，而我们社会信用的来源是每一个人的集合累积，每一个人的信用则与其劳动力所带来的收入分不开，即便你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你的资产租金或者资本收益，这些收入最终也是要通过劳动来创造的。不论最终怎么分配，劳动带来初始的利益是不能否认的，而我们的信用体系则在金融的主导下决定后来的分配，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财富除了劳动创造以外，资源的占有等也是一个重要的层面，而对于资源的资产定价权也是一个金融权力，对于资产层面也对于劳动的效能产生影响。劳动效率能够提高，与消耗能源的大生产是分不开的，就如我们的现代农业是石油农业，化肥和机械均有赖于石油；同时我们也受到劳动对象的稀缺性的限制，采金矿很赚钱，但你赚钱是因为金矿的稀缺带来了比一般劳动更多的收入，资源对我们劳动的影响也非常巨大。而流动性本身就是对于货币流动而说的，也是一种金融权力，一种金融资源。一个金融定价体系决定了社会各层面和世界各国的流动性分配。

劳动力和金融定价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实体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优势，因此我们现在分成了资源国、金融国和制造国，这些国家都围绕着自己的优势进行博弈。对于制造国中国，劳动力定价权则更为关键，所以我们要求劳动力可以到世界挣钱而对外汇金融是管制的。但对资金流和物流不断开放的世界，对劳动力市场反而是限制的，人们不能自由地流动。世界的主流是金融和物流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是不能的，就算入境免签证的国家之间，对就业以及就业背后的福利也是有限制的。因此在当前世界的运转规则之下，劳动力的差异就变得更为重要了，除了金融国通过金融定价权的金融攻击以外，在平时，金融的货币和资产定价权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力价格的差异来体现他们的利益，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巨大的差价变成了剥削，是同劳不同酬。

综上所述，劳动力定价权与金融定价权是定价权的核心，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当今全世界，劳动力定价和剥削是霸权取得利益的主流，中国全球博弈，劳动力定价权更为关键。在没有金融定价权的背景下，怎么样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提高本国劳动力价格，则是免受剥削和大国崛起的关键。

流动性、资源储备与定价权

要博弈定价权，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积累和储备，日本资源匮乏，但在全球定价权博弈上日本一直是一个强者，这与日本不惜代价地储备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国对于资源，却总是在说去库存的问题。

按照费雪方程式，$MV = PT$，MV 是流动性，T 就是商品的数量。在这样的方程式下，如果能够人为增加 T 的数量，则可以让流动性 MV 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如果流动性 MV 不发生增加的话，则价格 P 就要降低了，而怎么操纵商品数量 P 呢？就是要有足够的储备 T。所以资源储备与定价权之间是有学术上的理论支持的。对于资源积累的情况，我们更要看到其与利率的关系，而利率高低则是由更大层面上的流动性所决定的，定价权是交易层面的，在交易层面如果货币媒介宏观数量多，流动性供应丰富的话，按照供求关系，货币的媒介价格就要降低，这个降低就体现在利率上。

中国的企业库存一直是有限的，一旦库存高了一些，就要去库存了，为什

么要去掉这个库存，就是因为资金的成本太高。而在没有库存的时候，为了生产就只能采购，所以中国一旦库存高了，就被人家抓住让你去库存降价，一旦你没有库存了人家就抬高价格，你无法大量持有库存的原因就是持有成本太高了。美联储施行低利率政策的成果之一就是压低了库存的成本，使得你能够积累足够多的库存资源。这里直接体现了流动性对于资源积累的作用。

对于资源积累和定价权的问题，我们更要从建设和资源利用率等角度来分析，很多人攻击我们现在大搞“铁公基”建设是在重复建设，是积累泡沫，但实际上我国选择这样的建设方式也是由流动性决定的。

我国正处在加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好多荒唐的事。一条街道，刚刚修好，没过多长时间，又挖了重来；一条人行道，修好不到一年，又铲掉重修。如此折腾来折腾去的现象，举不胜举。这些挖、拆、建，所耗费的劳动价值，所耗费材料的增值部分，对于增加社会财富而言，确实都是无效的。但是问题就真的那么简单吗？很多人提到重复建设就想到了青岛的下水道设施，这些设施当中很多是德国在100多年前租借胶州湾的时候修建的，当年青岛还是不到一万人的小镇，现在这些设施负担着几百万人的污水排放。在青岛的大街上，还可以时常看到德国人当年留下的下水井盖，德国人的眼光得到了世人的交口称赞。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在当时一万人不到的小镇建设足够几百万人使用的市政设施，我们会怎样评价呢？我们的评价大概会是：好大喜功、政绩工程、巨大浪费的超前建设。这样的超前建设实际上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面也是不少的！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所有的不重复建设的工程，必然就要面临超前建设，只不过是超前建设多少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重复建设和超前建设实际上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要在未来不进行重复建设，那么必然要进行能够满足未来需求的超前建设，反过来如果不超前建设，则当下的建设满足不了未来的需求，必然是要在将来进行重复建设！

区分超前建设和重复建设的度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关键点就在于发展的速度和资金的情况，如果资金非常宽裕且资金利率很低，则超前建设肯定是非常合算的，但如果是发展速度很快，资金紧缺、利率高涨，超前建设的冗余就不合算了，我们就要考虑先建设满足发展需要，以后即使是重复建设，重复建

设的成本相对于资金和发展而言也是合算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 从不到 1 万亿元发展到了 50 万亿元，基本上每 10 年一届领导人就要翻两番的，这样快的发展速度之下，资金成本是很高的，尤其是社会资金的利率更是高昂，如果把资金投入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上，在大多数时候得利显然要高于投资到超前建设上；而对于西方世界，是资金多而利息低，美国连续印钞，美联储利率低至 0.25%，这样的资金冗余和低成本，当然是超前建设合算，因此我们就应当理解西方在普遍进行超前建设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重复建设。这超前和重复的比值，就是一个由利率和流动性确定的东西，中国这样高的社会利率下，必然是重复建设不断。这里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上的利率差距，西方长期崛起是低利率的状态，大部分时期的利率在 5% 左右，中国则是 50%。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一定是难以超前建设，并且要在不断地重复建设当中付出比利率更高的代价。

在一个社会，如果有足够的超前建设，这个社会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当我们不得不重复建设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浪费，这直接是一个资源效率的问题，这个效率的多少直接是流动性影响的。西方社会的崛起，也就是源于流动性的丰富，如果没有足够流动性的支持，德国怎么能够在青岛进行如此规模的超前建设？按照中国三年回本的社会利率，也就是三年要翻倍，如此计算一下是 30 年要翻 1000 倍，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是宁肯重复建设了！在重复建设的模式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资源，而且到不得不重建的时候，这样的需求还是刚需！如此刚性需求下和本来的流动性不足之下，定价权就一定是授予他人的，现在全球在博弈的就是中国发展的需求，借助这个需求来卖高价。反之在超前建设下则意味着这些建设当中储备了大量的资源，对未来是否再改造有很大的主动权，超前建设已经透支了未来的需求，未来需求给人的想象空间也不大，因此把握定价谈判的优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同时在我们当今社会资源紧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未来长期趋势下资源涨价也是共识，能够超前建设实际上就是占有了涨价的资源红利，而且在负利率和 QE 的世界，货币相对于大宗商品的贬值也是历史大趋势。超前建设还占有了货币金融红利，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重复建设的浪费是降低社会总效益的。一个社会体制的健康与否就是看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效益的关系。怎样达成一个

高效社会才是关键，这里我们看到了流动性的丰富与否，是直接影响社会运作和发展方式的。在流动性丰富的社会是一个超前建设比较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丰富的资源积累和定价权，反过来流动性紧缺的社会是一个重复建设比较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没有资源积累，是被资源先占者渔利的社会。这样的效率低集中体现在 GDP 之外的分配之上，无论是超前建设还是重复建设的 GDP 都是一样的，但重复建设的浪费必然使得你的社会成员的具体收入不高，社会成员人均占有的资源量的不足。西方社会的发达就是有赖于其流动性的充裕和超前建设的丰富，从而能够保障其人民有更高的收入比例；中国社会则是在大量的重复建设的浪费之中，老百姓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是不高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资源的社会积累量对于定价权的影响。更要认清流动性充裕与否对于定价权的影响，这个流动性和定价权的运行模式对于人们建设模式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个建设模式对社会积累、社会发展方式的影响。总之，流动性丰富与否对于现代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流动性与劳动力价格被定价

定价权竞争的终极对决是国家的劳动力定价权之争，一个国家走向发达首先就是国民的富裕，国民的富裕就是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要高，老百姓的收入要多，日本、韩国等国的成功发达都是如此。认为中国要维持廉价劳动力才能够有竞争力的看法是片面的，因为世界工厂离不开中国的劳动力，放眼全球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接盘，而且如果中国炒高农产品价格则世界其他低价劳动力加工输出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也要上涨。更关键的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竞争优势是在被西方征收了高额的所谓的反垄断反补贴反倾销的“三反税”以后的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的定价权也是在这样的流动性竞争中被压低而拱手让人的。由于我们的流动性不足，所以我们对产品没有定价权，没有定价权就要被压价，我们对原材料也没有定价权，我们的财务成本在流动性紧张的时候增加，国家防通胀收紧流动性的政策又加剧了这样的流动性紧张，最后企业运转的出路就是控制人力成本，无法压低人力成本也就无法生存。而外方把中国企业所有的成本环节计算得很清楚，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借助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让你自己举证告诉他，他给我国的价格也就是维持你企业正常运转和保

有最低工资的基础价格，如此我国企业是长不大的，员工的工资也是涨不高的。这样的趋势已成为一种宏观的现象。每一个企业的状态都类似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就被他们控制了。而西方的做法却是以提高工资和福利为拉动经济的手段，印钞的流动性首先注入了劳动力的领域，使得老百姓的收入稳步提高福利稳步增加，相比之下我们的老百姓的收入却没有增长，扣除通胀因素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是实际降低的，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是老百姓对于通胀最大的意见，如果能够如西方那样让工资的提高快于通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这样的通胀是绝对不会民怨沸腾的。因此在我们流动性泛滥导致通胀的今天，问题的核心是流动性都泛滥到了哪里，这里还关乎分配机制和老百姓收入的民生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中国劳动力的定价权被外来势力所控制，中国的社会分配机制也就被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被对方掌握了。

对于劳动力价格被控制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现在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中国古代领先世界千年所积累的大量历史财富很多就是这样被掠夺的。在当年西方崛起初期，中国与海外的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就存在了，但是这样的现象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中国在 18～19 世纪的劳动力价格就是与西方有着天壤之别的，其差别甚至超过了刚刚改革开放时的中美工资差距。我们经常宣传中国华工在外国当苦力被称作猪仔，就如当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精英刚到美国要刷盘子，但是苦力的收入是多少呢？1860 年左右中国人到美国当华工，当年华人给人洗衣服的价格是一打衬衫要 5 美元，后来降到 3 美元，筑路的华工是每月 20 美元以上，一般是 30 美元，而当时 1 美元大约可以兑换 2 两中国库平银，2 两银子足够普通人在中国生活一年。那个时候到美国当猪仔的华工也是比在国内赚得多很多的，劳动力的价格差原来百年前就有了。因此当年美国华工回国以后尽是大富翁，那些熬过来没死掉的猪仔回国就是“金山伯”，在乡下盖起钢筋水泥的碉楼当大地主了。“开平碉楼与村落”现在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了，而一两银子在当时的年代是可以换取 2000 个铜板的，而几个铜板就可以让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当年富甲天下的江浙地区喝顿酒了。由此可见，白银在当年中国的购买力和中国华工苦力相对于国内的收入差距。当年中国还是世界 GDP 第一，同时中国积累了领先世界千年的财富，这样的差距就是中外流动性之差所造成的劳动力价格的被控制进而被渔利。中国的流动性紧缺是因为中

国古代经济活动的货币就是金、银、铜，金、银、铜的生产量十分有限。在一个王朝建立后，金、银、铜的增加速度一般都低于社会财富的增加速度，故王朝一旦建立就是通货紧缩的开始。清朝的白银总量虽然多于明朝，但是中国在清朝的人口远远多于明朝很多倍，造成人均流动性远远低于明朝。清朝中国的流动性银根更紧，而且在1800年以后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中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流动性更加紧缺，这样的紧缺就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被深深地控制和压低了。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丝绸和茶叶、香料等商品也是刚需，如果中国劳动力的价格高昂，所有西方需要的产品都会因为成本带来价格的刚性支撑无法长期压价的，西方也要一样高价购买这些昂贵的茶叶和丝绸，西方与中国的贸易必然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这才是当年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精华。英国通过这样的经济理论的领先和运用，在贸易上压低中国劳动力价格所得的利益是远远大于赔款的，一年的贸易额就远远超过战争赔款，其被压低的价值又远超过贸易额，中国的财富就此大量外流。

我们要更深入地认识到廉价的劳动力价格的背后就是中国在输出这些劳动力时所必须消耗的资源。中国廉价的加工贸易看似收取了加工费，有资金进入你的经济体，实际上是你的劳动力消耗的资源效用被外国掠夺，因此压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就是掠夺一个国家。**劳动力价格不起来，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富裕**，一个劳动力价格被控制而没有定价权的国家就没有经济主权，就是经济殖民地，这与百年前中国的劳动力被定价是一样的。中国的历史学者主要关注赔款的多少，但是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吸取，中国还要再一次跌倒在同样的陷阱里面。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流动性对于劳动力价格定价权的重要性，劳动力定价权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老百姓收入、民生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也是调控流动性所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

而我们的微观调控，改善分配机制、提高老百姓收入是关键问题。认清这样的分配、薪资与流动性的关系，避免在通胀全球博弈中老百姓的收入被世界大鳄所定价。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在认识上被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马克思却早已认识到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后，工人之所以要被资本家剥削的原因就是工人没有钱，也就是没有流动性，不得不廉价出售劳动力忍受剥削，只不过现在世界发展了，这样的剥削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们对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

受限问题更多地局限在国家的制度层面，而对于经济金融货币层面的影响和外来势力的操控则认识不足，这也是导致老百姓收入增长迟缓的重要原因。造成老百姓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有多种原因的，我们应当逐一认识，对症下药，对于外来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发达国家的资源重商主义

在世界资源流向当中，人们只重视即时的价值计算，而忽略了其中的积累价值和重置价值。我们的外贸只计算顺差和逆差，似乎中国顺差赚取了巨大的便宜，但是长远来看，不要说过 10 年，就是 3 年后以当今的重置价值计算一下当初的贸易，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贸易实际上是中国吃了大亏。美国给中国的基本是以电子产品和各种知识产权为主的东西，这些电子产品在摩尔定律下 18 个月性能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也就是重置价格只有原来的1/4，而3 年36 个月就变成了 1/16，再加上产品的使用折旧等，实际上就已经是垃圾了。但是中国给美国的各种资源产品，在资源和大宗商品暴涨的背景下，重置成本提高很多甚至是翻倍还不止，同样的产品 3 年后再生产，算上折旧也比原先购买的价格要高。因此中外的贸易在时间的考验下沉淀为社会的财富和资源的积累上是极大的不同的，日本积累这样多的资源背后也是中国大量对日资源产品出口的积淀，甚至日本拿中国出口的煤炭填海造地，成为日本战略资源的积累之一。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仅仅使用货币来计算是不足的，还应当有一个另外的维度来衡量。历史上金银作为货币的时候，金银作为劳动等价物的同时也是资源等价物，因为没有金矿、银矿资源存在，再怎样劳动也无法取得金银，但是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资源限制就不存在了，在这样的信用货币模式下资源被占有货币金融制高点的利益集团所掠夺就在所难免。

因此看待贸易问题需要有长远的眼光，而衡量这样的资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标准西方以碳排放来计算是有倾向性的。在世界资源紧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建立的今天，熵增加已经是人类普遍确认的客观规律，而对于熵的永远增加的背后就是资源只能是有限的，世界各国的贸易当中不应当仅仅以价格作为衡量利弊得失的尺度。贸易的产品造成多少的熵增也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我们以熵增作为衡量的时候就可以明确看到看似等

价的交换，在熵的消耗上存在极大的不等，这样的熵增反映的就是一个国家在贸易下资源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社会发展当中，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不是简单地完全可以使用货币积累和GDP来反映的，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积累率等远远高于美国，美国基本没有什么积累，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老百姓积累的都是货币，我们的积累率是按照货币进行计算的，而西方的积累不在货币而在资源，西方的各种财富被消费后成为社会中的资源积累，就如人们到美国看到大量的铜质水管，而中国是生铁和塑料水管，这样的社会财富积累的差距是很大的。日本号称资源贫乏，可是对于日本国内积蓄的可回收金属总量计算，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银、铅和铟的资源国，其铜、铂、钽也位居世界前三位。而中国大量的是吃饭经济和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消费，因此中国的社会积累都是被吃掉用掉的，积累的只有货币，资源积累很少。在这样的资源积累效应下，日本的资源财富不再贫乏，而是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西方资源重商主义的精髓。西方只讲货币，不讲资源；只讲劳动创造，不讲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掩盖了这个世界掠夺剥削的真相，而通胀更是通过货币币值的变化，改变资源积累和财富分配的状态，也是资源重商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对资源重商主义掠夺全世界的做法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资源是衡量财富和生存权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除了挖掘本国资源以外，对外贸易和金融货币博弈是资源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资源在贸易中实现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资源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资源进口不惜负债，不主张甚至限制资源不对等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第二，由于所有贸易和金融参加国不可能同时出现资源净流入，而且任一时点上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或者减少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并且这样的损失在熵增下会多于你的所得。

第三，现在国际贸易我们说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资源反映的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中实行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是使用价值的极大的不对等，而这不对等的就是资源。

第四，造成劳动价值论的资源失真的根本原因就是价值通过价格体现，价格以货币为尺度，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具有资源属性，而现在的货币以国家债券发行，没有资源属性。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资源的限制，价值的货币尺度发生变化，因此古典的重商主义要变成资源重商主义。

第五，资源的效用是一个以货币和负熵共同衡量的一个体系，可以使用一个矢量进行表述和分析，资源重商主义本质就是在等价交换模式下取得负熵或者输出熵增。在熵的层面上，各种不同的资源统一为熵源，以此谋求熵利益，所以资源重商主义的实质就是重熵主义。

这样的资源重商主义，是各国韬晦的重点，谁也不会公开宣传，而是暗中角力，我们对于资源的重视应当极大地加强。对于这样的货币、资源等经济模型和模式，在本人另外的著作《资源角逐》最后部分进行了详细的理论论述。

第3节　劳动力价格与定价权剥削

非洲黑奴决定全球定价权

劳动力的价格本身是劳动力的成本决定的，劳动力的生活状态决定了劳动力的成本。不同地区间的贸易，由不同的劳动力成本落差带来巨大的利益差别，而什么样的劳动力成本最低呢？就是奴隶！奴隶只要能够养活他自己就足够了，没有娱乐需求、没有养家压力、没有休息旅游，等等。

我们对于竞争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倾销和低于成本的不正当竞争给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产业竞争当中，如果有一方的劳动力是奴隶，不要工资，这样的竞争结果就是让竞争各方的劳动力收入也只能与奴隶持平，这样的劳动力价格如果不是奴隶社会是无法承受的，必然导致产业崩溃，而产业崩溃以后就可以以高价赚取巨额利润了。印度的衰落，关键不是纺织科技的发展，而是美洲的廉价棉花。纺织科技再发展也离不开纺织的原料，生产原料本身需要大量的劳动，就如现在我们新疆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季节性地去采棉花，对于采棉花的机械化到现在也没有做得多好。但在当年的殖民时代，与印度相比，美国

是奴隶采棉花的，奴隶的成本就是换取一个人的口粮，而印度的种棉者则是需要换取一家人的口粮；奴隶老了就会被弄死，而一般社会则是要养活老人的。这个落差是商业竞争无法实现的，西方的财富根本不是正常的贸易能够得来的。在奴隶劳作的冲击下，印度的纺织工商业只有破产。因此在那个年代孟加拉饿死 2/3 的人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奴隶的存在也造就了社会的二元制，即以奴隶的低价劳动换取了自由人的高收入，这样在商品的总价格成本是一定的情况下，奴隶的存在保障了非奴隶人群有更大的工资空间，给这些人的高收入也是维持其社会劳动力价格与其他社会落差的手段，还能够吸引其他社会精英人才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这样的体制就有类似的功效，剥削奴隶（或外地户口、有色人种）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维持了自由人（或本地户口、白人）的劳动力定价权。而劳动力定价权又带来了其他商品的定价优势，在价格体系的主导作用达成正反馈。

对于非洲奴隶贸易，我们不只是要认识其中西方殖民者的作用，还应看到阿拉伯人在其中的作用也非常大，这背后的奴隶制度对于全球定价权的影响更巨大。奴隶贸易和奴隶的使用在废除奴隶制前是没有离开西方主流商业社会的，把西方的历史划分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本身也是一种美化。在中国，实行封建制度的是商周时代，秦帝国的统一就是中央集权了，以后虽然有奴隶的存在，但类似红楼梦贾府丫鬟、仆人这样的奴隶并不是大规模、成产业的工商业行为，是零星存在的。就算是夏商周时代，中国也没有大规模的奴隶工商业行为，但西方罗马则是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在矿山和作坊从事工商业生产活动的。在古罗马衰落以后阿拉伯崛起，阿拉伯控制西班牙 700 年，这时期阿拉伯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也是大规模地使用奴隶。阿拉伯的商业帝国是控制整个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对于黑奴更为残酷，是阉割使用的，对此大众可以在《一千零一夜》里面看到相关描写。当时中国虽然文明领先，但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农耕文化。到西方崛起开始殖民，只不过是继承了阿拉伯人的做法而已，大规模的黑奴贸易促进了美洲的繁荣，带来了低价棉花，打败了印度领先西方的纺织产业，摧毁并掠夺了印度文明等，均与廉价的奴隶生产方式有关。

再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的竞争文明均已经被奴隶产品的低成本所摧毁。美国独立了，美国的奴隶产业直接对英国产生竞争威胁，欧洲的废奴运动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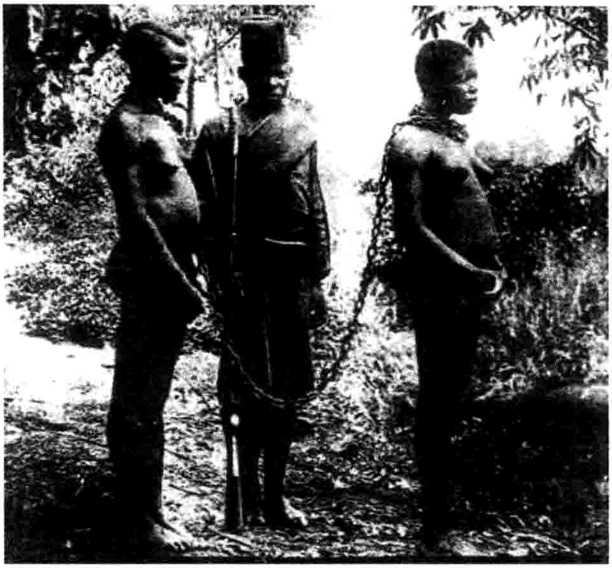


图 3-2　黑人奴隶

始了。要废除奴隶制，就要有道德制高点，英国废除奴隶制还得到了教会的支持。英国反奴隶制的运动得到了来自贵格会、浸礼会、卫理公会等其他基督教派的支持，其中福音派基督徒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年）就是典范，他参与组建了废奴协会，成为废奴的领袖。整个 18 世纪 90 年代，威尔伯福斯每年都会向议会提出废奴议案。1807 年 2 月威尔伯福斯再次向议院提交废奴议案。2 月 23 日投票赞同废除奴隶贸易的票数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3 月 25 日，议会正式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行为，并制定了相关的处罚措施。1833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法案。

对于英美废除奴隶制这件事，西方人一直说得很高尚，似乎南北战争就是为了废奴而战，但后人谈论南北战争时强调黑奴和棉花，却故意淡化宅地法和烟草。南方资本家的土地、黑奴加烟草对于北方资本家是个巨大威胁，打压土地价格和对烟草征收重税，解放黑奴也是打垮南方的战争需要，而宅地法的土地来源则是掠夺屠杀印第安人。一方面解放黑奴，另一方面却在屠杀印第安人。如果南方得胜，是否他们就可以说他们是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人权而战！美国废除奴隶制完全是一场利益博弈的结果。西方的舆论说：“在今天看来，奴隶制本身是损害奴隶主利益的，试想你种了那么多棉花要卖给谁呢？自由民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但更大的市场就是有利的吗？这里本身是有骗人的成分的！对于小国，大市场意味着控制更多的资源，对于全球而言，资源有限且一定，大市场反而让你分得更少。你的大市场是建立在外来人口要被这个市场掠夺的基础

上的，美国解放黑奴的背后就是以奴役了东方人民为基础，在美国当苦力的华工的两个月工资就可以在北京买四合院了，黑奴的成本已经不低于中国的劳动力了，在美国养活一个奴隶的成本也比很多国家劳动力的收入要高！东方劳动力的价值被打垮，除了原有的西方流动性的优势以外，就是奴隶制的美国廉价原材料压低了东方原材料出口的价格。而自由了的黑人种植从印第安人那里抢来的免费土地，成本比黑奴种植庄园主和贵族的昂贵土地的成本要更低。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发展，与侵占印第安人土地带来的低成本收益有关，只不过这个更低成本的利益所有人不同罢了。

美国废除奴隶制，带来劳动力整体收入提高，对外提高了国家在全球的定价能力，这些是北方资本不能忍受被南方奴隶制廉价劳动力竞争，同时在国际资本博弈需要高工资带来的财富分配的结果。这里面有时机的不同，在奴隶制的时候，是以极低的奴隶劳动力成本挤垮东亚、南亚的东方竞争者，而现在这些竞争者已经垮台，孟加拉的纺织产业人员大部分饿死了。西方的市场对于美国的棉花等产品产生依赖以后，提高工资反而对于当年美国崛起有利。对日不落帝国没有定价权的美国，高工资带来的高价棉花是让全球人不得不消费的“刚需”，这个高价给美国带来的财富比黑人奴隶被解放后增加的所得要多，只不过在具体的分配上，享受成果的是北方的资本大鳄而不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因此他们当然要打一仗了。

还有人说把奴隶的劳动看成无成本的劳动是不科学的，原因就是奴隶的价格在美洲也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奴隶的价格在紧俏的时候还涨价得很快。在 17 世纪，奴隶的平均价格是 200 美元；到 18 世纪就涨到 400 美元。进入 19 世纪，随着 1804 年英国政府禁止奴隶贸易，奴隶价格开始飙升。在新奥尔良，一名成年男性黑奴，在 1861 年可以卖到 1381 美元，由于北方废奴所带来的影响，到 1862 年又跌回 1116 美元。从这个价格水平来看是不低的，因为当时华工的工资是 50 美元，这 50 美元是要扣除吃饭和住宿费用的。奴隶价格是其年劳动收入的 5 倍左右，但所谓奴隶价格的高企只不过是社会内部财富的再分配，是使用奴隶的人给奴隶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如果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外部博弈，在与你自己提供劳动力人口的成本无法比拟，而英国的废奴和美国北方的废奴，背后就是关于奴隶价值的财富争

夺。奴隶解放以后，奴隶人身的价值成为消费的市场动力，给奴隶社会的竞争者带来机会和劳动力，同时也打击了占有奴隶的竞争对手。这些都只不过是西方内部财富的再分配，奴隶劳动带来全球劳动力价值被压低的效应是不变的。

在奴隶制垮台之后，世界各国对于完全低于成本的劳动力所制造的产品是非常忌讳的，这体现在对于准奴隶劳动的产品的抵制，这个产品就是犯人生产的产品。虽然西方各国也是经常利用犯人劳动的。监狱产品投放市场，曾引起社会商界和工人的抗议及反对，要求制定法律禁止监狱产品倾销自由市场。鉴于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严禁监狱产品进入市场的法规，监狱产品不进入市场成了监狱组织犯人劳动生产经营的一项原则。意大利《监狱法》规定，监狱犯人的劳动产品按顺序满足监狱系统，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公共或私人组织的订货需要，在订货不足的情况下可自由销售，也可通过公共企业销售。西班牙《监狱组织法》规定："安排罪犯劳动，不得从经济上考虑，劳动应与改造罪犯的目的相符。"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307 条即规定："全部或部分由囚犯劳动、强迫劳动或以刑期合同约束的劳动力，开采、生产或制造的任何外国的货物、器皿、物件和商品，不得进入合众国的任何口岸，并不得进口，同时授权财政部长可在必要时为实施这一规定指导制定规章。"美国的《监狱与犯人》也规定，由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购买监狱犯人的劳动产品，并实行专卖制度。为防止监狱产品进入国际贸易领域造成不正当竞争，关贸总协定允许各国将监狱产品排除在体系之外，于是 GATT1994 第 20 条 e 款应运而生，不少国家以此阻止外国监狱产品的进入。迫于国际压力，1991 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批准发布《关于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规定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外贸公司不得收购劳改产品，也不得让其他贸易公司代为收购用于出口，监狱不得向外贸公司提供出口货源。监狱不得与外商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如发现任何部门或企业出口劳改产品，海关有权扣留，没收其所得，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的处罚。

对奴隶劳动带来的全球劳动力定价权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劳动力供需曲线的理论层面加以认识。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定价曲线是后弯的，你的劳动力价格处于高位时，你会很在乎休闲时间，劳动力的价格越高你越需要有好的休

闲而不是拼命劳动；处于低位时，则意味着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更多地劳动以获得足够生存的粮食等。在奴隶可以不要报酬和没有休闲的情况下，与奴隶劳动重叠的工作在开放的市场和市场的价格竞争之下，则必然是要处于劳动力供需曲线的低位，你不得不更多地工作以维持生存，结果不但是压低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也使得本国的劳动力可以多元化并产生剥削。对于资本家而言，很多人辩解说他们也劳动，不过我们要知道他的劳动是处于劳动力定价曲线的上端，收入高了反而可以多休闲，提早财务自由，提早退休了。被剥削阶层则在劳动力供需曲线的下端，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而且收入越低越要拼命干才够吃。社会的阶层分化由此产生，不同阶层的劳动力供需曲线是不一样的。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历史上的非洲奴隶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其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些奴隶劳动所得，而是压低整体社会劳动力价值所带来的定价权利益，这个利益是远远大于奴隶劳动所得的。这样西方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就产生了这样的定价差别，或者在社会分工阶层价值链上带来好处，但殖民地独立了，宗主国就不干了，没有奴隶的资本集团掌权了也不干了，这才是全球废除奴隶制的基础。废奴与人权无关，他们是一边废除奴隶制一边屠杀印第安人并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的！而对现代社会，监狱的劳动产品比例是非常低的，但进入市场则有左右相关产品劳动力定价权的功能，因此各国把反对监狱劳动产品放到了异常重要的位置上。

综上所述，奴隶的价格对于世界劳动力定价体系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西方崛起的年代，西方利用奴隶的价格争得了全球定价权的主动，取得了比奴隶劳动本身价值大得多的利益，维系了西方的殖民霸权，而在西方殖民地独立过程当中，奴隶成为威胁，因此废除奴隶制运动就出现了。白人道德没有那么高尚，有的只是利益的取舍。在奴隶存在的年代，非洲的黑奴决定了全球劳动力的定价权，再通过劳动力定价权对于商品价值的影响，主导了全球定价体系，对全球财富和资源进行了再分配。

延伸阅读　非洲的奴隶贸易

在非洲历史上，奴隶买卖很早就出现了。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一书就有关于来自非洲之角（今索马里）的奴隶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

入北非后，也曾把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以及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非洲黑奴的历史开端据说是有一批伊斯兰教徒被人们从西班牙赶出之后，就逃到了海峡对面的非洲海岸去了。当时这一带海岸是葡萄牙人占领的地方，于是葡萄牙人就拼命追捕这些伊斯兰教居民。其中有一小部分伊斯兰难民被葡萄牙人捕获，带到葡萄牙去了。这些人就变成了奴隶，这就是在公元纪年开始，在西欧出现的第一批非洲黑人奴隶。但是，这些伊斯兰教徒，大部分都是富有的家族成员，他们的家族愿意出高价赎回他们。但是不论赎金出多少，葡萄牙人都拒绝释放奴隶，他们要外国人的钱没有用处，因为他们缺少的是在新创建的殖民地劳动中十分需要的人手，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奴隶的劳动力。至于说要捕捉更多的黑人，那是很容易办的事。葡萄牙人觉得这样交换对自己有利，所以就同意了，从此欧洲就出现了贩卖黑奴的交易。

在非洲穆斯林国家和班图人王国大量捕杀黑人，贩卖给奴隶贩子，一部分运输到阿拉伯国家，一部分卖给美洲。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人从非洲抓走了1300万黑奴（大概是因为阿拉伯人喜欢把奴隶阉割了用，所以在阿拉伯没有多少黑人），而穆斯林和班图人卖给欧洲人的黑奴有1000万。非洲的文明，完全被欧洲列强和这些抓奴隶的贩子摧毁了，很多人烟密集的地方，后来变得人烟稀少。如人口稠密的坦噶尼喀就完全被桑给巴尔苏丹国摧毁了。历史上，毛里塔尼亚王国是一个黑人国家，有很悠久很古老的历史，人口全部为黑人。后来罗马兴起，毛里塔尼亚国王在去世的时候，把全部国土献给罗马共和国。国民也因此成为罗马公民（罗马不轻易把公民权授予被征服的领土的）。后来阿拉伯人兴起后，征服了这一地区。经过阿拉伯人的治理，这一地区的全部黑人大部分都消失了（变成奴隶或被杀光了）。今天的毛里塔尼亚，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人口以阿拉伯人和摩尔人为主。

今日非洲的隔阂仍在于南部黑非洲至今不能接受以阿拉伯、土耳其混血为主的北非穆斯林国家对历史上贩卖黑奴的装聋作哑。当年阿拉伯人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组织大规模贩卖贩运非洲黑奴的文明国家，比西方早得多。在奴隶贸易的主要时期，欧洲人的奴隶，都是从非洲沿海穆斯林王国或者班图人王国那里购买的，而不是欧洲人自己去干的。这里要强调一下，欧洲人直到19世纪初，还没有能力深入黑非洲腹地，只能在沿海拥有几个据点。阿拉伯人比欧洲

人更早使用黑奴，并且在欧洲使用黑奴的时期一直使用。我们看《一千零一夜》里面，就有很多黑奴的描写。阿拉伯时期不但是奴役黑奴，还奴役欧洲人，著名的马木留克就是被阉割的奴隶兵，虽然后来他们有人专权了，这就如中国的太监专权了，但你不能否认太监整体属于极低的社会阶层。

在欧洲，14世纪已经有西班牙人贩卖从北非带来的黑奴，尔后葡萄牙人也开始了这项贸易。15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一些大成市还有专门贩卖黑人的奴隶市场。15世纪中叶开始，非洲不断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掠夺，奴隶买卖只是一项附带的贸易活动。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奴隶贸易急剧发展起来，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陆上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贩卖黑人活动，给非洲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到了16世纪末，这种可耻的交易已被各国普遍接受，当时各地都还有相当野蛮的风俗，所以并不认为贩卖黑奴的行径可耻，而黑奴们被当做畜生一样看待，没有一点权利。各国都保护黑奴买卖交易，以便使新大陆的各个岛屿能够更迅速和稳妥地殖民地化。确实，在南美这种热带地方，白种人还未服水土，还不适于承受当地的炎热气候，曾经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而这种非洲黑人出身的奴隶，却能忍受这种气候。所以，用特制的黑奴船把黑人运到美洲殖民地，就成为一种正常的海上货运活动了。这种横渡大西洋贩卖黑奴的买卖，促使白人在非洲海岸好几个地方，创建了规模庞大的贩卖黑奴公司。这种“黑货”在出产地非洲并不值钱，但是利润却十分可观。不过，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为了建立海外殖民地，人力总是非常必要的，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从黑非洲掳走大批黑人，将其远程贩运到美洲等地，这就是血腥的非洲奴隶贸易。由于奴隶贸易主要是在大西洋东西两岸进行，西方国家一般称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延续4个世纪之久，使亿万非洲人丢掉生命，给非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是非洲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延伸阅读　黑奴历史价格

在17世纪，奴隶的平均价格是200美元，到18世纪就涨到400美元。进入19世纪，随着1804年英国政府禁止奴隶贸易，奴隶价格开始飙升。图3－3为1804～1861年美国市场奴隶平均价格。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美国市场奴隶价格从

300 美元逐年上升到 800 美元。而在新奥尔良，一名成年男性黑奴，在 1861 年可以卖到 1381 美元，由于北方废奴的压力，到 1862 年又跌回 1116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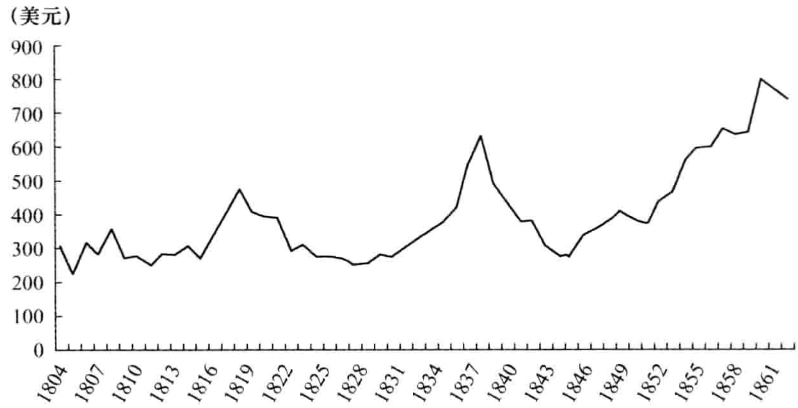


图 3－3　1804～1861 年美国市场奴隶均价格

资料来源：http：//www. measuringworth. com/slavery. php。

这是奴隶在当时的价格，那么平均每名奴隶一生能为奴隶主创造多少财富呢？如图 3－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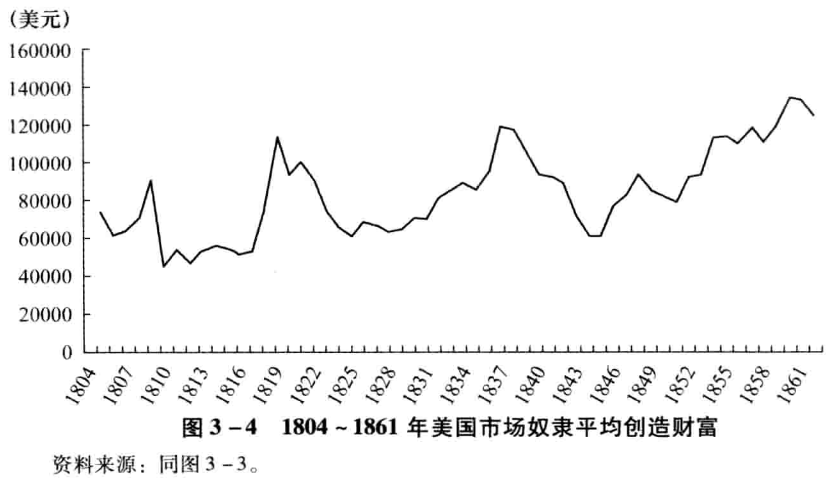


图 3－4　1804～1861 年美国市场奴隶平均创造财富

资料来源：同图 3－3。

扣除各种物价通胀因素，将奴隶价格换算成 2011 年的美元价值大约是多少呢？如图 3－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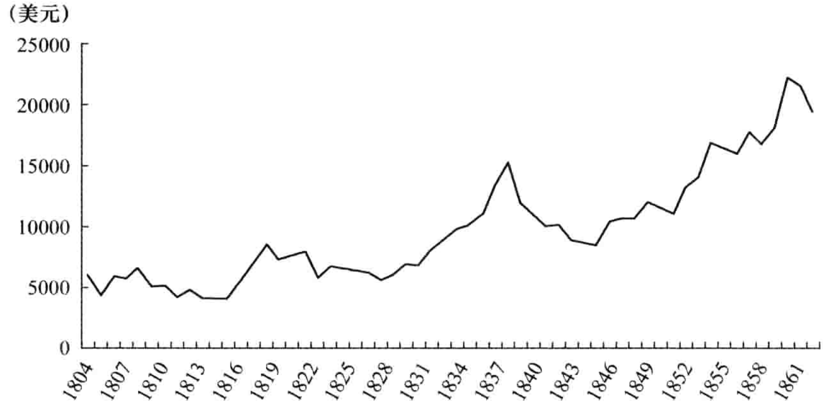


图 3－5　1804～1861 年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市场奴隶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同图 3－3。

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价权剥削

金融霸权的体现就是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金融霸权国生产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其他国家不能只“搭便车”，必须付费。这个体系也是一个定价体系，这种费用是金融霸权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收取的。具体来说，这种剥削是通过其货币的特权地位带来的定价权实现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更多的就是经济上的剥削，这个剥削体现在定价权上，而定价权的根本则是劳动力的定价。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们干同样的事情，中国人的工资只不过是他们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这些工作本身是没有差别的。

美国人拿出所谓的他们高科技和创造论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收入，中国现在高级管理层的收入也很高了，尤其是计算了他们的灰色收入所得，所以收入差别存在于一般劳动。这里一般劳动占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绝大多数情况，真正进行所谓研发创造的工作，进行中国人干不了的研发创造的工作是极少的一部分。媒体还炒作中国人的应试教育不行，实际上会应试也是一种素质，能够迅速解决难题又不出错是最好的工程师素质。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工程师，世界建设需要的工程师也比科学家要多，能够解决问题往往是更关键的因素。近年来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提升就与之有关，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也是如此。

如果以大家干同样的工作、取得同样的结果、带来同样的财富来计算，也就是以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 GDP 已经是美国的几倍了。如果美国不能掠夺这些中国人所创造的财富，美国人根本不可能享受现在的幸福生活。以美国人的高工资为基础生产的产品还要满足美国人的生活，美国的物价会大幅度上涨的。生产一部苹果手机中国得到的利润微乎其微，中国的加工费也极低，但这是以中国人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如果中国人的劳动力成本与美国接轨，苹果手机的价格就要高很多。韩国在苹果手机上的收益高，背后是韩国人的工资高，虽然同工不同酬，但在国际交易当中这些差别是不计算的，工资的高低成为国际利益分配的关键。

我们总说价值是劳动价值论，在这里我们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的，我们从这个社会必要劳动力时间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商品、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工作，但对于同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各国的计价当中却是不一样的，工资有天壤之别！还有就是工作虽然不一样，但劳动的性质和需要的培训是类似的，也应当一样而不是以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来区分，不要把我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剪刀差合理化，加工产品的难度未必有种好田的难度大，效率的不同在于对于资源的消耗不同。这里劳动价值论下的同工不同酬，就是剥削，现在剥削更多地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这类剥削能够成立的关键就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

中国与美国的工资差别是关键，在金融全球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面前，人肯定是不易流动的。如果人能够自由流动，真的如中国古代的“育民不以封疆之界”，全球的劳动力价格就要趋于一致，因为人都会向收入高的地方靠拢和迁徙，然后就是在供需关系的作用之下，不同地区的收入都趋同了；而要维持这样的工资差价，就要维持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位置劳动力供给水平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门槛，以前是资本、教育、权利、宗教、种族等对于管理者、技术者、工人、农民的差别的维持，现在又了地域的差别，在当今全球化和所谓的人权面前，地域性的差别变得更普遍了。

为了工资的差价、为了这个剥削效应，所以西方国家不给中国人签证。中国人出国难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主要也不是政权性质问题，而是中国人太多，劳动力太便宜了。没有人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和金融全球化就要产生

剥削，过去是在一国社会内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现在是工资差异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剥削。国内的一些人想要成为剥削者就要移民他国或者当带路党，但这是与95%无法移民的中国人为敌，他们需要剥削走不了的95%以上的人才能够获利，才能够被他国接受。他们的行为也与植根中国、在中国有核心利益的世家为敌。茅于轼等人说西方不存在剥削，西方老百姓过得比中国好，背后就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压力之后，通过金融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分工，把这样的剥削从国内变成了国际，从资本家与工人不同人群阶级之间变成了国家之间，这样等于是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了国外。而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剥削，国内产生各种各样的压力，反而被他们主导的舆论说成了政府和制度的问题。美国到底通过这样的剥削掠夺了多少，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延伸阅读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看待定价权对于我们的剥削，更关键的是要看制度性的国家之间的剥削，看到劳动力定价权是最根本的因素，而世界大同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之后，如果不让人自由流动，这个剥削就是存在的，各国当年对于西方世界开放自己的金融管制，如果是平等的谈判，必然也要开放对于人流的管制，就如欧盟搞统一货币和统一市场，必然是人流可以自由，包括我们去欧盟，只要有一个国家给你签证，你就可以在整个欧盟自由行动。这才是一个公平的协议，现在中国一大群带路党叫嚷中国金融要进一步开放，打着改革的旗号，但搞的是金融单方面的开放，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

当年日本以英镑为基准发行日元，取得了英国对于甲午战争的融资支持和日俄战争的全面支持。同时日本与英国结盟，英国带头并且要求其他国家跟进，取消了西方与日本的几乎所有不平等条约。当年中国发行法币绑定了英美货币，使英美与中国结盟，将日本排除在外，并且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封锁供应，派出志愿兵反抗日本侵华，使得日本只能加入德国和意大利联盟，最后二战彻底失败。印度能够坚持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权利和财产权。印度的中央银行为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简称RBI），是根据1934年出台的《印度储备银行法》（*Reserve Bank of India Act*）于1935年4月1日正式成立的，该法于2003年、2006年重新修订。印度虽然独立但也没有对这项法律进行更改，直到21世纪，仍保持着殖民者的根本利益。这些代价现在中国一句改革开放就什么对价

也没有要到，中国的央行的黄金储备全部放在美联储，也只能放在美联储，连如德国那样去看一眼的要求都不敢提，中国的货币发行 80% 以上是外汇；中国对外投资屡屡碰壁的背后是中国放外资进来完全是外资优待的，不但没有限制还有比国内更优惠的税收政策，这一点已经造成了对国内产业的不平等竞争，更加剧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

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崛起，看到了韩国的成功，甚至看到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发展，但这些成功都是劳动力成本与西方接轨为前提的，是被剥削被控制的结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能与西方接轨，中国被剥削的态势就无法改变。美国通过控制劳动力的定价权，达到剥削中国的目的。除了不让劳动力流动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压低粮食价格，粮食价格决定了劳动力的最低成本，因为劳动力总要养得起家，而低粮价也控制了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对比，只有农村种粮收入大大低于工人，农民才会大量走出来，提供丰富的工业劳动力，这样的供给以后就可以大大地压低工业劳动力的价格。因此，西方农业人口不多，西方国家都大规模补贴农业压低粮食价格，美国每一个农民每年可以得到补贴 25000 美元以上，但美国农业人口有限，可以这样搞，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怎么补贴？因此美国特别重视农产品的开放。农产品的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额里面的数量极少，为什么美国这样重视？关键就是其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了剥削才是关键！只要农产品开放了，美国就可以全球打压粮价了！中国在 WTO 对于农产品的承诺比日、韩、印度都要多！

鸦片战争中国承诺开放口岸，这是通过战争才得到的。从现在看来，多开放几个口岸并没有错，但关键是英国人给我们对等的开放吗？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能够让中国商人享有吗？忽视对等开放原则的，恰恰是民国后美国人支持的学者，这些人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是需要重新审视的。西方的流动性丰富，劳动力定价权下劳动力价格的差别和剥削，开放的贸易，这些使得劳动力差价得以套现。人员的劳动力价值的不同，还直接反映在 GDP 的差别之上，我们的 GDP 是以成本或者消费来估算的，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消费增加和产品的成本增加，在 GDP 的计算之上就会提高很多。中国的 GDP 的数量在低工资下的计算是被低估的，我们如果按照大家同样劳动同样价格来计算要高很多，这样的计算就叫做购买力平价。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的话，

GDP 都要高很多，但是我们的交易不是按照这样的平价进行的。国家 GDP 与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 GDP 之差参与国际贸易的部分，就是被这样的国家间劳动力定价权剥削的财富。

中国要提高收入，尤其是低端人群的收入，必然要既得利益者放弃利益，而这样的利益现在已经很难放弃了。比如打车的价格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服务成本与西方接轨以后，廉价的出租车和打车族就不能存在了；中国的乡村收入与日韩接轨的话，中国的粮价就要与日韩接轨了，这对于习惯低价农产品的城里人是有剧痛的！这些不是 CPI 问题，而是民族收入增长均衡的问题！如果中国最低收入的纯农民收入翻倍，中国的基尼指数立即非常合理了。如果不涨价而要补贴，这些社会服务人员和农民是大多数，怎么可能通过补贴让大多数人富裕呢？还有人说粮食涨价其他农资也要跟着涨价，这是当年计划经济刚打破的经验，现在农资生产已经市场化且过剩，过剩下怎么可能大幅度涨价？现在完全不是当年紧缺条件下需要计划供应化肥的时代了。

现在城里人压力大的背后就是涨价，但在全国市场化以后，劳动力价格的城乡均衡是不可逆转的，否则我们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结果就是城里的服务业的价格要涨价，我们坐不起出租车就是这样的背景。要知道在西方社会，打车成为日常交通工具是奢侈的，打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要富裕多了。中国能够有便宜车打，背后就是有廉价的司机，有城乡二元化带来的劳动力价格差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涨价所带来的物价上涨，是不能叫做通胀的，就如 10 多年前北京雇佣保姆是 300 元，2013 年至少要 3000 元，你能够说这是通胀吗？还有就是美国的股市比 2008 年底部翻倍了，这 100 元原来平均可以买 20 股现在平均只有 10 股，你能够说是通胀吗？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背后有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因素，中国现在养活一个孩子的成本与 30 年前相差多少？所以我们对抗西方劳动力定价权的剥削，就需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肯定带来涨价，但这个涨价不能简单等同于通胀，而是与西方崛起时的劳动力涨价一样，是一场社会价格革命，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否则劳动力差价的剥削依然存在，是不可能成为发达社会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对国与国的经济博弈有更深刻的认识，国家之间的剥削替代了以前阶级之间的剥削。中国对于这样的剥削要有深刻的认识，不能把

这样的剥削差别变成国家制度好坏的差别，而中国在目前因为实力差距不得不忍受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剥削，但绝不能再放任给日、欧、韩这样的二鬼子剥削。

延伸阅读　美元霸权的掠夺

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

这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的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该报告称，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

为定量测算世界各国的霸权红利收益和损失，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专门构建霸权红利模型，并计算出100个样本国家2011年的霸权红利情况。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高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

中科院最新出炉的这份国家健康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如果没有GDP过半的霸权红利损失，中国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可缩短20%～30%，完全可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到2020年，中国也有能力建立起类似北欧国家实现全民免费的医保、养老和教育等福利制度，建成共同富裕、高人类福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违反人权限制中国的背后

人权概念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人的自由，自由体现在人的自由迁徙权上。如果真讲彻底的人权，就应当让全世界的人口自由流动而不要什么签证，但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是差别待遇的。中国人几乎走到哪里都需要签证，人口的流动是受到巨大限制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即便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也没有这样的限制。在民国时代，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是相对自由的，需要签证的情况很少，但现在这样的限制出现了。中国比那个时候强大了，西方对于中国的限制找出了很多的理由，并且把这样的责任变成了中国制度的“邪恶”，但是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托词。

认识到劳动力定价权的重要，认识到劳动力价格的地区差异可以产生剥削的效用，就知道西方为什么这样限制中国。我们所进行的交易是等价交换，而价值与劳动时间和生产率等有关，限制中国的劳动力流入就可以保持这样的差别，这样的差别就可以产生对于劳动力的剥削，因此西方这样限制中国的实际背景，就是要在贸易上保持对于中国的剥削地位。如果中国人可以自由迁徙到世界各国，那么各国工资水平的差异将被逐渐抹平，劳动力价格的差别就不存在了，就如在有城乡差别的时候，会以农村户口限制农民进城。当年华工去了，他们搞了排华法案，现在中国的很多移民辛勤劳动，也被指责为没有底线，让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在竞争当中下降。民国时期不设签证，是因为当初出国要坐远洋轮船，成本很高，只有富人能够承担，对于富人他们都是欢迎的，包括很多地方制定的吸引中国富豪移民的政策。

这对待中国人的政策完全是利益的考虑，与所谓的人权是无关的，占据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是政治博弈常见的把戏。人权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的迁徙权，这是最基本的自然法则。我们注意到一些公知提及西方自然法则的时候，主要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第一条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条是人类具有自由交易的权利；第三条是每人都有信守承诺的义务，也就是说话要算数。近代以来，如同哈耶克所说的，人类所有伟大的法律改进，其实都是这三条自然法的延伸和扩展。但我们注意到这个自然法里面没有人的迁徙自由，没有人的活动自由，世界的贸易要自由的，但

人的活动是不能自由的，如果不能自由地迁徙流动，就是把人囿于牢笼，只不过这个牢笼的边界比较大而已，这不是自由。西方能够自由免签，不是他们有民主制度，而是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差不多，劳动力价格差不多的时候，移动迁徙能够促进劳动力更好地分工组合，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西方对于墨西哥、印度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一样是限制和需要签证的。尤其是对于人们移动到其他国家的就业权更是如此，工作签证是最难的，除非特别需要的技术人员，能够去就业的人口是被严格限制的，投资移民是一个人要去给他们创造十个就业岗位的！

西方给我们布道宣扬人权，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放人口流动，在流动权上大家的人权对等，把各国间的人口流动放到首位，我们的改革开放难道不就是以此为基点的吗？我们对美国讲人权，就要讲人口的流动权，而不是金融管制对美国开放。如果人的流动不能开放，劳动力价格有落差，则金融单方面的开放对于金融霸权国是有利的，对于制造国来说就是被掠夺。对此我们可以对比欧盟的做法。欧盟成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欧洲人可以在欧盟内自由流动，甚至对于外国人也是签证的落地生根，关键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市场化流动消除劳动力的价格差异，避免这样的资源剥削和掠夺的效用存在，这也是欧盟能够建立的基础，如果欧盟内部存在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异，是难以统一为一个经济体的，背后的剥削必然要产生。

想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工资有很多倍的落差，如果人口能够自由迁徙，怎样能够保持这样的落差，没有这个落差怎样保持西方的定价权和富裕生活？所以我们认识到劳动力定价权的关键性，认识到劳动力价格的区域差异带来的财富和剥削的效应，就可以在利益层面理解为何中国人的迁徙人权受到了西方限制，这不是什么普世价值的原因，是赤裸裸的利益考量，或者说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唯利是图。

认识日本崛起时工资倍增的力量

日本从战败中崛起，彻底超越当年的中国的时代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当年与中国的不同之处除了中国的内斗以外，还包括日本走上了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道路，而中国则是更重视国家的财富，中国的两弹一星就是那个时代的产

物。中国的技术积累和突破意义重大，不过日本的技术积累在二战以前就完成了。日本当年的航空母舰也是争霸全球的利器，是有全球竞争能力的，只不过是败于美国，所以在技术积累完成以后，发挥技术积累的优势，走出战败国的境地而崛起，提高国民收入更为关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日本经济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堪称日本的“黄金时代”。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 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 1.7 倍。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 2.7 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 1960~1969 年，农产品价格上涨 95% 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 30% 左右。“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这里的关键就是让农业人口也能够步入中产的行列。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涨工资所带来的力量，日本的涨工资是从最低工资和粮食的价格上涨开始的，这样的涨工资的结果就是最低的劳动力价格得到保障。粮食的价格是最低劳动力收入的红线，你的收入要足够一家人吃饭；同时对于工业的发展需要农村贡献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收入也是与农业的收入挂钩的，如果农业的收入提高，必然的是劳动人口向农业的回流。日本涨粮价的政策，还使得日本的粮食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在国家崛起的时代不受国际粮食攻击，不用从国际上购买过多的农产品，给外汇平衡造成压力，保持了日本粮食的高自给率。同样的日本的渔业发展非常快也得益于当时的高价政策，日本的捕鱼船队得以横行全球，捕鱼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的同时也使得国家对国际的生存依赖降低，这些都带来了日本在国际定价权上的影响。

对于日本的涨工资，以及粮食等与劳动力价格密切相关的产品的价格上涨，

带给日本的不是通胀，而是价格革命，是与当年西方崛起时的价值革命是一个概念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看待涨工资所带来的涨价效应，要更重视涨工资所带来的社会效率，尤其是在涨工资以后的对外交易当中，贸易给全社会带来的所得增加了。这个增加的过程与当年世界财富从东到西的移动也是一致的，所有国家摆脱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减少财富差距，与提高最低的工资收益都是紧密联系的。而涨工资带来的国际定价权博弈上更多的利益，改变了贸易背后的财富分配。

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当年的日本是世界工厂，类似今日之中国，劳动力的上涨使得在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国际资本难以压低日本的产品价格，日本社会在出口上就可以为国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日本的熟练工人群体的组织效率是非常好的，向日本之外转移产业只能是相对低端的产品制造，日本是在涨工资的过程当中完成产业升级的。在60年代过后，日本的高端制造业是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尤其是日本汽车当年挤垮了欧美汽车厂商，在世界车市占据了主流地位。我们都应当记住日本涨工资的作用，只有工资足够高，对劳动者的培养才是可以得利的。日本的工资在后来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对于欧美的高工资的优势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优势，这才是关键，你的产业在与谁比工资？没有足够高的工资，是不会有高端的工程师和工人的，中国海外移民大军当中，这些高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流失是巨大的，人数是要超过富豪人数的，而且富豪出去了还要在中国圈钱赚钱，而工程师走了则彻底服务他人了，中国留住高端人才也是需要提高工资的。而中国中端人才的成长，也必然是在高工资的基础之上才有更多的培训成长的机会。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到制造业强国，这些中端劳动力基础和高端工程人才的积累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来源。涨工资是可以带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参照日本的发展历程，对于提高劳动力价格带来的国家崛起力量要充分认识，这是在博弈劳动力的定价权，而劳动力的定价则影响到所有产品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国际定价博弈的关键环节。日本的涨工资带来的不是通胀，而是一次新的价格革命。

中国当前为什么不怕人力成本上涨

每到说起来涨工资，社会舆论中的反对声音就很多，对此需要具体深入地

分析一下。

世界正处于经济危机的萧条之中，中国的人民币也在升值的通道中，但是中国国内在通胀的压力之下，工资的上涨矛盾越来越大，工资背后的收入不公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现在有诸多的声音在反对工资上涨，主要理由是工资的上涨会带来新的一轮通胀，工资的上涨会削弱中国制造的海外竞争力。但是这些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背后是有各种利益的不良图谋的。

对于我们的出口来说，以富士康为例，现在富士康已经从 1200 元增加到 2000 元的工资，但对于西方即使是 300 美元涨到 600 美元，依然是极其便宜的，美国汽车工人的人均人力成本超过 14 万美元/年，但是这样的工资上涨会让中国的整体人民收益增加。因此不要简单地说为了外贸出口不能让劳动力成本增加过快，中国需要的是走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外贸可能离开中国，往东南亚转移，但东南亚受到人口的限制是难以完全替代中国的。东南亚的“小龙”国家工资水平是高于中国的，而其他国家政治动荡对于外商的影响就不单单是钱能够计算的了。同时印度虽然有足够的人口，但是基础设施落后，印度孟买经济带的土地价格已经超过上海，且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已经数倍增长的今天，这根本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印度完成中国当前的基础建设的成本也要有数量级的差别。中国的基本工资的增加背后一定是亚洲各国工资水平的整体增加，不用过于担心中国的工资增长所带来的通胀，因为所有购买中国制造的国家同样要通胀，而且在世界大宗商品不断暴涨的这些年，世界本来就是通胀的，只不过中国的不正常的工资把这样的通胀给抵消了，让外国得到了利益，这也是外国或者有外国背景的各路专家纷纷评说中国不能涨工资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工资水平占 GDP 的比例是很低的，与世界相比是有巨大上涨空间的。据统计中国的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例为 12%，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高达 50% ~60%，世界平均为 40%。如果计算了各种报酬和补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在 1983 年达到 56.5% 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 年已经下降到 36.7%，22 年间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工资收入偏低，老百姓为了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存，尤其是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劳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 26 天，每周工作 58.4 小

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超过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靠加班加点获取更多一点的工资收入。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对于东南亚、印度等国家也是不多见的，如果以中国工人的人均工时工资进行计算，这样的差距将更大。

又有人提出现在的汇率上涨对于中国的出口已经形成了压力，工资再度上涨一定是雪上加霜，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要从多方位认识。这些年以来中国的汇率有一定的增长，从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8.31到现在已经不足6.8，但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从经济危机中得到恢复，在汇率上的上涨幅度是大于中国的，比如日本就是从120多日元兑换一美元升值到不到90日元。因此相对于其他亚洲各国而言，我们的升值在绑定美元的基础上还有补升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产品的成本构成。中国的工资等人力成本在GDP中所占据的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是在微观上中国产品的人力成本所占据的比例也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工资升值的空间。更主要的是，在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我们的原材料成本是国际价格，不会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改变，改变的还有设备的折旧等。中国制造是依靠进口设备、技术来实现的，比如计算机的应用，计算机的主要部件和系统软件等都是进口的，人民币的升值恰恰使得我们的设备等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设备成本是我们产品成本构成中的大头，同时在中国现阶段进入产业升级，设备的升级换代和改造需要大量进口设备和购买外国高科技。人民币的升值在这方面是可以得到收益并对冲工资和汇率的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因素的。

况且工资上涨就真会导致出口价格增加吗？我们这里还忽略了西方对于我们贸易保护的因素，西方的反倾销措施愈演愈烈，中国制造被大面积征收反倾销税，税额高达百分之几十甚至几百，中国产品的成本价格竞争力在高额反倾销税的背景下还是有竞争力的。东南亚很多国家之所以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便宜，更能够吸引外资，不是他们真正的劳动力便宜，而是他们作为原产地的出口产品没有反倾销税！西方的反倾销税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给征收了！而人民币的升值和工资的增长对于中国反倾销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解决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所谓中国海外倾销的问题，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之中时是不存在的，

因此这个问题在我们WTO谈判之中没有得到重视，成为日后西方贸易保护的武器。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西方可以选择一个有货币贬值预期的替代国，因为中国的工资比例低西方就可以选择一个工资中不含社保等部分的高工资的国家，因此就可以得出中国倾销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由于货币汇率预期的差别和工资的低廉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倾销，在人民币升值和工资提高以后，这样的情况将得到避免，近期我们的反倾销在WTO胜诉也不是偶然的。以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和工资提高来避免西方的反倾销壁垒，这实际上就是让西方的反倾销税来给中国老百姓提高收入，这样的结果当然对中国经济有益无害，而西方则损失了他们的反倾销所得和贸易壁垒，因此西方的学者及其国内代理人鼓噪说中国的工资不能涨也是有他们的利益背景的。在以替代国计算不能得出歪曲的中国倾销结论，西方不能以此渔利以后，没有了不当利益的干扰，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容易解决多了。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出口加工业就一定对于中国经济有利吗？仔细想一下，会发现这个前提也是有问题的。以前很多学者都认为通过加工出口，每笔进入中国的加工费都是中国从经济体外得到的收入，因此在中国主流经济理论支持下政策是大力扶持中国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并且把这样的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但是我们要知道劳务的输出和对外的加工也是要消耗成本的，这成本实际上也是有中国的资源外流的。过于低廉的出口加工，实际上就是在输出中国的劳动力所必需消耗的资源，就是在输出这些劳动者生存必需的粮食、能源、土地等。对于劳动者所必需的资源不仅仅是劳动者劳动时的消耗，还要计算劳动者的培养、成长的消耗，还要计算劳动者养家的消耗，还要计算劳动者养老、养病的消耗等，这样的消耗是很大的。西方国家同样的劳动力为什么贵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劳动力在他们社会的上述消耗要远远高于我们！我国很多沿海地区依靠加工出口实现经济发达，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承担外来人口的附加消耗，在沿海打工的劳动者的成长、义务教育、养老等是劳动者所属的其他地区所承担的。如果让这些流入的外来务工者享受与本地人同样的待遇，让他们能够有房产和社保、有户口和子女义务教育，沿海很多地区就没有那样富了，因此很多地区是限制他们外来落户的！而对于劳务输出地区，由于现在的劳动力以计划生育以前生育高峰时的人口为主力，他们的外

出务工还没有到养老要地方负担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他们抚养的人数和成本也受到控制，同时由于当时的出生率高，大量的农村富裕劳动力是没有工作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效应是明显的，所有这些都与中国当前的人口红利等有关，在中国人口红利期过去以后这样的情况都要改变。中国的廉价加工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粮食等资源的流失。

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分子是非劳动力人口数，分母是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数）从80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几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分母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抚养比降低。可是等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变成了劳动力人口，于是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抚养比迅速上升。这说明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对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所谓的不真实的低成本是要正视的，因为这些人的养老成本要计算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里面的，因此透支中国人口成本的低价出口是有问题的，不是我们简单地认为人为的出口加工是只赚不赔的事情。

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多在低薪和高危行业，平均年龄约为27.3岁。由于分布、结构、素质复杂，其生存发展面临六大问题，对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而西方让中国这样的廉价加工出口，就是让中国这些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所消耗的资源出口，让西方占有和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而把灾难留给中国人的子孙。对此我时时记得很多年前与西方买办假洋鬼子的一段对话，该假洋鬼子说他对于中国做加工的赚钱规则，就是要把价格压榨到只够给中国人付一半工资的程度，你不干就没有钱吃饭而你要有全部的工资就只能是加班干！这样的买办很多时候比贪官还可恶，但是作为高干子弟的他还自诩自力更生，没有贪污腐败。很多人说即便如此也得干，因为不干没有饭吃，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其他各国是难以有如我国般这样大的产能的，尤其是中国的优势产品，比如服装、鞋子等对于世界很多品牌的代工生产，质量稳定是第一位的，多的那一点加工费的边际贡献并不重要。中国的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和分工已经形成了规模和组织上的优势，这不是简单的有人干活就可以了，但是每一次交易为什么总是中国处在交易价的最低点呢？这里也是与我们的思想误区有关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力成本和汇率的变动会极大危害经济的说法，是很多西方利益集团因其利益背景分析给我们听的，我们国内也有他们利益集团的买办和被洗脑者。中国的工资过低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分配不公，这样的低工资是在中国人口红利下劳动力供给过剩、边际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实现的，所得的利益也没有计算中国的社会成本等间接支出。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不变，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危害。中国当前不怕人力成本的提高，中国目前的产品竞争力是在计算了反倾销税后的竞争力，中国的人力成本上涨是为打破反倾销的盘剥和西方对于中国人劳动报酬的不公。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目前中国需要人力成本提高，改善社会分配不公，中国需要一个劳动力取得公平报酬的社会环境，作为和谐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全球为劳动力价格的激烈博弈

全球的定价权博弈，劳动力价格是最关键的因素。为了增加国家的竞争力，保持国内劳动力价格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是必须的。怎样让自己的劳动力价格提高？除了限制外来人口进入的壁垒以外，国内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则是必须的。

福利社会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呢？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不惜一切来维护这个福利体系呢？福利体系又怎样给一个国家带来了核心价值呢？认识到这些我们才可以真正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来源。这个差距就是劳动力价格的差距，同工不同酬，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保障了发达国家高昂的劳动力价格，保障了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在贸易当中看似等价交换的贸易，实际上还原成同样的劳动，是劳动时间的不等价交换，或者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等价交换。如果我们还认定价值来源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话，就是价值的不等价交换，这就直接造成了剥削；如果我们的价值还包含了资源，那么劳动力价值高的国家在交易的过程中商品的资源含量就低，直接造成了资源的再分配。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社会福利之下，人们的劳动力供给与价格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人们在社会保障体系下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人们失业以后是不会着急为生存去找低廉的工作的，尤其是不会牺牲自己的闲暇舒适去找工作，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就不会过低，保证了西方社会在危机当中，即使是失

业率高企的时候，西方的工资等劳动力价格也不会下降！反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很多人的收入过低，他们就必须要拼命地工作以赚足工资满足自己的生存。中国古代的农业内卷化就是如此，西方在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要每天劳作 15 个小时也是如此，中国现在的农民工在血汗工厂里面要干 12 个小时以上还是如此，**这样的现象都体现在后弯的劳动力曲线之上。**

这样的曲线在全球不同地区是同时存在的，发达国家以完善的社保福利体系的国家信用维持劳动力价格在后弯曲线的上方，使得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的均衡点位置很高，决定了发达国家的高工资；而发展中国家因为国家信用有限和社会财富积累不足，建立不起福利保障体系，老百姓迫于生计则不得不在供给曲线后弯的下方，使得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的均衡点位置很低，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没有过去，生育高峰的劳动力还没有到老去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就出现了用工荒，背后就是人们财富积累多了以后，尤其是独生子女从小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没有人愿意干血汗工厂了。人们寻求生活乐趣，工作时间大幅度缩短，中国的社会信用提高了，中国的社保覆盖提高了，大家为了养老和医疗而拼命工作的动力大幅度下降，供给的减少造成了工资的提升。

西方为了劳动力价值高和失业少，其社保体系下是养活了大量不工作的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保效应是西方人没有孝道，不用养活老人，老人是国家的社保体系来养活，年轻人没有赡养父母的负担，工作的需求就会进一步的降低，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同样对于中国社会，社保体系难以按照西方标准进行足够的完善，很多地方养老依然要依靠子女，要养活老人的独生子女的劳动赚钱需求是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就要增加，因此中国的工资就是在后弯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低端。

为了压低其他国家的工资，美国粮食武器的作用也是巨大的。美国对于粮食是有巨大补贴的，美国约有农民 300 万人，但是 2000 年美国农业补贴高达 757 亿美元，人均补贴 2.5 万美元。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农业财政支出大致在 460 亿美元左右，占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3.7%；进入 21 世纪以来，农业补贴的急剧增加导致农业财政支出大大增加，2000 年达到 757 亿美元，占联邦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上升到 4.2%。美国大量补贴粮食并且大规模出口粮

食，压低了世界各国的粮价，而我们的最低收入是与粮价挂钩的，农业人口的收入也与粮价有关。在粮价降低以后，则低价压迫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工厂，提供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否则因粮价高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要回流了。这样的低粮价效应不但挤压了中国，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效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对于粮价是非常敏感的，这造成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与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巨大落差。而日韩能够崛起，能够维持国内人民的高收入水平，与日韩的粮价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有关的。这里，西方的粮食武器对于劳动力价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老百姓的工资存在10倍甚至100倍的差距，这背后就是福利体系的差距；同时西方不合理的福利体系维持了他们不合理的高工资，这些高工资之下，维系了他们高额的GDP！这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差别，同工不同酬就是剥削。但是很多西方思潮把这个现象解释成为西方科技先进的力量，以此掩盖国家信用力量的剥削效应，如果真的是科技力量的话，那么从事科技研究的劳动者收入应更高才对，但是我们在美国社会看到的却是汽车工人的工资要超过大学教授！这里福利体系是有绝对的信用价值，会产生信用的剥削。

我们认识到劳动力价格不同的差别，在国际贸易当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交易，就是不平等交易；而信用体系的坍塌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国际贸易，还影响到国内的GDP和通胀，因为GDP的计算主要依据劳动力价格。GDP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的角度来计算，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补贴）、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计算公式为：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劳动者的报酬降低会直接降低国家的GDP，发达国家的GDP当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高达60%左右，如果信用体系崩盘，则他们的GDP将大幅度下跌。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财富，将按照新的劳动力价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价值重估，社会财富存量的重估价值也将大幅度缩水，而GDP和社会财富存量是一个国家金融和经济信用的根本，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货币信用；在这个信用体系坍塌的情况下，GDP缩水、社会财富积累量的价值缩水，必然造成原来货

币的发行量相对过高，必然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胀！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信用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了，这个国家的 GDP 和社会财富积累重估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就有升值的空间，但是与前面不同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反转变成通缩，因为在现代银行金融体制下，央行发行货币是非常容易的，中国广义货币 M2 的连年增长也就是如此。这里不对等的原因就是货币超发时收回货币是困难的，因货币数量不足增发货币是容易的。这就是覆水难收的道理。

如果出现福利体系的崩盘，国家信用必然坍塌，国际劳动力差价就没有了，不能通过劳动力差价取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西方世界的恶性通胀和货币贬值必然发生。因此欧债危机再大，美日的负债再高，政府也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个福利体系。西方的金融资本大鳄不惜减债和广施慈善也要维护这个体系，出发点并不是简单的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因为如果出现福利体系崩盘的信用坍塌，是要发生恶性通胀或者恶性贬值的，是要把有产者的资产剥夺光的，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资本大鳄的利益。大鳄们不是雷锋，也不是慈善家。

西方能够维持无比发达的福利的原因，就是西方拥有定价权的结果，就是通过这样的高工资制度取得定价权，在国际贸易当中取得相应溢价；因为看似等价国际交换，是在不同的劳动力价格上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如果以同等的劳动量来计算，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贸易就不再是等价交换了！如果再考虑其中资源的价值，则这样的操作还赚取了大量资源。但是西方的高福利维持劳动力的高价赚取国际贸易利益进行信用剥削的体系，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高工资赚取进口利益和资源利益时，高工资也同时会让本国的实体经济买单，实际上就是使得西方人的工资收入高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让制造业的竞争力严重不足，制造业的外迁就成定局了，而制造业的外迁又影响国家的税收，税收低了又影响社会福利信用体系的循环，造成连锁反应和恶性反馈。这就是西方当今的危机。如此的恶性循环、寅吃卯粮却还没有到破裂的时候，庞氏骗局还可以维持，但到维持不下去的时候，西方会乖乖地交出全球定价权吗？从西方殖民的历史来看，这肯定是不会的，一场战争必然来临。政治是经济的延续，军事又是政治的继续，全球为劳动力定价权在激烈

地博弈。

中国要崛起，福利社保体系的建立和社会公平非常重要，2014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2020 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合并实施新农保和城居保，形成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四个统一”，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这是推动中国社保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中国的社保能够有所保障，与我们的政府财产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不能如西方那样全球印钞，但中国政府是公有制，有巨大的财产。我们央企创造的财富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因此对于央企既不能贱卖给披着民资的外国资本及其买办代理人，也不能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要真正的造福人民。而围绕让这些企业私有化和退出市场的博弈背后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

综上所述，世界的福利体系是非常关键的，在维护和建设这个体系当中各国的博弈都用尽所能，背后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劳动力价格被压扁。中国要崛起，也是要中国人的劳动力价值的崛起，在全球价格定价分配当中不被剥削。

第 4 节　资源积累的重要意义

金融、资源、战争与生存权

我们看到很多货币金融等的博弈，通过通胀等金融货币手段可以占有大量财富。同时货币也是财富的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但是这些如果不与实物联系起来，都只不过是一串串虚拟的数字。

货币如果用于传统的贸易，那么与之有关的就是商品，如果是不准备拿来买卖和交换的物品，就不是商品，而人类大量积累的财富和拥有的资源等财产，是不卖的。这些资产的数量远远多于在流通的商品数量，就如股市，能够实际交易的股票远远少于控股股东们为控制公司而持有的、不轻易卖出的那部分股

票。这样在传统经济中也就是每年新生产的产品和少量储藏商品在流通，但是金融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而金融，在资产证券化的今天，实际上就是把以前不作为商品流通的资产变成了可以金融流通的商品，并且加入了全球博弈的体系，这样就可以使得再次分配世界的财富成为可能。因为在贸易时代流通的财富太少了，金融时代变成了全流通。就如我们的股改，以前不流通的资产也流通了，非流通时代这些财富是被国家控制而不是被资本控制的。这样的博弈就是把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放到了博弈的棋盘上了。

金融博弈的另一个要点是对于未来份额的圈占，因为金融系统不仅仅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把历史上积累的财富给放到了博弈的舞台上，而且通过期货衍生等工具把未来的资源和财富也放到了博弈的棋盘上，而现在虽然没有奴役人的奴隶制度，但是金融通过利率和借贷消费等手段，实际上把人的劳动也绑到了金融平台上，多少人成了银行的房奴、卡奴，在利率的压力下一生都在为银行工作。实际上金融的大网是将世界万象包罗且疏而不漏。

这样的金融博弈实际上只是在棋盘上下棋的规则和棋子，真正的博弈目的不是金融的数字，而是实际的资产，而更加深入的不是资产的数量，而是资产在全球总资产的比例或份额。这个份额包括历史积累下来的财富，金融博弈提供了一个可以把历史财富不通过战争圈占的手段，这样的比例份额才是更好的实力体现。金融舞台上的不断博弈，实质都是重新分配这些世界资源的博弈。

但金融博弈再复杂，最终也要回归到财富等实质物质基础上，回到资源的再分配和财富的占有上来。以中国人口之众，需要的财富资源总量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需求给全世界都带来很大压力；而随着中国的发展，这样大的资源需求放到了世界博弈的舞台上，同时中国的历史财富、产能、人力资源等也放到了这个舞台上，势必会有新的金融版图和世界瓜分格局出现，势必带给世界各方巨大的压力，也是他们觊觎的巨大的利益，现在对中国而言是关键的历史时期。

对于资源的博弈，首先要认识到资源的本质。更深刻地看待资源，就可以明白资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存权，我们需要依靠资源而生存。人活着就在消耗资源，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资源的支撑和消耗，甚至是我们活着呼吸，

都在消耗氧气，环保事业中的重要指标 COD、BOD（分解污染物质的化学需氧量、生物需氧量）等，就是对于氧气等资源的一种衡量。一个人的生存，需要有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离不开人的劳动，但是也离不开取得这样的粮食的土地，按照现在的粮食产量来说，每个人需要一亩三分地。而我们需要的水资源也是地道的“刚需”，这不仅仅包括我们自己喝的那些水，还包括我们用的水、生产粮食的水，还有就是我们使用后污水净化所需要的足够大的水体！我们住的房子、穿的衣服、使用的燃料，同样是对应着森林、矿产等资源。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财富，改善生活，另外那些无法通过劳动取得的生存保障也是我们无法离开的。

中国人是勤劳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的东西相对于无法通过劳动得到的东西而言都是简单的，在生存压力下，任何人都会拼命劳动，所以劳动所不能解决的东西才是我们更加需要珍惜的。他们决定了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的生存空间是由资源构建的。在劳动推动经济发展到了极致的时候，真正让我们受到限制的是劳动之外的资源，资源的紧缺会使我们失去可以劳动的对象，资源决定了我们生存空间的大小。这样一来，拥有资源的国家就可以用资源来卡住我们的脖子，以资源的不正常的价格掠夺和剥削我们的劳动，资源的重要性就会显现。

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价的现象，背后就是中国发展需要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我们买的是资源，而我们卖的是劳动产品，他国就是以这样的定价机制来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来掠夺中国人的劳动，让我们的劳动价值变得极其微薄。中国对于资源的危机意识必须从我们无厘头的地大物博的自大中走出来，先有思想上的高度，才能有实际的发展。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有限就是资源的稀缺性，而资源也是人类生存离不开的，这就是人类对于资源的依赖性。资源的稀缺性和依赖性的有机联系使得我们的生存空间就被我们必须依赖而又是有限的、稀缺的物质所限定。也就是说，资源实质上构建了我们的生存空间。

人类所有战争的实质都是资源争夺，人类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不断，而战争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直接的以领土人口为目的的战争占了历史上历次战争的绝大多数。在这些战争所处的历史时期，领土和人口就是人类最主要的资源

了，因此这样的战争就是赤裸裸的资源争夺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争夺的资源对象变得更加广泛，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年代，取得贵金属的流入就变得极其重要，所以有了历史上的重商主义，为了贵金属的流入采取非常龌龊的手段，并且以战争为后盾，就如鸦片战争，西方叫做通商战争，而他们的通商就是以通商之名行掠夺殖民之实。而后来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和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瓶颈以后，各种战争就围绕着石油进行了，几次中东战争都是如此，最近俄罗斯对于南奥塞梯的军事行动，也有控制石油运输管道的重大战略意义。所以这些战争也一样是为了资源。还有一些战争，冠以各种正义之名，就如古代的替天行道和现代的为了民主人权反对侵略，等等。这样的战争实际上是在维护一个游戏规则，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是在保护我们的资源不被掠夺，或者是保护强权的游戏规则让强势的一方可以按照规则通过贸易等资源重商主义手段得到对方的资源，其背后还是资源的争夺。所以人类的各种战争都是围绕着资源争夺这出大戏进行的，在不能通过贸易和商业往来得到资源的情况下，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资源，传统上对于战争的理解很关心领土、赔款等问题，但实际上战争是对资源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争夺；而现在的和平环境一样具备资源竞争的性质，这样的竞争不亚于一场真正战争。对于战争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就知道“上兵伐谋”了，如果能够通过计谋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真刀真枪的战争也就不需要打了，而战争的目的又是资源，得到资源实现战争目标难道不是一次战争吗？国际贸易的背后，如果是资源的交易不平衡，大量的资源通过贸易从一个国家流入另外的国家，使国家的财富和强弱关系发生悄然的改变，这样的过程往往比战争更加可怕，因为这是一个流水无痕、积少成多的过程，多年的累积远远超过一次战争的所得，而战争对于双方都有损失、代价很大，而通过贸易的所得可以说是没有损失的资源净收入，在没有明显的战场胜利的情况下，更好的达到了目的，这不正是兵法中的最高境界？

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源外流的历史，而在我们的历史中战争赔款的金额远远小于经济贸易掠夺的外流，因为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协定关税，中国丧失了对于资源外流进行保护的措施，而我们现在要保护中国的稀土资源，西方也是进行 WTO 的诉讼进行干涉。这样的中国资源的外流，导致中国这个历

史上的富国、千年世界第一，甚至大部分时间超过世界 GDP50% 的超级强国几乎丧失了几千年来所积累下来的所有财富，到中国的二战以前，中国成了世界的乞丐。这些财富哪里去了？战败的赔款只是很小的部分，清朝灭亡后军阀混战的规模也很小，更多的财富损失是在看似和平的贸易中流失到了海外。

要知道中国《辛丑条约》的赔款是依靠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抵押的，而中国当时的协定关税只有贸易额的 5%，只相当于我们的营业税，中国只能分享一部分关税，而《辛丑条约》中国的赔款超过所有以前战争赔款的总和，以此关税比例和中国还清大部分《辛丑条约》赔款以及利息，于是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资源流出有多少，和战争赔款与贸易掠夺的差别有多少，因为在那时中国主要出口的是资源，进口的却是加工产品。在此期间中国的白银对外贬值对内升值，总的差别超过 4 ~5 倍，造成中国资源大量外流。这样的问题在下面一节将详细分析。

而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进行资源重商主义的贸易，其结果实际上比战争更加有效。我们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源外流对于国家发展和财富的影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资源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而当今的通胀，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我们输入的通胀，以过剩的流动性换取资源，就是一场新的资源再分配的战争。全球的通胀博弈实际上是一次资源再分配的博弈，因为在通胀的情况下本身对于经济不产生价值，也不会减少价值，只是改变价值的持有情况，改变财富的分配情况。

认清唱衰中国的经济背景

对于本书提及的中国将来发展超越印度的各种竞争优势，西方学者和印度精英也应当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他们选择性地失明并且有意唱衰中国经济，这样的做法与当今世界发展进入信心经济模式有重大的关系。人民对于国家的前途发展充满光明信心就会大胆投资、大胆消费，反而促进经济更快的发展；反之，处于对于未来忧虑重重的时候就不敢消费、不敢投资，经济就一定走向萧条，所以社会关乎未来的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遏制中国、与中国竞争的国家，不顾事实一味唱衰中国、打击社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就是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手段之一，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抢在印度之先开始工业化进程，并进入正循环。这样我国在全球资源价格涨破天之前，赚到了大笔外汇，还有点钱买资源。否则，如果中国再耽误 10～20 年，等印度先开始工业化进程，中国就要等产业在印度完成升级，并转移出来以后才可能开始，那个时候如果付不出更高的代价，只能是永远的第三世界。中国当今能够崛起，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根本影响在于国家的管理成本在信息系统和新技术下大大地降低，因此让古老的大帝国又焕发了活力，不仅仅是中国，还要包括印度和俄罗斯、巴西等，中国的先发优势给了我们历史机遇。

大道至简，我们对于印度的优势实际上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我们先发展有领先优势，我们进行了高积累和高投资拉动，无论西方的学者怎样包装复杂和华丽的外衣来说明中国应当拉动内需消费，降低积累率、投资率，洗脑了绝大多数的国人，也不能抹杀中国经济成就的基本事实。我们再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齐家与治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关联紧密地。对于一个富人，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再是守财奴的话，其家族经济和财富是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而且守财也是难以守住的，所需要的就是多花钱、享受生活，让家族成员幸福、凝聚力增强和家族文化繁荣起来，多积攒的财富超过了使用的需求以后的边际效应是越来越低的。但是对于一个穷人家庭，孩子年轻、能干、收入高，要使得家庭富裕就必须勤俭节约，依靠积累和投资把家庭的财富发展起来，这个时候你倚仗着年轻、收入高与富家子弟一样的高消费，其结果肯定是你老年很痛苦，永远不可能超越富家。其不同就在于持有所积累的财富的边际效应是有巨大差异的，穷国持有财富投资积累的边际效用大而富国持有财富的边际效用小。对于发达国家社会已经发达，需要投资的地方都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各处待发展，能够有投资是雪中送炭，因此在发达国家消费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和幸福感是要超过投资积累的边际效用的，但是对于穷国这样的效用对比是相反的，这也应当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标志。

通过这样的比喻就可以理解中国的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日本明治维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以及苏联革命后成为超级大国，也都是在让老百

姓高度节俭的情况下完成的。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富积累是依靠殖民掠夺完成，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英美完成其社会发达所必需的财富积累过程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中国所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勤劳积累来完成超越和崛起，中国的积累期的痛苦是以牺牲几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来完成民族的复兴。另一方面，以中国人口基数之庞大，即使是想要高消费，中国是否能够控制你消费增长以后庞大的新增所需资源？对于小国高消费导致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资源，这是资源的大量流入；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市场容量无法满足的时候，一定是对内由于紧缺而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

西方一方面是向我们灌输他们的生活理念，就如收入高的富家子弟要让贫家的高收入者一起与他高消费，这样穷人家就不可能积累起来与富人同样的财富，从而保障富人一直处于高端统治地位。同时他们因你的人口老龄化描述你的生活痛苦，让你看到老年没有积累的痛苦，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让你关联在一起看的，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论点的矛盾。要知道**在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几倍的情况下，且不说总量，就是以人均而言，中国人均年积累的财富也比美国人均水平成倍高出！这不是美国指责的中国高积累率的缺陷，而是真正对于美国实实在在的压力！**对于相互竞争的国家，当你看到你的竞争对手每年积累的财富数量远远多于自己，你会不会感到巨大的恐惧？你能够有什么办法？以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想让他们节俭提高积累率，以此来维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在美国的社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核时代”无法以军事冒险打断中国财富积累进程的情况下，能做的就是在经济理论上忽悠对手，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让对手走弯路，利用民众的短视和欲望来达到他们的长远目的。就如你家生机勃勃的时候，与你家竞争的不怀好意的邻居就经常会鼓动你的孩子分家，鼓动你的孩子跟家长要权，鼓动你得孩子高消费、及时行乐，蛊惑他们说分配不公、财富全部被家长控制和拿走了，现在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做法与这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与美国一样的积累率，在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所积累的巨额财富面前，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即使是中国的人均积累率与美国相同，也是赶不上美国的人均水平的，而超越的时间与中国积累率呈反比，中国的积累率下降本身，就是在延缓中国崛起的时间，只要时间延缓，世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大。因此中国需要的就是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快地完

成国家财富、社会财富的高速积累。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以及诋毁中国的发展和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动摇中国富裕人口的信心，让他们大量移民。这样的移民同时伴随着大量的财富外流。包括对于中国人移民一直严控的美国，最近也放宽了中国投资移民的限制。中国的内部积累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这些财富还是留在国内，但是如果反对这样的财富再分配，在资本积累的血腥下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下，不是这样的财富再分配的停止，而是取得财富的人移民海外，造成财富的外流！财富留在国内的话发展到一定程度再度发展就会反馈富民，就如当年的亨利·福特发放高工资让他的工人买得起他的车从而取得巨大成功一样，这样的成功背景是国家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年的美国已经崛起，中国也会有这样的一天，但是必须要有基础。但是如果财富外流，那么老百姓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把财富留在国内的政策，改变外资优待的情况，宽容地对待原罪而不要把他们逼往海外，尤其是预防中国移民资产外逃要有好办法。西方各种宣传渗透鼓动老百姓的仇视行为的真实目的是要把老百姓所仇视的人逼到他们的怀抱。想一下，中国的外逃贪官在国外就很逍遥，而有原罪的富豪们在国外受到外国保护就更自在了，这样的最终结果是西方得到了中国财富外流的好处却让中国社会承受重大损失，这些损失最终会转嫁和体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的身上。而印度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印度赶超中国最现实的机会。

通过不断唱衰中国和鼓动仇富，让中国的富豪们大量移民、财富大量外流，造成中国经济的失血而带来他们发展的机会。对于所谓“拉美化”的威胁，我们还要看到拉美的富人们都以美国为基地，富人都外流在西方，对于这样想要外流的富人群体，他们是不会为其本土企业的做大做强而作长期打算的，更不会对于国家民族的未来进行考虑，在经营上也一定是竭泽而渔，其结果也是产业和经济的边缘化。中国的企业家不是没有长远眼光，而是社会不给他们长远在此发展的动力和理由。

因此对于西方和印度精英的唱衰，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认真面对的。中国具有先发优势并不代表中国就具有实际的财富，要把这样的先发优势转化为国家和社会的发达与老百姓的富裕，还有长期艰苦的道路要走。在竞争激烈的当今国际社会，一旦有所闪失，就会浪费我

们经过艰苦努力和付出计划生育代价所取得的先发优势与我们的财富积累。中国在与印度竞争的时候依然具备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并不代表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与印度竞争的不再是人口和单纯的劳动力，而是要发挥中国目前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进展，发挥我们的先发优势。在资本、金融、资源和社会发展上进行高层次的竞争，其中资源是关键因素，中国当前已经面临资源瓶颈的压力，对于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和人均水平低下的国家，将来也一定要面临资源的瓶颈压力。我们能够先发占有资源、积累资源，在资源版图上建立中国的优势才是长期的领先，否则他人反而可以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不走弯路，取得某种后发优势，这样的情况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走了弯路让对方取得后发优势并且对方有人口红利的话，中国就会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我们要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不要被洗脑，不要盲目跟随西方和他人的建议。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是雷锋，会真心帮助你，让你富强，超越他们，他们的所有论调和建议都是从他们的需要和立场上出发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思考是自己的。国家的富强在勤劳之外，更是国家智慧的博弈，战略上的方向正确永远比战术上的成功重要，战术上的成功比士兵的奋勇要重要，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战略思考和长期发展的软实力，是当前中国崛起的关键中的关键。

中国需要资源版图和金融边疆

从古代开始，国家的版图就非常重要，因为在农耕、游牧和渔猎为主的古代，领土就是资源。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已经不仅仅是领土。尤其是在二战以后，领土的作用变得不那么突出，更多的是经济资源的作用，包括对于原材料、能源的占有和定价权，对于金融的控制和货币的发行权，对于信息和人才的控制等，这些类似于领土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国家的资源版图，这是一个国家更加广义的版图概念。英国以一个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在于其控制了海洋资源、控制了地球资源的运输，使得他能够通过贸易达到资源的优化和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掠夺，其领土和资源的版图是差别巨大的。而美国通过其金融霸权，通过其美元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他通过国家信用就可以取得世界资源，其资源版图是遍及世界的，其国家的

强大已经超过了领土的概念。

而对于中国，资源的消耗量是极其巨大的，我们的石油进口消费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中。2010 年中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 1000 万辆，保有量将达 5500 万辆，如此巨大的汽车产量，仅仅汽车用纺织品用量就超过 26 万吨，汽车纺织品的销售量以每年 15% ~20% 的速度递增。所以以中国之大，每一项资源的消耗都是巨大的，而我们经济发展了，资源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不要说我们的内需不足，我们还要看到这样的内需是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的，就如我们有这样巨大的房屋需求，造房子的钢铁价格大涨，背后的铁矿石紧缺，铁矿石立即就成为资源持有国剥削中国的工具。中国的资源版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限制是巨大的，以前是我们的耕地资源不足，又没有能力保持自己国际粮食贸易，也没有能满足需要的运输能力，我们只有被迫进行人口的限制。而现在是中国各种资源都非常紧缺，资源版图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及时地扩展中国的资源版图。资源版图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线。

全球通胀就是一个全球重新划分资源版图的历史机遇，在通胀中资源价格的博弈是最关键的。当今世界通胀中过剩的是产能而紧缺的是资源，**以通胀的货币换取资源和资源控制权才是根本**。只有金融资本与资源的定价机制相对应，金融资本的游戏才不只是数字游戏而变成实际上的战争。中国被输入通胀的结果就是对应着资源的外流，人家给你的货币是要换走等价的商品的，你持有的外汇贬值的结果就是你再交换回来的商品要大大减少。这样的金融博弈使得中国的资源版图受到侵害，而如果把你控制的资源也作为你资源版图的一部分的话，金融制高点与国家的资源版图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了，尤其是当今世界以金融定价机制来博弈资源持有者的时候，金融制高点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中国有丰富的稀土，如果没有定价权，这样的资源实际上就不是自己的，而阿拉伯世界虽然有丰富的石油，但是这些石油的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中，这样的资源版图也不是自己的，因此很多人举例说阿拉伯这些资源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来驳斥资源的重要性是不成立的。这些石油国家实际上根本没有石油的控制权，一切要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在金融货币时代，能够博弈资源定价规则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资源版图最重要的部分。金融货币战争成为新时代下的资源争夺战争，成为国家资源版图和国家命脉的根本。

而对于国家的发展强大，资源不仅仅是够用就可以了，要想到将来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到资源的安全，不被他人抢走，所以资源是需要储备和盈余的，资源的数量多少、资源的构成结构等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从人类的原始社会开始，为了保证自己的资源不被抢掠或者可以抢掠他人的资源，你就要变得足够的强大，自己的力量不行就要发展伙伴，找到群体的帮助，而血缘维系的群体是最稳固的。随着发展，群体个数越多而占有资源越多的，就越有条件抢掠他人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被抢掠，因此群体越来越大，就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因此国家的基础就是资源。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一定要保证自己生存的必需品的来源，要不就自己直接拥有，要不就通过贸易交换，要不就通过武力夺取，得不到足够资源的就只有灭亡。

中国要保卫自己的资源，在和平年代就是靠经济手段，原来的主要手段是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但在世界进入一体化、金融化和贸易自由主义的环境中，这样的做法带来直接的贸易冲突并且有 WTO 等国际条约的限制。现在国家保卫自己的资源和核心利益更多的是金融手段，有了资源版图的概念，保卫国家就要有资源边疆的概念，要御敌于外就需要资源边疆。在资源战当中这个边疆就是一个国家的金融投资壁垒，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外汇资本项目的管制。美国号称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但是美国外来资本的投资限制很多，中国投资基本上以安全原因被拒绝。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到 2009 年，中国直接投资美国的金额只有 9 亿美元。对于金融边疆的问题，宋鸿兵先生做过深入的论述，在这里笔者要着重指出对于中国的金融边疆，海外的投资也造成了中国资源的外流和流动性不均衡问题，我们要更深入认识一下外国投资，反思一下我们的招商引资政策。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外汇海外投资和热钱涌入的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发行所带来的流动性的不均衡，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的理财投资就是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而我们的招商引资所得到的美元被央行持有又不得不投资于海外市场，造成对于中国金融边疆的威胁，这里面的盈亏也是要算笔账的。

现在中国出现高达 1.4 万亿美元的对美资本净输出，而中国对美国投资收益率低下，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收益率仅为 2.3%，股票投资实际收益率为 1.77%，中国投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的实际收益率为 3.22%。这是中国外汇

储备高昂的副作用之一。相比中国的低收益，1999～2009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实际收益率为18%。美国对中国股票投资收益率为13%。中美双边投资收益率倒挂15.7%。这样的倒挂反应的是中国招商引资和储备美元政策导致的利益损失。

而这样的投资差异也反映在我们的通胀和央行的难局上，外资在中国盈利并且从中国拿走所得到的超额权益，会对中国造成物资和资源的紧缺以及货币的流动性泛滥，而央行由于资本项目往来持有的外汇货币投资收益低下，直接制约了央行对于外资进入外汇占款所导致的货币被动发行后，回收过剩流动性的操作能力，央行的央票付息的收益来源要来自央行对于其持有的外汇储备的理财。因为双方的投资收益本身也是对于社会的一种流动性注入，我们的海外资本收益不足，难以承担通过货币政策对冲外来投资所带来的流动性所需要的成本，所以中国央行外汇储备的低收益和外资投资的高利润之间也是一种流动性的不均衡因素。因此中国的政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中美对于投资往来的不对等也是当今中国外汇紧缺局面改观后必须政策扭转的，否则将来的央行难局和通胀压力会越来越大。

外资到中国的投资，很多情况下目的就是控制中国产品的定价权，就是来掠夺中国的资源的。比如对于中国限制出口的稀土，他们就到中国来办与稀土有关的企业，逃避中国的限制，因而其投资收益很多不体现在其所投资的企业而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转移支付输送到国外。他们在中国不仅仅有政策的优势，而且他们的流动性直接与国际接轨，这样面对相对流动性紧缺的国内企业和行业是具有巨大的天然优势的，中国企业是很难与之竞争的。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投资国外却做不到同股同权，中国的投资必须放弃表决权他们才同意，但是在中国按照法律规定是必须同股同权的，这样就给外商谋取了方便之门。对此中国一直是重视控股权不重视参股权，实际上参股权也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是股东，企业的很多秘密就要告诉你，如果你进入了董事会、监事会，企业的核心秘密就一览无余。中国的信息流失也是重大的损失，在这里中国的金融边疆形同虚设。

中国金融边疆的核心实际上是信息的边疆，中国金融业基本上都被外资参股，很多还有外资的董事，这样的参股导致中国所有的金融企业信息都可以被

外国收集，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要到海外上市，我们就要把自己核心企业的各种秘密交给人家，所有审核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是外国的。我们都记得一个流传得非常广的故事，说日本为了分析中国在东北大庆是否发现了大油田，油田储量有多少，仔细地分析了我们《红旗》杂志上的报道，对于铁人王进喜的照片上楼梯扶手的粗细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运算，从而得到了中国油田的真实信息。这样的故事当时我们是把它当做中国信息情报流失的反面教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就还是按照上面的故事再演绎一下，现在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中国在西方的诱饵下，自己主动地把所有的数据交给了西方世界，这样还不够，人家要问你，你的数据真实吗？这时中国人就拿出了《红旗》杂志的照片，根据照片上扶手的粗细自己列出算式仔细运算后告诉对方，我们是有证据证明这些数据是真实的。"现在中国的海外投资、招商引资等就这样陷入核心信息流失的境地。

在当今世界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年代，金融制高点和货币战争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主流的年代，关乎国家命运的信息情报就更加重要，对于微观下流动性的不均衡和全球定价权的博弈，信息也是关键。西方势力利用货币金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在这样看似如鲁迅所说的费厄泼赖的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进行的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这个不对等就是体现在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霸权之上。让你错误判断，自己把自己的资源和财富在规则下输送给西方世界。无论西方的主流公开的是什么论调，他们危机前把世界的资源和大宗商品炒作到天价，背后就是在算计中国，因为中国是新兴的经济体，增加的资源需求在中国，西方世界早就有长期协议和参股等方式使得资源的价格变化影响不大。而在危机后把资源价格打入地狱，背后算计的是俄罗斯，因为加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给多半出自俄罗斯，利用资源的高价让俄罗斯担保借入巨额外债，资源的价格暴跌的背后是逼债和低价购买俄罗斯的资源产权，而暴跌对于有长期协议的西方社会，还是影响不大！所以不要说中国要是不搞套期保值就好了，不进行套期保值那么价格就不会下来，价格持续暴涨我们一样亏损，就是等你什么时候套期了，他什么时候套死你，核心信息在人家手里，他们是看着你手里的牌出牌的人，你是无法与之抗争的，信息不如人才是根本。而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是遏制中国在世界最高端的信息实力，

我们的金融实力已经具备，我们有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谁也不能再说中国没有钱，但是你信息不灵，有钱就是输钱的份，国家又如何发展？所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就是在核心信息上制约中国，让中国的信息不灵，不断出现决策失误，不断亏损，我们若今后还是处于信息弱势，如何谈崛起？

2010 年 12 月 1 日中国政府将对在华外资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政府认为这是国内所有企业统一了税制，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但是外国企业的股东对于中国政府是没有缴纳在中国取得的投资收入的所得税的，很多人通过将公司注册在离岸的免税港规避了个人的投资收入所得税，而且很多西方国家对于投资所得的再投资也能够抵扣，中国的投资收入所得税是没有任何抵扣的，在此中外差别是巨大的。对于我们的外资政策是需要全方位反思的。

中国要有保卫自身资源的主流意识，要有国家资源版图和金融边疆的概念。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印钞流动性泛滥的时候，这样的版图和边疆就尤为重要，我们的各种微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围绕着这样的版图和边疆来制定的。

中国对于印度的先发资源优势

比较日本与中国，就可以理解这样的先发优势，日本领先于中国的原因除了教育文化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资源战略。对于教育文化和制度，中国对比印度不占优势，因为中国能够采用的印度也可以采用，印度的教育基础等是比中国好的。中国能够占据优势的就是利用中国的先发优势在资源上占据先机。在世界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控制和消费了世界大部分的资源，实际上留给世界公开市场上流通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的崛起已经造成世界资源的紧缺和大宗商品的暴涨，如果印度再度崛起，这样的资源紧缺就会加剧，资源的价格就更加高昂，因此中国对于印度的先发优势就是可以先发展、先购买和控制资源，先购买的资源价格会比以后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低很多。

美国崛起的实质是美国当时（1900 年）近 8000 万人口要加入到全球工业化人口中来。当时全球老牌工业化人群也就差不多 8000 万。美国的崛起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拥有跟当时世界差不多工业化人口的国家崛起的事件。其导致的是工业品价格的长期走低，也导致了原有世界帝国英国的利润大

幅减低，并最终影响了其全球霸权。现在世界工业化人口也差不多在10亿左右，这是占世界20%的人占有80%资源的一个“二八定律”的生动体现。而中国崛起将是与美国崛起类似的历史事件，将是21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将使工业化发达社会的人口翻倍，同时使得世界的40%的人进入发达和工业化。要打破“二八定律”是很难的过程，其间也可能是“二八定律”维持发挥作用，有发达世界，有国家没落，或者中国不能完全地让所有人口进入发达阶段。而印度要与中国同时崛起的结果就是世界大多数的人成为发达工业人口，这样的“食肉动物”占大多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印只有一个国家可以成功是比较合理和更加可能的前提假设，这也是两国激烈生存竞争的背景。在这样的生死竞争下，你能够跑在前头，同时还可以通过领先优势将领先扩大化，因此这是一个高次方的非线性优势。

我们再往以前的历史上看，西班牙、葡萄牙的发达，是伴随着伟大的地理发现和奴役黑奴而发达的，大量黄金白银从美洲被抢劫到欧洲，造成印加文明的灭亡，是侵略和掠夺的发达；其后荷兰的发达与鹿特丹的高利贷者关系很大，荷兰的金融业和宗教改革带来了活力，以东西方的海运贸易创造的发达；到英国的发达，也比这些国家付出的代价要大，不是简单地进行抢劫和奴隶奴役，也不是仅仅通过贸易就可以发达了，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工业生产，依靠产业的工业化才能发达；美国的发达，更与技术革命、电磁学、现代物理理论的大发展有关；中国能够崛起，则在于信息浪潮，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国家的管理成本下降，在规模与管理成本的对比下，中国重新发挥了规模优势。

中国对于印度的先发优势首先就是资源优势，我们先以铁矿石为例加以说明。就如铁矿石的价格暴涨，目前印度还在出口铁矿石，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铁矿石的产量是世界第一，中国生产的铁矿石远超过其他国家。相比2002年铁矿石原矿2.31亿吨的产量，2008年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高达8.24亿吨，年平均增速超过20%。到2008年，世界铁矿石生产的前五名分别为中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俄罗斯，产量分别为约8.24亿吨、4.09亿吨、3.41亿吨、2亿吨和1.1亿吨。中国铁矿石紧缺的原因是中国在高速建设期，中国的钢铁产量是排名中国之后的10个以上最大产钢国家的钢材产量总和。2009年我国粗钢产量是5.678亿吨，产量占全球（12.2亿吨）的46.5%，而产量第2至第

10名的总和是4.25亿吨。印度目前的钢铁产量只有不到6000万吨，是中国的1/10左右。如果印度进入建设期需要大量钢材消费的话，印度需要进口的铁矿石会比中国还多。不要看印度大量出口铁矿石到中国，印度的铁矿石产量只有中国的1/4～1/3。目前印度出口铁矿石总量大约1亿吨，绝大部分卖到中国，但是等到印度钢铁产量超过1亿吨时就要进口铁矿石了。印度经济当前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期，印度在建的钢铁产能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印度去年底已经发生过进口铁矿石的事了。当印度开始买入铁矿石的时候，印度支付给世界的铁矿石进口价格肯定会更高，而且印度缺乏炼焦煤等资源，印度为了工业化和大发展所必需的大炼钢铁的困难会更多。对于钢铁的需求，在国家基本建设阶段是应当以人均计算的，印度经济腾飞之后会有需要大量钢材的一天！要知道中国在20年前与印度类似的阶段，对于钢材的需求和产量也是几千万吨而已，现在增长了10倍。而印度还严重缺乏能源，且不说煤炭远远比中国紧缺，印度更是一个贫油国。根据国土资源部相关数据称，2009年中国仅次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美国，成为全球第四大原油生产国，占世界原油总产量的5.4%，2009年中国原油产量约为1.894亿吨。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还是高达50%左右。印度如此贫油，印度经济发展以后会遭遇的资源瓶颈就一定会比中国更加严重。

因此中国有比印度先发展10年、20年以上的经济腾飞的领先优势。想一下当年日本大规模现代化采购资源的时代，这个世界的资源是何等的便宜，中国是怎样廉价地向日本出售煤炭和石油等资源，就可以理解这样的差别。中国对印度的优势更多体现在资源采购和积累上的时间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的很多经济还不如中国，但是在中国混乱停滞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就造成这样大的差距，可见这样的领先优势的影响多么巨大。中国除了资源先发优势，还有高积累率。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全球购买的资源如果全部消耗、消费，那么对于后来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关联等意义就不大，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与世界非常不同，中国的积累率远远高于世界。中国现在购买的资源被大量地在社会的基本建设中积累了下来，成为以后经济发展、社会发达的财富基础。这些积累的财富就会产生巨大的资本优势，后文我们将详细分析高积累背后的玄机。

第四章

流动性的博弈和金融定价权

国际流动性的松紧和流向以及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决定了整个定价体系的尺度。在价格体系国际博弈中，货币的价格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货币是所有价格体系的尺度，货币的尺度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和不同尺度下也会出现不均衡。货币流动性的不均衡也产生价格的渔利和定价权问题。金融也是有成本和价格的，金融货币也是可以输出和定价的产品，金融的定价权就是金融霸权。在金融统治市场的时代，金融定价权成为霸权的核心。

第1节 认识金融的成本与价格

很多人都说我国不得不进行外汇储备，不得不购买美国国债，把购买美国国债说成了拿中国人的血汗钱来养活美国人，中国给美国提供了这么多的美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笔者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得不购买美国国债是因为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原因，也分析了其中定价权的因素，而中国对持有美债和给美国输血，很吃亏且受制于美国是肯定的，但我们对其中的金融成本也是要有所认识的。

在使用贵金属的时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资本社会？西方能够形成资本社会也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机缘让西方拥有了全球大多数的贵金属，这些成功是有巨大的机会成本的！而对于贵金属的金融价值问题，我们的货币体系如果换成贵金属怎么样？很多人都希望以金本位来对抗美元霸权，似乎实行了金本位就不会给美国当奴隶了，但问题是以贵金属为货币也是要有巨大的成本代价的，至于这个成本代价怎么样合算则是要进行评估的。

在重商主义的年代，黄金是重大的目标，背后就是当年普遍实行的金本位制度，黄金的数量决定了货币的数量，决定了货币投放量，而开采金矿成本依然是极大的。在金本位盛行的时代，重商主义对于贵金属的价值是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拥有最多黄金的大英帝国是金本位和重商主义最忠实的拥护者，因此对于黄金在世界的情况，我们应当高度的关注。依据黄金协会的数据，当前全球的人类已开采黄金17.13万吨，40%为金融储备资产，3万至4万多吨为官方金融战略储备，2万吨为私人民间金融储备，另外60%为商品状态，首饰、文物和电子、化学产品等，部分已经消耗。2013年各国公布的官方黄金储备为4.19万吨。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黄金基本上是本世纪开采的，在19世纪前人类总的黄金开采量不足1万吨，19世纪最后50年的黄金生产量是人类5000年黄金产量的总和！18世纪100年间全世界生产黄金不足200吨，而19世纪黄金生产是1.15万吨，其中1850～1900年生产黄金达到1万吨。黄金生产量20

世纪初是300吨每年，到2001年峰值2600吨以后出现回落，到2011～2012年又达到2800吨的历史最高位。1900年到现在的这100多年生产了15万吨，20世纪大约生产黄金13万吨，黄金的生产是一个急剧增加的过程。很多人说金本位的破裂是因为黄金不足是不对的，实际的数据表明黄金的数量增长是惊人的，这里面的关键还是谁有货币定价权和黄金分布的不均。

黄金的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我们如果以金本位，那么世界的霸主不像很多人想的会是中国，可以不受制，而是中国要受制于那些金矿国家，虽然我们黄金的产量很大，但生产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到南非发现了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储量的黄金，南非生产了人类数千年黄金产量的40%，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金产量的98%又来自维特瓦特斯兰德金矿。世界最大的金矿是南非维特瓦特斯兰德金矿，储量为5.40万吨。该矿是1866年发现的，发现后不久就投入开采。至今已140多年了，已开出黄金达3.7万吨，现在尚有储量1.8万吨，仍占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52%。该矿1970年产金达到1000吨，为历史最高年产量，而这个时候全球黄金产量在1500吨左右，但其中苏联的产量就有380吨左右，这些黄金是不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内的，所以南非占有了西方金融体系当中90%的黄金产量。以后南非一直保持年产量650～700吨，均占世界黄金产量的一半。因此该矿的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是名符其实的世界最大金矿。在美国掌握世界金融霸权的时代，南非突然有了这么多的黄金，美联储才8000多吨，仅仅凭南非的黄金就能买下巨额的财富，主导世界财富再分配，这可能吗？因此金本位破裂就是必然的了，而南非被以政治理由隔离出西方国际社会，出口黄金被定义为走私。

很多人说美国让金本位破裂是为了能够QE等超发美元，但这样的说法是以今天的现实来想象当年的情景，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当年美国是债权国，不是债务国，不印钞让美元升值和利率高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大量印钞反而让美国债权贬值，与当今美国是债务国完全不同，不能与今日美国巨大的负债思维相提并论。而发现金矿世界黄金多了，这些金子不在美联储控制之下，世界各国都可以使用黄金在其金融体系当中衍生创设美元的，如果被挤兑，不是找美联储而是直接兑付黄金，美元的霸权就没有了。此时如果不让金本位破裂，黄金比美元的信誉高，美元的国际地位就要再度被黄金取代。在二战后能够建立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

体系，与当时美国有2万吨黄金，控制了世界75%的黄金有关，但后来美国的黄金储量下降很快，到破裂前只有8000多吨了。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控制的黄金远远多于美联储，若不是金本位破裂，就是美元的霸权破裂。

把金本位好处捧到天上的人，忽视了金本位的代价，且不说金本位下难以用货币调控经济，金本位的制度成本也被不恰当地忽略了。我们如果选择金本位，就要承受采金的成本，除了这个成本，还要受制于金矿本身的地理分布。计算一下世界上需要流通的美元和黄金，可以做货币的黄金美国有8000多吨，而美国美元的M2就8万多亿美元，需要黄金涨价几十倍才可以，这样就是虽然没有了美债给美国输送，确要给黄金矿主同样的输送。在贵金属本位货币时代，绝对不是金融货币没有成本，而是成本极高的，而美国给世界提供了这个金融体系，就是要收费赚钱的。使用这个体系，有背后的合算的地方，但美国提供这个体系，也是有成本的，国家信用需要由军事来维护，需要道德粉饰，当然也是利润丰厚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给美国输送金融信用的成本，就要把相应的成本给金矿的矿主，金本位下黄金价格上涨100倍也是正常的，这意味着黄金矿主的暴利，对没有黄金的我们实质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以当今的货币需求，建立金本位是黄金要涨几十倍以上的概念，我们为了金融体系大量持有和买入高价的黄金，给金矿矿主的成本比买美国国债给美国人的更多。这里我们还要看到黄金矿主还不像美国那样尽义务以武力来维护这个货币的信誉，市场化和商业体系是需要规则制订的。黄金矿主是不负责规则的，黄金是强盗可以抢劫的，谁拿着算谁的，而不是遵守商业规则进行交易，需要另外的成本建立和维护黄金不被强盗抢劫的商业交易体系，这个成本是很高昂的，也是金本位的采矿成本之外的制度成本。但对美元明抢是不行的，美国的国家机器维持了美元信用体系的稳定和建立全球的商业规则与市场规则，美国对其货币霸权也是付出了成本的，不是无本得利的事情。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也与它们在美国的保护下，没有军费和极低的国际安全费用，不用支付制度成本有关。

有人在这里可能还想到其他的货币信用来源，如2013年非常热的比特币等，但比特币是总量2100万枚封顶的，连如金矿那样不断发现新矿脉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都做不到，在经济不断增长下导致货币需求不断地提高，怎么做到提供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且用比特币一样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因为比特币最

初的挖矿者和系统的建立者很不透明，操控巨大的利益。根据统计和媒体相关报道，前100名比特币账户持有21.62%的比特币，前500名账户持有35.55%的比特币，在大量流入中国前只有10美元，很长时间没有交易，又突然在2013年11月底统一交易。据报道，前15名比特币用户从2~4月（10美元一个）一直到2013年10月底大量传入中国之前，都没有进行任何买卖，但是在11月25~27日统一进行了买卖。比特币是一个人可持有多个账户的，这些账户经常同时在很短时段内交易，同时前几千名的比特币持有者都可能是操控者的虚拟账户，实际控制比特币的人可能不到10个，外媒评论是easy manipulation（容易操纵）！这样的系统如果作为我们金融信用的来源，我们取得比特币做货币和金融信用就要大量买入和持有比特币，比特币的价格还要暴涨几十倍，这几十倍的涨价所带来的利润就是我们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我们要给比特币的控制者和参与炒作的投机者、早期的挖矿者等人的金融利益也是超过买美国国债的，而这样对金矿矿主或比特币操控者的利益付出，还得不到使用美元的对价，因为金矿矿主和比特币操控者是不尽美军维护信用体系的义务的，而美国国债为信用体系，虽说美国政府偿债有种种问题和困难，但美国的国力和军力，是为国债背书的，是要以武力和政治影响力维持国债体系的，而这个义务金矿矿主有吗？比特币的持有和操控者有吗？

因此我们建设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在金融货币领域得到利益。很多人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利益认识不足，现代国家能够兴起，与货币利益的支撑是密不可分的。虽然我们的央行给美债上税，但央行的基础货币衍生则带来更多的利益，对于附庸美国的日本、德国则利益更大，他们能够崛起很大程度上还有他们不用承担军费等成本的原因。不过现在日本不安分了，日本在谋求更大的金融利益。而对于中国来说则必须维持军事上的安全，对金融的利益就更应当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中国是需要金融货币国际化的，占有这部分的收入。因此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层面，就应当明白为什么我们购买外国国债根本不是为了收益，不要想分散投资取得高收益，而且也不要想多买其他国家的国债。我们货币只给美国一个国家上税，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也承担这个金融成本，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则是纯投资性质，是被盘剥的，这里购买美国国债与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是有天壤之别的。美国提供这个国际金融体系的服务是有

成本的，是要收费的，购买美国国债就是给这个体系缴费，而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则没有这个缴费的性质，是白白被盘剥。因此笔者在《信用战》一书中就分析过要紧紧抱紧美债，也就是抱紧了美国的信用。他国不能攻击，甚至包括美国不能攻击中国金融体系，攻击就是逼迫中国抛售美债，演变成连美国一起攻击，在这里中国收获的是金融保险和金融服务，这个服务的费用比金本位下开采金矿和给金矿矿主的费用要低！

对此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应当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避免被金融定价权盘剥和购买美国国债给美国上税，中国的国际化多一些，则中国给美国上税缴费的份额就少一些，同时中国也能够对人民币国际结算提供国际金融服务的地方收费了。而我们国内能够降低美元为主体的货币发行比例，也就是降低了对于美国的美联储国际金融服务的依赖，就可以减少缴费比例，中国就可以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因此在美国的金融定价权之下，中国需要的就是合理认识，找对位置，绝不能盲目地到处缴费受盘剥，中国给霸主上贡可以忍一时，但绝不能给二鬼子们上贡。不要说我们只依赖美国不行，要买日本、欧盟国债分散风险，实际上若美国与中国开战，日本、欧盟等哪个会不跟进制裁分享利益？购买他们的国债才是以老百姓的血汗养狗腿子，中国此时的竞争对手不是美国，是他们，而且美国基于对于中国产品的依赖也离不开中国，美国的金融没有了中国这样的制造国为收费对象，美国的金融服务卖给谁？国债卖给谁？现在的世界竞争是老大、老二竞争，最后老三倒霉的时代，就如广药和加多宝竞争，其他凉茶没有了，苹果与三星竞争，诺基亚没有了，一样的道理，绝对没有老二拉老三、老四的道理。

第 2 节　金融霸权与定价权

金融定价权成为最关键要素

在传统的供需价格理论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劳动力与资源的价格是最关键的要素，因为在传统理论时代，货币受到金本位当中的黄金数量和价值所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货币定价为核心的定价权是不明显的，全球的贵金属价值是统一的。在美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定价权成为最关键的要素，因为金融定价权是衡量各种要素的尺度和标准。

金本位破裂以后人类进入到了信用货币时代，央行对货币的控制比本位货币时代具有更大的权力，西方的货币发行以国家信誉为基础，也就是国债抵押为主的货币发行方式。这个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国家信用是无限的，但国家的信用却是有限的，对出了危机的希腊这样的国家国家信用是很低的，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国家由于赤字连年和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 GDP，信用也是被透支的。对透支的国家信用早已经造成了货币这个尺子不再是准确的度量衡，也是可以被供需曲线操纵的，而货币的供需变化，直接决定了流动性的多少，从流动性就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和社会的通胀程度，通胀本身也是信用体系弯曲的体现。在货币可以超发的情况下，大量商品是有限的，而货币可以是无限的，这必然会在更大的范围内直接引发这些产品的供需曲线扭曲，从扭曲的曲线的多个均衡点以及控制流动性，就可以更容易的通过控制定价权渔利，这样的范围将比原来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更广泛和直接，从而金融定价权成为控制世界的顶层设计来源，通过金融霸权下货币体系的构建，就可以重组价格体系，在价格体系当中取得定价的利益。

因此在信用货币时代，金融定价权成为本质和万能的再分配财富的手段，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这也是霸权国家统治全球经济的核心。

被央行改变的货币供需曲线

我们讲资金、资本或货币的价格是利率，在货币、资金、资本的供给和利率层面，也是可以形成西方供需理论的供需曲线的，这个供需曲线在传统的货币理论金本位下是遵循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需求越少的规律的，可以很快形成均衡点，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基本假设，但在央行的干预之下，这样的曲线结构是被破坏的。

首先是央行本身决定货币的供给量和价格，也就是说货币的数量和价格（也就是利率）是央行制定或者调控的，央行可以通过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正回

购、逆回购、央票、常备借贷便利（SLF）等金融工具决定货币的数量，而价格则是央行的利率所决定。美联储的利率只是对金融机构，还不是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利率，而中国央行的利率则是客户端的利率。市场上的利率是一条直线，现在能够有所浮动也基本是一条直线，而社会利率与银行利率由于贷款市场的分离不能混同画线，是分开画线的，而且在我们4倍央行利率的限制下，由于社会上资金的短缺也基本上是就高限的一条直线。

但对于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QE，则曲线变成另外的样子。本来在利率低位应当货币供给量少的情况被打破，央行强制的债券购买计划使得应当供给少的情况变成了供给量丰富，而在利率的高位则由于经济的风险，货币的供给量反而减少了，各个资金持有者不是投资于产业追求高利润，而是投资于低风险的国债，买不了国债的就变成了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存储在央行，这就是QE带来的货币扭曲（见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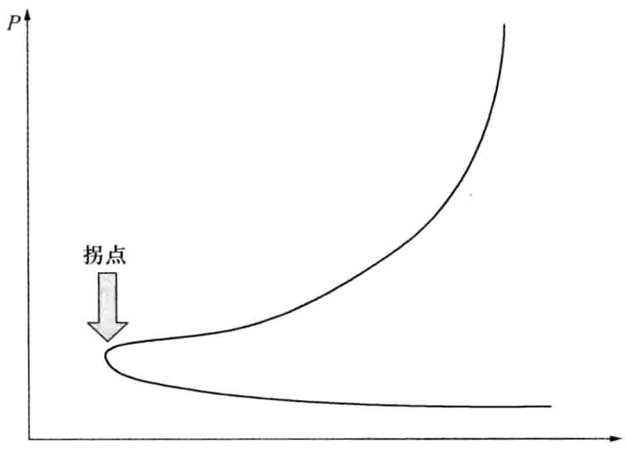


图4－1　QE下的货币供给曲线

注：在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之下，尤其是美联储为代表的QE政策之下，货币的供给情况是被干预改变的，造成供给曲线的畸形，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利率）之下，货币的供给可以因为央行的QE而暴增。这里有一个拐点，这拐点就是市场上的货币数量和利率触发央行进行市场干预的节点，在这个节点的下方，央行的不断货币投放让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同时利率降低；而在这个节点的上方，市场恢复传统的供给曲线的状态，而且到价格的高端曲线趋向竖直体现出刚性来，因为企业在危机下，因为对风险的担心即使利率再高，货币供给增加也有限。这样被央行改变的货币供给曲线，就是金融定价权的具体体现，是央行的力量对全球定价权的影响。

这与以前正常的货币供需曲线完全不同了，这样的供需曲线的扭曲也打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整个世界不是一个自由的金融货币世界，而是各国的货币供需曲线均发生不自然变形的世界。这个供需曲线的变形，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央行决定的，决定的背后就是各国利益的竞争和博弈。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模式之下，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供需也是可以互相作用的，到底哪一个央行对于货币曲线的影响大也是不同的。

如果说外汇进出管制的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是独立的，货币供需曲线可以基本上由央行和国内的市场决定，央行具有主导权。但如果外汇不进行管制，则就要受到国际上的影响，即使是经常项目的开放，外汇的进出也是会造成国内供需曲线的变化的，如果此时央行还要保持其对于货币供需曲线的控制，则这些货币的价值就不能由央行决定了，因为市场会根据需要进行货币的境内外流动。货币会换成外汇流出国外，从而改变货币供应情况，如果还要保持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曲线关系则市场就会改变一国货币兑其他货币的比价，这实际上就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所带来的东西。一国国内政策要受到国际货币市场的影响。

同样的在国际市场上，各国的货币有不同的份额，美元还是具备绝对性的份额，占 70% 以上。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数量是提供这些货币的各国央行决定的，各国央行的发言权是按照所占市场权重来分配的。由于美元的支配地位，实际上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就是美联储划定的供需曲线所决定的，而能够对此画线，就有价格的确定权，这个权利也是由能够给国际货币市场提供多少流动性所决定的。定价权的背后流动性是关键因素，让本国货币国际化，就是在国际上扩大本国的货币流动性份额，能够更多地影响国际货币的供需曲线。而美国由于国际市场也是它所主导的，因此国内政策不但不会受到国际太多的影响，反而可以影响国际政策，这就导致全球的货币市场受到其影响。美联储可以影响全球各国的货币供需曲线，美国因此拥有了全球货币金融的霸权。

所以我们的货币供需曲线是被央行划定的，国际上的货币供需曲线是由货币国际地位决定的，这些曲线是与自然状态不同的，是受到扭曲的，扭曲带来的就是金融定价权。而一国的金融可以影响他国，甚至主导他国的金融政策变化，这背后是有金融霸权的。我们的世界已经不是贵金属货币时代的自由市场

经济状态了，进入了金融霸权、金融定价权的霸权博弈时代了。

金融霸权的实质是金融定价权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到底是什么？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

金融霸权体现在霸权国可以制订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对于他国金融政策进行影响，并且成为“国际宪兵”，维护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的执行，在保障其资本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控制危机。金融霸权可以带来巨大的不平等利益，主要体现在霸权国（或集团）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这些剥削的内容主要就体现在金融定价权力。

金融定价权是一系列的金融价格和权利，主要体现在货币定价权、资本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以及汇率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等，这些权利背后是有内在联系的。货币的价格在利率层面和汇率层面组合决定了资本的定价权，货币购买力层面和货币发行层面的组合决定了资产定价权，而汇率定价权则受资本和货币发行的影响，这些定价权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央行不同的货币工具的调整就是要让各种金融定价权呈现最优的组合，但货币工具的使用本身也是一种权利，就如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一样，货币政策、汇率、管制不能同时做到。

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实际上调控了全世界，而美国的外汇管制则通过其国际军事和政治霸权来实现，就如你敢不以美元结算石油吗？你敢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进行金融攻击吗？索罗斯可以这样攻击英镑和东南亚，但用同样的手段搞一下美元行吗？实际上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对美元、美国、美联储是失效的，这个失效本身就是霸权的体现。这个现象充分说明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金融霸权国生产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只搭车，坐车就必须给美国得利来付费。

二战以来这种费用是金融霸权国通过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收取的，具体地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取得了特别的国际金融地位，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美元依然维持了这样的地位，但却没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美元义务，这个义务就是维持货币的数量，不让体系破裂，以货币的

数量维持国际金本位，但美国没有承担这个义务而是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博弈世界的定价权，以定价权服务于美国产业并带来巨大的利润。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没有履行维持体系运转的国际金本位所需要的义务，体系破裂美国也没有承担违约损失反而是赖掉义务维持了权利，这种剥削是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操控定价权，在一系列交易中实现的。因为美元具备了不对等的印钞权利，没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应义务以后，美元就具备了不对等的金融定价权，打开金融市场就是要给美元印钞买单，这个买单具体就是金融资本的流动和金融攻击操控金融定价权，通过定价权的不平等交易剪羊毛。

所以金融霸权的背后就是一系列的金融定价权，定价权是霸权的核心，这些定价权背后带有武力和政治的一系列的支持，而流动性丰富是定价权的来源，这不仅仅是对于其他商品而言的，金融产品的价格也受流动性的影响，而在金融层面为什么流动性能够丰富？流动性本身也是一种金融产品和信用，为何霸权国可以流动性丰富而其他国家就比不上它，背后就是霸权国的规则制订权在起作用。美国享受了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的权利却不承担控制货币数量和流动性的义务，美国的流动性富裕背后就是其不遵守义务产生的，而后来一系列的 QE，更是一种金融霸权的体现，维持了美国的流动性宽松。笔者的理论告诉大家定价权的来源是流动性，而流动性丰富与否在古代表现为贵金属数量多少，西方集中全球的贵金属是历史偶然造就，但西方维持不断的流动性丰富，掠夺全世界却是其金融霸权造成的，这个流动性霸权就是从殖民规则到金融规则的规则制订权来实现的。流动性的权利是金融霸权的核心。

现在给世界创造流动性的权力并不对等，创造流动性、控制流动性的权力，是金融霸权的核心，这是全球的顶层权力，它带来的就是金融定价权。

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

我们谈通胀、谈定价权，最核心的就是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也就是说对于世界汇率、利率和资本流动的掌控权。单一的商品的定价权是由商品所在领域的流动性所决定的，而这个流动性又是由汇率、利率和资本流动所决定，而汇率就是一个货币的国际价格。在全球的金融一体化下谁有决定汇率的权利，

谁就有货币定价权，而谁能决定本国货币在各个领域的利率和资本流动，谁就有资本定价权。货币定价权与资本定价权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影响着世界。

对于货币流动性和利率怎样影响定价权，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矿业所遇到的情况来具体说明。中国生产的矿产价值低廉，他们说这是初级产品，但对于中国紧缺的如铁矿石，也是最初级的产品，他们却说是资源，这样的双重标准的背后原因应当重视，应当重视库存和流动性在定价权当中的意义。西方有大量的矿产库存，而中国矿产的库存非常有限，并且进入到了去库存周期，但你没有库存就没有定价权，到时候你就必须去买，因此要充分认识库存对于定价的作用。日本能够在稀土定价上有优势，就是因为他们有足够使用几十年的稀土储备。而中国企业要保有大量库存，高昂的利率是无法承受的，库存的多少与利率和流动性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企业资金紧张，为了资金周转即使是价格不合理也不能进入库存而要出售，必须以快速销售来去库存维持资金平衡和流动性，因此中国特产的商品都卖不上价格，对方有库存而你的资金周转等不起，这就是中国与外国博弈定价权的现状。流动性的不均衡、不对等，是双方博弈价格和定价权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前面论述的供需曲线已经不是微观经济学市场出清假设下的情况了，在定价权的作用下供需曲线发生了扭曲，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回到均衡状态，这样的偏离就带了各种定价权的利益。

对于流动性、利率以及其本质的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这个三角在当今国际金融领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是指经济社会和财政金融政策目标选择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同时获得三个方面的目标。在金融政策方面，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也不可能兼得。1997 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相继发生金融危机。这些原先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被迫放弃了固定利率。1999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Impossible trinity theory）。在这个三角下似乎是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后的汇率、独立货币政策包括制定利率和资本流动

三者不能共同被实现，似乎这两个定价权不能得到足够的统一，似乎市场是自由的，没有谁能够操纵国际的市场，但问题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不可能三角”在东南亚危机时的效用，而中国现在是固定汇率、资本管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美国呢？美元的汇率看似是不固定的，但实际上美国控制着世界，美国印钞货币的汇率变化也是有限的，各国都与美元挂钩，各国与美国固定汇率的结果就是美元汇率是相对稳定的。事实情况也是如此，美元指数的变化这些年累计平均下来围绕着 80 多上下波动，比中国人民币单边升值累计的变化要稳定得多，而美联储更是执全球金融的牛耳，是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资本流动更是在全球无孔不入。这里似乎是美国掌握了三个全部的要素，对此笔者的理解则是美国控制了全球资本市场，以美国控制的资本市场而言这些资本也不是自由流动的，这一点可能有读者不会认同，因为美国就是在全球大力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不过笔者要说的是自由流动是双向的，是选择权！现在美元资本确实是自由流动的，但你没有不选择美元的权利，如果某国的资本在交易的时候不使用美元在国际结算的话，美国就要军事干预了，伊朗与美国的矛盾在经济层面最主要的就是伊朗要使用欧元来结算石油！如果美国又印钞、又超低利率、又保持汇率不跌，这个时候正常的市场选择就是大家逃避美元、抛出美元，在美元信用下降的时候人们会回避美元而转向其他货币或者黄金，但为什么我们不得不使用美元？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干预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人们没有不使用美元的自由！美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同时实现的背后是美国的军事实力让你没有不使用美元的自由，虽然世界上有欧元存在，但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没法与美元相比，尤其是在主宰全球的关键商品石油和粮食上必须是美元。就如基辛格所言，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元的不断印钞和挂钩石油、粮食等刚需资源，造成美元货币量与利率价格、石油等资源供需，粮食相关的劳动力供需等曲线都可以出现扭曲，在扭曲当中金融货币规则的制定者能够控制流动性，取得了定价权上的控制霸权。美国在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上的霸权不是一天建成的，打破这个霸权也要有特别的机缘，现在我们要在美元的定价权下与全球博弈，争取对于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在竞争中有更多的定价权。

中国海外战略资源战略的要害是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这与中国央行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当今的货币与本位货币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国家间的资源竞争、海外投资、产业增值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不能完全依附于美元。我们总讲宏观调控，但在资本项目开放、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时代，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下全球成为宏观的一体，只有美联储是全球的宏观调控者；而传统的行业产业是微观的，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已经占据产品或者产业链的50%以上，对于这些产业的微观调控反而能够起到影响全球宏观的效果，我们应当转变传统宏观与微观的界限，在微观上调控，更多地解决问题。尊重美国的国际宏观定价权，而在中国产业链具有优势的微观领域，争取微观定价权才是中国合适和明智的选择，央行的政策应当更多地向微观倾斜，为微观定向注入流动性。美国搞 QE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 QE 是买谁的债券和以什么样的价格买，我们的微观调控也应当可以通过央行在细分市场上购买资产而发行货币定向注入流动性，这样的市场细分才能够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下为我们找到空间，因为在中国未来开放资本项目是大势所趋，中国还需要汇率的稳定，那么央行的独立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微观进行转向，这个转向应当与我们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完全一致的行动，中国的转型和调结构本来就需要央行的配合和共同行动的。

而对于这样的微观调控，日本的财团模式也是如此的。日韩通过巨大的财团来实现自身的定价权，财团内部的金融供应链融资，财团本身的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形成小圈子，财团使用本国的货币进行国际结算让美元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财团的组织结构与西方跨国公司体制不同，不是简单的树形控制，而是一个股权加协议的多层面的网状控制，这些财团是一个全球网的整体调控，因此可以进行微观调控，达到利益最大化。

认识了货币定价权和资本定价权，我们就更了解了定价权博弈的本质，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崛起和博弈定价权金融力量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央行需要怎样的行动来支持产业的发展。

流动性与货币再认识

我们说现在是流动性泛滥，说现在是通胀，因此通胀下为了保障货币存款

的价值要加息，但是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是采取减息到几乎零利率的方式，而对于古代的世界，只要王朝稳定，由于经济发展总是要高于货币金银的增加总量，所以总是不断通缩的，但是在这样通缩的情况下货币本身就会越来越值钱，但是货币的利率却是今天难以想象的高利贷。可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现在通胀是货币数量多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而数量多的东西供大于求肯定应当降价，因此西方的降息和负利率就应当合理；同时古代货币的增加有限，经济增长更快，货币供小于求，导致的利率高企也是合理的。这样的思考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悖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以及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当今的金融国际博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揭示着极其深刻的经济学问题，这是财富、货币和流动性本源的问题。

对于世界关于货币的理解是有各种学派的，主要的学派就是商品说还是媒介说。古典经济学派主要都是商品说，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重商主义也是以贵金属货币为财富的，马克思把货币变成了劳动价值论和一般等价物。而现代经济学则更多倾向于媒介说，把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国家信用。依据这两个不同的货币理念，也产生了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的不同概念。古典货币是指任何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商品，都可被看做古典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古典货币。古典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典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现代货币是指以某一权力机构为依托，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推行的一种可以执行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及作为完全流动的财富的储藏手段等功能的凭证。古典货币与现代货币的区别在于古典货币本身是商品，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不依附于任何的权力机构，不会随权力机构的消亡而消亡。现代货币是一种凭证，依托于某一权力机构而存在，随权力机构的消亡而消亡。可以说现代货币在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方面功能绝非古典货币所能比拟，但作为财富储藏手段方面的功能要逊色于古典货币，储存再多的凭证其功能也会随权力机构的消亡而消亡。

对于这样五花八门的货币认识，我们不能说某个认识就是错误的，只能说对货币的认识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就如瞎子摸象的故事，摸到耳朵的说像

扇子，摸到鼻子的说像蛇，摸到大腿的说像柱子，等等，但是他们所摸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正确的。货币到底是什么，只能说我们在逐步的接近真理，真理是相对的，对于我们认识到的货币的各个方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哪一个方面成为货币主导我们经济社会的主要方面，认识到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理解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悖论问题。中国的利率增加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货币更主要的表现在其价值尺度、一般等价物和存储的功能，中国的老百姓以持有和存储货币为主要的持有财产的方式之一，这样货币与商品的价值关系就是关键的矛盾主要方面，利率要让货币在存储时带来的利益超过通胀，使得存储有意义和价值尺度不变化；而在西方世界货币的媒介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西方的货币更多的是一个政府的凭证和符号，在社会上西方的老百姓是不存钱的，货币的存储功能和商品性是非常弱化的，流动性泛滥也就是充当媒介的货币多了，那么对于流通中充当媒介支付的价格就要降低，就是利率要降低，因此同样的流动性泛滥对于中国要加息而西方要减息，中国是古典货币而西方是现代货币，这也是各国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的必然选择，很多新兴国家也是与中国相类似的。

古典货币与现代货币的差别在电子货币上体现得最明显，而货币摆脱了金本位等本位制度以后，世界就越来越将对货币的认识引向现代货币，而中国传统的哲学教育对于货币的认识还是局限在古典货币之上，而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一个是商品，一个是凭证，就商品和凭证而言二者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资源的差别。在古典货币的概念上货币是商品，是要有资源消耗的，固化于金银的货币不仅仅是需要劳动也是需要有金矿和银矿才能够取得的，这样金银本身既是一种劳动的等价物也是资源等价物；而现代货币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这样的信用的产生是与资源无关的，因此在当今货币的发展就是让货币脱离了资源属性，这二者的差异之间是存在渔利的可能的。这个利益就是其中差异的资源，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在信用货币角度上是一样的，但是在资源消耗上是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信用衍生可以顺利的地取资源，变成了实物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货币不等于流动性，只有充当媒介的货币才具有流动性，存储状态的货币并不具有流动性，所存储的货币对应于其代表的资源

和劳动，但是货币总量增加，所代表的财物总量没有增加，则单位货币所代表的财物减少，谁增加货币谁得利。现代社会增加货币的成本极低而古代要增加金银货币的成本极高，因此现代社会产生了增加货币掠夺以货币存储的财富的现象，导致社会以货币存储的财富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在此处没有与世界接轨则必然被掠夺。美国的印钞增加了流动性，但是美国的美元被中国得到并且存储起来以后就不再有流动性了，而是被固化了，美国的美元在流通中的数量就不足了，因此美国印钞还可以印出通缩来。同样的在 2000 年左右中国的老百姓不花钱，导致中国也出现了通缩和流动性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与流动性不是完全等价的，对于商品的定价权的博弈发生于流通领域，也就是充当媒介的货币起到主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讲的货币与西方讲的货币以及流动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其名称一样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这样的不同是可以渔利的。

同样我们再审视一下中外的利率政策，中国的利率作用于存款人和贷款人，实际上就是作用于货币的存储功能，而美联储的利率针对商业银行，美联储是银行的银行，利率是作用于银行间的利率，实际上是作用于资金的流通。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对于货币存储财富的需求，导致中国的货币需求巨大，使得中国的广义货币 M2 要超过经济规模数倍的美国；而由于美国的货币存储功能的萎缩，只有媒介功能，美国的广义货币的需求量就大大减少了。媒介中的货币泛滥和存储中的货币泛滥同样可以造成通货膨胀，但是所造成的通胀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供给不足的通胀和需求过剩的通胀，在货币的存储功能为主的时候货币多了没有足够的对应的财富就是供给不足，而在流通领域的媒介货币多了就是需求的旺盛。现在中国的货币成为外汇储备以后，这些外汇在国外贬值就会造成财富的外流和供给不足，中国现在的通胀实际上是中国货币不能够买到以前那么多的资源。

中国针对货币存储方面的利率肯定要高于西方把货币作为媒介方面的利率，更进一步讲，实现货币的媒介功能是给你的商品交易提供服务，不但不应当给利息还要收费的，因此实际的负利率也是可以出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实际上就实行了货币税，也就是外国普遍存在的钞汇差价，对于现钞和现汇是有 3% 的差价的，这样的差价是很大的，很多商业贸易还没有 3% 的纯利呢！而这样的差

价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的，中国的钱庄为了推行银票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对于现银实银的交易推行火耗制度，现在这样的方法被西方学会了，西方银行的中间业务模式就是针对货币的媒介功能而取费盈利的。中国银行的利差模式是针对货币的存储功能设计的取费盈利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差别就是渔利的焦点。不同模式造就利率差别，带来了渔利的动能，把货币的媒介功能变成存储功能是有钱赚的，这也导致美国充当媒介的美元不足而通缩，同时中国却存储了大量的美元，这些美元美国要变成国债，至少要存储在银行的，如果中国使用这些美元在美国买东西就会造成美国的通胀，因此美国对于中国把这些美元在美国直接投资是百般限制的。

中外体制不同也是一个流动性不均衡的来源，同样也是西方大鳄们渔利的机会，外国充当媒介的货币流入中国成为充当存储财富的货币而换取了中国的财富，就是中国的财富外流，因为作为商品的古典货币和作为凭证的现代货币是有资源差别的，这样的货币流动的动力就是来源于流动性的不对等。在中国由于货币要作为存储的财富，会在同等货币供应量下形成流动性的下降，给西方资本空间，而西方的资本得到这些货币所代表的财富外流以后，就会形成供给不足造成涨价，这就是输入性通胀的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我们长期的观念对于货币还处于古典货币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阶段，而西方早已经是作为交换媒介的凭证阶段了，此货币非彼货币，但是我们在思考与外国金融对接的时候根本没有把这样的货币概念差别和金融国情差别作为一个重要的修正因素。将不同的货币和货币概念混为一谈的结果肯定是流动性难以均衡和渔利机会多多。

货币的存储价值是一种静态的价值，货币的媒介作用却是一个动态的价值，货币总量的变化导致的静态存储估值是每一个持有者独自估价的，可以瞬时改变市场，这样估值的改变也没有额外的成本，而对于媒介功能在货币的供应量发生变化的时候却是要有一个传导的时间的，而且传导的快慢和国家的市场情况和国家的大小密切相关，并且所传导的成本是不可忽略的，因此货币是古典概念还是现代概念的背后还有一个动态与静态的问题。央行池子论的错误就是按照中国的资产古典货币的概念进行媒介概念的调控，没有足够的计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动荡和渔利，而是静态的看待问题，因而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反应。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要逐步与世界接轨，避免造成渔利空间，更主要的就是在认识上进行提高。现代的货币发行已经脱离了资源、劳动的时代，中国的货币观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有自己与时俱进的认识是必须的，这也是我党“三个代表”最重要的内涵，而不是口号。对于古典货币和现代货币的差别。对应的就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差别，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却很少提及这样的差别，但是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天壤之别，就如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类似，两者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爱因斯坦创立了划时代的时空观念，没有新的时空观念理解不了现代物理学，没有现代货币的概念也理解不了现代经济学，但是有人就是这样刻意的混淆之间的差别，更何况现在进入了电子货币和第三方支付时代，货币还在快速发展，新的电子货币的概念已经不是国家信用的托管凭证了，而是一个企业信用的托管凭证了。各种企业发放的点卡成为社会通行的支付手段，甚至在网络无国界的影响下这样的电子货币还出现了国际化的倾向，而电子货币这样的交换媒介的发达一样也是可以造成流动性的泛滥的，因此在新时代中国对于货币这样的古老概念的发展是需要重新认识的，不能从认识上领先世界就不能在经济上崛起于世界。

第 3 节　美欧的流动性的腾挪

国际货币格局根本性改变

我们认识世界，时刻不能忽视大环境的改变，在背景变化后不能以过往的经验刻舟求剑。回望世界，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世界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欧元诞生了。在没有欧元的时期在国际领域美元是一枝独秀的状态，而欧元的出现，虽然欧元的实力要逊于美国，但是这已经改变了博弈规则，从一个垄断到两个寡头的博弈，博弈模式会发生改变。这样的博弈研究很多的 MBA 教程都是有的，只不过没有具体到美元、欧元的霸权博弈而是抽象的进行讨论。从美元的单极世界到了二极世界，二极世界是博弈最激烈的世界。

欧元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

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马耳他、塞浦路斯、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的法定货币，这些国家合称为欧元区。目前共有 3.3 亿人使用欧元，如果加上与欧元固定汇率制的货币，欧元影响到全球 4.8 亿人口。到 2006 年 12 月，共有 6100 亿欧元在市面上流通，按照当时汇率计算，相当于 8020 亿美元。欧元流通的现金总价值超过了美元，而且还不断有国家希望能够加入欧盟和欧元区。虽然在国际结算和国家支配地位上欧元比不上美元，但是欧元给这个世界一个新的选择，欧洲是可与美国比肩的发达地区，欧盟的 GDP 甚至超过美国。

欧元的诞生直接开启了世界货币竞争贬值的时代，在美元为单独的世界货币的时候，世界的大宗商品是在走熊的，油价在 1999 年曾经跌破 10 美元每桶，金价也在不到 300 美元每盎司的低价徘徊，但是欧元诞生后货币竞争贬值开始了。美国没有了维持美元价值的义务了，美元只要比欧元不明显的差就可以了，而欧元也是与美元相比，货币价值变成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对比的对象不是原来的商品，而是有竞争关系的其他货币，而且货币是劣币逐良币的金融规律，要占领世界金融市场，自己是劣币有时候反而更有利，这就是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的金融基础。以前美元贬值造成石油危机，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出现危机则欧洲要垫背，当前的事态发展也是如此。在没有欧元之前，美元是一枝独秀，没有跟他竞争的国际货币，贬值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美元要升值、要高息，让全世界为美元支付利息和收益；但是欧元出现以后，美元就有了竞争性贬值的对象，美元的贬值就是让全世界为他的贬值买单，欧元与美元的竞争性贬值成为欧洲与美国交相得利的机制。而在亚洲，日本也是不断地印钞，国债负债率已经达到 GDP 的 200%，为世界发达国家之最。这样的结果就是以前美元所对应的是石油、黄金，美元过多贬值阿拉伯等产油国不干了，就有了石油危机；而现在我们说美元指数的涨跌，所对应的只不过是日元、欧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在日元、欧元也印钞的情况下美元的贬值是没有制衡力量的。美、欧、日的联合货币贬值和印钞，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的印钞贬值，这样的世界洪流又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抗拒呢？

这里大家可能要有一个疑问，就是货币的竞争为什么是贬值而不是升值呢？两种货币的竞争按照逻辑似乎是要以信誉好来赢得市场啊！这里大家对于人民币等国际化就是要在一个升值的过程中来完成，日元的国际化也是在升值的情

况下成功的，为什么他们就是竞争性的贬值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如果没有足够的信誉，则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只有你处于不断地升值过程当中，你的信誉良好的同时，你的升值还给对方持有货币带来额外的利益，人家才会接受你的货币，你的货币才能够成功的国际化，但是对于已经国际化的货币，情况则不同。对于在市场上的货币竞争，从金融层面上看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金融货币常识，叫做劣币逐良币，有贬值趋势的劣币大家都愿意花掉，而把良币收藏，结果就是劣币把良币逐出了市场！而从经济层面而言，货币的贬值有利于美国的经济，亚洲的新兴国家都是不断地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的，从美国不断地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就可以看出这个趋向性问题了。

美元从升值通道变成贬值通道，需要的就是把很多经济发展中国家的泡沫戳破。亚洲新兴国家在20世纪末发展极其迅速，欧美的产业大量向这些地区转移，快速的经济发展肯定要伴随着泡沫的发生，但是对待泡沫却不一定需要戳破的。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经济发展是可以把形成的泡沫填实的，更关键的是如果美元开始贬值，原来这些国家高估的货币在美元的贬值下就变得合理了，泡沫就被填实了，快速发展进一步填实了泡沫，在全球竞争当中肯定是欧美都不愿意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应当看到同步危机的还有俄罗斯，受到压力的还有南美很多国家。实际上这次危机是一次通过攻击亚洲新兴国家引发的泡沫破裂，造成整个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一次全球危机。中国内地在这次危机当中由于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受到的冲击是有限的，这也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制造业取代亚洲小龙、小虎打下了基础。就如中国内地当年的泡沫也非常严重，银行业的坏账举世瞩目，但是中国通过发展以后，这些银行坏账也成为优良的资产了，因为土地等资产价格增值了，抵押品完全覆盖银行债权。

图4－2为世界银行提供的金砖国家不良贷款率历史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泡沫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在发展中泡沫被填实。

索罗斯等人的攻击不一定就是美国的阴谋，但是起码这样的攻击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不把这些国家的泡沫戳破，美元开始贬值，这些国家将获得巨大收益而美国是吃亏的。再往前看，即使是1992年索罗斯攻击英镑的行为，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行为，因为攻击英镑使得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以后英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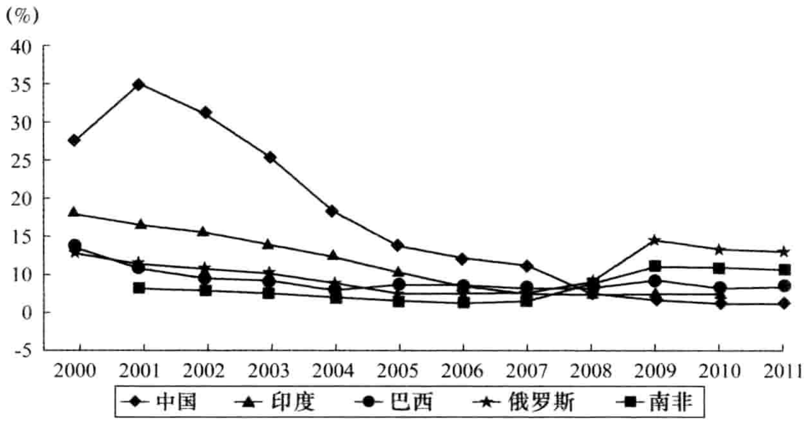


图 4-2　金砖国家不良贷款率历史图

加入欧元，欧元的市场信誉就差多了，毕竟英镑是历史上的货币霸主。对于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攻击行为，在各国都应当算作犯罪了，但是这样的罪犯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庇护下就可以招摇过市，如果违背了美国的利益标准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怎样对待“奇人”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 Armstrong）。令阿姆斯特朗备受关注的，不仅是因为其多舛的牢狱生涯，更在于其在投资市场上的翻江倒海，基于阿姆斯特朗透露其投资的精准应归功于其所创的“经济信心模型”，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继俄罗斯的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经济周期理论大师。但是他拒绝与美国的有关机构合作，拒绝提供其准确预测市场的理论模型，导致他因诈骗罪被判入狱 5 年，而实际上已被关押了 10 年。1999 年 9 月，叱咤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圈近半个世纪的阿姆斯特朗被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他面临着 24 项指控，但是当局却始终无法将他定罪。因此法庭只能不断地以“藐视法庭罪”将其羁押，这也创造了美国司法历史上因民事藐视法庭罪而被关押的最长时间纪录。直至 2007 年 4 月，他与检察官达成一致，承认“有意诈骗”，该案以当局撤销其他 23 项指控，阿姆斯特朗被判 5 年监禁而告终。对他的处理美国连司法公正的底裤都不要了。因此 1998 年的全球金融攻击，是在美国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货币政策被加入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博弈，因此我们反思金融制度、抵御金融攻击的时候，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也是必要的。

有泡沫是问题，但是不是有泡沫就一定要戳破泡沫？美国渡过危机就是在不断地制造新泡沫当中度过的，在美元危机后促生了互联网的泡沫。互联网泡沫以后是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泡沫，2008 年金融泡沫破裂后是货币宽松的 QE 泡沫，因此在出现泡沫的时候，戳破泡沫首先要看清泡沫到底影响了谁，泡沫是否会被填实，泡沫破裂谁的损失大等。不讲这些就一味地要戳破泡沫，就要想一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谁想要借着戳破泡沫进行渔利和掠夺。

在竞争性贬值当中，只有不断地贬值导致其中一方的信用破产，没有倒下的一方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以在对方的损失当中挽回自己货币信用贬值的代价。现在世界的危机已经看出欧元在贬值下的压力，但是欧元的破产道路还很漫长，甚至会长期维持美元、欧元共存的世界货币格局，这些博弈会越来越激烈，也成为世界金融动荡的根源。未来的世界是退回到美元独大的单极世界，还是美国也危机重重，美元主导性下降成为多极世界，现在的趋势也没有明朗。在单极世界下跟住单极的老大是正确的，在二极乃至多极世界，怎么跟随这几个寡头，保持与之怎样的比例关系，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而在世界竞争性贬值下，以外汇占款为货币发行方式，所带来的必然是输入性通胀，这样的输入性通胀和因此引发的一系列热钱的渔利，是国家财富的外流。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怎样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护自身的金融安全，是每一个经济体的核心问题。所以在世界货币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危机如此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国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发行制度应当以什么样的改变来适应，以及在香港原港府建立港币联汇制度的环境和条件下在全球竞争性货币贬值下都已经改变或者不存在了，对于现有制度难道不应当重新认识一下？即使是不改变也应当在新的背景和环境下再度审视一下，认清不改变的道理在哪里。这是一个国家货币定价权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家财富的定价体系和全球再分配的所得。

为什么美国印钞会难以为继

美国现在已经在探讨如何退出 QE 了，并且到 2014 年的年初已经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于周四（2014 年 1 月 30 日）凌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每个月量化宽松（QE）政策缩减 100 亿美元至 650 亿美元，同时维持 0 ~ 0.25% 的超低利率水平不变。到 2014 年 3 月 19 日，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从 4 月开始月采购 650 亿美元资产的开放式量化宽松（QE）将缩减 100 亿美元，其中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的购买额各缩减 50 亿美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 ~ 0. 25% 不变，取消了 6. 5% 的失业率的加息限制，并表示将把通货膨胀和就业目标考虑在内。这是美联储在连续三次议息会议上均匀缩减 QE，将 QE 的月额度从最初的 850 亿美元降至 550 亿美元，后者包括采购 300 亿美元国债和 250 亿美元 MBS。2014 年 3 月 19 日的会议是美联储女主席耶伦上任后主持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虽然美国的 QE 肯定还要来回反复很长的时间，但对于 QE 为何会要退出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美国 QE 的一些困境。

首先，不要看现在大宗商品在降价，事实上，其一样是可以进入涨价通道的。不仅是中国的豆粕期货曾经涨到天价，世界的农产品也在涨价通道之中，油价则一直在 100 美元以上的高位，未来的涨价会让作为资源消费国的美国经济复苏受到致命打击。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的特殊性，原因就是石油等资源价格高涨后供给曲线会出现后弯，价格上涨反而供应量下降。原因就是资源国出售石油等是为了取得足够的石油美元平衡外汇，需要的不是销售量而是销售额的概念，在石油价格暴涨，销售额达到要求以后就不会再多出售了。如果量化宽松，结果必然是石油等价格的暴涨，不但让石油等资源国家的得利超过美国，也使得资源的供给曲线更加弯曲，进而造成美国的通胀和市场崩溃。不断地 QE 使得资源国更加抓紧资源而不是多卖资源换取美元，如前述的资源供给曲线出现后弯，资源供给量随价格而减少，必然导致全球资源市场供需均衡点无法形成而崩溃。美国是严重依赖世界资源供给而生存的国家，资源市场崩溃就是美国经济的崩溃。在资源市场受印钞影响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印钞所带来的效果也越来越小，经济上的边际效应是不断递减的，美国的印钞必须在资源的压力下找平衡。

其次，美国量化宽松的前提是面临通缩压力而不是通胀风险，宽松出来的货币可以输出。QE3、QE4 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困难和金融风险加大，美元回流的趋势明显，如果美元不能外流到世界，必然是美国自己通胀，所谓的“量化”是看可以输出多少再“量化”多少的。例如，美联储 2010 年 11 月 QE2 投放 6000 亿美元，到 2011 年 6 月结束时中国外汇储备 31974. 91 亿美

元，而 QE2 前的 2010 年 9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为 26483.03 亿美元，中国流入了约 5500 亿美元的流动性，因此能够输出多少才会量化多少。现在世界危机风险加大，资金回美国避险，量化宽松后印出来的钞票是难以输出的。

最后，我们要看到美联储的政策是带有明显的利益趋向的。美联储所有权是私有的，管理权归国家也是形式上的，这是由美联储的决策方式决定的。美联储由七名成员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员五名，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任期为 14 年（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 4 年，可连任）。在美联储中最关键的机构是制定 QE3 等货币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简称 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联邦储备系统中最重要的机构。它由十二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全部成员七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他 4 个名额由另外 11 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流担任。该委员会设一名主席（通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担任），一名副主席（通常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担任），另外，其他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可以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但是没有投票权。在这样的结构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代表资本的 12 个储备银行都有权参加讨论而且有 5 个投票权，另外的 7 个投票权由于美国两党势均力敌，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对抗储备银行的银行家们。美国的货币政策是被金融资本控制的，因此美联储实际上无义务对国民负责，所谓“美联储要对高失业负责”，美联储监管金融，就是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一个势力的权利保障；反之伯南克所谓“就业不好转，QE 不结束”，只不过是“向弱者倾斜”的老套。美联储可不是民主社会，美联储的权力就像当年教皇的权力一样，是绝对的！美联储主席的选拔方式，类似于基督教会内部主教团选举的教皇，“凑巧”中世纪欧洲利率和金融政策，也是教会决定。

在利益趋向上，对原有形式的 QE3 美联储是要收益下降最终到亏本的！2013 年美国评级被下调，美国国债反而创造了新高，2011 年 9 月 15 ~25 年期的美国国债期货合约飙升至 141 - 06 的高位。30 年期国债涨 321/32，收益率报 3.375%，为 2009 年 1 月以来最低水平。这反常现象的背后是美国银行破产还优先保护小债权人，因此对于大资金在银行可能破产的情况下，持有美国国债反而变得比银行存款更安全。美国的现金如果不存在银行，则要有现钞和现汇 3%

的差价，大资金也无法拿着纸币现钞，美国信用比欧、日等西方诸国还是安全、优质的，因此就造成美国国债反而上涨的局面。美债上涨造成美债的收益率比以前降低，量化宽松给美联储所带来的收益也是下降的，这本身也降低了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动力。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国债的利率在美联储公布所谓的QE3以后，2012年9月14日美国国债殖利率[①]10年期是1.88%，20年期是2.68%，30年期是3.09%。这个收益率一直处于高位。

而美国国债的短期殖利率是非常低的，目前是1年期的为0.12%～0.18%左右，这样的收益率已经大大低于美联储的资金成本，美联储给超额准备金付息的利率是0.25%，为此美联储要卖出短期债券买入长期债券的扭转操作就可以理解了，这是避免美联储亏本的行为。当前的情况是长期利率到2年就与美联储0.25%的利率水平持平，到5年则为0.72%，7年是1.23%，持有5年以上的长期美债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样的有利可图的前提就是美联储需要长期保持低的利率，因此美联储不断延长维持低利率承诺的时间，背后就是保有其所持有的国债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美联储在当今国债超低收益率的背景下，再购买国债收益率极低，可能亏本，减少QE购买量促使国债收益率提高是美联储避免亏本的行为，维持低利率是维持国债的价格，也就是维持美联储持有国债资产的价格，这些政策都是为美联储的运营服务的。美联储是私人机构，代表的是金融资本家的私人利益，美联储赚钱多了要交给国家，但是赔钱了国家可以不补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政客集团、金融资本集团和宗教集团的博弈制衡社会。从美联储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言，推出QE让美联储经营吃亏的事情美联储是不会干的。而在国际上资源国、金融国和制造国也在博弈，美国是一个金融国，但也是一个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如果QE让资源价格暴涨，美国也是得不偿失的。QE掠夺制造国的同时美国消费资源也要被资源国掠夺，美国吃亏的事情是不干的，美国是要算账的。在资源价格仍然在高位而制造国已经经济下滑的今天，美国的战略目标更多的是资源国，因此美国就是要不断地调整其QE规模，为其

① 殖利率就是获利率，也有人称为收益率，也就是利息收入除以购买公债的价格之百分比。不同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票面利率。

利益服务，而不是一味地进行 QE。我们要注意到在二战前金本位破裂、货币竞争贬值与现在还有不同，因为当时世界发达国家同时是金融国和制造国，资源国是他们的殖民地，这是在一国体内的循环，与现在情况是不同的。所以美国的印钞是难以为继的，退出 QE 或者缩减 QE 规模就是必然的选择，维持不断大规模的 QE，除非美国受到了巨大的危机压力，美联储受到了极大的政治压力才有可能，这样的可能不会是美联储自愿做出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能够从各种政治动向当中看出端倪的，因为这将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了，而且这样做就是饮鸩止渴。

欧洲搞负利率博弈流动性输出

欧洲 2013 年有传闻要在三、四季度不断地降息，甚至直接把利率降低到负利率，让你到存银行就要赔钱的地步。到 2014 年，这样的传闻成为现实。中新社报道，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委员会 6 月 5 日作出决定，将央行银行存款利率降低至 -0.1%，主导利息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的 0.15%。

这是欧洲央行自 2013 年 11 月来第一次下调主导利息。在宣布上述决定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还表示，到 2016 年为止，银行界可以以主导利息在欧洲央行贷款。欧洲央行并将向南欧国家注入更多资金以协助其走出发放贷款滞后状态。

欧洲这样做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不论其怎样华丽的解释，笔者认为欧盟主要的目的就是促进货币流动性的输出。

在美联储新主席耶伦表态要继续宽松维持低利率政策以后，欧洲央行（ECB）执委会委员科尔（Benoit Coeure）周三（2014 年 2 月 12 日）讲话称，欧洲央行正在非常严肃地考虑实施负存利率。科尔讲话之后，市场立即对于央行可能进一步宽松的反应预期加剧，欧元对美元快速下跌逾 50 点。

对于美国的 QE 实际上还有一个对冲的紧缩政策，就是美联储提供超额准备金利率，这个利率的水平是高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准备金利率使得大量银行资金选择给美联储以超额准备金的方式存储，实际上是缩小了杠杆，收回了资金，同时这个利率也是美国正利率的一个重要支撑。但在欧洲，欧洲央行是不提供超额准备金利率的，而且相对于美国，欧洲的非银行部门规模比较小。然

而，丹麦和瑞士已经长时间出现了负利率。（有些银行甚至收取存户 50 个基点的存款费用。）欧洲央行在 2013 年 7 月把央行存款利率下调到零后，在去年已经导致非抵押利率下滑到只有约 10 个基点。因为缺乏高质量的抵押品，欧洲的国债抵押回购利率只有零多一点。（因为资金贷款人不愿意以负利率借钱。）如果论起实际利率欧洲更低。

现在是一个各国汇率竞争性贬值和各国竞争性宽松的时代，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已经有印钞 1.5 万亿美元的计划出笼了，美国早先也有 QE3、QE4 两轮宽松，现在美国有所谓的退出 QE 的说法但也没有实际行动，而欧洲怎样宽松呢？我们看到欧洲没有统一财政，发行欧洲债券再由央行购买的方式由于各国各怀鬼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很难达成一致，因此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方式就从美、日的简单增加货币变成了增加货币流通的速度。在费雪方程式 $MV=PT$ 之下，货币 M 增加和货币流动速度 V 的增加是互相可以替代的，货币流动性是 MV 而不是只有 M，这一点国人经常有错误。**欧洲采取负利率，让每一个人都不想持有现金，把现金迅速交易成为资产，从而使得货币流动速度加快产生大量的流动性。** 货币的流动性增加，费雪方程式下等式右边商品数量 T 不变的情况下价格 P 就要增加，这将带来通胀和货币的贬值趋势。

当今各国竞争性的贬值，每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货币升值，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货币贬值的理由是贬值可以促进出口，使得这个国家的出口商品在汇率价格下显得便宜，因此出口商品就有竞争力了。出口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这已经是主流经济的观点，出口的商品的价值组成包括进口的原材料、自产的资源和国内人民的劳动，汇率变化意味着你的这三部分组成怎样的变化？进口的原材料价格肯定要走高的，在产品出口的时候这部分不会因为汇率变化而成本便宜，但国内其他消耗进口原材料和产品的经济实体，却要因此承担成本的增加。自产的原材料、资源等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因为汇率走低而外汇所得减少，等于廉价的出口了资源，廉价出口资源肯定也不是好事。最后的变化就是老百姓的劳动，这个汇率变化促进出口，就是老百姓的劳动换取的财富的缩水。取得同样多的外汇需要老百姓付出更多的劳动，这样的出口有利吗？

欧洲的很多国家粮食都是不能自给的，能源石油更是严重依赖进口，如果欧美的货币贬值，难道他们就不担心进口需要的费用和成本暴增导致的崩溃吗？

在这样的进口压力下为什么对于他们还是促进经济的呢？在经济发展需要财富增加这样的常识下，贬值不能带来财富，则不会有经济的好转，而出口货物在贬值下肯定是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的，进口货物在贬值下还要多支付成本，那么贬值是怎样带来财富的呢？贬值带来财富的源泉在于货币的输出，在于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出口！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美国和欧洲都是货币的输出国家，对于货币的贬值他们反而是输出货币有利。经济学上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定律就是劣币逐良币，在一个市场上有多个货币流通的时候，人们普遍的倾向就是把良币收藏起来尽快花掉劣币，这样就让劣币流通更快，很快市场上就看不到良币，全部是劣币在流通了。对于这样的原理，在汇率上则变成汇率有贬值趋势的货币会以通缩所替代，有升值趋势的货币汇率上会以通胀所替代，原因就是全球货币市场是有多个货币流通的，有贬值趋势的货币是劣币，可以驱逐市场上的良币，因为汇率上的升贬和通胀、通缩可以通过货币的国际流动来实现。

在国际多个货币进行博弈的时候，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实物产品的进出口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便宜，而关键是由于汇率的涨跌趋势对于国内通胀、通缩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背后因素。货币汇率的贬值所达到的效果是国际上货币的流动，输出货币流动性，通过这样的贬值趋势，使得本国货币可以流向他国，避免本国货币过多所造成的通胀。让欧元成为世界流通和储备的货币，输出欧元流动性是欧盟的核心利益。如果汇率贬值不能输出货币，则必然是金融灾难，因此索罗斯攻击英镑让英镑退出了国际货币体系，英镑不能输出海外，肯定是巨大的损失。这些货币出口到这些国家，是要换取商品的，这些商品进入货币出口国，给货币出口国带来了财富和繁荣。所谓的货币贬值促进经济的真相就在这里，印钞不是关键，关键是印钞不能通胀，更关键的是印钞的货币能够输出，带来真正的财富！

但输出货币流动性是要付出代价的，欧盟搞流动性输出的代价是负利率，欧盟内部的负利率一年多以前已经出现了。德国 2011 年 11 月 9 日拍卖 15.25 亿欧元至 2018 年 4 月到期的国债，收益率为 -0.40%，而前次拍卖同类国债平均收益率为 1.22%。德国国债出现负利率，说明欧元本身的风险是怎样巨大，欧盟其他国家金融体系内的欧元需要到德国避险，他们宁愿忍受负利率换取国债

到期时这些货币流动性在德国。那个时候欧元如果解体，马克和里拉肯定价值要巨大分化，因此支付负利率持有德国国债换取届时德国政府可能归还的马克就是完全合算的事情！而现在欧元如果负利率，则所有持有欧元的人都要把欧元换为其他国家货币和商品，欧元大量输出，剩下不得不持有欧元的国家和机构，未来欧元如果解体这些国家就被剪羊毛了。

欧洲的负利率改变了经济界的游戏规则。以往的投资是需要获得利润的，而在负利率下的投资已经不是需要获得利润，而是买到就是赚到！这样的博弈结果使得过去的投资理论完全改变，经济学是要重写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京东到美国上市，而京东是经常性亏损的，但其上市的估值也是极高的，这背后就是负利率“买到就是赚到”的逻辑。在美国的互联网投机投资当中，充斥着这样的逻辑。如果你能够以负利率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就变得合理了。与此同时，在中国有着国家能源运输安全战略地位的长航油运却退市了，长航的亏损主要是高昂的利率和因为利率高企所带来的价值重估。这样的冰火两重天就是中外利率天壤之别的具体表现。利率的高低，背后是有金融和定价权的掠夺的。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应当减持欧元货币资产，避免被流动性输入和掠夺，日本安培的宽松就是要货币的输出，中国增持日本国债就大亏了，这一次不能再吃欧盟的亏！中国不得不忍受美元的霸权是给美国交保护费，如果我们还要忍受欧、日的流动性输出，则变成了给所有人当奴隶了，因此分散投资，西方各国国债都购买的方式是完全不可取的。中国如果与世界冲突则美、日、欧会一致行动，如果世界经济危机则风险上欧、日要远远大于世界金融主导者美国，中国需要欧、日的倒下释放资源。中国一定不能被欧、日掠夺。

第 4 节　认识流动性不均衡问题

美国量化宽松和中国流动性不均衡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学者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西方国家的

货币机构执行宽松的政策，在西方以债券抵押发行货币的体制中，这样的政府债券扩张和央行收购国债等债券本身，就是一个印钞的过程。美国搞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还会继续？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实行宽松印钞政策的国家会出现通缩。大家普遍知道的是印钞会造成通胀乃至恶性通胀，通缩是货币数量不足的表现，西方的印钞应当是通胀才对，而现在西方确实在通缩，那么印钞是怎样印成了通缩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现在的货币体系在全球一体化的时候，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西方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了以后其货币的发行是要影响全球的，是要与汇率紧密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货币也可以通过汇率兑换输出到国外的，甚至直接成为外国国家和银行的储备货币。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要贬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内金融可以以通缩来替代贬值，而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有升值压力的时候，可以以国内的通胀来替代，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劣币逐良币。对于要贬值的货币谁都倾向在没有贬值前兑换他国货币造成该货币流动性的大量外流，而对于要升值的货币则是大量的外汇流入，获取即将升值的货币，造成大量的货币流入。这样的结果就是只要印钞增加的货币少于外流的货币，国内的货币减少则必然通缩，而印钞本身也是造成货币存在贬值预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虽然西方国家的印钞造成该国货币的贬值预期，但是西方国家对于汇率市场的支配地位导致其汇率存在溢价，其相对汇率的贬值压力造成大量的货币外流被国内的通缩所替代。有贬值的就有要升值的，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被输入流动性的有货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国家，所面临的就是通胀，所以西方的印钞所造成的通缩是在该国的通缩，其通缩的前提是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流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通胀。如果以全球金融系统为一个总参照的话，他们的印钞行为造成的全球货币总体肯定是通胀的，也就是全球其他国家的通胀幅度要超过西方的通缩。

美国现在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 QE2 的结果是对于美联储的一个 6000 亿美元的授权。美国对于这个授权怎样使用确实是学问巨大的，美国不是一次性投放这么多的货币，而是逐步投放的，是根据其货币流出量而投放，确保其国内的通胀不发生为基础。根据央行 2010 年 11 月 26 日数据，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背景下 2010 年 10 月新增外汇占款高达 5190.47 亿美元，创 30 个

月来新高，环比大增79.27%。这对应的就是800亿美元左右，与美国QE2平均每个月宽松后多投放的货币相当，整个QE2时期，QE2了6000亿美元，中国同期外汇储备增加5500亿元左右。美国的印钞实际上是精确地控制着流动性的输入、输出而进行的，保持其印钞数量少于流动性的输出量，造成美国的适度通缩，促使他国货币升值，导致美国产品的成本竞争力提高，促进美国的产业在危机中恢复。因此美国的印钞反而形成了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背后是要向中国等国输出流动性的，并且要通过这样的流动性输出来渔利。

而后来的QE3、QE4和对于QE的缩减，都是类似的博弈，这些宽松的数量与能够输出的数量加上原有债券持有到期的数量是一个均衡的结果。美元的市场除了中国以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很大的。在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那些负债最重的国家借款成本升至创纪录水平后，欧洲各大银行目前正在争先恐后地吸引投资者。在欧元势力因为欧债危机受到影响，欧元萎缩的时候，正是美元大举输出抢占市场的时机，美国的印钞在世界上有巨大的市场，这使得印钞取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就是QE的本质。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中国的货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货币是不同的，中国的货币是古典货币、是资产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商品，西方的货币是现代货币、是媒介货币、是国家信用、是托管凭证。一个是商品，另外一个是凭证，因此同样的金融危机下资产货币需要加息正利率让资产保值，而媒介货币却是受媒介多少的供需关系影响，货币供给多了媒介的成本利息就要下降，就要成为负利率，所以中国的正利率与西方的负利率之间是有货币性质的本质差别的。而资产货币与媒介货币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里面是否包含资源，商品和凭证的差别最主要的也是制造任何商品需要资源，而凭证没有资源，这样的差别可以资源渔利，也可以再分配世界资源版图，在这样的问题上绝对不能被西方御用文人似是而非的概念所忽悠。因此对于通胀的宽松，中国是加息，而西方是减息，这也是差异的体现，但是这个利息差也成为热钱套利的空间，我们与西方货币性质的不同是可以被渔利的。这样的不同也表现在货币的供需曲线上，对媒介货币则非常容易出现货币供给曲线的扭曲，因为供给成本是完全不同的。古典货币是有商品的成本的，就如采金的成本，而媒介货币的供给

是不受成本限制的，QE 就是无成本的印钞行为，印钞使得供需曲线出现扭曲。

同时，流动性的输出会造成被输入国家的流动性不均衡，造成巨大的渔利空间，这是仅仅依靠汇率对抗印钞所不能防止的。我们应当看到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对抗外来热钱流动性输入的情况下造成了流动性巨大的不均衡，央行收取准备金、收紧流动性是面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均匀收取，而热钱进入中国却是被少数人控制，这样必然造成流动性的不均衡和震荡，会造成局部的流动性紧缺，导致连锁反应。我们看到说现在是流动性的泛滥，但是从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可以看到流动性是非常紧缺的，银行间的利率已经在 2010 年底超过了银行贷款利率，到 2013 年的 6 月，竟然出现了瞬时 30% 的超级利率。而现在利率虽然有所下降也是大幅度高于央票和国债的利率 1 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银行间利率只能以紧缩来形容。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产品的暴涨和房地产的回暖，这些领域的流动性是充足的，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流动性紧缺的时候，持有富裕流动性的热钱等是要渔利的，钱从一个实体到另外一个实体每一次流通都是要渔利的，这样的渔利就是让流动性更加不均衡。对于吃和住的需求弹性是最“刚需”的，其价格的增长也具有向消费者转嫁的最强能力，因此在流动性不足时最能够承受高利贷，会吸引大量的资金去放贷，造成局部的流动性过剩。同时高额的利息成为新的流动性来源和产业成本的刚性支撑，因此这些地方的价格是流动性的洼地，是最不易通过收紧流动性来调整的。同时你要是能够通过收紧资金把人们的吃和住的产业的资金都收走，那么还有什么产业能够有资金，因此房地产因为资金不足而降价的时候，其他产业一定遍地哀鸿。流动性不均衡的扭曲，就是我们前面论述的供需曲线扭曲，这个扭曲使得市场不能自动均衡达到市场出清状态。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政府依然在不停地收紧房地产和农产品的流动性，这样的结果就是要准备中国的经济进入硬着陆的阶段，这样我们就可能让经济进入调整，而且只有进入了调整以后才可以让进入池子里面的热钱变成投资或者亏损出局，调整也会让汇率重新进入人民币的贬值通道，国内通胀得到控制，同时使得热钱回流美国，导致美国的通胀，否则中国不断地对内通胀和对外的升值预期一定会导致热钱渔利空间不断加大。财富被渔利外流后不得不调整，与主动的选择调整是完全不同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还要有几次，实际上只要

他们能够通过通胀和流动性的输出，他们的印钞通过成为中国等国的资产和热钱取得利益，这样的量化宽松就不会停止，反之如果中国的紧缩和经济调整让流动性回流美国造成美国的通胀，其量化宽松也就走到了尽头。美国的 QE 缩减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产物。

对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和欧洲是以泡沫对抗美联储的泡沫的，日本进行了降息而欧洲也实行了类似的宽松政策，但是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以泡沫对抗泡沫，其中有大量泡沫对于老百姓存款掠夺的考虑，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是宽松、印钞导致泡沫泛滥，并且这样的泡沫热钱大量布局完成以后，中国如果出现资产泡沫，恰恰让这些热钱随着泡沫的膨胀大赚特赚了，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中国的选择也只有以经济调整甚至硬着陆来对抗，而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经济的调整哪怕是硬着陆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如果中国进行主动的调整就有经济调整的控制权，这样的调整不仅仅可以使得进入到中国的热钱渔利得到控制，中国的通胀也得到控制，中国产业的过剩产能得到淘汰，产业可以更好地向高端升级；同时美国的印钞无法向中国等国输出流动性的结果就一定是要进入通胀，而世界大宗商品在中国的调整中降价也使得中国可以得到更加便宜的资源，中国如果能够主动进行调整那么对于中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国的主动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是输家，反而被套死在中国的资本或者流动性回流西方所造成的西方通胀会让印钞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如果是在西方流动性不断输入引发恶性通胀中国不得不进行调整之时，中国就真的成为输家了，就如 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

如果中国选择以调整对抗西方的印钞和流动性输入，无论是真调整还是假摔，都足以震慑热钱针对中国的肆无忌惮，因为中国产业调整后进入产业的热钱就只能成为投资，变成冷钱长线了，而随着中国产业调整汇率再一次进入下降通道，外资在汇率上就从套利和渔利变成了套牢和损失。就如对于铁矿石的博弈，如果中国产业进入调整，钢铁价格下跌，日韩就不敢贸然把铁矿石价格炒作过高而自吞苦果。2008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高价签署铁矿石进口合同的背后就是得到了情报，吃准了中国不会产业调整。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博弈要有全方位的思维，没有只涨不跌的事物。如果美国的印钞不能成功的以流动性输入中

国，美国的印钞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中国的产业进入调整对于全球也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那些要靠中国高价购买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维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也会非常难受的，世界会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产生连锁反应的。在这里谁主动调整谁就占得先机，在次贷危机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主动金融调整。美国在不救助雷曼兄弟公司前是大量兜售了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我们的航空公司买入大量这样的期权亏损严重就可见一斑，而金融危机就真的不会成为实体危机吗？这不等于说金融与实体没有强烈关联、脱离实体运行了吗？在实体经济适应金融危机的调整中如果中国能够占得主动，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可持续发展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所以对于当今的形势和美国量化宽松的政策，更多的要认识到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博弈，美元如果不能输出流动性，美联储也就没有了量化宽松的基础。美国的量化宽松怎样走是要看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有多少流动性可以被输入，而且在流动性输入以后，会造成这些国家的流动性不均衡，给热钱非常好的渔利空间，因此美国的宽松政策还会有多少次，是要看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情况而言的。

央行紧缩难局与流动性不均衡

央行不断紧缩背后就是让中国的金融系统承担损失和实业承担高利率，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危及股市中的股票，同时对于物资市场短期内加大了投机的成本，但是这些利息会转化为生产成本，导致的长期效应却是使得涨价获得了更强劲的成本支撑。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国内融资收紧，开发商内地的融资陆续被堵，资金紧张；而国际热钱汹涌，使得地产商纷纷转寻海外融资，香港掀起融资潮。碧桂园、恒大等公司海外发债融资的利息高达12%、13%。碧桂园的债券被标普和穆迪下调评级至负面，富力、绿城负债率一度超100%，如不能赎回债券，被清算就成为外资控制开发商，外资控制了中国房地产业，中国的政策就是得不偿失的。而这样的高利率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小贷公司是比比皆是的，很多乡镇企业也进入了这个泥潭，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现金流搞的理财产品也是有10%以上的利率的。

这里股市所参照的利率不仅仅是银行利率，是包括民间利率和高利贷利率

的一个社会综合财务成本，这样的利率的提高就是对股票估值的下降，很多资金会离开股市进行高利贷渔利，而被渔利的产业又直接导致实业的利润率降低，股票的利润下降，因此这样的通胀对于总体的股市是没有牛市的，其通胀性牛市的特点就是抗通胀的资源、消费、流通等大类的股票会有价值的重估，但是对于股市的总体肯定是一个利空的结果，即使是对于抗通胀股由于市场的透支目前的估值也不低，整体的风险在加大。如果资金从股市被挤出，会造成更多的流动性泛滥，还要进一步的加剧市场的通胀。美联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迅速调整为近似零利率的结果就是要以低利率维持股票和债券的价值股值，但是对于中国超低利率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的银行政策之难点不仅仅有经济层面，还有政治层面。

外来的热钱所占的比例太高了。央行收取流动性是从银行收取，而直接得到钱的是外资，钱流转到央行手中要过很多道手，每次过手都要赢利的，这样的对抗成本有谁统计过？收取对象的不一致肯定要造成流动性的不均衡的。我们的央行讲的是宏观和总量的统计，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总量统计是看不出变化的，但是这样的不均衡在微观上渔利，社会上可能早已经是尸横遍野了。就如我们老百姓可以切身感觉到很多生活产品的暴涨，但是在总体上平均却没有那么大，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汽车行业、IT 以及家电行业、通讯费用等的发展和降价，一辆车的降价要顶多少粮食蔬菜的涨价呢？这样一平均屡创新高的 CPI 对于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比数据更严重，原因就是这些数据掩盖了社会微观上的不均衡性的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宏观上的流动性泛滥实际上掩盖了中国流动性极大的不均衡和局部的流动性不足，我们的政策更加剧了这样的不均衡，同时给热钱利用不均衡渔利留下机会和空间。我们必须知道和注意的是西方崛起的几百年来，西方的利率基本上是 10% 以下的，大部分年代还是 5% 以下，过高的利率是抑制产业发展的。

美国 QE、中国人民银行紧缩的时代，外媒经常报道有国际大鳄等热钱数千亿囤积香港等待机会到中国内地渔利，这样的热钱流入如果是以准备金、央票等手段收走社会的流动性，那么收走时面对的是整个金融体系，而这样的收走本身就会在某些地方造成价值洼地，成为热钱渔利的目标。因为在市场经济下资金的每一次流动和过手都是要盈利的，热钱的流动性富裕不会自动的填充到

流动性紧缺的地方，而是要得利的，与此同时在热钱撤出的时候所造成的流动性紧张，央行的宽松政策也不会立即和无代价的填补到热钱离去所留下的空间。中央这样的政策导致中国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会出现巨大的流动性松紧不均衡，所以虽然中国整体上的流动性泛滥但是不排除在某些地方出现流动性紧缺，就如被不断调控的房地产业资金紧张一样，这样的不均衡恰恰是热钱手持现金最好渔利的情况，这也是美国量化宽松的压力下所追逐的机会，他们就是要找到你的不均衡点来渔利。这就如非洲的群狮发现大群猎物以后难以下嘴，它们就采取恐吓的方式让这些猎物害怕，然后让他们跑起来，在猎物跑动的过程中就可以找到薄弱点下嘴了。在热钱囤积香港和美国量化宽松的恐吓下，中国央行的频繁操作和社会对于恶性通胀的无比恐惧，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国际金融大鳄眼中的猎物已经跑了起来，接下来中国哪里流动性不均衡，出现局部紧缺，哪里就是他们的机会；热钱是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去，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大宗商品、高利贷等都可能成为热钱获利的方向，而我们要全部防守住难免顾此失彼。因此我们对于热钱进则收紧，出则放松的调控货币市场，实际上就造成中国经济体内流动性的松紧震荡，震荡中不断资金地流转就要不断地赚钱，给热钱找到不断地渔利机会。对于一个成功的庄家真正的盈利不在于把价格炒高多少倍后的逃跑，而是不断地高抛低吸，几次往复就可以在赢利上超过直接的拉价格炒作，而且赚钱不留痕迹，这样的情况是最难防范的。而不断地松紧操作，还要造成信息的巨大不对称，由于热钱就是外来流动性的操盘者，他们对于信息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这样的松紧的结果加剧了资本对于老百姓财富的掠夺，激发更大的社会矛盾。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2010年10月、11月两个月的操作造成股市、期市、大宗商品的暴涨和暴跌，背后就给这些热钱渔利者带来了巨大的机会。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13年中期的钱荒和乌龙指，股市都是不正常的暴涨暴跌，在这关键节点上爆仓的投资者远远多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个月。这样的暴涨暴跌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经济政策跑了起来，在跑动中不可能保持经济体各方面的松紧一致性，肯定要有市场剧烈的涨跌震荡，这样就给热钱巨大的盈利机会。中国的股市、期市等一路上涨，热钱新进来只能追高，是不容易赚到钱的，只有让流动性不均衡以后导致这个市场震荡起来，热钱才有不断地上下翻腾的

机会，并且在这样的翻腾中正反馈越滚越大。从 2012 年底开始，我们的股市不佳和创业板的暴涨，也是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的具体表现，市场出现了反常的分化。中国房市也是如此，涨政府要压、跌多了土地、财政崩溃政府肯定要扶持，中国的房市整体看涨但是未来剧烈的震荡难免，2012 年的楼市已经体现了一次，只不过房子的建设周期长，价格的变化周期也很长，地区间的不均衡差异由于是不动产会比那些动产的差别更大，更有空间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房地产暴涨的地王和暴跌的鬼城同时出现了。如果真的到房市资金全面崩溃那一天，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房价降下来，不是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可以低价买房了，而是开发商没有钱了，只有把公司卖给热钱了。因为在流动性紧张的时候房子是难以快速变现的，房价跌了卖房子不足以偿还高利贷，只有卖公司，让高利贷持有公司等待价格涨回来，就如当初顺驰被外资低价收购一样。被外资控制了楼市，房价更不可能下来，而且开发的利润还要给外资，老百姓只能是更买不起房。

不均衡下的渔利机会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浑水摸鱼，因为水浑了水里全是泥沙，导致鱼难以呼吸，鱼被迫浮出水面呼吸就好抓了。我们不断的各种政策变化导致市场疲于应对的结果就是将水搅浑了，这样的结果就给热钱找到了机会，海外热钱囤积香港就是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我们的银行拆借利率超高甚至爆表，就是中国银行体系内流动性不足的具体体现，而我们的股市不断下跌和成交量大幅度萎缩也是股市流动性紧张的具体表现。不要看中国现在流动性是 M2 达到了 110 万亿元，被指为泛滥，但是中国流动性紧缩的地方更是存在的，中国地方债问题已经被爆炒，地方融资利率的超高，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流动性出现了极度的不均衡。

对于当今的世界，经历了危机的各国货币宽松刺激，各国的印钞早已经是天文数字，但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出现了流动性紧缺的通缩或者通胀率很低，原因就是在危机下银行的惜贷造成金融衍生的货币乘数降低，大量的存款淤积在银行体系之内。银行本国投资贷款存在忧虑，但是对于投资机构贷款到中国这样货币有升值趋势的国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西方的热钱就是西方释放的流动性，

而且随着银行贷款信心的恢复，货币乘数的提高，所能够释放的流动性是惊人的，同样如果中国在紧缩中银行和社会对于未来的预期出现变化，而变成银行惜贷和社会持币，中国的货币乘数大大降低，也会使得流动性迅速紧缩。对于以前贵金属时代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而对于信用货币此时的信心经济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当前中国对于未来的通胀预期特别强烈，中国的货币乘数是接近极限的，尤其是我们有大量的影子银行，有大量的以同业拆借来养理财、债券的表外业务，现在中国只要是可能，银行的货币衍生就要做到极限。

我们的金融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的不均衡，也恰恰是实体经济危机的体现，中国增长率大幅度下跌，这样的预期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就如我们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股市从 6000 点不可思议地跌到 1000 多点一样，因此大家的信心变化也造成流动性的变化，对于局部就更加明显了，只要你觉得这个产业有问题，社会各界的资金就迅速远离，立即造成该产业的流动性大紧缩。同时在世界上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现在大家觉得中国经济好，货币要升值，就会一拥而入，而将来突然有一天大家不这样认为了，又会突然离去，这样的危险所造成的流动性波动和不均衡是极大的，也是最容易被各种金融投资工具所渔利的。而基于中国的存款结构，老百姓一旦恐慌，立即可以把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变成活期提取出来消费抢购，就是一下子把 M2 变成了 M0，从而货币流通速度大增，流动性爆发！这样的世界流动性不均衡实际上就是股市中常说的一种兴登堡凶兆，西方世界的通缩和中国的通胀压力同时存在的不均衡就是世界进入衰退的重要风险。一旦大家觉得经济的风险持币导致货币乘数下降的正反馈就立即造成巨大的通缩，一旦大家担心恶性通胀拼命的花钱，就导致货币乘数的增加，正反馈找出，恶性通胀真的来临。货币乘数在这样的不均衡状态下受到社会信心的巨大影响，这样的信心变化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难以调节的。如果中国过多的宏观政策调控造成老百姓心理上形成了狼来了的固化印象，那么我们再多的操作也难以影响这样的公众心理状态了。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已经在热钱、国际大鳄唱空和量化宽松的恐吓下动了起来，并且有失控的压力。中国的加息、降息是对于所有的已经存在的存贷款的加息、降息，是对于所有存款人和贷款人的调整，对于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传导到实业，而对于金融行业本身的影响相对要小；而美联储是针对市场

的基准利率，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加息、降息，美国实业则大量的是固定利率贷款，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作用力是囿于金融体系内的。美联储的利益来源是银行间的货币拆放和对于金融产品的投资，但是中国央行的利益来源却主要是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而中国同业拆借利率的变化更类似于美国美联储的利率变化，但是这个利率反而是中国的央行无法调控的。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美国银行业处于危机，资金紧张的时候，美联储可以迅速把利率变成零、无成本地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资金或者抬高利率收回资金，而我们的央行要操作就要回购央票或者发行央票，但是央票的利率是不能改变的，成本是固定的和巨大的。我们央行政策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客户而不是商业银行本身，不仅成本高而且这样的传导需要时间和资金流动中赢利所导致的额外成本。中国的现有体制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速度是要慢于美联储的，成本也是要高于美联储的，这样的差距在双方都静止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在速度不够快的时候也差别不大，但是一旦快速动起来以后，情况就大不同了。现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增减收放自如，而且美国通过央行直接给金融机构的贴现则更是随时可以行动，不需要再度事先讨论和准备，已经为将来的快速行动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个市场不但是大鱼吃小鱼，而且更重要的是快鱼吃慢鱼，对于制度好、速度快的西方金融大鳄们，要发挥其速度上的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动起来。现在中国与国际金融大鳄们相比是既小又慢，这样的博弈怎么能够取胜？

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政策，到现在虽然不断有小国出现危机，但是在救援下似乎是整个世界皆大欢喜，危机几乎成为各方共赢的事情，但是理智告诉我们这样的共赢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和回光返照，否则也就不是什么危机了。将来一定是要有倒霉蛋为这次危机买单的，将来让谁为危机买单的博弈较量会空前激烈。在这样的生死时速的大角逐之中，你小、你慢，一时改不了，可是你还愚蠢地先把手中的牌出光，将来你还有什么能力来应付别人的打击？通常的危机发生后的模式都是开始的时候大家恐慌拿住现金成为通缩，就如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的通缩一样，然后就是货币过量到某个节点突然大家都抢购资源造成恶性通胀，就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后黄金暴涨20倍以上一样。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市场，各种歪风刮起，还没有

到大雨瓢泼时奔逃避雨的时候，但是看到风就要想到雨，要看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要有未雨绸缪的准备。世界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又有大量的流动淤积的情况下，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而兴登堡凶兆恰恰是这样的不稳定状态的征兆。一旦这样的体系被打破，一定是重大的危机再度发生。现在击鼓传花的鼓还在敲，但是等鼓停下来后，在最后的生死时速的赛跑中谁能够更多地输出流动性，让别人更多地拿着货币，自己拿住资源，谁就是胜利者。这时谁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谁拿着那么多的现金，谁就是倒霉者，为危机买单。

在这里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外金融体制差异与流动性均衡问题，我们的货币政策的利率是直接作用于贷款人和存款人的，而不是美联储利率作用于银行间市场，这样的不同导致的不均衡差异也是很大的，因为不同的贷款用途可以承受的风险和利率都是差异很大的。在美联储的模式下所有的银行资金成本被美联储利率所整合，而具体的贷款银行可以自主的决定，因此流动性紧缺的地方带来高利润，银行的资金就多，而对于风险，银行也要以高利率来对冲；但是对于中国，所有的利率都是基本限定而浮动有限，那么紧缺的地方银行得不到额外的利润，不会有大量资金涌入，反而是风险高能够承受高息的地方取得资金要行贿，给了银行权力者寻租的机会，这样的体制不利于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时候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会造成社会流动性不均衡的长期化。

就如中国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就是因为很多贷款的管理成本是按项计算的，小企业小额贷款的利息是难以覆盖管理成本的，因此造成小企业难以发展，但是小企业的活力所能够承受的利率却要高于大企业。国外的商业利率变化是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中国的流动性不均衡会造成中国小企业受到更大的压力，制约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发展性。为了控制流动性，我们的政策就是中国特色的总体贷款额度的控制、贷款行业和用途的限制等接近行政的手段管理金融，扼杀了竞争。中国流动性短缺的地方以行政手段限制中国的资金进入，恰恰给进来的热钱留下空间，就如我们控制开发贷款，结果就是热钱到处给开发商放高利贷，这些被热钱渔利的成本最终还是要中国的社会买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国企背后有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和资源的支持，基本上就是等同于一个无限责任国家信誉的公司，而中国的民企则是有限公司，规模也有限，这样的情况二者的贷款资金风险也是截然不同的。同等条件下国企当然更容易取得贷款，

在流动性不均衡和利率又固定的情况下，肯定会造成民企的资金短缺和贷款困难，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流动性富裕的时候民企要借比银行对冲风险所需要的浮动利率更高利率的高利贷，而在流动性紧缺的时候就大量被债主廉价清盘。每一次流动性紧缩之时，就是民间资本大量被外资和热钱兼并之时，央行的流动性的松紧震荡就是不断地给外资热钱利用资金链操纵和购并中国民企创造时机。中国的民企要是都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受到限制，中国就要拉美化，而中国民企这些年的发展困难也是与资金的魔咒分不开的。央行各种调控的统计数据对于这样的调控所带来的松紧不均衡是难以反映的，对于不均衡的微观影响也是难以反映的，但是热钱的赢利是在微观的操作和渔利，并不是宏观的攻击，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国际货币自由兑换体系，宏观的海量对冲和套利是难以操作的。

反思当年香港的流动性摸鱼

对于流动性的不均衡所能够造成的影响，以及钱荒会导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境外其他市场的故事来认识。这就是我们要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一下在香港1997～1998年金融保卫战当中国际游资的渔利过程。

人们普遍认为实行联汇制度将使得对港直接金融攻击变得不可行，因为要抛售港币，兑换美元，进行攻击的话，香港的所有的基础货币都是用美元发行的，只要政府不提供流动性，那么把所有的政府储备的美元兑换光的结果就是市面上所有的港币消失，这似乎是做不到的。因而联汇制度有助于保持香港稳定。但是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存在于宏观理论当中，在微观层面的实际情况中是存在巨大渔利机会的。香港金管局可以收兑发行在外的所有港币，维持汇率的不变，看似使炒家无法攻击汇率，而实际情况却是银行受到了挤兑，在宏观平均上是没有盈亏的，而在微观的利益差别上却是天壤之别。

以美元为基础发行的港币是香港的基础货币，但是基础货币在金融体系内是要产生衍生的。如我们有100万港元存入银行，银行拿这100万港元又贷款给他人80万港元，贷款的80万港元无论贷款人持有现金还是存入银行都属于港币的广义货币，这贷款的80万港元存入银行以后银行还可以再贷款，同时原先存入的100万港元还是港币的广义货币，这样100万港元存款在金融体系内衍

生出来的货币就远远不只是100万港元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把这100万港元兑换成美元并汇出，攻击港币，所有衍生出来的货币是要被消灭的，银行就要减少贷款或者到其他地方拆借头寸。这也就是说在市面上流通的广义货币M2是要比拿外汇兑换的基础货币数量多很多的，如果有谁收集市面上流通的港币，兑换美元，则基础货币相应减少的同时要在市面上减少比他兑换美元所抛售的港币更多的港币。这是一个把M2当作M1的过程，这个过程银行是要受到挤兑的，挤兑的结果看似炒家无法在汇率上得利，但是会发生利率的变化。如果兑换的足够大，实际上就是挤兑了整个金融体系，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会造成利率的飙升，会导致股市、债市、楼市等一系列的市场波动，而这个波动可以被操纵。

这里的关键就是制造流动性的不均衡。攻击者手里持有的是利率上涨前得到的资金，流动性是充裕的，而在其他地方流动性在广义货币M2减少以后就是紧缺，这流动性均衡的过程当中资金每过手一次都是要得利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息，这样流动性不均衡的结果必定造成利率不正常的上涨，也造成即使在价格的低位也不得不卖出割肉，做空市场的渔利机会就到来了。

简要回顾一下香港1997~1998年的情况。1997年7月，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香港恒指奇怪的不跌反涨，可以理解为国际对冲基金做空恒指的建仓期。到1997年10月，形势急转直下，危机开始爆发，其导火索源于10月20日，中国台湾地区“央行”放弃对新台币的支持，新台币随即贬值9%。有消息说索罗斯1997年10月21日、22日在伦敦外汇市场上抛出了60亿美元的港币，把港币汇率压到7.75的警戒线之下，同时市场盛传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不保。攻击流动性不均衡的结果就是拆借利率的暴涨。10月23日中午，同业拆借利率急升到280%，如此高的利率，股市是承受不了的，大家都会把股票抛售了放贷，恒生指数当天暴跌10.4%，1997年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度暴跌13.4%，香港股市市值减少2.1万亿港元。对此有人质疑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为何不为市场紧急提供流动性，但是实际情况是按照联汇制度的港币发行方式，没有美元的抵押兑换，香港的金融管理当局依法是不能提供货币的，香港联汇制度把金融管理当局的调控之手给捆死了。

要知道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金融管理机构的利率是与市场利率严重

脱节的，因为市场是有风险因素和利润诉求的，就如中国内地的民间利率远远高于央行利率。如果说中国的民间利率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美联储把利率降低为0.25%以后，美国商业贷款利率的下降是有限的，同时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和信用卡违约利率是创造历史新高的。香港的各种融资借贷也是很发达的，在流动性挤兑下民间的借贷利率攀升也是远远高于政府金融管理利率的。主导整个资本市场的市场利率是民间利率决定的，民间利率在流动性不均衡下异常攀升，是要压垮整个市场、进而压垮整个经济和社会信用体系的。投机者对香港金融市场联合发起了精心策划的攻击。在联汇制度下金融管理当局无法及时提供流动性，投机者在短期内通过集中性抛售港元，能够暂时抬升货币局制度下的利率到失控的地步，这将对股票价格施加巨大的向下压力。通过短期内对这种货币施加压力并且抛售股票，即使他们不能冲破设定的汇率，他们也可能从股票指数期货合同上获取一笔收益。1998年8月13日香港恒生指数跌穿6600点，从1997年8月16000多点的高位下跌将近10000点，此时离8月28日的恒指交割期时间已近，可以说胜败已定。虽然后来香港政府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救市行动，将股市的点位提升到了8000点以上，维持了市场不崩溃，让投机者在最后阶段损失不少，但是前面投机者已经是赚取了暴利。对于从16000点的高位做空而来的大额投机者，在恒指暴跌至6600点到8000点的区间，再贪婪的投机者也应当止盈收手了，否则巨额头寸怎样平仓呢？因此对冲基金的沽空期指的主力合约大部分已获利平仓了。

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1000亿港元平准基金成功挽股市、汇市大跌之狂澜，最终1000亿港元不仅挽救了香港股市，而且赚取了1000亿港元利润。这个成功的案例背后有中国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普通香港股民的损失惨重。对于楼市所造成的影响呢？从香港建立联汇制度后，1985~1997年房价则上升了近10倍，但在汇率攻击，利率飙升以后，1997年楼价一路下跌，至2003年年中香港楼价已下跌70%左右，导致大量负资产（持有物业的市场价值已经跌至按揭金额以下）人士产生。这一轮下跌过程达6年，至2003年底才慢慢有复苏的迹象。

1998年8月，特区政府毅然在股票和期货市场上进行了一场具有争议性的干预行动，特区政府购入以当时市值计约150亿美元的香港股票。到1999年9

月，该批股票值已升值至 260 亿美元，保住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但是，虽然香港政府为了香港投资者的利益放宽了交割时间等，但是香港投资者仍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户均损失达到 250 万港元。许多家庭因此破产，万劫不复。这些流动性不均衡问题造成的利率抬升，给了国际金融大鳄浑水摸鱼的机会，最后香港普通投资者损失巨大。对这些教训是应当深刻反思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很多人认为所谓救市击退国际金融大鳄一说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做空港股的时候，国际炒家是需要有打压股市的筹码的，从最终涌出的筹码数量来看，这个筹码的规模是 1000 亿港元左右。此时炒家大部分空单应当在股市从 16000 点到 8000 点股市腰斩的时候平仓兑现利润的，到 6600 点的低位的时候，这样低的点位任何人都知道做空是有巨大风险的，其持有的空单更多的应当是对应其所持股票的套保。在套保之下政府的救市虽然让其空单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可也让其持有的打压市场的 1000 亿股票筹码得以出货在高价，赚取了利润，国际炒家得以全身而退，因此炒家是没有受到损失的，不过即使是这样，救市也是必要的。

很多人深入看到了炒家的套保但没有看清更深的一步。国际炒家进行了套保，这样的套保在市场上是零和博弈，如果在市场的下跌途中，大笔的国际投机炒作资本得以套保保全，市场就要让没有套保的付出更多的代价，只有这样平均下来套保不损失才是零和博弈。因此如果没有救市，香港的股市会下跌得更多，香港市民的损失会更大。可能这里有人会说我怎么知道下面会走熊？6600 点是低点啊！走牛反转的可能性应当更大，走牛的时候套保的不得利不是让没有套保的人得到更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国际炒家要撤退，是 1000 多亿港元的资金要从市场上抽走，抽走这么多的资金那么市场是走熊还是走牛呢？这样的资金抽走本身就有一个流动性的问题，炒家是持股和空单进行的套保，到期期货空单交割是不存在流动性压力的，而套保则在交割的时候股票同时抛售，抛售 1000 亿的股票会有怎样的市场压力不用多说了吧！这里如果是融券和多单的套保，股市走向可能就到了反面。而政府的救市，是往市场里面输入了流动性，是 1000 亿现金进入了股市，对冲了国际炒家撤退抽走 1000 亿元所带来的流动性不均衡。要知道如果炒家的抛售导致股市再跌，很多股票

质押融资就要出问题，市场的质押大量是股市在 12000 ~ 16000 点的高位上的，6000 ~ 8000 点是质押股票即将平仓的位置，在金融机构的平仓潮当中会引发连锁反应，香港的金融危机就不会比东南亚的小！所以虽然遭受损失，让炒家赚取了利润，救市的意义还是很重大，不能抹杀，但更需要的就是在事后多反思。如果是浮动利率，炒家全身而退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做空股票的利润会在货币贬值的汇率当中损失掉。

对于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外来热钱也是一样渔利内地股市的。对于内地的固定汇率制和美国的印钞，当时的央行领导讲，可以挖一个池子，热钱进来就在这个池子里，出去再从这个池子里面出去，这与香港的联汇制度的思路是类似的，但中国当年央行领导讲池子论的时候笔者就立即清空了所有的股票，那可是在 3000 点附近，从以后几年的走势看基本属于逃到顶了。因为他讲池子但是没有讲在这个池子里的盈亏，这个池子也是中国的民间资本和散户老百姓都参与的，热钱进来再出去，是被中国的民间资本和老百姓散户的汪洋大海所发动的人民战争所消灭了吗？还是大大地掠夺了一番，“打草谷”似的满载而归呢？从资本的规模、信息和经验等各个方面海外的热钱都占据着巨大的优势，这里讲的是实力而不是主观上的人定胜天，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谁相信初生牛犊可以战胜虎？中国的市场还在培育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市场巨大，就是初生的肥牛犊，而海外的热钱却是在全球纵横捭阖上百年，成了精的斑斓猛虎，这样的放进来，就是对于中国社会资本的一场屠杀，是对于中国新兴资本势力的一次彻底的剪羊毛。中国的上市创业造富所产生的大批富豪，在老牌的资本贵族眼里就是一批暴发户，是最好的剪羊毛的对象。事实的结果就是股市从 2010 年 11 月的 3000 多点跌到现在，跌去了约 1000 点。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就是热钱进出前后流动性的不均衡造成了利率变化，随后的高利贷横行和高利贷破局，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和市场。股市的股价与利率挂钩，但是这个利率是民间利率为主的市场化的综合利率起主导作用，不是央行的公开利率，对于流动性不均衡下的利率失真也是应当重视的，这个失真产生的套利空间是各种金融攻击浑水摸鱼的地方。

对于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和金融攻击，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之下，情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只要看一看美国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以后是怎样做的，就知道在

金融制度下有足够的调控权是多么的重要。美国的量化宽松引人关注，但是美国的量化宽松实际上是定向宽松，而对于美国体系内的流动性紧缩则被选择性失明。我们更应当注意美国当时是怎样紧缩的。

2008 年金融危机，美国的货币实际上处于严重泛滥的威胁之中，美国国会于 2008 年 12 月授权给美联储的新工具——“超额准备金利率”，最初的利率计划为 1.25%，到目前该利率为 0.25%，这个利率使得大量超额准备金存储于美联储，准备金付息政策的出台导致负债方的“准备金存款”快速增加。自 2008 年 9 月份开始，原来构成负债方主体的“流通中货币”占比迅速下降，2010 年 1 月底下降到 40% 左右。而存款机构的准备金存款占总负债比重相应上升，2010 年 1 月底上升到 57% 左右，危机前的 2007 年 6 月，准备金总量 160 亿美元，而 2009 年 9 月准备金总量高达 8480 亿美元，扩张 53 倍，其中超额准备金高达 8220 亿美元。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创纪录。2010 年 1 月 13 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升至 2.274 万亿美元。其中，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亦从 2007 年初的 22 亿美元上升到 2009 年 11 月份的 1.16 万亿美元。

1.16 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对于当时美国不到 8 万亿的 M2 而言，这是一次性的提高准备金率 15% 以上。但是这个准备金率的提高不同于中国那样的强行提高，是银行自愿缴纳的，也就是说只有资金富裕的银行才会缴纳，资金紧缺的不会，在危机时成功的收回了富裕银行的流动性。但是收回了资金富裕地方的流动性以后，流动性紧缺的地方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量化宽松了。两轮量化宽松下来美联储购买了 2 万多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卖出这些资产的机构当然是缺钱的，等于成功地给缺钱的经济部门注入流动性，还维护了证券市场的价格、压低了实际的市场利率。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购买了大量的债券，这样的购买是要通过大宗交易完成的，购买谁的债券？怎样买？什么价格买？这些都是存在利益输送的，这也是美国的最高商业机密了。如果有谁要攻击美元，美联储肯定可以针对性的不购买他的债券，这样的流动性放松的背后是美联储强大的控制力，并且确保了利益落在美国人的手里。在宽松当中美国人可以首先得到货币，从而也有前面所说的制度性的套利机会。对此我们应当看透美联储在调控上的优势和手法，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香港由于政府没有有力调控手段，是要付出额外代价的。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国家不要干预金融市场，这些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在当年能够成功的原因就是金本位，后来金本位破裂以后就失败得很惨，因为金本位时代货币的价值是黄金本身带来的，是外界不易干预的，但金本位破裂以后货币本身就是政府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就必然与政府的行为有关，是不能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现在美国等国家超额发行国债、信用贬值甚至破产，美联储不断印钞投放货币，已经是在赤裸裸的干预金融市场并且从中要得利，大家还信奉自由金融市场的教条不是有问题吗？

所以从中国香港当年危机救市当中的流动性不均衡牟利，就可以以此具体的事例，真切地理解为何流动性的不均衡能够渔利，这样的渔利如果我们以定价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流动性左右定价权牟利的过程。要控制流动性的不均衡，更多的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手段，因为不均衡本身就是微观现象，我们应当在微观层面对于这样的渔利有更多的重视，因为在宏观的平均下，这些微观的渔利是被湮没的。

第5节　金融定价的博弈

制度性套利是可怕的

实行绑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被迫要存储所钉住的货币美元，但是美元的价值却是在变化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美元的价值是不断贬值的，这也就使得储备国储备的美元是要被掠夺和制度性套利的。套利不同于投机，是无风险的食利，食利就是剥削！适度投机在市场经济里面也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食利则是毒瘤，正常的市场会迅速的调解，让套利的机会消失，这样的迅速调节就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但制度性套利就是让这样的食利行为长期化、合法化，破坏了市场出清，是严重的制度性缺陷，虽然一时不起眼，但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千里之堤决于蚁穴。市场出清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如果市场出清的假设不存在，

则说明这样的市场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应当以货币政策干预市场，联汇制度下干预市场的货币政策受到限制就是制度性的缺陷了。

我们应当注意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货币的定义是改变了的，在本位货币时代货币更多具有古典货币的属性，是一种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但是在本位货币破裂以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就不再是商品，而是充当交易媒介的国家信用凭证。商品货币的价格是国家金融机构难以干预的，而信用货币的价格则国家是可以印钞让信用贬值的，这样就产生了货币套利行为。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世界的改变是在国际贸易金本位破产之后发生的，各国都使用本国廉价发行的货币来挤兑其他国家的财富，而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这个国际金融能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往往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使得其国内的经济体、利益集团和人民都希望持有外币进行避险，尤其是有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更加如此，客观上也造成了对于外币的不正常需求，因此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成为国家的社会稳定器，产生了特殊的使用价值，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这些国家最后把本国的货币变成了外国货币本位制，这就是当今流行的新重商主义。

这样的制度性套利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成为债务国，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变得畸形高昂，因此在不同利益取向上，东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新重商主义，而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国家赤字政策，双方各取所需，直到美元贬值过快，亚洲外汇储备过高，这样的需求平衡被打破，金融危机就要发生了。

货币概念的变化和差别，是制度性套利的根源，因为一方是本位货币、商品货币，另外一方是信用货币，而且这个本位货币还以对方的信用货币为发行本位。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已经没有了金本位时期的资源属性，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世界贸易的货币也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属性了。货币没有了资源属性，发行货币就再也不需要受到资源的限制，导致以劣币挤兑他国财富进行不等价交换成为可能，于是后者也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掠夺致富的新手段。这样古典经济理论就受到了根本挑战，新的世界格局建立了。

在美元等西方货币不断贬值的压力下，制度性套利就不断地发生，结果就是美国印钞直接造成他国的通胀，反而美国自己由于可以在印钞后还没有通胀时得到钞票，购买商品，通胀反而最小，因为货币贬值和通胀是传导的，谁先

得到货币谁得利，而美元信用贬值所造成的钉住美元的货币的贬值是传导的最末端，等这些美元流入让货币增发以后，世界商品已经涨价了，这样的时间差是要造成制度性套利机会的。美元的不断贬值不但是钉住美元国家储备的美元货币财富的流逝，还造成制度性的套利机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均衡的通胀，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输入性通胀的来源，香港的通胀压力也是与之高度相关的。

按照“蒙代尔三角定律”，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外汇项目的管制开放三者是不能同时成立的。香港是一个开放的金融体制，再实行最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政府的金融调控能力就要完全受限，在输入性的流动性和通胀面前，就要遭受掠夺或者制度性的套利。我们举例说明：香港有价值 100 亿美元的商品市场，美国印钞 20 亿美元涌入，这 20 亿美元首先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可以平价购买到 20 亿美元的商品，但是由于美国印钞没有对价，美国人购买商品以后，香港货币池子是 120 亿美元，但剩下的商品价值只有 80 亿美元，剩下的商品要与货币数量对应就要涨价到 120 亿美元，从 80 亿美元涨到 120 亿美元要通胀 50%。但是这个通胀只是发生在香港，而最先拿到钞票套购物资的美国人是赚便宜的，这就是制度性的套利。而如果是浮动汇率，或者有足够的政府调控能力，那么美国印钞以后汇率就要发生变化，美国印钞就要造成美元贬值，是通过美元的整体购买力下降来分摊它的印钞的。例子比较粗糙，但是实际的效果就是这样，现在钉住美元就是要面对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中国历史上就存在长期的被套利。历史上中国的金银比价是 10 倍，而西方是 20 倍，这样的差距在存在套利的情况下本应当很快的消除，但是这样的差价实际存在了上百年。西方曾经开来整船的白银到中国换取黄金，结果就是制度性套利。西方是金本位，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中国的货币是白银实银，结果就是西方人总可以先拿到货币，在涨价前购买商品，控制了定价权。现在的世界也是类似的，采取联汇制度就是美国有印钞的主动权，美国人总是可以先拿到货币的，这样货币取得的时间差成为系统性的差别，就要产生长期的制度性套利。

历史上设立美元联汇制度的时候，美元的购买力在不断地升值，大宗商品处于熊市之中，是不存在制度性套利的。而现在的美元处于贬值通道，购买力

不断下降，大宗商品在牛市当中，联汇制度让港币的抵押物贬值，导致港币贬值之外，美元的外汇流动使得美国印钞可以先得到货币，在通胀前购买商品。这种流动中不断地制度性套利维持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差异化通胀水平，财富是不断外流的，这样制度性的套利机会长期存在，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根本性的枷锁。

流动性衍生穿越与定价权

很多西方学者把西方的崛起归结为西方的金融能力，归结于西方可以迅速的调动足够的资金和信用，包括西方的战争胜败，西方学者也认为金融的实力决定谁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进行战争，西方人讲的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情，这背后笔者在经济金融层面要讲的就是流动性的穿越和定价权的问题。

随着人类的金融体系建立，实行了信用货币以后，世界的信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历史上贵金属金银财富属于某人的就是某人的，在你家地下埋藏着谁也无法利用，而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你的贵金属换成货币存在银行，你得到的信用是纸币的信用，这个纸币就是银行的债券，银票就是钱庄的债券，如果央行把货币发行权垄断的话就是央行债券，你的财富的贵金属价值所代表的信用变成了钱庄或者央行的信用了。钱庄、央行、银行机构等就可以利用你的贵金属价值信用，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些债券的发行者也可以多发行这些贵金属的金圆券衍生更多的信用加以利用。这样你的贵金属信用就衍生放大了。对应于这些信用，货币的流动性也放大了，货币流动性的本质就是信用的流动性。

贵金属货币被以国债抵押的纸币所替代，被国家承诺一定贵金属价值的纸币所替代，国家的信用就得到了更多的衍生，信用更多，流动性也更大，而定价权本身是流动性所决定的。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推论，标定价格的是货币，货币是信用，则定价权本身就是一种信用权力，能够货币衍生也是一种信用的权力，这是信用权力的一个组合。这里我们看见了信用与财富的脱节。

在人们持有纸币的时代，人们的财富都存于银行，这时的财富已经不是纸币而是信用了，则人们存于银行的信用实际上是被银行所经营的。你的财富所代表的信用是被银行给了谁和以什么代价给了谁，不是你能够决定而是银行决定的，这与贵金属时代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存款在银行是要货币衍生的，这个

背后也是信用的衍生。我们注意到你有 100 万元存款存入银行，银行把这存款扣除存款准备金 20 万元后贷款出 80 万元，这 80 万元要产生新的信用，无论这 80 万元是存于银行还是拿着现金，都属于广义货币 M2，你的存款更是货币 M2，在此过程一直没有变化，这样就变成了 180 万元的货币和相关信用了，但信用增加了这么多，财富真的有变化吗？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财富的总量是没有变化的，在财富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金融信用却在货币衍生机制下增加了许多，对于这些多出来的信用所对应的权力是什么，就是定价权和金融霸权。

西方学者解释这些货币衍生所多出来的信用，就是因为借贷的一方产生了更多的货币，借贷的一方要使用未来的收入来归还，这多出来的信用实际上对应于借款人未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因此西方学者把这些衍生出来的信用对应于未来信用的透支，如果说流动性的话，就是流动性的穿越，这样的流动性穿越所带来的好处是什么？真的能够在今天消费未来的财富吗？在物质不能穿越的科学原理下，穿越来的流动性一定要作用于当今的财富。谁能够控制这些穿越来的流动性，谁就控制了当今更多的财富，而流动性和财富的作用是在这个市场化商业交易当中完成的，决定交易的关键就是价格。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价格形成和发现的体系，作用于财富的关键就是定价，这是一种金融的权力。

人类的历史上有神权与王权交替统治的时代，在这两个权力争夺的二元状态下，制衡的体系是一个不稳定平衡，只能是一个权力依附另外一个权力，也就是不是神权为统治服务依附王权，就是王权依附神权的宗教国家，结果就是一家独大的集权社会，权力是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在金融体系大发展后，货币权力形成了，未来的流动性能够穿越，货币权力能够决定人们的财富价格和分配的时候，世界第三种权力形成了，形成了三权制衡的权力机制，可以形成制衡稳定系统了。在神权和王权的制衡下，货币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才可以让人们的社会行为由原来的权力决定变成钱决定的社会。当今就是金钱决定的社会。

在钱决定一切的社会，定价权成为顶层权力，也成为霸权的来源。资本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钱决定的社会，市场经济更是一个在市场上按照价格体系决定财富分配的机制，谁有让流动性穿越的巫术，谁就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定价王

者。西方社会获得了这方面的能力，抢先建立了现代央行金融体系，从而取得了全球的金融定价权，再分配了全球财富，才造就今日西方的发达，这个力量比科技带来的更本质，它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决定了科技成果的分配，是决定世界的关键力量。

固定汇率制度是汇率补贴制度

固定汇率制度实质是一种补贴制度，对这样的制度我们以中国香港的现行制度为切入点来认识最清楚不过了。

中国香港严格的联汇制度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实质上就是一个汇率补贴制度，这个角度就是从汇率掉期合约的角度去解读。掉期交易（Swap Transaction）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相互交换某种资产的交易形式。汇率掉期则是通过汇率的掉期交易达到规避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等利益，当然也有投机的需求。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的掉期交易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钉住一篮子货币下只不过是其他外汇与货币指数的关系，其他外汇的指数期货可以替代，而像联汇制度这样的钉死美元的，也就是美元与各种货币汇率掉期合约的翻版，唯一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市场下注赌博联汇制度垮台的概率。只有浮动汇率变动很大，汇率风险巨大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汇率掉期交易才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汇率巨幅波动的时期，汇率变更的风险越大，汇率掉期交易的需求就越大，汇率掉期合约的价格也越高，这样的高价格最终是要在正常的经济往来当中承担成本的，成本巨大以后就要对于经济造成巨大影响。

对于政府而言，政府的体量是巨大的，央行的风险承受能力与一般的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政府承担汇率风险的能力远远的高于企业，政府实行固定汇率，就是给所有的对外经济往来补贴了一个汇率掉期合约，让企业的经营往来在固定汇率制下达到了有汇率掉期合约套期保值的效果，就是等于给企业保驾护航。在世界汇率波动的时期，对本国经济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联汇制度就是最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是给企业对外往来最严格的汇率套期保值的保障。对于中国香港这样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其历史价值是不能忽略的。

在汇率不稳定的波动期，虽然有看多、有看空，但是政府和央行的参与是可以很好地对冲波动的风险的，对冲下总风险极大降低，给各方都带来利益；

但是如果汇率的走向发生了趋势性的改变，保持汇率不变的情况下风险就会积聚和累加，汇率掉期合约的价格就要出现大幅上涨，成为套利和攻击的手段，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固定汇率制是可以受到攻击的。这一点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的特别明显，各国在攻击下放弃固定汇率制实际上就是使得汇率发生趋势性变化，汇率风险累加掉期合约价格本应当大涨，保持固定汇率就是政府补贴汇率掉期合约的代价，直到风险增加，掉期合约价值暴涨到这样的补贴难以为继，补贴不起了！固定汇率制就崩溃了，在崩溃下出现报复性和恐慌性的波动被渔利。

这样的过程首先是两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发生了变化，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汇率掉期合约出现方向性的升水和贴水，实行固定汇率制下就要对于这个升水和贴水进行补贴，等于央行等本国金融体系承担了全部的方向性价格成本，这个成本承担就是通过本国的货币宽松和紧缩产生利率变化影响，改变汇率变化趋势，这就使得本国的金融政策不独立，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定律”就是这样来的。在本国货币有升值趋势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对简单，就是通过货币的衍生产生流动性，这是一个货币宽松投放，经济快速发展的愉快的过程，而本国货币如果有贬值趋势的话，必然要针对性的收紧流动性，这个紧缩的过程就是痛苦的。如果这个过程还伴随着外汇的金融攻击，就要出现挤兑的问题，在一般的固定汇率制度下，发行在外的货币是多于外汇储备的，这样在升值的过程当中必然更多地发行货币，一旦到拐点转入紧缩，发行在外的货币都要兑换外汇，紧缩挤兑下固定汇率是必然要破产的。而中国香港是严格的外汇储备发行货币的联汇制度，挤兑破产不可能，但是汇率掉期合约的补贴则是要金融体系承担的，这就会产生制度性的套利机会，所以中国香港一样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付出了代价，只不过这不是直接在汇率交易当中付出的，股市、楼市、利率等是一个整体，可以系统性攻击，从体系当中套利。

对中国现在的制度，基本的固定汇率制也是有这样的汇率掉期补贴的，但是中国内地与香港情况不同，内地对外不是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管制，经常项目进行监管，这样就可以保障补贴是给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而中国香港则是一个对外完全开放的自由港，固定汇率下所得到的利益政府是难以控制流向的。这样的补贴的结果就是很多投机者、渔利者成为制度性补贴的实际得

利人，而承担补贴的则是中国香港市民和纳税人，这样的机制的公平性已经很差，更不要说在金融攻击下对于中国香港的整体危害。

就如前面章节的分析，在美元印钞有贬值趋势的时候，香港的传导和跟随总是要有时间差的，这样的时间差和固定的方向性就带来了巨大的套利机会，各种对冲基金本来进行的套保活动就演变成为套利活动，总可以不断地套取制度性的收益，这样的收益实际上就是实行联汇制度下对于汇率掉期合约的补贴。想一下前面分析的套利过程和金融攻击的过程，如果没有联汇制度存在，对冲基金的对冲操作还应当买入一个汇率远期掉期合约进行对冲，否则的话即使是在中国香港市场赚取了利润，汇率的变化也可能使之变成无有甚至是亏损的。如果在金融攻击之下汇率不是固定的，则首先变化的是汇率掉期合约的价格，汇率掉期合约的价格变化会在市场机制下自动对冲他们金融攻击的得利的，金融大鳄攻击的效果就不存在了。因此攻击固定汇率制度的对冲基金，取得了相当于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掉期合约价值的利益，实际上等于是套取了国家对于汇率的制度性补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掉期合约的价格就非常好的通过市场的机制对冲了他们金融攻击的利益。

想一下在金融攻击当中是利率暴涨好还是汇率掉期合约暴涨好？对于中国香港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市民受到更多影响的是利率的变化，因为这直接影响房贷还款，直接影响存款理财，等等，中国香港大量的转口贸易以美元结算是不会有影响的，而汇率的变化则更多地影响到在中国香港的资本，中国香港的政策更多的是注重市民还是更多的注重外来资本呢？中国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更多的是考虑英国资本在中国香港的利益，但是现在港人治港，就应当更多地考虑香港人的利益，政府政策制定上由外向内的转变就应当被列入议事日程。

在联汇制度实行之初，世界汇率波动剧烈的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美元也处于危机当中，全球未来货币走势的方向性是不明显和不确定的，这个时候实行联汇制度，以制度性替代汇率掉期合约的套期保值进行补贴，对于中国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世界发展到了今天，西方经济危机四伏而中国香港背靠中国崛起经济相对良好，西方世界不断印钞宽松而中国香港金融稳定，汇率的变化实际上是有方向性的，这样的方向性一样是可以

金融攻击和套取的。使用政策调动国民和纳税人的利益补贴经济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在汇率市场有了方向性，可以被金融攻击和套利的情况下，使用这样的制度补贴套利和金融攻击利润则是万万不能被接受的，这是把香港人的财富向金融大鳄的嘴里输送，这使得联汇制度从原来的定海针变成了现在的老鼠仓，对于这样的输送制度是应当尽快反思和改进的。现在改革联汇制度，就是取消对于汇率的汇率掉期合约的补贴，减少制度性套利和利益输送的机会。打破原有利益格局所面临的阻力肯定会非常巨大，得到这样制度性利益的群体会成为反对方，而制度性的输送受害人却不是特定的，支持对象不明确，支持的人会有限。对于联汇制度的反思，恰恰是联汇制度的始作俑者任志刚先生，但这样的反思在 2012 年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很多时候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的，有话语权的不等于有民意，一时的民意不是长久的民心，我们的战略决策者应当站在中国香港未来更高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好的制度将给中国香港带来好的未来，要惠及未来扎根中国香港的人群，中国香港需要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人群。而目前对于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叫嚷改革却不说改革内容的，就是可疑的。

从中国香港的联汇制度，就可以想到我们的固定汇率制，如果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管制，中国也要面临中国香港联汇制度同样的问题。对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和代价我们是要充分认识的，因此我们对汇率市场化也要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认识。外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改革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第 6 节　流动性下全面认识人民币升值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到 2014 年初已经达到了 6.10:1左右，不远的将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将会突破6 到5 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对于人民币的升值需要全面认识。

在中国，货币的升值和贬值都是围绕着出口来讨论的，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企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出口企业来说更多的是不利的影响。但对于升

值和贬值的影响，我们要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估，不能仅仅把眼球放在出口上。在货币升值以后，中国的进口可以更便宜，这些进口的必需品的降价有助于降低中国的CPI，如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在60%上下了，国内民众对于油价也非常敏感；中国经济发展建设所需的大量资源都需要进口大宗商品，从铁矿石到铜、棕榈油，等等。这些商品的进口也变得便宜，中国的财富在积累。贬值确实可以促进出口，但贬值是把双刃剑，出口所得的收入还会因为贬值而降低呢！只要中国的外贸企业利润增加，由于中国外贸企业的集中度不够，国际垄断财团就会压价，多得的利润就要被他们占有，这会让我们的出口在贬值的情况下依然处于不赚钱的地位。有人说升值和贬值是与国际上同类制造国的竞争，但这个说法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比着贬值和便宜的结果就是以外汇的结算价值来看国内的收入进一步地降低和资源的进一步贱卖。这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这是一步步地让金融霸权的进口国取得利益的过程，你身处囚徒困境之中，怎么都不会有利。中国现在要跳出这个困境，我们的产业升级就是不要这样的低层次竞争，而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是带来额外溢价的，中国的人口规模也是周边国家所不能比的，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带来部分制造业转移，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是不好完全替代的，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润增加就没有人计算呢？

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确实会受到损失，但出口损失的另一面是进口企业获利。而人民币贬值，看似是出口企业占了便宜，但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便宜其实是不存在的，差别是给出口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工作的人的收入以美元计价是在下降，而且正是因为后者的损失这才带来了出口企业的利润，因而贬值导致出口增加的利润来源不是从外国取得的，而是一个国内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货币贬值给出口企业所带来的利润来源是国内其他经济要素外汇定价的贬值所带来的，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出来，如果出口的价格被压价或者出口企业因此有条件降价进行竞争，结果就是国内其他要素的价值减损，成为全球瓜分的外贸利益，这是没有好处的！而如果我们的货币升值，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大宗商品的价格以人民币看就是赚了，而出口由于我们的利润极其微薄，受到成本的刚性支撑，出口吃亏是难以长期化的。计算了进口收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贬值没有升值有利，但中国的进口产业很分散，话语权不足，出口企业

有更大的话语权，外国也需要中国大量廉价出口资源和产品。

进一步回顾历史，1992 年索罗斯进攻英镑，让英镑大幅度贬值，这样的金融攻击造成英国巨大的经济损失，怎么不见有人高兴地说货币贬值促进英国经济了？按照贬值可以促进出口进而促进经济的主流说法，英镑贬值应当是举国欢呼才对。1998 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亚洲新兴的小龙国家都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遭受严重损失，其具体表现也是本国货币的汇率巨大贬值，这个贬值对于这些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怎么不说是一个利好呢？汇率贬值促进出口、提振经济的说法，本身就不是必然的，但为什么美、日、欧等国要不断地宣扬货币贬值的好处呢？而且他们还通过印钞不断地促进本币贬值，宣称这都是为了促进出口，但他们的贬值和印钞与中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他们的贬值带来财富的源泉在于货币的输出，在于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出口！注意美国和欧洲都是货币输出国，日本的货币也是大量地对准了中国，日元宽松中国立即会感到流入资金压力的加大。日本财团的制造业大量在中国，他们是产业链整合调配资金的，中国的外汇管制难以控制日元流动性对国内的输入。

在货币贬值的时候输出货币对西方国家反而是有利的，我们在经济学规律上有一个大家广为知道的定律就是劣币逐良币，在一个市场上有多种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倾向于把良币收藏起来，尽快花掉劣币，这样劣币就流通得更快。很快市场上就看不到良币，全部是劣币在流通了。对于这样的原理在汇率上则变成汇率有贬值趋势的货币汇率上会以通缩替代，有升值趋势的货币汇率上会以通胀替代，原因就是全球货币市场是有多种货币流通的，有贬值趋势的货币是劣币，可以驱逐市场上的良币，因为汇率上的升贬和通胀、通缩可以通过货币的国际流动来实现。因此如果美元的贬值趋势改变，大量美元回流美国会激发美国的通胀，这样的通胀会加剧美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因此维持贬值趋势让美元持续流出就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了。

在国际多个货币进行博弈的时候，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实物产品的进出口上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便宜，而关键是由于汇率的涨跌趋势对于国内通胀、通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背后因素。货币汇率的贬值所达到的效果是国际上货币的流动，通过这样的贬值趋势，使得本国货币可以流向他国，避免本国货币过多所造成的通胀。美国多次实行货币宽松和印钞的量化宽松，

货币是严重富余的，美元成为国际货币，需要美元大量流入世界市场，而不是回流美国本地市场，如果美元的趋势从贬值变成了升值，那么大量在国际流通的美元就要流通到美国国内，美国国内的通胀就要造成巨大的危机。美国 QE2 购买6000 多亿美元的国债，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增加5000 多亿美元。美国的货币贬值趋势是让市场当中的美元持有者尽快想办法以投资或者贸易等方式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这样的兑换行为会强迫维持汇率的他国央行买入，如果不买入则在持有者卖出后造成汇率的实际贬值，直接取得了汇率收益，市场上这样的行为就达到了美元输出的目的。这就是笔者在《涨价的世界》一书当中论述的世界怎样印钞印出通缩，加息加出通胀的道理。

而美国等国家逼迫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背后就是给美国等西方国家输出货币找到市场，这些有汇率升值趋势的国家或地区就是国际资本和热钱追逐的对象，贬值出口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也需要有升值趋势能够进口这样的商品的市场。这些货币出口到这些国家，是要换取商品的，这些商品进入货币出口国，给货币出口国带来了财富和繁荣，所谓的货币贬值促进经济的真相就在这里。印钞不是关键，关键是印钞不能通胀，更关键的是印钞的货币能够输出并带来真正的财富！因此货币的输出在这里才是汇率贬值背后真正博弈的目标，否则贬值就可能成为金融攻击和危机了，所以贬值不是目的，进出口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货币输出，尤其是输出印钞的低劣货币。因此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真正给中国带来危害的，就是中国又要面对大量的输入性的通胀，这个通胀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在西方想要向中国等国家输出货币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恰恰给他们输出货币带来便利，中国出口那么多的资源和血汗加工品换来的是外汇储备不得不不断增长，增长的外汇只能存储或者购买美国收益率极低的债券，忍受贬值的损失。这样我们对于出口就要想一下了，而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还引发了世界的套利驱动，中国的高利率与西方接近零利率的利差就产生了套利的空间，这利差可以套利，而且西方的金融体系还可以为这样的套利提供杠杆，把套利的效应放大，套利的损失是要中国的通胀埋单的，中国的输入性通胀也是这样造成的。对于有升值压力的货币如果你不让其升值，必定是外来流动性的涌入造成通胀，升值趋势被通胀替代也是共识，通胀的损失就是给输

入性通胀和套利埋单，因此我们控制汇率、控制升值也是与防通胀等国内经济需求连成一体的，这要一同考虑。

很多人总说升值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大量的损失云云，我们看到中国确实有极其巨大的外汇储备，升值也确实有损失，但我们要注意中国的外商投资的情况和进出口的情况。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3 年 1 ~4 月，全国进出口总额 8. 36 万亿元人民币，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 14% 。其中，出口 4. 37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7. 4%；进口 3. 99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0. 6% 。而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按照央行网站的数据 2012 年底的外汇储备是 33115. 89 亿美元，外汇损失确实存在，但中国的外贸数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就要超过外汇的变化。我们再看外汇管理局公开的国际投资头寸表（见表 4 －1），我们看到 2012 年末我们的外汇净资产是 17364 亿美元。中国的其他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资产和负债是相当的，形成净资产主要是储备资产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差别来产生的，但中国的外国投资超过 2 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 5028 亿元，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我们看到了大量中国投资海外失败的案例，这会计上的 5000 多亿元是有很多损失在这个表上无法反映的，而且在西方世界普遍限于危机的情况下，这些投资总数基本上是没有增值的，而在中国的外商投资 2 万亿美元，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当中增值巨大，仅仅土地一项增值了多少？中国以前大量对外招商引资都是以零地价的方式完成的，中国的外商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比较公认的是与国有企业的贡献相当，这些资产的价值远远翻倍，如果发生西方大规模撤资的情况，对于中国可能是灾难性的结果。我们要注意到的是高盛在工商银行的时代终告结束，2012 年 5 月 21 日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全部出售其在中国工商银行 H 股的剩余持股，具体出售价格为每股 5. 47 ~5. 50 港元，市传最后以每股 5. 50 港元即上限定价售出，套现 11 亿美元（折合约 85. 8 亿港元），高盛连续 7 次卖出获利 72 亿美元。与此消息相类似的是前两年美洲银行也大规模清仓建行股票，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资本在出货，尤其是美国资本在出货。

西方做空中国、外资大规模外流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些资金增值巨大，如果算上这个增值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挡不住的，而诱发外资撤出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如果有升值预期那么他们会热钱进来赌升值，而如果

表 4－1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　　单位：亿美元

项　目	2011 年末	2012 年末
净资产	16884	17364
A. 资产	47345	51749
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4248	5028
2. 证券投资	2044	2406
2.1 股本证券	864	1298
2.2 债务证券	1180	1108
3. 其他投资	8495	10437
3.1 贸易信贷	2769	3387
3.2 贷款	2232	2778
3.3 货币和存款	2942	3816
3.4 其他资产	552	457
4. 储备资产	32558	33879
4.1 货币黄金	530	567
4.2 特别提款权	119	114
4.3 在基金组织中的储备头寸	98	82
4.4 外汇	31811	33116
B. 负债	30461	34385
1.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19069	21596
2. 证券投资	2485	3364
2.1 股本证券	2114	2622
2.2 债务证券	371	742
3. 其他投资	8907	9426
3.1 贸易信贷	2492	2915
3.2 贷款	3724	3680
3.3 货币和存款	2477	2446
3.4 其他负债	214	384

注：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最新获得的数据，修订了 2011 年各季度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并在 2011 年修订数的基础上编制了 2012 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2012 年各季度末数据将于 2013 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发布的同时予以修订。

出现贬值预期他们就要大幅度外逃了。这个情况在西方国家是没有中国严重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贬值的通道里面，在他们国家的外国投资本身受到汇率的影响

就不会有中国大。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外商投资主要的增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资金避险和赌博升值的需求是很强的，因此中国的货币维持不贬值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升值过快同样会产生未来的贬值预期和获利套现的需求，一样会有这样的资本外流的压力，而他们没有外流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这个管制是限制做空和攻击中国汇率的城墙，如果没有了管制则中国金融安全就更需要谨慎。我们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过程一定要把这样的资本外流和金融攻击考虑进去，现在的汇率变化升值还是贬值，我们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像1998年那样被金融攻击的风险，被金融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会大大高于汇率变化对于外汇储备和进出口所带来的损失。

对于汇率变化，我们有多种调控手段，在传统的利率政策和央行的准备金以外，在外汇管制要退出的大势所趋下，新的市场手段很重要，市场调控的税收手段是重要的。税收不仅仅给政府创收，也调整各个经济环节的权重，在资金要外流的时候不能管制但可以收税，收取汇率变化所得税、投资所得税，等等。这些税收的软壁垒经常比外汇管制的硬杠杆更为有效。而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冗余，我们的出口导向和外资优待政策也是需要反思的，防范资本外逃和金融攻击可能比招商引资和出口更重要，国家政策的微调也是现在改革的方向。

因此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要全面地认识，着眼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出口，进口也要考虑，中国资产的增值也要考虑。套利和资本的流动是很关键的因素，不能仅仅局限于外汇储备的损益，中国的金融安全是更重要的层面，这与我们金融改革开放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也是相关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是简单的一个汇率涨跌的单指标，这些因素的变化是与世界的环境、国内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和随时变化的，我们对此不能刻舟求剑，我们要认清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我们最好的对策。

第五章

货殖 QE 时代

量化宽松简称 QE，在日本的日元升值和国内经济衰退背景下，由日本人创造，日本刺激了 20 年，也失去了 20 年，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世界发达国家却采取了类似做法。美联储是不断 QE 的主导者，QE 到底带来了什么？对定价权有什么影响？围绕 QE 大家都在博弈什么？QE 为何会导致中国海外投资的屡战屡败？QE 的未来走向在哪里？我们分析定价权，离不开对 QE 的认知。

第 1 节 定价权与为什么要 QE

QE、扭曲货币曲线与定价权

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世界普遍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西方再一次的通过印钞取得流动性的优势，这些流动性会输出到全世界，给西方带来定价权的优势，而不断地 QE 就是一个制造流动性的机器，不断给市场兑水。

流动性带来的好处，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由于蒙古的“黄祸”和美洲的殖民，世界在贵金属时代发生了贵金属聚集西欧的情况，造成欧洲相对于世界的流动性充裕和不均衡，这成为欧洲崛起和在当年取得全球定价权的基础。东方的财富流向欧洲，世界的贸易体系建立起来了。东方丧失定价权以后为了对抗西方的流动性倾销采取闭关锁国的策略，而拥有定价权的西方集中了全球的财富。在贸易和金融的推动下，西方的金融体系建立，西方金本位的建立、发展和破产，西方信用货币的建立，一步步的金融创新确保了西方的流动性优势和定价权，使之可以持续地主宰世界。在当今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流却是不自由的，维持了世界劳动力价格的差异，而贸易保护主义则限制了物流，资本管制、外汇管制则限制了资金流。对于有定价权优势的一方，总是要打破壁垒进行开放，而劣势的一方则需要足够的保护。对于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优势，世界各国都限制中国的人流迁徙，严格签证，但同时还要要求中国开放汇率和资本的管制度降低关税。

在当今世界为何会有流动性的不均衡和定价权，则是因为定价权的价值尺度的变化。我们衡量一个价格是以货币来完成的，但是货币权利在央行的货币衍生体制建立尤其是金本位体制破裂以后，已经不是贵金属时代的货币，完全由贵金属价值决定。古典经济学金本位之下货币衍生仅仅是贵金属在其商品价

值上有一定溢价所决定的，货币的信用发行成为可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货币的数量膨胀大幅度加快，而苏联解体、中国和南非向世界开放市场和资源所带来的货币需求，缓解了货币超发的危机，但这样的货币增长和金融衍生的膨胀终于在 2007～2008 年造成了灾难，因为这个灾难，QE 就开始了。在其后的 QE 时代，有国家信用进行 QE 发行货币的国家货币的发行更加泛滥，所有这些变化都造成了货币这个尺度已经发生了扭曲，谁能够掌控这个扭曲，实际上谁就能够控制定价。这个货币的扭曲的外在表现就是流动性的不均衡变化，这不均衡变化包括时间上的不平均变化和地域上的不均衡变化，所带来的就是价格的变化，同时被流动性所决定的货币供需关系所左右，这对于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言是商品的供需关系被货币的供需关系所左右和影响；而对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价值论则不同的劳动力价格受到地区货币不同的差异影响而不同。对于货币这样的扭曲视而不见，在全球如此 QE 印钞的情况下还以货币币值不变或线性为各种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则会丢失大量国与国之间的关键信息，因为在不均衡的流动性下，不均衡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各国不同的，与各国央行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地位相关，这个均衡是不能够通过自然的反馈过程完成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明确指出稳定的汇率、自由流动的资本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也就是各国追求金融主权的独立货币政策下，货币的价格（汇率）不能通过流动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不均衡的状态下谁能够主导域内的货币流动性，谁就有域内的定价权，就如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实际上也是一种定价权的表现，即通过政策压低了社会平均定价（见图 5－1、图 5－2）。

QE 就是造成货币供需扭曲的一种方式，在传统的货币供需曲线之下，利率越低供给越小，利率高了才能吸引更多的货币资金，而需求则是利率越大需求越小；但在危机当中，资金的需求是刚需，甚至是已经形成了庞氏骗局，利率高的时候庄家也会不断地吃入，寻求找到利率更高的下家。同时当我们的 QE 利率变得很低、收益率几乎为零的时候，央行强制性的购买国债，提供流动性，与正常的供需曲线完全扭曲，QE 的实质就是要造成这个货币供给曲线的扭曲，在低收益率下通过央行的干预提供更多的货币，而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扭曲不能自动的回到均衡点，就是我们讨论的定价权来源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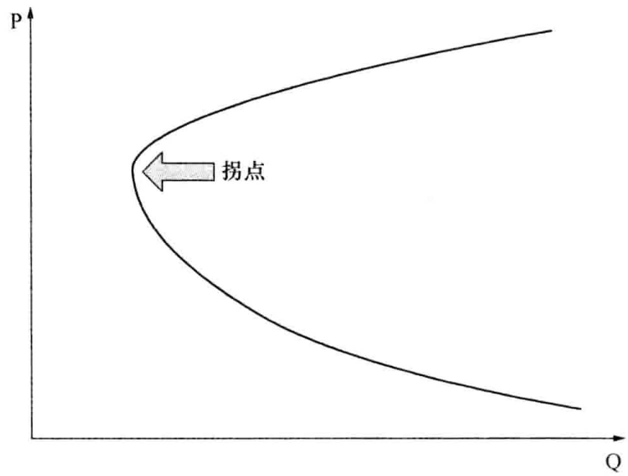


图 5－1　QE 下的需求曲线

注：对资金的需求曲线，一样可以是畸形的。在图 5－1 的曲线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拐点的出现，在这个拐点的下方是传统的货币供需曲线，而在这个拐点的上方，由于企业受到了危机的影响，在利率不正常的抬高以后货币的流通速度会降低。按照流动性 $MV = PT$ 的要求，如果市场 PT 不变，则 V 的数量降低，M 的数量需求会加大，这样的例子在 2013 年 6 月的中国货币“钱荒”下尤为明显。在中国货币 M2 超过百万亿的同时，由于影子银行等大量还款到期，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需求暴增，利率暴涨，银行间拆放利率最高利率突破 30%。同时在危机当中会出现类似庞氏骗局的效应，也就是说利率越高，企业未来受到前期利率高产生大量利息的压力，资金需求不是降低的，反而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定价权的角度，看到 QE 的施行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实际利益，印钞的 QE 所带来的不是 QE 那一点货币所对应的购买力，而是通过定价权的市场交易，造成流动性的不均衡和市场的扭曲，把这个 QE 的货币利益放大了很多倍，但这个机理却不会轻易示人。

负利率下西方的国债腾挪

QE 另外的重要作用就是压低了利率，可以让西方应对不断上涨的国债规模，使得西方国家拥有了更高的负债能力。

对于西方主要国家负债超标，总有很多人认为西方这样的局面是难以维持的，因为在二战前西方列强也是通过竞争性货币贬值激烈博弈的，并且最终导致世界的主导权从欧洲向美洲的转移。但是笔者经过分析认为西方在当今负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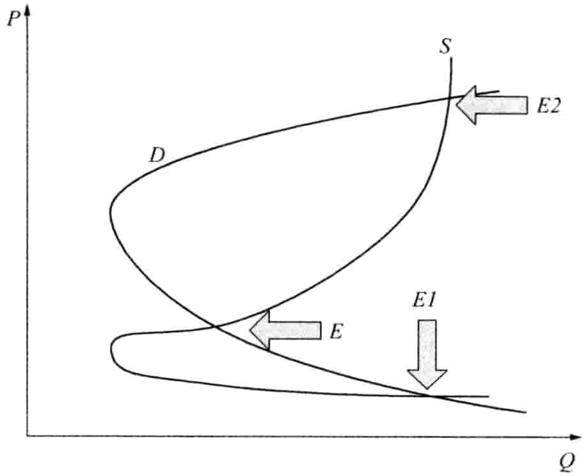


图 5－2　QE 下的多重利率均衡

注：对央行的 QE 等货币政策的干预之下和危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的供需曲线是可以形成三个均衡点的。对畸形的供需曲线，在传统的供需领域会有一个均衡点 E，这与传统理论是回归和一致的，就如我们的银行贷款利率。

在 QE 导致的拐点下方可以形成一个低利率、高供给的均衡点 E2，这是 QE 下的无风险利率的需求，对这样的均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国国债超低收益率下货币供给的丰富。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是要高于美国的银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的，所以美国的评级下调美国国债反而是上涨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就是可以长期低于美联储利率的。这个现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QE 下长时间的出现，美国国债收益率是 0. 12% 左右，而美联储利率是 0. 25%，这个问题本书已经详细分析了。

而在拐点的上方则还可以出现一个高利率高供给的均衡点 E2，这就是风险利率下的均衡点。美国金融市场是有二元性的，在 QE 时代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信用卡利率以及信用卡违约利率在历史的高位，分别高达百分之十几和 30%。中国的利率也是多重均衡的，在市场的高位中国出现了影子银行和企业融资难下的高利贷等决定的高利率，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重。

因此认识央行干预下的货币供需市场，会出现多重的均衡情况，这三个不同的均衡点导致会有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和传统利率的分野，但到底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率，则就是金融定价权的体现。

率的模式下，通过不断地负利率降低财务负担，当年英国等国衰落的历史未必会重演。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 20% 用于债务本息支付时，该国货币必然出现恶性贬值，伴之恶性通胀；当达到 40% 的时候，整个“帝国”会崩溃。因此有人预测到 2035 年，美国的国债占 GDP 的比例将会达到 200%，如果以现有的国债利率计算的话，美国的财

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债务本息的比例将高达46%，这就是1939年英国面临的情况！大英帝国正是从那时开始走向衰落。因此有人进一步预测美国在2035年会信用破裂，美元体系大崩溃。

但是西方主流负利率政策使得政府的财政负担实际上是在相对降低的。我们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美国的负利率政策导致美国现行的国债利息在大幅度降低。美国30年国债利率在过去近30年中从1981年9月的最高的15%到2008年12月的2.5%，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2011年初，长期利率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前期高点3.7%回落至3.45%，到2014年维持在3.60%左右。短期利率方面，美国2年期国债利率水平也出现回落，利率从0.85%一度回落至0.2%以下，现在的水平是0.3%，而一年期利率则是在0.12%左右，利率曲线的陡峭程度下降，呈现出平坦化趋势。这样的低利率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债达到了GDP的200%，而其债务成本也只有GDP的4%以内，难以超过财政收入的20%。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没有通胀压力，市场也是缓慢通胀的，年通胀率是2%左右，实际利率是负利率。现在的负利率政策恰恰是使得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很可能不会重蹈覆辙的主要原因，因为美国国债的利率在持续降低，美国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美国的国债利息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却是下降的。这是一个负利率逐步加剧的状态，随着美国高息的旧国债到期和低息的新国债发行，美国的国债利息负担将逐步降低而不是随着国债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美国甚至还可以通过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进一步降低美国国债的利率。同时现在美国的国债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全球化持有的程度越来越高，持有美国国债的世界其他主权机构的金融体系也严重依赖美元的信用，结果就是美国印钞得利，而要以国债负担惩罚印钞却是难以完成，这样的破裂是全球的经济破裂。现在欧洲已经彻底变成了负利率，存款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使得现金的持有者不得不去购买资产，而最容易购买和变现的资产就是国债。这样的政策就是促进欧洲国债发行和压低国债成本，是度过欧债危机的手段。而美国的QE虽然不断缩减，但低利率一直是其奉行不变的政策。美国在QE之外还有超额准备金等金融手段保持低利率，而欧洲的负利率政策产生的对比效果，使得美国更有条件保持低利率。在欧洲实行负利率的几天之后，美联储得

以再度缩减 QE 的规模。在 QE 的规模缩减下，依然能够保持美国国债的低利率。

因此在当今本位货币破产、负利率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历史上以债券财务成本挤兑限制西方政府大规模增加负债得利的模式是难以生效的。西方各国均有增加负债的欲望，这也是负利率的吸金大法，对抗这样的吸金大法同样不能再按照以往的思路，对于这些负债的恶性增加，应对措施就是让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同时提高劳动力和资源的价格，让该国的进口产品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国家通过负债印钞输出的通胀再一次回输到他们国内，以他们国内的通胀和民生来挤兑其印钞。因此中国已经意识到升值与通胀的关系，央行副行长胡晓炼 2011 年 4 月发表文章称，抑制通胀是当前稳健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未来将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是央行首次提出以汇率来应对通胀，这是在西方负利率下中国对于以往政策的重大反思。对此，笔者另一本著作《涨价的世界》当中有详细的分析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负利率给西方社会、经济、财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世界在负利率的模式下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世界了，以历史观念应对当今格局是行不通的。尤其是美元成为世界霸主，且不存在国际金本位的条件下，又建立了政府破产优先保护本国民众福利和民众个人资产不承担国家债务的规则以后，现在负债和破产的责任已经与几十年前的世界极大不同。就如欧债危机一些国家政府紧缩还债却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一样，中国怎样跟随、怎样利用世界的新规则是最重要的课题，最起码不能被世界其他国家利用规则合法掠夺。中国如何拥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和理论已经是当今中国崛起的瓶颈问题。

量化宽松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霸权

美国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购买了 2 万多亿美元的债券，然后又是两轮，每月购买 850 亿美元的债券。很多人把量化宽松看做是美元印钞，但是却随着西方主流舆论一起，忽略了其中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 QE 里面是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的，购买债券“融券”只不过是第一步，关键融了谁的券，这些钞票发送给了谁，这才是核心问题。

对这个问题，虽然迫于美国国会和法庭的压力，美联储已经向公众展示了更多的透明度，但其2007～2010年实行的货币互换计划仍旧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以至于就连美联储都可能对借款人的身份信息不知情。换而言之，也就是美联储并不知晓这些应急贷款的最终去向。真的是不知道吗？更像掩耳盗铃，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中的“怎样宽松”更是一个秘密。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就是购买数千亿美元的国债，这样的规模从二级市场上购买根本是流动性不足的，是要大宗交易的，这里就有故事了，美联储到底是买了谁的债券，到底是买了什么债券？美联储买谁的债券就是印钞给谁，买哪一类的债券则是印钞支持债券的发行者，这是一个定向注水的行为，其中肯定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按照西方的价值理论和我们的社会常识，钱每过手一次都是要赚钱的，谁先拿到钱肯定是谁先得利，在这一点上恰恰是美联储不透明的地方。这些被购买的债券是美联储定向发行钞票的结果，而且这定向是保密的，并且是被刻意忽略的。美联储是私人银行，这些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变成了商业秘密和隐私了，按照西方国家的宪法，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很多时候监管权力是受限的，国家都受限，公众和媒体就更不要说了。而中国的央行是国有的，有什么行为都要监督和公开，在这里竞争存在制度性的差距。

美联储定向货币操作的原则是维护美国利益、定价权和美元霸权。原来美国印钞是为了支持美国国债等债券价格，同时给美国的金融机构足够的资金流动性支持，用流动性的充裕来维护西方金融市场不在危机后进一步崩盘，维护美国的定价权。但是随后的资源暴涨使得美国肯定不会立即再度推出量化宽松来让资源国家取得暴利，美国不量化宽松则世界上其他国家就更难以印钞了，欧、日的量化宽松就要付出通胀的代价。但是如果欧洲出现危机，这个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美元一定会通过某种宽松的方式抢占欧元的地盘的，就如危机后多国央行联合释放美元流动性给欧洲一样，要注意欧盟已经统一了货币，为什么不是释放欧元流动性呢？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美元宽松挤占欧洲市场，为了促使欧元继续衰落，美国还会施放流动性，进一步挤占欧洲市场，但是美国这样的量化宽松的目的与前两次量化宽松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前两次是定向宽松，给自己的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如果下一步还有宽松，则是挤占欧元的

市场，所以笔者说 QE3、QE4 与原先的 QE 是不同的，我们要区分其中的差别。

综上所述，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定向宽松和维护美元的霸权，维持美国的全球定价体系。中国未来需要的也是定向宽松，把宽松的利益留在国内，而不是给外来热钱方便，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海外战略和争夺定价权，而不是被海外舆论所绑架。在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的货币政策要有全球博弈的视野和全面、系统的思维。

为何中国海外投资屡战屡败

中国海外投资屡战屡败已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经验不足上，或认为中国国企制度有问题，更有说法是外国的资本禁入门槛，最多的说法是中国人的急功近利，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就如瞎子摸象，每个说法都摸到了问题的一个局部，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资本价格，是央行对于企业的海外竞争支持不足。

美国的 QE 政策不断压低利率释放流动性，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支持美国的海外资本扩张。中国与海外资本的价格差距是巨大的，在美国连续宽松以后，美国、欧洲和日本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央行利率都已经到了零利率的状态。而中国的资金回报率要求是非常高的，仅我们银行的贷款利率就是 6% 以上，长期的是 7% ~8%，利率还可以上浮，还有评估费、律师费、手续费、担保费等间接费用。如果是理财的话即使是政府的债务也要 10% 以上，而合法的小贷公司的利率是 4 倍，算上附加费用则可以达到 30%，如果是民间高利贷，月息 10% 以上更是很经常的事情，这样的高利率下对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的要求也是超高的。民间投资一般就是 3 年回本，好的项目也不能超过 5 年，当年回本的要求也经常出现，甚至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也会给下属公司提出当年回收投入资金的考核指标。我们的国企尤其是央企虽然是资金最宽松的，内部资金核算年回报率也不会少于 7% ~10%。但欧洲的国家债券利率达到 7% 以上就被市场广泛的认为是难以为继的，中国海外投资的回报率如果要求与国内的资金回报率接轨会怎么样？

中国海外投资屡战屡败，要考虑机制上的问题，关键的制度差别就是中国与海外的资本回报率要求不一样。我们的综合利率不低于 7%，而西方 1% 以

下，过高的回报率要求导致企业必须急功近利和承担巨大的风险，好项目中国是承担不起对价的。就如对于年回报率要求是1%的投资与回报率要求10%的投资，投资2年开采8年的矿，估价要差1倍以上的。投资回报率的不对等造成估值的不对等，这是造成海外投资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海外能够在估值相差近1倍的情况下把项目给你，背后就是这样的项目有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你可能还没有看到，你高出他需要的回报率的部分不是稳定回报率，而是风险回报率，这个风险是要以你的投资失败和项目本金来承担的。

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美联储在次债危机以前的利率曾经高达5.25%，在20世纪80年代最高时超过20%，美联储的利率可不是最终的贷款利率。我们央行的利率是银行存贷终端利率，对于央行给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在2002年是3.24%，2005年涨到3.87%的水平，到2008年是4.68%。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金融危机前中美的银行间利率是持平的，甚至是美国要高于中国的，在这个时候美国还说中国输出通缩，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很紧张，当时的中国是在积极的招商引资而不是海外投资为主。拐点基本上出现在2007年，届时中国的利率变化有限而美联储在次债危机下迅速把利率降到0.25%，并且不断承诺长期维持低利率。而现在中国更实际的金融机构利率水平要看银行间货币拆放市场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现在一年期SHIBOR是4.4%，2011年的高点是5.25%，这个利率是银行融入的利率，大银行融出都经常有上百个基点的升水，实际利率比这个要高1%～2%。而这个拆放利率短期流动性经常不稳定，2013年6月底的爆表，竟然最高达到了30%，这就是中国在有了海外投资需求后境内外资金差别的情况。

美国的QE不是简单的印钞，更是服务于其海外投资的，印钞与其低利率政策是一贯的，如果印钞不能继续则在资金紧缺的需求之下利率自然就会提高，美联储的QE保障了低利率。美联储为了支持海外的资本输出和扩张，QE3更是不同于前面的QE的，QE3是在资产泡沫已经被挤出之后购买资产抵押债券MBS。MBS物有所值，是一种定向注入流动性的行为，通过美联储的央行购买行为极大地压低了MBS的利率成本，从而把美国并购海外资产的资金成本压缩在极低的位置。对于这样的目的欧、日也是一样，包括日本的安培经济学，日本是最先开展QE的国家，也是最先把利率降低到0～0.25%水平的国家，结果

就是造就了日本巨量的海外投资。日本海外投资所产生的 GDP 已经是其国内 GDP 的 1.58 倍（据国内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日本的资本输出使得日本印钞并没有造成国内的通胀，还使得日本的海外投资非常成功，大量购买了上游资源。在铁矿石博弈当中由于日本占有矿山、船队等全产业链的股份而左右逢源。但这些他们心照不宣，不公开言明。

但与此同时，中国进行防通胀的加息，原因就是中国的货币发行当中外汇占款成为主流，达到 80% 以上，其结果就是美国的 QE 必然给中国造成输入性通胀。中国通胀背后还有巨大的社会问题，政府一直把防通胀放到了首位，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不可能三角”，那就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的指标不能全部实现，笔者将其称为“**张捷不可能三角**”。在当今低通胀和调结构下完成保增长压力巨大，经济危机后在中国防通胀和保增长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就出现了问题。海外投资不足、资源战略受限也是中国产业结构性缺陷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加息防通胀与中国的海外投资资本输出二者是有矛盾的，中国的防通胀是通过加大资金成本来实现的，而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资本输出则需要资金的成本越低越好，资金成本低才是最大的竞争优势，没有这个优势，必然在风险和企业社会责任上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对于中国而言是被国际竞争对手不断妖魔化的。

对于“张捷不可能三角”，国内防通胀还是重中之重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在海外的融资平台上能够放开对中国企业的手脚，为了改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回报要求，应当放开设立在境外的中国企业的境外融资。境外投资、境外融资、境外抵押，外管局不要按照外债管理，让这些企业可以在境外融资到低成本的资金，以我国外汇资产购买美债等的低收益率，完全可以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倾斜，投资海外的收益率应当与美债看齐。让企业在收益率上与外国公司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平等竞争。在不能开放境外融资的情况下，也要给中国投资海外的企业同等的财务成本补偿，建立一定的贴息制度。可以与下面的条款相结合：建立由央行收购海外矿产的产权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和进行补偿，企业依旧如国内的方式开采国有的海外矿藏。如果不能直接以央行收购海外矿山的方式，也可以比照美联储的做法，以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矿山为抵押发行利息与国际接轨的资产抵押债券 MBS，我们如美联储一样收购 MBS 债券。

综上所述，QE 在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资本战略方面起到重大作用，海外的资源战略需要金融支持，需要央行给企业支持，我们需要央行与企业的战略更好地结合到一起。

第 2 节　QE 不是简单等同于印钞

刻意掩盖数次 QE 的政策差别

美国的各次 QE 在名称上没有差别，但实际内容和目的上却大不相同，对于前三次 QE 的差别，我们也应当分析一下。

2012 年 9 月 14 日美联储麾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后宣布，0～0.25% 超低利率的维持期限将延长到 2015 年年中，将从 15 日开始推出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QE3），每月采购 400 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现有扭曲操作（OT）等维持不变。内容是在 2012 年 6 月底以前买入 40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在 6～30 年；同时出售等量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为 3 年或以下，随后这项计划在今年 6 月份被延长到年底。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指令纽约联储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台以每月 400 亿美元的额度购买更多机构抵押支持证券（MBS）。FOMC 还指令公开市场操作台在年底前继续实施 6 月份宣布的计划，即延长所持有证券的到期期限，并把到期证券回笼资金，继续用于购买机构 MBS。FOMC 强调，这些操作将在年底前使委员会所持有长期证券持仓量每月增加 850 亿美元，将给长期利率带来向下压力，对抵押贷款市场构成支撑，并有助于总体金融市场环境更为宽松。

对于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保持低利率就是保持美联储所购买的债券的价值，如果是加息，债券是要贬值的，债券与利率的反向关系是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的。美联储购买债券，保持更长时间的低利率是正常合理的，同时维持原有的扭曲操作也是预料之中，因为这不过是原有政策的延续，这个政策延续到 12 月本届总统任期届满是必须的，如果此时取消就有政治取向了。因此真正需要

研读的就是每月购买 400 亿债券的计划，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个宽松与前面的两轮量化宽松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样的区别是被人为仔细掩盖的，而且这个区别与之前欧洲央行购买国债、之后日本央行购买国债和贴现国库券都是不一样的。

2008 年 11 月 25 日，美联储首次公布将购买机构债和 MBS，标志着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开始。2010 年 4 月 28 日，美联储的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正式结束。QE1 将购买政府支持企业（简称 GSE）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09 年 3 月 18 日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2009 年的采购额最高增至 1.25 万亿美元，机构债的采购额最高增至 2000 亿美元。此外，为促进私有信贷市场状况的改善，美联储还决定在未来 6 个月中最高再购买 3000 亿美元的较长期国债证券。美联储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执行期间共购买了 1.73 万亿美元资产。美联储 2010 年 11 月 4 日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计划在 2011 年第二季度以前进一步收购 6000 亿美元的较长期美国国债。QE2 宽松计划于 2011 年 6 月结束，购买的仅仅是美国国债。

美国的购买资产计划 QE3，笔者倾向于把它叫做 Next QE1，因为这次宽松与以前是不同的，以前购买的是国债和政府担保的机构抵押支持债券，而这次购买的是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没有了政府担保字样。国债是国家信用，政府担保的企业债务是间接的国家信用和间接债务，国家信用不变国债放水则是信用贬值，但是机构抵押贷款的信用来自所抵押的资产价值，购买未必造成信用贬值！因此不同的宽松操作背后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和效果需要研读。对比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其中 QE1 资产购买总规模达到 1.7 万亿美元，历时一年半，平均每月购买额度为 1150 亿美元，期间黄金从 750 美元附近涨至 1100 美元，涨幅约为 47%，白银则从 8、9 美元涨至 17 美元，价格翻了 1 倍；QE2 资产购买总规模为 6000 亿美元，每月购买额为 750 亿美元，期间黄金从 1200 美元涨至 1500 美元，涨幅为 25%，而白银则从 18 美元涨至 35 美元，价格再度翻番。而 QE3 总体规模不设限，每月购买 400 亿美元，加上之前的扭转操作，据其说法是每月规模达到 845 亿美元，略高于 QE2，不过扭转操作是早已经公布的，并不在本轮的增加之中，真正的变化只有 400 亿美元。不过这样的说法恰恰说明

了政策制定者的一种倾向性，它们倾向夸大这个政策的力度。

大家关注 QE3，但美联储进行扭曲操作或买一点债券并不一定就是量化宽松，也就是 QE3 或者变相 QE3，原因就是 QE 两轮施行下来已经有 3、4 年了，这 2 万多亿的债券很多就要到期了，到期不再买或者买的不够多的话，不仅不是宽松而是紧缩了，因此更关键的是盯住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和资产的性质。美国推出所谓的 QE3，就是维持美联储现有资产规模而已，每月采购 400 亿美元，远远低于预计的 1000 亿美元，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总计购买了 2.3 万亿，到期债券会逐步增多，相比到期的债券对冲，这个规模是有限的，更关键的是这次宽松没有说总量的上限和时间的限制，因此最终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会怎么样并没有最终定论；还有一点就是这次购买的是机构抵押支持债券，QE2 所购买的仅仅是国债，QE1 所购买的虽然有机构抵押支持债券，但是这些债券是有一个限定的，也就是说 QE1 所购买的抵押支持债券是政府支持企业等带有政府背景的特殊的抵押支持债券。这样的债券也是变相政府国债，所购买的债券产品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产品是应当有不同效果的，长期这样下去美联储的资产构成和资产结构也将改变，美联储资产状态的改变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也是影响巨大的！可以注意到美联储本次购买的 MBS，与之前欧洲央行的国债购买以及之后日本央行宣布增加购买国债和贴现国库券的情况都是不同的。

QE3 性质的不同，还可以从原油市场的反应看出来，原油不是上涨，反而下跌了。2012 年 9 月 20 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三收盘大幅下跌，创下 6 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收盘价。当日，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10 月份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1 美元，报收于每桶 91.98 美元，跌幅为 3.5%。在周二的交易中，纽约油价也大幅下跌，创下将近三个星期以来的最低收盘价。一周之内纽约油价的跌幅已经超过了 5%。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 11 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 3.84 美分，报收于每桶 108.19 美元，跌幅为 3.4%。在欧洲 QE、日本 QE 的印钞背景下，如果美国的 QE3 也是印钞，那么原油价格为何会如此大跌，市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此 QE3 非彼 QE3，两者有本质不同。

美国后来又进行了 QE4，QE4 即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 年 12 月 12 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了这个决定，每月采购 450 亿美元国债，替代扭转操

作，加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每月 400 亿美元的宽松额度，美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达到 850 亿美元，并用量化数据指标来明确超低利率期限。对于 QE4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替代了扭转操作，也就是停止了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的计划。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短期国债如果不是卖出，则会自然到期的。美联储持有大约近 3 万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不长的期间内到期的债券数量也是巨大的，这些到期的债券归还后自然而然的就是要变成货币回笼的。因此如果要维持原有的规模，不进行扭转操作就必然要买入新的国债，因此在扭转操作取消的影响被充分计算以后，QE4 所带来的宽松就是非常有限的和内部已经消化的。

对于这样的效果差异不但没有人进行分析，甚至连这样的差异也被忽略，这对于一贯目光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分析家来说，只能说是一种选择性失明。这样的差异已经对于所谓的 QE3 的性质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操作不仅不是印钞，而且是一场全球信用战的开始，是为未来全球信用危机出现后金融大鳄剪羊毛而做的准备，是一场全球的圈羊运动，借此把未来可以剪羊毛的肥羊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这一次的量化宽松号称 QE3，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质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是不同的，而 QE4 在考虑了取消扭转操作的影响后则更多的是在博眼球。而且按照严格狭义的定义，最早实行 QE 的日本，QE 就是购买国债以及间接国债的主要行为。央行购买国债是需要特别授权和限制的，购买市场化的债券就如我们的逆回购。现在购买市场化的、有抵押的债券也叫做 QE，已经改变了原来对于 QE 的定义。想一下为什么不把央行的逆回购等操作也叫做 QE 呢？购买有抵押的 MBS 是比购买没有抵押、依靠信用的逆回购还要好的，所以美联储的本次操作不应当叫做 QE3，而应当是 Next QE1，而把 QE4 则看作是对扭转操作的一个内部结构调整。美联储前两轮量化宽松以增加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为主要目的，而 QE3 和 QE4 则是改变美联储的资产结构。这样的结构改变就是对流动性的操控，是为在世界信用体系和价格体系中博弈定价权而服务的。

为何美联储 QE3 操作不是印钞

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印钞这个词成了最常见、最热门的词汇，似乎只要有钞票从央行出来，很多人就说是印钞，但是央行行使货币职能，向金

融领域投放货币，未必就是印钞。央行正常的货币发行是不能说成印钞的，就如我们央行发行央票回笼货币或者逆回购提供流动性，就是一种常见的公开市场操作，而商业银行到央行再贴现也是正常的金融行为，而不是印钞，更直接一点，在金本位时代拿黄金等资产到央行换取印刷的钞票是印钞吗？这里大家首先要区分的就是印钞不是指印刷钞票，而且在当今金融电子化的时代印刷的纸币是货币当中极少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首先区分印钞与货币发行在概念上的不同，明白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印钞再说话、再指责比较妥当，不要把正常的货币发行和央行金融操作当作印钞。想一下当年美国是债权国的时候，在石油危机当中一下子把利率提高到20%以上，各种债券利息大增，立即让拉美的“芝加哥男孩”[①] 们尿了裤子。此时美联储购买国债和债券，获利巨大，根本不会有人说是印钞的，而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一致说美联储是印钞呢？美联储购买债券和国债与印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是印钞，什么是货币发行，关键的差别就在于信用的对价，央行向外提供流动性，提供货币，没有取得相应的信用对价就是印钞，相反如果央行取得足够的信用对价，向外提供纸币，就是货币发行。根据货币银行学的理论，就货币发行的机制而言，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主要有四条：或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这是发行基础货币最常用的渠道；或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包括向金融机构再贴现和向货币市场拆入资金；或购买黄金等资产增加资产储备；或购买外汇，增加外汇储备。除金银外，不同的国家可能还有其他不同的货币储备物，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以粮食、棉花、食盐等战略物资作为货币储备物。而今天，很多国家都将外汇（具有较强流通性的主要国家的货币）作为重要的货币储备物。印钞是央行提供货币，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凭证到市场上流通，但是央行却没有对等的从市场上收回相应的信用，造成市场上信用的过剩和贬值，也就是作为信用凭证的货币的泛滥和通胀。央行的资产与流通在外的基础货币的信用必须是对等的，如果不对等则流通在外的货币就要贬值到对等。

---

①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

世界以发行国债的国家的信用作为发行货币的抵押，在现代金融社会是最普遍的做法，也是最多的货币发行方式。购买国债、发行货币是在市场上收回了国债信用，提供了货币信用的一个交换，但是我们为什么把美联储购买国债就叫做印钞呢？这里的关键就是国家信用的贬值，拿贬值的国家信用换取了货币，是一种信用不足情况下的货币发行。在西方现代金融理论下货币是国家信用的托管凭证，国家信用是被看做无限的，但是国家信用真的就是无限的吗？这个理论只不过是搞了一个国家信用无限的近似，国家信用可以很大很大，但终究是有限的。在金融衍生品大发展，货币总量海量增加的背景之下，国家信用无限的理论假设近似靠不住了。国家信用不仅仅是有限的，而且在 2008 年还发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这也是一次国家信用的危机，国家信用在危机当中是受到重创的。在国家信用严重缩水的时候国债却大幅度增加，这些国债的信用肯定有巨大的贬值，国债信用的总额肯定是无法超过国家信用的总额的，而西方社会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债负债大幅度增加。仅仅以美国论，2012 年 9 月 4 日，就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美国财政部发表的报告说，美国国债总额目前已达 16 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这样的负债规模也难怪评级机构要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对于美国这么大的负债，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却是有限的，美国是私有制的国家，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政府的收支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不仅非常严重，而且解决前景非常不明。2009 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 11%，是此前 6 年的 2 倍，逼近希腊、爱尔兰等国水平。2011 财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近 1.3 万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连续第三年超过 1 万亿美元，显示美国债务风险仍在扩大。但又据美国中文网、《今日美国》2012 年 5 月 24 日综合报道，美国政府计算赤字是根据国会的独特规则计算，而非按照标准会计规则计算。报道称，若美国政府严格采用标准会计规则计算，2011 年的赤字为 5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1.6 万亿元），而官方报告数字为 1.3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24 万亿元）。2011 年的实际赤字相当于官方报告数字的 4 倍。到 2013 年美国赤字虽然有所缩小，但美国要消除赤字依然看不到任何曙光，只要赤字存在，美国的负债必然是不断增加的。仅就美国现在 16 万亿的国债，这意味着每位居住在美国的成人和小孩平均负债 5 万美元，这还不算社保等政府隐含负债和地方政

府负债；再加上连续的赤字，美国国债的信用存在巨大的问题，国债的价值维持高位有 QE 宽松购买的因素，也有美元回流的因素，还有与西方其他国家比较的因素，但是无论何种因素美国国债信用不足是事实，购买国债是印钞也是共识。

西方国家是债权国的时候国债是好东西，央行购买国债不是印钞；西方国家是债务国，但是国家收支平衡有足够偿债能力的时候，央行购买国债也不是印钞，只有在国家负债超标，同时赤字巨大且国债利息低的时候，国债的信用、国家的信用实际上已经深陷危机，国债的归还和信用都存在巨大的风险，甚至已经明知难以为继，搞庞氏骗局，购买国债才是印钞。

与此同时，在第一轮量化宽松当中购买的大量 MBS 也是信用不足的问题严重。问题的关键是抵押品的瑕疵，抵押权要让位于破产人的居住权，这样的抵押是次级抵押。对于次级抵押贷款，之所以成为次级抵押贷款是由于贷款的信用不足，除了贷款人的信用记录以外，抵押的折扣不足使得房屋变现时折价难以让抵押物价值足值偿还贷款是重要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贷款人没有其他居所，贷款人破产以后银行止赎收回房产也不能将其赶到大街上流浪，只能让他们继续居住在房屋内直到其有能力获得其他住所为止。这样所有权中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就无法实现，对这些房屋就难以取得完全的所有权。对于这个问题在房贷律师意见当中是必须写明的，但是这些债券背后的抵押品如果不能及时拍卖，房屋的折旧是非常厉害的。美国土地很便宜，房价的主要部分是房屋建筑价值，在人工很贵的情况下砖瓦房的价格是木制房屋的几倍。大量的房屋是木制的，时间很不耐久，不能及时占有的损失是很大的。对于次级抵押贷款以及次级抵押贷款形成的次级债和 MBS，担保机构的担保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担保机构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了。这些贷款能够发放的背后是政府支持的保障房给信用不足的人的安居工程，所以房地美、房利美等公司都是有政府支持背景的房贷公司，QE1 政策买这些政府支持公司的债券就是购买次贷危机问题债券。政府支持的两房公司也受到冲击，政府自己的债务危机信用也非常不足，难以承担债券担保责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债券 MBS 也是信用不足的。因此前两轮量化宽松无论是购买国债还是政府支持的 MBS，都是购买信用不足的问题资产发行货币，所以我们指责美国和美联

储印钞。

但是对 MBS 的信用问题，等到 QE3 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同了，美国整个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约为 7 万亿 ~ 8 万亿美元，次级贷款存量约为 1.5 万亿美元，这部分贷款的规模只占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 20%。在美联储第一次量化宽松购买上万亿以后，次级抵押贷款的流通市值大部分是被美联储控制的，也就是说如果再想买，市场上流通中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也是不足的，而本次美联储 QE 政策购买的债券没有了政府支持等要求，购买的 MBS 债券是完全商业化的，这样的商业化已经挤出了债券资产的泡沫，所购买的债券信用是足值的，如果债券信用是足值的，这样的购买就不是印钞而是正常的货币发行了。美国的房地产在 2008 年前处在高位，现在已经腰斩了，同样的债券在不同的资产价格下作抵押，其中的风险和泡沫也是不等价的。抵押物的估值不同，抵押担保的信用显著不同，就如一个房子估价 200 万美元进行的抵押担保与同样房子估价 100 万美元所进行的抵押所产生的担保信用完全不同。美联储在购买 MBS 进行所谓 QE3 时，不敢在发布会上强调这次 QE 与 MBS 的关系，原因就是次级抵押贷款总规模就是一万多亿，美国第一次宽松已经购买上万亿有问题的债券了，市场上实际已经把有问题的买光了，而且经过几年来的市场博弈，风险水分是被挤出的。同样买债券 MBS，在不同的时点和状态下购买是不同的，就如西方已经使用国债发行货币百年以上，央行在市场上购买国债发行货币已经搞了上百年，以前央行购买国债也没有被称作是印钞，就如我们在 2007 年还发行 1.55 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通过商业银行通道由央行购买。只不过中国这 1.55 万亿元人民币国债换取了央行 2000 亿美元的外储成立的中投，国家的国债与外储是信用等价的，因此不是印钞。

再进一步讲，购买有信用的债券行为基本上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到央行再贴现等价！当商业银行持有的票据在到期前，需要资金周转时，可以向中央银行申请贴现，取得贷款，这种贴现称为再贴现。这样的再贴现制度是在历史上原有银行机构被恶意挤兑和金融攻击下建立央行信用建立起来的一套金融制度，使得有足够资产、运营良好的银行不会受到恶意的挤兑。中国也是大力发展和完善央行再贴现业务的，2008 年中国适当扩大了人民银行再贴现的对象和机构范围，城乡信用社、存款类外资金融机构法人、存款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可申请再贴现。对于再贴现是金融机构直接把票据交给央行取得货币，再贴现未必有抵押，现在是有抵押担保的金融机构资产变成票据经过市场交易挤出水分，按照市场价格交给央行，其资产保障和泡沫会极大减少和消除，这样的做法对于国债抵押发行货币也是类似的。平时为了限制政府和央行共谋的印钞，各国都立法要求不能直接从政府处购买债券，就是要通过市场博弈挤出国债当中信用不足的泡沫，但是央行的授权和危机后政府的救市，把这样的规则打破或者形式化了，只有这样的情况下国债抵押发行货币才是印钞。

这里有人说 QE 购买的几乎是零利率的债券，所以是印钞，这样的认识也是不对的。通常情况下，对于信用不好的债券会在利率上有所补偿，以高利率来覆盖债券信用不足所产生的风险，这利率实际上是债券信用与货币信用之间差别的补偿。不过这样的问题并不绝对，就如央行购买黄金，黄金不但没有利息而且还有保管仓储成本，但是我们不会说买黄金是印钞，甚至不说是货币发行，而是央行增加黄金储备，原因就是黄金的信用比央行的货币信用要高！现在央行购入有抵押资产为保障的债券发行美元，与原来的国债等发行的美元相比，这些资产的信用比原来的美元信用更好，因此所发行的美元信用是提高的，而不是降低的，这怎么能够叫作印钞呢?

所以判断央行投放货币的行为是否印钞的关键是发行货币是否取得了足够的信用对价，这信用是否足值，关键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作为发行货币负债所对应的资产是否足值和是否有泡沫。在抵押支持证券模式下，证券经过市场挤出水分，抵押的资产在当前处于房地产价格的相对低位，这样的资产与购买各国规模和赤字屡创新高的国债相比，就是一个金融机构合理取得货币的央行货币发行行为，类似于我们央行的逆回购等金融操作，还比逆回购多出来了资产担保。这次美联储没说明要多少规模，被舆论说成是无上限，但是实际上货币按需发行，市场是给出上限的。对于机构抵押支持债券 MBS 市场规模就是上限，能够创造的债券可能是无限多，但是能够作为担保的抵押物是有限的，抵押物是不能超过社会流通资产的，总体的基础货币发行量是不能超过抵押物价值乘以抵押率的，这与现在国债发行量直线增加没有制约是本质的不同，所以美联储所谓的 QE3 这样的行为不是印钞而是正常的货币发行。

因此我们对美联储的历次 QE，是不能简单地以印钞而概论的，是否是印钞，要针对其购买的不同金融资产进行具体分析，而没有疑义的是央行购买资产一定意味着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是央行的货币宽松，因此宽松是肯定的，印钞是相对的。

延伸阅读 MBS

MBS 是一种抵押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简称 MBS），借款人每月的还款现金流，是该证券的收益来源。抵押集合体所产生的本金与利息原封不动地转移支付给 MBS 的投资者，因此，MBS 也被称为过手证券（pass-through securities）。美国的过手抵押证券主要有以下四种：

①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担保的过手证券；

②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HLMC）的参政书；

③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的抵押支持债券；

④民间性质的抵押过手债券。

第 3 节　土地价值将重组世界

美联储悄然改变美元内涵

QE3 所谓宽松的背后，是刻意掩盖购买资产的性质，其过程实质是改变了美联储的资产构成。央行不同的资产构成对于货币的性质和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做法就是要逐步改变美元的货币内涵。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更深入的理解货币开始。货币的内涵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货币内涵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货币学派和古典、现代货币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货币的本质就是信用，但是信用来源于什么却不同，在当今货币均是央行纸币的时代，货币是什么信用性质就在于央行的信用是什么性质。央行的信用来自于资产，也来自于国家强制力给央行的特许权，不同的货币类型与央行的资产构成是有绝对联系的，在国家信用衰落的时候央行资产的信用

支撑就变得尤为重要。对于以国债为抵押的货币发行，背后就是国债的国家信誉，货币的实质就是一种国家信用的托管凭证。以资产抵押债券发行的货币则本质不同，背后是抵押权的价值，是抵押资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对应到被抵押的商品的，是一种广泛被接受的抵押商品的商品信用，这样的被广泛接受、可以作为抵押的商品，就带有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了，因此货币的发行是国债抵押，还是商品抵押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货币属性，决定了在市场当中流通的货币是古典货币还是现代货币。

在本位货币时代，即使是国债为主的货币发行，我们发现当时发行国债是需要有国家相应的权利抵押的，就如近代中国的战败赔款要以关税或盐税抵押一样，不像现在这样国家可以没有权利抵押的发行国债，因此这样的国债性质本身也是一种抵押债券而不是现在的单纯信用债券。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国债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本位货币时代的国债抵押发行货币背后还是资产抵押，与现在的国债发行货币是不同的。在政府支出优先保障社会福利、民生等美丽的幌子下，国债的偿付是在这些支出之后的，国债实际上是次级债，偿付的顺序低于其他债权和应付款项，而这个次级债还没有担保，信誉如何可想而知，其发行的货币信誉不断贬值就容易理解了。

“联邦储备银行券（就是美元）是美联储向持有人开具的借据。但是，和大多数债务不同，这些借据承诺用联邦储备银行券偿还持有人。”① 因此美元的信用性质完全是由美联储资产性质决定的。现在美联储的 QE3 从现代货币的国债抵押发行变成了资产抵押债券发行，货币背后的权利从国家信用已经变成了资产信用，资产信用也就是资产本身的价值信用，这样的信用的关键就是不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美联储的信用在脱离美国的信用。我们看到美联储每月 400 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MBS，没有说明购买多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就是 4800 亿，以美联储当前购买国债的规模和国债到期的速度，要不了三年美联储的资产抵押支持的 MBS 就将超过美国国债及政府相关债券。如果把政府支持的次级贷款资产抵押债券 MBS 不全算作变相国债，把这些债券可收回部分算作资产抵押 MBS，那么美联储 MBS 的规模应当在 2 年内成为美元货币

①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文第六版第 368 页，英文第七版第 358 页。

发行的主要来源。这样的过程是很快地悄悄地进行的，美联储的资产构成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这样的改变就是悄然地改变了美元的货币性质，美元的货币内涵已经慢慢变得不同。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美联储 QE1 是大量购买的有毒资产，MBS 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虽然当时很多 MBS 因为次级抵押的问题而信用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次级抵押债券是次债危机前美联储利率在高位的时候发放的，次债危机前美联储利率最高是 5.25%，而现在美联储的利率只有 0.25%，平均 3% 左右的利率差经过这 6 ~ 7 年的时间，已经产生了债券面额 20% 的收益差别，这样的差别足以补偿原来的亏损，因而美国的两房公司的股票也出现了飙涨。美联储第一次 QE 大量买入了 MBS，MBS 也逐步变成有信用的资产，美元的信用来源在改变。这些改变导致美联储改变了美元的内涵，让美元与资产挂钩，世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石油危机和牙买加会议以来的弱势美元可能就要结束了，未来强势美元的开始将再度重新瓜分世界财富，对此我们对于美元内涵的变化应当密切关注。

美联储改变美元内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元也受到了竞争，这样的竞争不要仅仅看作其他国家货币的竞争，美国内部的竞争也很可怕。现在美国政府发行国债，国债能够流通并且成为一种间接的支付手段，国债确实是具备了一些货币职能。我们要更广义的理解货币，如果货币就是一种能够支付、计价、储藏、交换的媒介的话，很多东西是有货币性质的准货币，这些货币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广泛存在，是与法定货币有竞争关系的，在法定货币信用不足或者不方便的时候，很多活动是以它们来计价和交易的。因此在广义的条件下金融衍生品、电子货币甚至各种 Q 币等游戏币也可以成为一定的货币媒介的。这些支付等价物在美国流通会给美元以及美联储带来压力，美元是美联储债券，而美国国债是政府债券，美元大量来自购买国债的发行使得美元与美债的性质趋同。现在美债涨的收益率之低超过美联储的利率，说明美联储所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的银行商业信用已经低于国债，就如前面章节所论述的人们因为避险而持有国债。美联储自身受到美债巨大的竞争压力，美联储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也是有信用竞争的，美债收益率低于美元的美联储利息，这也说明美国的国家信用已经明显超过了美联储，这对于美联储的股东们压力也是巨大的。美国内部也是多种势力博弈的舞台，金融资本的利益取向，不是

宗教和老百姓的利益取向，也不是美国政客的取向。美联储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维护美元的信誉，不能让美元信用完全绑定和依赖美债，因为购买美债，发行美元，且美元只能存储于商业银行，美元的信用就要在美债的信用基础上再按商业银行信用打一个折扣，使得美元的信用必然不如美债，这也影响了美联储所代表的金融资本的核心利益，美国的金融资本也不希望美元的信用长期低于美债，他们改变美元内涵就是必然的事情了。美国国债违约对于美联储的影响在 MBS 和美债发行美元方面各有不同：美债违约，在美债发行美元条件下，资金流向美债；在 MBS 条件下，资金流向美元。在美债与美元之间的影响，收益、信用和流动性是三个方面，我们前面在流动性层面分析过现在美元长期低于美债的原因，这里又在信用层面进行了分析，美元和美债在美国是属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其中也有博弈，这一点应当认清楚。

美元的属性是受美联储资产结构决定的，就如我们央行的资产结构从外汇变成其他资产，对于人民币属性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想一想这样的改变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会怎样？如美国国债违约对于美联储的影响在 MBS 和美债发行美元方面各有什么不同？就可以从各次 QE 购买金融资产的差别认识到美元和美联储政策内涵的差别，就更能够看明白美联储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粮食与土地价值的历史性拐点

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以来，农产品和土地的价值就处于不断地下降通道之中，这样的过程实际上已经有几百年了。工业劳动被定义为更高级的劳动，农业劳动是不值钱的，原因就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是工业化的国家，世界的农业国是要被掠夺的对象，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进入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印度也在积极的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在工业化，而世界强国反而是在金融化，同时这些国家还有比以往金融空心化的失败国家更大的军事优势，还有广袤的土地控制世界的粮食。以前是资本要夺取世界的控制权，打击大土地占有者贵族的权利，而现在经过几百年以后土地的所有权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因此世界的走向可能就要转变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整个世界是不是到达了土地价值的历史性的拐点，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几百年来的重大拐点，而不是简单的短线涨跌。**

在土地成为本位以后，土地价值高低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粮食因素，土地出产的粮食的多少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人均耕地状态决定了必须精耕细作，而且中国使用了超量的化肥，中国以 7% 的耕地养活世界 22% 的人口的背后还有一句就是我们使用了 35% 的化肥，这个比重是世界平均化肥使用量的 7 倍以上，大量的化肥使用导致土地副作用巨大，未来是否还能够如此高产是有问号的。中国要保持 18 亿亩的红线，为了这个耕地红线中国的城市集中度必然提高，房地产所分担的基建成本大幅度提高，所有这些都决定地价要远远的高于西方。如果粮食价格的拐点出现，土地的价值就要进一步的重估了，这个重估在美联储以抵押资产控制世界大量土地以后，会给金融国带来暴富。

美国得天独厚，耕地众多，天然控制着世界的粮食，美国出产玉米约 5000 万吨，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总量的一半左右，贸易量是世界的 34% 上下。小麦、大豆等也是世界价格的制定者，四大粮商“ABCD”中的三个和种子公司孟山都都是美国公司。①

美国对于粮价态度的变化还体现在美国的立法变化之上。2012 年入夏以来，美国主要农产品价格普遍暴涨 50% 以上，虽然其直接原因是媒体广泛关注的百年一遇的大旱，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新一轮农业法案的战略意图——6 月 21 日美国参议院以 64 票对 35 票通过了 5 年期的《农业改革、食品与就业法案》，削减已实施 10 年的直接支付农业补贴。根据法案，美国将在未来 10 年内削减 236 亿美元的农业开支，同时提高对农民保险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公司的补贴。美国开始削减粮食补贴，这意味着其粮食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世界粮食价格可能将加速持续暴涨。过去 10 多年，美国农业直接补贴约每年 50 亿美元，上述法案将削弱这一补贴额度的 50%，而对保险项目的补贴由于不可能弥补相应的

① 目前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是四家跨国公司；四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即美国 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业内称之为四大粮商。人们习惯根据他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把这四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孟山都这家农业公司是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的 2008 年十大最具影响力企业，更占据了全球 90% 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中国每年有 80% 的大豆依赖进口，但所有进口的大豆中，90% 以上都是采用孟山都的技术种植出的转基因大豆。但此公司历史劣迹斑斑，环境灾难很多与之有关。路易达孚在美国也有大量业务。美国的企业控制了全球粮食的定价权。

削减水平，因此，这将直接削减美国农场主收入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推高全球农产品价格。当然，更重要的是新法案事实上大幅度削减了对农业的补贴。1970年代以来，美国以美元赤字大规模补贴本国农业为核心手段，以农业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目的的“东京回合”谈判（1973～1979年）和“乌拉圭回合”谈判（1986～1993年）为契机，基本上建立起来对全球大宗农商品的全产业链垄断，建立起来了进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主要后工业化国家和关键地缘政治国家对美国农业权力的制度性依赖，谓之粮食霸权。

这样的拐点是一个控制世界思路的重大历史转折，以前是以压低粮价来压低中国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以压低粮食价格的工农业剪刀差来盘剥农民，把农民赶出土地，成为工业的劳动力。但是在美国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外迁以后，农业才是就业的重要方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当今世界分化成金融国、制造国和资源国，资源国在信用危机、货币竞争贬值的过程当中崛起，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出现了10年以上的牛市。对于依赖资源消耗的金融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印钞的得利将被暴涨的资源价格所抵消，这些国家也需要打压资源国，需要有与资源国交换资源的硬通货才行。在全球资源有限，中国崛起遇到资源瓶颈，中印等大国工业化带来的全球资源紧张面前，谁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维持自己的发达或者可持续发展，谁就将在未来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粮食价格的暴涨是可以预见的。美联储从QE3开始以MBS为主要购买对象做美元货币发行的信用，背后的支持就是土地为主的资源信用，这样的变化也必然造就这些资源的溢价。同时我们要认清粮食对于人类而言是最重要的资源，在美国金融控制世界的时候，如果美国金融霸权还不够保险的话，把粮食变成资源紧缺品，让粮食价格涨价带来美国长期关键性收入，则也是美国国家战略安全的方向。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一直是以压低资源价格为主要致富手段并维持他们的高昂资源消费，但是在中国崛起也占有资源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崛起就因为在南非融入国际社会和苏联解体释放资源的资源熊市过程当中享受了资源红利。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西方炒高了资源价格和大量印钞，但是这样的行为也给他们自身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造就资源国的暴富。资源国的资源先占者食利让西方限于危机，资源供给曲线的后弯使得印钞难以为继和挤爆市场经济供需信用体系，

使得西方不得不提高自己的优势资源对抗资源涨价。相对于制造国而言，西方的优势就是土地，土地背后就是粮食。就连欧洲人也在他们历史殖民地非洲拥有大量的土地，而制造国不仅仅是中国，日本、韩国一样土地紧张，未来的追赶者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一样土地不富裕。土地和粮食价格的重估，也是发达国家在世界财富博弈当中重新洗牌的关键。

粮食武器是挤压资源国非常重要的武器。资源国的普遍特点就是他们的贫富分化，占有资源的人非常富有，开采资源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岗位有限，在资源暴利下其他产业投资均陷于萎缩，导致大量失业或者半失业人群，这些大众收入偏低，对于粮食价格是非常敏感的，粮价的大幅度涨价就必然是一场社会危机。近年来依靠石油过日子的中东各国，如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也门等，因加入全球分工而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口，于是在恶性通胀和高失业率下发生了一系列政权变动。所有这些危机的结果都是他们对于美国更加依赖，对于美国的粮食更加依赖，这是美国控制资源国最主要的武器，粮食与资源是完全对等的硬通货，甚至粮食的刚需更大一些。而在远东地区，先后进入工业化的日本、韩国对美国的粮食依赖也达到无法摆脱的地步，日本和韩国已经基本没有了 60 岁以下的农民了，未来的粮食生产必然要被国际定价粮商所左右。

对中国，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设计者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写到，“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显然，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都意识到粮食问题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对于中国而言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在资源和粮食上没有足够的硬通货进行交换，如果是血汗劳动来交换的话，那么你将为了吃饱肚子不得不受到残酷的压榨剥削，因此保持中国粮食基本自给极其重要，想要放弃耕地红线依赖国际粮食进口的想法，在未来的粮食涨价当中会让中国再一次成为半殖民地！因此西方的重点就是打击中国的粮食自给，打击中国的粮食生产。目前中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种粮食尤其是精耕细作的技术活没有多少年轻人会了，中国农村 40 岁以下的农民已经不多见了，50 岁以下的农民都很少了，我们的农业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对此我们需要高度的重视，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像日韩那样维护

粮价，保护农民的利益。[①]

在粮食涨价以后，土地的价格必然是暴涨的，这对于西方这些人均占有土地多的国家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看到世界的金融国不但有金融制高点，还有足够的土地，而制造业国家普遍土地不足，中东的石油国家土地是沙漠居多，俄罗斯的土地又过于寒冷，非洲的大片土地属于原殖民者私人的，非洲独立并没有改变土地的产权性质，因此土地实际上是被控制在发达国家手里的。在土地价格被重新定义以后，我们应当发现的就是世界的资源被重新分配了，你的财富价值多少，是在一个价格体系里面衡量的，货币在这里充当的是价值尺度的功能，以这个体系的单价和总量来计算财富的价值。土地和粮食的价格暴涨，西方大量的土地产权被重估，在新价值体系之下西方实际控制的财富价值再度膨胀，这膨胀就是重新划分世界财富，是比印钞更厉害的手段，印钞只不过是给体系加水，多出来的是印钞的增量，而价值体系的重估则是改变世界的尺子，让存量的财富集体膨胀，这存量是比增量大得多的。这样的价值改变之后再通过贸易所谓的等价交换，取得全球财富的再分配，这个再分配的力量才是更隐蔽的掠夺，与之对比印钞是小巫见大巫的，这样的再分配也是一次对于全球的剪羊毛。这就是通过粮价夺取全球定价权的力量，定价权将再分配世界财富。

美元走向土地本位制?

美联储以购买资产抵押债券发行货币，这些资产抵押物成为货币信用的来源，这本身就是本位货币的特征，对此世界是否会回到本位货币呢？尤其是当今主要的抵押物是土地，那么美元会不会走向土地本位制呢？对此我们应当从全球货币发展的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当今世界是一个货币竞争性贬值的世界，大宗商品等价格相应暴涨，标志性的石油价格已经从10美元涨到100美元左右。世界上的货币指数看似是有涨有跌，但是这样的指数是对应于一揽子货币而不是对应于一揽子商品的，也就是说美元的指数是由欧元、日元等货币的汇率来确定的，而不是由石油、黄金、

---

① 文章中关于粮食的论述部分引用《美粮食战略拐点：通过粮食重塑霸权》中贾林州、兰永海先生的观点。

粮食等商品来确定的。如果我们以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来定义美元等货币的指数的话，这些货币的贬值将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在各国不断地宽松和压低利率下，这样的贬值过程一直在持续，而且各国对于汇率的态度，都是主动选择自己的汇率贬值，同时指责他国操纵汇率不让货币合理升值，就如美国不断对于人民币升值施压一样。

货币能够流通的关键就在于信用，竞争性贬值就是信用的持续降低，但是维持一个市场交易体系是需要最起码的信用的，如果货币的信用降低到低于这个临界点，世界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其他信用替代物。就如在战争当中各种必需品经常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准货币的流通物。中国在战乱时期已经退出舞台的白银就曾重新进入流通，现在世界上各国也是不断地寻求货币互换，实物的易货贸易等手段，就如中俄近期达成了石油交易等，这样的趋势发展以后必然要威胁国际货币体系的。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霸主和受益人美国而言，这是触动其根本利益的，这样的过程也是整个世界的控制人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在国内也要受到各种可以充当交易媒介、计价、储藏手段的商品变成的准货币的竞争，使得一些商品具备实际货币的功能，威胁法定货币的生存和国家政权统治力，这也是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世界的竞争性货币贬值是难以持续的，就算这样的竞争性贬值能够在西方各国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下持续到破裂，市场也必然选择建立新的体系。这样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回，从金银本位的博弈、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的改朝换代、古罗马的解体当中，这样的过程不断地重演。如果美国放任其货币贬值无限发展下去，其金融霸权就要无疾而终了，美国的强国溢价就没有了。当年英国英镑从世界货币霸主地位跌落，也与英镑竞争性贬值有关，美国是不会重蹈覆辙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货币竞争性贬值之后必然是全球泛滥的信用危机，因为没有货币的信用支持，财富储藏手段受到限制，人类的财富流转体系就要出问题，人类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也要出现危机。这样的信用危机也威胁了一个国家政权的生存，把内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变成对外矛盾和国家、民族矛盾是转嫁危机的一贯做法。信用危机将引发战争，导致信用体系的重建，这样的危机和重建将让世界回到某种本位货币上来。

货币从金本位到现在的国家信用货币的过程是逐步崩溃的，从金砖本位制

到私人持有黄金非法，再到国际金本位最后破裂，而回归本位货币的道路也是要分步走的，路线图就是首先要从国家信用转化为资产信用，然后资产信用产生一般等价物，形成货币本位。这最先的就是资产抵押在货币发行当中的作用，从抵押支持债券再到抵押资产，再到某种特别的资产，这特别的资产就是定价的本位。因此美联储购买有抵押的债券 MBS 替代国债，是可以看做向资产本位货币制走出的第一步。

如果美国回到资产本位制，那么会继续回到金本位吗？对于金本位的复辟，笔者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但也不是大概率事件，尤其是黄金分布极其不均衡。南非的一个金矿居然储量有 5.4 万吨，目前已经产出了 3.7 万吨，而且其尾矿的金含量依然有 1～3 克每吨，资源潜力巨大，而人类 5000 年历史总计采金才 16 万吨，官方储备只有 4 万吨左右。在历史上，货币发展当中本位资产的选择博弈是非常激烈的，粮食、布匹、丝绸等都作过本位货币，贵金属作为货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即使是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金本位与银本位或者金银铜等的复本位制也是不断竞争的，最后金本位成为通行全球的本位制度。这与美洲大陆发现后控制世界贸易的犹太人的黄金优势有关，在金本位与银本位博弈的时代，西方与东方的金银比价长期出现溢价差价，成为贸易套利者长期获利的手段。目前复辟金本位制之所以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依然占有世界最多的黄金，美联储依然是全球的黄金清算主体，金本位制的复辟不改变美国的金融货币霸权，同时美国还可能从中得到利益，但是金本位的复辟对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影响也是巨大的，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货币需求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黄金目前的总价值，如果黄金作为本位的话，那么黄金的总价值就必须与之匹配，黄金的价格将有上百倍的增加，这样的黄金价格波动当中黄金还作为货币，会对于经济的稳定发展非常有害，损失可能超过当年的金本位破裂。

有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石油本位制，现在就是石油美元，但是这基本不可能，这样的石油本位就太便宜产油国了，而美、日、欧都是石油消费国，石油是不可能当本位的。石油本位催生穆斯林富豪是基督教社会不能接受的，石油本位让冷战战败国俄罗斯再度崛起美国更不能接受。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美国把美元与石油绑定，是在石油危机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且这样的选择会使美国付出巨大代价。为石油多支出的美元都是美国向资源国流出的财富，美国今

日的危机也有石油财富的因素，只不过美元还是世界金融霸主，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国的金融与资源国的石油共同享有分配世界财富的权利，但是在美国称霸世界的时期他们愿意与他人分享吗？

土地作为本位制是可以考虑的，我们历史上的粮食作为本位就是以产粮量衡量土地价值时代的一个变相的土地本位制，但是古代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土地本位制的原因就是土地在资产阶级对立面贵族手中。犹太人不能合法拥有土地，同时土地是不动产，在古代难以实现价值移动，价值流是货币所必需的职能。历史上使用黄金本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金可以方便地流动，货币就是要流通的，运输黄金是非常容易的，其他资产是难以运输的，但是随着现在的信息系统的建立，货币更成为银行系统内的信息，本位货币的资产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仅仅是中国人对于土地和房产有特别的感情，美国人也是一样的，美国人把房地产称为“Real Estate”，即“真实的财产”，房地产等不动产在世界各地都是核心财富。在当今的 MBS 模式下，大量的土地集中到资产证券化机构的手中，形成资产池子，土地的价值由此形成了统计平均上的指数和指数跟随 ETF。这样的土地本位在技术上也成熟了，更关键的是全球土地资产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货币需求是匹配的，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有限，同时以现实的路径而言，现在的 MBS 基本上是土地抵押的，占到总量的 90% 以上，甚至在中国很多场合直接把 MBS 翻译为土地支持债券。在未来的危机和货币发行当中，如果这样的 MBS 成为货币发行的主流，那么货币信用就事实上绑定在所抵押的土地信用之上了，也事实上成为土地本位制，因此按照美联储这样的进程发展下去，土地不动产在货币信用的构成当中会越来越重要。

土地本位制之所以可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土地带来天然的地租性收入，这个收入是可以对冲货币利息的。在金本位制下持有黄金没有利息，还要支付保管费用，防止盗抢，但是货币存储于金融体系内却时时刻刻在产生利息，这些利息要形成新的货币，增加的货币在体系内造成贬值，因为发行货币的信用对价物黄金没有增加。因此货币利息不断地增加就是挤爆金本位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增长导致的货币需求增长可以被黄金开采量增长所对冲，但是广义货币 M2 是海量的，它的利息性货币支付却无法解决，这才是金本位真正的硬伤。石油本位就更成问题，因为石油要不断地消耗使用，未来石油的减少会造成天

然的巨大通缩压力，这样的本位是迟早要崩溃的。有地租的土地本位则难以简单的崩溃，因为它没有金本位等本位资产的缺陷，自身带来收入可以对冲货币利息性收入带来的强行货币增长。

现在美国的所谓 QE3 购买 MBS 造成世界资产价格的大涨，这样的上涨背后不是简单的印钞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印钞与货币发行的内在异同和本次 QE 与前两次的区别。这样的资产价格上涨的背后就是大家对于未来资产本位的一种预期。在资产本位货币制下，资产是要产生溢价的，也会让市场选择持有更多的资产，对此世界的货币和信用博弈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层面，就是是否回归资产本位制与什么资产成为本位资产，这样的道路选择带有重大利益再分配，也将决定国际社会的新秩序。

第 4 节　美元霸权的新动向

美国的 TPP 新合纵连横

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称霸世界的价格体系受到了威胁，原有的 WTO 组织和 APEC 组织的作用对于维持美元定价权已经出现明显的边际效应。美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遏制中国，同时攫取成员国更大的利益，因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外，对新崛起的太平洋周边，又开始构建美国新的合纵连横，这就是 TPP 组织。

从历史沿革上，TPP 可以说是脱胎于 APEC，它最早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从 2002 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本来这个由四个地区小国发起组织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各种自贸条约满天飞的全球化时代，几乎注定是只能出现在各种财经媒体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但是在 2008 年以后，事情起了变化，美国发现了其中可以利用的价值。当年 2 月，美国正式宣布加入 TPP，地球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加入使得原来小国创立的

小组织 TPP 立即影响力大增，并且成为美国主导的地区性组织，并于同年 3 月、6 月和 9 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举行了 3 轮谈判，这标志着 TPP 协议正式进入准备实施阶段。

2009 年 9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 TPP 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 年 11 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美国借助 TPP 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 TPP 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开始进入发展壮大阶段。2010 年，马来西亚和越南也成为 TPP 谈判成员，使 TPP 成员数量扩大到 9 个。

如果 TPP 的扩张脚步仅止于此的话，人们还可以认为这不过是美国人的独角戏，对世界经济的大格局还不至于造成太猛烈的冲击。然而 2011 年 11 月在檀香山召开的 APEC 领导人峰会上，TPP 变成了美国人重炮轰击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重磅炸弹。会议上美国力邀日本和韩国加入 TPP，中国则“出人意料”的未获邀请。

11 月 13 日上午，在日本横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日本将与有关国家开始协商谈判“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据日本《朝日新闻》11 月 14 日报道，韩国总统李明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韩国也在考虑之中。李明博表示：“（加入 TPP）虽然会有相对的效益，但目前还不很清楚是否会有实际效益。”

继日本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宣布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使参与这项协定谈判工作的经济体增至 12 个。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加拿大是在奥巴马的鼓励下参与的，“我们看了协定的条文，加拿大可以轻易地符合有关的要求，所以，我们有兴趣参与。”墨西哥经济部长费拉里同样表示“有兴趣”，并认为协定为墨西哥提供了推动经济成长的机会。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对此评论道，日本、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加入说明了协定扩展的动力，也显示协定在太平洋两岸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的回应。随着日、加、墨等国驶入通往 TPP 的快车道，TPP 也进入了快速扩容和发展的阶段，实力迅速增加。

反观欧洲，欧盟开始达成一致，要建立严格的财政纪律。就欧洲的紧缩长

线而言，势必将压缩欧洲经济发展的潜力，因此在其执行过程中必然矛盾重重。欧洲协议的达成，也对美国的减债带来巨大压力。美国为转移矛盾，必然会予以回应，欧美之间的博弈还将进行下去。为了跳出欧洲这个博弈的圈子，美国重视欧洲以外的市场就显得更为重要，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个方向的选择权来增加与欧洲谈判的筹码。

美国在 APEC 会议上高调推进 TPP 即是这样一个举措，如果亚洲的日、韩入伙，再加上北美的加拿大、南美的墨西哥等资源国家，TPP 的影响力势必要高过欧洲。欧洲在欧债危机下逐步衰落已经难以避免，而 TPP 就很有可能成为欧盟衰落后，取代北约联盟的一个新的世界利益集团。同时 TPP 也给欧洲施加压力，让欧盟与美国形成新的贸易集团。

延伸阅读　美军重返亚洲战略

2012 年 11 月 16 日，奥巴马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宣布，美国从 2012 年年中开始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部署 200 ~ 250 名海军陆战队员，并计划在 5 年内将驻澳美军总人数增加近 13 倍，最终建立一个规模为 2500 人的海军陆战队员军事指挥中心。风景如画的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美澳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协议内容还包括：美国海军将增加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岸的行动频率，预计有更多的美军战舰将使用位于珀斯市南部的斯德林海军基地。美国空军计划增加进出澳大利亚的美军军机架次，包括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FA－18 战斗机、C－17 运输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它们将驻扎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廷达基地。部分相关协议还需最终确认。

军事基地的增减是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分类，美国军事基地一般分为三类：小型军事设施、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履行单一职责，仅有少量军事人员维持军事设施运转的基地为小型军事设施，如通信站、雷达站等。凡是面积大于 100 英亩，驻军超过 250 人的被称为主要军事设施。凡是驻军超过 1000 人，能够为一个陆军师或一个空军联队提供支持的综合体，则被称为军事基地。此前，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唯一驻军地点是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松口联合情报和通讯站，只有 178 人，相比在夏威夷的 4.2 万人，驻日

本的 4 万人，驻韩国的 2.8 万人，驻关岛的 4000 多人，驻澳美军是亚太地区美国驻军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部队。

此次美澳两国将美国驻军点从小型军事设施升格为军事基地，说明美国对其军事战略做出了重要调整，是美国军事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的重要举措。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背靠南极洲，同时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距离中国南海很近且有一长串群岛作为缓冲。澳大利亚往东北可以跟美军关岛基地呼应，往西北通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则很快就可以进入南海。

达尔文是澳北地区首府，被澳大利亚视为通往东南亚的大门，离印度尼西亚帝汶岛仅一海之隔，离中国南海也很近，约 2000 公里，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也是澳大利亚唯一经过战火洗礼的城市。1942 年 2 月 19 日，日本联合舰队对达尔文发动了突然袭击。日军以 4 架飞机的代价击沉或重创近 30 艘盟军舰船以及 22 架盟军战机。这次袭击被称为“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同样在 1943 年，达尔文又成为盟军反攻日本的跳板，美军轰炸机从达尔文港起飞攻打日军占据的印度尼西亚。

TTIP 和 TTP 构建美国新全球信用体系

美国需要新的价格定价空间，美国主导的贸易利益集团分别涌现，在美国高调主导 TPP 的压力下，欧洲与美国的 TTIP 组织谈判也开始了，这样的区域组织大有取代 WTO 的架势。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 WTO 多哈贸易谈判受阻，给美国提供了腾挪空间和时间，美国主导的以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TTIP（美欧自贸区谈判，也被称为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谈判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贸易谈判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 TPP 谈判不断推进的同时，据悉美欧双方将于近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预计 2015 年完成谈判，2016 年获得美国会和欧洲议会批准后生效。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连接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经济贸易框架，并凭借其自身的规则优势开启国际贸易体系新的主导权之争。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信用体系，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货币问题是国家金融信用问题，债务问题也是国家信用问题，社会保障泛滥还是一个国家的

社会信用问题。在危机后原有的世界信用体系难以维持，美国急需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危机后信用体系，TTIP 与 TPP 就是美国分别在亚欧的信用体系平台。对于美国最近开展的 TTIP，笔者认为应当与美国主导的亚太 TPP 协议一起来看。

TPP 被称之为“立足于下一代”的贸易新体制，它有别于一般性的自贸协定，TPP 定位于高标准和更全面。以往大多数自贸区协议主要限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服务贸易，很少涉及劳工和环境保护。而 TPP 不仅将规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关税，还将涵盖安全标准、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争端解决，以及有关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标准之高和覆盖领域之广远超一般自贸区协议。

TTIP 这个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要将美欧之间关税降至零；如果顺利在预期的两年内谈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是一场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定价权大战。数据显示，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亚洲投资的 3 倍，而欧洲对美国的投资是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和的 8 倍。德意志银行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与欧盟启动贸易协定谈判，这与美方希望与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达成的贸易协定类似。报告指出，TTIP 将创造全球重量级经济体之间最自由的商业关系，此举是应对中国实力提升而采取的防御性策略。

对此，笔者认为 TTIP 和 TPP 更关键的战略意图就是建立危机后新的全球信用体系争夺全球定价权。美国希望 TPP 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借此可以提升与亚太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创造出一个美国主导的适合 21 世纪经济发展趋势的高标准区域经济合作平台。TPP 平台涉及的经济体将占据全球一半的 GDP 和 40% 的贸易份额，即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TPP 国家的 GDP 也占到全球 GDP 的 1/3，而 TTIP 的平台一旦自贸协定完成，将覆盖世界贸易量 1/3、也是全球 GDP 一半，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两者结合可以占到全球 70% 的贸易额和近 80% 的 GDP，是一个巨大的全球体系，基本上就是金砖国家、伊斯兰国家和一些非洲边缘国家等在外面。

笔者认为，针对中国只是美国的战术目标之一，美国积极推进 TTIP 和 TPP

的根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源版图，取得世界资源定价的主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新构建危机后的信用体系，达到在危机后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财富的目的，继续保持美国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国际资本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全球资源，分类定位国家角色，形成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寄生消费型”国家、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劳动生产型”国家、以沙特阿拉伯等为代表的“资源供给型”国家。美元之所以可以不断地印钞、不断地宽松，就是美元和美国有一个强大的以军事、政治、金融维持的定价体系，在美元宽松的情况下美国能够把印钞的美元输出到其他国家换取财富，而美国不通胀、汇率不大幅度贬值。

从 TPP 的金融开放等协议，可以看到 TPP 建立的是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核心金融系统和价格体系，以此来保障未来美元信用不发生坍塌，未来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将在 TPP 的框架下深度整合，从而互相绑定，力量大增，这也是 TPP 协议对于金融等领域开放的规定比一般的国际贸易协议走得更远的原因。在 TTIP 协议下双方将加强农业和工业领域标准制定工作的合作，以及加强数据保护、汽车、制药等行业规制合作。TTIP 的关键是标准，把持世界的标准制定，因为标准的制定权能够抗衡美国的只有欧洲，而美国与欧洲的 TTIP 还把投资放到了重要位置。欧洲与美国在资本项目上会有更深入的合作，而这样的资本融合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融合和竞争，这个协议实际上也对于欧元垮台后美元占领欧洲市场带来了巨大机会，因为在没有这个协议下欧元垮台欧盟并没有解体，欧盟当中的实力国家德国和没有加入欧元区的欧盟国家英国都有天然优势，美国与欧盟的这个 TTIP 就使得美元与其他欧洲货币在同样的起跑线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 TPP 和 TTIP 是各有侧重的，美国应当不会愿意把两个协定合并到一起，合并的结果是让亚洲的国家与欧洲的国家也建立起来了自由贸易关系，这样的关系变成了圆桌会议而不是美国独占两边。我们也不应当忘记的就是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美洲也是有特权优势的，在这些协定当中美国处于最有利的交集地位。同时美国在 2010 年也与中国提出过 G2 概念，被中国拒绝，这些都是树形结构，这样的结构完全不同于 WTO 和 APEC 的多国圆桌，而是美国在不同的圈子里都独占鳌头，最后

这些协定的共同交集一定是体现到了美元结算上，所有这些协定，都给美元的输出创造市场，而美国输出的美元可以印钞，但你是要支付对价的。这样的结构有利于美元的霸权，控制不同领域的流动性，形成不同领域的定价权，然后由美国装配到它所需要的价值链上。

中国应对美国的围剿，盲目想要加入他们的圈子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构建这样的圈子造成差别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付出高昂代价加入，因此中国急于参与 TPP 等谈判是不明智的。现在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是贸易保护的受害者，中国要打破他们的壁垒，需要的不是上贡而是抓住对方的利益，创造互利的谈判筹码，才有平等谈判的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自己打开国门，而是很多问题是要谈条件的，中国让外国来投资，给予了大量优待请他们来，他们在中国投资赚钱很畅快，当你要投资他们，到他们那里赚钱，他们就不愿意了，这样的开放是要对等的开放的。只有让他们在国际感到压力了，他们才能够与你平等谈判，现在外资在中国比本土企业有优待，他们就不会与你谈判。中国博弈定价权，首先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很多国内专业市场占有国际同类细分市场供货量的大部分，这样的市场就是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要有自己的体系和圈子，我们注意到美国崛起时采取的政策是孤立主义政策，当年美国的大体量是完全可以在本国内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而不必全球配置资源的。现在美国的全球配置的信用体系是要在金融领域赚取溢价的，我们参与美国这样的信用体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能够自行建立体系的时候是可以考虑部分孤立主义的，而与俄罗斯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资源保障合作好，中国也是有条件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面运转的，而美国若是离开中国制造，其他国家要不没有足够的人口，要不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支持，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因此对抗美国重新构建全球新信用体系的行动，中国需要的就是自己规划全球信用体系的位置，你的利润、你的财富分配都是这个信用体系的定价权决定的。

美元与欧日的宽松和圈羊

对于美联储所谓的 QE3，不能单单从美国来看，要放到全球背景上审视。

在美联储行动之前，欧洲率先宽松，这也不符合欧洲的一贯做法，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的宽松与美国的宽松有什么异同呢？

在欧债危机肆虐的背景下，欧洲宽松的消息似乎是一场及时雨，2012 年 9 月 7 日欧洲央行决定出手购买陷入危机国家的国债，这次购买行动没有数额限制，而且可以立即启动。欧洲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解释道："当出现特殊金融市场环境和危及金融稳定的风险时，各国政府必须准备在债券市场激活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如果有必要，这两个欧元区金融救助方案预计将和欧洲央行共同购买长期债券。声明说："各国政府坚持各自承诺、履行他们在欧洲金融稳定机构和欧洲稳定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完成且有效完成直接交易的必要条件。"欧洲开始宽松了，欧洲改变了德国主导的欧洲需要紧缩的认识，开始真正的宽松了。2012 年 9 月 17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其对欧洲央行债券购买计划的支持，她寻求在支持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同时不疏远颇具影响力的德国央行。而且欧洲央行也开始大规模购买国债了，德国之所以放弃其一贯坚持的紧缩立场，除与当前德国的经济形势吃紧有关以外，还与德国银行和机构大量持有欧盟其他国家债券的信用担保品有关，就如希腊国债的 CDS 就是大量由德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希腊进入欧盟是高盛进行的包装，德意志银行提供的 CDS。在欧债破裂的情况下德国也是难以幸免的，德国要求其他国家紧缩就是拯救其 CDS 的风险，而欧洲已经无法紧缩或者紧缩下也要违约时，印钞维持欧债也成为德国所必须的选择。欧债危机在深化，欧洲印钞已经是没有选择了。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欧债危机悄然消失，背后就是欧洲央行的宽松，在德国的紧缩要求威胁背后，德国需要的利益得到满足后，宽松是大家的需要，因为德国虽然经济好，在紧缩下可以拉大德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差距，但德国也是欧洲各国国债担保品 CDS 的持有者，真的欧债破局，德国在利益权衡上不是最大化利益。

在欧洲印钞之后，美联储选择了所谓 QE3 操作，此后又把扭转操作变成了 QE4。前文曾经分析过美国作为世界老大不宽松，世界其他国家是难以宽松的。在德国总理造访中国，中国也推出一些积极的计划以后，欧洲似乎有了宽松的基础，可以把欧洲宽松的欧元单方面贬值变成美元单方面升值，美元的升值对于美国的就业而言压力是增加的，因此美联储 QE3、QE4 的理由由刺激和恢复

经济增长变成了就业问题，但是美国会轻易就范吗？会当欧洲的拯救者吗？建立欧元的目标就是对抗美元的霸权，在机会出现的时候，美元会放过搞死欧元的机会吗？美联储 QE3 推出的 MBS 购买计划，对于欧元而言是压力长远的，虽然短期内美元的宽松会减少欧元的压力，但是有资产抵押的债券 MBS 与没有抵押、赤字连连、负债严重超标的欧猪国家国债比信用，信用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信用差别不是简单的汇率变化，但是最终会在汇率变化上体现！美元的发行抵押物不同，短期不影响汇率，而且美元的宽松还会让美元指数短期下降，但是由于抵押品不一样，背后的长期信用变化，使得人们会更加愿意使用美元进行交易计价和结算，在信用差别上更直接的体现是市场选择结算和计价货币上，体现在欧洲的定价权丧失上。哪一种货币成为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哪一个国家取得定价权，才是更关键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重点也是取得结算货币地位和在世界金融市场结算上取得更多的结算份额，为中国制造争取到更多的定价权。欧元的信用下降就是以欧元结算和计价的国际贸易大幅度降低，欧元将向美元让出国际金融市场份额，随着流动性降低的同时，欧洲的定价权也要被出让。

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是以其国内不通胀为前提的，印钞和宽松还要不通胀，只能是把多出来的货币输往海外，不在国内的经济体内流通。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美联储的 QE2 规模为 6000 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同期增加 5500 多亿美元，美国 QE1 宽松 1.7 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了近万亿美元，前两轮 QE 的美元输出重点在中国。中国承受了巨大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而现在中国 PPI 是 -3.5%，CPI 是 2% 左右，已经是通缩压力了。多出的货币输入经济出现压力的中国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对于美国没有好处，美联储这次 QE3 的目标是在欧洲，要的就是在欧洲宽松以后向欧洲输入流动性，以这些输入的流动性到欧洲去圈羊、圈地，增加美元在国际上的份额，为未来的剪羊毛做好准备。

在欧洲宽松和美联储购买 MBS 的分野下，欧元与美元长期信用比值发生变化，市场偏好的结算与计价货币从欧元更多的转向为美元，使得欧洲对于美元的流动性产生了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也成为美元宽松以后的流入场所。对此我们还不能忘记的就是 2011 年美国主导的各国央行向欧洲注入流动性的行为，

当时对于岌岌可危的欧洲银行业算是终于等来了“及时雨”。欧洲央行于当地时间 2011 年 9 月 15 日发布公告称，该行已决定联合美联储、英国央行、瑞士银行和日本央行于 2011 年年底前协同向欧洲银行业注入美元流动性。此举大大缓解了市场对欧洲银行业风险失控的担忧，美欧股市闻风大涨，具体措施是将在年底前协同执行三次美元流动性招标操作，为欧洲银行业注入美元流动性。参与本次行动的央行包括欧洲央行、美联储、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据《华尔街日报》当时的报道，在过去的 2011 年的一年中，由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担心在希腊和另外一些深陷困境的欧洲国家的风险敞口，已经有超过 7000 亿美元的融资渠道对欧洲银行业关上了大门。这个流动性注入的规模虽然没有最终公布，但是从这个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出美元流动性注入的数量有多大了。2011 年 11 月 30 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等六大央行宣布，将对全球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采取联合行动，在 12 月 5 日下调现有美元流动性互换费率 50 个基点。声明显示，各央行的联合行动旨在缓解金融市场紧张形势，扶助全球经济增长。各国将建立临时双边互换安排来提供流动性，新的货币互换额度将持续到 2013 年 2 月 1 日。欧洲央行表示，六大央行的联手行动旨在减轻金融市场压力。从这些金融操作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元的流动性大量进入欧洲，美联储的 QE3、QE4 实际上是给欧洲输入流动性制造所必需的美元。美元的输入背后就是定价权的博弈，就如我们论述的那样，谁主导流动性，谁就有定价权。美联储的流动性来自资产抵押债券的背后，就是要占有和控制大量的资产抵押权，在未来美元重新回到强势货币的时候，这些抵押债务就会遭遇流动性困难而难以还清。届时本来不会出售的核心资产就要归抵押权人，不但很多资产要改姓“美”了，而且这些资产的价格也是美国人说了算，就如当初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时的情况。

2011 年美联储主导的各国央行向欧洲金融界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当初这样的流动性是信用提供的，而流动性到期了以后新的流动性是怎样提供的呢？在美联储现行政策之下，要获得流动性的支持就要提供资产保障，也就是说要提供抵押。在 2011 年提供了流动性以后到 2012 年一年时间，通常的央行流动性支持和银行间的同业拆放最长也就是一年，美元指数是上涨不少的，汇率的变

化早已经使得这笔融资超过利率不少，更关键的是这样的融资会让欧洲产生依赖性，后续的美元流动性哪里来？就要依靠出售资产抵押的美元债券 MBS 得来，欧洲资产的抵押权就要被美国控制了，控制你的资产抵押权，实际上就是把这些资产肥羊圈到了自己的羊圈里面，所以笔者认为美联储这一次的行动就是针对欧洲，就是要以美元的流动性释放挤占欧洲的金融市场，就是要在欧洲圈羊了，为了进一步的掠夺世界做好准备。我们不能仅仅看美联储 QE 所购买的 MBS，美联储的购买给 MBS 注入了流动性，会带动大量的美国投机资本，实际的效果可能会被放大很多倍的。美国这一次的举动对于德国的压力会非常大，应当是德国在欧洲争霸推动欧洲一体化行为触犯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所带来的阻力，这样的圈占和剪羊毛是直指德国的，也是要在全球市场与德国竞争，吸引欧洲的高端制造业。中国的低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美国人是看不上且不会愿意干的，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取得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只能把目光放到欧洲。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谓的“为了就业”这句话不是白说的，美欧博弈是美国经济振兴的关键。为了服务这个目标，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制造地缘政治纠纷，限制亚洲的发展整合，也是应当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近期中日、日韩等摩擦不断升级的同时欧美货币大戏开演，当前已经进入到全球一盘棋的阶段了。

美国 QE 背后，就是向全球注入美元的流动性，是一个美元流动性输出的战略，QE 的美元不是在美国国内运行的美元，是要输入全球的美元。而流动性输出以后，各国产生了对美元的流动性依赖，美元回流使各国产生经济压力的时候，美国讨论退出 QE 就是必然的了，QE 就是美国手中的大棒。

全球信用崩盘与剪羊毛的准备

现在的世界行将进入全球信用崩盘的前夜。对于西方的信用危机，笔者已经在《信用战》一书详细分析过，负利率政策让养老金收益率过低，已经挤爆了西方社会保障信用体系。政府为了社会保障，隐形负债比现在公开的债务要大几倍，而现在公开的债务已经是天文数字了，美国国债超过 16 万亿美元。2011 财年美国政府每开销 1 美元有 36 美分是借来的，为此全年净付 2270 亿美元的利息，比上年增加 15.7%。全年美国财政收入 2.3 万亿美元，增长 6.5%；

财政支出 3.6 万亿美元，增长 4.2%。美国的负债水平相对于欧洲和日本，已经是最好的了，这样的负债距离信用体系的全面崩盘就已经不远了。美国的现行政策，应当是对其崩盘后的结果有所考虑的。

世界进入信用危机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崩盘，对此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美国等国的国债全面违约会怎么样；美国政府的运行和国债的持续发行遇到障碍会怎么样；美国的利率上涨导致利息超过收入成为庞氏骗局会怎么样；美国政府已经出现了两次停摆，以后停摆的规模再扩大怎么办？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美联储当今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国债的全面违约或者缩水、重估、政府信用危机等情况的出现做准备。美联储以每月 400 亿美元的速度在购买 MBS，同时美国国债不断到期减少。美国的 QE1 购买的 MBS 虽然坏账泡沫很多，但这些 MBS 的利率也很高，在连续低利率政策下巨大的利差收益，已经极大地改善了这些资产的风险状态，因此几年下来以后美联储的资产构成有相当的部分就是优质的 MBS 了，同时美联储购买 MBS 会给这个市场注入流动性，会带动大量的美国资本投机参与，美国资本持有的 MBS 数量和 MBS 市场的规模发展又可以扩大效应很多倍。美国的再度 QE 让欧洲开始大量购买欧洲国家的国债，只要这个过程开始，欧洲的宽松就会开始，欧洲国家的国债发行就又会成为脱缰之马，尤其是欧洲没有统一财政，是不同的独立国家，谁的国债发行得多谁就得利得多，依靠道德约束少发行国债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合作的囚徒博弈，最终走向囚徒困境是不难想象的，欧洲的国债出现大面积违约就是囚徒困境的结果。与此同时，由于欧洲的印钞和美国的宽松，日本是难以独善其身的，2012 年 9 月 19 日受中日矛盾升级和美联储政策影响，日本央行将资产购买与贷款计划规模扩大 10 万亿日元（1270 亿美元），至 80 万亿日元，增加的部分将用于购买国债和贴现国库券。日本央行指出，增加日本国债购买规模 5 万亿日元，增加贴现国库券 5 万亿日元。将到 2013 年 6 月底完成规模扩大后的贴现国库券购买计划，延长到 2013 年 12 月底完成日本国债购买目标。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以后搞的安倍经济学，大幅度地宽松 QE 和让日元贬值，日本的国债与 GDP 的比例达到 200%，已经是世界之巅了，再这样的印钞持续下去对于日元的前景和政府还债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欧洲国债违约倒下，负债率最高的日本能够独善其身吗？美国此时会当雷

锋来还账吗？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就是一个列强比烂的过程，如果欧洲和日本的国债都违约了，美国的国债违约就不叫违约而叫做危机了，这就变成了全球信用崩盘了。这是与拉美债务危机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完全不同的性质，列强们的天量国债不是为了还债的，美元未来走向强势之前必然是要以非正常的方式摆脱巨额债务的。世界的强国们又要通过他们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掠夺全世界了，在他们的话语权下这些都是理所应当，不是什么罪恶！要注意到几年后全球信用崩盘时，以 MBS 为大比例资产的美联储，可能已经是以资产抵押权为主的货币发行而不是国债为主的货币发行了，欧洲则是国债发行，而且国债数量冗余和庞大。国债被违约以后只有美联储是鹤立鸡群独善其身的，由于美联储的资产抵押物的价值是不会随着美国等国家的违约而消失的，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资产不大比例地遭受损失，美元的信用就是有保障的，美国再一次掠夺世界的过程就开始了。

在全球国家信用崩盘，各国以国债发行货币导致货币也限于信用危机的时候，美联储如果信用来源主要是抵押的资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全球从弱势美元到强势美元变化，从而是一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弱势美元时代的终结。这个历史就是二战前后的历史，经过二战美国独善其身，各国信用大损，大家只得建立以美元为主的世界体系，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现在如果世界各国违约，各国央行信用崩溃而美联储独善其身，美元必然再一次成为强势货币，从而出现美元从弱势到强势的拐点，这样的拐点出现就是世界财富的一个新的分配时代的开始。

对于弱势货币，借贷消费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强势货币，谁借贷得多，谁就要当奴隶的。在二战后强势美元时代，西方主要强国都是债权国，而弱势美元时代他们则都变成了债务国，而随着信用崩盘国债违约，债务国的债务被清零了一次。实际上使这些国家有了再度变成债权国的可能，也使得一些强国衰落，成为债务奴隶，滑入深渊。对于微观角度的经济层面，此时就是资产抵押借款人的灾难，在强势货币下借款消费就是要成为奴隶，你是难以还清欠款的，最后你的抵押资产就要被别人占有了。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中的抵押规则也是不同的，特别有利于强势货币方，这样的制度与美元在世界的霸权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在全球共有表外、表内和准表外三种模式。

表外模式也称美国模式，是原始权益人（如银行）把资产“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SPV 购得资产后重新组建资产池，以资产池支撑发行证券；表内模式也称欧洲模式，是原始权益人不需要把资产出售给 SPV 而仍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由发起人自己发行证券；准表外模式也称澳大利亚模式，是原权权益人成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作为 SPV，然后把资产“真实出售”给 SPV，子公司不但可以购买母公司的资产，也可以购买其他资产，子公司购得资产后组建资产池发行证券。这样的证券化如果以中国的司法概念而言，欧洲是抵押，而美国是质押，抵押和质押的区别就是资产的增值等部分的享有是不同的。美国只要在违约情况下止赎，资产今后变现增值就与原所有人无关了，但是在抵押模式下资产还属于原主，要取得财产需要通过司法手续和拍卖，多出来的增值部分是要归属于原主的，这样的差别所形成的 MBS 是有差别的，取得美国式的 MBS 是有额外的增值收益的，这也是可以剪羊毛渔利的。美国这样的模式在强势货币下是有助于取得抵押资产的，在欧洲模式下则有一定的保护，这样的差别就是即使是欧洲央行也购买 MBS，由于抵押规则的不同，MBS 的信誉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和美联储提供的美元流动性，惯例也是要采取美国规则的，在这样的美国规则之下，取得了足够的抵押权，实际上就是圈到了羊，抵押权在谁的手上，谁就有了剪羊毛的权利。

在大量持有 MBS 的情况下，怎样能够剪羊毛呢？很简单，在微观领域，因为全球信用崩盘，国债违约、信用崩盘国家的资产价格肯定是要下降的，即使是因为崩盘该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该国的汇率贬值也要跑过通胀，以美元衡量的该国资产价格也是要下降的。这就如中国在民国战乱期间资产价格极低一样，郎咸平先生不是到处说民国的北京四合院五两黄金云云吗？这样的资产价格下降造成抵押不足值，按照当今惯例是可以进行司法不安抗辩，要求对方补足、提供其他担保、平仓等，就可以对于所抵押的资产提出要求，这些资产的产权就被低价占有了，到危机过去资产价格恢复就赚取了暴利，很多平时根本不会出售的核心资产，在这个时候都可能被廉价的买到，而买到的关键就是抵押权在手。在宏观领域，信用崩盘的时候，如果大量国家国债违约，这些违约国债发行的货币和对应的财富蒸发，流通中的货币是会非常紧缺的。这样的紧缺出现则给了能够独善其身的良币巨大的扩张机会，良币的信用优势使得这

些货币大量印钞贬值，以后仍然对于崩盘货币具备信用优势，而且印钞的货币如果从体外买到了对价合理的资产，这些货币就不是印钞了，等于是拿印钞的纸换取了财富，掠夺了资源，就是进一步在宏观领域的财富再分配。上述的掠夺过程我们从宏观的层面上看，就是货币的信用消失，货币的流动性会出现紧缺。这时候美元的流动性和其他货币的流动性是不同的，美国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性，美国将掌握这些抵押资产的流动权，美国也就拥有了对于危机世界的定价权，并且可以通过这样的定价权再一次的分配世界财富。

对这次剪羊毛的过程，我们看一下剪羊毛的由来就可以了。在 20 世纪初，华尔街银行家们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Federal Farm Loan Board）的机构专门提供资金，“鼓励”在农产品高价中获利的农民贷款，“投资”购买新的土地。但是农民不懂金融也没有经济大局观，对于未来的流动性陷阱是看不到的。在 1920 年的 4～7 月的 4 个月内，工业和农业在贷款政策上出现了巨大的剪刀差，农民基本无法取得贷款，此举据说旨在掠夺农民的财富和摧毁农业地区拒绝服从美联储的中小银行，实际结果就是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财产被清算。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欧文（联署 1913 年美联储法案）在 1939 年的参议院白银听证会上说：“在 1920 年年初，农民们是非常富裕的。他们加速偿还着按揭，大量贷款购置新土地。1920 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信用和货币紧缩使他们大批破产。1920 年所发生的一切（农民破产）与应该发生的完全相反。”现在类似的事情又在上演了，宽松的美元刺激了你的贷款以后，非对称的紧缩会随之而来。美联储的所谓的 QE 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这样所谓的宽松是带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的，美联储可以决定买谁的和以什么价格购买 MBS 而不受监督，就如当年剪羊毛时只给工业和贸易信贷却不给农民一样，未来 MBS 的购买同样有这样的选择权，谁有流动性谁就是王，谁就有定价权！这样的选择权可以按照行业不同，也可以按照国家的内外不同，还可以按照意识形态而不同，而且这样的不同是暗箱操作的。美联储属于私人机构，虽然政府可以监督，但是政府不能泄露私人机构的商业秘密，只要不违法政府就无权置喙，但是这样的购买 MBS 的选择权行使不受法律限制，没有违法问题，是私权下的自由，因此美联储对于 MBS 的选择是不受公众监督的。在美联储有 MBS 购买选择权的情况下，即使不是紧缩，美联储也可以操控各个领域不同的流动

性和造成流动性不均衡，流动性的波动就可以渔利了。按照我们前面建立的定价权与流动性关系的理论，美联储给不同的领域注入不同的流动性，从而在不同的领域操纵定价权。这是对于市场的人为操作，根本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所谓的市场自由竞争和市场规则，而是一个规则制定者参与游戏和进行裁判的博弈，这样的博弈就是有规则制定权的人的掠夺和剪羊毛的天地，未来这样的剪羊毛还会发生的。

在信用危机、流动性危机下的 MBS 的崩盘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看到另外的一个差异，就是美国的内外之别，持有美国房地产的个人并不能保证因此取得去美国居住的签证，作为国家主权基金也难以在美国海量持有房地产。美国的房地产还有房产税等持有费用，但是美联储等持有这些资产情况则不同，是美国肉烂在锅里，就算是其他条件一样，作为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持有房产和管理房产的成本也是极大增加的，因此支持 MBS 本身就导致对于不同的持有人的信用是不同的。这是不动产流动性受到特定限制下产生的差异，也是要产生定价权的差别的，这个不同也可以造就资金的不同流向，确定了定价权在谁手里，给剪羊毛渔利以机会。

在美联储的低利率长期化和宽松政策之下，投机的风气必然会变得更加严重。西方的股市在西方经济全面陷于危机下不断创造新高，已经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实体经济和债务危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背离在西方一般被称作“兴登堡凶兆”，是未来会大跌的前兆，这个凶兆的背景就是剪羊毛要大面积发生了。我们说美联储的宽松是货币发行，不是印钞的关键就是提供这样的货币要提供对等的信用，你的资产等需要抵押给他们，他们要持有你的资产足额的抵押权。在市场高位和抵押权丧失的情况下，你是很危险的，如果美联储收紧银根会怎么样呢？历次的剪羊毛都是美联储的宽松在前而紧缩在后，美元从弱势美元到强势美元，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元从宽松走向紧缩，是流动性的挤兑。在紧缩的背景下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有限，要清偿这些抵押权，借款市场上所有的货币加起来都不够！这样的挤兑在本位货币的情况下是非常常见的，在本位货币情况下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受限，强行大量持有本位资产让他们退出流通，市场上就会一片哀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手里有流动性谁就是决定定价权的王者。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言论：“1894 年 9 月 1 日，我们将停止一切贷款的

延长。那一天，我们将索还我们的钱。我们将拥有并拍卖尚未清偿的财产。我们会以我们自己定的价格得到密西西比河以西 2/3 的农田和以东的成千上万的土地。农民将（失去土地）变成受雇用，就像英国那样。”1891 年美国银行家协会收紧银根控制流动性定价权的剪羊毛是残酷的。[①]

所以美国 QE3 的变化以及以后退出 QE 的种种政策这样做，就是在为全球的信用崩盘做准备。美联储以购买 MBS 的方式，取得大量资产的抵押权，并且通过流动性的输出把这样的抵押权控制延伸到全球，就是在全球圈羊的行动。取得抵押权就是取得了剪羊毛的权利，控制了被抵押资产的流动性，从而逐步加强对市场定价权的控制，为再一次的全球剪羊毛开始做准备。

第 5 节　中国受控着陆博弈 QE 定价权

中国在美国不断 QE 下怎么办？笔者认为采用受控着陆的方式是博弈西方定价权的有力武器。通过受控着陆，增加热钱进入中国的风险，降低世界对于中国需求的炒作，降低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结构，提高工资，取得一定的定价权，虽然会有一定的压力，但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这是提高中国劳动力定价权的有力手段，中国作为制造国劳动力是最重要的资源，是让劳动力定价权主导资源定价权和金融定价权的博弈策略。

美国量化宽松开始以后对于中国的冲击不仅仅是美元的流入，更在于资源和大宗商品的影响。在美元印钞的时候大宗商品也涨成了天价，这些大宗商品在美元结算下的涨价相对于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的价格稳定和中国的防通胀，这些资源国家在出口同样多的资源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制造品，它们也是美国印钞的获利者，而且这样的做法还使得资源供给曲线发生了后弯，产生了前面所论述的资源特殊性。美国等国越是宽松，资源国家越是希望尽可能多的拿住资源，印钞的程度还促使供给曲线的后弯程度出现变化和后弯拐点

① 收录于 1913 年 4 月 29 日的美国国会记录。

的提早到来。与此同时，外来的美元流动性进入到中国的刚需和资源产业，在通胀预期下资源的涨幅巨大，引发了投机性、恐慌性和避险性的需求和资源持有者的惜售，也促生了中国的资源食利。开发商和矿老板早已经成为国内黑恶商业势力的代名词，这背后就是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食利，使得中国的产业需求得不到满足，实业发展受到限制而出现经济泡沫。在定价权上，美国通过QE 主导了世界，大宗商品涨价美国却没有通胀。这就是美国金融定价权的成功和中国定价权丧失情况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世界大宗商品的高价，很多就是由于对于中国经济向好的预期导致的，对中国的预期给这些领域带来了充足的投机流动性，他们是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卖高价的。例如：俄罗斯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最近公布的财政方案基于石油价格将多年维持高位这一假设，库德林的预算显示 2014 年石油价格须达到每桶 125 美元预算才能实现平衡。只是在将原油价格预期从之前的每桶 70 多美元上调至 90 多美元之后，库尔德才勉强将未来 3 年的预算赤字控制在 GDP 的 3% 以下。即便提高对原油价格的预期，库德林的财政战略仍放弃此前到 2015 年实现预算平衡的目标。除去占税收半壁江山的能源收入，俄罗斯预算赤字将超过 GDP 的 10%。这些资源持有者和世界的资源投机者，其投机囤积的理由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需求为他们的囤积高价卖单。如果这样的趋势得以不断持续，中国的发展成果将被他们食利。因此如果中国的经济着陆，原油价格必然暴跌，对于这些拿资源卡中国脖子的国家就是灾难。惠誉（Fitch Ratings）驻伦敦主权分析师帕克（Edward Parker）认为俄罗斯财长库德林的预算战略是一个倒退，俄罗斯的最大风险仍在于原油价格的持续暴跌。石油价格暴跌的结果反而是产油国为了生存会出售更多的石油，因此帮助中国的经济受控着陆。按照中央的精神，控制通胀和需求的预期，让资源价格降低是中国突破资源瓶颈的关键。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定放缓迹象，石油价格才得以在 110 美元以内，否则石油价格会是多少？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石油供给出现后弯以后，所能够采取的就是战争。美国打伊拉克最大的利益就是石油，其最主要的利益还不是体现在价格上，而是体现在供给上。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伊拉克成为欧佩克成员中唯一一个不受欧佩克产量限制的国家。2011 年后的中东危机，中东石油国家的强权人物

被颠覆，西方进攻了利比亚，利比亚也是欧佩克的重要成员国，在利比亚内乱中，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损失惨重。美国还在政治上紧密控制了沙特和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算上新探明的石油储量已经是世界第一石油大国，现在世界石油最丰富的委内瑞拉、沙特、伊拉克等均在美国控制之下。西方的战争和西方让中东的内乱不稳定，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带来了他们的军火需求，为了这个需求就必须卖更多的石油，而买军火则更多也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美国简直是在做多个层面均赚钱的买卖。在中东的混乱下欧洲则取得了利比亚的石油资源控制权，这也是英法对打击利比亚比美国更积极主动的原因。利比亚的石油到欧洲通过地中海运输是最便捷的，利比亚的石油质量还是最好的所谓甜油。英法参与利比亚颠覆政权行动是很有收获的，决定石油控制权的不光是价格，还有配额！欧佩克的配额！

西方对付石油供给曲线的后弯是采取武力干预的，但是此路对于中国显然不通。与此同时西方还有金融领域的优势，可以以印钞换取资源。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很强，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还比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更依赖石油，采用石油以外的其他资源替代污染瓶颈也是难题，雾霾已经是这些年公众的焦点。因此在石油供给出现后弯的时候，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所承受的风险也是非对称的，在这样的后弯模式当中，中国首先会被掠夺。中国必须思考自己的道路，这里中国无力以武力干预世界，却可以控制自己的需求，如何让需求下来，导致资源的供需在后弯的下方形成低价的均衡点，这才是中国博弈世界和避免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的关键。

计划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西方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但是中国目前肯定没有能力计划和调控全球，中国要做的就是顺应全球的趋势。对于必将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够把握方向主动迎合，经常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文革”期间批斗侯宝林，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结果侯大师自己拿出高帽子一下子倒在了台上，搞的会场哄堂大笑反而斗不下去了，现在中国选择时机自己倒下主动调整，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中国的“倒下”使得美联储的量化宽松难以向中国等地输出流动性，中国受控着陆的风险是让热钱不敢肆意进来渔利的，反而热钱等撤离中国，导致过剩的流动性回流美国，引发美国通胀。热钱在中国着陆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取得高价和汇率所得，同时中国会在回流中顺理

成章的降低畸形的外汇储备和抛售美国国债，这些都是让美国难以承受的，这必将刺破全球的美元泡沫。

一个经济周期就是资源和定价强弱势力的循环，受控着陆不是硬着陆，是在国家管理部门的控制之下进行的人为的经济发展方向性调整，受控着陆和不得已倒下的硬着陆不同的就是经济体内资源和劳动的定价博弈当中，是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并且形成后弯供给下降，资源食利不断掠夺挤爆了产业，还是你的主动调整挤爆了资源投机者，让资源方不得不低价抛售资源。这是有根本差别的，但是西方有意忽视了这样的差别，并且渲染中国的硬着陆和做空中国，实际上他们是受不了中国真的进行受控着陆的调整的。中国的调整是对于资本的调整，但对劳动力而言则是涨工资和收入的增加，中国以当前无法替代的世界工厂地位下的调整，中国低工资快速增长，因为人力成本因素带来的涨价，必然是要将通胀的恶果让宽松印钞者和资源食利者自食其果的。没有了中国廉价商品，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将深化，这样的危机当中有利于中国崛起和调整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就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劳动力供需曲线也是弯曲的，当前中国的受控着陆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调整到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在后弯的上方，而资源在后弯的下方，改变目前的资源食利状态，其要点就是要强力的提高工资，在高工资下实现产业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使得资源方换取我们的劳动力产品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资源，使得印钞方的货币购买力更快的下降，自食通胀恶果，中国开始自 1994 年经济调整以来新的一轮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周期。

中国的受控着陆是有成功经验的，在 1993 年后的中国实际上就搞过一次受控着陆，让中国过热的房地产等产业进入了调整，当年对于中国大学生 200 元的工资，北京万通新世界项目售价高达 3000～4600 美元（那时 1 美元可以在黑市换 10 元人民币）的定价无疑是比现在房价更恐怖的价格，但是这个项目被顺利销售一空，此时伴随着经济着陆调整，老百姓的收入进入了快速的增长。到 1998 年的时候大学生的毕业工资就到 2000 元了，虽然 CPI 高涨，但是房价平稳，收入增长 10 倍，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房子买得起了，随后中国甚至发生了通缩。这期间中国的利率大幅度下降，房价平稳，老百姓收入快速增长，最高超过 20% 的 CPI 成为历史。预先的调整使得中国成功躲过

了 1998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促成了经济大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回望当时的调整和经济着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这样的受控着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现在在外来压力下我们不断紧缩，利率不断升高，民间利率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经济发展被严重盘剥，从而劳动力定价权流失，人民收入难以增长，人民不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因此中国急需一个主动调整的过程，改变现状。

这个调整就是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改变老百姓收入在 GDP 当中的比例持续减少的局面。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的背后就是资源持有者的得利不断增加，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个调整必然会是一个经济着陆的过程，因为工资的上涨会让很多血汗工厂难以为继，会出现血汗工厂的倒闭潮，这个倒闭就是所谓的中国“衰退”。但是中国的崛起绝对不是依靠血汗工厂能够实现的，血汗工厂是中国发达的障碍，只有让老百姓富裕了，处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后弯上方，中国才有资格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而这样所谓的“衰退、危机”等与西方的危机是有本质不同的，同样的 GDP 受到压力，但就业和工资收入层面则是完全两个方向的变化，这是一个中国取得自身劳动力定价权的博弈过程。

综上所述，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是要看其货币流向和政治博弈的，而资源的供给会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这样的反常情况必然导致新危机的不断发生，在危机中是资源与劳动力定价的博弈，美国的量化宽松也是金融资源力量的体现。中国如果能够受控着陆打破资源食利的盘剥，让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取得自身劳动力的定价权，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黄金时期。当前中国的经济看似受到压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在上涨，中国需要的各种资源的价格都在下降，中国的产业在升级，其实十八大以后这些才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更可喜的现象。中国如此的变化，也是促成美国收缩 QE 规模的原因，因为中国已经难以让美国的 QE 流动性安全输入了，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中国的受控着陆与美国的量化宽松在定价权之间的角力。

第 6 节　未来的 QE

美国 QE 的走向分析与替代工具

2013 年 6 月 20 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发布最新的货币政策后召开发布会，记者的问题自然集中在何时开始削减量化宽松（QE）直至最终结束上。伯南克指出最可能的情况是从今年末开始缩减，至 2014 年中某个时候最终停止 QE。美联储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造成全球股市的大跌，黄金跌破 1300 美元，中国的沪市也跌破 2100 点。结果到 2014 年 2 月，美国 QE 每月缩减了 100 亿美元的规模。到 3 月 19 日，美国的 QE 再缩减 100 亿美元的规模。2014 年 5 月 1 日美联储在周三结束了为期两天的 4 月决策例会，在随后公布的货币政策决策声明中，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以 9 票赞成的一致表决结果继续维持目标利率在接近零点的 0～0.25% 不变，同时将每个月的资产采购项目规模再缩减 100 亿美元，至每个月 450 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在周三的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水平在接近零点的 2008 年 12 月以来水平，并连续第四次对债券采购项目的规模进行缩减，使得每个月的购买数量从最初的 850 亿美元减少到从 5 月 1 日开始的每个月 450 亿美元，也就是每个月购买 250 亿美元国债和 200 亿美元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美联储的 QE 呈现不断收紧的态势。2014 年 6 月 19 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将其债券购买计划的规模进一步缩减 100 亿美元。FOMC 宣布，从 7 月份开始，该委员会将以每个月 150 亿美元的规模扩大其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持有量，而不是此前的每个月 200 亿美元；同时将以每个月 200 亿美元的规模扩大其长期美国国债的持有量，而不是此前的每个月 250 亿美元。现在美联储的 QE 的规模再度缩减，QE 会走向何方呢？真的就是要退出历史舞台吗？

美联储如果真的不施行 QE 了，本身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也难以宽松，各国准备资金储备越冬是必然的选择，股市在全球范围内再有一次大跌是必然的结果，这个结果本身也是美国财团想要的。我们要看到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

资财团是一直在出售资产的，从高盛不断抛售中国的银行股就可以看出，他们需要出售资产掩盖他们的危机。美联储这个时候搞 QE 实际上是让他们的资产卖一个好价钱，但到他们资产出售完毕，就如高盛基本清光中国的银行股票一样，美资财团手里有钱的时候，美联储继续 QE 则是让美资集团手里的货币贬值，这可是美国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而此时高位购买资产，抬轿子、当雷锋则是美资财团更不愿意干的事情。对于美国资本最有利的就是退出 QE 让美元阶段性走强，让资产大跌，美资财团可以抄底，因此配合美国资本剪羊毛的政策就出台了，当初有剪羊毛的说法，也是华尔街先宽松，在紧缩后洗劫留下的历史名词。现在美联储筹备退出 QE，就是美国人筹备抄底了。

但有人会说美国经济刚刚有所起色，难道美国不怕退出 QE 经济恢复夭折吗？这里美国实际上还是有后手的，美联储不施行 QE 的背后，实际上是美联储手中还有比 QE 更有威力的调控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取消对于超额准备金的付息政策或者调整美联储超额准备金的利率。这样的政策调整直接关系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关系到美元的货币总量和杠杆率，对于市场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 QE 的，因为 QE 是做货币的加减法而超额准备金率所决定的货币杠杆率则是在做乘除法。

对于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本来是不付息的，但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货币实际上处于严重泛滥的威胁之中。美国国会于 2008 年 12 月授权给美联储的新工具——“超额准备金利率”，最初的利率计划为 1.25%，到目前该利率为 0.25%，这个利率使得大量超额准备金存储于美联储，这是西方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美联储如果使得淤积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等流动性释放，同时使得欧洲难以宽松，客观上就是再在全球收紧流动性，这样实际上是美国实行了对内对外不同的货币政策，是外紧内松的定向宽松政策，而不是流动性输出的量化宽松政策。

准备金付息政策的出台导致负债方的“准备金存款”快速增加。自 2008 年 9 月份开始，原来构成负债方主体的“流通中货币”占比迅速下降，2010 年 1 月底下降到 40% 左右。而存款机构的准备金存款占总负债比重相应上升，2010 年 1 月底上升到 57% 左右，危机前的 2007 年 6 月，准备金总量 160 亿美元，而 2009 年 9 月准备金总量高达 8480 亿美元，扩张 53 倍，其中超额准备金高达

8220 亿美元。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创纪录。2010 年 1 月 13 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升至 2.274 万亿美元。其中，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亦从 2007 年初的 22 亿美元上升到 2009 年 11 月份的 1.16 万亿美元。根据圣路易斯联储披露的数据，截至 2012 年 3 月末，法定准备金余额为 968 亿美元，超额准备金余额为 15097 亿美元，而截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当周，总准备金余额为 15632 亿美元。截至 2013 年第一季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逼近 3 万亿美元大关，且美联储正以每月 850 亿美元的速度购入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公开资料显示，2009 年初时的美联储整体资产负债表规模尚不足 1 万亿美元，而现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大约有 1.7 万亿美元。超额准备金成为支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主要贡献项。

现在如果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从 1.7 万亿美元恢复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十亿美元的水平，这 1.7 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与美国的 10 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 M2 相比，相当于存款准备金率下降了 17% 左右。这样的宽松效果是远远超过 QE3 的购买债券的 QE 的，对于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而言，Quantitative 是重要的限定，而准备金利率下调导致的超额准备金流入市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远远要超过 QE 的影响的。

实际上美联储主席就超额准备金的问题早已经表态过了。2013 年 4 月 9 日下午消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联储将把提高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作为收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而不是从其资产负债表中出售资产。“我们所考虑的基本工具是对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率。”伯南克在佐治亚州一次会议上回答听众提问时表示。他说，在货币紧缩时期，货币市场利率或许会维持在接近超额准备金利率的水平。美国的 QE 与取消超额准备金虽然都是宽松，但是后果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笔者曾经分析过印钞不是关键而发钞才是关键。在 QE 的模式之下，美联储购买国债，政府取得印钞的现金，这些现金被支付给政府的救市和社会保障等项目，是造福社会的，但取消超额准备金让货币在金融体系内衍生，则取得现金的是资本，尤其是控制美国金融机构的美国资本取得大量现金，这些现金可以支持他们到全球收购资产，这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在世界范围更具有威力。在欧洲，欧洲央行是不提供超额准备金利率的，而且相对于美国，欧洲的非银行部门规模比较小。然而，丹麦和瑞

士已经长时间出现了负利率（有些银行甚至收取存户 50 个基点的存款费用。）。欧洲央行在去年 7 月把央行存款利率下调到零后，在去年已经导致非抵押利率下滑到只有约 10 个基点。因为缺乏高质量的抵押品，欧洲的国债抵押回购利率只有零多一点（因为资金贷款人不愿意以负利率借钱）。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资金本来就紧缺，法定准备金还有压力，不会有人交超额准备金的，因此美联储把 QE 的大棒变成超额准备金政策，美联储就让美国资本取得了差异化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就足以支持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因此美国的 QE 可能退出，但美联储的宽松不会结束。

美国退出 QE 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巨大打击。日本实施的安倍经济学计划日本央行大幅度增加货币基础，至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50% 的水平，即从 2012 年的 139 万亿日元增加至 2014 年底的 200 万亿日元。未来两年内，货币基础将以每月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 的速度膨胀，如果届时未能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这样的做法还将延续下去。日本央行将大规模无限制购买各种债券，包括日本政府债券在内。如果将债券采购计划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则日本的每月采购力度甚至相当于美联储量化宽松计划的 2 倍。此外，日本还将延长其所采购的债券的期限，从平均不足 3 年增加至 7 年左右。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预计将会膨胀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左右，2 倍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日本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预谋的针对美元的贬值，使得外国持有的日本国债与日本的外汇储备相当，日元贬值给日本制造业带来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但美联储如果退出 QE 则会让日元的国际信用崩溃，世界将抛售日元，日元的贬值将不受控制，这就是如东南亚一样的金融危机了。从产生了美联储退出 QE 的预期之日起日本股市就暴跌了，我们要看到 QE 是一种权力、一种威慑力，只有拥有金融霸权的美国才能够使用，欧洲一直不宽松搞 QE 的背后，应当是金融经验丰富的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

美国的 QE1 控制了金融危机的深化发展，而 QE2 的成功背后是宽松 6000 亿美元，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增加 5500 亿，在中国央行池子论之下中国为之提供了池子。对于美国推出 QE3 和 QE4 本身当时笔者就说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有勉强的成分和其他战略目的，QE4 则是取代了原来的扭转操作，考虑到国债到期的压力，QE4 本身的宽松规模就已经不大了，而 QE3 购买的主要资产抵押债券，

与购买国债的性质不同，而且美国的流动性真的收紧以后，这些债券如果还不起，美联储可以取得其中的抵押资产，与国债违约的彻底损失完全不同。美国QE 政策本身已经边际效益递减，正在逐步走向反面。这里我们不光要看到美国QE 的所得，还要看到 QE 带来的资源价格上涨给世界资源国的好处，美国也是资源消费大国，美国是需要综合算账的。对于美联储不实施 QE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QE 带来的石油涨价的压力，美国打页岩气和页岩油的牌，现在已经出现问题，页岩气不是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争气。随着美国国债利率的长期走低，美联储购买美债的资金来源是超额准备金，而超额准备金的利率高于短期国债利率，也会导致美联储的亏损。为了不亏损，美联储就不得不购买长期国债和让低利率长期化，这个长期化也是挤爆美国社保体系的源头，因为美国人不直接存钱，而美国人的社保都要依靠利率下的投资收益平衡维持呢。美国人是通过社保体系间接存钱的，这样的长期低利率化美国社会是承担不起的，我们不要忘记危机前美联储的利率高点是 5.25%，现在只有 0.25%。相差 20 倍！美联储在石油危机的时候利率还达到过 21.5%。在政策力度方面，美联储经常是可以超乎想象的。

对于美联储退出 QE 和可能的超额准备金杠杆政策调控，中国应当将当初的池子论坚持到底，在美联储退出 QE、热钱外流的时候，一定要抽紧银根不让热钱渔利外逃，能够有税收调节就更好了。在热钱流出后汇率市场化让人民币升值到位，加大热钱回流输入性通胀的门槛；而到美联储通过超额准备金的杠杆加大流动性的时候，中国的金融边疆要建设好，不能无原则地放开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让外资进来肆无忌惮的抄底购买中国的廉价资产。现在到了危机的下半场，是博弈谁为危机买单的时刻，中国不能成为被渔利者。中国手里还是有牌打的，因为中国虽然没有超额准备金，但中国维持法定准备金在历史高位，是有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手段和空间的，虽然比不了控制世界金融的美联储，但处境也比世界其他国家有自己的优势。

对于中国金融系统的压力，QE 退出与其他因素叠加成为灾难，银行间利率爆表。2013 年 6 月 20 日质押式回购市场上，短期资金供给近乎枯竭，隔夜和 7 天回购开盘利率分别达到 10% 和 12%，无奈供给依旧难觅，成交价被一路抬高，隔夜回购成交水平在 10 点 47 分后直接被拉到 25% 的高位，11 点 48 分之后

更是攀高至30%，7天回购利率在11点后也被抬高至25%的位置，这是一个历史记录的位置。有人借此妖魔化中国的金融政策，但这种情况在海外算正常，中国还不习惯，银行反应过度而已。中国这样求助似乎就是错误，海外银行被挤兑到央行贴现是正常金融业务。中国央行说向金融体系注资500亿元，这个规模实际上是不大的，比起美国参议员桑德斯的报告说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给市场投放了16万亿美元的资金，这根本不算什么。央行再贴现本身并不是量化宽松而是中央银行的日常业务，中国的银行应当学会及时向央行贴现，现代金融制度建立央行的目的就是央行作为最终再贷款人防止挤兑的发生。中国融资融券时间不长，操盘手们还未尝过市场大规模爆仓的滋味，一味大杠杆、一味乐观非常危险，大机会是在套牢盘变割肉盘之后的。就像运营水库，关键是水库久旱，见了洪水想多储蓄水，结果是大水来了超预期，水库满了未防洪、泄洪，把水库冲垮，水库蓄水成了洪水，成了大灾。对于这些金融操盘手是一定要让他们知道风险的，美国2008年是可以让雷曼倒下的，这个倒下是让人出乎预料的，如果一味地救市则让这些金融操盘手没有了顾忌，等真的救不了了怎么办？中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以上看似很高，但还没有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多，真的被金融攻击也是很可怕的。央行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大局负责，而不是对某大行负责。现在也有大量传言和辟谣说某核心银行的违约问题，这肯定是有背景的，不能倒逼政策。美联储也可以让雷曼倒下！如果总保着不倒，等真的保不住了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危机。现在能让之暴露问题是重大进步，某行真的垮了，后续处理对老百姓与富人、正常商务与违规热钱、隐身外债都可区别对待，这也是国际惯例。必要时必须让影子银行、潜伏外资热钱和隐身外债的相关者遭受损失。坚持既定政策是不易的，而央行的区区500亿元就让有关利率均大幅度回落到合理的水平，说明问题在操控范围之内，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不能被想象出来的恐惧逼迫出台有利于食利者的政策。

综上所述，美联储的QE就是服务美国金融霸权的大棒，在QE下还有超额准备金等多种手段。美元是否宽松，不单单是QE所带来的基础货币，还有美元货币在金融系统的衍生情况，也就是货币乘数的大小。美联储虽然在收缩，但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悄然走出了去杠杆周期，美国金融体系的杠杆在加大，金

融体系对流动性和定价权的操控在加强。对此中国应当有风险意识，保护好民族产业，坚持既定的政策，不要被身披改革外衣的带路党忽悠，维持现有的稳定，坚持下去等谁倒下为危机买单，绝不能成为危机的买单者。

QE 政策对于未来的深层影响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不断 QE 下去会怎么样？继续 QE 则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就要开始发挥作用，收益不断减弱，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债等收益率极度低廉、低利率已经长期化；而有利差的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在经济过热下积累，收益虽然高但风险也很大，无风险收益率非常低，尤其中国制造业进入升级调结构以来总体风险均加剧。美国的 QE 进退两难，没有明确的选择方向和药方，可以看到下一次危机的端倪了。

笔者一直在说主导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主轴是资源国、金融国与制造国的博弈，在 QE 的初期肯定是资源价格上涨，有利于资源国，美国等金融国印钞也会获得红利，只不过资源国的得利要超过美国，而对美国的好处是渡过危机，只有制造国是吃亏的。但随着制造国的产业调整后进入人力成本上涨的周期，通胀压力就要还回去了。更重要的是 QE 会对于实业的投资有挤出效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高利差会吸引更多地资本，QE 国的国内资本外流对于国内的制造业打击是很大的，就如发明 QE 的日本一样，大量资本外流导致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同时也造就海外日本产业 GNP 是国内 GDP1.5 倍以上。

QE 造成产业空心化会怎样？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远不如中国了。很多人说投资海外以后虽然 GDP 低了，但 GNP 的数字是很好看的，中国从来不说 GNP，因为中国的 GDP 减去外国投资的 GNP 是要比官方公布的 GDP 数字少很多的！但 GDP 与 GNP 对于中国有利的关键问题在于征税权，产业在哪里，则平时可以征税，战时可以征收，于是平时是国家财政问题、战时则是供应问题。美国这次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大吉的财政危机，其产业空心化导致税源大量流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税收不足则导致更大的赤字，发行很多的国债和进一步的 QE、进一步的货币贬值和空心化，这是一个正反馈的循环。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 QE 的间接负面作用，就可以理解美联储为何会缩减 QE 规模，但 QE 对于美国经济的支持重大，QE 规模的缩减幅度有限，还会不断反复的。

不搞 QE 则国债违约，期货、股票等金融体系会崩溃；继续 QE，虽可以缓解债务上限，但产业会继续空心化，预算会更加紧张，更需要钱，更需要撙节和削减公共开支。因此现在美国在 QE 的问题上实际是进退两难的，美联储的决策现在看来应当是准备把这个难题交给下届主席，因此谁当下届主席很关键，而几个重量级人物也回避当这个主席，不想接手烫山芋，因而这个传统上都是男人的职位第一次迎来了一位女性领导人耶伦。问题无解就是新的危机！而 2007 年次贷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迄今已经过去五六年，再过两年后就是七八年，按照经济周期律就该是下一场危机周期的开始了，所以到 2015 年又将是世界经济的一道坎，中国、美国、欧盟将展开生死竞争。只要中国、德国和俄国三个欧亚大陆国家紧密合作，共同防范 QE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宽松的美国就要为其前面进行的 QE 付出代价。

事实上为应对美国可能退出 QE，中、德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为填补退出 QE 美元回流以后流动性真空，留下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巨大宽松空间。一旦 QE 结束、美元外流后央行可以迅速进行货币宽松，弥补国内流动性的不足；中国还有外汇资本项目管制的金融壁垒，房地产的限购也限制了资本的套现外流，所以应对 QE 退出中国手里的金融牌还是很多的。中国的风险主要在政治层面，美国也是从这方面攻击中国。

在下一轮危机当中，同样紧缩货币的中、德等欧亚大陆核心国家会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而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的背后是豪赌美国不会退出 QE 或者只是有限度地缩减，与美国同步推行宽松政策的日本等国因其庞大的海外资产以及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决定了其国策必定是抱紧美国；俄罗斯是中、德的资源版图，且与美国同样是竞争关系，是天然的盟友，这已经是一个世界地缘政治斗的大棋局，战略形势与二战前夕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央行大量美元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则会受到全球美元流动性变化的较大影响，尤其是激烈冲突的时候，会如二战时德国的道威斯债券、杨债券一样成为包袱。

当年美苏的冷战是政治挂帅，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辅之以经济利益；2008 年金融危机后导致的下次大国博弈则是经济利益对抗为主，各国在博弈全球信用体系，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减弱。2008 年金融危机与 QE 造就了新型国际社会秩序，所谓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绝非只是纸上谈兵，此间深意和新

意，经济纽带和政治抗衡的相对势移，值得战略家和投资家们反复思量。笔者认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在全球信用体系中进行相对位置关系的角力。中国战略博弈的智慧源远流长，眼下我们在金融上握有一手好牌，在实体经济方面成为世界工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这信用体系的博弈，是全球宗教、国家和资本三权分立的经济政治博弈新格局。

在新经济危机引发世界新一轮冲突中，军事冲突应当只发生在局部，主战场则是经济战、网络战、货币战、信息战等新型战争状态。笔者认为更关键的战略争夺则是在意识形态和信用体系上进行的信用战，意识形态就是公信力，国债就是国家信用，而货币金融契约都是信用的不同层面。中国不是政府重获公信力、凝聚力而国家崛起，就是国家崩溃，重走苏联老路，因此眼下是中国和世界历史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期，上升提升还是向下沉沦，是各国国运的一个节点。

QE 带来的就是国际阵营的重组，能够 QE 的和不能 QE 的要重组，是抱定“老大”合作，还是以 QE 进行分野，都对世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对于 QE 带来的深远影响要有深刻的研究，QE 已经不是一个危机政策和应付危机的手段，而是一种长期博弈的武器和阵营的区分标志了。

看日本知美国：低利率取代 QE

对于未来美国的 QE 走向，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发展看出美国的动向。美国未来必然是以低利率为核心，为了让利率降低，是有很多办法的，就如笔者讨论过的降低或取消超额准备金利率，一样可以带来资金巨大的宽松。由于 QE 被全球道德关注，美联储采取其他工具也是可能的，对于美国而言，更关键的是低利率。所以我们看到 QE 不断地缩减规模，但低利率是不变的。2014 年 6 月 19 日美联储会议声明，美联储再度缩减 QE 规模 100 亿美元，美联储的 QE 规模已经是只有 350 亿美元了。但在此次会议上，FOMC 还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不变，符合市场广泛预期；同时指出在资产购买计划终结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当前区间很可能仍将合适；尤其是，如果预期通胀率继续低于 FOMC 的 2% 长期目标，并假设长期通胀预期仍很稳定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这再一次确认了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长期化，尤其是这个政策是在欧洲宣

布实行彻底的负利率几天后发布的，更显得重要！在欧洲施行负利率以后，在全球利率的对比下，美联储更有条件实行低利率，而且更有条件在缩减 QE 的情况下实行低利率政策了。

为何美联储要维持低利率，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贷款和债务维持的世界，美国社会对于贷款利率的提高是难以承受的。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到 2013 年末已经是负债超过 16 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可以预见的就是美国的政府负债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可能，美国下一步怎么样走，从日本就可以看出了。原因就是日本也是政府负债极高的社会，全球发达国家负债率最高的就是日本政府，日本国债达到了国家 GDP 的 200%。如此高的负债必然的结果就是利率只能降低，如果利率升高日本政府就要陷于庞氏骗局之中，政府的收入都赶不上要归还的利息，这在金融的概念里面应当属于标准的诈骗。现在西方国债的遮羞布还在于支付的利息是有限的，政府的收入还是高于支付国债利息很多的，虽然国债的收益率已经低于美联储的利率了。如果未来利率走高，美国就要崩盘。低利率政策是有日本现有的经验在的，日本也是最早实行量化宽松的国家，日本这个政策搞了 20 年，是一个失去的 20 年，但日本政府维持运转良好，日本财团在危机当中还是有发展的。

具体到美联储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任后（2014 年 2 月 11 日）的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耶伦强调了政策的连贯性，表示仍将坚持美联储缩减 QE（量化宽松）的政策。耶伦总结了美联储半年来所执行的货币政策，强调美联储将继续执行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已连续两次、每次缩减 100 亿美元购债规模的情况下，将依据最新就业、通胀等经济数据，以循序渐进的步伐降低购债规模。耶伦的这一表态似乎是她要认真考虑退出 QE 了，但她更重要的是强调：即使失业率降至 6.5% 门槛以下也不会提高联邦基准利率！而是根据美国整体经济前景、能否促使美联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使命来决定是否需要提高联邦基准利率。耶伦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表示，而不是紧缩。QE 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压低利率，因此她对于利率的表态是更为关键的，与这一次的表态相比，此前美联储在最新政策声明中称，如果失业率高于 6.5%、未来 1～2 年通胀预期不超过 2.5%，将继续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0～0.25% 的超低区间；而现在变成了即

便是失业率降至6.5%之下，仍可能保持这一超低利率。这是一个明确的实行低利率政策的表态。对于这个表态市场反应是非常明确的，全球市场应声大涨。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的利率便一直保持在接近于零的超低水平，美联储同时依赖资产购买和前瞻指引两大非传统工具帮助美国经济向最大化就业和价格稳定方向迈进。美联储的资产购买和前瞻指引就是利用央行的货币能力，主导全球的定价体系，为美国输入渡过危机的财富。耶伦强调该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了消费者支出、商业投资和房地产的回暖。房地产的回暖更是增加了美国家庭的财富，当前美国资产为负的家庭占比已降至12.5%，两年前这一比例为25%。美国在低利率下取得了巨大的财富，这些借贷家庭均因为低利率而得益，而不得不持有美元的全球实体、机构和个人则为这个得益来买单，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的价值博弈过程。

对于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的姿态，美国众议院与此同步表决通过无条件暂停债务上限至2015年3月。美国国债的大发行也是必然的，低利率支持了美国继续的财政宽松。不过美国政府只要是债务不断发行，为了政府的收入和低利率必然会有大量宽松的流动性来买入国债。如果流动性不足，美联储实质上也不排除再度放大购买国债的规模。对这样的历史经验再看一下日本就足够了，日本安倍在2013就再度大幅度地QE了一把。美联储对于QE的缩减和增加，未来很可能成为一种调控手段，就如我们央行的央票和逆回购的加加减减一样，而美国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低利率维持国债不要破局，要给足够的流动性。

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元低价格的政策，这将导致美国资本的成本比其他国家更低，有利于美国资本的输出。美国资本与世界其他国家资本的巨大差值，就是美国套利的利益来源，套利的规模不是以QE出来的美元来计算，而是要以美国在全球资本的总规模来计算的。想一下美国的黑石公司就管理了3.5万亿美元的资产，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规模是何等的巨大！美国资本的低成本和QE带来的丰富流动性，为美国的资本定价权带来了决定性的支撑。QE美国取得资本定价权有重大作用，这个作用更关键的就是资本的价格利率，因此QE变成低利率政策，也是回归了问题的本质。日本的低利率和QE，就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海外资产，现在日本的海外GDP已经是

国内 GDP 的 1.5 倍以上了，日本的相关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案例对全球都有借鉴意义。

因此对美联储的 QE 走向，日本的 QE 历史已经给出了经验和方向，低利率和 QE 带来的资本输出和资本定价权，带来的国债低成本，都是金融国的巨大金融红利，这样的红利资本家们会放弃吗？所以未来世界走向低利率，QE 成为一种央行金融工具而常态化，是大概率的事件。

第六章

微观调控与打破定价霸权

中国要崛起会面对怎样的风险？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的风险有多大？宏观上在世界一体化和西方定价霸权下中国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应当如何学习日本在微观层面解决问题？微观调控理论对中国有现实意义，央行的新工具在微观流动性控制上具有重大意义，控制流动性和金融价格利率才是中国取得全球价格体系定价地位的关键。

第1节　要有再次危机的忧患意识

2008年的金融危机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此后世界进入激烈博弈的历史时期。经过不断地量化宽松以后，虽然依旧问题多多、经济不振，但人们似乎觉得危机已经离我们远去，再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提在嘴边已经是不时髦的事情了，但笔者认为这次危机的影响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再次危机一触即发。

按照西方的经济周期律，一般是7~8年一个周期，社会主义学者称作“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2000年左右网络泡沫破裂，7~8年后出现了2007年次债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也快七八年了，将要进入到下一个经济危机周期。现在似乎还很安全，但美国国债继续高企、股市迭创历史新高，这本身就是危机的来源，而不是远离危机的繁荣。现在西方并未发生足以导致西方能够摆脱经济周期变化规律的因素，我们要有危机随时发生的忧患意识。

下一次危机会在哪里发生？是利率！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为了给这个泡沫买单，资本大鳄们策划了大宗商品牛市，各种金融衍生品泡沫空前发展，终于引发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此后美联储的利率一夜之间从5.25%的高位降低到0.25%，并且开始了四轮QE。现在提出了低利率政策长期化，是不断以新泡沫掩盖旧泡沫，其实就是以定价权进行价值输送，解决危机——以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的利润对冲网络泡沫破裂的问题，然后以低利率带来的货币利益对冲金融衍生品的损失。但利率代表资本的盈利要求，低利率其实就是一种资本泡沫，因此资本流动性涌入和利润回报参照利率低下，才产生了美国股市的牛市。这个牛市的背后并不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是QE催生出来的。美联储QE，日本也QE了，发达国家各国都在宽松货币，世界有那么多盛泡沫的池子吗？

西方长期内部低利率，造成不切实际的投资过热，盲目投资的结果必然是

实体经济风险加大，市场风险加大，风险利率会走高，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会分化，就如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处在历史高位一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QE下会逐步忽略风险，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利率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相比发达国家的长期低利率政策美元会持续外流到高风险的领域，引发发展中国家通胀，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进一步外流。矛盾是加剧的，一旦有风险猜测，资金又会蜂拥奔逃，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动荡。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利率下，形成了畸形的套利市场，使用汇率掉期NDF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利差的套利，也就是说把在美国贷款的美元存在中国，然后买一个人民币汇率掉期合约，中外利差可以超过10%，而汇率波动风险以NDF对冲，再把存单到美国再融资，进行杠杆放大，可以套取大量利差，而且通过金融衍生套利的规模可以放大很多倍。同样美国的短期利率非常低，只有0.12%左右，但长期利率很高，这样就可以如中国同业拆借养理财产品一样搞以短养长，而且中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对于利率的波动没有金融衍生品对冲风险，而美国则是有利率掉期合约的，还有利率掉期衍生品交易市场（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就是两个主体之间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一方与另一方在规定时期内的一系列时点上按照事先敲定的规则交换一笔借款，本金相同，只不过一方提供浮动利率（Floating Rate），另一方提供的则是固定利率（Fixed Rate）。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汇率掉期NDF和利率掉期规模是远远比信用掉期合约CDS要大的，这样大规模的套利加剧，利率掉期和汇率掉期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在加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信用掉期合约的危机，而美联储的QE和低利率政策救市就是让利率掉期和汇率掉期给信用掉期买单的。美联储不断地QE而且扭转操作卖短买长，就是要压低长期利率，减少通过利率掉期赚取套利的空间。

利率掉期合约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工具，如果这个市场崩盘，则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将无法维持，利率的增加对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国债而言是灾难性的。美国国债总额目前已达16万亿美元，而在奥巴马2009年就职时是10.6万亿美元，美债的暴增已经于2013年让美国政府停摆关门一次了。对于美国经济一大堆人在说美国复苏，但这个复苏是建立在低利率的基础上的，一旦通胀暴起以及利率被迫增加的情况出现，美国政府的债务必然无法控制。因为利率带来了政府

债务付息的增加，而通胀又使得政府财政支出的刚需增加，而收取所得税不是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收入增长是有限的，因为通胀带来的成本会让所得下降。

汇率掉期和利率掉期的共同风险会导致在新兴市场套利的大量资金处于非常不安全的状态。这些资金大量回流的结果就是新兴市场的流动性资金危机和发达国家资金涌入以后的通胀危机。这个时候新兴市场利率暴涨，但没有了利率掉期和汇率掉期的保障，则再高的利率也不能阻止资本的出逃。危机发生的结果就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可以不断地 QE，维持低利率，而通胀和汇率均稳定的局面在西方不存在了。外部流动性回流，而不是输出造成西方流动性泛滥，低利率与通胀不可以同时实现，美国实际上已经受到此方面的压力，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已经处于下滑状态。所以美联储要缩减 QE 的规模，而西方的实际就业形势并不好，没有涨工资的空间，所依赖的 QE 政策中止，必然是大量中产阶级破产。世界的前两轮危机分别发生在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和欧洲（2010 年欧债危机），因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危机开启新一轮危机的概率是很大的。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问题就是国内的高息。为了防通胀而紧缩货币造成的高息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政府借贷都需要走理财信托，利率都可以在 10% 以上。西方的观念是现在 7% 以上的利率就是经济难以承受和不可持续的，而在中国对于产业小贷公司方兴未艾，小贷公司普遍的利率是 20% ~30%，中国微观上的私人民族产业基本的融资途径就是小贷公司，银行贷款很难，小贷公司能够贷款就很好，很多还必须高利贷才行。社会利率高企，实业难以承受，风险加大，外资出逃就是必然的了。中国虽然经济增长有压力，但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还是相对好的。新兴市场的大规模灾难是可以引发世界的动荡的，2000 年的网络泡沫破裂与 1997 ~1998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相关的。中国当前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处境非常像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中国香港，但当时香港有大陆的支持，现在中国只能靠自己，太多的竞争者想要落井下石，从中渔利。

因此在看似平静的这几年，世界是通过注水来饮鸩止渴的，在平静的表面下早已暗潮汹涌，我们要有危机一触即发的忧患意识，时刻防范一些国家利用危机掠夺中国财富。

第 2 节　认识中国的微观风险

宏观调控的微观悖论

中国动辄宏观调控，但效果却不是那么有利，对于房价的调控被指责为越调越高。对于应对危机的 4 万亿宽松则带来了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和通胀压力的指责。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对此我们要对宏观调控的问题有所反思。

中国的宏观调控之所以效果不好，笔者认为是受到“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但现在我们的外汇管制要深化改革、要打破，而且在此前一直是越来越自由的状态，外汇稳定也是我们需要的，当然独立货币政策是国家主权，我们更需要。但在国际金融霸权之下，美联储的政策才是国际上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是可以让外来资本套利的，套利的结果就是给中国市场带来巨大的流动性泛滥和通胀压力。

中国不断地收紧流动性，带来的客观效果就是在微观上压低了劳动力的收入，压低了工资。因为每一个微观企业在流动性紧张的时候，定价能力不足，从而价格降低，确实是压低了通胀，但也使得我们的出口等低价，让全球享受了我们的低价，企业低价后只有内部压缩成本，能够压缩的只有工资！行业的企业都是这样的情况，一致压低工资，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的整体下降，起码是不涨，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工资 10 多年来涨幅不大，老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引发众多的社会矛盾，控制商品价格的政策带来了压低工资的效果。价格是下来了，但老百姓的收入下来了，是否合算呢?

在房地产、农产品领域，由于刚需的存在，宏观调控的流动性紧张不是让企业贱卖而是向下游转移。由于能够转移，流动性紧张带来的高利率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渔利，造成流动性的泛滥，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不但房价越调越涨，农产品也不断出现“蒜你狠”、“姜你军”等涨价故事，宏观调控在微观

上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是因为在“刚需”的领域，“刚需”下的供需曲线是有特殊性的，因为刚需难以替代，涨价会产生恐慌性和投机性需求。在涨价下需求不是降低，反而可以提高，因此在这些刚需领域造成微观上的调控悖论。

还有就是宏观调控的紧缩带动利率的增加，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掌握流动性的银行因此一个个利润丰厚，而缺乏流动性的实业却因为高利息的盘剥步履维艰，在宏观上的统一行为却造成了微观上的失衡，给中国产业造成巨大的伤害。

所有这些宏观调控在微观层面出现了背离的情况，给社会带来微观层面上的风险，而微观层面上的风险更应当通过微观的手段解决，以宏观手段处理微观问题，就如大炮打苍蝇，事与愿违是难免的。

流动性陷阱

做金融的都知道对冲基金是风险最大的基金之一，但如果看他们的操作，却都干着看似无风险的套利活动，风险在哪里呢？就在于所谓“流动性陷阱”，流动性对于对冲基金这样一个大杠杆操作的天量资金来说，经常是不足的，而且流动性的变化经常是致命的影响。

大户持有高额的股票不是能够立即变现的，因为一旦准备立即变现大量抛售股票的话，股价就是灾难，原因就是市场的流动性相对于该大户要抛售的股票是不均衡的。投资者计算价值的时候是参照市场价格静态计算的，所参照的市场交易量相比要交易的股票是可比的，而抛售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交易量要大幅放大，在动态下市场是没有那么多的流动性的。就如你要卖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也就是 MV 不够，则你卖出股票就是增加商品 T，按照费雪方程式 $MV=PT$，必然是价格 P 的下跌；如果你要买入股票，你的资金增加了 M，但交易的股票是商品 T，没有增加，结果必然是价格 P 大涨，涨跌的幅度看你交易的数量与原有的数量相比如何，以及与货币流通速度 V 和其他所有者参与交易的 T 的变化有关。

投资者交易股票往往按照市场价格估价，但如果因交易数量巨大导致流动性不足的话，股票价格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单个投资者的交易数额并不大，但是有很多人与其采取类似的策略，这样的策略下实际上的

交易量是巨大的，从而产生共振效应。如光大乌龙指事件，2013 年 8 月 16 日 11 点 05 分上证指数出现大幅拉升大盘，一分钟内涨超 5%。最高涨幅 5.62%，指数最高报 2198.85 点，盘中逼近 2200 点。乌龙事件中共下单 230 亿元，成交 72 亿元，涉及 150 多只股票。这 72 亿元的成交与大盘千亿元上下的成交量相比数量是不多的，但我们事后发现中国有几十家券商都在使用同一家交易软件服务商——上海铭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虽然说服务商承诺给每一个券商都提供独立的交易系统，但他能够做几十种模型吗？最多是模型的参数有一定的调整，这些券商使用共同的软件，结果就是交易的共振，这个大交易对于市场就是流动性的灾难。还有就是 2013 年 6 月著名的钱荒，背后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财产品集中到期，虽然每一个产品的数额不大，但集中到期导致的还款需求让人们将待还款的货币处于趴在账户的状态，市场上流动的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大减，流动性一下子不足，造成各种市场的价格大跌。

更关键的是中国特有的金融结构，在发生恐慌的时候会出现流动性灾难。西方的资产结构是借贷消费，老百姓是没有多少货币资产的，金融资产也是有限的，在危机和恐慌当中，老百姓难以拿出多少钱来抢购，甚至是由于借贷消费结构，恶性通胀反而是可以得利的。但在中国，大量的老百姓拥有储蓄资产，甚至老百姓的主要资产就是储蓄，在通胀的压力下一旦出现恐慌，对定期存款也是可以放弃利息支取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大量货币的流通性质从广义货币 M2 变成了现金 M0。货币的流动速度突然加快很多倍，导致流动性也迅速放大很多倍，按照费雪方程式，流动速度的突然倍增会导致价格突然暴涨很多倍。这就是流动性的灾难，我们必须引起重视。随着老百姓提现购物，M0 暴增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流动性不是简单的增长，而是一种失衡出现了。在老百姓的日常消费领域由于 M0 的激增和抢购会暴涨，同时在其他资产领域尤其是生产等领域还会导致流动性的严重不足，因为大量的货币从 M2 变成 M0 以后，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的衍生将不存在了，总的货币数量将下降，也就是说货币乘数下降，银行的存款大幅度减少，银行会被迫收回大量的贷款以保持资金平衡，而央行则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继续提供流动性则通胀更为紧张，如果不提供流动性则实业等领域流动性不足，会让高利贷横行。中国现在防通胀和高利贷增多、利率增加，就是这样的难局的体现，这也与我们的金融结构，以及在这个结构下

特有的流动性陷阱有关。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进行结构调整，而调整就要有损失和付出，到底让谁受损？既得利益者是不能接受的。

所有这些就是流动性陷阱，在平时难以看出其存在，但一旦触发，就是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价格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业拆借蕴藏巨大的风险

中国金融当今的热点就在于同业拆借市场，在紧缩不断持续之下，这个市场成为一个银行流动性来源的市场，在银行流动性不足的时候，都要依靠这个市场。

但在中国，银行没有破产，企业破产银行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情况下，各种高利贷都愿意变成银行债权过桥的形式，通过银行给企业，但中国又是一个金融管制的市场，对于贷款的利率，是受到央行管制不能太高的，而社会上流动性紧张，高利贷的利率已经攀升到历史高位。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差，如何能够在这个金融缝隙当中渔利，就是所谓的金融“创新”了。

银行要放高息，只有搞理财产品，对于理财产品号称是不保本，但在实际运作当中理财损失风险还没有释放，金融企业需要利润，参与理财投资就是必然的了，只不过这些不保本的理财是不能使用存款来投资的，那资金怎么来？资金就是从同业拆借来，在 2013 年的同业拆借市场，大多数时间的利率都在 4% 左右，而理财的收益率在 10% 以上，房地产企业被调控，理财甚至可以到 13% ~14%，这里面的利差有 6%，甚至 10% 以上，比正常的存贷利差 3% 左右高多了，而且不用占有资本充足率，这是表外业务。因此这样的通过同业拆借市场，拆借短期资金来养长期的理财投资产品，让金融业像吸入鸦片一样疯狂，中国的表外业务也因此迅速的达到了万亿元以上。但这样的同业拆借以短养长的做法，流动性风险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特别的时间节点更是如此。

中国同业拆借投资理财产品的泛滥，所带来的流动性影响是长期性的，这里面在特殊的时点会产生巨大的流动性危机，这样的危机使得你看似完美的套利变成了风险，这样的陷阱是平时被隐藏的，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并规避其存在的风险。

套保套利要当心市场的流动性陷阱

2012 年 2 月 3 日，中金所修订出台《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与套利

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在进一步优化套期保值管理业务的同时，引入了套利业务的制度措施。这是股指期货上市以来，中金所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创新举措。与早前套期保值管理办法很明显的区别是《办法》延长了相应有效期的使用。在《办法》第十条，套期保值、套利额度自获批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可以重复使用。此后仍需要进行相关交易的，应当在额度有效期到期前10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出新的额度申请。在早前套期保值管理办法中，有效期仅是套期保值额度自获批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时间延长到12个月，更大程度方便了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入市，优化了套期保值与套利交易的参与程序。

对于当今中国的股市，越来越进入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时代了。很多人都说市场机制这样就健全了，可以做空了，有了股指期货还可以套保了，更有人说在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的差别上是可以套利的，似乎市场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各种规则的出台都是利好，对于其中的风险是没有人提及的，这样的风险在哪里呢？期货交易的新规大幅度放开了套利的规模，对于这种套利所需要的市场性风险却没有足够的涉及。在流动性规模不足的情况下，放大套利规模会造成流动性陷阱。

对于股指期货的推出，很多分析文章都把推出这个工具的意义放在了套期保值上，也就是可以反方向的运作股指和股票，从而就可以达到保值的效果。对于在熊市的时期，机构有最低仓位要求，不能空仓，以及机构有大量股票难以抛售的情况下，就可以应用这个金融工具进行保值了。同时现在很多机构也推出了套利的投资计划，也就是当股指的期货和现货的差值出现偏离的时候，操作者可以针对这个差值进行反向操作，把差值的利益套取出来，这样的套取似乎也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获利渠道。由于有套利的存在，即使是大家对于市场的远景预期与现在偏离很大，通过这样的套利也必然让远期的股指与现在的大盘的差距缩小到套利差别在融资利率之内。套保和套利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套保是在你持有一个方向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在其远期交易上反向操作，而套利是当现货与期货出现差价的时候对于这个差价反向操作，以反向操作对冲市场的波动和风险为操作的核心。

对于本来看似没有危险的套利和套保，我们就是要认清其中的风险和忽悠

投资者的逻辑在哪里。对于对冲基金的投资大家都知道风险巨大，但是对冲基金是以高杠杆捕捉微小的套利机会为投资理念的，按照这些套保和套利的理论对冲基金应当是无风险套利才对，这些对冲机构怎么是风险最大的？这里的关键就是要认清其中的流动性陷阱，这些套利、套保当中对于流动性的风险在他们给投资者的逻辑里面是没有计算的，而出现了危机以后会因为流动性的问题造成系统崩盘，再加上对冲机构的超高杠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血本无归，所以加上流动性的风险，很多看似安全的套保和套利就要出问题了，他们说的套保和套利的逻辑里面有一个流动性的陷阱。认识流动性是市场经济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信用体系里面，要达到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市场出清，也就是市场可以让价格迅速达到均衡点，关键就是要有足够的流动性，没有流动性则没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就要有巨大的风险，甚至崩盘。

怎么讲流动性的陷阱呢？就是大家讲套保和套利，同时操作了反向的股指和股票组合，看似很准确的保值，Hold 住了，但是到期你要平仓的时候，是否能够同时把股票和股指都成功地抛售出去呢？你能够同时将二者抛售的前提就是市场上要有足够的流动性，你一抛售就有人接盘了。事实上只要你的资金是比较多的，就很难做到一起抛售，在抛售的时候就要对于大盘产生影响，会吞噬你的利润，尤其是股指期货，到期是强制性的交割，可以不计算流动性，但是在股指到期的时候你的股票却难以一次性抛售，对于大盘不产生压力。不能立即按照市价平仓的结果就是套保和套利的反向操作对冲风险的机制失效，甚至在金融危机导致系统崩盘的时候这样的流动性风险还会大于市场波动的风险。

对于股市的套保和套利，实际上是需要有大量的散户和投机者存在才可以的，他们的存在造就了充分的流动性，等到你平仓的时候能够保障你随时可以抛售兑现。没有这些人的存在，等你需要抛售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按照预想的接盘，套保或者套利就不成立了。所以套保或者套利的无风险必须是建立在市场存在比套保或者套利人多得多的散户和投机者的情况下的，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套保了，谁能够保谁呢？套保和套利是需要有大量的散户和投机者给你买单的！所以在套保和套利的模式下，过程都是看起来很美的，但是到最后揭开锅盖的时候，风险才会显现，也就是要到大潮落下以后才可以看到谁在裸泳！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各路金融机构为了所谓的安全进行套保，为了所谓的

安全套利而对冲，结果就是危机来临以后，发现大家都是裸泳者，大家都是按照几乎相同的理论模型进行套保或者套利，没有多少投机者提供流动性，谁能保谁？市场没有这么大的流动性来保护你，大家都是在套利和套保的，怎么可能不一起巨亏？在系统性的崩盘下就如跌停的股票，价格再低没有流动性接盘也卖不掉的，连续跌停造成的损失早已经超过了套保和套利那一点利益。

中国的股市和股指实际上也可看到类似风险的端倪，中国的股指期货散户已经被杀得很少了，股指期货一个合约的交易量甚至最高达接近3500亿元，而相关的股票的交易额只有四五百亿，只不过是股指的几分之一，这样多的人在股指上套保和套利，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如此巨大的交易量差别，流动性肯定是不足的！很多人也许会说股指是T+0的交易，比股市T+1的交易量当然要多，这里我们且不说T+0与T+1之间本身的差异就可以造出流动性的不均衡和风险，股市与股指不计算浮盈浮亏下的实际盈亏额的大小是以点位和成交量的乘积来计算的。这就意味着股指产生的实际盈亏是相关股票的近十倍，而套保和套利的基础都是在股指和股票之间盈亏对冲。股指和股票二者之间的盈亏相差是有限的，这么大的差距下如果机构的资金要被赎回挤兑的话，必然是一场流动性灾难，必然要造成系统的崩盘。

此外市场的走势因为这些套保和套利的操作是会发生扭曲的。套保和套利本身就是要市场买单的，在市场走熊的时候由于有套保和套利的存在，肯定会让市场在原来的走势上加剧，并且随着套保和套利的步伐被套保或套利的节奏所控制，也就是要投机者为此买单的具体体现。由于投机者要为套利和套保买单，原来投机的零合游戏就要变成损失巨大的赌博，早期进入股指期货的投机小户都已经输光筹码，出局不玩了。股票的僵尸账户也越来越多，虽然是有市场的原因，但是也有套保等带来的改变。这样市场的构成就要发生改变，如果市场全部是套保和套利者的博弈，肯定是流动性陷阱重重，风险巨大，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套利、套保的对冲基金被公认为风险巨大的原因。

对于股市的做空与做多本身也是不对等的，原因就是在熊市的时候流动性要大幅度地萎缩，在流动性不断地萎缩下，流动性的陷阱是随之而来的。原来流动性充裕的情况可能随着市场的走熊而不断改变，尤其是对于套保和套利的行为，要占用大量资金只不过是小利和保本。在牛市的时候是很少有人进行套

保和套利的，反过来到了牛市末期大家都涨不动的时候会有大量套保和套利，更多的则是在熊市，熊市则大家都在亏损，不能空仓的人能够保本就很好，难以赚钱的资金会去套利，这样一来套利和套保的资金在熊市的时候和牛市到顶的时候就会迅速增加。增加的资金淹没在正常的交易当中，使得你并不知道市场真实情况是有多少的资金在套保和套利，等真的要揭锅盖的时候，市场可能就会发现市场的交易主要成为套保和套利者的市场，没有了投机者的流动性市场是一定要崩盘的。就如2007年次债危机以后大量的套保和套利的涌现，在次级债券的暴跌之中造成系统崩盘，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也是当今中国股市的重大风险之一。

综上所述，对于流动性的问题在很多人分析问题的假设当中都被遗忘了，很多推理逻辑是要以流动性为假设前提的，流动性的假设前提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假设前提，也就是要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出清假设，否则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就要有巨大的风险。我们的各种市场经济下的投资分析，都是基于市场可以迅速达到均衡点来进行的，但是没有流动性市场就难以迅速达到均衡点，甚至严重偏离均衡点。这就要造成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破局，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框架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了这个前提，所有的市场经济下的分析理论都是浮云。

中国高利率是全社会以价格买单

中国的利率非常高，民间普遍存在高利贷现象，在2008年以后中国的民间借贷迅速火热起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1年，银行信贷的持续收紧，让高利贷变得炙手可热。一项调查显示，温州有八成以上的家庭个人和五成以上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2011年温州担保公司数量迅猛增至200多家。在江苏泗洪石集乡，全乡5800多户人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就有1740户，参与者中有干部、教师、农民。而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高回报甚至让在京工作的白领不惜辞职回家做借贷生意。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民间借贷仍在一些地方以不为人知的方式疯狂生长，无数资金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这个看上去能让人一夜暴富的“新兴产业”。随着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最高峰时，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月

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高额的回报让上市公司等各路资金也参与其中，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沪深两市今年来已有79家上市公司发放139笔委托贷款，累计“放贷”金额高达203.24亿元，利率最高超过20%。另外，还有超过6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其中已实施的投资额超过100亿元。

随后中国高利贷出现崩盘，大量高利贷者跑路，著名的鄂尔多斯成了鬼城，还有搞高利贷的变成非法集资，其中的代表人物曾成杰被依法执行了死刑。随后就是同业拆借以短养长，信托、理财为幌子的影子银行兴起，小贷公司也兴起了，但这些理财信托从银行所谓的代理下进入经济领域，利率是10%以上，远远高于央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而小贷公司可以合法的是银行利率的4倍，再加上手续费、律师费等可以达到30%的利率。注意这些利率虽然比民间的高利贷低一些，但这是合法的利率，是有财产抵押保障的低风险利率。中国老百姓对高利贷的破产是一副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对于理财老百姓则是积极参与却忽视其中风险。对高利贷的破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高利贷自己的事情，他们借这样的高息是咎由自取，但高利贷、高利息的成本是要转嫁的，最后的成本都是要老百姓买单的。因此利率过高的问题是全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高利贷借贷双方的问题。高利率的成本通过价格和定价权，转移给了全社会，由全社会买单。

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中国同样的商品在国外远远比国内要便宜，外国到中国的进口商品就更加如此。很多人是以税收高昂和进口关税来解释这个问题的，但是细心的人们经过计算发现就算是加上这些关税与税收的情况后价格差别依然巨大。同时外国也有关税，有些国家是高福利、高税收国家，税率一点也不低。因此又有人说这是中国高速费等物流成本和灰色成本高昂的缘故，虽然这些成本是巨大的，但是外国的人工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对于这样巨大的价格差异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资金紧缺和高利率，尤其是民间高利率远远高于世界有关。可以看到中国的民间利率在我们数次紧缩以后已经极大增加，高峰时月息已经达到了10%的水平，这样的利率还是友情价和驴打滚。即使是利率水平低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利率一般也不会低于月息2%或者年息

20%的，这与当今世界利率基本为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企业做生意上，外国的低利率使得外国在华采购可以预付款，最起码是交货就可以得到现金。但是在中国销售产品就不同了，中国的超市等连锁机构给厂家的销售款结算的时间大多数都要超过半年，超过一年的也很多，企业间压款和拖延的情况极其普遍。在紧缩的时候企业间的债务坏账比例大幅度增加，这些都是企业的成本，这些成本都在紧缩下大幅度增加，最后这些成本只有计算到售价里面去，因此给中国国内销售的产品所制定的售价只能更高！对于外国在华的采购，因为能够付现金，企业为了得到紧缺的资金就会低价甩卖；更有甚者由于企业的流动性不足，为了避免资金链的断裂，很多企业会亏本卖给外资以获取资金生存，这些亏损也要加载到国内销售商品的售价之上，而这些企业被迫低价甩卖的结果还授予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反倾销的口实，因此这样的紧缩高利贷下就是中国财富的外流和中国老百姓被掠夺在高物价下，为高利贷买单。对于掠夺和侵害民生的政策，是应当立即终止的。想一下国内外利差和半年多可以达到50%以上的利率或坏账损失，中国内销产品比外国贵50%就不足为怪，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计算税收和物流等情况，就与大家看到的中外同种产品巨大的差价吻合了。这样的结果就是高利贷的成本和利息被转嫁，全部由中国的老百姓买单了。

还以房地产为例，中国的房地产领域房价高昂，但是开发商看似高利润的背后，也是高利贷的天堂，这些高利润经常是绝大多数被高利贷所占据。在老百姓高价买房的背后，就是高利贷在房地产开发过程当中的活跃。由于高利贷的支撑，造成了房价的居高难降，也造成了在高利贷成本压力下的价格不断走高，最后高利贷的成本就由买房人来买单了。中国的高利率环境让政府的很多民生建设也不得不借贷高利息，这些工程就是要以高收费来解决的，我们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比世界其他地区要高，就是直接与利率挂钩的结构，而政府的土地开发成本也有大量的利息，这些也是以房价买单的。

高利率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向劳动者进行转嫁，在高利率的挤压下，企业的产品为了有足够的竞争力是不愿意加价的，面对高利贷所造成的高昂财务成本，最终的转嫁方向就是压低工人的工资，降低人力成本，这样的结果就是工人为高利贷买单，如果这样的行为成为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结果就是中国的人工工资被不正常地压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工资增加有限，就有这样的因

素在里面，劳动者的劳动力价格在为高利率买单。中国的财富分配在发生扭曲，我们GDP当中劳动者收入所占的比例直线下降，据统计资料显示，1978~1984年，劳动者报酬在略微上升，而1984~1994年在波动中略降，1995年之后是大幅下降，1995~2007年下降12.45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年下降尤为突出，劳动者报酬骤降5.25个百分点。我们现在是50万亿元GDP了，劳动者的收入下降10%则意味着在财富分配上资本等要多拿走5万亿元，这可是每年都在发生的事情，十多年累积下来是几十万亿的鸿沟，这已经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社会矛盾激化。

所以利率过高是全社会的问题，高利率经过转嫁会变成全社会买单，利率高涨是一个社会危机，绝对不是老百姓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情。国家干预不仅仅是解救高利贷的崩盘，也不是一些人指责的为高利贷放贷人买单，而是一个为国为民必须干的事情，对此政府不应当无作为。

中国债务危机的风险在乡镇

2013年6月银行间拆放利率爆表以后，对于中国金融危机的重视多了，对于中国政府的债务危机的炒作也多了，中国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也到地方去查了，还列举一些中国的省、市、县的财政收入严重收不抵支，严重的危害了经济发展，达到GDP的100%以上，等等。但这样的炒作实际是转移了方向，中国的债务危机真正的危险不在这些省、市、县地方政府，而是在更基层的乡镇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

中国县以上地方政府的债务虽然高，但是总体而言还是有资产进行保障的，负债主要是投资于土地开发和基础建设，这些投入是有相应的资产的，偿还债务也是可以通过资产的变现和经营收入来取得现金流偿还的。这一点与西方的政府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政府没有财产，要完全依靠税收来还债。同样是政府债，西方是信用债务，而我们是抵押债务，这样根本性的性质差别被西方操纵的媒体有意忽略。

但是中国的政府不光是省、市、县三级政府，还有镇乡、村呢！即所谓基层政府，这些基层政府也在大量负债，他们也有融资需求啊！但他们的负债没有足够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也没有进行足够的统计和调查，我们的审计只到

县一级政府，镇乡、村是不审计、不统计的。不过聚沙成塔，总量计算起来是非常巨大的，不比省、市、县政府少多少，这等于是少算了很大一部分政府债务，这个黑洞必须得到重视。镇乡政府负债很多是间接的，尤其是我们当年大量发展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与镇乡、村是紧密联系的。乡镇企业为集体所有制，与当地的老百姓息息相关，这些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就是镇乡、村，而且一些没有改制的还是基层政府的无限责任企业。这些企业的负债之庞大是我们无法小觑的！而且乡镇企业负债率之高也是中国的特色，企业的负债率可以接近100%。乡镇企业负债与镇乡政府负债二者是捆绑的，镇乡政府的收支也有很大部分是依赖乡镇企业的。

在当今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最受到压力、亏损巨大的，就是在竞争激烈甚至过度竞争环境下的乡镇企业。我们现在搞的治理、整顿、淘汰落后产能，基本被淘汰的都是乡镇企业的产能，这样的淘汰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乡镇企业的资产变成被淘汰的废铁，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下消失，会让大量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大幅度提高，甚至直接变成资不抵债！因此实业不佳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乡镇企业大量破产和镇乡政府负债的暴增。在中国经济所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当中，乡镇企业受到的压力是最大的。

现在有很多政策在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需求等，但是对于镇乡、村的限制却是没有的，基层政府是有自己资产的独立运作权的！比如村委会对于自己的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等，这些基层可以掌握的资产是巨大的，他们的实际运作能量是巨大的，而他们的投资则被限制和管理的并不多。基层政府开办乡镇企业是得到支持的，而他们的行为也与当地老百姓的财产息息相关。在经济好、财政刺激的大干快上中，这些基层政府及其乡镇企业的投资增长也是巨大的，但他们的投资效率和规模则是有限的，经济不佳时的压力是更大的。面对财务压力，这些基层政府的财政来源不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财政权，现在博弈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基层政府根本没有这些权力，他们财务出现问题就要搞乱收费，在乱收费被限制以后，就只有融资借贷搞投资，以投资收益维持政府运转。这里他们与乡镇企业的结合非常紧密，在这些政府缺钱时，乡镇企业即使亏损也会给政府融资，而政府则给这些企业作相关的担保，导致这些企业的负债与政府完全黏合在一起。现在经济不好基

层政府的开支就是靠其乡镇企业融资维持，这样的负债会不断扩大，最终不可收拾。

乡镇级别的负债问题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利率的高企，省、市、县有自己的融资平台，也可以给相关地方金融机构施加压力，取得银行贷款和信托，但对于镇乡、村基层，对于金融机构是完全弱势的，他们的融资需求只有通过提高利率来取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因此这些负债大多都是高利贷，在经济好的时候高利贷本身就问题多多，经济不好的时候肯定是难以为继的，而且这样的高利贷还有合法化的趋势！如果是省、市、县的政府负债，利率是银行利率还可以承受，即使是搞的信托理财的借款，理财等也是不保本的，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是有限公司，是可以破产的，如果谁借高利贷则不受法律的保护。但乡镇企业的负债是不同的，我们在前面政策的支持下搞起来了小贷公司，法律允许这些小贷公司的利率达到银行贷款利率的 4 倍，另外还有合法形式的手续费、评估费、律师费等，实际利率能够达到基准利率的 5 倍以上，也就是年息 30% 以上。在西方 7% 以上的利率就被认为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就是 7% ~10%，远远低于这个利率水平，根本是难以为继的。我们说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一度高达 30% 是匪夷所思，可是谁会这么高的借贷呢？这才是需要思考的方向。实际上小贷公司的借贷利率就有 30%，这么高的利率已经合法的存在于金融体系内了，当然会在在银行拆放时出现。

对企业影响最大的是实际利率，当初很多政府借贷的时候 PPI 接近 9%，银行贷款实际上是负利率，信托理财 10% 的利率也很可以接受，而且经济好，收益也高。但现在 PPI 一直是 -2% ~3%，导致企业的实际银行利率已经到了 10%，理财信托则在 15% 以上，这样的金融机构利率实际上就很难接受。省、市、县的政府承受这么高的利率以后则会对于下面企业上缴收入有更高的要求和节流各方给镇乡、村的拨款。对于基层政府的压力就更大了，再加上乡镇政府及其企业本身的实际利率负担加重，处于实际破产状态是正常的。

最近中国激进的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也有问题，对于农商行是不设贷款利率上限的，农商行的客户基本上是乡镇企业。这些合法的高利贷、准高利贷在经济不佳的时候借给乡镇企业，目标就是乡镇企业背后的乡镇政府。这里一些骗子和吹鼓手搞的所谓的金融改革刺激小微企业的政策，背后瞄准了中国的基层

政府，这些高利贷在经济不佳和小微企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赚钱而且趋之若鹜呢？放贷者不是傻瓜，背后有基层政府来买单，与其这样，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刺激，直接刺激也没有这些人的高利贷收益高啊！搞所谓的市场替代政府行为，最终政府买单的同时还要算上高利贷的利息！书斋里面的政府御用专家成为市场经济自由派脑残以后，就容易被忽悠。这里我们要充分认识一些“市场化”银行“赚得都不好意思了”的背后是什么！

合法的高利贷与非法高利贷是完全不同的，非法高利贷破局以后资产清理时非法利息是不会被承认的，政府不会被绑架，但合法的高利贷是不同的，政府相关责任人是被绑架其中的，合法的高利贷会不断借贷掩盖责任，会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把利息计入本金，结果就是负债不断扩大，而且在每一次新贷以后利息进入本金还被实际计算了复利，算复利的高利贷驴打滚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的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的负债现在就在这样的驴打滚之中，负债的规模还在不断暴涨！而在高利贷合法化和基层政府承担风险的格局下，外资热钱的进入也变得肆无忌惮，这也是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重要差别。在非法的情况下外资热钱大资金是难以进入的，但变成小贷公司和所谓的金融创新甚至是农商行存款等让之合法了，热钱就可以大规模进入了。2012 年底、2013 年初资金大幅度涌入是值得怀疑的，当时就是小贷等金融创新最火热的时候，因此对于这一政策背后的实际效果如何，是需要反思的。在高额利率和经济低迷收益萎靡下，这样的暴涨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对这样的庞氏骗局中国经济再好也顶不住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都被高利贷者渔利了，老百姓收入得不到提高，基层政府限于债务危机，未来怎么办？

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现金流付息，这个庞氏骗局就会继续下去，因为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上破局，只要自己的任期上没有问题，再高的利息和负债都是下一任的事情，而且在本来已经高企的债务和利息上政府也必须再融资再建设，因为这样干明的有政绩，暗的有灰色收入，就算主政者不贪，裙带们也要满足一下的。因此这样的经济上的庞氏骗局就演绎成为政治上的庞氏骗局，为了保一群官僚的官位，也要不断地借债融资下去，然后是寄希望不要在自己的任期上出事就好了。这样的故事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潜规则的存在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基层债务泡沫的发展，并且把危机隐藏起

来，直到再也藏不住为止。

对于基层政府的负债更关键的是社会效应问题，省、市、县的政府负债面对的很多是机构和有钱人，出了事承受能力是相对大的，但基层镇乡、村的债务危机爆发受到影响的则大都是当地老百姓和低收入人群，甚至基层老百姓的存款也裹挟在里面。这些合法的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农商行等股权、控制权已经被渗透，可以合法吸收老百姓的存款，然后贷款承接小贷公司的债权等，让富人先走，高利贷者先走。基层老百姓的债务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可能会因此失去一生积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于基层非法集资严厉处罚的原因。乡镇企业也是乡村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乡镇企业的债务危机也直接影响中国最基层的就业，就业如果再出问题，没有社保、低保的农民工就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镇乡等基层政府及其企业的债务，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的危害是巨大的，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在中国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这些人放贷也是有目标的，他们要以这样的压力倒逼所谓的“改革”，他们盯住的就是基层政府的资产，基层政府的资产最主要的就是集体土地。乡镇企业负债虽然高但是一般都占着不错的集体土地，搞土地的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和流转，乡镇企业是早准备好了子弹的，如果这样的“改革”实施，就是这些高利贷者的饕餮盛宴，大量的乡镇企业占用的集体土地就要到这些高利贷者的手中了，这就是一些人保护私产搞宪政和土地私有化的真相。中国基层政府的债务已经积累起来了，更关键的是这些债务是高利贷，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就是倒逼私有化。这样的“改革”是夹带了私货的。前面的小贷公司合法化，合法的给基层放高利贷并转嫁到基层政府，就是所谓的金融“改革”的结果。盯住土地私有化，占有土地等是一系列的有计划的行动，中国土地如果再一次的兼并到极少数人手中，最终将是国家的危机。

中国的核心资产一直是外国资本觊觎的目标，尤其是在美联储等西方国家大量印钞之后，这些钞票是要买到资产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财富价值的，这些钞票所代表的资本和热钱在全球当中能够购买的大宗资产只有中国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资产。省、市、县的地方政府在上一轮国企改制当中已经私有化了所属大量国有资产，省、市、县级的地方政府资产是不多的，而中央政府管辖的央

企等核心企业要私有化是有难度的，是需要走立法等程序的，因此剩下最容易得手、也是最大的资产就是集体土地。这些资产都掌控在镇乡、村基层和所属乡镇企业当中，这些资产是分散的，基层政府有巨大的经营权，资产是最容易流失的。我们以前总讲国有资产流失，也关注于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对于集体资产的流失，对于集体土地控制权的流失则没有声音和重视不足，这样的不足早已经成为金融大鳄的猎物。我们要搞城镇化，城镇化的背后就是镇乡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土地，我们要保障国家的安全，18 亿亩的红线是不能动的。能够进行城镇化的农村建设用地实际上是在镇乡、村基层和乡镇企业的手里，现在各路资本和外来热钱通过高利贷和基层政府的债务危机，合法的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土地资源廉价的拿到手里，我们的崛起和城镇化进程就要再一次的被渔利，老百姓将再一次的不能分享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社会贫富分化将更加严重，中国的财富将要外流，这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综上所述，热炒省、市、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转移视线，掩盖了镇乡、村基层的债务问题，等这些问题发酵到不能收拾，个别人渔利获取暴利，他们破坏中国崛起进程的目的就达到了。因此对于中国债务危机风险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基层负债的情况，把基层利率压低下来，不让高利贷者渔利。对于一些害群之马要严厉惩处，控制基层负债，使之不再不断扩大，必要的时候要让金融机构破产和救市，要严惩一些违规者。这已经不是刺激经济的问题了，而是维持社会和政权稳定的大问题了，这才是中国当前所遇到的核心问题和风险，中国镇乡基层政府及其企业的负债不能再隐藏着发酵了。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不在中央政府，也不在地方政府，而是在基层政府，所谓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博弈被忽视的是基层政府的现状和不断发酵的问题。中国之大，基层问题才是根本。

巴塞尔枷锁与西方评级霸权

为了博弈世界定价权，世界的宽松是不断释放流动性，流动性的背后是定价权的博弈，对于世界的不断宽松，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行宽松呢？大家以泡沫对泡沫，而不是我们的紧缩为世界的泡沫腾出空间。大家都可以看到世界股市高奏凯歌而中国股市熊冠全球，股市的走向是直接与货币宽松挂钩的，如果我

们的货币利率如西方一样不到 2%，我们的股市该涨到多少呢？1% 的利率下我们的股市上万点的说法不过分吧！为什么单单我国要成为经济危机下搞货币紧缩的异类？

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巴塞尔协议》的评级霸权对于我们的影响。西方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是希腊国债这样的垃圾国债在《巴塞尔协议》下风险权重也是为零的，而次级债即使是雷曼兄弟这样的破产垃圾债，其风险也仅是 20%。我们知道西方银行大部分的资金来源就是次级债，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标准，这些次级债是要被计入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当中的，这样西方银行大量的次级债融资反而成为银行的次级资本，可以大量计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当中。外国的银行杠杆率实际上是远远高于中国的银行的，经常是达到 30～40 倍的杠杆，这些杠杆都是通过次级债来实现的。中国的银行是没有多少次级债的，中国的银行发行次级债需要审批而且极其不易，因此造成中国的银行在《巴塞尔协议》下的不平等待遇，中国的银行必须不断地再融资。

同时《巴塞尔协议》对于风险资产的规定也是不同的，这里对于中国也是不平等的。《巴塞尔协议》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资产分为四大类，分别以相应的权重（K）反映其风险大小：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 0；
>
> 对于 OECD 的商业银行及 OECD 以外的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 20%；
>
> 抵押贷款的风险暴露权重为 50%；
>
> 其他所有商业银行、企业、个人的风险暴露权重都为 100%。

我们看到中国不是 OECD 国家，OECD 国家被他们定义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不被西方所承认的，因此中国的所有的商业银行、企业、个人的贷款风险暴露都被计算为 100%，中国政府的国债的暴露风险是 20%！但是西方这些 OECD 国家的国债在银行资产里面的风险权重是为零的！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地发行超额国债，这些国债均可以被银行不计成本的持有。中国的银行持有中国政府的国债还要计算 20% 的风险资产权重，需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持有地方政府债务的要求就更高，这样中国进行市场化和证

券化金融改革的时候与西方根本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更可笑的是这一次欧债危机的欧猪五国竟然是 OECD 的创始成员，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暴露权重为 0，但是这些国家的国债等风险显著地高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持有西方 OECD 国家的银行债务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只计算 20% 的风险权重，持有中国的银行债务就要被计算 100% 的银行风险资产权重，这样的结果就是银行的金融杠杆率受到了巨大的差别待遇。西方这样的低杠杆的背后就是给银行炒作衍生品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让西方的金融机构可以极其方便地用极高的杠杆来炒作金融衍生品，因为次级债到其到期的前 5 年就可以最高以 100% 的比例计入银行的次级资本了，最少的 1 年内到期的也有 20%，而这些银行债务的风险权重才 20%，炒作他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是不到其次级债金额的 2% 的。在《巴塞尔协议Ⅲ》以前，这个资本要求甚至不足次级债金额的 1%。但是中国的银行要发行次级债，中国的银行持有的话就要被计算 100% 的风险权重，与银行的贷款的风险权重是差别不大的。中国的银行要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本身对于核心资本就要有高于西方的银行 5 倍的股权资本的需要，银行股权融资的压力可以想象。

西方金融机构在《巴塞尔协议》下可以大量发行次级而不受限制，同时金融机构持有这些次级债资产也没有多少的资本要求和负担，我们可以看到一家金融机构发行的次级债被另外一家持有，然后是另外的一家发行次级债又被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最后可以循环回来再由这家金融机构用发行次级债所得的资金购买持有，出现了次级债循环持有这样的怪圈，而且这样的持有经常是隐秘的。对于持有银行 CDS 等金融衍生品，其风险与其担保额相比被计入风险资产管理的比例也很低，因为虽然是其风险权重按照评级高低有所不同，但西方给了这些债券高高在上的信用评级，按照他们的高评级这些债权债务的风险权重很多只有 20%。想一下把欧洲这些 OECD 国家的国债的风险权重变成零，持有这些国债的 CDS 的风险权重能有多少？造成这些金融衍生品与次级债一样可以高风险、高杠杆的交易和循环持有，炒作金融衍生品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巴塞尔协议》下也是很低的。

在这样的高杠杆和循环持有下，风险被杠杆放大，在《巴塞尔协议》下对于银行的风险管理上是刻意的“忽略”了这样的资产关联性，有关协议根本没

有考虑到不同资产相关性是很不正常的，其背后就是给这些西方的银行带来巨大的利益，2008 年的经济危机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的。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在 98.7 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 74 万亿美元的份额。在金融领域中，用10:1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100:1则是“疯狂型”投资。90 年代著名的超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指导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施。在用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一不留神就输了个精光，还险些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626:1，堪称世界之最。在这样的高杠杆的情况下他们居然都符合《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风险控制的要求，在次级债模式下理论上是可以不受任何《巴塞尔协议》限制，无限的加大金融杠杆的。对此你还觉得《巴塞尔协议》的设计本身没有问题吗?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风雨飘摇当中，谁有话语权，谁就有了最大的力量，美国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怎样把他们的评级变成能够左右世界的力量，很多人仅仅认识到了世界对于他们的关注这一个层面。实际上通过《巴塞尔协议》，对于这些评级机构的权力是被固化的，评级的下调直接关系到你的银行的杠杆和资本充足率。这样三大评级机构就有了对金融市场生杀予夺的大权，《巴塞尔协议》维护了美国的评价霸权。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不同，提出了信用风险计量的两大类方法：①标准法，基于商业银行资产的外部评级结果，以标准化方式计量信用风险；②内部评级法，基于商业银行自身健全和完备的内部评级体系计量信用风险，但必须经过监管当局的技术检验和正式批准。

《巴塞尔协议》的信用风险计量标准法对主权、商业银行、公司的债权等非零售类信贷资产，根据债务人的外部评级结果分别确定权重。零售类资产根据是否有居民房产抵押分别给予 75%、35% 的权重。表外信贷资产采用信用风险转换系数，转换为信用风险暴露，过分依赖于外部评级。对于缺乏外部评级的公司类债权统一给予 100% 的风险权重，缺乏敏感性。此外，也没有考虑到不同资产相关性。这样的风险权重评估就是对于没有经过西方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金融资产 100% 的计入银行的风险资产，再对于风险资产按照《巴塞尔协

议》的要求乘以资产充足率，得出银行必须的资金数额，而对于经过评级的金融资产则可以降低计入风险资产的比例，降低比例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必需的银行资本金随之降低，因此这个评级实际上就是决定了银行的资金杠杆水平和银行的发债成本。因为高评级可以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就会有更多的银行愿意持有你的次级债等债权。金融机构持有这些债权的成本不仅仅是利率，也受制于资本充足率，如果大量持有的都是高评级的资产，银行的金融杠杆就可以很高，否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下金融杠杆是高不了的。

《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计量的内部评级法要去除商业银行建立健全的内部评级体系，自行预测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期限（M）等信用风险因素，并根据如下权重公式计算每笔债项的信用风险资本要求（K）。

（1）公司、主权及商业银行暴露：①非违约风险暴露；②违约风险暴露。

（2）零售暴露：根据对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依赖程度的不同，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①初级法要求商业银行运用自身客户评级估计每一等级客户违约概率，其他风险要素采用监管当局的估机值；②高级法要求商业银行运用自身二维评级体系自行估计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期限。初级法和高级法的区分只适用于非零售暴露，对于零售暴露，只要商业银行决定实施内部评级法，就必须自行估计 PD 和 LGD。

我们看到《巴塞尔协议》的信用风险计量的内部评级法是要求必须经过监管当局的技术检验和正式批准的，这个监管部门是谁呢？这里也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个监管部门是在各国国内，各国有各国的主权，但是到了国际之上，发行国际流通货币的国家有监管的权利。现在美元是世界的结算货币，要以美元结算经过美元的结算机构，是否符合《巴塞尔协议》就是该结算机构说了算了。因此不要简单地看这个协议是怎么定的，这个协议实际执行起来的结果就是谁做结算货币谁监管，除非交易的双方有特别的约定。因此这个内部评级法实际上就是美国以及美国认可的金融机构可以使用，其他的金融机构只能使用标准法来进行风险计量，而使用标准法的风险计量的结果就是你必须屈从于美国控制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下。无论是你让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还是你内部

评级被美国监管机构认可，协议运行的结果就是让谁都逃不出美国信用评级的如来佛手掌心！

不但如此，《巴塞尔协议》还要对于信息安全进行挤压，如果由三大评级机构来评估某国的信用等级，就是对于这些评级机构来一个信息大公开，而采取内部评级法也是要求信用暴露的，也是要对于监管机构信息公开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信息必须向美国公开。对此中国显然难以做到，结果就是中国银行的资产均要按照100%的权重计入风险资产，受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这对于中国显然是不平等的。美国金融机构对美国评级机构和美国监管机构信息公开是没有什么额外风险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核心秘密之一，完全是不对等的。这样美国的金融机构通过信用风险计量的评估可以大幅度降低银行资产成为要被资本充足率约束的风险资产的比例，因此可以有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高的金融杠杆，通过金融优势就可以掠夺他国的财富，金融优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霸权的主要体现，《巴塞尔协议》保障了他们的评价霸权，并且使得评价霸权通过协议转化成为金融的实际优势。

在《巴塞尔协议》的评级霸权和不平等条约下，中国的银行业是根本不能宽松的，在这个战略层面已经将中国的宽松道路堵死，尤其是在美国前两轮 QE 时中国没有及时跟进，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到 3.2 万亿美元，比危机前增加 1 倍。这样快速增加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市场早已经潜伏着大量外来热钱，如果中国此时宽松，则进来的热钱投机就要大幅度获利。2008 年 1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 1.59 万亿美元，到 2012 年 6 月是 3.24 万亿美元，新增的美元储备当中有多少是热钱？到 2013 年年底则超过了 3.8 万亿美元。我们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 2011 年 6 月末外国来华投资 1.58 万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 60%，而到 2014 年就已经超过 2 万亿美元了。这些增加的投资都是在中国股市低位和房市调控的背景下增加的，如果此时中国宽松股市等，资本市场价值翻倍上涨，外资获利就可能超过我们的外汇储备。如果股权的价值翻倍，外国来华投资的资本价值就要在 4 万亿美元以上，还有隐藏在房市和股市的热钱资金。如果中国宽松他们就要胜利大逃亡了，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彻底压死。因此在国外抢先宽松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宽松的机会了，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巴塞尔枷锁和评级

霸权不解除，中国是没有宽松的机会的。

在内外宽松不同的情况下松紧不同，如果开放外资进入则对于中国也是一个剪羊毛的过程。《巴塞尔协议》不但对于中国是枷锁，对于欧日压力也很大，每一次评级的下调，对于欧盟和日本就意味着要银行和金融体系进一步的去杠杆化，压低了欧日的杠杆也就是使得货币衍生的货币乘数降低，货币供应必然是紧缩的。不要看各国央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怎样增加，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影响大的是基础货币经过金融衍生后的广义货币，这广义货币在货币乘数的变化之下，是完全可以与基础货币增减的方向相反的。《巴塞尔协议》订立之初，就有限制日本当年量化宽松的作用，是美国和英国共谋针对《广场协议》下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央行大量印钞应对升值攫取世界财富所采取的限制策略。在这样的限制之下，宽松的结果是要被银行依据《巴塞尔协议》不断再融资，从金融货币市场上的抽血所抵消的。现在这样限制日本的策略变成了中国的枷锁，但是对于美英，则是一个债券为主的金融社会，持有金融机构的次级债哪怕是破产的雷曼债券，只占20%的风险权重，持有国债，哪怕是希腊这样的垃圾国债也不计算风险权重。债券的融资模式不会增加广义货币的数量，不会发生银行存贷款所造成的金融衍生，因此对于货币乘数是关系不大的。美联储购买MBS等债券本身也是扶持债市，西方有一个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债市，债市的规模比股市要大，而在中国债市与股市完全是不对等的。这样的差异就被规则制定者所利用，制定了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这里我们不能忽视《巴塞尔协议》和美国的评级霸权所造成的影响，整个世界不是一个平等竞争的世界，中国崛起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的。

《巴塞尔协议》的不平等，造就了中国和外国在流动性上难以对等，几百年来中外流动性的差异，让西方取得定价权、取得更多的财富分配的历史不断地继续。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地位不仅仅是反倾销时的价格确定问题，还有在《巴塞尔协议》下的不同流动性影响呢！当今欧美都在放慢达到《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步伐，我们也要思考一下，为何我们就要那么老实和迅速地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呢？在《巴塞尔协议》谈判上我们是否应当有更多的要求，起码是知道签署这个协议的后果是什么，应当更深入地研究，让全社会都知道。

第 3 节　微观调控博弈定价权

微刺激成为 2014 经济新热词

2014 年 6 月 2 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今年以来的多种“微刺激”手段保证了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有效果。这是官方首次承认“微刺激”存在并且合理。微刺激一词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微妙”。微妙就在于，政府既要平衡内部改革，又要防止投资者（特别是投机者）盲目添乱，因此就出现了被市场评论为“一边刺激，一边又想让市场感觉不到刺激”的艰难战术。

自从官方提出了“微刺激”的说法，微刺激这一个词汇一下子成为经济新热词。而有刺激就有压缩，刺激和压缩所构成的就是微观调控，这些都是微观上影响经济的手段。

分析人士指出，微刺激措施主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这可以实现调控政策的“精准发力”。从涉及行业来看，基础设施、民生、新能源等领域将是微刺激的主要发力领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民生依然是保证我国长期供给能力扩张的有力手段；加大对太阳能、风能、核能的补贴和扶持，将会有效改善我国能源供给结构，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微刺激也将避免有关流动性进入房地产、流通和投机等领域，避免通胀的再度抬头。

面对 2014 年的经济压力，提出微刺激政策概念以来，在财政政策之外，央行也采取了定向降准政策进行配合，不是普遍降准的开闸而是给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贷款达到一定规模的中小型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促进银行的金融资金进入相关领域。在央行的政策之下，金融流动性趋于平稳，没有 2013 年年中的流动性大起大落，经济数据有了明显的改善，微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是非常适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环境的。政策性定向的选择和干预，这样的做法本身不是宏观的做法，而是微观的手段，以微观手段影响经济，促进中国经济

的去产能调结构，就是微观调控。微刺激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微观调控的开始。

从日本商社成功体悟微观调控

日本的成功其中的经济组织方式有关键性的贡献，这就是日本特有的财团模式，对这个模式白益民博士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给笔者非常大的启发。就他研究的成果以笔者看来，就是日本商社通过相互内部联系，造成了一个产业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当中协调一致，博弈美元在全球的宏观霸权，取得了一定的定价权，保障了企业的核心价值不断发展提高。

综合商社是日本首创的一种具有独特机能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综合商社，也没有与综合商社相比拟的企业；在世界，即便是在所有模式上都仿效日本，而且成绩不错的韩国，唯有商社模式至今没有学到手，美国、欧洲更没有能把商社模式学得有些样子的企业。商社不同于工厂，靠贸易起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制造业负责生产，综合贸易公司负责贸易”的分工体制，让商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在日本顺利渡过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二战、70 年代的石油危机、90 年代的金融风暴，至今仍健康发展的企业不在少数。三井财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300 多年来，三井不但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而且几乎一直在日本甚至全球的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可以从认识三井财团的层面来认识日本综合商社的组织形式。

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中很独特的一种模式。三井物产前社长上岛重二曾对综合商社有过一段精彩的说明：“为什么综合商社只在日本得以发展？因为日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资源的国家，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没有资源，要发展成现代化工业国家，就必须依赖外国资源，把外国的资源运到日本、把外国的技术拿到日本，以此来发展日本的产业。不管是购买资源还是技术，都需要外汇，必须把日本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综合商社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进行工作。”至于三井物产到底涉及哪些产业，可以听听一位三井驻中国代表的话：“除了毒品、武器弹药，其他所有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这就是全产业链！除了众所周知的汽车生产企业丰田、电器产品生产商东芝、造船厂三井船舶、造纸厂王子制纸、三井矿山、三井生命保险、

三井信托银行……甚至连日本主流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也属于三井财团。在创立之初，《日本经济新闻》是三井物产的“企业内刊”，时称《中外物价新闻》，为三井旗下的各个公司提供商业情报。

20世纪90年代，三井物产（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一直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位列前10，其中，在1993年曾排名第1。2003年后，由于将一些重要部门进行独立核算，三井物产的排名迅速下降，在“2008财富500强”中，三井物产仅排名140位。但实际上，500强中的其他很多日本公司，比如丰田、东芝、索尼、石川岛播、王子制纸等，都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企业。在中国，四通、宝钢、上广电等著名企业也都与三井财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综合商社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让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综合商社。

1949年，三井物产的前身——第一物产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数十年来一直是日经指数的重要成分股企业。三井物产并不拥有生产设备，也不直接从事生产，它的任务是调动全球的信息、人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为财团旗下的各个企业服务，打通产业链，并帮助财团开创新的业务、进入新的产业。因此，三井物产有“产业组织者”之称。以钢铁行业为例，在澳大利亚、巴西等矿区密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看见三井旗下新日铁的标志；商船三井为各国的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的运输服务；而运输所用的大型矿砂船又由三井船舶制造……三井物产协调、贯通了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作为一个中介，它“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自然在行业内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此外，商社内部的融资小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商社就是在这个微观环境下进行调控，在微观环境下靠绝对定价权来影响国内价格，再博弈全球的定价权。要的是企业的发达，而不是做发达国家资本的奴隶，有价格的自主权非常重要。

日本商社的成功就是他们在国际上博弈西方定价权的成功，日本的商社模式在企业内部创造了一个小气候，商社的成员之间是互相调配资源的，商社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集体。不仅仅是三井物产，像三菱、住友、伊藤忠、丸红这样的日本综合商社几乎都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让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

队。在日本，商社企业的融资可以通过外部的贷款，也可以通过内部的供应链的融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流动性是被打通的，这样在某个环节当中出现流动性紧缺的状态，在商社内部可以通过上下游的交易关系给企业注入流动性，这是在商社内部的一个微观调控的做法，在日本商社体制之下，比宏观调控效果要更好。

这些综合商社为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将日本的经济模式称为“会社主义”，意思是说，整个日本就是一个大企业。商社内部的成员结构就是一个社会，商社的管理是社会性和有计划的市场性的，就如三井物产很少做大股东，它一般只在所投资的企业中占5% ~10%的股份，甚至更少，但它是领袖，通常会联合旗下相关企业共同投资，而后者的投资往往是前者的好几倍，因此三井物产又被业界称为“投资放大器”。日本的这样的管理模式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日本的财团商社不是一个树形的控制模式，而是一个网络化的控制模式。没有一个处于顶层的控股公司，企业之间是网络状的交叉持股的，这样就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凝聚力，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股权民主社会。这么大的一个树形机构，就等同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问题就是管理成本非线性的膨胀，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也是管理成本问题导致的失败。网络控股结构则是内部形成了市场，彼此的持股和成员资格更像一个国籍概念，内部是市场决策的，这样的管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管理成本，控制了内部风险，提高了效率，因此这个模式可以克服庞大企业集团的大公司病，让财团做得更大。财团富可敌国了，那么与政府职能的冲突就会发生，到底是政府政策为主，还是财团内部的市场机制更重要，则需要平衡。日本的财团模式还与政府有非常好的沟通和互动机制，就如“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这类机构正是日本政府重要的智囊团。从而体现政府为产业服务，政府的政策与产业有非常好的配合，这样的政府虽然是财团影响的，但从财团的角度，从财团作为出发点则到世界竞争更有力度，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其网络化的股份结构看，叫财团不叫控股集团是有原因的，但我们一直对日本的这个不同名称的背后实质也没有研究。

在全球美联储美元霸权控制世界金融，控制全球金融定价权的格局下，日本的政治在二战战败国的地位下依附于美国，广场协议则在货币上给了日本巨

大的压力，金融的宏观调控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在全球化的世界，西方列强已经在制度、垄断、技术等多个层面占据先机，同时金融定价权给他们充足的流动性，劳动力差距在日本崛起之前也是巨大的。定价权在世界大鳄手里，而且在美国的全球化打破贸易保护的立场下，日本是难以对抗建立自己的贸易保护机制的，再开放的市场下，面对一个个产业巨头，怎么样与之竞争，进行产业升级，争夺定价权？只有依靠企业内部的抱团取暖！日本的商社和财团，就是这样抱团取暖的产物，紧密结合以后内部就可以微观调控，成为小气候，同时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西方的垄断是横向的垄断，把产业一步步细分成为一个个环节，不同的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这些环节连接的纽带就是进行国际贸易。一到国际贸易层面则国际金融定价权、美元霸权就成为主导力量，这就是金融霸权国的如意算盘。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的商社财团进行的是纵向的整合，通过企业的抱团，所有的产业链都在财团内部完成，外部的流动性决定的定价权难以进入到内部，从而保持了整体的竞争优势和一定的定价能力。

日本全产业链的财团模式，很多国家想要学却学不像，是没有理解日本模式其中的关键点在哪里。这关键点就是日本财团的股权组织形式是一个网状结构，而非树状结构。产业的上下游本来就是一个竞争关系，整合在一起也是会内部竞争的，管理者作为控股公司顶层进行调整的时候，就要面临巨大的管理成本。每一个企业的管理者都会以各种影响力来影响最高决策者的决策，为其争得更多的利益份额，于是公司内部的腐败就开始了，即使不是钱的因素，人脉利益关系也会比钱更加复杂。企业互相参股，利益成为共同体，却没有一个中心领导，企业在财团内部的博弈是在相对公平的内部市场模式下进行的，每一个企业都是理性的，理性的投票是关键。就如三井公司，“二木会”（总经理会议，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四召开，日语中星期四为“木曜日”。）是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由财团内 26 家主要大企业集团共同组织，定期聚会、互通信息、统一决策——东芝和丰田都是二木会的成员。这些会员之间合作型的理性博弈，比由一个财团独裁者的决策更能够做到维持企业公平，让各个企业团结、有凝聚力，这样的管理模式是日本式财团独有的，它所带来的好处却被关注不足。

日本财团的体制和他们内部的流动性机制也是日元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性

货币的重要支撑，日元的国际地位基本上是在日本财团取得世界影响力以后得到的。二战以后的日本，怎样让日元成为世界货币？人们有什么理由使用日元？原来日本经济影响地区因为日本二战时的行为是仇恨日本、忌惮日本的，他们为何又使用起日元来？这里日元的无息和低息贷款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则是他们的财团体制，日本的优惠贷款也是为他们的财团进军这些国家服务的。不是支持他们的财团投资，就是采购日本财团需要的资源，资源是偿还贷款的保障，并且资源价格与贷款与否是挂钩的。这样的日元贷款与投资整合的配置之下，日本财团投资遍布世界和他们需要的产业链，这些遍布世界的日本财团投资，内部都是以日元进行结算的，这使得日元结算的交易量大幅度上升，而日元国际贸易量、结算量当中有大量的结算量都是日本财团的内部结算。这样的财团内部财务的变化，使得无论日元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在财团内部就可以迅速调整，然后把流动性输入到全球！就如日本采取宽松，中国的流动性立即就会有反应，原因就是日本的在华企业太多了，他们可以通过企业贸易结算迅速地把流动性注入中国，套取汇率利益。这是经常项目，在我们的资本外汇管制下是难以限制的，而且通过汇率的不同变化，也可以主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企业的利润盈亏，而日本这样的网络控制非控股模式，在国际惯例和国内法上经常是不属于关联交易。这样的利润调整是反避税的，因此对于日本的财团所带来的好处，要从全方位上体会，而这个经验就是日本财团的微观调控。在财团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微观也是相对的，成为在产业层面的宏观调控了。

日本总说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云云，但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日元基本维持与美元汇率的大致稳定，日本经济不佳、利率奇低却可以维持汇率不变，背后也是定价权带来的利益，这个定价权就是日本商社体制带来的。日本商社在日元升值期一直是快速扩张的，扩张的结果就是日本的产业遍布全球，日本的海外GDP是国内的150%以上，日本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资本领域的定价权一步步扩大。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和商社的集体协同的体制，为日本产业海外扩张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在广场协议后的20多年里面，日本迅速资本输出扩张，成为海外投资最成功的国家，建立了以商社为主导的全球定价体系，这个体系才是日本维持印钞和低利率还能汇率稳定、不通胀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到，1983～2007年，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收入由零增长到2.1万亿美

元；海外总资产由2720亿美元增加到5.4万亿美元，增长近20倍；海外纯资产由373亿美元增加到2.2万亿美元，增长近60倍；外汇储备由244亿美元增加到9733亿美元，增长近40倍。其海外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经济的1.58倍。2002年日本的海外净纯资产达到1.6万亿美元时，就已相当于法、德、意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2004年日本海外纯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时，已占到全球海外纯资产的90%以上。而美国2004年的海外纯资产是-3.85万亿美元，仅此一项就比日本少了5.65万多亿美元。单看GDP美国每年都超出日本1倍多，算起GNP，美国还不如日本①。日本是私有制社会，它的海外资产基本是日本的商社和财团控制着的，他们控制着这些资产，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价格体系，可以把日本宽松出来的流动性源源不断地输入全世界，保障日本在低利率的同时汇率稳定、不通胀。但流动性被输入的地区，日本印钞买走财富的地区，怎么能够不通胀呢！这就是日本以商社内部微观调控这类看似微观的财政手段，达到了影响日本乃至世界宏观经济的效果。

所以对日本的成功，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其商社的力量，对外说日本金融战败和失去的20年，但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财团依然成功，他们已经走出了日本，进行全球化了。日本财团的产业更多的是分布全球的，在日本国内博弈美国金融的局部可以吃亏，但日元的升值让日元优惠贷款成为高利贷，也挤兑了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在日元升值的过程中资源的价格都是吃亏的，这就是日本全产业链条带来的力量。我们应当学习日本财团，学习日本财团在微观全产业链上的智慧，从中体会从微观到宏观的定价权博弈。

微观调控的必要和自主创新

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只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注意是政策而不是具体的行为，具体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事情而不是宏观的行为。所以对于绿豆、土豆的暴涨不是宏观而是微观的问题，同样我们打压房价、菜价也是针对具体产业的微观政策，不是宏观调控。

对于微观的问题就要通过微观来解决。中国近年来的政策基调一直是要实

---

① 据商务部研究院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比GNP，日本是世界第一。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样的宏观政策实际上是微观政策，针对具体内容的是微观政策，而宏观政策是针对总量的，我们当前更需要的是针对流动性的不均衡进行微观调控。宏观调控所依据的是宏观经济学，而微观的事情通过宏观问题来解决肯定要有问题的。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有时也被称为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主要研究个体消费者，企业，或者产业的经济行为，及其生产和收入分配。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而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流动性不均衡的问题在宏观上是难以反映的，各种总量和平均的宏观数据是反应不出微观上的不均衡的，不均衡是微观的问题。我们的大蒜、绿豆、糖、苹果等价格问题也是一个微观的事情，微观的事情需要使用微观的方法进行解决，通常情况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现在的世界与微观经济学所产生的年代有了巨大的不同，我们在利用这些学术成果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当初的客观世界和基本假设的变化，这样的基础改变决定了我们在学术上也要为之进行改变。基本假设的改变对于其后模型的改变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就如普朗克把连续辐射改成量子离散就立即解决了黑体辐射的紫外发散问题，这样的模型影响是零与无限大的区别。

对于当年的微观经济学，世界还没有进入全球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壁垒是很清晰的。欧洲的各国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没有当今的欧盟。今天微观经济学所关注的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等假设已经改变，因为国家巨大和不均衡的存在，市场出清是不存在的，因为国家的巨大和全球化信息也是不对称的，而通胀的恐慌也造成了市场的非理性行为的普遍性，我们不断反复地金融货币政策操作，所造成的流动性不均衡也肯定无法让微观市场处于市场出清、信息充分等微观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因此对于这样的微观现象再依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我们的大蒜、白糖等商品的暴涨就是一个范例，以中国之大，中国一个省区的规模无论是人口、GDP，还是疆域等，经常已经与微观经济学产生环境中的一个欧洲国家相当。在全球化下中国有庞大的世界工厂，中国的一个行业已经相当于过去的整个世界，这么大的规模实际上使得传统的宏观与微观的边界发生了重合，这样的微观经济行为也会出现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机制不完善，需要政府等“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但是这样的行为又是局部的，与针对整体市场、面向整个经济领域的宏观政策不同。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放到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来看，又是局部的、微观的政策行为，这就是宏观和微观的相对性和辩证性。中国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就是要打破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学术界限。宏观和微观的疆界在现代经济发展下是要调整甚至重新划定的，认清学科基本假设的变化，做出相适应的调整。对于这样的不均衡在不同的领域针对不同的微观事物进行调控，这是一种微观调控，是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对于西方的政策的一种变革和调整。

西方注入泡沫，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泡沫，西方以其泡沫来对付我们的紧缺，谋求泡沫的资产化、实物化。让印钞成为商品就是印钞者的胜利，把水对进去容易，取出来难，中国挤泡沫，他们兑泡沫，这是一个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游戏，中国是难以为继的，中国要做的事情是以泡沫对他们的泡沫。他们在某些地方水多了，不是把多的地方的水拿出来，而是在水少的地方加水，于此同时对于关乎民生的重要战略产业予以保护。因为流动性泛滥到老百姓的消费品，我们就增加流动性到老百姓的收入中，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通胀，补贴低收入人群，让老百姓在通胀中生活质量不下降，生活负担不加重。在此微观调控的模式下，各个地方政府和部委的职能部门保障经济和民生的作用，

远远比央行的大一统的货币政策和中央政府统一的财政政策所搞的宏观调控要有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更加符合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因此微观调控在当今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出现的广泛的流动性不均衡的背后就是这个世界的微观经济学假设的经济环境已经被打破，这样的不均衡是需要新的理论面对的。

西方世界早已经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局面，一个分支行业的相关企业是有限的，一个行业一般就是三、五家企业，这几家企业之间很容易做到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市场出清、信息充分和完全理性。西方对于这样的流动性不均衡实际上由于企业的集中已经在企业内部自我调整了，西方的微观调控实际上是大型企业的自我调控行为，尤其是日、韩等财阀国家，大财团内部彼此联系，可以非常自由地调整内部的流动性不均衡；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么国家没有中国规模大，要么就是产业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阶段。但是在中国，一个产业内就有成百上千家企业，甚至上万家也是常态，这么多企业怎么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怎么可能迅速市场出清？又怎么可能彼此间信息充分呢？这样的市场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不具备，而且是过度竞争，难以像西方垄断企业那样自我调节，因此中国政府在行业内就具备了微观调控的必要，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创新。

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发展了，但是当今世界却在这几十年中变化最快，因为没有了世界大战，冷战后的和平演变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经济学过去很多难以数值计算的模型可以定量化计算，对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改变和理论模型的提高，华尔街等西方大鳄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停止的是他们公开的理论和学校教学。在他们的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以后，学校还拿过时的理论教学就是洗脑。他们的定量化的计算和改进的经济模型对于中国的不均衡是可以非常精确地把握的，唯一不能把握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调控政策，难以用统计数字宏观计算，因此他们是极力反对中国政府在微观上的任何政策举动的，而且把这样的举动妖魔化为向计划经济倒退。但是在中国存在微观上的流动性不均衡的市场，如果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把市场的控制权不是交给客观规律这只手，而是交给被经济模型操纵着的这只代表西方资本的手了。这是事关中国经济主权的大事

情，绝对不能妥协，中国的微观调控不是限制产业发展的计划经济，而是保障产业发展的安全堤坝。在西方垄断竞争下中国要是没有微观上对于自主产业的保护，而进行所谓的自由主义，就是放纵西方资本大鳄对于中国产业掠夺。

中国应当就自己的市场微观情况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和经济模型，进行博弈，这是中国自主创新最关键的地方，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发达的武器，模式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发达的战术，而中国有自己独立于世界的理论才是发达的战略。西方的崛起也是经济理论创新的结果，英国有重商主义，美国有货币主义，我们当年的革命成功也是依靠马列主义，而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想要发达崛起怎么可能呢？中国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理论支撑，理论创新才是自主创新的根本。

2014 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6 次部署直接与投资相关。其中，棚户区改造成为政策的主要发力点。在此基础上，2014 年 7 月国务院批复了央行 1 万亿元再贷款，用于支持国开行的住宅金融事业部，以保证棚户区改造任务的资金需要，并努力降低资金成本。此次央行再贷款是一个微观定向政策，不是大水慢灌，这种定向的微观调控手段，是我们微刺激政策的强有力的手段，这个刺激的幅度非常大，一点不亚于宏观调控！再贷款也是央行货币发行的一种方式，与每次降准 0.5% 释放 3000 亿～4000 亿元资金相比，此次再贷款 1 万亿相当于 2～3 次降准的水平，力度之大，使得微观调控完全超过了宏观调控的水平，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微观手段的力量和规模。受此影响，2014 年 7 月中下旬开始，中国股市走出 2000 点的徘徊直线调头上行。

再贷款属于央行对于特定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流动性的使用用途是定向的。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定向会落空，渔利者可以让棚户区项目成为取得资金的通道，资金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但这个担忧是过于谨慎的，因为再贷款是需要有具体项目为背景的。虚构项目资金用途本身就涉嫌金融犯罪，且即使是违规转贷其他领域，本身就是要有利益节流的。这节流的利益也是定向的，因此定向资金被转移的效用是受到限制的。本次央行采取再贷款手段释放 1 万亿元，这也让我们看到，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再贷款是此前央行极少采取的手段，而这一次不但采用了，且规模巨大，央行这个灵活性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

微观调控理论

我们要进行微观风险的控制，怎样进行调控，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已有的方程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公式给了我们进行微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我们现在重复这些货币方程式如下：

> 1917 年，剑桥大学教授庇古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货币的价值》一文，提出 $M = kPy$ 的货币需求函数，即剑桥方程式。式中 y 表示实际收入，P 表示价格水平，Py 表示名义收入，k 表示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的比率，因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和人们持有的现金量占名义收入比例的函数。
>
> 费雪方程式：是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之一。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交易方程式，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费雪方程式为：$MV = PT$。（其中：M——货币的数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

这两个公式在不同的领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这里代表货币流通速度的参数 V 是关键，而对于货币的资产功能人们持有现金的比例 k 所占据的影响巨大。剑桥方程式表达的经济意义被称为“现金余额说”，主要是强调人们保有的现金余额对币值从而对物价的影响。

二者的差异主要有：费雪方程式强调货币的交易手段职能，侧重于商品交易量对货币的需求；剑桥方程式强调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职能，侧重于收入 y 的需求；费雪方程式侧重于货币流量分析；剑桥方程式侧重于货币存量分析；两个方程式对货币需求的分析角度和所强调的决定货币需求因素有所不同。费雪方程式是对货币需求的宏观分析，剑桥方程式是从微观角度对货币需求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持有大量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货币的流通速度还很慢，实际上就是剑桥公式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美国是老百姓没有多少现金，货币在金融化和金融衍生品泛滥的情况下流通速度极快，因此从这两个公式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的 $M2$ 要远远多于美国。这两个公式所侧重的货币是不一样的，两个公式中的货币 M 实际上货币属性也有微妙的差别，一个贴近古典货币，一个贴近现代货币，因此这样计

算的货币内涵和外延也不一样，真实的货币情况是大于它们而又小于它们之和，因为有些货币既发挥存储功能也发挥媒介功能，二者是有很大交集的，但是二者不是重合的，要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别和这样的差别可以带来的渔利空间。

我们的政策恰恰忽略了这两种货币的区别和中国现有国情的影响，以往的宏观调控是费雪公式，而我们要微观调控就要更关注剑桥公式，按照不同的现金比例 k 来考虑在不同行业领域的流动性问题。按照宏观的费雪公式对于货币在不同领域的流动速率是难以调控和把握的，因为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变化是很快的，但是持有现金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现在的流动性不均衡更表现在不同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股市、期市、热钱等都有不同的流通速度，尤其是对于货币的流通速度，热钱是流通最快而且最方便操盘的参数，但是对于社会持有货币资产的比例，外来户热钱的操盘手如何下手？而且这个比例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因此认清货币的不同本质和采取不同的理论，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调控是关键。

从两个货币方程式，我们看到了微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我们在微观上注入流动性或者收紧流动性，是可以在微观上控制价格的涨跌的，也给我们的微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是对待具体的细分市场的调控，同样的对于货币市场，在微观领域也是大有可为，因为如果不对外汇进行管制，则就要受到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即使是经常项目的开放，外汇的进出也是会造成国内供需曲线的变化的，使得宏观调控的效果受到削弱甚至对冲。如果此时央行还要保持其对于货币供需曲线的控制，则这些货币的价值就不能由央行决定了，因为市场会根据需要进行货币的境内外流动，货币会换成外汇流出国外，还会引发热钱的套利和投机，从而改变你的货币供应情况。你如果还要保持货币的价格和数量的曲线关系则市场就会改变你的货币兑其他货币的比价，这实际上就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所导致的结果。你的国内政策要受到国际货币市场的影响。但这两个方程式是为微观细分市场注入流动性，这样的流动性也带来了货币供需曲线的改变，微观调控是在微观不同领域提供不同价格的资金，而由于微观市场的全球分工不同和无可替代的特性，微观的流动性受到国际货币影响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将市场细分的流动性绘制成为一张货币价格的总的供给曲线的时候，这个曲线就发

生了改变。这个改变可以大幅度降低国际货币霸权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理论上，对抗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进行微观调控，干预货币供需曲线的效果也是比宏观调控要好的。就算是在整体的宏观层面，通过微观效果的叠加效果也更理想，宏观效果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个个微观层面进行积分的结果。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微观与宏观原有的边界已经变化，原来一国在整体上是宏观的，但在全球下是微观的，原来某个产业是微观的，但全球化了以后就有宏观的影响，由此微观层面的调控就变得更加重要。

综上所述，在美元霸权之下，对于霸权下生存的国家，宏观调控经常是没有微观调控效果好的。微观调控不但在具体的细分市场更有针对性，而且微观的产品分工壁垒也可以对抗宏观上的流动性变化，这也是日本商社成功的精髓。日本商社通过内部微观调控，影响了宏观上的货币供需曲线，从而在定价权上取得相应的博弈地位。我国的国有制经济更有条件进行类似操作，龙头央企怎样与政府、央行的政策配合，发挥类似财团的微观调控作用，是中国未来在全球价格体系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有力武器。

微观调控与定价权

定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微观上流动性不均衡的表现，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假设，商品迅速在供需上达到均衡时价格是在均衡点，附近波动，是已经被基本确定的，不存在着定价权在供需哪一方的问题，而实际上的不均衡造成实际的交易有一个交易区间，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间内交易买卖双方都是可以得利的，但是到底交易价格是高是低就看谁有定价权了。有定价权的一方可以让价格在交易区间内长期偏离均衡点在自己有利的位置，从而产生额外的巨大利益。举例说明，中国成本 1 元人民币的玩具在美国卖 3 美元，则买卖双方可以 1 元 1 分钱成交，也可以 2.99 美元成交，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但是美国商人有定价权，可以做到就让中国人只挣几分钱。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市场中国人不能自己销售达到均衡，也就是市场出清的状态呢？原因就是渠道和流动性本身的不均衡让微观经济学下的供需曲线的均衡点无法达到，此时才产生了定价权和巨大的定价权利益，这个问题在前面的章节已经具体分析过，不再复述，而改变这样的供需曲线的扭曲，就要针对这个曲线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了，所

以博弈定价权本身就是要从微观入手，进行微观调控。

前面分析了流动性与定价权的关系，认识到流动性的松紧是定价权博弈的关键，这里还要认识到不同产业对于流动性的松紧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采取统一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一刀切是不行的。供需曲线的弹性和刚性是不同的，在同样的流动性下发生怎样的扭曲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不同在货币资金渔利下还会放大，流动性越多越有定价能力，越能够转嫁给需方造成危机和泡沫。房地产被热炒就是这样的例子，调控下房地产不是资金越来越少，而是投机和放高利贷的资金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涨。因为在社会流动性被宏观调控的时候，钱总是找最能够渔利，最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地方去渔利放贷的，而需求越刚性这样的渔利就越有余地，越容易产生恐慌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造成需求曲线的扭曲，从而在供需曲线上无法市场出清，产生定价权效应被渔利，需求曲线扭曲下放贷的成本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转嫁给需求方，因此在这些刚性的商品上抬高了价格，加剧了通胀；与此同时，需求弹性大对于利率承受能力弱的领域是流动性流出的，流动性流出后造成这些领域的流动性不足，导致生产者不得不大规模地底价抛售产品，导致价格下降，会产生通缩效应，这些效应的综合在总体的宏观数据上表现为滞胀。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正反馈的问题，在流动性不均衡的情况下，不是自动的调整均衡，而是在可以渔利的地方堆积流动性，难以渔利的地方流动性流出造成紧缩，从而使得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出现了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行业成为水源，资金的刚性需求最大，导致金融部门的部门利益和金融业盘剥实业过于严重的问题，因此只得把流动性合理分配的调整力量交给政府的调控，从而更可以看出微观调控的必要。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实践问题了，老百姓的食品消费是绝对的刚需，而老百姓的住房也是刚需，这样的刚性需求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一刀切的流动性紧缺下，反而是紧缺的资金成为重要经济资源，都涌入这些地方进行渔利，于是这些领域的定价权就掌握在资金的拥有者手里了。渔利的成本由价格买单，造成我们的房地产实际上是越调越涨和各类农产品的暴涨，同样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钢铁也是刚需，在这样的调控下不是铁矿石的降价，而是铁矿石的涨价，原因也是可以向需方转嫁涨价成本，这样的转嫁就是通胀最大的动力。同时由于中国的流动性向地产、农产品炒作、铁矿石

等方面流动，造成中国的稀土等产品只能低价出售，中国的加工产品也是低价出售，中国制造出口的价格是下滑的，这样的商品降价反而给美国等使用中国产品的国家带来一定的通缩。中国统计的 CPI 与老百姓感觉的不一样也是由于各种工业品在流动性流出，进入房地产等领域以后因为流动性不足而降价。这样的不均衡对于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是极大的。我们一刀切的流动性政策所导致的就是对于中国产业的误杀。我们的房地产和农产品是中国最硬的刚需，如果能够通过统一的流动性调控把他们的资金收紧，让他们低价抛售，那么中国其他行业还可能有流动性吗？他们是中国流动性最低的洼地啊！这样的调控等不到房地产价格被打下来中国其他产业就遍地哀鸿了。股市和房市的关系也是如此，老百姓住房是生存需求，房子比股票是刚需，因此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首先就表现为股票的暴跌，股票的流动性要流入房市进行高利贷，从而极大妨碍了需要大力发展的资本市场。因此对于他们的局部经济问题绝对不能以宏观调控的方式来解决，只能微观调控。

因此整体的流动性收紧以后加剧了微观上流动性的不均衡，其原因就是资金要涌入相关领域渔利，定价权在拥有资金的人手里。但是我们真如美国 QE 那样把整体流动性加足并调降利率以后会怎样呢？会不会让刚需的地方有更多的流动性，造成价格暴涨，促使通胀发生呢？笔者通过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恰恰相反，因为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产业会得到足够的投资进行发展，需求曲线当中的恐慌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不存在了，产业的供需曲线的扭曲不存在了，产业的供给就增加了，在增加了供给的情况下按照供需曲线和均衡点就能够决定产业的市场价格了。这样流动性并不能推高产业的利率，取得利益，产业中的流动性也是互相进行竞争的，一个产业中的流动性多了，利率下降，就一定要向其他流动性不足的产业转移，那些需求弹性大，只能够承受较低利率的产业也就有了融资的机会，竞争的结果就是各行各业得到了均衡。对于存在刚需、可以价格转嫁的产业也是要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制约的，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因为流动性的过剩而额外的价格增加超过其他行业的，反而是如果出现通胀则是均衡的通胀，先得到流动性的经济实体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充裕能够渔利的地方就要小。中国现在的一刀切调控导致热钱最先得到流动性，而且在流动性紧缺的时候不均衡剧烈，导致热钱渔利的空间很大，越调控热钱

实际上是越得利的，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改变。这里流动性就是定价权的决定因素，整体流动性不足，定价权就在拥有流动性的游资、热钱和投机者手里；而市场流动性足了，流动性也就均衡了，被渔利的空间也就小了。

还有人会说需求弹性大的行业如果流动性流出的话，行业减产、供给不足就会让价格上来，就会接受较高的利率，再吸引资金的回流，但是在这里这个调整机制也是失灵的，原因就是在这些行业内流动性不足，没有定价权被盘剥，但是对方并不是让你破产，只不过给你最低的价格而已，这个价格偏离均衡点但是还是没有离开交易区间，就如稀土产业、铜冶炼加工产业，他们给你的价格或者加工费是刚刚好让你维持正的现金流。这样我们的企业破产不了，只是以前投资的设备折旧等无法收回，不生产投资全部成为垃圾，生产却收不回投资或者没有赢利。就如前面说的中国生产玩具是 1 元人民币的成本，给你一元零几分他可以卖 3 美元，但是他不会给你不到一块钱，让你破产，他给你的价格是让你长不大、做不强、受制于人的价格。所以在这里是“看不见的手”失灵，而“看得见的手”决定了定价权，对付这样的“看得见的手”以及其定价权，我们也需要“看得见的手”。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为在整个流动性紧缩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弹性是最大的，原因就是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老百姓必须挣到足够的钱来生存，在行业受到紧缩的时候会导致大量企业退出，致使劳动力需求下降，失业率上升，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紧缩的流动性不均衡的时候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最慢。如果计算了通胀和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实际上是下降的，而且劳动力的行业工资水平也能够反映劳动力所处行业的流动性情况。金融行业劳动力价格最高，原因就是金融业是流动性的水源，而且市场经济在资金紧张时让资金链不断，就是生命生死线，对于资金的刚需是最大的。而以农民工为主的建筑行业是薪酬水平最低的。能够与国际流动性接轨的电信、网络等的工资也是比较好的。西方为了在通胀中保护老百姓的收入，实际上西方的通胀是通过政府负债给老百姓增加福利和减税而实现的。奥巴马上台竞选的时候拉着富人巴菲特说要加税，现在也进入了减税的行列，在福利和减税方面注入流动性就是把原来最容易被流动性不均衡盘剥的劳动力市场变成了流动性的水源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微观上针对特定市场的调控。我们保

民生是在通胀压力下政局稳定的关键，而我们的流动性注入的却是外来的热钱，我们需要的就是在民生领域也搞一个流动性的注入点，让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在全球通胀的模式下中国一国之力难以完全抗拒世界的整体通胀，在全球一体化时也难以抗拒通胀的输入，我们更主要的是让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跑赢通胀，这样中国的老百姓收入所带来的流动性就有输出的机会。以这样的输出对冲外来的通胀输入，才能够达到国家经济的均衡，否则流动性的不均衡一定会不断地持续下去，也不断地给热钱创造渔利的机会。

流动性不均衡这样的现象西方社会也是存在的，现在西方在讲他们通缩和流动性的淤积，也就是因为在微观上的不均衡使得流动性产生利益趋向所导致的，但是他们与中国不同的是流动性越宽松的地方反而流动性越充裕。银行里有大量的现金而惜贷，企业缺钱却贷不到款，科技和网络在硅谷甚至出现了泡沫。之所以造成这样正好与中国情况相反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资金不是在追求利益，而是在规避风险，也就是在原来流动性紧缺的地方由于紧缺所造成的产业运营压力在经济危机中破产的风险极大，因此不论利率多高资金也是要撤出的，就如高利贷要是成为死贷再高的利息也是没有意义一样，流动性宽裕的地方资金集中，反而安全，就如我们在熊市中的机构抱团取暖一样。对于美国是有钞现差价的，钱不存银行拿出来，将来再使用或者回银行去是要有损失的，因为银行也是会破产的，导致多余的钱存储于大银行和保守的银行寻求安全，因为破产的时候优先保护小储户，让10美元以下存款的本金不受损失的政策使得大资金在破产时的损失概率更大。2008年经济危机给银行业留下的黑洞是整个资本社会所害怕的，雷曼兄弟这样的公司都可以一夜之间破产，银行需要自身堆积流动性，给客户显示安全，如果此时银行的存贷比再高昂的话势必引发存款人的担忧，就要被挤兑了。在其他高风险的面前导致原来投资科技股泡沫的风险反而相对减小了，同时在其他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下，科技股泡沫的投资收益与风险的比例关系也更有吸引力了，因此社会富余资金投资于科技股，期待大回报和有人接下一棒，从而造成了流动性的不均衡，这样的不均衡在通胀的情况下又以囤积物资来博弈定价权最安全。西方可以囤积天量的资源产品，他们的囤积行为会造成物资的紧缺，给需要物资的新兴国家带来更大的资源压力和通胀压力，而新兴国家的资源性紧缺所带来的通胀反而

给他们的流动性过剩下的囤积行为带来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发展中国家资源外流所输送的，因此不要对于西方流动性淤积的问题没事偷着乐，要看到它们这样的淤积转为囤积以后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通胀压力和资源紧缺压力。因此对于西方的情况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资金的趋向是赢利还是安全，不同的趋向对于流动性紧缺和宽松的作用也不一样，对于定价权的影响不能忽视。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讲“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不是哪一方的力量来定价，也没有定价权，但是西方在宣传微观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同时又在把博弈定价权当作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以学说的理想状态掩盖底下的掠夺。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出清假设就是定价权不存在假设，而定价权恰恰是存在的，因此西方微观经济理论发挥“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是有问题的，任由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放纵控制定价权的资本肆意的掠夺。面对这样的定价权博弈，为了社会公平和国家民族利益，就是应当政府调控干预的。我们由此也可以认识到提高中国的经济理论水平的重要和微观上发挥政府职能进行调控的必要。因为这里我们是有立场的，在全球化以后，全球市场才是经济学当中的宏观，我们属于微观，有我们国家的根本立场，在国家和民族没有融合成为一体的时候，面对宏观的全球一定要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能任由“看不见的手”在全球进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这里的普世价值就是丛林法则，而不是美国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利益下，不要说美国怎么样保护私有财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规定了限制私人持有的黄金数量，超过部分征收，否则为犯罪，以此控制了黄金超过 800 美元、20 倍暴涨趋势，这根本不是美国的价值观。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就知道美国的普世价值是忽悠人的。这里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微观上的不均衡有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行微观调控和博弈国际定价权也有国际政治的需要，是国家的根本，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了。

宏观的以静制动与微观调控

目前世界的流动性处于极大的不均衡和不稳定之中，美国不是流动性不足的通缩，而是流动性淤积和外流的通缩，中国是流动性输入和通胀恐慌下外汇占款货币被动发行泛滥和通胀恐慌下货币乘数过高的衍生，一旦信心有所变化，

美国资金内流或者经济看好银行增贷，美国就会流动性泛滥和通胀；而中国一旦热钱外流导致外汇占款减少，货币就会被强制紧缩或者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恐慌使得企业持币货币乘数降低，中国立即会进入通缩。这样的不稳定和波动变化还可以在不同行业中同时出现流动性的泛滥和紧缩，这是一个博弈的不稳定平衡。因此对于这样的难局，我们现在的政策应当是什么实际上根本没有看清楚，其难就难在看不清楚该怎样做，而我们看不清楚的同时我们的对手也是没有看清楚的，这样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什么也不要做！看别人先出手怎样做，再想对策后发制人。如果我们先行动，别人就可以看着我们的出牌的情况而决策，他们选择怎样的出牌，美国的各种政策太极拳就是要看我们的政策出来之后再决定他们行动的方向。

中国在现阶段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但中国的高利率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此时中国一些部门在高利率和去库存的压力下大量抛售中国的战略储备物资，进入了残酷的去库存、去产能阶段，但如果等真的危机开始后储备已经抛售光了，那个时候又如何应付？基于世界资源紧缺的长期性和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我们判断未来世界即将进入通胀的时代，是必然的长期趋势，在通胀初期一个国家不是储备资源，而是在高利率的压力下“去库存”，不得不把战略资源抛售，平抑物价，或者在利率的压力下不得不低价抛售库存，这将对于国家的定价权造成根本的影响，国家的控制力要因此下降。与此同时，我们抽紧流动性会加大社会的囤积成本，让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源存储都进入去库存，被抛售，被竞争者得到，进行囤积，将来只能高价购买通胀后的资源，那么整个国家经济的定价权就要易主了。因此将“政府调控”等同于“宏观调控”，再以宏观调控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对于社会信心状态的影响是负面的，是要额外付出代价的。

宏观调控是制定规则，而具体的政府调控行政干预则是作为裁判的政府部门置身规则之外亲自下场比赛了。中国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太多了，政府的积极行为的背后经常是部门利益甚至是权力寻租。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要耐心等待热钱的动作，等待美联储对于 QE 和利率的方向更加明确之后再行动。我们的国家战略储备要留到最后的时刻再使用，如果你先把牌出光了，以后就没有牌打，只能任人宰割了。在这里等待是关键，大家比耐心的时候到了。

现在美元、欧元、日元竞相贬值，如果其他货币区未以同样速率贬值，又让印钞多出来的热钱流入，渔利变成资产，则无疑相当于一场对非美元、欧元、日元货币区的财富洗劫。如果欧洲对于美国的印钞采取以泡沫对抗泡沫的方式，我们能够独立对抗世界而把全球的流动性都给收取了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疏通而不是堵截，中国能够堵截全球流动性吗？疏导的过程就是要让流动性更加均衡，避免局部的流动性过于泛滥或者紧缺，保障民生，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通胀，生活水准得到保障。这里更重要的是微观调控，而不是宏观调控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我们很多人高喊改革，但改革了几十年还要改革？一种政策周期的开始时和结束前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早动作使得我们的政策的效果越来越降低，也就是减少了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市场的手段力度。但是中国各方都想积极行动，进行改革，而不是无为而治，原因就是对于一些操作者而言，积极行动不但可以得到权力寻租的机会，也可以获得政绩。此外我们的评价体系是被外国所控制的，学术界的规则也是他们定的，学术到一定程度后，得按照几个大家的指挥棒走，否则在国际期刊上发不出文章来，没有文章在单位就难混，因此我们国内学校、研究所、专家学阀们的导向都顺着人家。国际上的一群老狐狸在引导着我们的行动，符合他们利益的就各种“点赞”，包括忽悠说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西方的主要领导人和金融舵手云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是与西方的发达相比还是属于“乌鸦”阶段，我们发展的奶酪是被西方的狐狸们觊觎的，他们积极地鼓励着乌鸦唱歌，如果你真的唱歌了，奶酪就掉下去被他们吃掉了。这个千年来的寓言在今天还是有巨大的实际意义的，认清自己价值和在世界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所图，不要因妄动而给老狐狸们带来机会。

相对于我们前面提出的微观调控，我们在宏观上要以静制动，背后要看到宏观与微观的相对性。在全球一体化和金融化的今天，中国的宏观政策相对于一体化的全球就是一个微观问题，而中国的一个行业政策，由于中国很多行业产业是世界工厂，已经占据世界产量的优势地位，对于这个行业产业就是一个宏观的政策。中国原来的条块分割在现在的地球也上演了，一个个国家就是块，而一个个行业产业就是条。中国不能与美国比，美国有调控整个世界的主导权，

美元是世界货币。那么中国在这样宏观的问题上就要坚持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方法，要坚持“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以世界的规则来限制美国的霸权，这本身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在微观上，对于产业尤其是国内的产业，就要按照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方法，要坚持不均衡，要有“看得见的手”进行微观调控，这样才是博弈美国金融霸权的根本。在具体的流动性不均衡问题上，对于保障国家根本的地方就是要紧缩，而对于中国经济博弈定价权、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提高劳动力价格等方面又要投放流动性，如对于稀土这样的中国优势资源，要以它来博弈世界其他国家优势资源的供给，就需要给它更多的流动性。对这样的行业就应当有激进的措施，其中最激进的措施之一就是把它的产品直接变成流动性，实行稀土货币政策，就如当年美国的白银法案，一夜之间把白银的价格从0.25美元提高到1.29美元一样。同时对于科技等重要核心产业也要加大流动性，我们在此已经走出可喜的一步。据路透社消息称，中国政府正考虑未来5年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多投资多达1.5万亿美元。政府希望，此举能够加快中国从全球廉价商品出口国向高附加值科技提供商的转型。中国的调结构政策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微观调控的政策，中国走出危机需要高科技的支持，历史经验表明世界各国走出经济危机也都是依靠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来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不只是税收，也可以发债券，然后央行收购债券，财政政策就转化为货币政策了，债券也可以收回热钱进入证券市场的流动性。虽然同样是货币增发，但用途不同决定去向不同，去向不同，结果自然不同。在这里微观调控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回顾西方历史，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美国搞了星球大战，拉动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由此美国的半导体工业领先全球，从而产生了庞大的计算机工业，让美国走出危机；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美国又搞了互联网络，网络的大发展让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现在美国在新能源、转基因、生物医疗等领域又找到了走出危机的钥匙。美国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扶持根本不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一种微观上的政府调控。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为美国企业的大多数研发费用买了单，等于是一次对于科技的大规模政府补贴，并且以军工的名义排斥了外国的竞争和贸易的反补贴措施。而美国对于网络泡沫更是在金融政策上进行创造，居然可以让亏损的企业也上市

融资。市场对于社交平台和手机软件的高涨热情促使风险投资家们争先恐后地向初创不久的科技企业大笔砸钱。这样的泡沫是美国再次以泡沫走出危机的手段。所有这些措施都集中了大量的流动性，给美国的经济创造了巨大的活力，因此我们也应当从中得到启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也需要以充裕的流动性扶持中国的战略产业。这些流动性不但保障了战略产业的发展，更保障了在这些战略产业发展当中的分配权益。没有定价权的战略产业不会保持长久的，没有流动性支持的科研成果一样会廉价的抛售或者无法实施。

现在世界的流动性已经泛滥了，流动性到市场里面就如把水加到面里，把水对进去容易，取出来难，某些地方水多了，不是把多的地方的水拿出来，而是增加面或者在水少的地方加水。现在世界都在印钞兑入泡沫，只有我们在挤出流动性，兑入和挤出的成本是严重不对等的，对于世界的泡沫攻势中国不可能全面对抗，但是必须保住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微观调控。对于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方面，进行流动性松紧不同的调控就是微观调控，而在整体的宏观政策方面则保持不动，把“看得见的手”交给微观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因此我们要采取宏观的以静制动和微观的积极政策，进行全方位的微观调控，控制中国关键产业的定价权，对抗世界的通胀和掠夺。

中国定价权在于国内市场的全球影响力

中国博弈世界定价权的关键在于国内市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流动性与定价权的关系，世界的金融制高点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的，他们可以通过金融优势印钞来增加流动性，他们的印钞是全球买单的。中国是做不到的，而中国能够做到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中国就有征税权，我们再将征税权延伸，就是在中国建立市场，尤其是建立影响全球的市场尤为关键。

可以看一下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当初世界的三大矿山寻求以指数型定价，笔者就撰文指出指数型定价不可怕，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指数，要让这个指数基于国内市场。中国的铁矿石交易是远远大于世界贸易水平的，这个市场建立了，监管和征税的权利就在我们了。现在钢协建立中国铁矿石的现货交易机制，三大矿山都参加了，如果他们进行一些价格同盟的操作，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反垄

断。市场在国内不仅仅意味着征税权，市场的所在地自然而然地取得了司法的管辖权。

中国博弈世界的定价权，需要产业的集中度，时刻不要被所谓的垄断舆论所忽悠。西方的巨头都是垄断的，虽然他们宣称所谓的垄断是市场自然产生的，不是因他们的行政行为而诞生的，实际上他们的市场产生垄断的背后是他们国际军事和金融的强权，就如世界的石油垄断是美国多少次战争的结果，战争和流血难道就比中国的国家行政行为更好吗？中国的油价问题如果打破所谓的垄断，结果一定是铁矿石进口的乱象，石油打破垄断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石油变成铁矿石，不是降低了价格，而是抬高了价格。

建立市场还需要平衡国家对于矿藏的所有权。中石油所谓的暴利实际上是无偿把国家所有的石油变成了企业所有导致的。中国今年开始建设石油期货市场，是非常关键的举措，未来国内的石油价格应当是期货市场价格，在期货市场上中国的炼油厂来买入石油。而对于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业务，我们应当把他们变成采油服务合同和勘探服务合同，给石油公司采油费和勘探费，这些服务合同是可以各方竞争的，由价格低廉和采出率高、环保好等最优的企业取得。中国有三家大的石油公司就足以竞争了，所采出来的石油在支付了采油服务合同、勘探服务合同的费用或者份额以后，石油是归属国家的，这些石油就可以在国内的石油期货平台上进行交易，交易所产生的利润给中国社保，给所有的中国人带来福利，或者直接分配给广大的人民。

现在中国的低油价是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的，中国使用石油的汽车的所有者是一部分高端的富人，虽然石油价格高会进入 CPI 的涨价，但是这个涨价与富人开车所得到的是不成比例的，更何况在中国 1/3 的经济份额是外向型的。在石油的使用中外向型所占有的比例则更高，中国的低油价是补贴全世界的，这与美国的低油价，人人有车，自己消费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中国的有车富人和外向型经济买办占据了中国的话语权，人们听到的声音未必是中国真正的民意民心！

中国石油资源国有，石油企业只不过是采油或者勘探服务，这样的模式在中国也不是首创，中国当前土地的招拍挂模式就是这样的。由于土地的招拍挂，原来占有土地的单位私下转让土地，赚取土地暴利的事情被彻底限制，真正地

体现了土地国有，国家取得主要的土地收益和控制权。中国目前对于石油领域也是一样的，资源是国家的，要彻底的体现国有！这种采油服务模式对于中国的石油企业也不是第一次，中石油取得伊拉克石油的开采权就是这样的采油服务合同模式，每桶石油的开采费用才2~4美元，与上百美元的油价相比，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得到了石油价值绝大部分，同样的模式为什么在国内就不能采取呢?

所以油价问题的关键是石油利益的分配问题，不能让低油价补贴和利益输送属于有巨大话语权的富人和外国经济，而应让石油价值真正属于人民，石油价值得到的钱应当进入社保基金，惠及全民，或者直接把这个收益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中国公民。改善石油定价机制比成品油价格管制更重要，我们建立石油期货市场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中国买入石油的企业很多不是垄断的，三大石油公司之外还有全世界的石油企业，也不是垄断的，中国需要垄断国有石油利益，让这些利益合理合法的属于人民，让中国的宝贵资源造福子孙后代。

石油的问题延伸到稀土也是类似的，这样的稀土期货市场如果建立起来，所有开采稀土的要先把稀土卖给国家，国家再在市场上投放，这个市场还向世界所有的稀土生产、加工、储藏的企业开放，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交易。以国家的力量来维护定价权是非常重要的，而铁矿石更是如此，通过类似土地招拍挂的形式把中国的所有铁矿石产量都放到交易平台之上，这个平台再向全球开放。这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平台，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会对于全球的铁矿石价格有决定性的作用。

国家把国有资源统一招拍挂这样的行为不是垄断，而是产权人行使自己产权的行为，不能被有些组织恶意的妖魔化，成为所谓的垄断！中国把国有的财富变成了一些国企的企业财富，看似产权只不过在国家不同的口袋里面，但是按照西方的法理意义却大不相同，变成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就是国家垄断、行政垄断等。但是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使所有权，这与企业经营获利是两码事，垄断是针对企业经营而言的，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有思维的高度。中国的资源搞定价权，一定要在所有权的层面而不是经营权的层面，世界的产油国大多数都是国家石油公司，但是这些国家石油公司为什么没有变成所谓的垄断，就是因为这些国家非常好地利用了规则，变成了所有权，层面的博弈，而

不是经营博弈。就如前面所举例的伊拉克对中石油的做法，伊拉克没有自己搞一家石油公司垄断采油，采油是全球招标的，但是采出的石油属于国家，这体现了国家的所有权而不是经营垄断，对此似是而非的法理差别，中国的决策者要在法制层面上深入理解。

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把国际贸易的壁垒降低到极限，但是这些协议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却不能干涉，我们建立国内市场，面向全球，就回避了这样的限制。如果我们是在海关上的行为或者内外有别，则我们在 WTO 就要受到指责和攻击，对此国内政策如何博弈，如何让国内市场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把政策层面降低到国内层面，在国内练好内功，以国内政策和国内市场规则博弈世界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很多细分的市场，中国是占据世界的主要部分的。例如：铁矿石的采购和稀土的供给，就算不是占据绝对优势也有很大影响。中国的石油和石油进口就是如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很多大宗商品的进口也是如此，把握住这个市场就是牵住了牛鼻子。最近香港联交所竞争收购 LME，就是很有意义的行为，中国的市场是中国香港竞购重要的砝码，中国也要利用好香港的对外窗口和平台。中国在国内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控制、监管有世界影响力的市场，远远比在外国已经建立好的市场上博弈要具备优势和可行性。

第 4 节　央行新工具 SLF 与微观调控

2014 年春节前夕，央行政策工具库里面的常备借贷便利（SLF）（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 SLF。）悄然登场。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宣布，针对现金大量投放等节假日因素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央行 20 日已通过所谓“常备借贷便利”向大型商业银行提供短期流动性。央行称，自 2014 年 1 月 20 日起，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同时于 21 日开展了 2550 亿元人民币的逆

回购操作。

笔者注意到，市场的眼球全部汇聚到了央行逆回购操作上，但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举措恰恰是这个貌似不起眼并为人们所忽略的“常备借贷便利”。逆回购只有2000多亿，而常备借贷便利（SLF）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中国20万亿的地方债都可以成为其抵押物，再加上几十万亿其他贷款当中的优质部分，比如首套房房贷等，加上杠杆衍生，SLF的数量是可以成天量的，而且有以短养长的可能。现在很多影子银行就是利用同业拆借的短期资金“养”长期债券的，但有了SLF以后央行也可以成为影子银行的央行，因此央行推出常备借贷便利的意义巨大，堪比美联储QE。新生事物刚出现时大家害怕步子迈大了容易出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创新的动力会越来越强。为了不给市场过多套利空间，现在SLF的利率是不低的，但随着SLF余额的不断扩大，其利率会逐步降低，否则这个工具就要成为摆设了，因此以后SLF的作用在中国金融市场会起到QE对美国资本市场类似的作用。

再仔细看常备借贷便利权力下放省市试点名单，居然一次性试点10个省市！其中不乏北京、深圳、广东、山东等核心省市，实际等于全面铺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央行逆回购操作的资金是少于往年的，但收到了股市大涨的效果，常备借贷便利这个央行新的金融工具初显威力。市场对于这个新工具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但笔者认为SLF的威力未来会远超逆回购，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央行金融工具。这是中国版QE的开始。

什么是常备借贷便利

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SLF），是全球大多数中央银行都设立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名称各异，如美联储的贴现窗口（Discount Window）、欧央行的边际贷款便利（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英格兰银行的操作性常备便利（Operational Standing Facility）、日本银行的补充贷款便利（Complementary Lending Facility）、加拿大央行的常备流动性便利（Standing Liquidity Facility）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货币调控效果，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常备借贷便利（SLF）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金融机构可根据自身流动性需求申请常备借贷便利。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初

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

所谓“常备借贷便利”，何为便利？何为常备？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方便的出现，可以快速反应。SLF 的名称与西方央行类似工具的名称有一定区别，意味着这个工具是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使用的细节层面，央行应当还在不断地完善过程当中，所以对这个工具表现的非常低调。这个常备借贷便利，可以在宏观层面流动性总体不宽松的基础上，实现地方局部上的定向宽松。中国在总体不能宽松流动性的情况下，SLF 这个金融工具所带来的宽松，可以算是中国版的 QE 了。

常备借贷便利与流动性危机

2013 年 6 月的“钱荒”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整个危机当中我们注意到央行进行逆回购的数额是不高的，但危机却得到平稳缓解，央行公开说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对此市场迷惑不已；直到后来央行新的资产负债表出来，其中赫然出现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余额，我们才开始看到这个神秘新工具的身影。

事实上央行早在 2013 年初就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这一工具。在 2013 年底央行公布了 2013 年 1 ~9 月份此项新工具的操作情况，6 ~9 月份余额分别为 4160 亿元、3960 亿元、4100 亿元、3860 亿元。央行表示，在 2013 年春节和 6 月份流动性异常波动时，都采取了相关操作。这是央行首次公开承认对于流动性危机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我们应当注意到流动性紧张并不是货币紧缺，中国的货币 M2 总量已经超过了 100 万亿美元，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到 2013 年年底已经达到 110 万亿美元 M2 以上。如此货币泛滥的情况下却出现流动性危机、利率高涨，背后的原因就是流动性的不均衡，流动性紧缺的地方被渔利，人为推高了利率。而 SLF 直接面对具体的流动性被挤兑的机构，达到了精准的微调，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发挥了 SLF 工具比逆回购和降准等工具更有力、更细腻的作用。

进入 2014 年，流动性在春节前再度出现紧张和不均衡的情况，央行这一次就是逆回购和 SLF 的共同使用，而且对于 SLF 扩大试点到省市。对此市场反应热烈，当日股市止跌反弹，次日股市大涨，SLF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LF 给中国

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急需的流动性宽松。以 SLF 带来的宏观稳健、微观宽松的局面，可以算是中国版的 QE 吧。地方债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央行把 SLF 权力下放地方，实际上就是受到地方的影响。美国的 QE 是在联邦和美联储层面操作，中国版的 QE 则是在地方和央行地方机构层面进行。

美联储与常备借贷便利监管

常备借贷便利一直是西方央行的有力武器，而这个工具却不容易被人发现其存在，因为这个借贷工具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也是一对一保密的。在央行报告余额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归还，不会出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它最能体现现代金融体系当中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作用。

美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当中，常规借贷便利是经常使用的，外界却难觅其踪迹，但我们可以从一位美国参议员对此的调查当中看到端倪。美国桑德斯参议员表示，通过国会有关委员会对美联储资本负债表的审计，得知美联储向多家美国和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了超过 16 万亿美元的秘密援助。例如大摩的总裁同时也是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就从美联储获得了 3900 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此外，大摩还是美联储紧急救助贷款项目的清算银行之一。事实上美联储几乎把所有的紧急贷款项目都外包给了像大摩、摩根斯坦利和富国银行那样的私人承包商，这些私人承包商也获得了美联储数万亿美元的贷款，且利率接近于零。如此巨大的钞票从美联储发行，相对于美国当年的 8 万亿美元广义货币，从美联储出来的这些所谓援助达到 16 万亿美元而且是基础货币，能够起到过桥资金的作用。在金融衍生品不监管、不公开、M3 不公开和私密的 SLF 之下，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把整个金融系统的损失对冲到某一个机构，然后让该机构破产，雷曼的破产就很可疑。因此在美国公开的 QE 宽松下，这个不公开的 SLF 宽松也可以看做是整体 QE 的一部分的。而在中国，我们的央行是国有的人民银行，以这样的阴谋诡计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是不会做的，但我们的商业银行也有民营和外资了。为了取得 SLF 资金，在抵押物不合格和压低风险利率评级等方面，会有人动贿赂央行官员的歪脑筋，这比央行、银监会分离后对具体企业在原有的微观上的权力大多了。新的权力寻租空间有了，权力监管也需要及时到位。

SLF 能够带来巨量的金融宽松和流动性，胸怀利器则杀心顿起，这样的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监管的要求是很高的，利益输送也是存在的，我们也应当注意其中的腐败和寻租空间，更要注意到金融间谍和金融战的可能性，国家金融安全部门对此是应当高度关注的。所以我们不应忽视 SLF 带来的宽松作用，中国现在下放地方 SLF 试点，SLF 应当大发展，中国版的 QE 应当是要开始了。

延伸阅读 美国参议员桑德斯报告①

对于美联储账目的首次彻查揭示出在本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美联储如何以骇人听闻的 16 万亿美元巨款救援美国和外国金融机构及企业的令人瞠目的新细节。本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一年前获得国会通过的华尔街改革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指导政府问责局实施了这项审计行动。桑德斯参议员表示，通过这次审计我们现在得知美联储向多家美国和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了超过 16 万亿美元的秘密援助。

根据政府问责局的审计报告，最严重的问题是美联储单方面向从韩国到英国苏格兰的一系列外国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而美国政府中的任何机构未经国会和总统直接批准都无权向外国银行和企业提供援助。

国会的非党派独立调查也确认美联储缺乏综合机制去平衡利益冲突。事实上根据这份审计报告，美联储甚至授予其雇员和私人承包商以利益冲突豁免权，使他们能够在已经获得紧急救援贷款的金融机构和公司继续投资。

如大摩的总裁同时也是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从美联储获得了 3900 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此外，大摩还是美联储紧急救助贷款项目的清算银行之一。

这份审计报告还有一项引起争议的发现，政府问责局说在 2009 年 9 月 19 日，现任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杜得利得到豁免权，使其在 AIG 和 GE 得到美联储救援贷款的同时还保持其在这两家公司的投资。根据审计报告，美联储声称，之所以没有让杜得利卖掉其持有的上述企业股票，是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反而会显得救援本身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

① http：//www. sanders. senate. gov/newsroom/news/？id = 9e2a4ea8 - 6e73 - 4be2 - a753 - 62060dcbb3c3

对桑德斯参议员来说，结论很简单，一旦一个人工作的公司获得美联储的救援资金，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在美联储董事会获得一席之地。

调查还披露美联储将大多数紧急贷款项目外包给其私人承包商，这些承包商中有很多也获得了这批利息极低的秘密贷款。

事实上美联储几乎把所有的紧急贷款项目都外包给了像大摩、摩根斯坦利和富国银行那样的私人承包商，这些私人承包商也获得了美联储数万亿美元的贷款，且利率接近于零。所有联储转包其经济贷款项目的合同中有2/3不需要竞标，获得这些无竞标合同中最大单的是摩根斯坦利，它承包了美联储救援 AIG 的紧急贷款项目，合同金额达到了 1.08 亿美元。

常备借贷便利与逆回购、降准

我们认识常备借贷便利工具的价值，要从它与逆回购、降准相比较的角度来进行认识。认清 SLF 的与众不同，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笔者将之称作中国版的 QE。

逆回购为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逆回购操作是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逆回购到期则为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的操作。常备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一对一”交易，针对性强；常备借贷便利的交易对手覆盖面广，通常覆盖存款金融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

逆回购不是针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同时逆回购对于抵押资产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是国债这种无风险有价债券，央行购买国债是一个标准的货币发行模式。逆回购是对公开市场的操作，是以价格也就是利率为唯一指标的。有了这些门槛的存在，在逆回购操作上基本是大银行的天下。而常备借贷便利则针对所有金融机构，而且要求对手机构抵押的金融资产也是比较宽的，可以接受银行优质信贷资产的抵押。常备借贷便利是不公开的，是对于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抵押资产给予不同价格的，是一事一议的，可以解决很多具体层面的银行的问题，尤其是中小银行的问题，有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逆回购是定期公开招标、限量发行。常备和便利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是可以随时进行的，是没有限

制的。

金融的一个特性就是货币在体系内流转的时候，从一个机构到另外一个机构都是要有钱赚的，没有利益货币流动性不会从我兜里到你兜里的。在逆回购模式下只有大银行能够参与，小银行必须以更高成本从大银行那里拿资金，对于社会流动性不均衡的调整是不利的。难于参与逆回购的机构会被市场过度渔利和挤兑，会恐慌性抛售资产，也给外来热钱找到渔利的空间，对于中国金融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央行给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工具还有一个就是降准，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则是对于所有机构的货币流动性放松，不论你是否紧缺都会宽松，且相对长期，是长期政策，与逆回购和 SLF 的短期流动性调节相比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动作，而在中国现阶段通胀压力和紧缩需求下，降准的条件并不具备。对于具体的流动性不均衡调控需求，SLF 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无论是降准还是逆回购，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于汇率和外汇流动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不是只有国内市场，外贸、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都是重要的层面，而具体的、一对一的 SLF 与逆回购和降准相比，对于汇率市场和外汇流动的影响是最小的，是在局部精准地解决具体流动性问题。尤其是央行这一次将 SLF 的权力下放地方分支机构试点，地方分支机构的 SLF 的作用是被限制在局部的，因为我们的金融规则是不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异地抵押、异地贷款的，地方央行分支机构的 SLF 流动性对于地区外的传导性是受限的，即使是放松也不利于热钱出逃。因此笔者认为未来 SLF 这个金融工具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的金融难以宽松还有一个重要的压力就是通胀，虽然目前中国的 CPI 处于低位，但通胀的威胁随时存在。在应对通胀层面，我们是不能降准的，而且逆回购也是受限的，甚至我们还要发行央票，但对抗通胀的紧缩当中也不能让金融系统因此出危机。对于紧缩下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我们就需要 SLF 的定向流动性支持。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中国的地区差异巨大，各种行业差异也巨大，不同区域的流动性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同的，宏观金融工具完全一刀切也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有针对特定区域、特定对象进行特定流动性调控的手段，SLF 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利率市场化以后，不同银行的风险是不同的，银行是会破产的，因此不同银行就应当有不同的利率，有与之对应的工具。SLF 就是对应于不同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调控的工具，可以对于特定机构制定特定条件和特定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离不开的工具。SLF 有利于均衡流动性，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局部的作用与西方央行的 QE 是相当的。

因此通过比较，SLF 比逆回购和降准更适合目前中国的国情，也是金融改革所必需的金融工具，丰富了央行的金融武器库，具有其他金融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其他金融工具受限的情况下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常备借贷便利与地方债

央行的新工具常备借贷便利 SLF 悄然登场扩容，这个工具的到来和宽松，给中国地方债的出路指明了方向。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比例越来越高，有人认为已经达到 20 万亿元，还有一些隐形债务，未来随着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建设，债务还可能提高。对于妖魔化中国地方债务的问题笔者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中国地方债务都是有实际资产作抵押的抵押债务，与外国政府的信用债务完全不同，可以通过抵押物的变现和自身运营现金流来偿债，西方的债务则一定要财政盈余才可以偿还，他们的赤字是不断扩大的。

但中国的地方债也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利率和流动性。地方债务规模巨大，往往超过地方金融市场规模 10% 以上。在偿债的时候金融系统为了偿债就会运转失灵，造成流动性异常紧张，同时由于这样的流动性紧张，利率居高不下也是个大问题，而这些问题，SLF 这个金融工具都可以解决。因此解决地方债问题，急需 SLF 这个工具。

在地方债的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下，央行把 SLF 金融工具的权力下放地方可谓是及时雨。2014 年 1 月 21 日央行开始 10 个省市进行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是非常重大的历史进步，央行称，此次开展的部分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是对短期流动性调节方式的创新尝试，主要解决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完善中央银行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正常流动性供给的渠道。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的对象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

期限分为隔夜、7天和14天三个档次。常备借贷便利全部以抵押方式操作。此次试点接受的合格抵押品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公司信用债等债券资产，央行通过设置不同的抵押率来控制信用风险。SLF在央行还有1~3个月的期限，如果真如央行所说的常备和便利，那么是可以以短养长的。对于现在不得不在同业拆借市场以短养长的众多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解脱。

这种情况下，SLF的实质就是对于地方债的QE，持有地方债务的地方金融机构一旦出现流动性的危机，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无可奈何，不再局限在银行间拆放市场，上高利率融资。在银行间市场各大行的融资都是要加几十到几百个点的利率的，它们的需求同时推高银行间拆放利率，高利率又反过来使得它们的流动性更紧张，造成正反馈下的地方金融系统性危机。现在有了SLF，地方金融机构可以直接通过SLF从地方上的央行分支机构直接取得货币，这些货币还是基础货币，在地方金融市场上可以杠杆衍生，调节地方局部的流动性不均衡。对于中国这样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在局部地区、特定领域实行精确制导式的货币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央行此举对应对目前中国地方债困局来讲，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在SLF给地方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压低地方债的利率，让地方债的利率回到央行指导的SLF利率的框架之内，因为银行可以以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公司信用债等债券资产作为SLF的抵押。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债权都是可以通过SLF取得资金的，没有必要再通过拉存款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高成本的借贷来维持资金平衡。借贷成本大幅度下降，地方债的利率将要走低，而中国地方金融的超高利率早已经是地方经济的癌症，但降低利率又不能直接大规模地货币宽松逆回购，更不能采取长期性地宽松降低准备金的方式，SLF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能够在此时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地创设这样的金融工具，是我们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果。

中国的金融问题是流动性不均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更好的方式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调控。虽然SLF现在的利率不低，但随着它余额的增加必然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现在利率不低只是为了不给市场过多的套利空间。

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的发酵，解决问题需要QE，而中国地方债的流动性不

足、利率过高问题，也需要宽松，这个 SLF 就是中国版的 QE。有了 SLF，在央行权力下放的时候就可以宽松了，我们对 SLF 可以宽松的余地是没有限制的。未来中国央行的 SLF 余额是可以达到美国 QE 的规模的，我们可能在未来看到巨大的央行 SLF 余额。1 月 20 日央行下放 SLF 权的行为，给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让我们看到中国地方债的出路，因此这两天资本市场反转型的上涨就可以理解了。SLF 是中国版的 QE，中国 20 万亿的地方债都可以通过 SLF 从央行找到流动性支持，SLF 的余额是可以到天量的，这为我们解决地方债问题找到了出路。我们要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

常备借贷便利与利率市场化

要理解 SLF 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中国与西方在利率方面的差别。中国利率是管制的，我们的利率是客户端的利率，也就是对于存款人的存款利率和对于贷款人的贷款利率，而西方的利率是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利率，是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再贴现利率。至于商业银行给具体的存款人和贷款人多少利率则是由市场来决定，因此中国和西方的央行加息和降息，叫一个名字，却完全不是一码事。但我们现在要利率市场化了，这个市场化就要求存款与贷款的利率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央行一刀切，那么我们央行怎么控制利率呢？

对于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如果我们的客户端利率都市场化放开，那么央行操控什么利率呢？总不能因为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就不要央行的利率工具了吧！甚至可以说现在允许商业银行对央行的存贷款利率进行上浮或者下浮，实际上就是允许它们对于央行的利率政策打折扣，央行利率政策是被弱化的。因此再来一件央行控制银行间利率的工具是必须的。目前中国的银行间货币市场就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提供 1 年期以内的银行间拆放交易，由此生成银行间拆放利率，并成为银行间货币交易价格的标杆。类似这样的市场西方各国也有，但这与央行直接操作这个市场还是有差别的，央行一般是间接对这个市场进行影响，而不是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一方，央行作为监管者也不适合作为交易的一方。中国央行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央票的发行和逆回购上。

因此我们的央行是需要一个与商业金融机构进行直接交易的利率指标的。

虽然在中国央行也是作为最终贷款人，只不过是银行要破产时由央行来兜底，并不是在日常当中遇到困难后央行给它们贷款。以至于中国银行业有一个概念就是找央行贷款等于承认自己经营失败，等于要行长下课。“下课危机”就成了让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高压线。这样的商业银行与央行的关系，不是西方正常的金融关系，而是中国银行业不破产下特定的关系。中国商业银行到央行进行贴现的利率也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关系，不是银行根据市场需要主动与央行发生的关系。而 SLF 是要改变这样的中国金融潜规则的，商业银行获取 SLF 的支持是根据市场规则自主选择的，这样 SLF 的利率就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央行按照市场规则制定执行的银行间利率。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之下，中国的金融体制必然与世界主流接轨，中国的客户端利率管制和央行的客户端利率工具必然要放弃，从而也要放弃央行利率政策导致的固定利差，这个固定利差实际上是银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收取的利息税；取而代之的则是央行对于银行间的利率价格。SLF 的利率与银行间的拆放利率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利率市场是一个信用市场，而央行的 SLF 则是一个抵押利率市场，是央行的再贴现。一个是公开的竞价市场，一个是秘密的议价市场，一个是市场参与人之间的市场，一个是参与人与管理者按规则交易的市场。央行对 SLF 是在公开的基准价格之上按照不同抵押物和借款人的风险决定利率的市场，这两个市场本身也是互为补充的。只有央行与商业银行交易的市场规则建立起来，央行定价的利率才能发挥市场作用，央行能够控制银行间利率了，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才有条件开始，央行才具备放开客户端存贷款利率的可能。因此有 SLF 这样的利率标杆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

SLF 对于压低利率有重大的意义。在美国，QE 到了 QE3、QE4 以后，主要的目的也是压低利率，美联储已经在淡化 QE 的提法而主要提低利率政策了。在中国，如果商业银行能够随时取得低成本的 SLF，则对于优质贷款的发放就不会有顾虑。当今很多房贷都发放不下来，原因就是上海同业拆借市场的短期利率已经高于房贷利率，银行放款是赔本的，但如果房贷作为优良贷款资产可以通过 SLF 抵押从央行取得资金，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就算是银行通过 SLF 以短养长，SLF 的短期低利率在养长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是把年化利率不计复利变成计算复利而已，这个在央行 SLF 短期利率基础上计算复利年化长期利率，会成为中

国无风险利率的标杆。央行对这个利率的操作，就变成了市场化后央行放弃客户端利率后新的利率工具，这个利率的调节，就将与西方的央行利率接轨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SLF对于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具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的金融改革已经悄然开始了。SLF权力下放省市名为试点，而且是一次性“试点”10个主要省市，实际等于SLF工具在大干快上，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中国刚刚创造的SLF这个金融工具，从创始之初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进行预调微调，也是在局部有针对性地调整，其借助的金融工具就是SLF。宏观的短期工具逆回购和长期工具降准都比不上这有针对性的微观精确制导工具，而中国的地方债危机，也要依赖SLF找到出路，地方债的SLF融资实际就是地方版的QE。地方债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QE的输血在地方上得到解决。创设这个工具，就是中国特色的QE的开始，就是在宏观不宽松的背景下实现地方局部的微观宽松。以中国之大、各地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以地方为主的金融宽松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金融工具就是SLF。进入2014年，中国金融的深化改革开始真正发力，SLF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金融工具。

央行还将不断金融创新

随着外汇占款增长规模的台阶式下降，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逻辑正在改变。再贷款正成为基础货币补充的重要工具。此外，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也是目前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6月18日报道，为了更好地确定和引导中期政策利率，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全称初译为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从PSL的定义、期限来看，和再贷款非常类似，或将逐步取代再贷款。推出PSL的目标，是央行试图借PSL的利率水平，打造出一个中期政策利率。

PSL是一个中期利率工具，对地方债等中长期贷款的利率将有更大的主导作用，这样的新工具与已经铺开的SFL相比，它的周期更长；与传统的央行再贷款相比，它是一个抵押货币发放工具，而不是央行再贷款的信用发放货币的方式。对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货币疯狂，保留再贷款成为一种对银行惩罚的潜规

则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哪一家银行申请银行再贷款，哪一家银行行长就要下课。PSL是非常适合中国的，因为中国的银行贷款绝大多数是抵押贷款，本身是有抵押品的，以新工具调节银行间的流动性是适合中国的金融创新。

这样的新工具对降低整体利率水平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但这个工具的作用更体现于微观，是央行与具体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货币发放，有助于精准发放至流动性紧缺的领域。这也体现我们现在提出的应对经济压力的微刺激的政策。以后这个工具的利率提高和收紧，也可以变成微紧缩，这是一个微观调控的手段。央行创设新工具，通过新工具的利率标准影响市场，而不是整体降息的宏观政策，PSL利率本身对市场的利率的指导性可能更强，在原有整体利率下，我们正在实现利率的浮动，放宽利率浮动空间，以后的利率调控水平要变成PSL利率将更可能。

2014年7月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金融改革与跨境监管专题会议吹风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相关金融事宜发表看法。周小川表示，央行准备用短期和中期政策工具来引导利率水平，正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他还提到新的工具将会要求抵押品。此前媒体报道称中国央行正在创设简称PSL的新型基础货币投放工具，以这种定义和期限类似再贷款的贷款利率可更好地确定和引导中期政策利率。以新的利率工具让银行间利率取代现在的客户端利率，是中国利率市场化必经的阶段，因此PSL和SLF的出现非常关键。

中国的金融需要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货币信用的独立而不是依附于外汇。央行的不断创新，新的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将为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

第5节　中国走向低利率是崛起关键

从西方利率二元化认知中国利率

中国社会的利率自古以来一直是很高的，古代有著名的“九出十三进”的规则，也就是当铺当期一般是一季粮食的时间，不到半年，最多是半年，当10

元扣除所谓的手续费等只给 9 元，而你赎当则要 13 元，也就是实际利率 4/9 即 44.4%，这只不过是半年，如果算出年化利率则是 108.6%，是当年翻倍的。按照王安石改革，《青苗法》给老百姓的优惠利率也是 20% ~30%，老百姓实际拿到的还要高，这样的当铺规则在中国流传千年。

西方社会的利率则与中国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会认为收取利息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受到了教会的抵制。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所谓“肮脏”的金融是让最没有地位的犹太人去把持的，或者是让外来的野蛮人维京海盗参与；而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则汇集了丰富的流动性，西方的历史利率与中国的利率相比则是不高的。据《利率史》记载，西方人在近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利率都是低于 10% 甚至 5% 的，东方与西方二者在贸易领域相遇进行竞争，到底谁能够获胜这不是很清楚吗？资金紧张的一方不得不低价出售货物，尽快取得现金，因此定价权一定是拱手让人的。中国历史利率的高企与中国古代社会流动性紧张密切相关，中国的改朝换代人口波动特别大。每一次新王朝的建立，人均贵金属占有量都处于快速下降的状态，而古代的生产力发展缓慢，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很快，人均占有量越来越少的结果使得市面上的货币总是处于不断紧缩的状态，这样的紧箍咒下利率怎么能够不高？西方则是国家间战争不断、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紧缩压力是没有的，后来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驱赶导致了流动性的集中和价格革命，利率低就可以理解了。而不同的利率决定了不同的流动性水平，也决定了谁拥有定价权，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和定价权的博弈处于下风，闭关锁国就这样产生了。

到了现代社会我们看到中美的利率差别依然很大，这个差别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进一步拉大。要知道在次债危机前美联储的利率也是有 5.25% 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美联储的最高利率也到过 21.5% 的，但现在美国实行了几乎零利率的政策，美联储表态还要让低利率长期化，进一步保持与中国的利率差距。不过中国的利率不是市场化的，中国是利率二元化，也就是民间有一个高利率的黑市，同时国家银行难以贷款，可以权力寻租。中国的名义利率几乎都是要高于美国利率的。我们 90 年代的存款利率就很高，甚至还有保值贴补，不过在这个时期，高的是名义利率。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通胀过程中，人民币的通胀水平就算以美元汇率衡量，汇率从 2 到 8，也是贬值为原来的

1/4。在这个贬值下实际利率是不高的，这不高的实际利率是当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动力，而且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老百姓同期的收入水平增长很快，毕业大学生的工资从90年代初的79元，到90年代末基本能够拿到2000元了，工资增长是快于通胀的。

90年代以前的银行高利息，基本上是一种风险利率，银行贷款的坏账风险很大，这与古代的高利贷有类似的地方。在古代高利贷的管理成本和坏账成本是很大的，对于管理成本实际上是有服务的投入的，坏账很多则增加了风险。中国古代是一件旧衣服和几个铜板也可以典当的，这样的小额贷款管理费用巨大，而过去的高利贷很多人倾家荡产也还不起，血本无归。

对于市场化的利率高企，我们尤其不能忽视民间小额贷款的风险和管理成本。一个项目的管理成本有很大的份额是固定成本，这样贷款不论大小实际的管理成本差别不大，但是分担到利率上的比例却因贷款的数额差别极大。同时小企业也没有足够的信用和抵押品，小企业都还处于一个风险巨大的领域，坏账的风险也非常大，贷款的利率当中应当有坏账的体现。还有一点就是高利贷需要有一个很高的追账成本，在中国要钱是不易的，所以有欠钱的是爷爷，借钱的是孙子的说法。在中国经常是钱借给别人要回来都不易，更不要说要高息了，这个要账是需要灰色成本的，这个灰色成本有黑社会的介入，也有当权者的介入，这个成本最后也必定要摊销在高利贷的利率当中。对于所谓高利贷，其成本也是很高的，不是简单的与银行利率的差额，是带有大量间接成本的，因此有这些成本的存在，要将贷款的利率压得很低是不可能的。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在美联储利率接近于零的基础上是运行在历史高位的，利率从百分之十几甚至到20%，信用卡违约利率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30%。美国的风险利率也是极高的，我们更可以看到对于欧债危机下的希腊国债，其国债的收益率也可以达到100%左右，这样的高利率背后就是风险的影响。

但现在很多中国的高利率变的无风险，这就是扭曲的暴利了。在我们银行改制以后，银行的风险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而且国家还对银行破产进行兜底，也就是说在借贷的时候都要有很好的抵押、担保，保障银行债权实现。同时如果银行真的出现了风险，这个风险还是由国家承担，银行的债权人是不承担的，因此高息揽储也就没有了顾虑。中国利率的问题是银行本来应当是风险利率的，

但在政府和政策的护佑下变成了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这么高，则是社会和经济难以承受之重。结果就是经济分配出现了扭曲，实业因为高利率摇摇欲坠，而银行则赚得盆满钵溢。

民间借贷也有良性的时候，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在2005年之前的浙江民间融资，企业信誉非常好，年坏账率一般低于1%，年利息也不高，普遍在年息12%～20%，即月息一般不超过2分。这种省内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好，无形中造就了当地百姓普遍敢于借贷、全民借贷的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前，民间借贷在浙江省发展一直很规范，信誉也好。而利息都在国家保护的4倍之内，以月息1分2，1分5的居多，以前外地金融机构和企业都跑到温州，学习温州的民间借贷的信用是如何维系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这样表示。浙江民间融资利率相对不高的背后就是建立在风险小的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到风险对于利率的影响。

美国的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在美联储0.25%的利率下，美国的信用卡利率和信用卡违约利率达到历史高位，信用卡违约利率可以达到30%。美国的很多商业贷款利率也是10%以上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利率就普遍在13%～14%，但美国很多情况下的利率只有1%，融资租赁买飞机、轮船的利率是3%左右，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二元化，这个二元化是由美国金融制度造就的。因为西方在存款保险制度之下，在金融机构破产的时候破产债权的赔付有特别的办法，这个办法经过社会的商业博弈就造成利率二元化的分野。具体的方式就是对大储户和小储户的赔付标准是不一样的，美国就是优先赔付10万美元以内的储户，这样小储户就可以放心地存款，可以追求银行的高利息；而大企业因为破产以后优先赔付小储户，风险被杠杆放大，就要选择安全的银行。这样就使得很多小银行也有发展的空间，因为他们可以给出高利息，从事一些高风险的贷款，吸引一些小客户；而大银行为了足够的安全就只能给低利息，吸引大客户，从事安全的贷款。这样银行的业务就可以有分化，来适应各种细分的市场，造就了大银行追求无风险，小银行在风险中逐利，利率自然是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分化。

美联储的风险利率与无风险利率的分化，实际上是受美国QE等影响，改变了货币供需曲线的结果。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在传统情况下价格越高供给量越

大，需求越小；价格越低供给量越小，需求越大。但 QE 使得价格越低越 QE，供给量越大的，而价格高，利率高，人们担心风险反而供给量越小。就如希腊国债收益率不断飙升，反而更没有人去买，这样的供给曲线后弯则与需求曲线可能会有两个交叉的均衡点，一个在低利率的一方，体现无风险利率，另外一个则在高端，是风险利率。我们如果要与西方的央行接轨，也需要像那样调整我们的货币供需曲线，我们即使是不调整，由于资本管制的开放和坚持汇率稳定，国际货币流动也会让我们的货币供需曲线与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供需曲线靠拢；而国际货币供需曲线中美元占 70% 的份额，其形状也是与美国国内的情况接近的，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现实，否则不一致的地方就意味着要被金融套利。

中国由于没有这样的分化，所有的利率都是无风险的利率，以风险利率作无风险导致银行赚取了暴利。同时因为没有这样的二元分化，好项目找不到低成本的资金，真正的无风险利率却不能降低，导致社会的利率整体走高，因此中国的利率没有考虑风险因素，是中国利率的重大问题。这个利率不带风险因素也与我们的金融体制和政策有关，美联储利率是银行间的利率，是银行与央行之间的利率；我们的央行利率则是终端的利率，是管制银行面对客户的利率。我们央行的贷款利率本身就是一刀切的，这个一刀切就无法反映风险对于利率的影响，从而造成中国的金融体系内所有的利率没有区分贷款的风险大小，造成市场的扭曲和利率的过高。而解决这个问题，西方通过不均衡的清偿和银行破产机制，以市场博弈建立利率二元化潜规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资本定价——利率的接轨是非常重要的层面（见图 6－1、图 6－2、图 6－3）。

借贷变风险投资带来利率扭曲

中国的高利率盛行，我们也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尤其是什么因素支持了如此高的风险利率，支持了民间的高利贷市场。我们经过研究发现，中国的高利贷本身带有风险投资的性质，把借贷当作投资，必然是利率的扭曲。

对于高利贷的盛行，最流行的说法是把高利贷的盛行说成了各种资本和资金、货币持有者的贪婪，但是有谁会往另外的方面去想一下，这么高的利率为什么还有人会支付？高利贷繁盛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这里我们还要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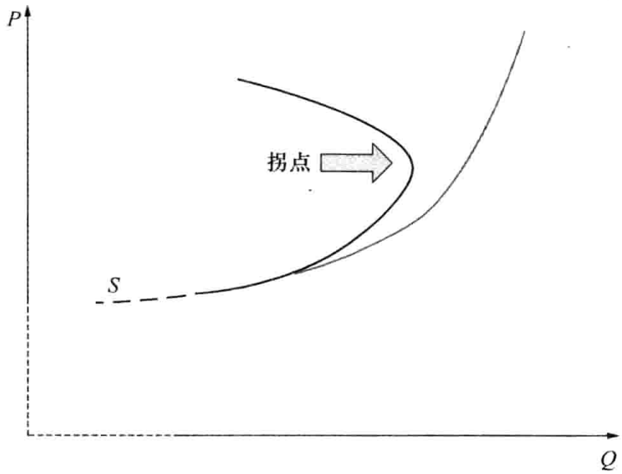


图 6－1　银行是否可以破产导致的供给曲线差别

注：在银行可能破产的情况下，大家出于对风险的担心，并不是利率越高货币供应越多。我们可以看到欧债危机下的希腊国债，利率百分之好几十也没有多少资金进入，货币供给量对希腊国债这样的利率反而是融不到钱了。同时美国的金融制度规定了 10 万美元以下优先保护的政策，导致大资金寻求更安全，在高利率资金不够安全的情况下大资金是放弃的，而小资金数量则显著不足，因此在银行会破产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在供给曲线的高端也是会出现弯曲的。对于中国这种银行不会破产的情况，老百姓存款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收益高，只要利率高资金就趋之若骛，资金供给曲线就不会出现后弯的状态。

曲线和坐标轴上面的虚线表示有所省略，我们只绘了再利率高端的曲线进行示意，低端的曲线部分省略了。图中的灰线代表中国的。

的就是高利贷产生实际上是有更深刻的原因，大家争着放贷只不过是一个现象，能够给高利贷者支付高昂的利息也只是一个现象。资本的性质本来就是逐利的，高利贷能够提供更高的利润，当然就会有资本的青睐，这没有什么好妖魔化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各个产业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创造了大量的创业投资机会是产生大量的高利贷借款人最重要的方面，它决定了高利贷有足够多的借款人。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不断催生创业机会的平台，在创业的高成长阶段，对于当前的民间投资一般就是 3 ~ 5 年收回成本和投资，在经济不佳的时候一两年能够收回投资的项目才敢参与。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国的民间投资的市盈率实际上只有 3 ~ 5 倍，甚至只有 1 ~ 2 倍，这是一个超额的回报，这个回报是完全可以承担 30% 以上利率的高利贷的。如果再有一定的低利率的银行贷款或者渠道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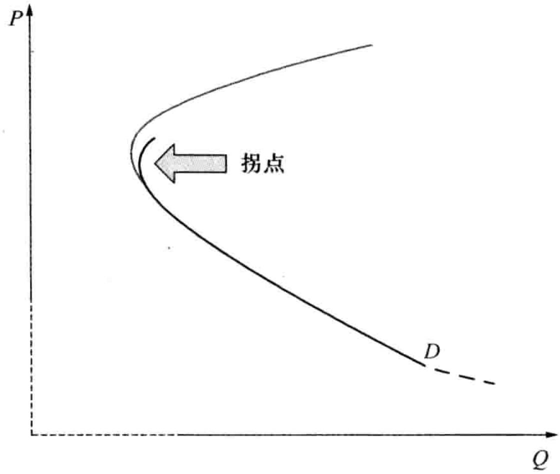


图6－2　中外货币需求曲线的差别

注：对资金的需求曲线，在利率不正常的抬高以后货币的流通速度会降低，按照费雪方程式M的数量需求会加大，因此在利率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需求曲线的弯曲。但中国与西方这样的弯曲是不同的，西方的弯曲是不会太长的，因为有银行的破产，债权人会选择让客户尽快破产而不是客户借贷利率越来越高，形成庞氏骗局，所以需求曲线后弯以后曲线不会有多长。在中国则不同，没有破产下每一个企业危机下都不断借贷更高利率的贷款，直到现金流彻底断裂，因此中国的曲线会比西方长得多。中国经济增长快很多行业是一年翻番，这意味着能够接受的边际利率达到100%。西方产业成熟，增长有限，利率承担也有限，利率超过增长就是庞氏骗局，西方形成庞氏骗局的门槛比中国低；同时西方风险投资VC非常发达，真的有高增长行业也是VC替代借贷，变成资本供给，不是货币供给，但中国高利贷还有风险投资的一面，所以中国的需求曲线尾端是比西方长很多的。

曲线和坐标轴上面的虚线表示有所省略，我们只绘了再利率高端的曲线进行示意，低端的曲线部分省略了，图中的灰线代表中国的。

加大投资回报的杠杆，民间项目可以承担的利率是更高的，对于高利贷的利率不是没有承担的可能。对于中国房地产的高速发展，高利贷创造了很多空手套白狼和白手起家的机会，在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和房价高涨的时期，高利贷支持下的开发也创造出来了很多富翁。由于房地产本身的融资特性，房地产成为特别容易被高利贷参与的领域。

民间高利率和民间投资高收益的背后，是中国民间投资的高风险。中国是没有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大环境的，创业的途径不是风险投资而是高利贷！对于正常的银行贷款在西方也是门槛很高的，要有足够的信誉或者资产抵押，不是一般的创业公司所能够完成的，甚至不是上市公司所能够完成的。以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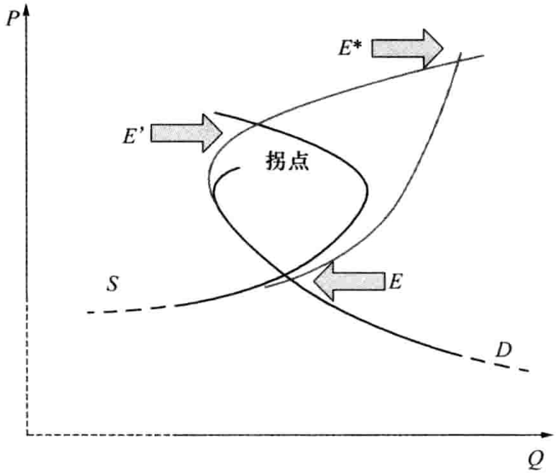


图 6-3 畸形供需曲线与高利贷形成机制

注：对高利贷的形成，我们可以看供需曲线的高端的情况。高端出现弯曲和长短的不同，对于中外曲线的均衡点不同，揭示中外高利率的不同。对需求曲线，西方由于 VC 等的替代作用和低增长下对庞氏骗局的严打，需求曲线不够长会导致均衡点没有形成，因此高利贷不存在。对在供给曲线后弯的西方，就算供给曲线够长，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很容易在高端形成均衡点，这样的均衡点最多就是和西方的垃圾债相类似；而中国的均衡点则在没有弯曲的情况下不容易形成，形成的均衡点无论利率还是货币的数量都要多于西方，这是真正的高利贷，所以中国的高利贷市场规模和利率等都要高于西方，这从中外货币的供需曲线是可以看出的。

曲线和坐标轴上面的虚线表示有所省略，我们只绘了再利率高端的曲线进行示意，低端的曲线部分省略了，图中的灰线代表中国的。

等国的低利率，上市公司之所以要股权融资或者债券融资而不是在银行低息贷款，背后也是银行贷款的门槛极高。美国的 M2 低于中国的背后是美国的贷款数量低于中国，中国的很多银行贷款给高风险公司的创业，实际上就是变成了风险投资，而且这样的风险在中国的央行利率下还没有在利率上得到体现，这样的贷款变成风险投资的背后具有巨大的利益输送空间，也让商业银行和存款人承担了不合理的风险，就如几年前谁能贷到款谁就有成功的权利一样。

对于外国的风险投资，业内人士都知道 VC 的资金是最贵的，看似高市盈率的 PE 背后是对于你的业务有对赌协议的，你完不成约定的业绩就要被清除出来了。这实际上比高利贷还要苛刻，因为在借高利贷的时候所有的借款人都是有计算的，如果完成业绩绝对足够还贷而且赚钱机会很大，只要完成了就成功了，相比风险投资的资金代价甚至更小，因为还债以后股权全部是自己的。更进一

步的是高利贷者没有谁会主动限制借钱人的成功，但是对于签署了对赌协议的风险融资，却有不良 VC 恶意博弈，以限制创业者的成功，达到对赌协议让创业者出局的条件。这里中国的高利贷就是投资，类似 VC 投资，最初借贷高利贷而不是向风险投资等融资，除了中国保障投资权益不足和 VC 不够发达的因素以外，高利贷的资金成本有一定的优势也是重要的原因。

我们知道借贷与投资最本质的不同就是风险的承担不一样，在公司清算的时候债权和股权的清偿顺序也不同，借贷是不参与公司管理的，而投资不是。中国的借贷投资化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推高了利率，在利率当中含有极高的风险成分，推高了风险利率，带动整个社会的利率高企，这也使得我们本来无风险的利率由于社会利率不区分风险程度而平均化的抬高了。这就是当前中国利率扭曲的现状，因此我们的证券发行需要改革，需要有足够的企业直接融资，股票和垃圾债券都是需要的。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发行更加容易的股票，是压低风险利率的关键。没有对风险收益的投资性市场，就没有发达的 VC 产业，这些产业没有，所有都依靠利率来解决问题，利率怎么能够不扭曲呢！这个扭曲同样表现在货币资金的供给需求曲线之上，本来应当 VC 要求高，回报高价格的资金，变成了一个低价格的资金，提供了供给；而本来低价格的资金，却因供给不足，相关曲线发生了扭曲，带来市场无法调整的问题。

余额宝兴起与体制漏洞

2013 年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大事就是余额宝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出现了，一时间互联网大佬的类似产品也不断涌现，但在美国怎么就没有余额宝类似的产品，或者说不像余额宝这样石破天惊，而余额宝为什么能够兴起呢？这背后就是钻了体制的漏洞。

余额宝是以销售基金代理的名义收取客户的账户余额的，但基金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余额宝没有给老百姓足够的提示，老百姓把钱放到余额宝里面，就认为是放到了储蓄里面。一下子余额宝就汇集了数千亿元资金，同类资金的规模在 2014 年初达到了上万亿元。现在余额宝的规模大约在 4500 亿元，2015 年应该过万亿元。余额宝兴起以后，2014 年 1 月份的银行存款减

少 9402 亿元，而去年同期银行存款增加 7499 亿元。对储蓄存款带来明显的搬家效应。

余额宝能够成功，关键就是余额宝把本来的风险利率变成了无风险利率，从而赚取了利差。在西方的体制之下，余额宝的风险会比普通的老百姓存款的风险要大，而中国则是越大的资金越有谈判能力，进行协议存款，取得更好的收益，余额宝的协议存款的收益居然可以达到 7% 以上，超过央行规定的贷款利率。哪一个银行流动性紧张了，就到哪个银行高息存款，取得更高的利润。余额宝把老百姓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取得了对银行的谈判优势。余额宝这样做似乎是遏制银行的金融垄断，惠及老百姓的行为，但实际上却是恶意地将风险利率变成无风险利率，抬高社会的利率成本，造成热钱套利空间和中国对外的资本定价偏高，使中国在国际定价权竞争中处于劣势。

余额宝的行为为什么国际上就不存在呢？这里的原因很简单，西方银行是可以破产的，西方银行破产以后的清偿是优先照顾小存款户的，美国就是 10 万美元以下的存款得到优先清偿。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敢把散户的资金聚集成巨资？如果是分散的，在银行破产的时候有存款保险制度都要足额清偿，但如余额宝那样聚沙成塔以后，只保障清偿你 10 万美元，剩下的要所有的 10 万美元以下的储户得到足额清偿以后才有可能按照比例兑付存款，于是存款的风险被杠杆放大，有谁敢这样？在美国的制度下，大资金不敢追求高利率的，中国则是大资金可以放心的追求高利率，有与银行谈判的资本，这就是银行不破产的缘故。再进一步讲，给高利息的银行必然是受到流动性压力的银行，这样的银行破产的概率是更高的，赚取这个收益就是火中取栗。因此在西方的金融体制下，如马云这样把散户资金集中起来存储取得利益是不会受到市场追捧的。所以余额宝的利益就是来自于中国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制度漏洞。

与余额宝思路类似的是雷曼公司的迷你债，这个西方的金融产品也是汇集散户的小资金投资，看似安全的银行货币基金。随着雷曼的破产，这个债券的风险出来了，但民众对于这个债券根本没有充分理解其中的风险，是按照无风险进行投资的。雷曼迷你债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理由就是代理出售这些债券时有误导，而余额宝就没有误导吗？充分告知民众风险了吗？尤其是阿里巴巴还没有金融、银行等相关执照，是有变相揽储嫌疑的，如果引发社会动荡

以后会怎么样？央行可没有给网络公司输入流动性的机制。我们央行目前是利率管制的，银行高息揽储本身就是非法的，很多银行非法高息揽储的背后是体外循环，搞表外业务，这些非法行为本身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应当承担更大的风险，在银行破产的时候非法的存款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血本无归。余额宝的高于存款利息涉嫌违规，尤其是随时支取不受罚息，把活期变成了定期也是涉嫌违规的，这些协议都是可以依法无效的。因此不出问题则好，如果发生危机，一定是风险极大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有银行破产，损失了几百亿，这本来只有不到其存款规模的1/10，但恐慌的人群会挤兑赎回的，这个时候央行能够如对待银行那样注入流动性预防挤兑吗？在赎回的时候能够公平清偿吗？如果最后赎回的没有钱了，全部损失老百姓能够认可吗？阿里巴巴是代理人，一点都不用赔会导致什么？深想一下就知道风险利率变成无风险利率的可怕！余额宝的推广说的是把群众不用的钱存在余额宝里可以赚取高息，谁也没有明确强调这是去买基金，如果明说把多余的钱购买基金，用户的想法就可能不同。在购买基金上余额宝没有金融牌照，名义上是由一个它控制的基金代理，余额宝赚取代理佣金，阿里巴巴把余额宝定义为它代理的产品，但消费者有多少人认为余额宝不是阿里巴巴的？阿里巴巴要通过这个余额宝在投资市场上讲故事，但如果阿里巴巴是代理人的话，那么对于余额宝的责任是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上阿里巴巴对于余额宝的损失是不承担责任的。

我们信任余额宝是因为阿里巴巴的实力，如果是一个小券商的理财基金，大家会这样热衷吗？而且在余额宝赚钱以后，既然阿里巴巴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人，余额宝的权利是否可以转移到其他券商，阿里巴巴是否有这样的转让权利，这个问题的不清楚给阿里巴巴很大的操作空间，谁能够保障阿里巴巴不会如当年转让支付宝一样进行股权剥离？这个剥离大家只关心了投资者的层面，而对于支付宝使用者的层面权益是怎样的？大家当年可以放心使用支付宝的背景是支付宝由阿里巴巴集团所有，是由集团的财富背书的，变成个人注册金额有限的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这个信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银行的设立是受到严格审批的，世界各国对于设立银行和银行控制人的改变都是要有说法的，但余额宝在这些地方就是一个模糊地带，这也是我们银行金融制度的模糊地带。

这些模糊地带产生了大量浑水摸鱼的准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利益来源就是推高中国的利率，以高额利率吸引资源，再从其他地方的金融资源紧缺中渔利，加大中国体制内的金融不均衡。

所以余额宝的兴起，就是钻了中国银行业不破产和没有保护小储户机制的漏洞，钻了金融和互联网边界不清的漏洞，这漏洞造成中国的利率扭曲，也造成中国金融系统的特有风险。把风险利率当作无风险利率，这也是一种泡沫，必然是要有一次危机教育投资者的。只要中国开放了银行破产和储蓄保险制度，一次破产就足够了，会让大家知道余额宝怎样就成了雷曼迷你债。这里央行和银监会对高息揽储的监管是不能缺位的。

中国开放银行业破产意义重大

中国对金融业的风险历来是非常看重的，但这个“看重”其实也是扭曲的，因为我们的金融的含义与世界是不同的。在翻译中文金融一词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 Finance，另一个是 Banking。经济是整体不是部门，经济学语境下的金融应当是银行与产业的融合，而不仅仅是产业。西方的金融的含义不是银行业，按照英文金融是 Finance，而不是 Banking（Finance is the commercial or government activity of managing money，debt，credit，and investment），但中国的金融变成了银行业。为了银行的利益实际上是损害了金融行业和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中国经济语境里讲金融，就有这两个含义的不断扭曲，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安全首推金融安全，但这个金融的含义是 Finance，而不是 banking。我们保护金融安全变成了保护银行安全，结果就是银行赚取了暴利，把银行的风险利率变成了无风险利率，成为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不要以为银行的数万亿元坏账有多么可怕，你真的以超常严格的手段保证银行没有坏账和超额利润了以后，不但银行掠夺实业，你还会发现银行之外的民间的高利率导致社会的财富被掠夺损失的要多得多。有这些坏账的利益输送实际上是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也保障了社会利率不可能成为恶性高利贷。中国当前的高利贷也大量破局，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亚于银行坏账的崩盘。看美国对于危机的处理方式，他们可以让雷曼兄弟倒掉，但不会让通用汽车倒掉的，实体经济是更根本的。银行的坏账以更宏观的眼光来看是肉烂在锅里的，是支

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利益输送，就如美国的 QE 是巨大的输送一样。把银行的贷款收紧，尤其没有了信用贷款以后，高利贷的渔利导致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改变才是更关键的事情。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有企业职能，更有社会责任。把金融放得过高的结果就是企业资金链断裂，大量的国有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不得不贱卖。国企贱卖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些企业改制以后看似是焕发了活力，但背后是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推给了社会，大量员工下岗，多少家庭一下子进入了地狱；大量的离退休职工等交给了社保，这也是现在很多专家说中国社保亏空的来源，如果算上社保的损失，实际上是远远高于当年银行的坏账的。但是过度炒作银行坏账，给一些人在国企改制中渔利创造了方便。

美国对于雷曼兄弟和通用汽车的态度已经告诉了世界，一定要全力阻止金融危机变成实体危机，宁可让银行破产也不让实业破产，金融的损失是可以肉烂在锅里的。但是它却让世界各地的骗子们把银行的危机夸大，银行赚取巨额利润的背后是影子银行和热钱赚取更大的利润，是实体经济的垮台！我们知道一个系统的不同参数可能是互相抵触，不能同时优化的。在银行的安全性无限化的背后就是实体风险的更大化，在银行取得暴利的背后是实体经济被拖垮，而美国要振兴本国的制造业，不让中国的实体经济垮掉，怎么可能呢？因此西方的金融骗子们就开足马力了，对于次级债等概念的恶意错误扭曲，就是要掩盖这样的真相。[①] 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危机当中让银行的坏账真的多一些，银行没有这么高的利润，西方的战略投资者怎么能够套现万亿元的利润？如果银行坏账多一些，这些坏账都是实业的所得，虽然是贷款企业亏光了，但这些财富没有消失，又转化到其他企业了。就会让垮掉的实业企业少一些。如果我们的坏账多一些，这些坏账是能够消灭货币的，我们的货币流通量就要少一些，外资进来渔利也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我们的通胀压力就要小了。如果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承担更多，风险贷款多一些，高利贷的空间就要大大减少了。财务成本降低、人力成本增加才有空间，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提高。如果我

① 次级债本来绝大多数情况是最优债券，却被金融骗子蛊惑，让所有中国老百姓认为次级债近似等于垃圾债，而不是次品债。事实上，其是《巴塞尔协议》规定的可以作为银行次级资本的债券。是一些人利用望文生义来欺诈老百姓！这些能够作为银行次级资本的债券出问题才导致危机，垃圾债的违约是正常现象，早有预计，不会成为危机。

们的资本不再暴利，房地产的泡沫就要挤出了。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房子老百姓买不起，只有获利的资本可以买，如果资本受到损失房价必然回归理性了，所有这些在全局之下不是很有利吗？为什么在欧美都推迟执行《巴塞尔协议》的时候，中国却要抢先提前达到进度要求呢？中国的金融安全不是不足，而是冗余的！

我们总说热钱在中国渔利，总说各种套利基金是无风险获利，但在西方大家都知道对冲基金是风险最大的投资，看似无风险怎么就成了风险巨大？这背后就是银行会破产的，世界没有给你套利足够的流动性。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你的套利资金很可能是大比例，甚至100%损失的。而套利追求的利差经常不到1%，甚至1‰，如此微小的利差面对100%的可能损失，难道不是风险巨大？银行会破产的风险，就是限制热钱套利渔利的有力武器，而在国际金融骗子主导的银行安全冗余，就是热钱套利的有效保障。如果我们能够开放银行破产，热钱套利的动机就会大幅度降低。

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格局之下，哪个国家不是拼尽全力，不可以在某个领域有太多的冗余的，这个冗余的出现，必定是要以其他损失为代价，要在其他地方被渔利和买单的。因此如果中国的银行业能够多承担风险和责任，而不是自己赚翻了，中国实业就不至于这么的惨，中国的民间借贷利率就没有那么高，中国的通胀压力就没有那么大，老百姓的收入可以提高、房价可以控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被错误概念所得出的错误结论所引导，让银行的安全性冗余，让银行赚取了过高利润，尤其是银行后面的热钱、外资、高利贷、影子银行等都是中国发展的食利者。老百姓没有分享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果实，社会矛盾剧增，这些问题的背后恰恰是错误的决策所导致的中国资产和财富的大量外流，数额达到几十万亿元，这样的骗子才是真正应当被千夫所指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与骗子们的忽悠密切相关，但是骗子却不断地拿着这些问题妖魔化中国，指责中国，还要通过这样的指责披上所谓的敢说“真话”的外衣。

中国要融入世界，取消利率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是必然的方向。在这里大家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限制，各个银行恶性竞争，抬高利率，那么金融不就混乱了吗？其实这样的担心是没道理的，因为国际上银行是会破产的，银行能

破产是实现利率市场化所必需的。在银行能够破产的情况下，存款人不仅仅要考虑利息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考虑资金安全。那些利息畸高的银行，也就意味着风险更高，也是大家不敢存款的，这是市场决定的。在这样的市场之下出现通胀，对于存款的竞争，西方国家的百姓就会比中国老百姓要趋于理性，通胀下中国的银行违规高息揽储是常态，中国老百姓没有银行破产的概念，导致银行的高息揽储可以不受市场的有力制约。西方的老百姓面对银行的高息是有很强的安全风险意识的，银行是没有非理性的，因此存款的利率就得到了遏制，使得通胀的正反馈受到遏制，不会失控变成恶性通胀。但是中国却可能造成不断地拉高利率，高涨的利率的财务成本使得物价更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正反馈，把通胀发展成为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胀。

还有很多人认为在银行会破产的情况下，会不会导致利率变得更高，最后还是要实业买单，就如古代高利贷是利率，要覆盖钱庄坏账风险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片面的判断，美国的成功经验恰恰是利用银行可以破产，通过社会的博弈竞争，成功地压低了利率。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吸取西方的智慧精华。美国的做法就是存款保险制度和倾向小账户的破产清偿制度，在银行破产的时候优先清偿10万美元以下的账户，对这些账户还有存款保险。结果就是对于大资金存款的风险是被杠杆放大的，对于小银行可以不计风险的高息，小客户也可以放心的追逐高息。存款保险制度也解决了银行破产的社会风险，而承揽高息的小银行可以从事高风险的贷款，满足社会风险融资的需要。但银行真正的存款大户则是超过10万美元的大客户，由于银行破产的时候他们的资金风险是被杠杆放大的，因此他们选择银行的标准是风险考虑远远高于收益考虑的。要赚取高利润他们可以买垃圾债券和风险投资，存银行的大资金就是安全第一，因此银行给他们的利息可以非常低，甚至不给，而银行的贷款和资产则必须足够的安全，安全的贷款和资产的利率或者收益率都很低。博弈的结果就是在西方金融体系内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的二元化，社会发展需要的无风险利率可以变得很低，而风险利率则充分考虑市场风险多出来的风险收益，这才是公平的体现。中国的金融利率管制和银行不破产则导致风险利率也无风险化，要无风险的利率为这些风险买单，导致无风险利率也很高。风险利率反而是谁贷到款谁就已经赚钱，带有很大的利益输送色彩，成为银行腐败和权力寻

租的空间。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放开银行破产也是非常必要的。

2014 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存款保险制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年存款保险制度有望择机推出。央行的这个表态，表明利率市场化和放开银行破产的进程会大幅度的加快。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 2014 年 6 月 24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作报告（《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研究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对严重违法违规、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依法实施市场退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目前存款保险制度的技术准备和方案研究已经基本就绪。

如果银行可以破产，小户有存款保险制度，那么大客户的风险就要受到考验了。现在我们的银行对待大客户普遍的协议存款在存款保险和银行能够破产的情况下将变得非常的不安全，这样的结果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以利率招标，只问利率的国库存款就是一个大问题。央行规定明确的存款利率，社会上都要遵守，不遵守也只能潜规则，但政府财政的存款却可以堂而皇之的招标，而且招标基本上以利率高低为唯一指标，这本身就是国家与社会在经济层面上的不公平。如果银行可以破产，银行破产时的国库损失怎么办？银监会是否有一定的责任，而追求高利息的国有资产管理者又有什么责任，这也是我们开放银行业破产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国家存款可以受到特殊的保障，这些存款还可以肆意的追求高利息，则在破产清算的时候是对整个经济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在银行能够破产的情况下，国库存款的招标就必须改革了。

国家的国库存款在银行能够破产时怎么办？大资金在银行能够破产的时候怎么办？这在国际上是有现成的答案的，就是政府的国库资金等买卖债券，或者说赎回债券。现在财政存款要高息的同时还给国债支付利息，如果存款不安全了，购买和赎回国债或者其他债券才是合理的选择。政府资金和各种大资金不是青睐于银行存款，而是购买债券的话，中国的债券市场才能够大发展。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于降低利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各种债券的涌现，风险收益在债券市场可以充分的通过市场挤出水分和泡沫，让银行贷款的市场利率可以更无风险化，利率更低。很多高风险的融资可以通过垃圾债券，而比贷款更

安全的融资则也可以用债券来进行，债券的发行者可以提供比银行更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使得债券可以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甚至央行的银行间利率，就如美国短期国债现在低于美联储利率不止一年了一样，社会整体利率能够得到降低。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的银行业没有合理的破产制度，造成了中国金融产业之间的扭曲，推高了利率和热钱套利的动机，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障碍。因此我们不能只看破产的局部微观损失，要更多地看到经济、金融的整体性。国家的崛起和财富积累是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总效益的差值，在让银行破产这个层面，我们降低了社会总成本，也通过银行的优胜劣汰提高了社会总效益，因此非常有意义。

以低利率跻身国际价格体系

别说与中国历史上的高利率相比，西方历史的利率与中国现在的社会利率相比都是很低的。在西方殖民全球的主要时期内，西方的利率是10%以内的，19世纪到二战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率甚至基本在5%以下，而同期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利率则高达40% ~50%，甚至更高。有这样的利率差别，东西方的经济如何竞争？现在中国要崛起成资本社会，资本的价格——利率是不能太高的，怎么样将中国的利率降低到合理程度，是中国博弈世界定价权的关键。

中国的高利率有中国的特定历史原因，中国历来把防通胀当作头等大事，为了防通胀中国可以说是无所不用，中国的高利率与中国的防通胀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更需要看到中国从防通胀到压低利率的历史必然性。对于通胀的成因不要简单说钞票印多了，更要深入地分析一下，中国北京的保姆月工资从21世纪初的300元到现在已经是3000~4000元了，你能够说保姆工资的涨价是通胀吗？如果保姆工资涨价不算，那么相关的农民工工资涨价算不算？再进一步的是农民收入要求提高了以后，会不会导致粮食涨价呢？还有就是如果股市大涨，同样的钱只能买更少的股票，钱在股票面前不值钱了，这不是通胀吗？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全面认识才可以。

中国要崛起，能够在世界价格体系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关键就是中国要有定价权。在本书当中充分论述了定价权与流动性的关系，如

果有充足的流动性，必然是一个低利率的社会。在货币充当媒介的时候，流动性高就表现为利率低；在货币充当商品的时候，流动性高则表现为价格高。我们要控制物价，但我们要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我们要走市场经济，进入资本社会，而资本的定价权则体现在能够实行低利率。我们的货币如果与世界接轨，现在的世界都是一个媒介货币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在通胀压力和经济危机下，世界不是加息而是降息的。为什么要降息，就是因为货币是媒介，而中国的未来如果与世界接轨了，也是与世界一样，需要降息来支持经济发展的。高额的利率是国家定价能力和资本定价权低下的标志，低利率就是资本价格低。在当今的社会能够实现低利率本身就是一项权利，是资本的定价权，这也是金融定价权的核心之一，利率过高是中国当前的主要金融问题之一。

要实现低利率，对占我们货币发行总量 80% 以上的外汇占款发行货币的局面应当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制于外国货币，外汇储备在中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有贬值的压力，贬值的损失由通胀买单，为了防止通胀又要利率弥补。因此改变中国的高利率状态，就是要改变中国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发行货币方式，把外汇储备变成商业银行的储备和政府的储备。货币发行以政府债券和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为主导，同时在当前抗通胀的情况下，央行应当建立中国的储备体系，把货币发行与资源、资产的储备结合起来，让中国的货币成为一定的资源本位货币，这样才有利于保持货币币值，把储备外汇发行货币变成储备资源发行货币。

对于中国的资源储备，国家有专门的储备部门管理，但是这样的储备与央行操作的储备性质是不同的。央行操作储备有其他储备部门所不具备的两大优势。

一是央行操作储备是没有储备的财务成本的，央行是印钞储备资源的，其他储备机构是要承担储备物资的利息成本的。就如各地的土地储备中心，如果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储备土地三年，这三年的利息就要储备价值的 20%，也就是到时候卖地必然要贵 20%，这样的利息就增加了通胀的压力。即使是自有资金，资金也是有成本的，否则这些资金放到银行还有利息呢。

二是央行操作储备会起到货币投放与货币回笼的效果，也就是说央行收购进行储备就是一个发钞的过程，而央行以储备平抑物价是直接的货币回笼。其

他储备部门出售储备物资，所得款项还是存储于商业银行，还是金融体系内的货币。央行出售得到货币以后这些货币就藏在央行不再流通，不是流通体系内的货币了。

购买资源，定向提供流动性，是压低相关产业利率，博弈当前定价权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中国央行购买政府债券的数量实在是太少，导致中国以财政为主的政府投资融资成本依然过高。应当注意到日本的国债负债率特别高，是全球发达国家第一。日本虽然已经是后工业社会，但还是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有仅次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但日本央行资产构成当中外汇所占比例并不高，日本大量的国债是其央行的主要资产。自 1995 年 9 月削减隔夜利率至 0.4% 以来的 17 年里，日本央行一直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日本央行在购买政府债券从而向经济注入流动性方面早于美联储数年，如今甚至购买注入股票基金和债券等的私人部门证券。这些债券成为央行主要的资产来源，央行通过购买债券压低了债券的收益率，也就压低了社会利率，让利率保持在 1% 以下，较低的利率促使日本资本在全球快速扩张。同时日本从工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而且是在通缩下完成的，不要说日本此时的失去的 20 年，这 20 年里面日本的海外投资产生的 GDP 是国内的 1.58 倍。国内资本外流，经济不好，但统计了海外的资产价值则是增长巨大，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未来突破资源瓶颈，离不开海外的投资，也就离不开低成本的资本，因此利率是一定要降低的。所以购买政府等机构的债券，压低债券收益率，也就是压低资本的价格。

美国的 QE 最重要的效果就是压低了利率，背后就是美国的 QE 要输出美元。低利率意味着低的资本价格，是输出资本最重要的竞争力。中国海外投资的屡战屡败就是因为利率决定的资本定价权，我们的资本回报率要求高，是难以在国际市场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就如在几百年前中国的利率与西方相差 10 倍以上，结果就是中国商人全面败给了殖民者。以股票为例，原来股价 5 元，100 元可以买 20 股，后来股价 20 元，只能买 5 股，为什么我们就不把这个叫作通胀呢？如果我们的利率低到西方的水平，我们的股市涨 4 倍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对于通胀要全面认识，低利率本身的价值就是资本定价权，低利率带来了股票的价值重估，这不叫通胀，而叫作价值增长。

欧洲的现在更是彻底的负利率政策了，这样的你存钱还要倒给钱的做法，改变了商业的规则，变成你买到商品就是赚便宜，而不是我们这样，库存商品需要支付高昂的财务成本。在负利率之下，库存与存款相比可以看做是得利的，再也没有去库存的需要，在未来的通胀预期下，可以无所顾忌地抢购资源，做得比美日更狠！欧洲的负利率使得谁拿着欧元，谁就要立即花出去。货币得到了大量的输出，而资源被大量储备。反过来，对于中国的高利率社会，现在却不得不大量去库存，但一旦进入了通胀的模式，没有库存时，你如何能够平抑物价？这里的定价权之争才是关键。

同样的，对于劳动力涨工资所造成的价格上涨也应当叫作价值增长，而不是通胀。中国在崛起和发达以后，劳动力的培养成本也大幅度提高，在中国养孩子 20 多年，到他成为一个劳动力，家庭和社会为之付出的成本有多大？这些成本的增长本身就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增长，在劳动力价值快速增长下，我们不单从事农业的成本会大幅度增加，与人与人服务的成本也增加得飞快。很多人都在抱怨出租车涨价，但是否注意到在发达国家里面哪里有打车族？因此中国进入发达社会更大的通胀压力来自于粮食成本的变化和养一个劳动力的成本变化，来自于劳动力价值的变化，尤其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价格，大量是由劳动力价格所决定的。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不种粮食的，全面依赖国际市场是靠不住的，因为就算国际市场能够满足中国这么大的需求量和物流量，没有全球的军事能力国家安全也要出大问题。就算日韩等小国，他们的粮食也要维持相当大的自给率，日韩的农产品价格是多少我们都应当有概念吧。很多人说农民增收要依靠政府补贴，但现在中国有 50% 的人口是农业人口，怎么可能补贴一半的人，提高其生活水平。还有人说农产品只要涨价，就如当年有了自由市场一样，其他农业要素也要涨价，农民不会增收。但这个逻辑也是错误的，农产品涨价不一定增收，但不涨价绝没有可能增收！历史上的要素涨价是因为化肥、农药、柴油等还没有市场化，现在我们的化肥等都过剩了，都完成了市场化，下面需要的就是农业人口的收入与世界接轨，不能再有工农业剪刀差。这样的结果就是农村的农业生产率要与现在的工业生产率持平，中国的经济与日韩接轨的背后是中国的粮食价格要与日韩接轨，这个接轨反映在价格的上涨上应当是惊人的。日韩很多农产品的价格是中国的 10 倍，就算是日韩

农产品价格的一半又是多少？粮价如果上涨很多人会剧痛，但粮价上涨也惠及一半的农业人口，而如果我们高利率，则还会产生压低劳动力的工资效应。所以虽然物价上涨有社会的剧痛，但低工资更是社会长期的痛苦，高利率更是经济的痛苦和发展的天花板。

很多人说低利率盘剥了老百姓的存款，同时造成通胀，这样的做法对于老人很不公平，他们的一辈子的积蓄就在这样的通胀和低利率当中被消耗掉了，但这里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落后的代价和差距。有些历史成本不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包袱，这段论述的背后是很残酷的事实，那就是老人当年所创造的价值本身在全球接轨的国际视角下看也是很低的，我们不是总在讲接轨吗？我们就不妨接轨一下，站在世界的眼光下看看：当年我国老人一个月的收入等同在美国洗碗、做工两小时所挣的钱，在80年代有多少中国人打着留学的名义到外国刷盘子？我们总说物价涨了多少倍，但我们的劳动力价值也涨了多少呢？在中国的核心大城市很多工作的工资正在与国际价格接轨，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找工作了，中国保姆在北京的工资可以与国际上的菲佣相比了。老年人当年攒的钱与现在的劳动者工作的收入价值可比的背后是要求拉近这样的劳动力价值差距，在世界的眼光下中国与世界的劳动力差距是大幅度缩小的，这样的劳动力差距的缩小，以前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和积攒的财富以现在年轻人与世界接轨的劳动力价值来重估的话，他们所积攒的财富是不可避免地要缩水的。如果他们的财富不缩水，必然是现在劳动力的价值缩水；如果当今中国劳动力价值缩水，则中国的崛起大业就要夭折了。中国的这样的通胀过程我们应当给予一个更好的词汇来形容它——国家崛起时的价格革命，这个价格革命的核心就是劳动力价值的飞跃。在历史上西方的崛起就离不开美洲金银进入西方后的物价飞涨，这个过程西方学者不叫大通胀，而是价格革命。这样的革命本身也催生了西方社会从封建到资本社会的转变，催生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在其后日本的崛起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物价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以劳动力价值飞跃而带来的物价上涨，不仅仅是愉快的，也是社会的高度发展。

所以我们知道中国未来的崛起，需要与西方世界一样的资本竞争力和劳动力竞争力，这个竞争力的背后就需要低利率。高利率是一个资本食利的过程，

所食利的利益是由劳动者工资买单的，而劳动力价值则是全球定价权博弈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要跻身世界，必然要压低利率，而低利率背景下的价格增加，不是什么通胀，而是与西方当年崛起时一样的价格革命，因为价值所对应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价值发生了改变，而不是货币的币值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我们不能被西方舆论所忽悠，这是价格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胀！

我们如何压低利率呢？在宏观层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国际货币霸权，然而在具体的微观领域，现金数量的多少，则是容易控制的，是大有可为的。2013 年央行采用 SLF 这个工具，而且在 2014 年初把这个工具的使用权利下放到 10 个省市进行试点铺开，就是在不同的微观领域注入流动性，解决中国的各种微观上的流动性风险。按照剑桥方程式的现金余额说，微观上现金的多寡，就决定了微观上的价格，这样的调控就能够非常好的解决微观流动性，在微观上博弈定价权。这个工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央行对于不同的风险资产已经明确会采取不同的利率杠杆来控制。如果央行在此对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有所倾斜，而且对于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陷阱有及时防范的作用，这个微观格局将是央行的一大进步。

这样的工具，现在是短期的，以后可以逐步长期化，可以利率差异化极大，可以下放更多省市，甚至可以下放到地市级。而到 2014 年中，有消息称央行将创设新工具 PSL，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相对于 SLF，PSL 将是一个中长期工具。这两种工具是央行直接面对商业银行的，是能够起到微观调控作用的金融工具。两种金融工具的组合使用，让商业银行的金融信用彻底与产业与实业抵押品等结合在一起，让社会信用能够通过微观上的通道与央行的货币信用和货币发行紧密的联系起来，将解决中国产业与金融脱节导致的利率畸形、产业利润与银行利润扭曲等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这里对抗美联储的货币霸权，学习日本商社的微观调控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时我们还可以让银行破产，采取对待小户倾斜的清偿政策，建立如西方一样的二元化利率，区分风险利率和无风险利率，再通过央行的债券购买和大资金在安全需求下不得不购买债券，建立活跃的债券市场。利用债券市场盘活流动性，流动性提高了促进债券涨价，债券价格上涨则债券的收益率就降低了。利率是与债券收益率相对应的，对此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手

段来降低利率的。因此我们应当更多的想一想怎么样能够让利率下来，也就是让中国资本的价格下来，这是中国拥有自己资本定价权的一个标志。对此是要有奋斗的过程以及过程当中的代价的，通胀就是这样的代价。对于追赶世界的中国，没有代价和痛苦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为了子孙的未来忍受痛苦的时刻，需要忍受这个痛苦，实现社会低利率化，从而跻身世界价格体系。

POSTSCRIPT 后记

本人是2009年开始财经写作的，把自己因为机缘巧合和家族传承总结的财经见解整合成书，从2010年到2013年先后出版了《霸权博弈》《资源角逐》《涨价的世界》《房势》《信用战》《房噬》六本书，对于其后到底写什么，原来最想写《信用逻辑》，作为《信用战》的第二部。但中央换届以来，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更上了一层楼，本人觉得定价权问题是中国当前更关键、更重要和更紧迫的问题，因此本人先写作了《定价权》这本书。

定价权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我查询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定价权的专著，本人的这部定价权著作也只不过是本人的一家之言。自从本人写书以来，就以资源价值、熵、供需曲线的扭曲和新价值论为个人立论的基础，以自己从事的多种行业和家族传承的知识积累为背景，从经济金融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我们的历史和未来。中国的崛起，需要有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独立认识。

世界的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多，关注经济背后财富分配和公平的少。发达国家掌握世界经济的话语权，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而他们在世界财富分配上也取得主导地位，分配世界财富并不是按照公平进行的。中国的崛起不光是我们要生产得更多，在分配上我们也不能吃亏，定价权更多的是决定世界的财富分配。我们不光是要认识生产力对人类的作用，也要认识生产力背后的分配关系。经济讲的是经世济民，经是经天纬地讲发展，济则是讲分

配关系。中国要崛起，改变世界的分配秩序才是成为命运主宰的关键。

本书的创作得到众多朋友的支持。感谢国家战略学者乔良将军和商务部顶级专家梅新育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本书的积极推荐，感谢助手薛晓明协助整理部分数据并加工文本，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对本书的支持，使得本书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希望本书能够对国家民族有益。

张　捷

2014 年 6 月于北京家中

延伸阅读



《大国空巢》ISBN 978-7-80234-856-1

人口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人物——易富贤先生的最新力作。本书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系统的批判，是不得不读的人口学经典。

《中国不一样》ISBN 978-7-80234-891-2

本书通过一种远距离观察中国的理论视角，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

《三九集团重组实录》ISBN 978-7-80234-945-2

本书作者为三九集团重组当事人，全程参与了三九集团重组工作。作者以实录的形式向我们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国资委拯救三九集团的全过程。

《超越授权：自我管理时代的到来》ISBN 978-7-80234-942-1

自我管理是一种人道、高效的管理方式，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大，海尔、联想、汉庭等公司正在不断学习并将其运用到实践当中。

《中国经济：盛世下的阴影》ISBN 978-7-80234-948-3

本书旨在透过当下中国经济的不同截面，进行全景式、立体式的扫描，以期撕开仍被盛世光环笼罩的经济疮疤。

《这个国家会好吗》ISBN 978-7-80234-808-0

本书从经济视角入手，力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并回答“中国会好吗”这一世纪之问。本书涉猎内容甚广：贫富分化如何产生、市场有哪些缺陷、地方政府如何定位……

《金融极权》ISBN 978-7-80234-811-0

本书通过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告诉了我们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宰世界的奥秘所在。原来，金融能够发挥出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能量。

《正能量投资学》ISBN 978-7-80234-919-3

本书通过讲故事、谈心理、做测试等通俗易懂的方式，希望读者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与专业知识相比，投资更需要的是眼界和心态。

《供应链为王》ISBN 978-7-80234-854-7

本书揭示了中国企业与欧美和日韩企业商战中的弱点，指出了中国企业应如何在“狮狼”合围下成功实现供应链突围。

《大通胀时代的投资真相》ISBN 978-7-5177-0036-4

本书从人们耳熟能详的“通货膨胀”这一关键词入手，为大家详解了当代世界的经济规律，指出了人们不同投资方式的优劣。

《中国创投 20 年》ISBN 978-7-80234-708-3

本书对中国创投行业 20 年来的起落沉浮做了全景式系统描述。李开复、沈南鹏、江南春、薛蛮子等众多创投行业“大佬”关注本书，纷纷推荐，为国内创投类图书少有现象。

《老板到底要什么》ISBN 978-7-5177-0045-6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年轻的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了解行业的趋势，更好地了解职位的要求，找到求职的着力点。

《人口危局》ISBN 978-7-80234-933-9

本书从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问题入手，细致地分析了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论断是多么荒诞。

《中国网络舆情风云》ISBN 978-7-5177-0055-5

本书以新旧媒体为立足点，全面展现了社会各界媒体的舆情导向能力，深入分析了近年中国社会若干大事件的始末，并提供了深刻理性地舆情分析和舆论导向。

《中国经济突围》ISBN 978-7-5177-0039-5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约束与内部困难相继浮现。如何顺利实现经济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突围是当前中国经济首要解决的问题。

《全球博弈：中美关系改变世界》ISBN 978-7-80234-447-1

本书是对国际政治宏观格局的把握，围绕中美关系考察当今的世界权力结构。以中美关系为线索，分析全球博弈之特点，推演世界大潮之动向。

《资本的傲慢》ISBN 978-7-80234-735-9

这是一本写给决策者和平民百姓的书。从行为经济学的运用入手，告诉了我们，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

《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ISBN 978-7-80234-736-6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在这里，读懂中国，看透未来，认清使命。

《中国经济大洗牌》ISBN 978-7-80234-755-7

本书从财政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新能源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前世今生。



《经济运行图：还原经济生活的原貌》ISBN 978-7-5177-0005-0

本书对当今经济运行中大众关心的主要经济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释，让您更加清晰地认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

《权力与“笼子”》ISBN 978-7-5177-0004-3

本书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梳理，既总结了县委书记落马的十大缘由及落马县委书记的九大特征，又总结了落马县委书记的教训和启示。

《中国 Hold 住了：潜流涌动的中国经济》ISBN 978-7-5177-0033-3

本书的核心着眼点是人民币汇率以及美国牵头搭建的两个国际贸易新平台。本书从中国的汇率制度与国际贸易发展入手，涉及金融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内容。

《中国经济究竟处在什么位置》ISBN 978-7-80234-892-9

本书讲述和分析了当下中国经济的严峻现实，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

《资本的力量》ISBN 978-7-80234-825-7

本书详尽地阐述了国内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活动时，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模式，并对股权投资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详细分析和研究。

《无知的经济学与中国经济》ISBN 978-7-80234-896-7

本书系统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我们处在一个结构复杂、不断变化的系统中，不存在一个万能的理论。

《世界经济大战》ISBN 978-7-80234-900-1

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关口，回望列强昔日“奋斗”之路，正视美国今时“称霸”之术，论其成败得失，当使国人自省自强，重返世界之巅。

《期货往事》ISBN 978-7-80234-918-6

这是一个期货人根据亲身经历改编的关于期货的故事，你可以在书中了解期货的运作原理和规律。

《中国经济盛世背后》ISBN 978-7-80234-855-4

本书从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入手，分析了当今中国经济盛世背后的诸多问题，指明了我们与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告诉了人们盛世背后的冰冷真相。

《中国离世界还有多远》ISBN 978-7-80234-851-6

“盛世”中的中国和危机中的西方依然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的缩短非短期能实现。本书客观地分析了这种差距，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ISBN 978-7-80234-758-8

“凯迪社区”浏览量过千万，帮你清晰把握时代脉搏。一本信息量巨大的经济通俗读物，人人都能读懂！本书实为深入解读中国经济问题和把握未来投资趋势的难得力作！

《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经济真相》ISBN 978-7-80234-759-5

本书从宏观经济政策解读入手，先后分析了 GDP 保 8 背后的就业压力，国进民退的结构性原因等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力图为读者展现一幅中国经济的宏观画卷。

《中国航母》ISBN 978-7-80234-763-2

中国为什么要造航母？中国为什么长期造不出航母？一本书让你全面了解中国航母。

《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ISBN 978-7-80234-769-4

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吗？西方一直就是那么文明吗？颠覆你印象中的西方文明。

《下一个泡沫》ISBN 978-7-80234-788-5

与泡沫一起膨胀的是人们的贪欲，与泡沫一起破灭的是人们的希望。告诉你经济兴衰的规律。

《金融之巅》ISBN 978-7-80234-795-3

一部美国投行的兴衰史！告诉你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的起起落落。

《看不清的手》ISBN 978-7-80234-944-5

看不见的手（市场）会失灵，看得见的手（政府）会出错，现实中的经济更像被一只“看不清的手”所操控。本书会告诉你后来者如何在这场身处劣势的竞争中反败为胜。

《快速读懂世界经济格局》ISBN 978-7-80234-796-0

本书帮你解决对经济不“感冒”、一看财经频道就想睡觉的问题。让你感觉到读懂世界经济格局并非那么难。

《谁来拯救世界经济》ISBN 978-7-80234-810-3

本书从个人选择与现代经济的运行机理出发，解释失业、贫富差距、债务危机以及经济大萧条等社会最关切的经济问题。

《资本的战争》ISBN 978-7-80234-932-2

本书回顾了中国股市几十年来关于举牌的各大事件，分析了其中的成败得失，力图为您展示一幅中国股市举牌案例全景图。

